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
岁月 1956|1958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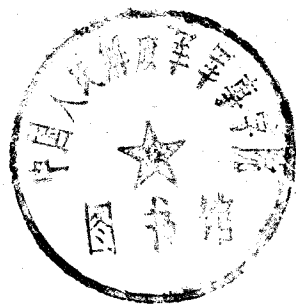


2 028 7970 5

莫斯科的 岁月

1956
1958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达洲 代军 丽敏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VELJKO MIĆUNOVIĆ
MOSKOVSKE GODINE

1956/1958

IZDAJE

SVEUČILIŠNA NAKLADALIBER-ZAGREB 1977

根据萨格勒布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宁成春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

〔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达洲 代军 丽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印张 505,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8,000

书号3002·221 定价2.05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南斯拉夫长期担任外交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并于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年两次出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

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南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作者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特别是南苏关系的变化情况。叙事生动，内容丰富，有分析，有评论，既是一本回忆录，又是一本有关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书籍。该书在一九七七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向〈文学语言〉杂志发表的谈话》一文，发表在南斯拉夫杂志《文学语言》第100期上。作者在这里对本书的写作目的作了详细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想法和书中涉及的一些事件的背景。我们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作为中译本的附录，供读者参阅。

作者在出版中译本时，对原书内容作了少量的改动。

一九八〇年三月

作者的话

一九五六年三月初，在我被任命担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之后，我开始就我的新工作做笔记。同月底，我一抵达莫斯科，就日复一日地把我在新职务上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首先是南苏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样，在我第一次赴苏任职的将近三年时间内，就记下了大量的笔记。

对这批材料的整理工作只是把二十年写下的文字压缩一下。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这件事拖延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得学会用左手写字，一九七四年七月初我突然得了一场无法痊愈的病之后，我的右手永久地丧失了。

关于这里谈到的极大部分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南苏关系的发展，我国公众是及时地了解的。这本书要做的是，提出有关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期间南苏关系发展的个别事实。在我看来，这既是《莫斯科的岁月》这本书的好的一面，又是这本书的不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可能在于书中所谈的一切都具有文献的性质。消极的一面可能在于由于追求翔实而陷于罗列事实和枯燥地列举所发生的事件。

这里谈的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的大多数参与者已经不在人世，尽管如此，局势以及南苏两国那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仍然保留自己的根本特点。南苏关系今天跟以前一样，仍然是我国公众和国际上瞩目的中心。从种种情况来看，南苏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仍将有其现实意

义。南苏两国间合作的程度和形式不断地经历变化，诚如整个国际关系经历变化一样。我们两国的关系在逐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今天的状况同这本书里所谈到的二十年前的状况已大为不同了，不过南苏关系的基础依然没有改变。

我相信，我们年轻一代有兴趣于了解南苏关系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了解作为某些事件的参加者之一的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相信，别的人也对这些事件有兴趣，虽说老一代的人早就知道，当时的某些重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收场的，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莫斯科的岁月》的问世可能对理解南苏关系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裨益。这又只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爱好和平和不结盟的政策。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于伊加洛疗养院

目 录

作者的话	1
赴苏前夕	1
清除过去的陈迹	16
克里姆林宫的晋见	26
南斯拉夫政策中的“不正常做法”	48
铁托访问苏联.....	63
莫斯科宣言	80
莫斯科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	97
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危机	1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南斯拉夫的秘密信	134
铁托和赫鲁晓夫访问克里米亚	146
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匈牙利事件	161
暴风雨般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185
铁托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发表演说	205
南苏关系恶化	230
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新年	252
中国的调解作用	266
关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	280
对南斯拉夫提出新的指责	291

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	308
尼·谢·赫鲁晓夫的地位加强	325
中国和蒙古之行	338
南苏关系改善	349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联最高层的一场较量	367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以后	390
铁托和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和 二日的会晤	405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朱可夫元帅被撤换	423
庆祝十月革命和莫斯科各国党的会议	441
又一个岁暮时节	459
苏联继续展开“和平攻势”	478
第二次去蒙古	496
围绕南共联盟新纲领同苏联发生冲突	516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和 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激化	535
取消信贷协定	556
纳吉·伊姆雷遭杀害	573
近东出现危机的苗头	592
离开苏联前夕	609
向尼·谢·赫鲁晓夫辞行	619
写在“完”之后	643
附录：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向《文学语言》杂志 发表的谈话 ——《莫斯科的岁月》一书作者回答问题	653

赴 苏 前 夕

南苏关系正常化后贝尔格莱德的气氛。南斯拉夫这颗政治明星仍在上升。南斯拉夫领导的团结。贝尔格莱德的辞别晚餐。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贝尔格莱德。

过两个星期，我就得动身去莫斯科，担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的职务。这是铁托总统和我们领导在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以后作出的决定。

我不知道，在莫斯科等待着我的一切是什么。早自一九四六年起，我就在我国政府不同的政治机关里主管南苏关系，已有十来年时间，同志们认为，我很了解在莫斯科等待着我的工作，认为可以依靠我。直到前不久，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随着我启程的日子日益临近，对我来说，俄国越来越象一座我不认识的笼罩在云雾中的高山。

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因素，一种不只是同上路前的旅客怀有的忐忑不安心情有关的因素。我过去十来年所做的工作同莫斯科正等着我的工作这两者之间就我的地位而论，有着重大的区别。在这里，我是南斯拉夫这个大集体的一员，这个集体，理所当然地使每一个人得以发挥最大的个人积极性，同时又使他在工作中免犯大的政治错误。在作出涉及南苏关系的决定的过程中，“上面”和“下面”都有许多把守严密的关口。我们这里有数以

十万计的人参与这件事，照例使人不至于在政治上“走上歧途”。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将是另一副样子。在莫斯科，我将处在突出的阵地上，而且不是作为行将发生的事件的旁观者。

对于我们和俄国人来说，现在需要的干部不同于这几年来我们和他们都大批拥有的那种干部。我们现在需要的人，要能够保证把我们去年六月庄严地宣告的正常化政策付之实施，要懂得和能够照“新精神”办事，而不是老是按“旧章法”办事。好几年来，数百万南斯拉夫人，几乎是我国全体人民参与了我们对苏联侵略政策的抵制。我们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基本上我自己也是这一类“专家”之一，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另一类的专家，正如他们曾经成功地同俄国人进行政治斗争那样，他们至少懂得同样成功地同俄国人合作共事。

我认为，有若干原因使得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要比苏联好得多。是俄国人把冲突强加于我们，而不是我们强加于他们。从冲突的第一天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时为止，以及包括后来，南斯拉夫曾多次建议结束冲突，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合作。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斯大林死了，甚至在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多时间，他的继任者才接受南斯拉夫的这些建议。

最后，南斯拉夫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小国，而苏联是世界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南苏两国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合作的基本概念和感情是不同的。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小国，这种感情是很强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是小国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象苏联这样的大强国，追求平等的感情是很微弱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种感情，因为它们由于是大国而不需要这种感情。

现在在南苏关系上这一切都在双方经受考验。我们得恢复合作和我们之间的信任。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跟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一样，建立要比保持来得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也好，在国

与国之间也好，如果一位伙伴滥用了这种友好关系并弃之如敝屣，就象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对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那么这种友好关系是很难恢复的。因此，南苏关系的正常化迈着小步子，以缓慢的速度取得进展，经过很长时间才达到我们去年六月间的“和解”。

铲除斯大林给他的继任者们留下的，特别是在南苏关系中留下的废墟的工作，是由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主持进行的。南斯拉夫人在这上面，即便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关系上也是爱莫能助。钥匙仍然在俄国人手里，斯大林死后的两年内，大门只打开到俄国人愿意打开的程度。不过，在南苏关系正常化以前的时期内，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多年来强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战争悄悄地停止了，俄国人一停止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未经商议就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和停战。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第一次互派大使以来，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下面这一点表明了我们之间的私人的关系怎么样，且不说官方的关系如何了：从一九四九年秋天以来，在贝尔格莱德也好，在莫斯科也好，在联合国也好，在我们见面的其他一切地方和政治场合也好，俄国人跟我们连话都不说。他们在见到我们的代表时，连招呼都不打。唯一的例外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在两国外交部里递交和拒绝接受抗议照会时，而这一活动几乎成了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和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留下的一小批低级职员的工作。

鉴于俄国人许多年来把这样的关系强加于我们，我认为，我们驻莫斯科代办D.久里奇所遇到的一件事就不足为奇了，据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死去后的两三天内。苏联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雅可夫·马立克向我们的代办伸出手去，后者当时正同一批外国外交官就（苏联蒙受）最沉重的损失向马立克表示悼念。马立克同我们的代办握了手这件事，我们的

代办用密电报告了南斯拉夫政府，因为苏联官方的一位代表在公开场合同南斯拉夫的代表握手，这的确确实是件大事。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政府决定指派我为驻莫斯科大使，这肯定不会使苏联政府高兴。俄国人总是把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划分为亲苏派和反苏派。我觉得，照苏联人的评价，我早就属于那第二类人，虽说我认为，俄国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对。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还在我的故乡——黑山的韦莱斯托沃村的时候，俄国便是作为黑山人的朋友和“保护者”为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国家。后来，我从书本上读到，沙皇俄国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时代起，一直到十月革命时为止，始终在援助黑山这个巴尔干的第一个自由国度，俄罗斯帝国的忠实盟邦。我还很早就了解到，许多代的黑山人一生都觉得自己不仅是俄国的忠诚友人，而且是俄国沙皇的最忠实的臣民，把俄国沙皇看成自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解放斗争中的强大保护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久远的过去，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马克思，接着是出现列宁和共产党人之前。

我这一代人只能是，也确实是，双倍地亲俄国的，因为我这一代人是在黑山这种强烈的亲俄国的悠久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多少世纪以来，黑山一直是同自己的“俄国保护人”联结在一起的。十月革命的思想 and 胜利，使得这种联系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力量，可以说是得到了新生。因此，在俄国的内战还在进行的日子里，十月革命和我们共产党的思想在黑山很快就为人们广泛地接受，就不足为奇了。黑山的这场运动的参加者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我们当时几乎还没有工人阶级。

在后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气氛中，我于一九三四年，在我十

八岁的时候，作为策提涅的一位中学生，参加了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好了，关于这些，我就不再写下去了。我只想说，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们同苏联政府的代表发生最初的一些冲突时为止，我跟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觉得苏联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几乎是一个崇高和神圣的地方。我在想到和谈到斯大林时的那种激情不亚于苏联和世界上的他的千百万信徒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现在想起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我作为游击队洛夫钦支队的政委拍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当时，我们的解放战争和苏联反对法西斯征服者的卫国战争正处于紧张关头。我手头没有这封电报，战后，我们的一本人民解放斗争文件集中曾发表过这封电报。我清楚地记得，就内容也好，就措词也好，它都象是信徒在祈求上帝：你，总揽一切者，缔造者……全是这样的调子，象一篇誓言或者象一篇祷文。

不过，这种激情在我身上早在战时，特别是战后不久就减弱了。在我们同俄国人发生冲突之前很久，我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代表的正式会晤越来越不愉快。在这方面，俄国人很早就预示了将于一九四八年降临我国的那场风暴，虽然我们当时未能相信其中的许多迹象。

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各国共产党“大家庭”的消息，成了最轰动的政治事件，传遍了全世界，那时我们在南斯拉夫召开了著名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有点象是国家在面临战争时才采取的总动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也发了言。我的发言不完全符合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的发言片面性大一点，更加尖锐。但是，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发言的薄弱的一面是对苏联的尖刻，这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却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被人们所接受。第二天我们获悉，苏联代表把我在大会上的发言看成是证明

南斯拉夫奉行反苏方针的一个证据，而他们以前就在指责我们奉行反苏方针。

我们同苏联发生冲突后不久，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部，一九四九年以及一九五一年我被指定参加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这些会议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南苏冲突当时处于世界公众瞩目的中心。

一九四九年，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南斯拉夫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维护我国的安全，对于制止斯大林使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反对我国来说，这次选举具有极大的意义。当然，俄国人跟我们一样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因此苏联代表团一九四九年竭尽所能阻止南斯拉夫选进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当选的话，等于苏联在同我国的冲突中政治上遭到失败。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安·扬·维辛斯基。他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代表团的态度最为恶劣。我想象，在莫斯科三十年代对布哈林和被弄死的苏联其他领导人的骇人听闻的审讯案中，维辛斯基作为斯大林的国家检察长的行为，大概跟那时对我们的态度差不多。在联合国大会这次会议上，苏联在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遭受了惨败，因为南斯拉夫被选进了安理会。

我们不得不进行的这场斗争给我国代表团以及给在南斯拉夫的我国最高政治领导留下恶劣印象的，不只是苏联以前的国家检察长安·扬·维辛斯基的态度。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料想到的。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英国代表团投票反对把南斯拉夫选进安理会，而赞成苏联提名的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当时执政的是工党政府，由贝文大臣代表工党政府出席联合国这次会议。贝文大臣这么做，似乎是想确认一条老的原则：英国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不是永恒的，唯有英国的利益是永恒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在英国议会尖锐地谴责了英国代表团在安理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一九五一年于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另一次会议上，我们同苏联的冲突正式国际化了并完全表露在外。我们指控苏联对南斯拉夫奉行侵略政策。应南斯拉夫的要求，这一点作为特别的一项列入了大会政治委员会的议程。我国代表团团长是爱·卡德尔，而密·吉拉斯^①是我们驻政治委员会的代表。他发了言，代表南斯拉夫在联合国这个崇高的讲坛上指控苏联。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绝大多数代表支持南斯拉夫的立场。在投票表决时，苏联完全孤立并被击败，总共只有东欧国家五票站在它一边。

从一九四八年起，俄国人就竭尽所能，防止我们的冲突所谓国际化，竭力让其他国家，首先是让西方各大强国认为，这场冲突不过是共产党家庭内部的争吵，应当让作为家长的苏联去解决。我们的观点则从一开始就相反。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先是一九四九年在纽约，继之是一九五一年在巴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个最高“世界法庭”上取得了苏联的最重大的政治胜利。

两年以后，要我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想这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就约·维·斯大林去世表达南斯拉夫官方的悼念。当时我们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只保持在代办一级。

在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里，我见到了这位代办，我记得他叫祖鲍夫。按照惯例，他穿一套黑衣服，眼睛红肿，很可能是由于哭泣或者失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一间挂着一帧四周蒙着黑纱的斯大林巨幅像的房间里，他合乎礼仪地、几乎是热切地接待了我。我按照礼仪规定，代表南斯拉夫政府说了，几乎是慷慨激昂地说了表示悼念的话，但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听起来，这不仅不

^① 按“吉拉斯”以前被误译为“德热拉斯”。在塞尔维亚文中，为Ђилас，拉丁化写法为Đilas或Djilas，Dj系一个字母，被误以为两个字母，遂被误译为“德热拉斯”。——译者

象是悼念，倒有点象对发生了可庆幸的事件表示祝贺的味道。既然在我看来尚且如此，我可以想象，在祖鲍夫的耳朵里听来会是怎样。我没有打算让这一切搞成这副样子，尤其是我没有打算亲自伤害祖鲍夫的哀伤的感情，但是，要让南斯拉夫对苏联政府的正式悼念变成另一副样子，变得好一些，要有所作为已经晚了。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们等待苏联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我们在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文件草稿，准备作为我方的方案同尼·谢·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讨论。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我们在爱·卡德尔家里开会，会上我们讨论了这个稿子。这个会，我们开了一整宵。据我记得，到会的还有亚·兰科维奇、科查·波波维奇、韦·弗拉霍维奇和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等同志。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只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文件后来以《贝尔格莱德宣言》的名称出了名，俄国人基本上接受了，虽说对它并不满意。

这一切俄国人都知道，关于我在我们这十年的冲突期间的工作，还有许多事情，他们都知道。关于我对我们的关系的看法，他们也得到详细的报告。我丝毫不怀疑，俄国人对于挑选我当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是不满意的。这种情况决不会方便我在莫斯科的任务。但是，我认为，即便如此，我们仍又以平心静气处之，因为“不打不相识”吆。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贝尔格莱德。

我昨天写下的这一切，今天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思路老是把我把拖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迹象。

我们同俄国人一起郑重其事地宣告了刀枪入库，接受了我们两国间关系的正常化，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中“黑字写在白纸上”，为我们两国现在和今后的关系确定了新的政治基础。但是，问题

在于俄国人对这是怎么看待的，因为《贝尔格莱德宣言》出自南斯拉夫夫人之手。俄国人同我们一起签了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他们和我们对此仍然有不同的想法，尽管我们在同一个文件上庄严地签了字。

根据对苏联现行政策的观察，不难看出这种差别。我们把《贝尔格莱德宣言》看成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大宪章”，它应当适用于南斯拉夫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果不象英国大宪章保持那么久远，无论如何也该保持好多年。从种种情况来判断，俄国人把这一文件看成没有什么特殊的持久意义的有关两国眼前事务的一时的条约。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通过《贝尔格莱德宣言》在同苏联这个“第一个和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在走向平等和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且这不仅是为了它自己，也是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令仅仅在潜在的意义上是这样。从俄国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们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可以奉行一种政策，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可以奉行另一种甚至是相反的政策。

从我们所了解的种种情况来看，俄国人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是一个很差劲的文件，因为它是“国家”性质的，而不是“党的”性质的，因此需要尽早用一个新的、比较好的文件来替代它。这个新文件将在莫斯科写成，出自苏联人之手，这一点本身就会使新文件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俄国人看来，《贝尔格莱德宣言》离开这种精神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他们在上面签了字，因为他们不想两手空空回莫斯科，但是意味深长的是，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团团长却拒绝在上面签字。代替他的是布尔加宁，他以总理的身份签了字。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贝尔格莱德。

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对南苏关系正常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些西方国家很可能希望，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这场冲突永远不要结束。在例如美国同西半球的任何一国的关系方面，俄国也有某种类似的想法。双方采取这样一种观点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不难理解一九四八年以后西方之所以对我们奉行支持的政策。我们的基本利益要求我们向四面八方寻求援助和支持来对付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咄咄逼人的压力，接受有助于捍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的任何援助。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方向我们提供我们能够接受的那种援助，又有它自己的利益。

这种情况已经多年了，就如我们同苏联的冲突已经多年了一样。鉴于我们同俄国人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西方强国似乎已经习惯了，几乎把这场冲突看成是国际关系中的某种持久的因素。

现在，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在西方强国和其他国家对这个国际问题的既定政策中引起了一定的混乱。《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签署，使得东西方斗争中本来指望“长期利用”的一个源泉突然枯竭了。西方国家处于“在行进中变换队形”的地位，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主义”，也包括对南斯拉夫，因为它也是所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一部分。

我写下这些主要是因为现在对于在贝尔格莱德的我们来说，西方国家睁大了“四只眼睛”，想断定俄国人和我们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的真正的规模，并对在这条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作出新的评价。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冲突，我们同西方强国的关系很开展，很好，这些国家现在将把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发生的一切拿到显微镜下来观察。西方现在将郑重地估量，南斯拉夫是否会放弃

自己的独立立场，我们同莫斯科的接近是否意味着南斯拉夫逐步地重新回到苏联的政治轨道。

俄国人评价我们的政策的标准，只是看起来是相反的，而实际上是类似的。他们认为，只有我们同西方的关系恶化，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诚然，俄国人在同我们谈判使关系正常化时，对于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畏之如火，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说。相反，给人的印象是，在这一点上对于南斯拉夫的政策没有任何意见。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赫鲁晓夫。他两次说，他们对于我们向美国和西方要贷款不仅没有意见，而且苏联也打算要这样的贷款，当然是指不附带政治条件的贷款。

我们吃不准俄国人是否果真这样想。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又一个迹象，赫鲁晓夫代表团很关心的是使他同我们的谈判顺利地结束。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肯定，这次谈判决不是俄国人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提出批评的场合，因为他们来到贝尔格莱德，是要让我们相信，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试图改变南斯拉夫的政策。

斯大林死后，俄国人显然需要“南斯拉夫通行证”，以便他们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在同南斯拉夫“和解”以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才动身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新德里成功地抬高了贝尔格莱德之行的成果的价格，因为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有助于说明，苏联对印度以及对亚非其他新兴国家的政策朝好的方向发生变化。

毫无疑问，如果俄国人继续以搞坏我们同西方的关系为条件的话，那末我们是很难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有根本的改善的。这意味着俄国人仍然不打算接受现实存在的南斯拉夫。对我们来说，困难将增加，因为西方也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自己的条

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得逆流而上。如果我们由于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减轻了苏联的压力，西方的压力就可能增加，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如果西方的压力代替了东方的压力，我们要按照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独立的方针来巩固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我们是不会有有多大作为的。

麻烦的是，东西方的主要强国实际上都不承认小国在对外政策上有可能独立行事，有可能既同东方又同西方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要是南斯拉夫做到了这一点，很可能其他许多国家也会走上同一条独立的道路，摆脱今天主宰着国际关系的两个军事集团。这样的前景对于今天的集团政策来说是个威胁。我们迄今的对外政策的特殊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贝尔格莱德。

昨晚我们在阿夫拉莫维奇大街的政府俱乐部就我前往苏联举行了一次晚宴。有十来位同志出席，其中有：卡德尔、兰科维奇和科查·波波维奇。晚宴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我们这些最杰出的人士乐意接受我的邀请，他们的出席最好地说明了我们最高领导对于对苏关系，也即对于我在莫斯科的工作关心的程度。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晚宴期间的主要话题是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的中心是苏共二十大，更确切地说，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二十大后，俄国人为了表示信任，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送给了我们。我们中央本月份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个报告。这是整整一本书。报告宣读了很长时间，但是人们的注意力格外集中。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我们一致赞成赫鲁晓夫的报告，认为报告具有历史意义。

赫鲁晓夫的报告为什么是秘密作的，而不是公开作的，从而使苏共二十大上的这次最重要的事情成了秘密，不为苏联公民和世

界公众所知晓。我们就这一点谈了很久。在苏联公众不了解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了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转折何在的情况下，能否谈论这种转折呢？在苏共代表大会不公开的会议上秘密地谴责斯大林，而同时在这同一个代表大会上又公开坚持苏共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而这意味着三十年来一直领导着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出席这次晚宴的某些人说，我们在十分重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必须以苏联官方公开宣告的政策，也就是说以苏联领导的行动为依据，而不能以在二十大不公开的会议上的秘密讲话为依据。莫斯科过去多次秘密讲的是一回事，公开做的是另一回事，对我们也好，对别人也好，在同我们的冲突之前也好，冲突之后也好，一贯如此。归根结底，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不是按照斯大林的功过谴责他，而是把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谴责主要局限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某些事例，而且又只是指苏联的事例。

被苏联领导无端地搞死的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赫鲁晓夫连秘密地都没有谈到，而是主要谈到了苏共几位无辜地被弄死的著名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连一句话都没有谈到，直到昨天为止，苏联还在把杀害无辜和正直的人们，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同一个制度强加于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各国。现在俄国人似乎承认这些国家在消灭最杰出的共产党人方面享有“独立和平等地”了。现在就让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摆脱俄国人“独立地”去断定，在这些国家里谁要对那些罪行负责！俄国人甚至在二十大上，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所犯的罪行问题上，还在替斯大林洗刷。

在昨晚的宴会上，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这样和类似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这样和类似的意见。关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在斯大林试图使南斯

拉夫屈服期间对共产党和政府最杰出的领导人的杀害，谈得很多。我们抵御了苏联，但是俄国人却因此而把最恶劣的版本的斯大林主义强加于“人民民主”国家。俄国人失去了南斯拉夫，但却因此而使阵营斯大林化了。

晚宴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在晚宴期间，除了上述意见外，还对苏联的政策提出了别的批评意见。据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的主要缺点不在于报告的内容，尽管在内容方面也有该受到指责的地方，而在于报告的秘密性。据认为，另外的一个弱点是死去的斯大林现在遭到他的最亲近的合作共事者的谴责，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忠于他的。在现在受到谴责的那段时期，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我们的告别晚宴上，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每当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批评和保留越来越多，对苏联未来的政策越来越怀疑的时候，卡德尔就出来讲话，提醒我们注意有些说法过头了。这种过分的批判态度可能使人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整个代表大会作出错误的估计。赫鲁晓夫没有象我们南斯拉夫人早就做的那样，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地批判斯大林，意味着赫鲁晓夫不可能走得比已经走的还远。这是苏联现在的政局的现实状况，不只是为了赫鲁晓夫看待整个问题是否比他就斯大林所说的话更为广泛。如果有什么应当使我们感到惊奇的话，那就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勇气和力量，他就斯大林说了他已经说了的话，我们不应当批评他没有讲得更多。

我们一致同意，赫鲁晓夫要是公开讲了，那就更好，情况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但是这不应当缩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意义。我们在估量苏联的局势，特别是苏联最高层的状况时一致认为，对于俄国人来说，选择只在于：是秘密地作一个这样的报告还是不作，而不在于报告应当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报告只能是，要么是

秘密的，要么就不作。

在晚宴过程中，对我在莫斯科的工作谈得很多。占上风的想法是，在苏共举行了这样一次二十大后，我的主要任务大大减轻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尽管是秘密地提出的，在苏联已经广为人知。现在，南斯拉夫在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余地要比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人在二十大以前所能预料的为大。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致函苏共中央，表示我们一致支持二十大的各项决议。我去莫斯科时，在进一步发展南苏关系方面，将给赫鲁晓夫带去铁托的最良好的口信。

清除过去的陈迹

关于南斯拉夫的“胜利”和苏联的“失败”的口号。同铁托谈话。在泽蒙的送别。同苏维埃国家第一次见面。回顾历史。抵达莫斯科。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贝尔格莱德。

尽管我的任命十来天前刚发表，在贝尔格莱德这已经有半年时间不成其为秘密了。对于驻这里的外交团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这里的外交团照例立即了解到外国人有兴趣的我们内部的这一决定。驻这里的外国代表几个月来一再来找我，表面上是来找副外长，而实际上是来找南斯拉夫驻苏联新任大使。他们办完自己的事，就缠着我。他们想起某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或者想出某个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要求约会，花几分钟时间同我谈这个问题，随后就谈开了苏联和南苏关系。

西方国家大使在会见时，没有任何人批评南斯拉夫的政策。相反，全都赞扬南斯拉夫，谈到我们对苏联的“胜利”。他们说，他们也准备同俄国人改善自己的关系。同时，又说服我，说这完全取决于俄国人。

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宣传掌握着十分强大的机器、巨额资金和大批人员，而且具有全世界的规模。他们通过宣传我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来谈论南苏关系，以为这样将最有效地影响我们今后同苏联的关系。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贝尔格莱德。

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浏览有关从南苏关系正常化政策来看“人民民主”国家的状况以及这方面的事件的文件。

对于自己的同南斯拉夫“和解”的政策，俄国人大概没有征求“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同意，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经与莫斯科协商，已经使自己的对南政策同苏联对我们的新态度相适应。

* * *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新政策如果贯彻执行的话，现在就会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一系列居统治地位的人物下台。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仿效大暴君，无辜杀害自己最亲密的合作共事者的同一些人不仅还活着，而且还在掌权。如果赫鲁晓夫谴责已经死去的斯大林，从种种情况来判断，做得颇为不易，那么对于匈牙利的拉科西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类似的一些人来说，要谴责自己，那就更是困难得多了。

俄国人希望奉行“非斯大林化”政策，同时又打算象在斯大林时代那样牢牢地控制住“阵营”。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做到这样的两全其美。若是要作选择的话，我认为，遭殃的将是“非斯大林化”这一新政策，而不会是“阵营”，俄国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阵营”，因为事关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胜利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在莫斯科不存在“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之分。大概以后也不会有。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贝尔格莱德。

我最近一次在铁托同志的乌日策街十五号办公室里同他会见时，我竭力想搞出个对我们大家一无例外都适用的同俄国人打交道的一般准则，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贝尔格莱德，不论是办外

交，还是做生意，不论是党内还是别的什么部门。铁托在结束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说了一番结论性的话，说就我而论，我不同俄国人发生冲突，不同他们吵架。但是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也不要向他们让步，说我将有可能帮助使这条准则付之实现。

我对铁托同志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做，那将有极大的意义。我自己担心，俄国人会不断地施加压力，要求我们让步。我不会让步，我也不应当同他们吵架，而不让步通常就会吵架。铁托笑了起来，说正因为如此才把我派到莫斯科去。我说，如果非要我来选择的话，从我这方面决不会让步，倒有可能吵架，虽说我并不想吵架。铁托重申，既不要让步，又不要吵架。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让俄国人去吵架，而我们则不让步。

我还同铁托谈到两个月后他对苏联的访问。这是八年前我们两国发生冲突之后，铁托第一次访问俄国。这一切从政治上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不仅对我们和俄国人是如此，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是如此。尽管我将定期向政府和外交部报告，铁托要求，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向他本人报告。至于他对莫斯科的正式访问，铁托说，现在一切听凭俄国人去安排，在访问之前我必须回贝尔格莱德磋商。

接着，我向铁托同志谈到，我们同俄国人的经济关系史引人注目的程度决不亚于我们同他们的政治关系史。俄国人直到现在仍跟过去一样，把任何贸易当作政治的直接手段。我们担心，为我们的炼铝厂提供的信贷会遇到这样的遭遇。

一九四八年以后，俄国人单方面地撕毁全部贸易协定，接着又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我提醒铁托同志，我们去年曾就此事同赫鲁晓夫代表团谈过，并把俄国人直接间接地使我们蒙受的损失的一个很大的数字告诉了俄国

人。赫鲁晓夫拒绝把这列为我们会谈的内容。他说，即便我们的数字小得多，他也不想向我们“付赔款”。第二天，俄国人向我们提出了南斯拉夫欠苏联的债的数字。其中的主要一项是苏联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向我国军队提供的作为战利品得到的武器。俄国人的数字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大。我们同赫鲁晓夫谈判时的“经济卷宗”跟国与国之间在这样事情上发生纠纷时的正常的文件差不多，而俄国人却拿来了厚达一印张纸的文件，宣读自己的要求。显然这是在我们提出要求之后，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一夜之间搞出来的。

当我们得出结论，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把这个问题搁下，谈判别的问题。这对俄国人施加了某种压力，使他们越来越担心，在我们之间可能根本达不成什么协议，因此在接受我们的某些政治观点上比较容让。随后我们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一笔勾销”我们相互间过去的财务方面的要求。

关于“军事方面”的合作，我同铁托商定，我们暂不提出。我们还需要时间看一看，在苏联对我们和对别人的总政策上，我们处于什么地位，得等铁托访问莫斯科之后再说。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赴莫斯科途中。

很早我就起床了。米什卡^①也睡不着，因此在天亮以前我们就在一起了。在最后的这次谈话中，我们互致良好祝愿，也对情况不明表示担心。我们谈到下月底要出生的我们的第二个孩子。

上午九点左右，我来到泽蒙^②小机场，以便搭乘苏联飞机，一架双引擎的伊尔-14。这是美国达科他式小型客机的苏联变种。

① 指作者的妻子。——译者

② 贝尔格莱德市郊。——译者

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令人遗憾的是，要飞一整天。我已经同自己最亲近的人，同要好的朋友告别过了，要他们大家不要去泽蒙机场，他们也都同意了。我本以为机场上会是一番正式的送别，我们的外交部派一、两名代表，苏联大使馆来一、两名代表，别无他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在小小的泽蒙机场的不大的机坪上站满了我的朋友，尽管我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告别过了。他们中间特别显眼的是一批南斯拉夫人民军将领，我的同乡——黑山人，我们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些著名的司令官和政治委员，他们身穿制服，是从办公地点径直前来的。显然，对于我们的礼仪规定，他们不感兴趣，按照这些规定，在这种场合他们不能穿着制服来到泽蒙机场，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无所谓。外交部和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消失在这一大批南斯拉夫官员中间。

苏联大使馆的代表看到这个场面而感到意外的程度，很可能超过我们。除了按照“官方的方式”理解这一切之外，他们很难作别的理解。而这就是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我国政府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来送别南斯拉夫驻莫斯科新任大使。事实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还有我，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这样的送别使我很受感动。我和送别我的同志们都觉得，我们一时又回到了我们战争和革命的最美好的日子里，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富有人情味的，相互间的信任是无限的，只有在一起打过仗，每时每刻都准备为共同的思想相互间献出生命的人才能做到这样。

尽管我们在南斯拉夫掌权已经有十来年了，等级关系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到处占上风，还没有完全占上风，虽说权力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快地使人变坏，使他们的道德败坏，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战后同斯大林的多年斗争极大地帮助我们，使我们保住了过去时期和青年时代的人的某些品德，使这一败坏的过程放慢，因

此，我们身上最宝贵的、正越来越成为过去的那些特点才始终还有可能自发地、突然地迸发出来。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泽蒙对南斯拉夫新任驻苏大使的这番游击队式的违反礼仪的送别，多少表明了这种精神。

对于我来说，这还有一点政治性的含义。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虽说涉及到的是在我们政府、党和军队内身居要职的领导人，他们今天完全清楚我们对苏联的政策，但是我感觉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真诚地希望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迅速地得到改善。似乎认为在这条道路上不应该再有什么障碍！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对我这么说，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前几天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我的辞别晚宴上，也可以感觉到某种类似的情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并且程度要轻得多罢了。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赴莫斯科途中。

与我同行的有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他被任命为我们大使馆里的一秘。在我们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中，他已经“出师”了。他在索非亚工作了三年。恰好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几天前，他告诉我，除了南斯拉夫外交代表通常受到的种种恶劣待遇之外，保加利亚当局还在他的卧室楼上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辘轳，或者类似的什么装置；这个装置不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成年累月，大概每隔十秒钟就自动地撞击一下地板。拉伊夫对我说，他完全知道，在他顶上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保加利亚人住，这是一个自动装置，以为在他顶上住着活人，那样去作出反应是毫无意思的。但是他又克制不住，特别是在深夜，对于保加利亚警方的这个自动装置的撞击声，他随手操起东西就敲打自己房间的天花板。就这样，保加利亚警方的这个发明表明是有效的。

把拉伊夫在索非亚任职的几年看作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岁月，

甚至还不止于此，那是公正的。在索非亚呆过之后，对他来说，莫斯科很可能显得象是巴黎。我就要差一些，因为我既没去过保加利亚，也没有在东欧呆过，莫斯科是我在国外长期任职的第一个地方。

飞机里有十来个苏联公民。看来象是苏联同国外打交道的各式各样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我试着同他们中偶而同我目光相遇的某些人打招呼。我想认识一下，交谈交谈，不仅是作为在小小的机舱里要度过一整天的旅客。我的想法是：他们是我在自己的新工作中遇到的第一批苏联公民。他们可能有兴趣于同为了恢复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前往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新任大使交谈交谈。我没有成功。苏联公民继续沉默不语。迪兹达雷维奇和我觉得，光是我们两个人交谈，颇为难堪，但是俄国人就这样把沉默强加于我们两人。

大约十四点左右，我们抵达拉沃夫。我平生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使我自己感到奇怪的是，在同“苏维埃国家”的这第一次相见不仅没有产生任何激动，而且没有任何感受，而这种相见多年来是我终生的愿望和最美好的梦想。当年的梦想成了现实，而我却没有好记载的。难道斯大林已使我们的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致使多年来一直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祖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第一次进入“苏维埃国家”时的感觉完全象旅客，象到了异国他乡的外国人？

俄国人把我们 from 飞机上带到机场大楼。我问一名苏联向导，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抵达莫斯科。他不回答我。我问另一个向导，他说会“及时”通知的。他们把我们安顿在国际候机室。除了我们那架飞机上的十来个俄国人和我们两个南斯拉夫人外，别无他人。向我们提供了午餐。只有一个菜——鸡。我什么也不想吃，再说这只冰凉的鸡还不知道是否是“及时”烤出来或者烧出来的。招待我们的女服务员见我对规定的菜连碰都没碰。毫无疑

问，他们已经告诉她，我是谁。她对我说，如果我不想吃鸡的话，我可以得到鸡蛋。

在我们这十来个旅客四周老有些穿制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比全体旅客合在一起还要多。制服是各式各样的：有绿色的、灰色的、橄榄色的、蓝色的和其他颜色的。全都在干着什么，来来去去的，而我们这十来个旅客全都坐在桌子旁边，一声不响。我觉得，我们似乎到了一个仍在进行战争的国家。我试图对这样的气氛作出解释，责怪我自己在同“苏维埃国家”第一次相见时抱有这样的情绪。拉沃夫是苏联的一个边境机场，从西方和其他地区来的外国旅客经由这里进入苏联，因此苏联警方在这里增强了控制。

接着我还想到，拉沃夫不是真正的俄国城市，这还不是俄国，甚至还不是乌克兰。这个城市是斯大林根据一九三九年同希特勒达成的瓜分波兰的条约从波兰人那里夺来的。今天的苏波边界同斯大林和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密商的边界一模一样，在这次密商之后，希特勒才得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垮台，斯大林的胜利，社会主义波兰的宣告成立，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莫斯科和柏林一九三九年秘密条约确定的苏波两国间的边界。我感到奇怪的是，公众很少意识到这个重大事实。在我们南斯拉夫，今天很少有谁想到这个问题。知情的人似乎已经忘却。

对于俄国人来说，领土和空间似乎老是不够，尽管他们的国土比中国和美国这样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至少还要大一倍。俄国人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把自己辽阔的领土又扩大了，扩大的面积或许相当于两三个南斯拉夫。首先，在瓜分了波兰以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同希特勒达成的条约，“吞并”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随后又同芬兰开战，在大打一仗之后，又从芬兰夺走了芬兰的、而不是俄国的领土。接着又在喀尔巴阡山，把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边界变得对自己有利，

从它那里割来了喀尔巴阡乌克兰，并使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界变得对自己有利，从它那里割来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接着，大战结束时，又消灭了东普鲁士，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州纳入俄罗斯，把它的中心，德国的哥尼斯堡市改名为俄国的加里宁格勒。那里再也没有德国人了。

随后，俄国人又在亚洲和太平洋上扩大了自己的领土，鉴于日本在同美国这个强大对手的较量中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斯大林就向日本宣战，在仅仅为时一周的战争中，从打败的日本那里不仅要回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全部领土，而且还占据了新的领土，把这些日本领土并入苏联。我这里指的是千岛群岛。这样一来，俄国人就把鄂霍次克海变成了某种内海。俄国人直到今天还占据着日本的这些领土。日本人把从沙皇尼古拉二世那里夺来的这些领土占据了四十年之久，看来，俄国人把上次大战时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这些领土至少也得占据这么久。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的西方诸大强国在领土上，都仍然留在自己的国界内。曾经有过殖民王国的那些国家基本上丧失了自己的殖民领地或者不久就将丧失。唯有苏联一家既在西方又在东方扩大了自己的国家领土。就这样，这个本来已经是最大的国家，变得更大了，而它的小邻国则变得更小了。且不说苏联还把拥有大约八千万欧洲人的七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纳入了自己的轨道。

在基辅机场上，情况同拉沃夫差不多。

我们大约在二十一点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迎接我们的是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莫洛奇科夫。会见是友好的。显然莫洛奇科夫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外交官。从一见面时，他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似乎我们是老相识。他给人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向我表

示，他明天就愿效劳。迎接我的还有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同他们的见面使我想起了泽蒙机场上的游击队式的十分亲切的送别。

大使馆的同志们向我详细地谈到，这里前不久发现并铲除了苏联在我们大使馆里安装的秘密窃听设备网。找到了十九只扩音器，都是连接在各个房间地板下面，有的则是在天花板里安在灰浆和水泥里的电缆上的。在我们大使馆里的一些大一点的房间里，则每个房间找到两个扩音器，在小一点的房间里，有一个就足够了。他们对我说，整个大楼都被窃听，从大使的寝室开始。

这个秘密窃听系统从技术上讲十分陈旧，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运转得很好。我们在这座大楼里已经呆了十来年。在我们之前，住在那里的是日本人；俄国人向日本宣战后，日本人离开了大楼。后来俄国人让南斯拉夫人搬进去，他们象窃听日本人那样继续窃听南斯拉夫人。俄国人或许已经安装了新的、比较现代化的窃听系统。不管怎么样，现在，从第一天起，我的门口就会有苏联警察，很可能比我在莫斯科的前任都要多，而不管我们同俄国人的“和解”怎么样。俄国人很可能知道，早在三个月之前，我往莫斯科派去了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一批人，让他们彻底检查一下我们大使馆的大楼，以发现窃听装置。关于这件事，贝尔格莱德曾有不少议论，这是很容易传到俄国人耳朵里的。

在我们对俄国人的总的态度方面，我对同志们说，铁托同志说过，“我们不跟俄国人吵架，但是也不向俄国人让步”。在任何情况下，都照此办理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掌握好什么时候为了不向他们让步而要吵点架，什么时候又为了不吵架而向他们让点步，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我处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的夹缝中，往往需要一个人就此作出决定，这也不是可取的。

克里姆林宫的晋见

拜会维·米·莫洛托夫。受到克·叶·伏罗希洛夫接见。同尼·谢·赫鲁晓夫谈话。用什么来代替情报局？反对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拜会布尔加宁。关于格鲁吉亚的示威游行。停止举行谴责斯大林的党内秘密会议。同阿·伊·米高扬谈话。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昨天我拜会了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莫洛奇科夫。我同他商定了递交国书后我想拜会的苏联领导人的名单。莫洛奇科夫一切都听凭我，他只是记下我所提到的名字，而我本来想同他商量这件事。对于这件事，莫洛奇科夫显然有另外的想法，他以为我在贝尔格莱德时就同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商量过我在莫斯科拜会哪些人。莫洛奇科夫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对于我所提出的简短的名单，一个名字都没有增减。

我同莫洛奇科夫谈话之后总共才过去一、两个小时，苏联外交部就通知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明天九点就接见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要是我们不得不等上个把礼拜才受到莫洛托夫的接见，我们本来也不会感到奇怪。想当年，在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前夕，我国政府的成员要在这里等上个把月才能受到接见。例如米伦蒂耶·波波维奇同志就等了一个多月才受到苏联在政府中担任同他对口的职务的米高扬的接见。米高扬老是“有事”，米伦蒂耶

就每天晚上去莫斯科的剧院看戏，等待接见。

同莫洛托夫的会晤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谈话是自发的，甚至有时是亲切的，好象是很久没有见面的老相识之间的谈话。我们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交锋杳无形踪，这场交锋恰好又是莫洛托夫发起的，他当时作为共同起草者和会签者，同斯大林一起，在那时，于一九四八年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发来了那几封威胁性的信。虽然我并不急于递交我的国书，莫洛托夫却表示，他今天就亲自同伏罗希洛夫谈，设法使这件事尽快办完，免得不必要地浪费时间。

莫洛托夫认为，我们的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我们去年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代表团商定的一切几乎都解决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可以很快解决。耐人寻味的是，莫洛托夫是用自己的某种措词，而不是用我们和俄国人常用的那种措词谈到这一点的。

我没有加以反驳，虽说我的看法刚相反。莫洛托夫在谈到《贝尔格莱德宣言》时，十分明确地把它看成是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了结的一桩事，由此得出的是，现在应该为我们的关系奠定某种新的政治基础。虽然我认为，就实质而言，我们还没有开始实现《贝尔格莱德宣言》，哪里谈得上已经完成和超越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但是我默认了莫洛托夫的讲话。

同莫洛托夫的首次会晤不是谈论过去，也不是谈论他们的党的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谴责的场合，这是一清二楚的。三十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的第一名共事者，他同斯大林一起提出了苏联要让南斯拉夫臣服的侵略政策。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听说，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南苏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即便莫洛托夫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次会晤也不是“揭疮疤”的场合。

莫洛托夫提到苏共二十大，认为这是苏共团结和有力量的一个证据。我支持他的看法，我对他说，我们南斯拉夫人已经表示了

我们党对这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我对莫洛托夫说,我们,贝尔格莱德希望,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方针能起好的作用,促使欧洲的局势得到改善,冷战得以打破,国际关系得以正常化。

我把苏共二十大同国际关系联系起来(而不是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联系起来),这使莫洛托夫显然松了一口气,他打断了我,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苏联政府将朝着这一方向采取新的步骤。过两、三个星期,以政府总理居伊·摩勒和外长克·比诺为首的法国代表团将来这里进行正式访问。莫洛托夫说,法国人还没有下决心,在莫斯科是否也谈党与党之间的合作,还是光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俄国人准备两者都谈,听凭法国人选择。莫洛托夫接着谈到,苏联曾经向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提议进行党的合作。莫洛托夫说,他们在那里长期掌权,但是他们拒绝了 this 个建议,或许他们觉得由他们在西方率先开始同苏联进行党的合作是不适宜的。

我很笼统地向莫洛托夫谈到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同保·亨·斯巴克的会谈,谈到我们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人以及同西德、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党人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显然不同于俄国人的立场。莫洛托夫总是把这看成是“目前”对社会党人的一种策略;而我则谈到,同他们的平等合作是我们的政策的一个持久的要素。我记下下面这样一个细节:莫洛托夫问我,我们南斯拉夫人如何称呼保·亨·斯巴克。我们是称他“同志”还是“先生”?我把这当成开玩笑,我对莫洛托夫说,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定规,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称呼。莫洛托夫最后说,斯巴克只能是“先生”,决不能成为“同志”。

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为时大约半小时。我高兴地记下,同莫洛托夫的这次首次会晤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在拜会了莫洛托夫之后，仅仅过了一天，苏维埃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克·叶·伏罗希洛夫为了接受国书事宜就接见了。苏联这样的速度，是我所没有能想到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好得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最后并不好。

我修改了我将在伏罗希洛夫那里的讲话。我想，我把它稍稍改进了一下，因为我从贝尔格莱德我们外交部带来的文本过分干巴巴，没有色彩，是严格按照框框和公式写成的，是用写法律或者议事规程的文字写成的。我认为，这里对我格外关注，我的答话稍稍改得好一点，那就更好。

莫洛托夫对于南苏之间多年来的冲突，怕得要死，连提都不敢提，伏罗希洛夫同他不一样，马上直接了当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就转到这个问题上。伏罗希洛夫说，今天“不可能”理解，我们之间发生了多么骇人听闻和阴暗的事情，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是真正的兄弟，在俄国人最艰难的日子里，在彼此相隔数千公里的情况下，他们共同作战，共同牺牲，这里对南斯拉夫同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和不公正的攻击，干了不少坏事。他在讲话时经常提到上帝，用不同的形式提到：以上帝的名义，看在上帝的面上，只有上帝才知道，等等。

伏罗希洛夫问我什么地方人。当他听说我是黑山人时，正如我们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喜形于色”。他问我，黑山人是否是东正教徒，他希望是，但是吃不准。当我向他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黑山处于穆斯林世界和天主教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因此黑山人是“真正的东正教徒”时，伏罗希洛夫的脸显出了光彩，好象一个人突然听到了喜人的好消息。他抓住我的手，要我相信，在我们之间现在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会变得更好，我们友谊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排

除了。伏罗希洛夫没有问我，我是否是南共中央委员，而是问我，作为黑山人，是否是东正教徒。后一点在他看来比前一点来得重要。

当我告诉伏罗希洛夫，黑山人总共只有大约四十万人，他极为失望。我“作了让步”，说我们有五十万人，但是我们分散在南斯拉夫各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是黑山人聚居的最大城市。这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已经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黑山人人数这样少，使他感到失望。他问了我两、三次；他是否听清楚了我说总共只有四十万黑山人。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莫斯科。

三月二十九日，我通过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莫洛奇科夫请求受到接见，对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礼节性拜会。苏联方面改变了我请求对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礼节性拜会提出的这个次序。俄国人把他们安排的次序强加于人，通知说，赫鲁晓夫今天，四月二日，就可以接见我。至于我请求受到布尔加宁接见一事，则什么都没有说。尽管我很不喜欢这一改变，我当然还是接受了苏联方面作出的决定。这开始有点象在莫斯科任职了，因为俄国人只顾作出符合他们心意的决定，而不管我的请求是什么。

尼·谢·赫鲁晓夫下午三点在莫斯科市中心古比雪夫大街的中央委员会大楼里接见了。在等着赫鲁晓夫叫我时，或许只有一分钟时间，我望了一眼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房间的墙。墙上对着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像。我思量着：斯大林的像还挂在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里，在苏联全国又会怎么样？赫鲁晓夫不能把斯大林从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室请走，他又怎么能把斯大林从俄国请走呢？一位工作人员的叫声打断了我的这番思路，他没有声响地从赫鲁晓夫房间里走出来，叫我进去。我进去时，赫鲁晓夫站在铺着绿绒

的一张长桌子旁边。会见是亲切的。赫鲁晓夫对我表示欢迎，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会合作得很好。赫鲁晓夫让我讲，我说了在这种场合必要的十来句话。我转达了我们中央委员会、政府和铁托同志的问候以及我们对二十大的成就的真诚祝贺，我说我们认为，这是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我提请赫鲁晓夫注意卡德尔最近有关这一点的正式讲话。赫鲁晓夫说，他看了整个讲话，他同意这个讲话。

我本来不打算在一开头就提到秘密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谴责。我觉得，最好是让赫鲁晓夫来谈这个问题。他沉默不语，在我看来，他认为我没有把我应该说的话都说出来。我继续代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铁托同志感谢赫鲁晓夫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送给了我们，我们中央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报告，并一致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步。我们认为，这不只是在说出关于斯大林的真相，问题在于这是同过去总决裂，是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世界上进一步发展开创新的和极其广泛的前景。

我接着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南斯拉夫人早就经历过并清算了围绕斯大林的种种困境了。因此当我们今天一致支持二十大和他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时，我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充满自尊心和利己主义的某种狭隘的南斯拉夫的利益。对于整个这件事，我们看得更为广泛，我们不是仅仅从斯大林时代的南苏关系出发的，尽管我们对于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谴责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感到满意的。我对赫鲁晓夫说，我曾多次有机会同铁托同志交谈，铁托同志认为他的报告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具有历史意义，铁托同志坚决支持苏共二十大采取的总方针。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就等我说这番话，然后他再马上接过话去。他说，他们面临过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他们首先估量了苏联国内的困难。他们认为，这种抵制是将在这里

展开的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赫鲁晓夫说，我们在国外也会有困难，但是资本家将明白，我们能够如此坚决地同斯大林决裂，那我们是强大的，因为孱弱者决不采取任何类似的做法。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研究。党的中央委员会是一致的，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是接近斯大林的。问题甚至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对当前的局势和我们面前的前景有不同看法。最后，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同意我们在二十大上这样办。赫鲁晓夫相信，一切困难都将克服，经过这场斗争，他们由于谴责了斯大林而将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得多。

赫鲁晓夫用了片刻时间回顾了历史，向我解释，斯大林在杀掉了科西奥尔和波斯季谢夫这两名来自乌克兰的政治局委员之后，为什么要在一九三八年把他派到乌克兰去。赫鲁晓夫说，他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始终生活在乌克兰，他在居领导岗位的俄国人中是唯一的一个能讲乌克兰语的，而斯大林从他在莫斯科的工作中了解了他，对他是信任的。对于科西奥尔，赫鲁晓夫满口交誉，但是他却是一个平和和本性软弱的人，而乌克兰的困难极大，斯大林得出结论，需要有一个强硬的人来领导乌克兰的党。斯大林杀掉科西奥尔是因为他软弱，杀掉波斯季谢夫是因为他对斯大林也那么硬。两人都是十分正直的人，都是功勋卓越的共产党人，结果却落得了这样的下场。现在两人在二十大上被恢复了名誉，但是你不能把死人从坟墓里拉起来。

赫鲁晓夫接着说，当时斯大林想出了一个在苏联当作最高法律的“天才”口号。在三十年代的一次会上，他说，“小人物”可以做出对苏联有极大意义的事情。这个口号传遍了全俄国，并且当作斯大林发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定理一再重复。于是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小人物”，他们开始建立“伟大的功勋”。实际上这个口号

是号召苏联公民彼此告发和指控。

就这样，我们这里对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人们提出了指控。这是以匿名的方式搞的，而这些“小人物”中的有些人是在自己的告发上签了名的。就这样俄国出现了新职业。赫鲁晓夫向我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基辅的一个妇女，作为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动员起来的这些“苏维埃小人物”的一个例子。赫鲁晓夫说，仅就后来能够确定的材料，光这个妇女，实际上是那些利用她的人就欠了大约八百条人命的债。

赫鲁晓夫告诉我，他当时同斯大林谈起过这个妇女，公开地向斯大林谈起过自己的意见，说过这是一个重病号。他向斯大林谈到基辅街头的场面，公民们，尤其是这个妇女特别“憎恨”的军官们，为了免得遇到她而匆匆跑到街道的另一边去。赫鲁晓夫说，“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斯大林，你们知道斯大林是一副什么样的脸色！”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之后接着说：“今天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在苏联也听到这样的问题，虽说还不多，这个问题就是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苏共今天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们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允许发生这种事，对于我们今天谴责斯大林时提出的这一切，为什么我们一直沉默？”赫鲁晓夫举党的十七大选出的苏共中央遇到的惨剧为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一百名中央委员中，大约有七十人通过审判或未经审判就被杀掉了。进行这一切的同时，在苏联全国举行了成千次的党的会议和其他的会议，欢呼这种做法，颂扬斯大林。赫鲁晓夫说，保住了性命，现在领导着党和政府的这几个人当时起来反对斯大林和那种疯狂的做法的话，结果会是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会更多些，而且总共只多十万分之一。决不会发生别的什么情况。

我已准备从我这方面结束这次会晤，只提出铁托来访的问题，

于是我开始感谢赫鲁晓夫这次友好的接见,对此他说,我们最好喝点茶,喝着茶谈话会进行得更好。在等待茶的时候,赫鲁晓夫说,他想向我介绍二十大和谴责斯大林之后国内的状况。他说,格鲁吉亚发生了风潮,我很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格鲁吉亚的一些堕落分子利用斯大林去世三周年,在第比利斯制造混乱,举行示威,在公共场所发表反苏演说。赫鲁晓夫说,在必要的地方,我们进行了十分强硬的干涉,我们动用了军队,很快一切都归于正常。

赫鲁晓夫自己问道,为什么这恰好发生在格鲁吉亚?须知斯大林并没有格外突出格鲁吉亚人,或者对他们格外开恩。如果用百分比来表达,斯大林杀害的格鲁吉亚人要比俄罗斯人或苏联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要多。比格鲁吉亚人更惨的只有“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人”、鞑靼人、车臣人和二次大战结束时的其他一些民族。斯大林根本不是格鲁吉亚人的保护人。

斯大林晚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不是由于斯大林,而是由于贝利亚。他是一个怙恶不悛的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者。同时,他既是杀害一些格鲁吉亚人的凶手,又是另一些格鲁吉亚人的保护人。在格鲁吉亚,谁都休想避开贝利亚做什么事情,更不用说反对他了。杀掉了贝利亚和现在谴责斯大林使得格鲁吉亚的某些人和某些集团情绪低落,因此唯有那里发生了抵制。赫鲁晓夫说,现在那里又恢复了秩序与和平,人们有点垂头丧气,“有一点”伤亡,现在全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作了保证,但这不会使我们睡大觉。

赫鲁晓夫断言跟西方将会有困难,因为西方将利用苏联的新局面来削弱苏联在世界上的威望,鼓励苏联国内的分裂。我们谈到西方已经有的朝着这一方向的某些公开的评论。现在最反动的人士采取伪善的态度,装作对斯大林在莫斯科受到谴责表示遗憾,甚至开始赞扬他,因为据说同斯大林可以“商谈定当,知道是在干着什么”,而现在同苏联的关系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据说再也

吃不准明天这里会出现什么情况。

赫鲁晓夫说，他们对于斯大林必然会这么办。斯大林使苏联陷于灾难。随着年事日高，他的病态的、乖戾的本性变得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说，由于年迈和多病，斯大林晚年靠专门为他拍摄的影片来了解俄国和世界，统治着这个国家，以为苏联一切都欣欣向荣。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在这里在二十大期间同各国党，首先同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党举行了会谈，决定解散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仍然在于：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必须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建立一个组织。西方是组织得很好的。首先必须为欧洲掌权的共产党的合作建立一个新组织。接着的问题是西欧国家共产党的合作。赫鲁晓夫要我相信，他拒绝由苏共对西欧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提出任何建议。这听凭欧洲人去解决，他们不需要俄国的忠告，这些事情他们最清楚。为此多列士最近去了罗马，同陶里亚蒂商谈。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如何商定，事情就那么办。

对亚洲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米高扬去那里了，他还有“别的事情”。他将就这个问题同中国人和其他人会谈。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还要以某种方式同南北美洲各国共产党解决这个合作问题。这些党很弱很小，它们同苏共的联系要比西方所说和所写的弱得多。赫鲁晓夫说，事态本身就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建两个，亚洲建一个，美洲建一个。赫鲁晓夫没有提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赫鲁晓夫跟我谈这些，是要我向铁托报告。

我对赫鲁晓夫通报情况表示感谢，我说，鉴于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新的，所以我说不上贝尔格莱德对此会有什么想法，我们的领导可能采取什么态度。同时，我可以不受约束地向他谈谈我自己当时的感想，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新的和了解不够的。我认为，在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之后，我们决不应该马上建立新的和

类似的共产党国际组织。而且不仅建立一个，而是建立三、四个，来替代斯大林建立的，在他生前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那一个共产党情报局。

在新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从他们的苏联党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党开始，应当是自愿的、自由的和平等的，无需经过指导和控制这种合作的某些国际机构。接触和联合行动将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或双方的利益，自然而然地进行。至于说到我们南斯拉夫人，我认为，无论是存在老的还是建立新的共产党情报局，对于同俄国人或其他人展开党的正常合作来说，都是重大的障碍。

我再次强调，我完全代表我自己说话，我说，如果我们组织四个新的共产党情报局来代替目前的一个共产党情报局，我们就使西方有了新的可乘之机，来发动攻势，攻击共产主义现在比斯大林时期更富有侵略性。赫鲁晓夫打断了我，声称我们不必害怕同资产阶级斗争，在局势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动斗争。他接着说，仍然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从外部或内部强行推翻例如欧洲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使自己得到保障，我们应当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对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切是另一码事，但是对于阵营各国来说，必须有一个新组织。赫鲁晓夫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例，论证苏共必须同世界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他说：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公民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票，而我们同那个党却没有任何联系。难道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这一部分谈话从政治上说最为重要。但是谈话没有结果。尽管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讲话，我觉得，在他们的建立新的、地区性共产党组织的总主张方面，我使赫鲁晓夫发生了动摇。至于阵营，我一点也没有能使他动摇。俄国人把阵营看成是自己的内政，从种种情况来看，对于他们自己选择的解决办法，在他们看来，无需征

得任何人的同意，包括南斯拉夫的同意。

谈话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我本来准备走了，谈了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完全满意了。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有兴趣于谈话，结果却相反。在这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走进办公室来，他办公桌上的好几只电话，一次也没有响过。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日，莫斯科。

今天午间刚过，苏联总理尼·亚·布尔加宁接见了。布尔加宁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里，因此一切都显得比我昨天在尼·谢·赫鲁晓夫那里隆重些，尽管主要的事情在赫鲁晓夫那里办完了。谈话又是很长，虽说双方都没有说出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同昨天在赫鲁晓夫那里说的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谈话本身都是按照昨天的次序进行的，提到了同一些问题，发表的意见也是相同的。布尔加宁对于某些事情谈到了富有特色的细节，例如，他在向我谈到格鲁吉亚的示威时，他谈到的情况要比赫鲁晓夫多得多，尽管赫鲁晓夫比他饶舌得多。

说到格鲁吉亚事件，布尔加宁说，事件变成了反苏活动，这场风潮持续了两、三天时间。曾经提出“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接着还有颂扬斯大林的口号。布尔加宁说，他、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受到了格外的攻击。曾经提出“打倒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当苏联政府首脑”的口号。示威者要求释放斯大林的儿子，前将领瓦西里·斯大林。说到他，布尔加宁说，他是一个被酒精毁了的堕落的人，现在关在监狱里，但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格鲁吉亚人知道瓦西里·斯大林被捕了，以此来动员人们，把大家引上街头。动用了军队，进行了强硬的干涉，有伤亡。布尔加宁说，他出于同志对同志的信任，把这一切告诉我，这些事情对于苏联来说政治上是十分棘手的，但是他想让我了解格鲁吉亚发生的真实情况。

在接着的谈话中，重复了我昨天同赫鲁晓夫谈过的几乎所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在某些问题上，布尔加宁谈的时间长一点，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在有关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类似的。例如，建立共产党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布尔加宁只是提了一下，他说，他了解我昨天谈的观点，说既有理由赞成又有理由反对我谈的观点，他问，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这是南斯拉夫领导的态度。跟对赫鲁晓夫说的一样，我告诉他，我昨天才知道这个问题，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对此，布尔加宁说，他们在铁托同志来访时要同他研究这件事。

从同布尔加宁的整个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这两个人在提到的所有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中是第一号人物。

昨天，《真理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其他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我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会晤的消息。这里还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刊登了我前些日子拜会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的消息。这一切都使气氛热乎起来，超过了正常情况，而这是同南苏关系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在我看来，新大使刚到任就大加宣扬并不好。事关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那就更其如此了。一切比较平静些，比较正常些，可能要好些。这样，苏联公众和这里的大多数观察家就难免要猜测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正在发生新的重大事件。在铁托访问莫斯科之前的两个月，对南斯拉夫新任大使如此关照，这种“新”事件必然是很符合俄国人的心意的。

我重新翻了翻我同布尔加宁谈话的笔记，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是关于第比利斯的示威者提出的口号的消息：“打倒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当苏联总理”^①。由此而下令军队向要求由莫洛托夫

^① 原文如此，与前略有出入。——译者注

当苏联总理的苏联公民开了火。这一切发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除布尔加宁外，示威者还要求撤换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这使人考虑苏联上层的状况，情况并不象赫鲁晓夫前天对我说的那样美妙。毫无疑问，布尔加宁就格鲁吉亚的骚乱一事恰恰把与莫洛托夫有关的那件事告诉我，事先是有过考虑的，而示威者要求莫洛托夫出来领导苏联政府也不是偶然的。布尔加宁强调，在相对立的另一边，除他之外，只有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他这么做政治上的含义也是清楚的。布尔加宁没有提到主席团其他十来名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一切他都是作为描述第比利斯的示威者所做的事情提到的。当然，决不是作为这里的什么人的意见；但是不难使人想到，这里的问题不只是示威者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莫斯科。

昨晚，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我认识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并同他谈了话。同他的谈话以及卡冈诺维奇后来在一千五百名来宾，包括驻莫斯科的外交团的面前的正式讲话，给人留下了令人讨厌的印象。卡冈诺维奇完全按照老的方式，从斯大林时期这里所谓的“老大哥”的立场出发讲话。

在同我的谈话中，他也差不多这样行事。我谈到我们的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未来的前景良好，我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友好的接待，我们支持苏共二十大，对于这些他都没有发表意见。卡冈诺维奇只是说，铁托应当到这里来，他们将同他解决我们两党的合作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而且是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

卡冈诺维奇的讲话，在外交团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评论。他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文化和工业发达的欧洲国家，说这是事实，因为他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说捷克人正在顺利地建设社会主

义,正在生产各种机器。唯一使他尴尬的是他想不起是哪种机器,因此笼统地说捷克人生产机器和自行车!接着他强调没有阵营就没有社会主义,随后又断言,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所证明的那样,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说苏联主张和平,但是也懂得打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缺少的只是再对斯大林赞扬几句。卡冈诺维奇未能“明白过来”,未能理解二十大,看来从精神上而言,他离开二十大还很远。

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的庇荫下在苏联最上层度过了几乎三十年。靠着这笔遗产,他在二十大以后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很难把这一切联系起来,很难加以说明。在我们看来,新方针和代表大会潜在的政治力量是巨大的,但是昨晚听了卡冈诺维奇讲话,不禁使人觉得根本没有举行过什么二十大。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莫斯科。

十来天来我一直处在“流水作业线”上,不断地拜会驻莫斯科的同行和苏联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于大使们来说,这种拜会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我得拜会我的每一个同行,而他们大约有八十人。按照这种封建的礼节性拜会的惯例,你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认识”其他国家的代表,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我在莫斯科的各种招待会上已经认识了。然而,只要你不对他进行礼节性拜会,他“阁下”如果愿意,就可以装得根本不认识你似的。麻烦更大的是,他还要回访你,这就使时间的浪费更是倍增。

我已经拜会了大约二十名外国代表。双方说了许多话,不过基本上是空话。

在苏联外交部,我拜会了莫洛托夫的十来位高级同僚,从两位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和安·安·葛罗米柯起,一直到南斯拉夫处的处长克·达·列维奇金。与我同大使们的会晤不同

的是，我本来希望关于我同苏联外交部领导人的这些最初的会晤，我可以记下点什么。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所有这些会晤彼此酷似，都是同样的空空洞洞之外，我一无可记。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莫斯科。

我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情报工作，即使是最原始的形式的情报工作。除得到苏联政府特别允许外，我们不得在莫斯科以外活动。南斯拉夫在苏联没有领事馆。苏联公民不敢把我们中的任何人请到自己家里去“喝杯茶”，更不用说吃午饭或晚饭了。

在同我们的正式接触中，大多数俄国人不愿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对斯大林的谴责。我已经对苏联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进行了十五次以上的拜会。我只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谈到这一点。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同俄国人的众多的接触中，除极少数例外外，不可能谈到这一点，因为俄国人沉默不语。在我们同苏联公民偶然的接触中，也很难谈到这一点，因为俄国人照例回避这一点。这可不是最好的迹象！

当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机会直接问及某些俄国人关于谴责斯大林的事，通常得到的回答是，这一切使他们感到痛心，他们不懂得有什么必要这么做，说他们是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说他们跟着他在俄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说他们把斯大林搞成了天才和上帝，而现在又要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推倒，等等。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一次同我们谈话的苏联人中有谁怀着个人感到满意的感情谈到对斯大林的谴责，并认为应当这样做（当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除外）。

我们得到情报说，十五天以前，遵照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在苏联各地停止继续举行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党内秘

密会议。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举行这些会议。据我们所能获悉的，在最初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的报告受到欢迎，但是不久以后情况就表明，报告使党和人民在斯大林的问题上产生了混乱和分歧。结果是，似乎这是今天的苏联唯一的一个问题，显得二十大仅仅是为了斯大林而举行的。二十大的纲领被撇到一边，几乎象是没有这个纲领似的。

情况已经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秘密的，俄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事后表示赞同这一情况不可能有助于新方针。人们正常地问道，为什么报告是秘密的？结果是于赫鲁晓夫不利，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这件事“不干净”。混乱越来越严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最初的会议上欢欣鼓舞地接受了这一报告。会还在开就把斯大林的像从墙上扯了下来，扔掉了，撕毁了，很可能是在指望这一切成为苏联新领导的公开的和官方的政策，指望在国内各个领域内都发生变化。代之而来的是莫斯科下达了指示，命令停止这么做，不要动斯大林的像和塑像，不再举行党内会议，于是“人民开始寒心了”。斯大林的像仍然挂在原来的地方，从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开始。

几天前，在把苏联部长尤金(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上的仪式上，在主席团委员、苏联政府代表和外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一位官方的发言者特别提到建造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和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是死者的特殊功勋。这也登在发行数百万份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和列宁！

不必怀疑，唯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才能决定这件事，而恰好又是作了这样的决定。这一切不利于加强赫鲁晓夫和新方针的地位。这一切说明赫鲁晓夫向不同意他的意见的那些人，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那些人开始，作了某些让步，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很可能应当用苏联十分复杂的国内局势来解释这一切。不论西方

和国外有什么反应，我认为，苏联国内围绕斯大林和新方针的局势更好些，是另一副样子的话，这里就不会这么做。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莫斯科。

我们的一个提供情况的人士告诉我们，工人和干部中间在党内会议上围绕斯大林问题的讨论开始变得有点不对头。事情开始变得比二十大之后不久设想的来得困难。在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报告被当成突如其来的耸人听闻的事情。此外，这里事先确保代表的组成会接受新方针。首先由于主席团本身动摇犹豫，没有勇气发表赫鲁晓夫的报告，现在人们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判断。在俄国，谁都不为斯大林辩护，但是大家说，人民还在报告之前早就知道这一切了，知道得比那里写的多得多，为什么现在要谈论这一切呢？人们批评所采用的方法，说赫鲁晓夫在大会临近结束时使代表大会面临既成事实。现在又以同样的方式使俄国面临既成事实，而且又是秘密地这么做。应该是相反：在大会开始时提出斯大林问题。对党的组织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通报的，事先全都解决了，不让人有机会表态。斯大林就是这么干的。

人们还指责苏联现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他们跟斯大林一起，同他一样“犯错误”。有些人在这上面还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另一些人仅仅是执行斯大林的决定，但是他们本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犯了罪。俄国人从传统上说是信宗教的人民，他们宁可首先宽恕已死的领袖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而不愿去追究坟墓里的死者的责任。因此多数人不愿谈斯大林，既不说好，也不说坏。

有例子表明，人们要求改变斯大林的制度，而不只是谴责斯大林。据说，关于民主，《真理报》只是有时写一点东西，但是民主杳无形踪。此间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现领导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人们把停止开会、保留斯大林的像、禁止写文章谈论看成

是主席团背离二十大通过的决定。人们广泛地在猜测，谁在主席团里害怕了，而谁又在为这些决议表示忏悔。

很大一部分指责企图贬低斯大林在上次大战中的作用有关。人们说，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象赫鲁晓夫现在说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虔诚地尊敬斯大林，相信他并怀着这种信念死去。斯大林把整个苏联人民动员起来投身于生与死的斗争。唯有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的胜利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却把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化为乌有。怎么可以这样呢？俄国还得打仗，今天为什么要对俄国人有史以来作出的最大的战争努力产生这样的怀疑和问题呢？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在人员上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受到了欢迎。据我所知，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斯大林，因而也就反对赫鲁晓夫。各阶层的苏联公民优先考虑中国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立场。对于中国人，都说他们是客观的、讲究策略的、有分寸的和说实话的，是英明的，而对于赫鲁晓夫，就听不到这些话了。中国的政策是英明的，因为中国人以中国的方式建议，苏联现领导按照比斯大林好的另一种方式去做，而不是在秘密报告里谴责他这个死人，同时又继续做斯大林所做的事，那样的话就更好些。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看来，有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牵连进格鲁吉亚的骚乱中去了。现在那里，连以前反对斯大林的人，出于民族感情也在为他辩护。与其说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还不如说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俄罗斯人。现在俄罗斯人把他抛弃了，而格鲁吉亚人却把他接受下来，于是俄罗斯人就用机关枪向格鲁吉亚人开火。

我们还得到情报，据说在苏联全国整个这件事被说成是斯大林个人和赫鲁晓夫个人的某种对抗。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干得很巧妙，因为把事情的实质掩盖起来了，使得不能就制度和社会的问题展开讨论，而事先就可以相信，作这样一种比较结果不会对赫鲁晓夫有利。这在现在意味着，比较的结果是对最象斯大林的他的某个继承人有利，他比赫鲁晓夫更接近斯大林，他今天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谴责伟大的已故者。因此格鲁吉亚才提出了“由莫洛托夫领导苏联”的口号。我们听说，还提出了有关马林科夫的类似口号。

与此同时，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和指责广为流传，说他粗暴，没有分寸，过分直截了当和生硬，说这样一个人不能当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从我们这番“调查”来判断，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这样的人物似乎更符合此间的口味，在苏联老百姓心目中这样的人物似乎更伟大些，因为离他们更远。鉴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一辈子都是在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庇荫下度过的，可以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而同赫鲁晓夫不同，对赫鲁晓夫大家都了解，赫鲁晓夫也跟大家一个样。

我提醒贝尔格莱德，看一看塔斯社的官方报道，说主席团全体十五名委员和候补委员集体到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向尤金部长的遗体告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青年建设者大会上这种场面又重演了，十五个人又全都到那里去了！以这样的异乎寻常的方式具体显示苏联的集体领导和这一领导在政治上的团结，达到的却是相反的效果。我认为，就是按照苏联的标准，由一、两名委员代表主席团就足够了。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无论如何，这样的显示是很难证明苏联最高层政治上是团结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前几天同阿·伊·米高扬的会晤使我结束了对苏联领导人的

一系列“最高级”拜会。我等待这次拜会大约等了二十天时间，因为米高扬去访问某些亚洲国家去了。

米高扬向我“通报”了他的亚洲之行。他说，他到那里去是向亚洲主要国家的政府介绍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的。他向中国人，接着向尼赫鲁、吴努和越南人作了介绍。米高扬说，尼赫鲁对二十大的决议表示欢迎，“尽管尼赫鲁既不是共产党人，又不是社会党人，而且永远不会是，但是他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于这一切，连吴努也“很好地理解了并表示支持”。米高扬对我说，在苏联和印度之间发生的这一切新的和积极的情况仅仅是开始，这两个大国之间发展关系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关于中国人，米高扬说，连他们也同意二十大，说毛泽东亲自向他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是错误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米高扬对此发表议论说，毛泽东以前有许多机会说这番话，然而在斯大林死后，当苏联最高级代表一九五四年去北京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只是现在才这么做。我们在这里得到情报说，米高扬在北京的会谈进行得不很顺利。米高扬说，北越开了三次共产党政治局会议，那里“逐条研究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米高扬说，我们的关系正在顺利发展。作为证明，他提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南斯拉夫领导人现在的态度是正确的，例如卡德尔，他抛弃了自己前不久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我问米高扬，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看不出卡德尔比一年前或更长一些日子是一个更好的或差一些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接着说，他们去年访问南斯拉夫时，同铁托谈过意识形态问题和我们之间的分歧。他说，他们完全同意铁托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也是这么作了汇报的。米高扬说，他在这里满意地指出，铁托的观点同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十分接近的。

我请米高扬给我解释一下苏联现在公开赞扬共产党情报局的原因。这里几天之前发表了关于解散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份公告，正式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我对米高扬说，他们决定解散斯大林的共产党情报局无疑是积极的，要是早几年解散那就更好。米高扬就更加维护苏联官方的态度，在我看来是没法为这种态度辩护的，再说也没有确切地反映事实。米高扬一口咬定苏联对于解散共产党情报局的官方公告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应当说的。尽管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这个机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是有益的。他们在发表解散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时作了肯定的评价，这么做是客观的。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就只会是等于把武器送到西方手里，让西方攻击苏联，他们不想这么做。

我说，没有必要把武器送到敌人手里，但是我担心，他们对共产党情报局作这样的肯定的评价，是适得其反。从共产党人起，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由于反对南斯拉夫而垮台了。因此现在要解散它。要是这里在关于解散的官方公告里不能公开批评它，我认为就不应该公开赞扬它。米高扬不同意。他谈到共产党情报局的历史。我们^①重申了在我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会谈时提到的某些论点。同米高扬的会谈进行了大约两小时。最后，米高扬向铁托同志表示问候，说他们“将同铁托在这里解决我们和我们两党间的一切问题”。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我”。——译者

南斯拉夫政策中的“不正常做法”

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午餐。我们在苏联的情报局政治侨民。俄国人如何解释和运用对等政策的原则。在莫斯科出售南斯拉夫报纸的第一次尝试。莫斯科外交团里的会晤。南斯拉夫在世界上起的作用比它的物质力量大。外界的威胁是我国内部团结的一个因素。在莫斯科电台发表讲话。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莫斯科。

昨天我参加了红场上的五一庆祝游行。

驻莫斯科的各国大使馆在五一前很久就“处于战斗状态”了，在市内派人到处奔走，收集情报，了解莫斯科的装饰情况、领导人的像和这些像的次序，了解列宁的像有多少、斯大林的像的情况，了解口号的规模和内容。我觉得，驻这里的某些外国人精通此道。他们中的某些人要我相信，对于确定苏联对某个国家的政策有意义的是，涉及这个国家的口号是作为横跨马路的横幅挂出来呢，还是仅仅挂在某座大楼的正面。至于苏联现领导人的像在城里悬挂的次序，他们说，在这上面是不可能出差错的：一切都是一清二楚。要是少了哪个人的像，这个人也就完了。根据哪些人的像靠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哪些人的像又远离他，可以确切地断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政治地位。

虽说像非常多，我觉得在老百姓的四个小时游行中，列宁的

像，接着是赫鲁晓夫的像占了支配地位，再次之，则是苏共中央现任主席团委员们的像，以赫鲁晓夫为中心。几乎哪里都没有斯大林的像。尽管我跟多数外国人一样，集中精力寻找和计算斯大林的像，我总共只发现四、五张他的像。就是这四、五张像也是陵墓对面的队伍举着。斯大林的像尽管数目最少，但是大概最引人注目。

除阵营国家和南斯拉夫的大使外，各国大使在正午之前就离开了观礼台。我在观礼台上也呆了大约两个半小时，等待游行结束。游行结束后，我得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午宴，莫洛托夫的第一副手瓦·瓦·库兹涅佐夫昨天代表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邀请我参加这次午宴。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莫斯科。

让我继续昨天开始的关于五一游行和克里姆林宫“秘密”午宴的记载。

阵营国家的大使和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中央大厅，我觉得，在场的有以主席团为首的苏共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在一张很长的桌子的头上坐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赫鲁晓夫居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安排在他们中间。我的位置相当好，在两名主席团委员中间，右边是米高扬，左边是萨布罗夫。

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次午宴的时间同克里姆林宫前的游行几乎一样长。东道主和中心人物是尼·谢·赫鲁晓夫。在午宴期间，他发表了十二次或许是十五次即席讲话。第一次祝酒是祝苏联共产党和苏共现在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次祝酒是祝莫斯科市民、五一游行和苏联人民。第三次祝苏军。第四次祝苏联工人阶级。第五次祝苏联共青团。第六次祝苏联各民族友爱，依次类推。有一次祝酒，赫鲁晓夫用来祝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

赫鲁晓夫相当早就向南斯拉夫致意。他说，苏联现领导人是一些正视真理的人，说同南斯拉夫的冲突的最大罪责在他们身上，在苏联身上。

赫鲁晓夫说，我们改正了，这是“我们最大的胜利”，他接着又说铁托不久将到苏联来，这证明，今天苏南两国之间的关系处在最好的道路上。正如他说的，我坐在主宾席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番话，在场的人热烈鼓掌，我站起来表示感谢之后掌声才停。赫鲁晓夫最后说，现在为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意思是南斯拉夫也在内）的“真正的”团结创造了一切条件。令人沉痛的过去再也不会重演，因为苏联领导今后将“按照列宁的精神”办事。

赫鲁晓夫在谈到斯大林时谈到一些细节。他说，围绕这个问题主席团进行了许多次讨论，并用手指了指坐在他附近的莫洛托夫。在突然笼罩着大厅的一片寂静中，赫鲁晓夫接着谈到，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说到这里，布尔加宁插话，要赫鲁晓夫继续谈斯大林，赫鲁晓夫接受了，他谈到斯大林如何瞧不起人，人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说斯大林听不见党的呼声，说他依靠自己变化无常和病态的本能，因此滥用权力，在苏联干了许多坏事。

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下自己曾对莫洛托夫指指点点，赫鲁晓夫又重新谈到斯大林在晚年曾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赫鲁晓夫说，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曾不得不经常赴美国。赫鲁晓夫继续以这样一种派头说，斯大林曾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尽管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从来没有到过英国。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要求我在莫斯科组织反犹太人的活动”，并且由于生气而讷讷起来。我觉得，赫鲁晓夫有句难听的骂人话已到了嘴边，但是他忍住了，他提高声音说：“同志们，请设想一下，连我的文盲父亲也从来不是黑帮分子和反犹分子，而

斯大林却要求我，一个政治局委员充当这样的人！”

赫鲁晓夫流露出真诚的兴奋的表情，接着谈到是该让列宁重新占据他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的时候了，说他们将把列宁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说苏联人民对此是热烈欢迎的。随后他谈到，他已经老了，每时每刻都可能老死，因此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人，有义务说出斯大林的真相。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人人都必须考虑考虑，他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对于他自己，他说，他不怕死，个人是不重要的，唯有党是重要的。赫鲁晓夫的激动感染了大多数在场的人，他暂时停一下讲话，人们就报以自发而热烈的掌声！

赫鲁晓夫认为国内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斯大林问题，已经谈完了，就转到阵营问题，立即猛烈地抨击波兰的现状。说那里的某些领导人现在不理苏联了，眼睛望着西方，想让波兰从“兄弟大家庭”中分出去。赫鲁晓夫提高声音说，我们要同这种想法作斗争，并用拳头敲着桌子。赫鲁晓夫一边用手指着波兰大使列维科夫斯基，一边接着说：“你们有你们的主权，但是波兰今天所做的，既是反对你们的主权，又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已故的贝鲁特使我们深感悲痛，这是一位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奥哈布听凭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你们那里大肆活动。应当狠狠地揍他们。”除了赞扬了南斯拉夫，批评了波兰，赫鲁晓夫没有提到别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不相信，就共产党人而言，波兰会有谁像赫鲁晓夫在这次午宴上指控他们的那样，想离开阵营，想“到西方去”。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波兰大使列维科夫斯基在这一点上竟然支持他，并作了补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人无法“到西方去”。这一点，赫鲁晓夫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还是那样激烈地攻击了波兰人。如果说波兰人要求使自己同东方，同俄国人的关系变得好一些，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赫鲁晓夫没有本着二十大的精神，采取主动，改

变斯大林对波兰人和阵营里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倒指责波兰人试图指望赫鲁晓夫本人和他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去这么做。^①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在谈到阵营时——实际上只谈了波兰——似乎这是苏联的内部问题，而不是涉及到另一个国家，涉及苏联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赫鲁晓夫说，他们不允许在这方面出现任何新花样，说将同想改变苏联同阵营的关系的任何人作斗争。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论，是应该相信赫鲁晓夫的。说俄国人甚至准备动用武力来保住受它完全控制的阵营，这样的估计不无根据。可以认为，这也是现在的主席团早就确定的政策，赫鲁晓夫不过是在这次五一午宴上说了出来罢了，而绝大多数在场的俄国人都是支持的。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次午宴，不如说是苏共中央的一次盛会。

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的举止，就目前的事态而言，显得他们是最接近赫鲁晓夫的。唯有他们两人大声插话，补充赫鲁晓夫的话，对他表示赞许，让在场的一百多人都听得到，之后照例又鼓掌。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抱消极态度，一直显得没法适应这种隆重的气氛，尤其是头两个人。我特别注意离我最近的莫洛托夫的态度。有时我觉得，赫鲁晓夫的讲话使他焦躁不安，尤其是在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谈到斯大林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时候。在赫鲁晓夫谈到南斯拉夫的时候，莫洛托夫才一反这样的态度，站了起来，要求同我为苏南之间的友谊干杯。

尽管一再作了强调，我的印象是，今天治理着俄国的这一小批人从政治上来说，远不是团结的。有时在我看来，某些主席团委员

^① 在苏共二十大和总的事态的影响下，波兰一九五六年全年的特点是人们企求公众生活民主化。当局部分地倾向于这样的动向，但是往往又表示反对。

不仅相互之间在政治上意见不合，而且作为个人也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不应忘记，这一切发生在苏联一百多名高级领导人面前，发生在一大批苏联元帅和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面前。我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注意到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这次盛大午宴上感到不舒服，在这次午宴上赫鲁晓夫心满意足地、热热闹闹地充当了“东道主”的角色。

一九五六年五月七日，莫斯科。

《贝尔格莱德宣言》签署一周年的日子日益临近。此间把这一文件看成是“业已执行的”和已经过时的文件。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苏联方面准备在铁托下月访问时在莫斯科签署一个新宣言来代替《贝尔格莱德宣言》。问题是要在我们两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关系和发展合作，此间把这个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跟过去一样，认为我们之间没有建立党的合作，我们的关系就不算正常化了。南斯拉夫方面不存在理由，反对同俄国人在党的方面也建立合作，诚如在其他一切方面那样。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这一合作，是否会尊重每个共产党的独立和平等，还是象过去那样，是以“共产党家庭”里的“老大哥”论为出发点。据苏联人的意见，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这个“家庭”里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去年没有达成协议，我们把关于建立党与党之间的合作的谈判推迟到以后进行。时间日趋接近，铁托下月来访期间，这个问题将是我们谈判的中心。

我们在苏联的侨民问题——虽说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怎么重要——在行将要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谈中将再一次提出来，届时我们将弄确实，《贝尔格莱德宣言》在哪些方面已经全部执行了，而在哪些方面甚至连开始执行都还没有。此外，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政府继续把这些逃兵——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工作——

当作“国际主义者共产党人”，就象赫鲁晓夫去年在贝尔格莱德试图做的那样。只要苏联对我们的这些侨民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不能认为南苏之间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了。造成这样一种状况的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涉及的是几百名侨民，他们在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失败以后，逃往苏联，今天仍然在苏联。他们在苏联全都受到最好的接待。在这里，苏联当局不仅给他们以政治避难，而且给他们以苏联国籍，还安排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而且是安排在一些十分敏感的岗位上，包括苏军、党的机关和国家安全机构。我们的这些侨民亦有由苏联政府提供经费的报纸，有自己的反对南斯拉夫的定期无线电广播。他们从一九四八年起，一直到前不久，都很活跃。莫斯科电台对南斯拉夫的广播，跟斯大林时期一样，今天仍然由这批侨民中的十来个人编写。南苏两国去年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没有使这方面发生多少变化。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史上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新鲜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和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党员、这个国家的军官、党和国家官员，响应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在这里是响应苏联的号召，背叛自己的国家，在这里是背叛南斯拉夫，而替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效劳，而这个大国却又对一个社会主义小国奉行施加侵略性压力的政策。“第一个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就把我们之间关系的这样的发展提到日程上来的一个新问题带进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这个问题就是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自己的秘密阵地，自己的第五纵队，就是为自己的情报机构招募代理人，就是试图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变成背叛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不忠诚的公民和卖国贼。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莫斯科。

从苏联对我们的情报局侨民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莫斯科的态度跟一九四八年一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集中了南苏两国关系中其他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本身今天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一个问题，从两党两国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却成了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

南斯拉夫政府要求于苏联政府的不是引渡这些人中的哪一个人，而是要求保证这些南斯拉夫国民有权返回南斯拉夫，如果他们自由地表示愿意回国的话。苏联当局直到今天不允许这么做。

这里值得记载的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收到了我们这些侨民中的一批人的一份反南决议。大会主席团当然没敢向大会宣布，但是内部决定把这一文件载入大会的官方档案。俄国人用这种方式想使自己的这批代理人获得某种政治地位。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莫斯科。

妨碍南苏关系的问题之一是，苏联在我国和南斯拉夫在这里的所谓情报部门的地位和活动。我们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毫无结果，因为俄国人是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解释对等的。苏联记者自由地从我国的一个地区走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不实行新闻检查，苏联在贝尔格莱德的苏联文化宫里设有长期阅览室和展览陈列室，这是苏联的情报和宣传活动的中心。这个“文化宫”向南斯拉夫人免费分发图书，随后定期从莫斯科得到新书。那里免费上映苏联电影，因此苏联的“文化宫”甚至成了贝尔格莱德商业电影院的竞争者！一年内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贝尔格莱德人出入这个“文化宫”。

我们在莫斯科一无所有。我们的记者无权在莫斯科以外地区

自由活动，他们受新闻检查，甚至不允许我们在使馆的窗户上或墙上贴一张南斯拉夫的照片。

关于在莫斯科上映南斯拉夫电影一事，我们甚至不能同俄国人谈一谈，如果我们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为期两年的文化合作协定的计划里没有写进这一条的话。

每当我们谈到这种状况，俄国人总是说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待遇跟其他一切人一样，而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同样如此。在贝尔格莱德没有歧视，在莫斯科也没有！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这里从事任何这类活动，因此也不允许南斯拉夫。我国政府允许其他国家从事这样的活动，正常的是，有义务允许苏联这么做。根据苏联的解释，充分的对等已经提供！

我们一再设法影响苏联当局，至少正确地执行在新闻方面同南斯拉夫签定的某些协定，首先是关于在这里出售我们的报纸和在贝尔格莱德出售苏联的报纸的协定。俄国人不允许苏联公民个人预订我们的报纸。强调实行“限额”预订，也就是说由他们莫斯科的卖报系统出售我们数量有限的报纸，并且真的打算向我们提供对等。

这里对于贝尔格莱德的《政治报》和《战斗报》兴趣极大，而在贝尔格莱德，人们对苏联的报纸毫无兴趣。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苏联报纸象我们的光发表命令和法律的《公报》，我们的公民不会想起要买苏联的报纸。因此，俄国人在出售报纸这一点上坚持要实行严格的对等。

这或许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公民们，至少是莫斯科的公民们，哪怕只是一千个莫斯科人中只有一个人，有某种机会可以购买和阅读南斯拉夫报纸，并且不受苏联当局的“洗脑”，多少了解一点南斯拉夫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当局连这点也加以阻碍，尽管我们这两家报纸不仅没有一句不友好的话，而且不对苏联的任

何事情提出批评。这里显然仍就害怕苏联公民自由地阅读“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报纸，而且恰好又是在准备要求我们接受我们两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团结”的时候！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以自己的方式十分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实际状况，除此之外，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问题现在处于两国关系的中心。在这方面，占首位的仍然是苏联为南斯拉夫建立新的炼铝工业提供贷款的问题。

俄国人立即表示有兴趣，他们愿意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这不仅有助于一笔勾销我们相互间从冲突时期产生的财政上的要求，而且有助于正常化本身。俄国人缺少铝，而我们可以用向苏联出口这种“未来的金属”来偿付贷款。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个计划有多方面的吸引力：第一，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对斯大林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的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损失所提出的“赔偿”要求。第二，为自己的工业确保了铝的长期供货。第三，尽管南斯拉夫将归还欠俄国的债，而且利息照付，苏联可以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己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鉴于美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方强国对于我们要求贷款以在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大型的炼铝工业不打算予以满足，苏联在这件事上可能更有希望成功。

从去年五月和六月我们一开始谈判起，俄国人就谨慎对待。他们没有明确说过，苏联对贷款的数额承担肯定的义务。同时，对我们说了，他们打算为生产二十万吨铝提供资金，而我们仅就黑山的一批新炼铝厂的第一阶段就指望苏联提供将近两亿美元的贷款。

我们曾表示希望去年就在苏联就为南斯拉夫建立新的炼铝工业提供贷款一事签订协定，但是俄国人不着急。谈判拖延下来了，我认为首先是由于俄国人对于《贝尔格莱德宣言》和他们在政治上在南斯拉夫取得的结果不满意。现在又把为我们的炼铝厂提供贷款的问题同铁托对苏联的访问纠缠在一起。布尔加宁四月三日跟

我谈起过这件事。俄国人现在又支支吾吾起来了，在贷款的数额上不表明态度，说一切都取决于进一步的谈判。

去年，苏联方面在谈判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为炼铝厂提供贷款的问题，在政治上使俄国人便于顺利地结束谈判。现在看来俄国人又打算利用这个问题，把它当作自己主要的“意识形态论据”。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按照这种方式把意识形态和炼铝厂的贷款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事情不妙。铝的问题再次成为我们同俄国人的政治会谈的中心，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能落得个用意识形态来交换铝，也就是说，如果同俄国人不搞“意识形态团结”，也就不会有铝。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莫斯科。

这里我记一下同此间外交团的某些成员会晤的初步印象。

“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们比起他们驻贝尔格莱德的伙伴们似乎处境更加为难。同他们见面时通常只是打一个招呼，说几句话，谈谈气候和时间，我们不谈政治，尤其不谈“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苏联的政治。他们也克制自己，从来不向我问及南斯拉夫的政治。

我的印象是，来自阵营国家的我的同行们，或者说他们在这里所代表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不仅对在“社会主义阵线”上所发生的这种情况迷惑不解，而且由于对这一切可能在苏联或他们的国家里导致什么情况吃不准而担惊受怕。

我拜会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海德。我得在这里记下，关于英国和苏联眼下的关系以及关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行将对伦敦的访问，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比从我这些天来所会晤的、正在为这次访问作准备的莫洛托夫十名副手那里了解到的还要多。尽管我没有问海德什么特别的问题，他却以一种对人表示信任并且

使对话者本人也这么做的方式同我谈话。

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对苏联新政策的赞扬的话，比他的大多数西方同行说得还要多。在这样一个上下文中，法国大使对迎合苏联新政策的南斯拉夫政策表示赞许。此外，德让确认，对法国来说，同莫斯科的关系格外重要。在我看来，贝尔格莱德仍然处于法国政治利益的边缘。

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在这里享有“苏联通”的声誉，不仅在外国代表中间，而且在苏联学术界也是如此。波伦研究俄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从二十多年前美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开始研究。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主要强国的代表，波伦大使在这里占据特殊的地位。

对于斯大林，波伦说，就俄国的状况和这个国家的传统而言，他算是有才干的政治家。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他看来并不存在。问题只是在于斯大林象沙皇们多少世纪以来以别的某种名义统治俄国那样，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统治俄国。除了独裁和专制制度外，俄国人民不知道还有别的统治制度。

波伦跟我谈到他自己的估计：在这个国家里，事情朝好的方面改变得很慢。他谈到，在苏联，甚至在斯大林死后，领导人也未能背离斯大林给俄国的政治生活规定的准则。作为这一论点的证明，波伦举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干掉贝利亚为例。他们指控贝利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不是说他是斯大林最忠诚的奴仆。

谈到苏共二十大时，波伦说，要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这个国家里发表了，事情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波伦说，报告在这里是一个秘密，这就可以做手脚了。

我从贝尔格莱德就认识挪威大使布罗德兰，他在那里有几年时间成功地代表自己的国家。我曾经常是他家里的座上宾，在贝尔格莱德，布罗德兰和我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在我看来，挪威大

使尽管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却是我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的友人和苏联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我的印象是，布罗德兰对苏联所指的批判态度有时超过了他的国家的政府。

同他的会晤是友好的。他已听说，我们发现了俄国人在我们大使馆里的窃听系统。他对我说，他们也发现了，并问我们找到了多少个扩音器。我告诉他：整整十九个。他们那里是二十三个，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的“扩音效果”更好。我开玩笑说，这样也是应该的，他们是北约集团的成员国，再说他们大使馆的房子也比我们的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他在殷勤招待中十分用心，他尤其小心翼翼地不同我进行任何政治性谈话。他对于南苏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原因很可能是，免得我问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对于苏共二十大，他也不谈。据我们在这里了解到，中国对这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有保留，而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大使是中共中央委员。同他谈话本来是有益的，但是他现在不想谈我们和中国对苏关系中政治上关心的中心问题。遗憾的是，刘晓哪一种外文都不懂，如果他没有兴趣谈话的话，我就无法跟他谈话。他把自己这一不足之处变成了长处，他不想谈话的时候，在他的三个翻译中，他随身一个也不带。那时他就只握一下手，说两声好，好，鞠个躬，笑一笑。中国这种别出心裁的外交手法或许并不坏。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莫斯科。

我四、五月份在莫斯科外交团中进行的谈话证实，今天在上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关于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成就的看法。在国外并不特别倾向南斯拉夫的那些阶层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

在反共浪潮最强烈的美国，也不乏这样的评价。我们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形成了整整一套理论，南斯拉夫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比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根据我国幅员的大小和物质力量所能起的作用为大。

这种“不正常”是其他一些“不正常”的结果，其主角是不久前的南斯拉夫。十五年来，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中，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非正常”现象。在南斯拉夫的这一类“不正常”中，有参加（德意日）三方条约的贝尔格莱德亲法西斯政府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垮台。这使希特勒感到意外和狂怒，他的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后来在俄国战场上给法西斯军队造成严重后果。另一个欧洲规模和世界规模的“不正常”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于一九四一年夏天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当时希特勒正处于势力极盛时期，谁都不认为我们会有什么希望，甚至我们的友人也都认为，我们的起义象是一场灾难和民族自杀。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了，同时也有“不正常”的地方：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比在整个战争期间死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在这里，南斯拉夫的“作用”也远远超过它的“幅员大小和物质力量”。

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对南斯拉夫的攻击，仅仅在一开始，在我们南斯拉夫人看来象是一个最严重的不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正常和一贯的做法，而我们对他对南斯拉夫的攻击的抵制，谁都没有料到。全世界的共产党首先认为我们对斯大林的抵制是“不正常的”，它们支持斯大林，附和他反对南斯拉夫的政策。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应苏方的建议，我于五月十八日通过莫斯科电视台和电台就

南苏关系的状况和前景发表了谈话。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官方是如何估量苏南关系之外,这次讲话毫无意思。

如果让我对自己的讲话作个鉴定,我认为,就苏南关系而言,可以说,我们“略感欣慰”。不过,这种关系是用十分美妙的色彩来描绘的,可是还得以现实为依据,寄希望于这些关系今后能得到发展。我同意了苏联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某些评论,但是我也强调了南斯拉夫对某些问题的观点。我相信俄国人是不会很欢迎我们的这些观点的。

铁托访问苏联

南苏“意识形态团结”问题。西方对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疑虑增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铁托抵达莫斯科。莫洛托夫被撤职。斯皮里多诺夫卡官中的晚宴。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就铁托行将对苏联访问一事，我在贝尔格莱德呆了两天。南斯拉夫国内对这次访问的兴趣异乎寻常。我们有些人说，我们这次同俄国人谈判不会比去年轻松多少。现在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又在经受考验。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希望在现在的情况下铁托对苏联的访问尽可能顺利。

诚如一九四八年同斯大林的冲突一样，目前同苏联的新关系不是我们专门挑选的。可以说，事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现在要对我们迄今所取得的全部成果重新加以检验，而且这一切又是在莫斯科，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人们现在将再度付量，我们同苏联的冲突以及我们同俄国人的和解，只是一时的插曲和事件，还是象我们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和持久的现象。

我个人认为，俄国人也强烈地希望使铁托此行成功，当然是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条件。他们为铁托安排了规模很大的日程。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访问失败简直不能想象，首先是对俄国

人本身。因为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莫斯科，谈判很可能将是艰难的。可能提出极端的和相对立的立场：从最伟大的友谊和“团结”，直到威胁和发生新冲突的危险。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仍然有达成某种协议的现实可能，环境将迫使俄国人和我们达成某种协议。我们现在同俄国人的谈判跟去年一样，我们国内的形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国内的形势象往常一样是稳定的，如果在我们的领导和人民之间存在充分的信任和谅解，就如十五年来的一贯情况那样，而我认为这一切依然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就不必怀疑我们在行将同俄国人的谈判中会取得成功。

如果改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结果是使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就很不值得，就是于我们有害的。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具有根本性的和持久的意义的是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同一方改善关系来搞坏同另一方的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国就会象是一个用一只脚站着又试图表明是站稳了的人。在当今世界上处于类似地位的一个国家是很难能够谈论自己的稳定的。

至于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不只是在于我们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对西方和美国的贷款，对西方的技术，对美国的小麦或者对南斯拉夫仍然从美国得到的军事援助感兴趣，尽管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意义的。就我们的经济而言，南斯拉夫现在对西方处于它以前对苏联和东方的类似地位。那时，苏联和东方一夜之间片面地撕毁了四十多项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并且突然对我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过去只对宣战的国家宣布并采取这样的措施。南斯拉夫在物质上蒙受巨大牺牲的情况下顶住了斯大林的经济封锁。俄国人甚至在“和解”之后，也没有就此赔偿过我们一个戈比。我不知道，如果西方现在也突然采取同南斯拉夫中断经济联系的方针，会发生什么种种情况。我不相信西方会那么做，我

也不相信一个比南斯拉夫大、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能经得住另一场新的经济封锁。

如果一个小国，即便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成了大国竞争和较量政策中的目标，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南斯拉夫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因为它在国内是强大的，而任何国内稳定的国家似乎都有某种免疫力，防止各大强国在彼此结账时把它用作“找钱用的零头”。

苏联领导现在准备尽其所能排挤南斯拉夫这个欧洲和世界上自主的社会主义因素，如果说已经不能把它排除掉的话。俄国人没有想到，就象去年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又一次使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苏联人参与使独立的南斯拉夫朝着迄今为止的方向得到进一步确认的任何活动，只会增加俄国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困难，尤其是在欧洲。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肯定南斯拉夫的平等和独立，同时又继续否定阵营国家享有同样的这种平等和独立，这两个方面很难能够走到一起去，作为一种政策，这是难于持久的。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从我同布尔加宁以及随后同英国大使海德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对于俄国人访问英国时交换意见不抱多少期望。不过，这次访问本身就是一条重大的政治新闻，是上个月政界关注的中心。

我认为，在这一切上，特别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就第一次使他们有机会来到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创造者之一的一个大国。斯大林不受限制地统治了俄国三十年，从十月革命起直到自己死亡，几乎整个这段时间他都一直呆在克里姆林宫高墙之内。赫鲁晓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谴责了

斯大林仅仅两个月之后就进行这次访问的。或许要到这一点上去找赫鲁晓夫伦敦之行的意义，而不论苏英两国目前的会谈的结果多么不足道。我们行将同俄国人进行的谈判，或许会由于俄国人刚刚访问了英国而变得容易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前不久我在这里同率党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法国执政党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进行了一次饶有兴味的谈话。安·菲利普告诉我，俄国人以最热烈的方式接待他们。苏联领导人在伦敦同英国工党吵了架，发生了公开的丑闻之后，对于法国社会党人格格外小心。这批法国社会党人是作为法国总理和外长正式访问苏联的先行人员来这里的，这也帮了大忙，使这个不大的代表团受到这样的接待。

安·菲利普向我详细地谈到他们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三次会晤。安·菲利普认为，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件等于发生了某种革命。在这个法国人看来，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和苏联的制度象是西欧国家在久远的过去所经历的某种现代狂热的教权主义。

据安·菲利普认为，在俄国，实践将走在理论前面，因为苏联上层不敢公开提出新的纲领。因此这里的实践必须为理论开路。他告诉我，同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的谈话，他在自己笔记上作了四十来页的记录。这对于他之所以珍贵，首先是由于法国共产党人，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现在他可以援引赫鲁晓夫的话来公开驳斥他们！

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法国人对苏联各个领导人的看法。对于赫鲁晓夫，他满口赞誉。说他们代表团得到一个牢固的印象是，在理解世界总的局势方面以及在了解苏联复杂的国内问题方面，赫鲁晓夫远远走在苏联其他领导人前面。对于米高扬，他说米高

扬是一个杂技演员，说米高扬的最大特点是，你同他谈话之后，弄不清楚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对于卡冈诺维奇，他说，卡冈诺维奇象是一张只能放出斯大林主义旧调子的已经磨损的旧唱片。对于马林科夫，他说，马林科夫在整个时间里一直一声不吭，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同苏联大多数目前的领导人是不同的。他们同莫洛托夫没有打多少交道，因为他们的代表团是党的性质的，不是国家性质的。

从苏联人士处我们获悉，摩勒^①在这里的行动使得本来就不好的气氛变得更糟。在同俄国人的谈判中，在共进午餐和晚餐时，他的讲话的一头一尾总是声言，法国是西方军事共同体的忠诚可靠的一员。似乎莫斯科正好是法国政府总理在跟俄国人讲话时应当证明对北约集团的忠诚的地方。还给俄国人留下坏印象的是，居伊·摩勒把自己在苏联的逗留限为三天。外长克·比诺在自己的领导人离开之后又呆了四天，这也无济于事。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最高层，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谁都没有想过要对斯大林留给他们的制度从社会政治方面迅速地大刀阔斧地加以变革。在二十大上，除了谴责斯大林的那个报告之外，赫鲁晓夫还以苏联领导的名义作了另一份主要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论证，这个国家的制度不仅没有什么要改变，而且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据说，苏共的政治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尽管在斯大林死之前，确定这一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有许多理由使人有根据地设想，这里的最坚定的反斯大林分子——是指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而言——最多也只是考虑在苏联实行有限的和逐步的经济改革

^① 居伊·摩勒，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五六年法国政府总理。

和其他改革，而这些改革要花好多年时间一步一步地实行。这里采取的立场似乎是，这一制度是不会出差错的，谈不上加以改变，只能谈论使它臻于完善。

莫斯科大致是按照以下的方式提出同南斯拉夫有关的某些问题的：赫鲁晓夫谴责了南斯拉夫与之进行了生与死的政治斗争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特别谴责了斯大林针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造成的景象是，赫鲁晓夫由于这么做了，在这场历史性冲突中最终地站到了南斯拉夫一边，现在南斯拉夫方面也应该改变自己的对苏政策，以此来回报赫鲁晓夫。

我们完全有理由支持赫鲁晓夫的政策，但是我们这种支持的性质和界限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无论如何，唯有我们，而不是俄国人才能确定这一界限。苏方在这方面的幻想越大，他们对我们的要求越高，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就越弱越小。俄国人的最高纲领主义的要求，例如关于“意识形态团结”，简单地说，关于要我们加入阵营的要求，只会使我们同赫鲁晓夫也发生公开冲突，而不论这是否会对俄国的斯大林分子或反斯大林分子有益。格外的困难在于，俄国人认为如果南斯拉夫加入阵营，阵营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在我看来，这象是有人认为，一筐烂苹果里放进一只好苹果，就会全都变成好苹果了。事情只会恰好相反：连那只好苹果在这样一筐里也会烂掉。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莫斯科。

我们的礼宾机关和安全部门顺利地办完了同铁托访问有关的工作。同苏联机关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俄国人事实上办完了全部工作，南斯拉夫人只是监督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已经采取的措施。在苏联的贵宾的安全方面，苏联或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礼宾机关的事情要比我们的安全部门多得多。需要重新审查全部节目，而节目有很多项，因为铁托要在苏联整整呆二十天时间。需要协调两国礼宾部门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俄国人方面，由赫鲁晓夫代表党，由布尔加宁代表政府，而由伏罗希洛夫代表国家。因此需要明确定下来，例如，从基辅车站到铁托下榻处，由作为党的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和作为国家元首的伏罗希洛夫陪同铁托坐敞篷汽车驶过列队欢迎的莫斯科人。还需要确定其他细节。

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让贝尔格莱德了解这里同铁托访问一事有关的气氛。二十大谴责斯大林以后，贝尔格莱德对于苏联国内事态发展十分乐观。但是这里的事态没有朝着我们的一些同志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个人认为，连赫鲁晓夫也感到意外，而更不用说南斯拉夫的一些乐观派感到意外了。

要是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在苏联和阵营里都是本着二十大的精神，哪怕是以很小的步伐展开的，南斯拉夫人也会自觉地 and 自发地尽最大努力，对此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那样的话，俄国人在同我们谈判时“比较软”或许就不会给赫鲁晓夫造成困难。我担心，赫鲁晓夫会“比较硬”，因为他不够强，因此就会要求南斯拉夫人支持他，而且是按照俄国人要求的方式支持他。

俄国人强而我们弱的一个问题同南斯拉夫需要为我们的军队谋取现代化军事装备和武器有关。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中，一年来，为炼铝厂提供贷款一事具有这样的政治作用，不难设想，我们一旦要求，苏联也答应用苏联的现代化武器来配备我们的军队，这又会起什么样的政治作用。我们在这方面的状况不太妙，因为战后我们军队的装备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因素基础上的：本国主要生产轻武器，向苏联购买重武器。第一个因素依然如旧，而且现在大为加强，但是第二个因素从一九四八年消失了。我们所拥有的

苏式重武器越来越不能使用，因为已经有十来年时间，我们向俄国和东方用黄金都买不到一个小螺丝钉、一个配件，而这是使我们的苏制坦克、火炮和飞机开动起来所需要的。恢复我们同苏联的“军事贸易”，尚未提到日程，俄国人还没有动用自己对南关系中的这一张很强的王牌。这一时刻日益临近，铁托访问期间可能出现，虽说还谈不上就此进行正式的谈判。

南斯拉夫根据几年前同美国政府签署的条约，仍在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我们向四面八方寻求武器，并不是想进攻别人，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东方的威胁。我们准备向任何愿意卖武器给我们的人购买武器。同美国政府的条约仍然有效。谈不上南斯拉夫可以自夸是今天世界上在武器方面同时接受美国和苏联的援助的唯一国家。如果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按照迄今为止的方针稳定下来，我们将不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如果我们拒绝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我们这么做不会是为了用苏联的军事援助来代替之。我们能够自由地向美国和苏联购买武器，象购买其他商品一样，这依然是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在。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日，翁格内。

为了迎接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代表团，我来到苏罗边界。南斯拉夫人决定乘火车，而不是乘南斯拉夫的小飞机前往莫斯科。他们选择了很好的路线——经由罗马尼亚，而不是经由匈牙利，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的正常交通线本来是经过匈牙利的。

我们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从传统上说是良好和友好的。在南罗两国友好关系的漫长历史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当时斯大林把罗马尼亚也拉进去，来执行他的针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

铁托偕同夫人约婉卡和我们的代表团完全按照计划抵达边境

车站翁格内。苏联一个由各方面人员组成的正式陪行小组从莫斯科抵达这里，为首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苏共中央委员尼·米·别哥夫。迎接场面异常亲切友好。放了礼炮，身穿制服的乐队奏了乐，还派了苏联仪仗队。贵宾的大幅画像、南苏两国的国旗以及色彩鲜艳的标语，改变了这个小镇的正常面貌。苏罗边界上的这个小地方过去很可能没有机会经历过类似的场面。

同铁托一同前来的有我们国家和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根据米高扬一个月以前给我的口信的精神，他们人数不多，但是级别是最高的。前来的有：卡德尔、科查·波波维奇、米亚尔科·托多罗维奇、亚科夫·布拉热维奇、约扎·维尔凡等同志，还有我们的负责对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的领域的一批高级专家。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代表团里没有我们国防部的代表。

在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第二天在俄罗斯，一路上，在各个车站，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到处都有大批苏联公民欢迎我们，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真诚地感到高兴和欢欣鼓舞。苏联公民沿途的这些自发的表示，从铁托同志起，使我们大家都为之感动。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日，莫斯科。

莫斯科的迎接是最高水平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联政府领导人、苏军领导人、驻莫斯科的外交团，全都到场。还有少不了的苏军仪仗队、军乐队，基辅车站高高的漫长的圆穹下，一切都在震动、回响。附近放着礼炮，向我们的国家元首致意。这种种热闹的场面给就在近旁的数千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听着这一切，感受这一切。基辅车站不是每天都有类似的场面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莫斯科。

我们参观了农业展览会。苏联的农业看上去很出色——不过是在展览会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过去四十年了，农业依然是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苏联还没有达到俄国最后一个沙皇时的农业产量。从苏联农民作为个体生产者自由支配的一小块宅旁园地上生产的东西来看，苏联农民很可能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农业生产者。从拥有按照斯大林规定的原理耕种的大面积土地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成来看，苏联在农业上依然置身于世界上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列。

现在赫鲁晓夫又有机会回到自己最初热爱的农业上来了，在经历了并非很成功的四十年之后，为苏联农业比较顺利的发展开创了前景。赫鲁晓夫把这个计划的重点放在“征服”哈萨克，接着是西伯利亚、中亚和其他地方的荒地上。要在比几个南斯拉夫的全部可耕地还要大的大片土地上，种上庄稼，住上人。这个规模宏大的计划，要求几代人参加，要求巨额资金，就在当时也有这样的危险：整个这个计划告吹，长期生产率低下，无利可图。

就苏联农业而言，赫鲁晓夫设想的“回到列宁”会有什么结果，还要拭目以待。在苏联农村，还几乎居住着一亿人，苏联人口的将近半数，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我们南斯拉夫的农业也不是很成功。更不用说苏联了！社会主义和农业还始终不是相处得很好，结果使双方都受损害。

昨天在莫斯科街头出现了这里前所未见的场面。在我们的汽车有一次经过莫斯科街头时，赫鲁晓夫和铁托商量好，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高尔基大街上走一走。一长队汽车突然停止了，赫鲁晓夫、铁托和我——因为我坐在他们的汽车里——下车步行走向克里姆林宫。在我们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在街道上的一批莫斯科市民。我

觉得,几分钟时间聚集了几千人。出现了种种自发的表示,马上交通为之中断。铁托和赫鲁晓夫为了逃避街头的拥挤,走进了一家卖点心和冰淇淋的店铺。

苏联安全部门的军官为我们开路。我们在这家店铺里遇到的顾客开始被赶走,但是赫鲁晓夫大声地要每个人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赫鲁晓夫和铁托要了冰淇淋。待到要付钱了,赫鲁晓夫和铁托口袋里分文不明。在这家甜食店里,赫鲁晓夫的举止恰如平常的顾客,好象他认识招待我们的所有人以及我们在那里遇到的顾客似的。

毫无疑问,在高尔基大街上“吃冰淇淋”这件事将引起轰动。赫鲁晓夫在经历了这番“冒险”之后情绪极佳,他建议铁托,把车开到列宁山,停在罗蒙诺索夫大学跟前,从那里可以了望“大莫斯科”的景色。铁托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前面的一块平地上,我们呆了一刻钟。夕阳已经西下,太阳的余晖给莫斯科蒙上了各种鲜明的色彩。赫鲁晓夫向铁托解释我们从列宁山的一个小山丘上望着的大莫斯科的各个地方。赫鲁晓夫跟我们谈到计划规定要在莫斯科建设哪些新区。

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莫斯科。

我们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分别作了礼节性拜会。此前,我们拜会了伏罗希洛夫。在俄国人那里,我们遇到的总是新人。而我们到任何人那里都是“全班人马”。如果从会谈中把重要的内容同不那么重要的内容分开,那么在布尔加宁那里的会谈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苏联给南斯拉夫的炼铝工业提供贷款的问题。在伏罗希洛夫那里,会谈是亲切的,很可能是由于谈到久远的过去比谈到现在要多得多。拜会赫鲁晓夫时,他不象布尔加宁,他既没有提到铝也没有提到我们两国关系方面的其他任何问题。值得记一下的是,不同于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就他一个人在场。

赫鲁晓夫向我们谈到斯大林，谈到他在理论方面的谬误和实践中的严重罪行。赫鲁晓夫举了好几个例子，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强阶级斗争的理论起，接着谈到斯大林在农业方面和对农民的态度上的错误和严重失算，赫鲁晓夫说，农民今天是“半个多俄国”。东道主方面还谈到贝利亚。虽说从贝利亚被干掉算起，差不多过去了三年时间，这里的人似乎负有某种义务，总是向我们谈到新的证据，证明他们干掉贝利亚是正确的。

看来，对贝利亚的长时间的审问的结果是搞出了一套规模巨大、内容可怖的政治文献，这样的文献苏联以前很可能没有搞过。关于此事，这里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过。斯大林按照简短的程序把贝利亚的前任叶若夫和雅戈达干掉了，而赫鲁晓夫却对贝利亚和他的同伙紧张地审问了好几个月。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情报，但是我猜想，赫鲁晓夫部分地是根据审问所提供的文献草拟了自己在二十大上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在这里为铁托举办的一切盛大活动中，维·米·莫洛托夫都参加了，他在铁托抵达的前夕突然被撤去苏联外长的职务。莫洛托夫被撤职一事几乎被视为耸人听闻的消息，全世界作了广泛报道。事情显得莫洛托夫是由于南斯拉夫而丢掉苏联外长的职位的。这使得许多谣言盛传，尤其是在西方，说现在把南斯拉夫最终纳入苏联政治轨道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了，因为南斯拉夫得到了莫洛托夫被撤职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礼物。苏联最高层这一突然的变化的真正原因，我们一无所知。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莫斯科。

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首次正式会谈。我们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不重要的问题开始。这是谈判远为轻松的一部分。组成苏联代表团的有：尼·谢·赫鲁晓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尼·亚·

布尔加宁、维·米·莫洛托夫、阿·伊·米高扬、德·特·谢皮洛夫、瓦·瓦·库兹涅佐夫、尼·帕·费留宾、列·费·伊利切夫、克·达·列维奇金。桌子另一边是以铁托为首的人数几乎相等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可以看到，双方将近二十个人。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同俄国人是办不成大事情的。通常在小范围内同俄国人商定最重要的事情，而最微妙的事情则由两个人商定。这一次也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谈判杳无形踪。

出于尊重客人，俄国人让铁托先讲话。铁托谈了我们对欧洲和世界上某些最重大的问题的一般立场。他特别就我们对外政策中俄国人最不喜欢的几件事作了说明：同希腊和土耳其签订的巴尔干条约，我们还在接受的美国军事援助，我们对分裂的德国的政策。铁托特别谈到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作为邻国的关系，而没有涉及阵营问题。我认为，铁托是克制的，因为在莫斯科也好，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好，对于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的反南政策，他都可以讲更多的话。

赫鲁晓夫对铁托的讲话作了回答，次序也是相同。赫鲁晓夫试图支持恩维尔·霍查一方，同时又使自己不同他完全一致，说他只是通报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他们谈的看法。我们明白，俄国人也不想在这一场合当真会谈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同保加利亚以及我们同阵营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就这样，在这次首次会谈中一切照旧。俄国人仍然认为阵营问题是自己的内部问题；事关他们的盟国，至于我们同阵营国家的关系，南斯拉夫仍然拒绝苏联的调解。还在会谈桌旁时，我们估量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俄国人的立场，我们商定，不向俄国人作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将不经过莫斯科，径直向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阵营里的其他人作解释。

我们还谈到匈牙利，俄国人谈得比我们多，因为俄国人或许也清楚，只要拉科西和他的那班人马在领导匈牙利，南斯拉夫就没有

可能改善自己同匈牙利的关系。俄国人对我们说，匈牙利国内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情况越来越困难，米·安·苏斯洛夫明天将从这里动身前往布达佩斯，就寻找摆脱越来越复杂的内部危机的出路同匈牙利领导人进行会谈。在通报了这一情况后，俄国人指望我方发表支持苏斯洛夫布达佩斯之行的某种声明。关于此行，除了赫鲁晓夫通报我们的这句话之外，更多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方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当我从赫鲁晓夫那里听到米·安·苏斯洛夫到匈牙利去执行专门的政治使命时，我本人感到惊讶。对于我们和别人来说，他是以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衔命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命令出名的，当时他在反对南斯拉夫的一些决议上签过名。

苏斯洛夫同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不仅不谈话，甚至很少打招呼。他只参加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里举办的招待会或者参加某些阵营国家代表举办的招待会。我们听说，他反对改变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反对尼·谢·赫鲁晓夫代表团去年五月去贝尔格莱德。我认为，俄国人把米·安·苏斯洛夫派到匈牙利去，那他们是作出了最坏的选择，找了一个最缺少权威的代表了。

赫鲁晓夫转而谈到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他说，苏联没有任何意见，他们尊重铁托提出的种种理由。赫鲁晓夫这里所指的是西方，而不是阵营。他说，苏联也准备接受美国的贷款，当然是在象南斯拉夫接受贷款那样不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承认东德一事，赫鲁晓夫说，这将是一件意义极大的事情，但是俄国人将不催逼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铁托、卡德尔和我方的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没有料想到苏方会表现出这样的谅解。在今天的谈判中，没有谈到我们两国共产党的合作。这留到访问结束时再谈，而这个问题却是最为重要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莫斯科。

前天晚上，铁托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宫举行盛大晚宴，招待苏联领导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参加了。我想，这次晚宴将成为全体参加者难以忘却的一次回忆。虽说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宫举行的这次晚宴仅仅是一个礼节性节目，结果却成了完全另一副样子，成了远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次晚宴象是某个混合党组织的特殊的会议，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十来名党的领袖以及以铁托为首的一样多的南斯拉夫人，而议程，则可以最确切地称之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事实上是苏联进行自我批评，南斯拉夫方面没有进行批评。

铁托用俄语致祝酒辞，他没有书面的稿子，不受拘束地发表了讲话。作为好的东道主，关于我们的冲突和对南斯拉夫作出的种种缺德的事，他对苏联没有讲一句批评的话。他谈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深深相信苏共，确信我们之间的冲突是会消除的，事实上也消除了。铁托把功劳同等地归于我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强调指出了二十大的历史性意义，并向苏共中央致意。苏共的责任重大，不仅要对苏联，而且要对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负责。

铁托对苏联现领导的这番独特的赞扬，而不是对苏联提出什么批评，似乎触动了俄国人的神经，因为这番话完全符合苏联领导在这里散布的现在的一种论调，说什么苏共内部一直存在一个“列宁主义核心”，据说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时期也不断地起作用并同“个人迷信”无关。既然现在不是别人，恰恰是铁托证实了这一点，难道还需要在俄国或别的地方去寻找证人来证明关于“列宁主义核心”的说法确实是真的，这个“核心”的成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宫的盛大晚宴上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

的这些人吗？

铁托讲话以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最后是莫洛托夫，都讲了话。从苏方讲话的人数来看，尤其是从他们讲的内容来看，可以得出结论，不存在任何礼宾规则，虽说这次晚宴表面上是正式性质的。苏联所有领导人似乎在相互竞赛，看谁对斯大林反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以及对自己参与执行这项政策的谴责来得尖锐，看谁更加突出地强调南斯拉夫种种可能的美德和历史性的功绩。

从赫鲁晓夫的举止来看，可以注意到，他的情绪极佳，他认为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宫宴会桌旁发生的这一切远比我们当天上午进行的正式谈判来得重要。主席团最著名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发表讲话，对我们之间艰难的去相继表态，把责任归于自己，在今后将执行的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方面使自己承担了义务。赫鲁晓夫没有（象五月一日在克里姆林宫的那次午宴上那样）过分地利用自己“地位平等者中位居首位者”的地位，而是同在场的主席团委员们商量，他们中谁要发言，在什么时候发言，他带头支持各个主席团委员讲的话，当作自己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作的自我批评。赫鲁晓夫的答辞强烈地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谴责、南斯拉夫在大战中、战后和现在的历史性作用，强调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最伟大的友谊和展开合作的道路上，一切障碍都已排除。

关于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的讲话，我要记的是讲话也有相当的水平，就同一个题目有那么多人讲了话，这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谴责过去和承担苏方的责任上，布尔加宁比米高扬还来得坚决，就语调和用词而言，米高扬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虽说对米高扬的讲话也提不出什么意见。卡冈诺维奇的讲话最为响亮——就嗓门而言，但是也最为空洞——就内容而言。我觉得，连苏联领导人也在等着卡冈诺维奇尽早结束自己的讲话。或许他们担心他说出什么

不适宜的话来，来破坏极好的气氛，因为同别人不同的是，卡冈诺维奇以众所周知的老方式谈到苏联的实力。我的印象是，当卡冈诺维奇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举杯祝铁托健康时，俄国人都都松了一口气。

莫洛托夫的讲话给我，我认为还给桌子旁的大多数人，包括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在内，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本来似乎莫洛托夫不想讲话了，因为主席团其他所有委员都祝了酒，晚宴已临近结束，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从桌子边站起来开始相互告别。在这样的气氛中，莫洛托夫请求东道主铁托允许他讲话，他大约讲了十至十五分钟。他对于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以及他本人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同样，莫洛托夫是令人信服的，当他以十分积极的态度谈到苏联目前对待我国的新政策时，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真心实意的。

在我看来，莫洛托夫对于当前国际局势谈得也很好。不仅我方而且苏方也都全神贯注地听莫洛托夫讲话。俄国人中没有人打断他的话，苏联大多数其他人讲话时，包括赫鲁晓夫讲话时，却都有人打断话。

对于苏方的这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讲话——而这持续了很长时间——铁托没有作答。卡德尔按照铁托祝酒辞的精神作了回答，提出了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中以及使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同样操心的当前局势的新的政治问题。卡德尔的讲话受到俄国人的欢迎，卡德尔对苏联目前的政策和苏联领导讲了这样一些赞扬的话，他们几乎感到意外。

午夜过后，大约凌晨一点，我们才分手。我很难估量，谁更满意些，是南斯拉夫人呢，还是俄国人。正如我在一开始所写的，这次晚宴变成了某种党的会议，俄国人或许认为，在这次晚宴上以最好的方式已经提出了，且不说已经解决了，对铁托的访问具有根本意义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

莫斯科宣言

列宁格勒之行。斯大林格勒的欢迎。布加勒斯特隆重欢迎铁托和南斯拉夫人。宣言在签署后的第二天就遭忽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担心阵营瓦解。苏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决议。美国正式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莫斯科。

铁托到莫斯科以外地区的第一次旅行是访问列宁格勒。我认为，俄国人把南斯拉夫人首先送到列宁格勒去，那是做得最好不过的了。即令曾经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冠以列宁的名字的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没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列宁格勒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树的功勋，在希特勒一千天包围期间作出的牺牲和蒙受的苦难，这个骇人听闻的时期的英勇气概，也必然会使访问列宁格勒的每一个人激动不已。

在前往列宁格勒途中，我向陪同我们的俄国人问及在战争中牺牲和死去的列宁格勒人的数字。没有人对我说得上的确切的数字。我认为，这里还没有正式发表这一数字。还没有建立纪念碑，还没有安置好公墓。

从其他理由来看，访问列宁格勒也是最好的选择。斯大林在战后正是在列宁格勒又重操三十年代的旧业，未经审判就把列宁格勒最杰出的一些共产党人杀掉了，其中包括苏联政府副总理、国

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即令是谈论斯大林的政策，还能想象更可怖的事情吗？战后不久他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列宁格勒，就对涅瓦河上的这个英雄和殉难者之城的杰出人士重新犯下罪行！

铁托到列宁格勒访问还有更强有力的政治意义，不仅对我们南斯拉夫人是如此。跟铁托一起来的是苏联政府总理布尔加宁。受到人民欢迎的情况使人永志不忘。我不可能作确切的估计，但是，如果我说有一百多万列宁格勒人上街欢迎我们，我想我没有夸大。我们接着在最大的一家工厂出席了群众大会，铁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在列宁格勒访问了将近两天时间，那里一直处于节日气氛中。在我们同当局、同列宁格勒市民每一次会晤的时候，不论我们在哪里出现——在剧场，在博物馆，在街头，我们到处象朋友那样受到欢迎。这种欢迎在我看来是亲切而真诚的。

列宁格勒的这一喜庆活动是同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的，南斯拉夫曾是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牺牲品，而列宁格勒却是他的国内政策的牺牲品。一九三四年谢·米·基洛夫的被害，斯大林就在这个城市开始奉行他的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丧生的恐怖政策。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索契。

到俄国南方的旅行，是以没有料到的一些事件为开始的。访问斯大林格勒是一件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当铁托和赫鲁晓夫离开汽车，走向因在上次大战中在那里的战斗而出了名的一座叫做马马耶夫岗的小山丘时，人们象对付稻草人似的冲破了强大的警察警戒线，警察本应维持秩序，使我们能够从列队站在两旁的市民中间穿过。发生了无法描述的拥挤，出现了大混乱，赫鲁晓夫和铁托一度好不容易在群众中间为自己开出一条道来。这种混乱的情况是严重的，尽管混乱是由于老百姓极度兴奋所造成的。俄国人，特别

是安全机关的人，比我们感到的意外远为严重。

在马马耶夫岗，赫鲁晓夫向我们介绍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各个阶段。他曾是这条战线上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因此他不需要专家。我问曾在这里指挥苏军的安·伊·叶廖缅科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了多少俄国人？叶廖缅科元帅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告诉我，他也很难确切地断定，如果把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大范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算在内，可能有一百万人。叶廖缅科元帅说，德国人死得比俄国人多，他跟赫鲁晓夫一起向铁托、其他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介绍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叶廖缅科元帅说，在包围并消灭了希特勒第六集团军的俄国军队的装备方面，苏军使用的技术装备几乎等于苏联全部生产量。

还没有为苏军战士和斯大林格勒的牺牲者建立纪念碑。在马马耶夫岗，我们找到一小块一小块钢铁、俄国或德国的炮弹的弹片，而战争则早在十一年前就结束了。赫鲁晓夫告诉我们，整个这座小山丘将变成一座同苏联这次光荣的胜利相称的纪念碑。

当我们在马马耶夫岗参观，听取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介绍时，俄国人动员了大批军队，因为使苏联领导人大大感意外的是，安全机关已表明是软弱的，无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我们从停着的两行军用卡车中间穿过，回城，军用卡车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一辆接一辆地停着，长达数公里。在城里的几个广场上也都是如此，因此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聚集上千名群众。

在同俄国人谈及几十万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人的这种不寻常的欢迎时，可以注意到苏联对所发生的事件的不满意不只是由于造成一场大混乱，或者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贵宾的安全受到破坏。我认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在于人民出于强烈的兴奋和向南斯拉夫人表示欢迎的自发愿望，采取了苏联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那种行动。鉴于个别人，不论是南斯拉夫人还是俄国人老是

谈论这件事，俄国人就更是不满。这本身比任何别的事情更好地表明南斯拉夫在这个国家声望之高。南斯拉夫人从这一意义上，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到自己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欢迎感到非常兴奋，这只是使俄国人更觉得不愉快。因此在我们抵达南方的索契、新俄罗斯克和其他地方时，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的场面。到处我们都受到友好的接待，老百姓迸发出来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场面再也没有了。

在索契逗留期间，既有时间休息，又有时间会谈。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有卡德尔总是跟铁托在一起。有足够多的机会同俄国人就我们可以商谈的一切问题进行商谈，事实上无需在莫斯科进行最后的长时间谈判。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同俄国人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温和的，给人的印象是作了某些让步，因为对于我们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对于我们对德国的政策，或者对于巴尔干联盟，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们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和阵营问题上真正做出重大让步。

关于苏联为南斯拉夫建立炼铝工业提供贷款的问题，没有详加讨论。双方商定，在政府一级就此进行专门的谈判。对于贷款的数字，俄国人始终不表态。鉴于他们对于我们在“意识形态团结”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不满意，肯定会用进一步减少为炼铝厂提供的贷款来表明自己的不满。从去年起，这笔贷款的数字就不断减少。

苏方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我们自己决定接受德国问题上的“比较强硬”的提法。这很可能在公众中造成“南斯拉夫靠拢苏联”的印象。实质上问题不在这里。赫鲁晓夫明确强调，苏联对于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意见，我们对东德国家的承认完全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最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赫鲁晓夫这样的态

度，而不是苏联的压力，使我们便于自行决定接受表面上看来象是我们对俄国人让步的那种提法。无需特别说明，苏方对此表示满意。他们把这看成是同我们会谈的初步成就之一。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索契。

我们越来越怀疑，访问不会象开始那样顺利结束。我们中间由于俄国人开始时态度特别友好而有不同想法的不多几个乐观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决定，乘等待同俄国人会谈之机，压缩我方关于党的合作的宣言草案。我们代表团从莫斯科带来的这份草案，是苏联领导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不是由于它写得很详尽——俄国人甚至喜欢这样详尽的官方声明——而是由于我们的方案按照南斯拉夫的方式陈述了我们两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原则。在经过压缩的新方案中，我们也不会采取别的态度，但是方案短了这一点本身就使同俄国人有关的问题少些。

我们预料，我们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在对阵营问题的态度上会发生争执。在我们动身作这次俄罗斯南方之行之前，在我们代表团进行的一些会晤中，就已发生了这一冲突。事情完全清楚，俄国人认为铁托访问的主要任务在于设法使南苏关系恢复到老样子。我已经记下过，我们对这些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苏联的奢望比之于我们的要求脱离现实的程度大得多。我们对于我们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建立合作是有兴趣的。对于这种合作，我们不会要求任何条件，除了唯一能够据以进行合作的那些条件：平等、独立和权利相同。这是很难不予接受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莫斯科。

我们回到莫斯科，举行了双方不耐烦地等待的会议。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我们为解决问题的合作问题提出的经过压缩的文件草

案。如果我们把同志们从贝尔格莱德带来的那份内容广泛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宪章》交给他们的话，苏联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不难猜测的。最起劲地反对我们的草案的是赫鲁晓夫，接着是米高扬，布尔加宁差一些。赫鲁晓夫提到我们有可能签署两个文件，一个是给共产党员看的，另一个是给其他人看的。这个第一个文件很可能是内部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们提出的理由，没有给俄国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们把不同于我们的主张的方针看成是对二十大路线的确认。

我们可以这样行动，并且承担得了铁托访问“失败”可能带来的一切政治风险，因为我们在国内政策上也好，在对外政策上也好，都不取决于俄国人。事实上，我们有义务这样行动，因为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支持我们这样的独立的对外政策。同俄国人商谈，我们是深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决不打算作出让步，从而使国内的团结成问题。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寻找对我们内部稳定的支持。一个国家要到国外去寻找对自己国内稳定的支持，事实上只是表明，它正走在既丧失自己国内的稳定，又丧失自己对外关系上的独立的道路上。

我们拒绝对阵营承担任何义务，不同意在“意识形态团结”上签字画押，这给俄国人的印象不好。他们硬是不接受我们的联合声明草案，因此商定由卡德尔和米高扬设法找到解决办法，拟出个新的、共同的草案，而且要尽快拟出来，因为铁托过两天就离开莫斯科了。我们变换了、重申了论据，各说各有理，这帮不了忙。事情是清楚的，我方不会让步，苏联代表团也没有表明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莫斯科。

今天在莫斯科的狄纳莫体育协会运动场举行了盛大的友好大

会。铁托和赫鲁晓夫发表了重要的政治性讲话，从讲话来看，我们同俄国人的一致比实际情况大得多。这使我们便于就党的合作发表一个短小、简要的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南斯拉夫和苏联报纸发表赫鲁晓夫和铁托的讲话全文。我们对于大会上的气氛感到满意。聚集在狄纳莫运动场的莫斯科市民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人十分友好。另一方面，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这十万人，连想都没有想到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在我们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莫斯科。

昨晚，(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告别晚宴。气氛是好的，只是不象十五天前在斯皮里多诺夫卡宫举行的那一次。那时，访问刚开始，而现在，访问已趋于结束，希望是什么，实际情况又怎么样，现在比较清楚了。从俄国人的举止来判断，除了对铁托访问的结果表示满意外——至少有一阵子是这样——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尽管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是感到失望的。他们对这次访问下了不少本钱，但是巨额投资没有得到补偿。

铁托向朱可夫元帅和十来名苏联最高军事首长和战时苏军司令官赠送了南斯拉夫勋章。朱可夫元帅被授予南斯拉夫最高军事勋章“自由”勋章，苏联其他十名军事首长铁木辛哥、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莫斯卡连科、索科洛夫斯基等位元帅和几位苏军杰出将领被授予“游击队之星”勋章。

有一千多人出席就铁托的访问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包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的招待会和“苏维埃大饭店”举行的我们的招待会。外交团也出席了。一部分大使，美国的波伦，法国的德让，瑞典的索尔曼，印度的梅农以及其他一些人，要求同铁托单独会晤。我设法使这些会晤得以进行，尽管这是不符合俄国人的心

愿的。

最后，我们就党的合作的文件的共同文本达成了协议，我们在克里姆林宫最豪华的格奥尔基大厅里隆重地签署了这一文件。关于我们两党合作的文件就其篇幅而言是简短的，尽管题为：《莫斯科宣言》。宣言既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团结”，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这一文件也是符合南斯拉夫基本观点的精神的。虽说《莫斯科宣言》就篇幅而言比《贝尔格莱德宣言》要短，而就内容而言，看上去也比较简单，不象后者那样明确，这还是一项有巨大意义的文件。我只想提醒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共领导没有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签署过这样一个宣言。

我听说，当铁托和南斯拉夫人自苏联返国时，布加勒斯特正准备给他们以隆重的欢迎。据说，预料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铁托和格·乔治乌—德治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不知道，俄国人是否考虑到这件事？要是南斯拉夫人对这件事保持沉默，罗马尼亚人肯定不会犯类似的疏忽，很可能把这一切通报给俄国人。我陪同铁托、他的夫人约婉卡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直到罗苏边界的翁格内，他们是经由这个地方来到苏联的。当我同铁托告别时，他感到奇怪，因为他本以为我跟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前往贝尔格莱德。在最近二十天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也很想跟他们一起前往南斯拉夫，但是我得回去，干我的日常工作。在分手时，铁托对我说，现在我在苏联工作也容易些了。我表示同意。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铁托几乎是凯旋地经由罗马尼亚返国。在布加勒斯特市主要广场上举行了群众政治大会。铁托和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格·乔治乌—德治讲了话。《莫斯科宣言》签署后总共才两天，铁托就在群众大会上向罗马尼亚首都二十万市民发表讲话！这可以说是顺便，

在返回贝尔格莱德途中发生的，这件事是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对于我们也好，对于俄国人也好，对于罗马尼亚人也好，怎么估计也决不会过高。这一切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简直象是上天所赐的，而对我们来说，也象是事先选定的。至于罗马尼亚人同苏联的关系，他们认为，从政治上来说，他们是“有掩护的”，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迎接铁托，只是对苏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而已。对于罗马尼亚和阵营内其他国家来说，南苏两国党的合作的新协议为它们在同苏联打交道时争取独立和平等扩大了回旋余地。

贝尔格莱德的迎接使铁托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达到了顶峰。铁托向大约二十万贝尔格莱德人用最美好的语言谈到苏联，谈到我们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在铁托在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讲话之后，我国公众以及国外大大加强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在南苏相互靠拢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看来俄国人对这一切有不同的看法。我回到莫斯科后获悉，还在铁托返抵贝尔格莱德之前，俄国人就在这里举行了阵营国家代表会议。出席的有阵营国家党的领导人。俄国人把他们叫来，向他们通报铁托访问的结果。这种匆匆忙忙的做法证明了我们先前的估计是正确的，俄国人确实把阵营问题摆在他们为我们安排的政治计划的首位。

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次阵营国家代表会议由拉科西主持；轮到他主持。主要议程是：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之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合作。报告人是尼·谢·赫鲁晓夫，他说苏共中央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各国共产党的任何国际新组织来代替业已解散的共产党情报局。阵营国家全体代表未经讨论就立即同意了赫鲁晓夫的意见。拉科西作为主席，急于第一个表态，而且是以全体代表的名义表态。赫鲁晓夫不同意这么做，要求每个人只代表“自己的”党讲话。赫鲁晓夫接着建议组织出版一家理论杂志，作为各国共产

党非正式的机关刊物，它们将在那里进行合作。这被一致采纳。编辑部所在地将不在莫斯科，而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作为说明平等的某种论据，而对俄国人来说，这样也更好些，因为他们在一个阵营国家里得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苏联机构。

在阵营头头们的这次会议上，谁都没有提到会议之前总共两天才在这里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在《莫斯科宣言》签署后的第二天就无视这一宣言，这种做法只能意味着苏联对这一文件感到不满。无论如何，俄国人以这种方式明白地告诉阵营国家领导人，他们同铁托签署的东西不适用于苏联对阵营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也没有人要说什么。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莫斯科。

《莫斯科宣言》签署后，总共才过了一周，波兰的波兹南就发生了骚乱和流血事件。据我们从这里所能了解的情况，站在百姓和当局之间的这场冲突的前列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开始时是罢工。当局把军队和坦克开上街头。据说示威者有许多伤亡。^①

波兰事件最初使俄国人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看成是一场反革命的开始，据这里说，这场反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组织的，目的在于破坏阵营，使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强行分离。在俄国人中间，除了把波兹南的流血事件看成是“帝国主义阴谋”外，找不到一个人是以别的方式加以解释的。在官方人士中，没有人把波兰人的不满同斯大林强加于波兰的政权联系起来。在莫斯科还可以听到议论说，这一切只怪那些谴责了斯大林的人。

^①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罢工和骚乱。当局试图使局势平息下去，但是最初没有成功。《战斗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曾转载波兰通讯社的官方公报，公报详细描述了该市发生的巷战，把骚乱的罪责归之于挑衅分子，官方证实，有三十八人死亡，二百七十人受伤。

对于这样来解释这一事件，不必感到奇怪，这样的解释从政治上来说最符合斯大林分子的心意，而从心理上来说，十分接近苏联普通干部的心理。赫鲁晓夫本人前不久也曾从类似的立场出发威胁过波兰人，指责他们想“到西方去”，对波兰和阵营里试图改变迄今为止的关系的任何人进行威胁。保住阵营和苏联在阵营里的统治是苏联新老对外政策的至高无上的要求。非斯大林化政策不仅不允许瓦解阵营，而且算计着要进一步加强阵营。

根据苏联最高层的看法，非斯大林化政策严格地是苏联党和苏联政府，事实上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内部问题，他们象药剂师似地量出新的政治手段的剂量。已经有三个月时间了，他们未能找到真正的措施，因此在考虑全新的处方。

莫斯科可以宣布一种反对“个人迷信”的理论，并在这一基础上制定斯大林之后的某种新政策，即便是按照前进一步后退一步的方式和沿着曲折的路线进行的。但是事关哪个阵营国家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些国家的国界同时也就是苏军和西方军队的分界线。如果说苏联有可能牢牢地控制住内部事件，一步一步地实行非斯大林化过程，阵营国家就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迈出最初几步就可能导致爆炸性局势，就可能导致后果难以预料的最严重的危机。在波兹南，开始时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举行了抗议集会。这一集会在同一时刻变成了波兰十万市民的群众示威。那时就出动了军队，用坦克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波兹南的流血事件使俄国人确信有必要最严格地控制目前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并掌握其“剂量”。如果允许哪怕只多“一个药匙的量”，尤其是在阵营里，病人就可能完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莫斯科。

或许莫斯科认为，如果我们十来天前接受了“意识形态团结”，

在义务承担书上签了字，按照俄国人的心愿奉行对阵营的政策，阵营里就不会有这场危机，就不会出现波兹南事件。按照这种颠倒的逻辑，我们要对我们坚持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为独立而斗争而负有责任，因为这样，我们就鼓励别人去争取同样的东西，而苏联剥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自己的盟国的独立和平等，倒是没有责任的。眼下的情况不如三个月以前有利。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莫斯科。

波兰事件发生两天后，这里发表了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的一份新的、十分详尽的文件。很可能这一巧合是偶然的。我认为，这里早就在草拟这份文件，对于阵营里会发生类似波兹南所发生的事件，连想都没有想过。

要是在四个月前举行了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之后，这里没有什么困难的话，或许就不会有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的这项新声明。麻烦几乎来自各方面：来自苏联，来自阵营，来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自中国，来自美国和来自西方。对于家里，或者说阵营里的困难的感觉比别的困难更为强烈。阵营对于俄国人来说，在政治上尤为重要，因为对于苏联，阵营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地区。在这一点上，在一定情况下，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之间是有可能达成妥协的，因为在苏联领导人中间不可能作这样严格的区分。在阵营国家里，这就更困难了。在那里，共产党最著名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并被无辜杀害。另一些人被判处流放。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地方前不久释放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这些国家里，掌权的还是那些策划了这些罪行的斯大林主义人物。以前的流放犯显然不可能同昨天的狱吏一起呆在政府里。要么是这批人，要么是那批人！我认为，赫鲁晓夫向阵营里的某些斯大林主义政府施加了压力，让它们把无辜被判刑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放出

来：波兰放了哥穆尔卡，匈牙利放了卡达尔，还有别的人。

俄国人的麻烦之所以增加，还由于某些阵营国家政府，例如阿尔巴尼亚政府，几乎公开反对谴责斯大林。保加利亚人跟这种态度也相去不远。他们需要花去大约一个月时间，才召开保共中央全会，公开支持苏共二十大！在阵营的所有领导人中，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其次是对匈牙利的拉科西来说，要接受非斯大林化政策，很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对其他人来说，也不会是件轻松的事。

中国是个特殊问题。中国人不仅没有支持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短暂历史上，恰恰在斯大林问题上第一次以中国的方式批评苏联现领导。这在苏联已经有反响，而且是不利于赫鲁晓夫和他的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在苏联对秘密报告所作的这些“补充和修改”中，存在着中国这个因素。俄国人现在改口了，“科学地”和“客观地”谈论起斯大林来了，而这正是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的意思。俄国人照例坚持自己的基本路线，同时又说自己是—贯的，举出中国人来作为支持他们的证人。中国人并不支持他们，事实上已经同俄国人保持距离。

—一九五六年七月三日，莫斯科。

苏联所有的报纸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一个声明，题为《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这是一份内容广泛的文件，占据苏联每张报纸的几乎一半篇幅。文件是作为中央委员会关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作的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决议”发表的。美国人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就发表了秘密报告的全文。秘密报告不是由美国的哪家报纸或杂志，或者由美国情报机关发表的，而是由国务院发表的，从而表明美国政府对于发表的文本的可靠性承担全部责任。在俄国和美国的关系中，许多年来很可能没有发

生过类似的事情。美国的这一行动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除了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外，几乎世界各国都在根据美国官方版本谈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的新闻自由方面，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副似非而是的景象：全世界用各种主要文字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唯有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这仍被认为是国家机密。

有鉴于业已发生的这一切情况，俄国人看到他们有义务在莫斯科发表秘密报告的某种公开版本，于是就出现了那项“决议”。“决议”事实上补充和修正了秘密报告。

我认为，俄国人在铁托访问苏联之前就在草拟关于斯大林的这项“决议”。我认为，他们等待访问有了结果，并据此来确定“决议”的基本政治方针。我们拒绝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使苏方感到失望，首先是使赫鲁晓夫感到失望，他本人对铁托这次访问下的本钱比对一九五六年春苏联其他任何政治行动下的本钱都要大。或许，正因为如此，关于斯大林的这项“决议”现在比本来的情况还要糟糕。

“决议”除了是针对共产党人和阵营之外，有一部分是写给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看的。这一部分强调了苏联对于世界划分为两个对抗性集团的老公式，严格要求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同打算用武力来消灭革命运动及其成果的资本主义作斗争。“决议”不强调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力量国际团结的必要性，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必要性只字不提，甚至一点也没有谈到共处和世界和平的政策。至于苏联和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向他们严格地说清楚了，莫斯科迄今为止的政策中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苏联和阵营里的国家和党的机器不仅在吁请人们保持秩序和遵守纪律，而且似乎它本身已处于戒备状态。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这里已开始刮什么样的风了。在发表“决议”的同时，俄国人现在公开批评起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

亚蒂来了。仅在十来天前，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对我们说，对于陶里亚蒂为了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和赞成奉行非斯大林化政策而发表的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意见，这里准备全部予以发表。结果却是，现在《真理报》攻击起陶里亚蒂来了！

虽说“决议”说，苏联将继续奉行现在的，其意思应当是指新的政策，重点却过多地放在老政策的观点上。对于我们，对于别人，我认为也包括对于俄国人来说，特别糟糕的是，《莫斯科宣言》被忽视了，因为要说苏联对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有什么新的和进步的内容，那就要算铁托和赫鲁晓夫十来天前签署的这份宣言了。尽管俄国人现在应当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证据来，以证明他们的新政策，这些证据中最重要的一项此时此刻却使他们感到为难，于是看上去他们对于同南斯拉夫人签署了这一宣言感到后悔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莫斯科。

我们设法多了解些有关“决议”的情况，不限于我们自己从苏联报纸上所能得出的结论。我要我的同事们同俄国人和阵营国家的代表接触和交谈。就目前而论，西方和其他国家意思不大。

从同东欧国家记者的会晤中，我们听到了一些评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同我们交谈时，比他们国家的外交代表来得不受拘束。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朋友的阵营国家的记者深表失望，我甚至要说，六月三十日的“决议”使他们垂头丧气。他们在批评俄国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时，往往走过头，有片面性。他们把苏共中央的这一声明看成是放弃二十大的最好的一些决议。他们把“决议”看成是，莫斯科决定支持阵营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府，证明在这里，在苏联最高层，老的斯大林主义派又占了上风。每当这里在试图奉行非斯大林化政策遇到困难的时候，赫鲁晓夫就第一个出来讲话，似乎

他是斯大林的最忠实的学生，而不是秘密报告的作者。看来他是想用这种方式使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其他的人不能反对他。

我们同驻莫斯科的西方外交代表经常保持接触。西方代表对“决议”的解释比起东欧记者来正面的东西多一点，一开始时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奇怪的。西方人绝大多数认为，非斯大林化政策不仅没有被放弃，而且由于有了“决议”而得到了肯定——如果只就言词而言。在这一方面，西方人对苏联的政策看法比在这里同我们交谈的俄国人阵营里的某些盟友还来得现实。在后者看来，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南斯拉夫人看来，之所以发生危机是由于二十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进行得太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而不是由于非斯大林化进行得过多。西方代表从相反的立场出发，说进行了已经进行的和现在“决议”要进行的那种程度的非斯大林化，是一件好事。显然，我们是根据俄国人应当怎么做来评价他们的行动的。西方代表没有共产党人，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我们南斯拉夫人还没有摔掉的那种脱离现实的包袱。

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莫斯科。

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如三个月前我刚到莫斯科时好。看来这里上个月搞了三个星期的赞颂南苏关系的活动，使他们上了当。在光彩夺目的外表下——这往往只能是表面现象——我们和苏联的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了，在两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合作，而这是一个新的重大的政治事实。

南斯拉夫争取到在崭新的基础上同俄国人合作，看来，连这一点也不使美国代表感到高兴。或许他们不打算理解，也不打算正视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超级强国，或者我要说，象苏共这样一个超级共产党，能够在自愿、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同一个小国的“共产党

国家”的共产党，这里包括南斯拉夫在内，进行合作。对于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主义小国的共产党同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共产党的合作归之为屈从关系，这是事情的自然的归宿。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种状况，铁托和赫鲁晓夫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也改变不了。这只是言词而已，而言词在政治中，即便是最美好的言词，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事实仍然是我同驻莫斯科的美国人会晤时的气氛不象近几年来那样友好了。现在，这里的景象很不寻常：俄国人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同南斯拉夫什么也没有达成；美国人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俄国人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俄国人和美国人都对南斯拉夫人愤愤不平！

美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在波兹南事件以后活跃起来了，十分起劲。他们丝毫不因苏联指责这一切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而显示出不安。这里的美国记者说，美国乐意接受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的任何国际调查，美国事先就表示接受从事这一调查的国际委员会的任何发现。我们总的印象是，美国人对所发生的情况感到满意。危机发生在苏联和华沙条约，而不是发生在他们那里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里。

莫斯科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

同西德大使谈话。空吵一场。同赫鲁晓夫谈话。庆祝我国武装起义十五周年。继苏斯洛夫之后，米高扬去布达佩斯。千方百计支持拉科西。苏联给外国贵宾看电影。

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莫斯科。

印度大使梅农认为，铁托的访问是对国际合作和平的重大贡献，相信一切善意的人们“都会欢迎你们同俄国人的新协议”。他认为，我们不仅增进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对加强苏联的新政策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俄国人欢迎铁托的情景给这位印度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尼赫鲁来过这里，受到十分友好的接待，但是这两次接待无法比较。应尼赫鲁之召，他将前往伦敦，他十分谨慎和有分寸地提了几个问题。他说，我为他的伦敦之行和同尼赫鲁的谈话提供了方便。

缅甸大使对这次访问讲得过分了。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缅甸人在类似情况下是严守中立的。他特别赞成我们拒绝干与其他国家的内政，以及我们不允许别人干与我们南斯拉夫的内政。

这里流传一则消息说，铁托在谈判过程中要求俄国人除掉匈牙利的拉科西、东德的乌布利希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与此同时还流传另一种相反的说法，说俄国人提出把这三个人除掉，条件是我们参加阵营。当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我认

为，是西方抛出这些假情报的，因为这些假情报很快就传开了，轻易就被接受了。这加剧了混乱，加重了不信任，使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都受损失。西方将在布达佩斯、东柏林和别的地方散布这一切，这不会不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以及世界公众起作用。尤其是因为俄国人通过抛弃“完成使命的黑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外，西方通过这种办法，再度把苏联和阵营，以及南斯拉夫和“世界共产主义”说成是某种野兽出没的地方，在那里谁都性命难保。西方抛出这样一些“绝密情报”，表明它很想事先就让南苏协议信誉扫地，而不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协议。

我设法向铁托同志做了工作，让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会见一下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并同他谈一谈。后来会见了。我相信这对双方都有益。而现在波伦向我解释说，美国报纸援引铁托在斯大林格勒的讲话，说南斯拉夫在未来战争中将与苏联站在一起，美国报纸这么做是得体的。美国报纸只是援引了苏联报纸的文本。我对波伦说，我本人在斯大林格勒，我听了铁托的讲话，美国报纸和俄国报纸都没有确切地引用铁托的话，我们南斯拉夫人希望根本不发生第三次大战，因此今天来谈论谁将站在哪一边是没有意思的。

西德大使哈斯要求我接见。他说，铁托的访问使南斯拉夫的地位得到新的、有力的确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接受了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哈斯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南斯拉夫这么做，打击了德国的统一，而这是全体德国人的基本问题。第二，我们鼓励了以乌布利希为首的潘考夫斯大林主义集团。第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不会同意把自己同潘考夫政府这样的外国代理机构等同起来，而我们把他们等量齐观。第四，不仅现在，而且明年大选后，即令社会民主党人取胜，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也没有人会改变波恩迄今为止对苏联在潘考夫的代理机构的政策。第五，乌布利希和他的斯大林主义集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南斯拉夫的敌人，而我们却支持他们。

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随时可以中断同哈斯的这番谈话。然而，我同他呆了一个多小时，最大的理由是，从第一天起，哈斯对我的态度是十分得体和友好的。另一方面，我想告诉他，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存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不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区别，这是我们大家，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内，迟早都必须考虑的现实状况。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谈话最后还是谈得比较好的。

在几大强国的代表中，唯有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对南苏协议发表了正面的评论。这位法国人在同我的谈话中，赞扬了南斯拉夫的政策，他关心的不是我们的政策，而是苏联的政策。我觉得，在法国大使看来，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小国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作为超级强国和法国在欧洲的伙伴的俄国的政策。

瑞典大使索尔曼，我们外交团的团长，努力既同俄国人，也同美国人以及同我们其他的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在同我谈话时，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再说，这位瑞典人觉得讨厌的是铁托—赫鲁晓夫关于我们两国共产党建立合作的宣言。我们是在什么原则基础上建立这种合作的，这他不感兴趣。原则，只是说说罢了，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了这一类合作。在他的国家里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决不会接受这样的合作。在我作了不成功的解释之后，我不得不对他说，这完全是他们的事情，正如我们同俄国人的协议是我们的事情一样。

对于我们在德国问题上“靠拢”苏联，他也作了类似的解释。看来我们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了，索尔曼说，他并不这么认为，他对我说，这里的“大多数大使”对于苏联的看法，

基本上同我们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苏联的情况越来越好，希望苏联越来越强大，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尽管俄国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其他许多人希望的，则刚好相反。我完全接受了瑞典大使和我们外交团团长的“指责”。

同阵营国家的大使，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进行有意义的谈话。他们一如既往。甚至在我看来，现在，在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之后，他们比以前更有保留。我几乎已经习惯于同他们的这样的关系，他们不想谈起铁托对苏联的访问，尤其是在阵营国家首脑六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开会之后，我也不感到奇怪。唯有罗马尼亚大使是例外，他面对面地用最美好的言词向我谈到铁托访苏结果以及布加勒斯特对铁托的“隆重接待”。

要就铁托的访问和《莫斯科宣言》同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们进行某种有意义的谈话，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在他们看来，这仍然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而他们对共产主义“不明白”，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听凭俄国人和我们去处理。实际上，莫斯科对于正同以色列和西方作斗争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是日益强大的支柱。阿拉伯代表担心，如果同我们过分接近，俄国人会有意见，虽说南斯拉夫在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是可靠的朋友。

我认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是，大多数国家的大使，首先是西方的代表，在谈到波兰发生的事件时都认为，西方要是有人认为现在是强行改变任何一个阵营国家的体制或者设法使这些国家摆脱苏联的时候了，那是极其愚蠢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昨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率领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前来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我觉得合

适的片刻，我走向赫鲁晓夫，同他打招呼。跟他在一起的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我一走过去，就全都沉下了脸，很不愿意地打了招呼，勉强表示礼貌而已。他们情绪很不佳，使我我觉得我最好立即走开。赫鲁晓夫留住了我，因为他“有些事情”要告诉我。

他说，他们没有能够想到南斯拉夫会作出对苏联和对他本人已经作的类似的事情来。我感到意外，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报纸删节了他在莫斯科狄那莫体育场的讲话，尽管曾同铁托商定，我们和苏联的报纸全文发表两人的讲话。我们南斯拉夫人违反协议，删节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因此我们那里不知道赫鲁晓夫讲了些什么，而他们，在苏联，则是按照官方的协议办事的，全文发表了铁托的讲话。

看上去赫鲁晓夫颇为激动和恼怒。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看上去忧心忡忡，似乎发生了一件坏事，突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提出越来越凶的指责。他说，他们考虑过给要对这一切负责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写一封抗议信。信没有写成，但是也没有善甘罢休，因为这是一件大事，而且不是偶然的。他们极其真诚地、怀着最大的尊重对待铁托，而我们却报以最粗暴地违反协议。赫鲁晓夫生气地，几乎是威胁性地强调，他们苏联人决不允许任何人耍弄他们。

我感到奇怪。我不知道南斯拉夫报纸的这个错误，尽管我在这里定期收到并经常翻阅我们的报纸。我没有看报上登的铁托和赫鲁晓夫的讲话，既没有看苏联的报纸，也没有看南斯拉夫的报纸，因为我在群众大会上听了两人的讲话。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报纸这个几乎是技术性的疏忽比对铁托访问的全部成果还要重视，这使我感到意外。我感到奇怪的是赫鲁晓夫的用词和语调。

我告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一切我是现在从他们那里获悉的，使我很奇怪的是把我们报纸的这一疏忽同我们

领导和铁托联系起来，我们报纸报道狄那莫体育场的群众大会和讲话时，铁托还在苏联，我们领导同这一切不可能有任何联系。我提醒他们注意，铁托在苏联，后来在罗马尼亚，后来又在贝尔格莱德至少有十来次用最美好的言词谈到苏联和自己的访问，这一切在全世界都广为报道，因此南斯拉夫某家报纸是否在十五天以前发表了铁托或者赫鲁晓夫六月十九日群众大会的讲话的自己加以压缩的文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完全同意赫鲁晓夫责备南斯拉夫报纸的这个行动是不得体的，但是我认为，不必赋予这以任何政治意义。在苏联也好，在南斯拉夫也好，在世界上也好，谁都不会甚至注意到这一点，而今晚这却成了围绕铁托访苏的一件大事。这是叫人无法理解的。

我这番谈话没有成功，尽管我觉得，全部理由都在我这一边。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看法。离我们一、两步远，站着布尔加宁、米高扬、马林科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谁都没有走过来。当赫鲁晓夫说，他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解释“南斯拉夫对苏联和他本人”的这样的行动时，伏罗希洛夫说，我们那里或许还存在“某个吉拉斯”，这时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我打了招呼离开后，赫鲁晓夫还说了下面这句话：我们之间还有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我问他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说，我很清楚这一点。当我说，我确实不明白这一点，从一开始起就不明白今晚的谈话，赫鲁晓夫说，现在他不能对我说更多的话，他相信，能够那样做的时候会到来的。

赫鲁晓夫再次激动起来，他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来结束谈话：您本人最清楚，我在这里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做了哪些事，而你们的报纸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全都得到有关这件事的材料。你们的报纸只发表了我的讲话的原文本的

三分之一，而苏联报纸却发表了铁托讲话的全文。现在主席团都望着我。由于你们方面的这样的行动，他们还没有跟我说什么，只是看着我。

我回家后，设法把事情从头到尾连贯起来，设法对赫鲁晓夫不同寻常的举止和苏联最高层整个这种戏剧性的做法作出解释。考虑到协议，赫鲁晓夫批评南斯拉夫报纸的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赫鲁晓夫把我们报纸二十天前的这一疏忽看成是南斯拉夫“破坏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证明，这是毫无道理的。

赫鲁晓夫或者苏联领导中其他某个人由于某种原因需要挑起这场杯水风波，找到一个借口，对南斯拉夫使用这样有分量的和严厉的话。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是当着一些见证人的面这么做的。这些见证人之一伏罗希洛夫问我，我是否知道，如果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或别的人干了类似的事，他们会怎么办。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俄国人会怎么办并等着伏罗希洛夫回答，赫鲁晓夫不让伏罗希洛夫说出他的想法。

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昨晚跟我讲的事，曾作为特别议程，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审议过！全体主席团委员都拿到了材料：苏联的《真理报》和南斯拉夫的《战斗报》。《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讲话的三分之二都用红铅笔划了，正好是我们的《战斗报》以及南斯拉夫所有报纸删去这个讲话的部分。以前我不知道苏联最高领导还干类似这样的事。计算行数的这种做法应使俄国的指责具有某种正式的力量。俄国人实际上是寻找借口，使同我们的关系尖锐化。

我相信，赫鲁晓夫不是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这种做法的倡导者。在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离开我们之后，赫鲁晓夫让我知道，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同我们进行这场争吵的，而是他

是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行事的。当然，关系紧张起来的原因不在于删节讲话，而在于莫斯科对铁托访问后所发生的事件的总的方针。

当苏联方面全面普遍搞紧张的时候，南斯拉夫很少有可能成为例外。

我建议我们纠正这一错误，办法是由国家负担，出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关于铁托访苏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发表赫鲁晓夫六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友好大会”上的讲话的全文。即令没有同俄国人发生这场出乎意料的冲突，我认为，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宣传铁托访苏的成果。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莫斯科。

今晚在为北朝鲜主席金日成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到了赫鲁晓夫。鉴于赫鲁晓夫的情绪比三天前好得多，我问他，他曾告诉我，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还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指什么？我是作为南斯拉夫大使这么问的，我完全有权扫除我们之间令人不愉快的过去所残存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说，我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是令人不愉快的，而是十分明显的差别和不一致。观点上的差别决不是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赫鲁晓夫不打算谈这个问题。他追述了三天前对我说的话，说就这个问题对我说更多的话的时候会到来的。他谈到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发展，很好，而苏联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却很差，因此许多南斯拉夫人继续按老的方式看待苏联。从他这番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所说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指南斯拉夫人同西方外交代表的一些谈话。

此间仍在继续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各种报告，不仅是从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而且是从全世界。不论苏联情报机构今天是否

是“按照列宁的方式”，以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方式工作的，此间继续向苏联最高层提供形形色色的反对南斯拉夫的文件，从阵营国家开始直到美国。要是莫斯科有人专门收集某些南斯拉夫人在全世界对苏联讲的坏话，不难设想，在一个礼拜以内会收集到多大一堆“反苏”报告。

此间把任何南斯拉夫人说的反对苏联的话，都当成一回事，似乎这个人代表我们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在说话。关于“我们的反苏主义”的这些报告，现在在这里特别有份量。看来，这里终于得出结论，铁托的访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立南斯拉夫的独立政策，俄国人不满意的是，他们自己对此作出了贡献。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莫斯科。

从我们和苏联的整个政策的范围来考虑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向贝尔格莱德报告，我认为南斯拉夫有必要在政策上朝着其他方向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过一个星期，尼赫鲁和纳赛尔将到南斯拉夫同铁托会谈。这是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这两位领导人不仅代表自己的国家，而且象征性地还代表整个大陆。在我们最近“靠拢俄国”之后，使在南斯拉夫的这次会晤成功，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将加强我们对俄国人以及对西方的地位，更不用说为我们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开创新的广泛的前景了。

按照同样的思路，我建议贝尔格莱德，我们正是要在现在同某个西方国家，同美国人或者西欧人，反正都一样，签订一项比较重要的经济协定。我知道，贝尔格莱德有好几个这一类的方案。我认为最好是现在，在签署了《莫斯科宣言》之后，南斯拉夫和西方签订一项新的经济协定。这只会加强我们对苏联的地位以及加强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要素，因为这将表明，关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国

共产党合作的《莫斯科宣言》不应当成为妨碍南斯拉夫和西方顺利发展关系的障碍。

我知道，奥地利共和国总统拉布访问南斯拉夫一事已经商议很长时间了。我建议贝尔格莱德，取决于我们的事都予办到，以便尽可能早地使这次访问得以实现。我还建议研究一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代表会晤的可能性，以便本着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发生十年冲突之后两年前在伦敦签订的条约的精神，就解决我们两个邻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会谈。

我提醒贝尔格莱德注意这些问题，我觉得，南斯拉夫朝着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发展尽量广泛的合作的方向展开活动，最终会对我们在苏联的工作起好的影响，而不管俄国人会对我们这样的对外政策方针表现出多大的不满。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莫斯科。

昨晚赫鲁晓夫通知我，在铁托同他们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谈话之后，我们的报纸事件可以被认为已经消除了。谢天谢地！

赫鲁晓夫接着转而谈到波兰事件。他十分尖锐地攻击波兰的“反苏分子”，说他们试图以南斯拉夫为榜样，尽管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做。赫鲁晓夫说，波兰的这批人也好，匈牙利的那批人也好，还有别的一些人，现在都以南斯拉夫为例，而这一切同南斯拉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南斯拉夫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实际上是想到西方去，想破坏阵营。支持这一切的是杜勒斯领导下的美国，据赫鲁晓夫认为，杜勒斯这一回走得比在莫斯科这里所能设想的远得多。现在俄国人将公开追究美国的责任，要在苏联报纸上十分坦率地谈美国人所做的一切。美国人从俄国人所做的一切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苏联软弱。赫鲁晓夫说，我们将向他们表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我说鉴于这一切我是第一次听说，而且我不知道这里要发表些什么东西来反对美国，我认为，完全从波兹南的事件和骚乱来看待目前的局势，这样做不好。赫鲁晓夫打断了我的话，一把抓住我的手，说：那里流了血。我说，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同样确实的是，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城市里的一起具体事件，这一事件必然有同杜勒斯的反共政策无关的具体原因。我觉得，如果现在一下子使局势全面紧张，只会对杜勒斯有好处，不会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好处。在我只表达我自己的意见这一条件下，我对赫鲁晓夫说，应当研究别的、相反的办法。要弄确切，波兹南工人为什么闹事，当局为什么这样行动，如果着手这么做，则有好几种别的办法。我不能相信波兰的工人，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想恢复资本主义，我也不能相信他们是按照杜勒斯的愿望闹事的，尽管美国政府对于波兰事件是感到满意的。

赫鲁晓夫说，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说苏联将继续执行二十大的政策，但是同时将“向敌人表明”苏联是强大的，苏联谁都不怕。西方现在敢于在波兰挑动闹事，明天就敢于在别的地方这么干；他们认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时候了。赫鲁晓夫说，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和平共处政策不会因此而受损失。相反，只有社会主义强大，帝国主义才会接受这一政策。帝国主义是不会同软弱的社会主义共处的。

一如既往，苏联对西方搞紧张的结果是在国内，在苏联和在阵营里搞紧张。苏联对铁托的访问感到失望和在我们报纸问题上小题大做，都是按照这一精神办的。我担心不会就此罢休，因为眼下看来，这里似乎又重新刮起了西伯利亚的冷风。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谈话中接着要我向铁托同志通报以下情况：匈牙利

利的局势十分复杂。苏斯洛夫已去过那里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报告。俄国人决定坚决支持拉科西！赫鲁晓夫说，他们完全清楚，他的处境困难，但是他们也知道，拉科西所做的一切都是照斯大林的命令办的。拉科西的过错同他们在这里，在莫斯科犯的一样。拉科西今天不可能公开这么说，诚如俄国人今天不可能公开这么说一样。因此在苏斯洛夫作完报告以后，他们决定支持拉科西！我认为，对于苏斯洛夫建议支持拉科西是不必感到奇怪的。

赫鲁晓夫告诉我，匈牙利人已经给无辜地死于非命的拉伊克·拉斯洛平了反。对此事，我也没有发表评论，尽管十分清楚的是，拉科西不可能给拉伊克平了反而仍旧领导匈牙利。赫鲁晓夫指责匈牙利人把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他说，这件事他们没有问过俄国人。本应让纳吉留在党内，现在就会受到欢迎。这里除了支持拉科西外，没有别的选择，赫鲁晓夫希望铁托正确地理解他们，因为他担心，苏联和南斯拉夫现在可能在匈牙利和苏联支持拉科西的问题上发生新的冲突。最近米高扬从莫斯科去了那里，以便“同匈牙利同志们商谈”。

我认为谈话已经结束，我说，我今晚就把他告诉我的一切电告铁托，我想告辞了。赫鲁晓夫留住我，他接着说：如果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里决定使用一切手段来粉碎匈牙利的危机。赫鲁晓夫强调，他是出于信任把这一点告诉我，这样的局势还没有出现，或许也不会出现，但是他希望把这里作出的内部决定及时告知铁托。他还说，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决不允许阵营的“阵线被冲破”，而西方现在正在这么做。

事情很明白，赫鲁晓夫也在威胁我们南斯拉夫人，而不只是威胁匈牙利人，就如很明白的是，如果出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这里已决心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苏斯洛夫已尽他

所能使危机加深和尖锐化，而不是使它趋于缓和和找到较好的办法。现在还威胁我们，说要在匈牙利动用苏军，并要南斯拉夫“正确地理解他们”，还要南斯拉夫保持沉默。

或许为了缓和进行这番威胁的效果，因为赫鲁晓夫不难发现我感到意外和我是不同意的，赫鲁晓夫对我说，最近他们同意意大利人进行了很好的谈话。赫鲁晓夫说，陶里亚蒂是“一位忠诚而正直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没有提到，这里十五天以前还通过《真理报》谴责了陶里亚蒂。接着赫鲁晓夫告诉我，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曾秘密地来过这里，说他们将给波兰人以巨大的经济援助，说波兰正在整顿，波兹南事件还有相反的、好的一面，说波兰领导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前不久赫鲁晓夫曾就同一些问题对我说了完全相反的估计，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感到为难。为了证明自己的讲话，赫鲁晓夫向我谈到一些事例，波兹南闹事工人如何不让匪徒们从“军队之家”射击从示威者焚毁的坦克里跳出来的波兰军官。匪徒们抓住了他，让他站在墙脚下，但是工人们，尽管也是闹事者，却不让枪杀。

或许在赫鲁晓夫看来，跟我谈匈牙利谈得过多，而且过分有利于我们南斯拉夫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因此开始向我谈到恩维尔·霍查对南斯拉夫的新指责。他说，霍查最近给他写信，指控南斯拉夫继续在活动，要推翻阿尔巴尼亚合法政府。我们的新任公使阿尔索·米拉托维奇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招募反对派人士，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反对者。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打破沉默。我告诉赫鲁晓夫，有好多年我本人就负责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国家事务，而且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当时阿尔巴尼亚人在边境杀害我们的官兵，对南斯拉夫犯下形形色色的罪行，以后我也负责过，直到我前来莫斯科。我们在一九四八年前后一贯维护这个国家的完整和主权，尽管以霍查为

首的它的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奉行敌对的政策。我们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向阿尔巴尼亚在西方的所有敌人明确表示，他们危害阿尔巴尼亚的主权和完整的任何尝试，我们都认为是对南斯拉夫的主权和完整的攻击，而不论霍查对我们奉行的却是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今天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恩维尔·霍查今天还在掌权，霍查首先要感谢南斯拉夫，而不是斯大林。我们向他提出，在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尊重双方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使关系正常化。霍查拒绝了，老的、斯大林的时代更合他的口味，因此他继续在莫斯科玩弄阴谋，反对南斯拉夫。我还驳斥了对我们的公使阿尔索·米拉托维奇的指控，我本人跟他很熟。在我看来，霍查对他的指控没有任何根据。我请赫鲁晓夫要苏联驻地拉那大使馆汇报南斯拉夫驻地拉那的外交官生活得怎么样？遭到哪些凌辱和恶劣的对待？

我觉得，我这一番话给他留下了印象。赫鲁晓夫后退了，说他从来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除了对恩维尔·霍查“稍有”了解外，不了解那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说他只是“作为同志对同志”向我谈了这一切，说苏联希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改善关系。由于向我通报了苏斯洛夫布达佩斯之行的结果，苏联对拉科西的支持以及要在匈牙利使用“一切手段”，这一切都带有威胁南斯拉夫的味道，我已经感到忧郁不乐。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莫斯科。

在法国人的招待会上，我没有想走到赫鲁晓夫那里去。他是主宾，受到法国大使的最大的关注。赫鲁晓夫派了自己的一名译员通知我，他想同我谈话，“如果我还呆在招待会上的话”。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到来宾中来，同大多数外国大使一一打招呼。他走到我跟前时，象通常一样，“面对面地”进行了谈话。

赫鲁晓夫对我说，他想把米高扬在布达佩斯的会谈迄今为止的结果告诉我。他说，那里的情况一切都比这里希望的要好，说“匈牙利同志们”已决定让拉科西辞职。拉科西也出席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会议，他“完全同意这一办法”。赫鲁晓夫指望，这样一来就朝着从政治上解决匈牙利国内危机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要我把这一点报告铁托，并要我相信，正是为了告诉我这一情况，他才来参加法国人的招待会。

布尔加宁费劲地穿过法国大使馆里密密麻麻的人群，走到我们身边。我们继续交谈米高扬的匈牙利之行，他们说米高扬现在在南匈边界附近“休假”。赫鲁晓夫说，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很喜欢旅行，在匈牙利“休假”后，可能去南斯拉夫。事情很清楚，这里希望米高扬“解决”了匈牙利危机后去南斯拉夫。结果在世人面前就显得俄国人就解决这场危机同南斯拉夫人秘密地商量过，尽管我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如果不算赫鲁晓夫对我说的这一情况的话。仅在三天以前，他还对我说，他们已决心“使用一切手段”，充分地支持拉科西。

在同一个问题上存在这样的矛盾和采取相反的立场，说明不仅匈牙利而且苏联最高层的事态不是最妙。俄国人对波兰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先是在波兹南事件发生之前很早就威胁波兰人，接着在波兹南事件之后采取了极其好战的态度，而在此后不久，又不顾以前说的一切，给了波兰人以新的、重要的经济援助！

赫鲁晓夫也好，布尔加宁也好，都对米高扬访问南斯拉夫，而且恰恰是从匈牙利去访问，表现出很感兴趣。他们显然需要在世界公众中造成一种看法：南斯拉夫参与了苏联对匈牙利危机的解决。为了更加明确地显示这一点，这里希望米高扬同铁托会晤，因此赫鲁晓夫问我，尼赫鲁和纳赛尔什么时候离开南斯拉夫。我吃不准，我提到七月二十日。赫鲁晓夫有准备地连这个日期也接受

了，他说，米高扬那时还在匈牙利。

我建议贝尔格莱德同意米高扬进行短时间访问，尽管这次访问是强加于我们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莫斯科。

对于苏联的要求和我关于米高扬访问的电报，贝尔格莱德的回答迟误了。俄国人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因此苏联外交部给我送来了米高扬座机机务人员的护照。我自己作主签发了签证，尽管我清楚，贝尔格莱德不喜欢米高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往。

在加紧让米高扬访问南斯拉夫，也就是说，他经由贝尔格莱德返回苏联的同时，在向南斯拉夫提供炼铝厂贷款一事上，俄国人的态度仍然不好。这个问题，象影子似的伴随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第二年了，随着时间的消逝，苏联的态度不断恶化。俄国人现在提出政治条件。贷款已经降为原先提出的数字的四分之一，他们还要求让东德作为贷方，要求让东德政府跟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成为这项国与国之间的协定的签署者。阿夫多·胡莫同志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了这件事，他是我们政府成员，他在这里同俄国人谈判已经是第二个月了。贝尔格莱德同意在同苏联签定的这项双边协定中加进一段，根据这一段，东德也参与执行苏南贷款协定。俄国人认为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让步还不够。

东德人对于我们就东德不应签署这项国与国之间贷款协定提出的理由，没有大的意见，因为存在一定的国际准则，他们和我们都得遵守。我们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不能在政府一级签署这一项以及其他的国与国之间的协定。俄国人的态度比东德的代表要坏。我们援引国际法和国家之间的惯例，俄国人则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反对之。

两天以前，这里发表了苏联政府和东德政府会谈公报，东德代

代表团是由奥·格罗提渥率领的。俄国人向东德提供了新的、巨额贷款。同时，他们又第三次压低答应要向南斯拉夫提供的贷款。整个这场把戏是一清二楚的：俄国人把答应向我们提供的贷款给了东德人，又根据俄国人给了他们而不是我们的苏联的钱，要求我们同意东德作为协定的合签国和贷方。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的面演出的。东德甚至还没有尝试清偿战时以及战后这十年对南斯拉夫负有的任何一项债务，而现在俄国人却把对东德的债方的地位强加于南斯拉夫！

在东德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乌布利希在同我谈话时试图本着苏联这样的政策的精神施加公开的压力。他指责我们不承认东德。他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我对乌布利希说，他们直到昨天才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因此而遭了难。他们也不会因为我们不承认而遭难的。时机成熟了，我们会承认他们，让各自象迄今为止的那样保留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次谈话进行得不太好。

还在招待会上我就听说，乌布利希和俄国人对这次谈话感到不满意。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苏联第一副外长瓦·瓦·库兹涅佐夫最近到我这里吃午饭。库兹涅佐夫向我谈到波斯国王前不久访问的某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俄国人给他安排了某些意料不到的事，目的是使苏联的科技进步，也即军事实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令人遗憾的是，军事实力在苏联也仍然是科技发展的第一个受益者和主要标志。

这里在访问结束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演出中让波斯国王看了苏联氢弹试验性爆炸的影片。事先只对国王说，他将看一部苏联在“科学领域”内的成就的纪录片。接着俄国人要求高

度保密，请波斯国王跟他一起来看的人不超过两、三人，说苏联方面只有一、两个人到场，说一切都是格外机密的，因为国王是邻国的君主他们才给他看。据库兹涅佐夫说，电影一结束，国王“简直惊呆了”，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紧张心情，并激动地一再说我们大家都必须为和平而斗争，新的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将是一场普遍的灾难，等等。据库兹涅佐夫说，在我看来，这部影片对波斯国王的影响比在莫斯科的一个星期的谈判还要强烈。

我没有对库兹涅佐夫说，他们上个月也给我们，铁托和南斯拉夫人看了同一部影片。俄国人对铁托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们对我本人说，涉及一件秘密的、绝密的事，要求我只让两三名南斯拉夫人同铁托一起出席，而我可以作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出席，我的理解是，我不能“作为外交官”出席。我们真的把这当成是对南斯拉夫表示信任的某种特别迹象。从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中，我看到俄国人，进行类似的导演，也让自己的其他贵宾看这部相同的影片。

我认为，苏联的这种外交手法可以取得成效。夜里，作为绝密之举，在克里姆林宫里给外国贵宾上映苏联爆炸氢弹的影片，而第二天又与同一些贵宾会谈相互合作和维护和平。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即苏联政府对于铁托—尼赫鲁—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三边会晤表示一无兴趣，尽管这是历史上第一起这一类事件。我不是说在这件事上铁托的功劳大于尼赫鲁或纳赛尔的功劳，我们也不需要苏联方面对这一事件表示某种特别的赞扬。不过，很难不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尼赫鲁和纳赛尔这两个亚非主要政治家现在去我们那里，就国际关系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同铁托进行商谈，并就此发表了联合公报。俄国人无视这一点。这里对

这一事件只由通讯社发表了几句话。苏联没有发表评论。显然俄国人丝毫不喜欢这一切。他们只问我尼赫鲁和纳赛尔什么时候离开南斯拉夫，以便铁托能够接见米高扬。对于俄国人，远为重要的是在欧洲和世界上造成南斯拉夫秘密参加解决匈牙利危机这样一个印象，而不是向本国公众报道铁托—尼赫鲁—纳赛尔会晤的巨大意义，报道南斯拉夫为共处和平政策的确立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一个阵营国家还要多。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由于我再次提出要求，我从贝尔格莱德得到了有关米高扬“访问”的电报报告。同米高扬的会谈以及他所谈解决匈牙利政治危机的情况，使我们极度失望。米高扬只向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人谈了从苏联和匈牙利报纸上已经知道的东西。

在收到贝尔格莱德报告的第二天，我得到我国政府的电报指示，说我们应同苏联政府以及东德政府签署关于贷款的协定。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决定，对于我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我建议我们不接受这一类协定，因为这是苏联方面在政治条件下提供贷款。我完全真诚地说，对于我来说，我们是否同意把东德当成这笔交易中的参加者，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要是我们有可能同东德签订某项类似的经济协定，我会赞成签订这样的协定，但是得由我们和东德人按照相应的方式来搞，因为在我们两国之间还不存在外交关系。使我感到讨厌的是，我们屈服于俄国人就东德施加的公开的政治压力。我开始担心，这只会使苏联的“胃口”更好，会对南斯拉夫施加新的压力。他们要是今天在东德问题上得手了，明天就会在其他问题上压得更厉害。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我们获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就铁托访苏发了一封致党员的秘密信。我们听说，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受到明确的批评，因为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初作为东道主祝酒时称铁托为“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我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也把这封信送给了阵营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是送了，那么主席团这一步就更糟糕了。

我们获悉，兴高采烈地欢迎铁托，真诚地庆贺南苏新的接近的苏联公民、共产党员和其他人，得知苏共中央主席团这封秘密信后感到失望。还听到这样的评论：我们现在不同南斯拉夫人和解，那么永远休想和解。

我对大使馆里的同事们说，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这封秘密信暂时谁也不要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任何情况。我们商定，设法搞到这封信，然后再报告贝尔格莱德。要是我们关于这封就铁托访问发出的秘密信的情报是确凿的，那么苏联最高层对南斯拉夫的情绪就比我们中间的某些乐观派所设想的还要糟。

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危机

邀请赫鲁晓夫“私下”访问南斯拉夫。纳赛尔没有把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意图告知铁托。国际危机的重点转移到近东。苏联报纸火上加油。赫鲁晓夫同英、法驻莫斯科大使谈话。贝尔格莱德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

一九五六年八月八日，莫斯科。

铁托从苏联回到南斯拉夫之后，为在各个领域内扩大我们同俄国人的合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气氛。我国政府对能够为同苏联建立接触和发展合作作出贡献的任何人都加以鼓励，因此南斯拉夫形形色色的代表团名副其实地蜂拥而至，来到这里。往往同一天，乘同一列火车有两、三个南斯拉夫代表团抵达这里。急于尽早来到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名副其实地多如牛毛，这一点不仅可以由代表团数目之多，而且从铺的面之广来判断。因此这里眼下有一个研究苏联蔬菜栽培工作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尽管园艺在苏联农业中根本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连俄国人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些蔬菜专家竟来研究“苏联的经验”，因为到目前为止或许还没有任何类似的外国代表团来过这里。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由留普乔·阿尔索夫率领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我国农业代表团，尽管就农业而言，俄国人从我们那里也好，我们从他们这里也好，都不可能取什么经。苏联这一领域内的社

会经济关系同南斯拉夫完全相反。南斯拉夫的政策在四年前解散了我们的农民劳动合作社，把土地归还农民，这很可能使俄国人不寒而栗，苏联在使土地强行集体化的制度基础上的农业的效率不高和生产率低下，也使南斯拉夫人不寒而栗。但是交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道路的这一类经验，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里还来了由我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弗·莱斯科舍克同志率领的我国人民技术协会代表团。这也是某种无的放矢。莱斯科舍克作为南共联盟领导人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接触，因为这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没有人负责类似的工作。

在莫斯科还有两名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拉·科利谢夫斯基和布·约万诺维奇。他们来这里进行某种官方的，比较确切地说是强迫的一年一度的休假。他们按常规估计要同苏联党最高领导人会晤和会谈。这没有实现。我们党的两名最高领导人在苏联一批党务和警方人员的包围下虚度时日，没有进行任何的接触。俄国人向他们提供了一大笔钱，从而使得他们同我们党这两位高级人士不好的关系更趋恶化。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惯常的做法，为的是“苏联的客人可以在苏联购买纪念品”，包括购买有重大商业价值的东西。尽管我们的同志对于苏联这种做法表示奇怪和不快，并且拒绝接受所给的钱，俄国人还是把装有好几叠卢布的纸袋留在他们的房间里。这样放了几天。俄国人最后把钱拿回去了，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南斯拉夫这两位领导人在苏联的逗留成了一件苦恼的事。

俄国人十多年来一直邀请阵营国家高级领导人作官方的一年一度的休假，并把自己的人派到这些国家去。我不知道，这件事在他们之间进行得如何，很可能俄国人在阵营国家里要比阵营国家里的人在苏联感觉得好些。我知道，拉·科利谢夫斯基同志和布·约万诺维奇同志在这里过得很糟。他们对我说，要是原先知道这

里如何接待他们，就决不会前来。关于这种人为的和强迫的休假以及关于互派许多代表团，我们是在六月份铁托在这里时同俄国人商定的。这是俄国人竭力主张的，很可能他们认为，通过互派代表团来加强自己在南斯拉夫的地位并对来这里的我们的人施加影响。看来俄国人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未经准备就前来苏联访问的结果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不应指望，每一个南斯拉夫夫人都会因为来到了苏联就感到欢欣鼓舞，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会使他感到幸福和表示钦佩。

这里还来了由帕约·格雷戈里奇同志率领的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接着这里还来了我们的少先队员代表团，大约有五十来名南斯拉夫儿童也到苏联来休假。俄国人把他们分成几组，用飞机把他们载到列宁格勒和中亚。俄国人也好，我们大使馆也好，都受不了南斯拉夫的大批代表团的这种“袭击”。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代表团一整天耽搁在大使馆里。他们抱怨俄国人，尽管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求大使馆给他们派陪行人员、译员、打字员。我们只有一个人管这些事情，而在莫斯科的我们的代表团一时竟有十六个之多。代表团生我们的气，因为帮他们的忙不够，我们则生他们的气，因为把我们大使馆变成了一个乱糟糟的旅行社。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日，莫斯科。

为了使我们的气氛符合六月份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精神，国内决定，由铁托邀请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进行一次私下访问。

当我接到贝尔格莱德的指示，让我邀请赫鲁晓夫作为铁托个人的客人进行一次私下访问时，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他正在内地进行一次宣传运动，这一回是关于“面包”，关于苏联的收割工

作。从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以及从赫鲁晓夫的旅途来看，收割在苏联是一年中的一件大事。这有点象某种非常状态，某种总动员。运动搞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始终占报纸的头几版。报纸从六月份起，就宣布收割是国家和党的头号任务。动员了几十万技术工人，铁路改变了火车的运行，大批机械远距离运往俄国各地，全部新闻机构好几个星期一直在发表党和苏联政府给参加收割的数千万人的命令。把这一番苦工夫加在一起，我认为就不要感到奇怪苏联一公斤粮食要比其他任何国家份量来得重，价钱来得贵了。

我盼着赫鲁晓夫回来，鉴于他没有回来，我就去找布尔加宁，把铁托的邀请通知他。我觉得，布尔加宁大吃一惊。他说，今天就通知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委员们的休假时间，赫鲁晓夫将在九月初开始一年一度的休假。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莫斯科。

每当南苏关系恶化，我们在苏联的侨民问题，照例就浮到面上来了。铁托访问之后也是如此。

铁托在苏联呆了将近三个星期。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接见苏联的、外国的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和个人，他也是这么做了。直到六月二十日，铁托准备离开莫斯科了，俄国人才向我们提出，要求铁托接见我们的侨民代表团。我们告诉他们，应该早一点通知我们。从种种情况来判断，俄国人估计到我们会作这样的答复，因为他们使我们处于不可能作别的回答的境地。俄国人竟然还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们要求铁托在回国途中在基辅接见我们的侨民代表团。铁托说，这办不到，不会有时间，俄国人说，他们将向我们的侨民提供飞机，他们将在铁托之前抵达基辅！

就这样接见了我们的逃兵—侨民代表团。这次接见和谈话时我在场。铁托很成功地解释了五月份同苏联政府签署的条约。这

个条约所涉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我们在苏联的侨民，跟南斯拉夫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全体公民一样，享有南斯拉夫的法律保护。谁想回南斯拉夫，现在是有保障的。谁不想回去，那是他自己的事。

本来可以指望苏联政府违反一切正常行为准则强加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侨民代表团，会理解南斯拉夫政府出于善意所作的努力，希望这会帮助他们最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事情恰恰相反。我们的这批侨民试图利用同铁托的谈话，来达到在苏联发起一场反对执行条约的运动的的目的。他们为了这个才需要铁托的这次接见，以便在苏联当局的赞许下和帮助下展开活动，反对我们的侨民中有任何人返回南斯拉夫。

现在这场运动的口号如下：要求普遍赦免我们的这些逃兵，接着要求南斯拉夫政府事先作出保证，把在这里当上了苏军军官的所有人都接受进南斯拉夫军队，保持在这里的同样的军衔和职务。还要求在以下方面作出类似的保证：在南斯拉夫保证住房，我们的侨民—苏联公民的夫人的就业。还提出，在南斯拉夫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全都保留苏联国籍。一句话，我们的逃兵的领导人，肯定是在俄国人的同意下，现在要求对他们一九四八年及以后出卖民族的行为给予褒奖。

我拜会了苏联第一副外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再次提出有关苏联对我们的侨民的行动以及有关苏联方面违反双重国籍条约的一系列严重的指责和事实。我没有就基辅的会晤使用有关俄人居心不良和南斯拉夫心怀善意的全部论据。瓦·瓦·库兹涅佐夫表示有兴趣解决这一问题。他对我说，这不属于外交部的职权，他们也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外交部有义务保证执行苏联政府所签署的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协定。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莫斯科。

近十来天，国际关系中发生了十分重大的事情，不仅把南苏关系，而且把其他许多问题都暂时置于次要地位。这里我指的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关于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决定。

情况使得这个问题也成了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第一号问题。纳赛尔从南斯拉夫回去后就迈出了这出乎意料的一步，在南斯拉夫时，在一星期内，他曾面对面同铁托举行过多次会谈。与此同时，尼赫鲁也在南斯拉夫，因此在全世界看来，纳赛尔把这重大的一步通知了铁托和尼赫鲁几乎是正常的，他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突然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依靠的是在南斯拉夫举行的这次三边会晤。从我同英、法驻莫斯科的代表的几次会见中，我的印象是，这些人士不仅怀疑我们事先就了解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且他们认为是我们怂恿纳赛尔采取这一步骤的。

我要贝尔格莱德提供情报，我得到回答说，纳赛尔一个字都没有向铁托谈到他有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想法。我国政府七月二十六日从电台和报纸上了解到这件事时感到意外。贝尔格莱德猜想，纳赛尔对尼赫鲁也一个字没有说。我认为，纳赛尔在从南斯拉夫的三边会晤回国之前很久就作出了这一决定。美国拒绝为阿斯旺大坝提供贷款一事，无疑加速了纳赛尔的国有化决定。我们倡议举行三边会晤，对于纳赛尔来说，这来得正是时候。这与其说是由于这次三边会晤所具有的意义，还不如说是由于纳赛尔需要在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指靠这次会晤。我们南斯拉夫人认为，如果朋友同朋友交谈了一个星期，却把自己的主要想法和意图不告诉朋友，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根据我同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谈话，我可以判断，俄国人认为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其根

源在于认为西方老是在诉说苏联和阵营内的政治困难和危机。现在，西方的脚下也起火了。西方现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不会来扰乱苏联和阵营，而去拯救自己在近东的利益以及还是从以前的殖民时代一直保留下来的特权。已经有十来年时间，俄国人一直不承认西方有权讨论和解决东德、匈牙利、波兰或者阵营内别处的危机。俄国人不会去征求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才参加解决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这里认为，这种权利属于苏联。

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起了严重混乱，威胁到很大一批西方国家所谓的自己的“生命攸关的”利益，尽管纳赛尔是按照埃及的生命攸关的利益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的。过去，直到昨天，一个独立的小国采取这样的步骤，来废除大的强国在它本国领土上的特权，几乎自动地导致战争。纳赛尔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采取了这一步骤。现在需要的是找到能够支持所显示的勇气的力量。

苏联是坚决支持埃及的唯一的一个大强国。南斯拉夫毫无保留地站在纳赛尔一边。俄国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想就苏伊士运河危机同我们接触和合作。我曾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同苏联第一副外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和部长助理弗·谢苗诺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两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纳赛尔是否曾把自己的意图告诉铁托？俄国人谈到自己感到意外，表示苏联政府是通过电台和报纸才了解到这一切的。

苏联报纸近十天来，不仅无保留地支持纳赛尔，而且怂恿他进一步加剧自己同英国和法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使苏联报纸的这样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几天前他第一次谈到苏伊士危机。赫鲁晓夫主张一切国家在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主张尊重埃及的主权，但是也主张尊重直接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莫斯科。

几天前，我曾出席法国大使莫·德让的一次晚宴。他请我去是为了谈谈苏伊士危机。当然，这位法国人对纳赛尔和他作出的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愤愤不平，说这是破坏世界的安全和平赖以建立的国际条约体系。德让的情绪很悲观，看不到出路，不排除出现各种不测的可能性。一切后果只能由埃及负责。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法国人在谈到最严重的后果时，往往提到英国，而不是法国，强调英国决不会同意由于“一个纳赛尔”的决定而丧失一大强国的地位。他怀疑纳赛尔没有某个大强国的支持会敢于做出这一切来。俄国人怂恿纳赛尔，使苏法改善关系道路上前不久取得的一切丧失殆尽。

巴黎曾经相信苏联希望世界上平安无事，现在看清楚了，他们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评价错了。俄国人的作为似乎是希望近东爆发战争。德让还提出了“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前夕”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三边会晤问题。

我向法国大使说了我能对他说的一切有利于纳赛尔，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话，同时又尊重我正在他家里做客的那个人的殷勤招待。我本指望他会向我说点什么，作为我转告贝尔格莱德并通知纳赛尔的口信，以利于和平地摆脱危机。显然他请我去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让我知晓，法国和英国不会屈从于“一个纳赛尔”的讹诈。根据这次谈话来判断，在我看来，随着时间的消逝，苏伊士危机离开和平解决越来越远了。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莫斯科。

苏联和我国的武装力量的代表建立了联系。俄国人做得很策略。他们利用苏军各种纪念日和庆祝活动，邀请南斯拉夫人。他

们也邀请作为战时盟国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这样，上个月他们邀请我们的空军代表参加苏联空军节。前来这里的有我们的将领维克托·布巴尼和维茨科·安蒂奇。俄国人对他们招待得很好。现在苏联政府又邀请我们的海军派代表团参加类似的庆祝活动。我们的海军司令马特·耶尔科维奇海军上将偕同一批海军高级军官来了。我相信，俄国人对我们的这个军事代表团也会招待得很好的。

令人遗憾的是，俄国人没有邀请英国人和美国人参加苏联海军节庆祝活动。英国人和美国人曾接受邀请并向莫斯科派了十分强大的代表团，参加苏联空军节庆祝活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接着，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爆发了危机，俄国人没有邀请西方强国海军的代表。要是有谁应当出席的话，我想不是别人，正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人作了极大的努力，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承受了极大的牺牲，保持了从大西洋到摩尔曼斯克的“北方通道”，把作为战时对俄国的援助的宝贵物资从美国运来。但是现在重要的是现在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而不是过去的事。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莫斯科。

我拜会了苏联的一名副外长弗·谢苗诺夫，因为他的上司德·特·谢皮洛夫“没有时间”接见我。俄国人现在第一次把南斯拉夫当作海运国家，主张我们参加伦敦会议。除南斯拉夫外，苏联政府还提了二十个国家，并且不接受英国人所设想的与会国名单，因为这样的会议只可能作出反对开罗，而有利于伦敦和巴黎的决定。俄国人当然要竭力减少英国在伦敦会议上的多数，如果他们在那里不得不处于少数的话。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值得记载的是，谢苗诺夫没有提到美国。然而，苏联报纸对于美国 and 美国的西方盟国不加区分。谢

苗诺夫作了这样的区分，他不谈美国。我的印象是，苏联最高层在苏伊士问题上是完全区分美国的立场和英法两国的观点的。俄国人很可能根据华盛顿同巴黎和伦敦的分歧而认为，可以进一步反对英国和法国。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莫斯科。

最近，苏共中央的鲍·波诺马廖夫叫我去。原来是移交在这里的我们的档案。我本希望波诺马廖夫会把我们党的档案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移交给我。然而，他只把前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纯行政档案移交给我。大约有五千个项目，分装在大约一千五百包里。我在莫斯科把这批档案打开并查看一番，那是没有意思的。苏联机关过去十年里就这么干了，他们挑选了他们感兴趣的资料，而这些材料就不在这五千个项目中了。这些档案是希特勒匪徒战时从南斯拉夫拿走的，接着俄国人又俘获了这批档案，把它从德国搬到莫斯科。在我看来，俄国人开始从次要方面执行铁托—赫鲁晓夫关于档案的协议。

为了免得在俄国人归还了我们些什么档案，又仍然扣留着哪些档案这个问题上产生误会，我对波诺马廖夫说，根据共同在莫斯科确定的材料，应当还有以下南斯拉夫政治档案：自南共一九一九年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南共中央档案，南斯拉夫共青团同一时期的档案以及南斯拉夫工会和南共领导的其他组织在这一时期的档案。这里还应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档案。这批档案战后就整理好了，打好包裹准备运走，但是被扣压在莫斯科。这里还应该有关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南斯拉夫全体志愿人员的档案。在来自不同国家的我们的志愿人员中，半数以上的人在西班牙牺牲了，有关的材料也在战后不久就准备运往南斯拉夫的那批档案中。关于南共及其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后

的工作的部分档案也在苏联。我们对这批档案以及其他一切档案都有兴趣。

波诺马廖夫在古比雪夫大街的中央委员会大楼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赫鲁晓夫的旁边。在同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一幅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从他的工作室的墙上望着我们。看上去，波诺马廖夫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不是太好，也没有给人留下他想解决这个问题印象。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日，莫斯科。

今天我接到贝尔格莱德的指示，要我以铁托的名义邀请伏罗希洛夫，作为国家元首，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至于访问的日期，我们建议就在下个月或者十月份。虽说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形形色色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南斯拉夫方面这样匆忙，这样着急，却使我感到奇怪。我认为，铁托对于邀请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进行私下访问尚未得到回答，就不应该邀请伏罗希洛夫率苏联官方代表团前往访问。我们的人现在同时却还在考虑伏罗希洛夫的访问！我报告了贝尔格莱德，为什么我认为我国政府的决定是错误的。我的理由基本上可归纳如下：

第一，我们的邀请为时过早，铁托对俄国的正式访问总共才过去两三个月。这既不符合我们的做法，也不符合苏联的做法，也不符合多数国家在类似事务上的做法。尤其是因为在铁托访问苏联和他邀请伏罗希洛夫之间只隔了两个月的一年一度休假时间。对俄国人来说也好，对我们来说也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也好，都不会明白有什么可以会谈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公开宣布的。俄国人和我们都需要逐步实现我们六月份签署的铁托—赫鲁晓夫协定，而不是去订立新的协定，也就是说不是到九月份再去同伏罗希洛夫重复旧的宣言。

第二，我国政府的指示作为我们的一条理由谈到赫鲁晓夫九月份将在南斯拉夫，他可以在我们那里加入伏罗希洛夫的正式代表团！我认为，这对于俄国人和对于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还不知道赫鲁晓夫到那时是否会去我们那里。如果他去，那么我们就需要同时又让伏罗希洛夫呆在南斯拉夫。如果说谁可以“加入”谁的话，那么只能由率领正式代表团的伏罗希洛夫“加入”赫鲁晓夫，而不是相反。赫鲁晓夫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的头头，而伏罗希洛夫只不过是苏维埃国家的名义元首而已。

第三，我要求我国政府也让时间这个因素发挥作用，我们至少要实现总共两个月前达成的铁托—赫鲁晓夫协定中的哪怕一项，在此以前我们不要建议由苏维埃国家元首进行正式访问。我们方面如此匆忙草率，使我不明白。我主张明年春天或夏天邀请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今天在罗马尼亚人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我，他九月一日赴克里米亚休假。他在那里同一家人呆一段时间，然后去南斯拉夫，九月中“同铁托见面”。赫鲁晓夫还向我谈到，六月份时他们曾打算让铁托看一看苏联的一部分现代化装备。当时没有时间。他将邀请铁托一起从贝尔格莱德赴克里米亚，可以在那里打猎并且休息。显然铁托去克里米亚是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的条件。赫鲁晓夫说，我们可以公布铁托的访问，也可以不公布，随我们的便。他打算建议铁托在克里米亚大约逗留一周时间。我们的其他领导人也可以随铁托和他的夫人前往。他还邀请我的夫人和我，说到克里米亚去逗留一周对我们也不会有害处的。他不想通知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因此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他将只身前往南斯拉夫，随身将不带任何官方随从。

我认为这是好消息。我表示确信，他本人将在南斯拉夫访问期间就这一切同铁托商谈定当。

在这次简朴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又惹得人人注目。赫鲁晓夫同英国大使W·海德和法国大使莫·德让打招呼后，就攻击他们，用了十分尖刻的话谈论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政策。他说得很响，我们自发地围着“战场”，形成了一个圈子，不声不响地听着赫鲁晓夫同两名西方大使的这一番不平常的谈话。

这两名大使合在一起也对付不了咄咄逼人的赫鲁晓夫。还对赫鲁晓夫有利的是这两位西方大使的俄语讲得不好。英国人试图讲俄语，或许是出于对赫鲁晓夫的尊重。而赫鲁晓夫从头几个词听明白海德想说什么，就马上打断他并更加尖锐地谴责英国的政策。法国人则通过翻译讲话。这也帮不了忙。赫鲁晓夫听明白了法国人的主要想法就立即打断翻译的话。这样持续了十五分钟，使阿拉伯国家的大使极其满意，并得到阵营国家的大使的赞许，其他人则保持沉默。

赫鲁晓夫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口号：

西方三大强国（尽管美国的态度不同于英国和法国，赫鲁晓夫对此连提都没有提）扬言要对埃及发起一场新的殖民战争。国际法和全体进步人类站在埃及一边。

西方应当明白，进行类似的殖民战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埃及人和亚非的千百万人替殖民主义者，首先是替英国人和法国人干活，已经干了几世纪了。历史已经结束了这种情况，而伦敦和巴黎的行为仍跟过去一样。

赫鲁晓夫列数亚非的新兴国家，把它们的人口加在一起，得出已经有十亿人摆脱了西方的统治。接着他批评了伦敦海运会议，批评了法国社会党人，他称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者。

西方三强（又是三个，而不是两个）应当知道，埃及在武装斗争

中不会是孤单的，如果西方把武装斗争强加于人的话。如果他的儿子决定当志愿军，手执武器捍卫埃及的正义事业，赫鲁晓夫将为他祝福。

这就是赫鲁晓夫在来自世界各地、五光十色的一百来名见证人面前的这番讲话的要点。英国大使对于这样一番谈话感到愤愤不平，很快就离开了罗马尼亚大使馆。法国人还呆了一会。

这番谈话是在伦敦海运会议的同一天进行的。赫鲁晓夫使苏联的态度变得尖锐了，作为苏联对西方就苏伊士运河发出的新威胁的答复。赫鲁晓夫说，他将祝福自己的儿子，当志愿军去埃及作战，我们认为，这番话表明，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苏联准备通过派遣“志愿军”，而不是通过宣战从军事上介入埃及。这一新的军事干预方法已经在朝鲜试过了，中国人在“志愿军”的旗号下，派遣了一百多万军人，由中国的元帅和将领统率。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应贝尔格莱德的要求，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我提了一些意见，目的在于增加和平解决苏伊士危机的希望。我建议贝尔格莱德考虑以下倡议：

建议埃及人不加区别地为一切国家在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最大限度地提供保障。

我们建议向纳赛尔派遣南斯拉夫领水员。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领水员，就告诉纳赛尔到哪里去找并帮助他找到领水员。这实际上是最紧迫的措施。西方撤回了自己的领水员，一百人中大约撤回了八十人。纳赛尔越早宣布埃及有足够的领水员越好。

如果纳赛尔在接受国际监督上走得尽可能远，只会加强他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进行专门的谈判。埃及应当接受和平解决的倡议，不论倡议来自何方。这样可以争取到时间，减少英、

法、以色列入侵埃及的危险性。

我不知道纳赛尔现在在保住英、法的面子方面还能有多大作为。或许现在对纳赛尔来说，要在这方面作出彻底的改变已经晚了，因为那样可能显得阿拉伯人害怕英、法、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因为纳赛尔方面任何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只会有利于伦敦和巴黎的侵略集团。

依我之见，只要埃及人不保障苏伊士通航自由，埃及重申准备谈判也不会取得必要的效果。歧视以色列只会有损于埃及。如果埃及在关税和其他方面继续坚持自行其是，情况也将是类似的。开罗不应当在现阶段追求取得全面胜利，也即使西方全面失败。

我就联合国的参与同俄国人的谈话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俄国人与其说关心通过和平途径尽早解决苏伊士危机，不如说有兴趣于尽量利用苏伊士事件来使西方信誉扫地。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莫斯科。

昨晚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问我，对于他一周以前建议铁托和他彼此进行私下访问一事我是否收到了贝尔格莱德的答复。令人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不想这么说，我说，铁托将在九月中有空，那时苏加诺将离开南斯拉夫，关于这一切赫鲁晓夫可同铁托商定，这段时间是为他保留的，我对他前往南斯拉夫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对于我还没有收到贝尔格莱德的答复感到不满意。他对我说，他一、两天内就离开莫斯科，让我通过苏共中央把我们的答复告诉他。

我责怪贝尔格莱德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表态。我建议不要用我们的礼仪同苏联的礼仪相对照，因为那样将使政治和礼仪都受损害。我不知道，因此我也不能记下，是谁要对造成这一过错负责。是我们先提议的，因此我们的义务也更大，因为我们邀请的是

苏联最高代表。

我们礼宾司的官员不敢催促在几天内就一个重要问题作出答复。在我们从莫斯科提出意见后，我们在几小时内就得到了答复。贝尔格莱德的这位官员受到批评，为什么这样对待工作，而他只是想“不要去打扰”最高级。铁托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全部建议。要我们同俄国人商定一切细节。我今天，八月三十日，在北越大使馆见到了米高扬。这是第一个机会，使我能够通知中央主席团的某位成员，铁托指望赫鲁晓夫九月十七日前往。在那里，在我们那里，铁托将（同他）商定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克里米亚休假。米高扬对我说，今晚他就告诉赫鲁晓夫。

在昨天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还提到某些问题。这里我只记录有关阿尔巴尼亚和苏伊士运河的谈话。出于信任，赫鲁晓夫告诉我，他决定十一月份，等恩维尔·霍查参加了中共代表大会回国后，就去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等着听我发表意见，但是鉴于我只是听着，一声不响，他就接着说，较大的国家必须谅解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和弱国，它在欧洲是最贫穷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必须援助阿尔巴尼亚人。

关于苏伊士事件，赫鲁晓夫的消息很灵通。他知道我在苏联外交部的所有谈话。他也知道，纳赛尔一点也没有把自己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的意图告诉铁托。赫鲁晓夫要我相信，纳赛尔事先什么都没有告诉苏联。赫鲁晓夫不赞成纳赛尔这样地对待南斯拉夫和苏联这样的自己的可靠朋友。赫鲁晓夫把我列在首位，因为我们同纳赛尔的关系“更为接近”。他告诉我，纳赛尔已经要求俄国人提供武器援助。这里向纳赛尔送去了他所要求的几乎全部东西。动用了苏联的军用库存。赫鲁晓夫说，没有时间来为纳赛尔新生产武器，现在就需要援助他，而不是过一年才援助。现在不要去批评纳赛尔，尽管有些事情上他是该受责备的。问题在

于：如何来援助他？

赫鲁晓夫提醒我，他明天动身到黑海海滨进行一年一度的休假。随后他就去南斯拉夫，也是去休假，他希望能在那里得到很好的休息，希望他在南斯拉夫逗留期间不要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赫鲁晓夫说，如果他有别的想法，他就留在莫斯科了。

我认为应当相信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因为很难设想，苏联领袖预料围绕苏伊士运河的事态将有最严重的发展，而会去作一年一度的休假。要是看来会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现在就不可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作一年一度的休假了。我承认，赫鲁晓夫使我也至少感染了他的一部分乐观精神。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拭目以待。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 南斯拉夫的秘密信

《真理报》刊登“南斯拉夫审判共产党人”的文章。苏加诺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偕同家眷在南斯拉夫休假。就赫鲁晓夫的访问致贝尔格莱德的信。再谈苏伊士危机。

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莫斯科。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昨天发表文章，报道贝尔格莱德法院判处南斯拉夫两名情报局侨民——以前的共产党员。事情涉及我们侨居东方的逃兵，他们曾为斯大林侵略南斯拉夫的政策效劳。我们的判决是很严的：一人被判服苦役八年，另一人是四年。《真理报》的文章很坏，现在实际上完全通过这一事件来评价我们的整个政策。《真理报》强调，这两名共产党员是前不久返回南斯拉夫的。是自愿回去的。他们以为，我们在东方的“共产党侨民”问题“已最终地和公正地解决了”，鉴于我们的侨民中没有人犯下“反国家的罪行”，因此不会追究他们中的任何人的司法责任。当然，《真理报》只字不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侨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从那里进行针对自己国家的反国家活动。

迄今为止，这些侨民中大约回来了一百人。他们中没有人在我们那里受到审判，尽管他们中人人都对国家犯了罪，有的重些，有的轻些。《真理报》对此缄默不语。要是这里公布说，在我们这

一百名回国的侨民中，没有人受到审判，仍被他们扣留在这里的那几百名侨民就会不再顺从俄国人了。《真理报》的文章暗示了一个虚伪的结论，似乎只有这两个人返回我国，而这两个人又被判处在南斯拉夫服苦役。

我拜会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前不久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对《真理报》的报道提出抗议，而库兹涅佐夫则设法同时既同意我的意见，又同意《真理报》的观点。

审判是在正好一个月之前举行的，《真理报》现在才报道这件事，因此这里有名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真理报》难道不知道赫鲁晓夫过十天时间就要作为铁托本人的客人前往南斯拉夫？东道主在等候客人来到时不应制造不好的气氛，但是客人负有同样的义务。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应当给《真理报》以适当的反击，而且是立即就办，要在赫鲁晓夫抵达南斯拉夫进行“私下”访问之前就办。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莫斯科。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真理报》关于“南斯拉夫判处共产党员”的文章对苏联公众起了作用。在莫斯科最热闹的街道上有贴报栏，张贴每一期新出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他报纸。这里办这件事是很自觉的。这一习惯是从十月革命时传下来的，当时《真理报》上是有东西可看的，而且发行量小。今天，《真理报》印成百万份，只卖三个戈比。谁想看它，谁都买得起，过往行人谁都不在贴报栏前停留。现在却不一样了。一小批市民站在贴报栏前，阅读关于“南斯拉夫判处共产党员”的文章并发表评论。人们很感兴趣。我们派了大使馆的好几个同志，同莫斯科的市民一起“阅读”这篇文章。苏联公民的评论对我国是不利的。我引用其中的若干条：“我们这样来欢迎铁托，他却判处共产党员服苦役。”“判处苏联

在南斯拉夫的朋友，这证明南斯拉夫对苏联缺乏诚意。”“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各地自由走动，有丰厚的国家养老金，而铁托却把苏联的朋友送去服苦役。”“南斯拉夫赦免了乌斯塔沙^①和切特尼克^②，而把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反倒送进监狱。”“佛朗哥将军赦免西班牙的共产党员，而铁托把本国的共产党员送去服苦役。”

在每一批市民中只要有一名“读者”，就会说出种种反对南斯拉夫的议论来。这影响到数以千计的莫斯科市民，使他们对南斯拉夫反感。人们不知道牵涉到的是些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就接受了站在“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一边的这些议论。我们既不能通过《真理报》，也不能通过别的方式把真实情况告诉苏联公民。要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同苏联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就往往成了苏联报纸制造假情报的受害者。

一九五六年九月六日，莫斯科。

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试图弄确凿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南斯拉夫的秘密信的真相。从好几个来源，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份秘密文件的详细材料。我们主要是从政治上倾向于我们的友好人士处获悉这些材料的：住在这里的欧洲共产党人以及极少数的个别俄国人。

我们在苏联没有任何情报机构，也没有这一类合作者。我们

① “乌斯塔沙”或“乌斯塔什”，原系指奥匈帝国崩溃后安特·帕韦利奇所组织的克罗地亚解放运动的成员，二次大战期间成了反动民族主义武装，投靠德意法西斯占领者，与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敌，残害大批游击队员和平民，尤其是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译者

②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二次大战期间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

尊重贝尔格莱德关于禁止南斯拉夫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搞情报活动的决定，在这里不搞这类名堂。还在去年谈判南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把这一点通知了俄国人。赫鲁晓夫对于苏联在我国的活动也宣布了类似的意思，因此从官方来说，在这个特殊领域内，我们应当建立起对等的关系。

我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大莫斯科”内，直径为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在这一地区的边缘的各条通道上，都设置了拦路杆，建有派出所。早就这么做了，在斯大林政府的头几年就这么做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更臻完善，现在也运转良好。未经苏联政府事先同意，我们中谁也不能乘汽车离开莫斯科。事实上我们只在直径大约十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在我们的住房、大使馆和苏联政府机关之间活动。苏联外交官则在南斯拉夫自由地从一地走到另一地。

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莫斯科。

(苏共)中央主席团秘密信的题目是：《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之间的谈判的情况》。信的封面印有下述提请注意的字样：苏共各共和国、州、市和区的委员会在收到本信一个月内在原地予以销毁。信共分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谈我们两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颇为平心静气的方式叙述的，同这里已经公布的说法没有重大区别，尽管这封信的语言和语调比南苏官方公报有更大的保留。

最后的第四章内容最为广泛。这一章是谈“意识形态问题”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这封信也是为此而写的。在宣读这封信的会上是这么说的。信里说，南斯拉夫人就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宣言草案，但是被苏联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南斯拉夫的草案是机会主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所能接受的，但却是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的。信里强调，苏联代表团提请注意，南斯拉夫还有一些领导

人以老眼光看待我们的关系，仍在诋毁苏联和苏共。接着又说，苏联代表团对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进行了干与，铁托对这种干与表示认可，说南斯拉夫将努力同这两个国家改善关系。

最后——而这才是这封信的要害——信里说，还有不少意识形态问题，两党的立场分歧很大，因为南斯拉夫夫人仍然固执己见。关于这一点，这封秘密信大概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考虑到这一切，苏共中央认为，尼·亚·布尔加宁同志一九五六年六月五日在莫斯科的正式午宴上说铁托是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作这样的鉴定为时过早，因为这样的鉴定可能妨碍南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彼此接近，也可能使苏共党员以及兄弟共产党的党员迷失方向。

由此可见，俄国人通过秘密信作了自己的解释，表示自己与六月二十日同我们隆重地签署的文件中的某些观点无关。南斯拉夫仍被说成只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对象，而不是苏联独立平等的伙伴。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归之于我们的错误，归之于我们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而且特别强调西德和美国，而这两国是苏联最凶恶的敌人。苏联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分成“亲苏派”和“反苏派”的老的论点又被接受了，这是俄国干与我国内政的一种特别危险的形式。《莫斯科宣言》根本未被提到，实际上苏联这样的解释已丢弃了《宣言》。苏共党员被提醒，应当把这个文件看成是苏联的一种外交姿态，而不是我们两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某种基础。信里也谈到了阵营问题，而且是从南斯拉夫表示要“改正”的意义上谈的。

我们从好几个方面得到情报说，这封秘密信只是增加了苏共内的混乱。据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如果我们断言，这封信与其说说清楚了什么问题，不如说使苏共党员精神不振，情绪沮丧，尤其是那些懂得从字里行间看文章的党员。宣读这封信之后，苏联的共产党员中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封信体现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真

正的政策，同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六月底在莫斯科同铁托隆重签署的文件恰好相反。

苏联领导还把这封信交给了阵营国家。在各阵营国家里是会有不少人 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的这一批评感到高兴的。实际上，中央主席团的这封信正是为了讨好这些人而写的。俄国人通过这一方式是想表明，对南斯拉夫仍有哪些保留。虽说这封信是要修正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公开的立场，我认为这封秘密信将给俄国人本身带来最大的损失。要是各个国家和人们可以交换类似的“秘密信”的话，世界看上去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莫斯科。

俄国人很可能已知道，我们已获悉这封信，贝尔格莱德也已知情。要是把“秘密”告诉了千百万人，就象他们关于铁托，关于对布尔加宁的批评以及关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这封信那样，那么今天是很 难还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这里对待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做法，跟对待这次的“秘密”的做法是相类似的。既然在这一类秘密性方面，事情看上去是这么回事，这里必然是认为，有紧迫的政治上的需要，要对南苏的协议和铁托本人提出保留。

要是南苏之间的正式谈判没有提供合乎心愿的结果，那么现在就设法通过赫鲁晓夫的“个人外交”来改变之，他将前往南斯拉夫进行私下访问。要是在这一点上成功了，此行更可以为他自己洗刷。要是不成功，反正访问是私下进行的，本来也没有规定要进行任何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很难相信赫鲁晓夫不会有所得。

要是在贝尔格莱德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这种成功还不充分，此后不久还要在克里米亚进行谈判，俄国人可以根据赫鲁晓夫本月“私下”访问南斯拉夫期间所取得的结果来筹划这一谈判。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莫斯科。

为了起草就赫鲁晓夫“私下”访问南斯拉夫给贝尔格莱德的报告，我不得不收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二十大后在国内政策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中所做的一切的材料。肯定我没有全都收集起来，但是我所收集到的材料说明，苏联政府和党近来活动频繁。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三月九日，党和政府通过了缩短劳动时间的决定，星期六和节日前的一天，从八小时减为六小时。这一措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尤其是据认为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还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就。据料，工作日将从八小时减为七小时，事先就把这一点说成是苏维埃制度的特殊成果。

两天以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作出了改变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决定。只规定了一个原则性范围，比斯大林时期广泛得多，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受权在考虑当地条件的情况下解决全部问题。在分配收入，组织集体农庄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扩大了集体农庄的权利。直接的上级国家机关被剥夺了自动撤销集体农庄大会的决定的权利。

同一天，三月十日，发表了政府关于每月必须向集体农村庄员支付预支款项的决定。从两年前起，在苏联一小部分先进集体农庄里已开始实行这一措施。极大部分集体农村庄员，也就是说苏联农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得到钱的。根据劳动日，在集体农庄的生产兑现之前每月给集体农村庄员支付现金，看来当真是一种刺激，尽管在多数集体农庄里，这笔货币收入为数不大，在实践中，经济薄弱和穷困的集体农庄还不实行这种办法。

三天以后，三月十三日，作出了政府关于改进公共饮食企业的工作的决定。为了增加为数不足的食堂、饭馆，建议所有新建筑的底层全都用于这一目的。为了增设企业里的食堂和保持现有的食

堂、饭馆，规定由基本建设基金里调拨资金。

同样在三月份还发表了政府的一项决定，规定产妇的产假从七十七天增加到一百一十二天，如果是难产，则产假再增加十四天——这一点规定得不当，因为“难产”无论如何要求有别于正常情况的另一种等价物，要求产假天数更多。

在我看来，苏联政府没有足够的货币资金，贯彻执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的这几项初步步骤。因此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发行了三百亿卢布的国内公债，归还期为二十年。苏联人民没有料到会发行公债，尤其是四月一日没有象战后往常一年一度的那样宣布降价，这本是斯大林的一项政治宣传决策，而不是政府的一项经济措施。关于发行公债的决定是很能说明苏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现状的，这种关系正在艰难而缓慢地摆脱贫穷和卫国战争中的破坏。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共青团的呼吁书，号召青年前往西伯利亚，移居于穷乡僻壤。在我看来，苏联将发表不只一个这样的呼吁书，因为所涉及的是一个财富尚未开采的辽阔的地区。

六月三日通过了苏联党政的一项决定，把四十年来一直由联盟机关主管的一系列企业交各共和国政府主管。这牵涉到十四个部门。不过，这些部门中的最大的企业仍由联盟各部主管，因此应当把这一措施看成是最初的和不彻底的，尽管这一开端是意义重大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关于增加甜菜和糖的产量的决定。这一决定中的新闻是提高收购价格，从而刺激苏联各地的生产者。

七月十五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养老金的新法律。这是布尔加宁政府为改善苏联一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而采取的最重大

的措施之一。国家在这方面的总开支达到四百亿卢布，比以前的开支翻了两番。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关于草莓和水果生产的一项详尽的决定。跟以前的关于甜菜的决定相类似的是，这项决定的出发点也是通过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生产者。各共和国受权把由此而获得的全部收入用于扩大草莓和水果的生产。在我们看来或许是可笑的，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竟然发布命令谈如何培植草莓，但是就是这么写着的，这里就是这样从最高一级领导草莓的生产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给百分之三十各类工资最低的工人提高工资的决定。据料，每年为此将支出八十亿卢布。毫无疑问，政府的这项措施也会受到人民的欢迎。

苏联政府分别采取复员措施，强调要削减苏联武装力量的人数。很可能首先要削减陆军的人数，其他军种的人数减得少得多。这次削减是由于苏军的核武器和火力增强了，而不是由于政府奉行什么爱好和平的政策，尽管在宣传上，把这次削减说成是这样。

在对所有这些措施进行了估量以后，可以注意到：

——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在二十大后通过这些新的经济措施，无疑加强自己在人民中的政治地位。

——经济中的所有变动的主动权和限度完全掌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手中，它们详细地制定新的条例，从关于养老金的法律一直到增加草莓产量。

——政府在代表大会以后作出的决定目的在于改变以前的极其不利的、严格中央集权的做法，这种做法的有害后果彰明较著，曾在二十大上加以讨论。对苏联的农村特别重视，斯大林使苏联农村的状况搞得惨不忍睹。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以来，这个问题

一直列在中央全会的日程上。

——在领导苏联的经济方面，跟在军队中一样，仍然强调“一长制”原则。虽然看上去改变不大或没有什么改变，业已采取的措施只是一个开始，在我看来，必将继续走下去。政府所采取的大多数措施是针对旧制度的，不只是宣传而已。尽管看上去只是由各共和国的官员的权力来代替联邦的官员，我怀疑能够只到此为止，必然会更接近直接生产者，虽说不会直接地，也不会很快这么做。

——今后也可能指望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改变旧的经济决定，通过新的经济决定，同时这里注意保持在现有的，也即旧的制度的范围内。诚然，这里也越来越感觉到，应当尊重直接生产者的物质利益。这一点对农村来说，已首先予以承认，而且不只是在口头上。因此，苏联农村的状况理应得到改善。一九五六年，集体化以后第一次出现了人们自己请求从城市迁往农村的情况。赫鲁晓夫最近一次会见我时就这样告诉过我。农村人口继续在缓慢地下降，我认为，城乡人口之比接近于一比一，要是知道，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是九比一，有利于城市人口，那么（苏联的）这一比例就不利了。

——至于说到工业，对于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来说，现在所取得的实际成绩远比俄国人在农村取得的成绩为大。我们知道，有许多数字和统计可以证明这一点。工业仍然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基础，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比较谨慎，尽管第六个五年计划野心勃勃，这方面进行迅速的和比较重大的改变的必要性要小一些。

因此，这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以后，仍然坚持认为，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迄今为止的按“一长制”原则组织苏联经济的体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业强国，它已经表明有能力夺取最大的一场战争中的胜利，并同美国一起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莫斯科。

今天，贝尔格莱德电台报道，尼·谢·赫鲁晓夫偕同部分家眷已抵达南斯拉夫访问，他将在我国大约逗留一周时间。党或政府方面的苏联领导人中，没有人跟赫鲁晓夫一起前往。赫鲁晓夫这么做，是承担了风险的，如果这次“私下”访问失败的话。赫鲁晓夫如果成功了，那么对他来说，这就更其可贵了。贝尔格莱德电台用十分友好的调子报道这一消息。尽管是一次私下访问，对它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更为强烈。只能到朋友那里去进行私下访问和休假，正式访问则可以到任何一个伙伴那里去。从一开始起，这里的外国人就对这次访问存有戒心。这使他们感到意外。莫斯科方面整个夏天对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没有预示尼·谢·赫鲁晓夫会对我国进行友好的“私下”访问。现在看来，有些外交代表以前在南苏关系状况方面过早地得出消极的结论，因此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阿拉伯国家的代表突出地发表了积极的评论。看来阿拉伯人对于这次访问的成功比我们还有把握。在这方面埃及人一马当先。阿拉伯人这么做，很可能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及对国有化的结局捉摸不定而引起的危机。他们希望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这次访问会有助于支持阿拉伯人。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的代表的反应是有保留的和持否定态度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六月份铁托在这里时，就对我们存有戒心。他们过分地相信了当时的隆重气氛，过分重视许多次讲话和祝酒辞中的话以及我们同俄国人一起签署的官方文件。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前不久，苏加诺率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访

问了这里。俄国人对他的接待格外好。伏罗希洛夫隆重地在克里姆林宫授他以列宁勋章。这为外国代表所注目，因为俄国人很少把列宁勋章授予阵营以外，共产党以外的外国人。

我在会见苏加诺时，他以自己现在在莫斯科的集会上讲话的风度跟我讲话。他强调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是相近的，他对我说，当他前往南斯拉夫的时候，他有一种是去看自己的兄弟的感觉。我自己也支持这样一种调子。

苏联印度尼西亚的公报内容很丰富，不能怀疑这份公报在国际问题上的进步性。重要的是俄国人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强调自己忠于和平共处政策和“潘查希拉”原则。^① 俄国人对亚洲人和非洲人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事关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受了。

俄国人在伏努科沃机场向苏加诺显示了航空技术。科涅夫元帅为他设了午宴。就象伊朗国王来访时一样，显然是想用军事技术和实力更有力地使苏加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也让苏加诺看了苏联爆炸氢弹的“秘密”影片，这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里如此热烈地欢迎苏加诺，或许不只是因为这符合苏联对亚洲或对西方的政策。在印度尼西亚，通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在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影响十分强大。苏加诺在莫斯科受到欢迎，很可能“中国这个因素”起了重大作用。

^① “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上宣布。

铁托和赫鲁晓夫访问克里米亚

铁托和赫鲁晓夫抵达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同格罗的意想不到的会晤。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团的访问。莫斯科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发展感到不满。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我拜会了葛罗米柯，就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景进行了会谈。

我的印象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可以预料，仍将从迄今为止的立场出发继续围绕苏伊士运河展开相互的斗争。根据葛罗米柯的话来判断，俄国人关心的是和平解决，但同样关心把西方搞臭，从政治上和宣传上捞回几分，西方特别是近来在这方面占了俄国人的上风。

俄国人想一举达到几个重大目的：近东爆发了危机，国际冲突的重点几乎自动地暂时移向那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第二，这也暂时地摆脱了阵营国家危机的重担，这里形成的印象是，现在阵营里事情将好起来。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雅尔塔。

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回来了，看来对于所完成的工作很满意。

他昨天同铁托总统一起乘飞机抵达。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铁托的夫人约婉卡。还有尼娜·彼特罗夫娜和赫鲁晓夫一家的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也在这里，布尔加宁也在附近。应赫鲁晓夫的邀请，到克里米亚来的还有格列奇科元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阿列克谢·基里钦科；他们中有的人偕同夫人前来。跟铁托同志一起来的有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贝罗·普察尔。

鉴于赫鲁晓夫不让事情“冷下去”，在这里直接继续下去，从在南斯拉夫打猎变成在俄国打猎。对俄国人来说，事情现在比六月份铁托正式访问苏联时进行得要好。鉴于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也在这里，鉴于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也要和我们在一起，最后事情变得跟六月份访问时一样，成了官方的了。只不过那时一切都是严格官方的，最后发表了联合公报。在这里不会这么做。这样的接触和会谈最好结束时为公众发表一个公报。要是不发表任何官方的公报，对于我们方面来说，事情结果可能不大妙。但是“关于打猎”能发表什么样的官方公报呢？

我是同米什卡一起从莫斯科来的。在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机场迎接了南斯拉夫的客人。天气相当凉。米什卡很怕冷，她向我诉说，夜里冷。第二天，负责照料我们的那位妇女一见到我们，而我们除了向她问了一句早安外，什么都没有跟她说，就对米什卡说：“昨天夜里您感到冷，我已经叫人再给您拿几条毯子去”。显然“墙里有耳朵”。我们只要在房间里彼此说一说，我们的愿望就会满足。

我试试在黑海里游泳。我一跳下水就后悔了，水太冷了，水温十五度左右。

今天午后，我在克里米亚进行了长时间的散步。天空和雅尔塔后面的嶙峋山峰的颜色使人想起我们达尔马提亚和黑山的海岸。

晚上，我们从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得到关于中国国庆活动的消息。俄国人举办了两个盛大晚会，但是在晚会上也好，在中国驻

莫斯科大使馆后来举行的招待会上也好，没有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参加。

在招待会上去了许多人，实际上是“民间来宾”，俄国人似乎想靠人数来弥补“最高级客人”的不出席。人们注意到，东道主和客人的态度都是冷若冰霜。米高扬祝了酒，是在中国代办致了欢迎词三刻钟之后才祝酒的，中国代办举行了这次招待会，因为刘晓大使在北京。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米高扬的讲话是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同阵营欧洲国家代表的讲话不一致。祝酒词很短，米高扬过分地强调必须维护苏中两国之间的团结。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团结遇到麻烦了。三、四分钟后，俄国领导人就离开了大厅，十来分钟以后苏联其他所有客人也都离开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克里米亚。

昨天我们在雅尔塔的以前沙皇的一座宫殿里进了一次非正式的午餐。在俄国人中，我前面列举过的人都出席了。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带来了苏联现领导中看来是他本人所信任的，曾经一起，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乌克兰工作过的好几个人。铁托和我们的领导人在他们中不认识什么人，多数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

午餐时，苏联方面祝了好几次酒。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俄国人都讲了话，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讲了不少。在我们方面，讲话的是铁托、兰科维奇和普察尔。后者的祝酒，我不能说俄国人会很喜欢。他一开始就谈到“崇高的灵魂已经归天”的“斯大林同志”。我的印象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到斯大林，是俄国人所不喜欢的。赫鲁晓夫问我普察尔是谁，叫什么名字。当我告诉他，普察尔是南斯拉夫最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时，他没有发表看法。

午餐时喝了好多酒。在这方面，俄国人比我们能耐得多。在

他们中间，酒对布尔加宁的影响最强烈。赫鲁晓夫跟别的人一样喝，但是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午餐后，老伏罗希洛夫感觉不好，不能跟其他人一样。

离开饭桌后，客人们就分散到宫殿的各处去了。我跟布尔加宁在一起。布尔加宁说，他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有反对我们接近和真诚合作的人。在我们南斯拉夫，他们大都在下面，在国家和党的机关里，而在他们苏联，令人遗憾的是在最高层有这种人。他没有说他是谁，但是他显然指的是某些中央主席团委员，不难猜出其中的某些人。不管怎么说，布尔加宁使我了解到他们不止一个。这是布尔加宁也好，任何俄国人也好，第一次这样公开地谈到这个问题，直接提到苏联领导中还有反对我们合作和友好的人。

对他自己，他说，一度他曾不得不“说过几句反对南斯拉夫的难听的话”。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的话，并说，我们南斯拉夫人知道，他同赫鲁晓夫一起主动提出了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对于苏联发生的积极变化功劳最大。布尔加宁想紧握我的手，他握了好几下，又说起“难听的话”。我明白过来了，他是指一九四九年他在索非亚的讲话，他是按照斯大林的特别命令被派到那里去的。他说，他是奉命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我设法越过这个不谈了，而布尔加宁说，一九五五年是他主动提出去南斯拉夫的。我说，“如果我们想纠正错误，那就去贝尔格莱德，要么哪里也不去。”

布尔加宁一口咬定我们外交部里有人反对南苏真诚合作和友好，他们在积极活动，他并就此问到我们外交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很困难地说出他们的名字。他问我，对这些人是否很了解？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布尔加宁接着说，他们俄国人手上有文件，可证明这些人不仅反对我们两国友好，而且反对铁托同志，他们谴责铁托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这些人说，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要由外交部负责。要是情况是那样的话，要是我们的对外政

策取决于这些人，那将是不幸的。布尔加宁说，这样一些人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这些人，就象我们外交部的这些官员，不信任铁托。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也不忠于他。布尔加宁说，我可能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有证据，可资证明他作为对同志和朋友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发表前夕，这里曾经用过更为严重的字眼来称呼我们当时的外长助理弗拉迪米尔·维莱比特。为了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满意，维莱比特无辜地从我们的外长助理职位上被调走，去搞旅游业！

我估量了一下，觉得对布尔加宁加以驳斥，是没有意思的事情。鉴于他眼下这种状况，向他说明也无济于事。他喝醉了，向我谈了他清醒时的想法。我要是相应地回答他的话，就会发生以后难于平息的事件。那时布尔加宁就会被迫承认，他不知道向我说了些什么，或者他会说，我说的不是真话。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来讨论问题。因此我对这一切都缄口不语，我也没有把布尔加宁对我说的一切告诉我们的的人。

在谈话中，布尔加宁常常向我提到我从莫斯科发往贝尔格莱德的电报。在这种时候，他就拉着我的手说：这您就不要打电报报告了；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电报所作的报告，等等。俄国人在没有喝醉的时候也习惯于对大使说这种话，这似乎是他们的某种风格，似乎外国大使和他的报告是万恶之源。我一瞬间觉得他们的情报机构有我们的密码，能看懂我的电报。

根据这次谈话，还能够指出的是，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今天仍跟以前一样行事。在新的条件下，它仍然朝着我们之间以前的冲突爆发前的方向展开自己的活动。甚至布尔加宁向我谈的题目也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信里所谈的题目完全相似。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日，克里米亚。

我们继续远足，直到马桑德拉，我们参观了俄国的一座存放陈酒的酒窖，并尝了尝。我第一次参观这样一个酒窖。我知道，他们有的酒存放了一百多年。战时，这一地区曾被希特勒匪徒占领，但是俄国人及时地把这一酒窖撤往中亚。我们尝了好几种陈酒。酒已失去了味道和颜色。在我们的酒中，在某种程度上，达尔马提亚的“普罗舍克酒”有点象马桑德拉酒窖里的几种酒。

赫鲁晓夫这几天方显出本色。我不相信斯大林时代他常去打猎，但是作为猎人，他给人留下率直和十分令人信服的印象。据我知道，我们的人打猎比他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经常得多，我认为，我们的人在打猎上有较多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的狩猎场也比俄国的这个狩猎场收拾得好。赫鲁晓夫和我们曾商定，南斯拉夫派一名或几名狩猎专家到莫斯科来，帮助俄国人组织这一活动，就象在我们那里那样。赫鲁晓夫发表过评论说，南斯拉夫作为这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很可能，我们那里对狩猎要比俄国重视得多。看来，社会主义将使狩猎又带有封建时代那种豪华阔绰的色彩。

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格罗·埃诺突然从我们所在的那幢房子的隔壁一间房间里走了出来，赫鲁晓夫充东道主时，我们常在那里进午餐，而我们在克里米亚逗留期间，多半是这样。跟格罗在一起的，还有两、三个人。看上去，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匈牙利人，而不是俄国人。关于他来克里米亚一事，我们一无所知，至少没有人向我谈起过这件事。这表明了目前在克里米亚这场“狩猎”以及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的另一面。匈牙利的局势从前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今年以来，俄国人曾几次采取主动，想摆脱内部危机，最

后不得不接受拉科西辞职，因为匈牙利人自己都不再能容忍他了。现在俄国人又急于迅速地让南斯拉夫同这种变动挂上钩，似乎我们同他们一起作出了解决匈牙利政治危机的决定。看来似乎是我们共同选择了格罗来接替拉科西，而现在来巩固新的局面，而其实我们是在苏联的决定付之执行后我们才获悉这一切的。

不管别人是否喜欢俄国人这种做法，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象事先商定要在克里米亚会晤那样来接待格罗。这一切将予发表，我们只好在此之后再看看，我们进一步能有什么作为和如何去做。

* * *

要是我现在设法得出什么结论的话，我觉得，赫鲁晓夫通过对南斯拉夫的私下访问和铁托在克里米亚的逗留，他的行动同六月份相比有所不同，比三个月前成功。很可能赫鲁晓夫认为，一个特殊的成就是在克里米亚谈妥匈牙利人十来天后访问南斯拉夫。对于匈牙利，对于我们同整个阵营的关系来说，这将是有意義的。赫鲁晓夫和铁托有这样一个机会，接连十几天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进行会谈，这也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在南苏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莫斯科。

我一回到莫斯科，我就给兰科维奇同志写了信，建议让我尽早回贝尔格莱德一趟，以同我们的领导人谈一谈，因为在克里米亚不可能谈。我不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从克里米亚带回去的印象，我也不了解同俄国人商谈定当的事情，我更不清楚同匈牙利人谈妥了什么。对于赫鲁晓夫去南斯拉夫之后，我们的人得出的政治结论，我一无所知，我也不了解，在克里米亚逗留期间，这些结论是否得到证实和更加强了。铁托同志说过，我们要在克里米亚谈一谈，根

据他的意见，我推迟了我在莫斯科要办的某些事，但是在克里米亚没有进行任何谈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莫斯科。

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危机继续在发展，九月份在南斯拉夫时以及后来，十月份在铁托访问克里米亚时，在我们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南斯拉夫方面也好，苏联方面也好，都没有考虑到出现最坏的情况，也即西方几大强国和以色列使用武力来反对埃及。探讨了支持和援助纳赛尔的各种可能性，纳赛尔的处境被认为是艰难的。

这里的外国代表很起劲地探听在克里米亚和在南斯拉夫有过什么情况。我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的这几天里，我应挪威、加拿大、奥地利、法国、阿根廷、匈牙利、希腊、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大使的要求，会见了他们。我同《纽约时报》记者乔丹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我应他的请求接见了他。

同我谈话的一部分人现在的出发点是认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存在困难，这种困难是苏联的政策引起的。大家都知道，苏共中央主席团就铁托前不久对苏联的正式访问发了一封秘密信。这里把这封秘密信当成是一起政治事件。大多数谈话者把这封信看成是一个证据，证明俄国人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中耍两面派。他们中间有的人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但愿这封信产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九四八年的那些信的结果。有些人（譬如，奥地利的大使比朔夫）甚至谈到，要是他们处于我们的位置的话，他们会如何回答俄国人。西方某些大使现在对我说，我们六月份的两项宣言，一项国家的，一项党的，都是正确的，而不久前他们还攻击过。我六月份向这些人说过同样的话，每一次都不怎么成功。现在，他们向我说这种话了，尽管我不再提起这些问题（瑞典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等等）。

有个别大使散布一种看法，认为在克里米亚还谈到军事问题，他们想用这一点来解释格列奇科元帅的在场。这种看法到现在为止是极个别的。大家都格外重视格罗和匈牙利人突然出现在克里米亚一事。这里的外国人正常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件事事先同我们商量过。我不知道我们是说我们事先同匈牙利人约好在克里米亚会晤（我们肯定没有这么做）好呢，还是说俄国人和匈牙利人安排的这次会晤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不知道我就我们的对外政策，包括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同《纽约时报》记者乔丹的长篇谈话的结果怎么样。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莫斯科。

外交团里对现在在这里的以亚克希奇将军为首的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很感兴趣。有些外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个代表团到苏联来访问同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有关。

前天，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遇到了朱可夫元帅，同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他头几句话就说，他要接见我们的军事代表团。他打听了代表团的组成以及迄今为止对访问苏联的印象。朱可夫元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当他谈到他对我们代表团前来这里感到高兴时，他是真心实意的。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到目前为止受到俄国人的良好接待。外交团里对代表团的兴趣日益浓厚。西方的某些代表对于南斯拉夫和苏联建立军事联系特别敏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莫斯科。

最近还有一个代表团从南斯拉夫前来这里进行正式访问：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团，是应“全俄大总主教”阿列克谢的邀请前来的。代表团由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大总主教维肯蒂耶·普罗丹诺夫率领。组成代表团的是塞尔维亚的一批主教。我觉得代表团的

平均年龄有七十来岁，或许在我看来是这样，因为全都是鹤发银须，因此或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为大。“全俄大总主教”阿列克谢在苏联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生平很有趣，尤其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他在列宁格勒迎来了这场战争，他在那里度过了希特勒封锁的骇人听闻的一千天。

我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认识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大总主教维肯蒂耶·普罗丹诺夫的。他作为一个确实准备竭尽所能增进本国利益的爱国志士，给人留下了好印象。现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是共产党人——宗教和任何教会，包括他的东正教会的反对者。普罗丹诺夫大总主教很好地估计到，他在这里负有教会的使命，但是也负有国家的、政治的使命。诚然，应当竭尽所能来取得“全俄大总主教”的信任。若干世纪以来，俄罗斯教会一直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会的保护人，这种传统的联系在我国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代表团不应使教会所得到的南斯拉夫政府的信任发生问题。

一天早晨，普罗丹诺夫大总主教要求会见我，而且无论如何要见我，因为他最初要求我看一看他过一、两天将在“全俄大总主教”阿列克谢举行的盛大午宴上发表的讲话，被我拒绝了，我认为没有必要看。他对我说，届时出席的还有二十来名俄国教会上层人士、苏联政府代表——我国也有的宗教委员会主席，他现在相当于当年的宗教事务大臣。阿列克谢大总主教还将邀请我出席这次盛大午宴。在他一再要求下，我当着他的面看了看他的讲话稿并还给了他，我说写得很好，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出席了“全俄大总主教”阿列克谢举行的午宴。有三十来名俄国教会上层人士参加，在中间的一张桌子旁坐着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共产党南斯拉夫”的大使也在他们中间。俄国人看上去仪表堂堂，留着长长的胡子，头发一直披散到肩头，身材魁伟，体重超

过平均水平,尤其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身穿拖地黑袍,使他们显得更为高大。

两位大总主教讲了逢场作戏的话。俄国人的讲话措辞谨慎,无疑得到当局的批准,如果不是由当局写的话。在开始这次不寻常的午宴之前,俄国大总主教阿列克谢请在场的人都起立,并命令尼古拉主教,我想他来自白俄罗斯明斯克,念一段祷文,他就用威严的男低音唱了一段祷文,他的雷鸣般的嗓音使一切为之战抖。此后,在场的人,除我以外,都划了十字。差一点我也划了,但是我两手紧握,免得到时候做出这一动作,虽说划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一直到贝尔格莱德都会引起反响。

几天前,我们就我们教会代表团访苏在我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款待俄国大总主教。以大总主教为首的俄国教会上层人士无一例外全都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气氛远比我们招待苏联外交部官员或苏联政府其他某些官方代表来得亲切。俄国客人们在我们这里感到不受拘束,很随便,没有人打算打听或者隐瞒什么秘密,当我们同苏联国家官员,特别是外交官员在一起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你会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神父之间的谅解,要比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共产党人之间的谅解来得容易,更为彻底。

最后,我还得记下,苏联总理布尔加宁接见了我们的神父,在所有这些礼节性活动中,苏联外交部都派了副外长费德林参加,就这次接见而言,在苏联也好,在南斯拉夫也好,都不能说教会同国家是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首先是为国家服务的,而不是同国家分离的。考虑到布尔加宁这次接见,我可以这样说,俄国人,我这里指的是党中央和政府,对我们的神父的接待比对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布拉若·约凡诺维奇和拉扎尔·科利谢夫斯基还要好,他们两人由于没有受到这样的接见而很不满意地回南斯拉夫了。

值得记下的是,俄国的主教和神父老是忘记铁托的名字,在致

欢迎辞时不提他，因此我们的主教们总要在上面纠正他们。俄国人试图叫我们的代表团接受现金，到莫斯科的商店里去买教会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神父拒绝了，对俄国人说，他们有足够的钱，自己会买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人不想单独呆在一起，各自同东道主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唯一的例外是贝尔格莱德的俄罗斯族神父塔拉谢夫，他的举止使人可以想象，他不仅代表贝尔格莱德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还代表驻我国的别的、远为强大的“神圣的”苏联机构。我们的主教们不得不为此而公开警告他。俄国的照顾十分周到，用自己的特别客车把我们的代表团送回贝尔格莱德。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莫斯科。

苏联报纸迄今一直不理睬匈牙利与为七年前在斯大林主义反南斯拉夫的诉讼案中无辜死去的拉伊克·拉斯洛平反和给他重新下葬有关的事件。关于为其他无辜受难者平反的措施，也什么都不予报道。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这个题目对于俄国人来说，极其敏感。

我们听说，俄国人对匈牙利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主动权越来越远离当局而转到人民一边。十来天前，苏匈双方就此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专门的会谈。苏联方面出席的是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他们似乎是某种匈牙利问题专家，因为他们负有不同政治使命，到那里去过几次。匈牙利方面出席的是从中国回来的匈牙利代表。匈牙利新任大使博尔多斯基对我进行礼节性拜会，他不想谈为拉伊克平反的政治意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莫斯科。

我在《文学报》上读到俄罗斯作家奥维奇金的一篇发人兴味的文章。他在苏联公众中越来越被视为新政治路线的激进的拥护者。文章的题目是《作家和读者》。奥维奇金显然得到主席团中某个

人，或许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强有力的支持，他才敢于以这样的方式同苏联政府的一些部长谈话。

奥维奇金特别攻击了苏联以下最高级官员：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机器制造业部长科斯托乌索夫、他的副手塔兰切夫以及教育部^①。他也没有放过莫斯科党组织。在这篇很长的文章中，奥维奇金涉及了同官僚主义，同苏联的计划方式，同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一切的做法作斗争的某些实质性问题，他要求部长们真正地“想一想”，并设法认清他们的领导作风会导致什么情况，这种作风在苏联存在几十年了，一成不变。

奥维奇金把苏联渔业部作为这样一种领导方式的实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因为据有人写道，俄国人每年吃的鱼比肉多。奥维奇金说，伊什科夫部长从国家计委得到一份直到最后一公斤鱼都作了明确规定的计划。不论有没有鱼，计划必须完成。奥维奇金说，由于这样的计划方式，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计划的人就搞了形形色色的名堂。他说，斯大林时代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在这方面一无改变。

奥维奇金以论战的口吻提到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奥维奇金指名道姓地公开问他，作为部长，他是否知道他的下属做的渔网把水里遇到的一切统统打捞上来，连最小的鱼都逃不出鱼网。亚速海的工人用这样的鱼网捕捞到小鱼时，把最小的鱼称为“伊什科夫鱼”。这么做，全是为了完成不现实的计划，奥维奇金说，而年复一年地这么做，使得亚速海和其他地方的鱼类荒唐地惨遭灭绝。

关于这篇文章，莫斯科议论纷纷，有人加以翻印，争相传观。人民似乎感觉到，奥维奇金得到某人的赞同和鼓励而这么做，因为公开地嘲笑苏联的一位部长，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现在合乎逻辑的是期待伊什科夫部长和其他被点名的人被撤换。同时又由于这样一篇文章而提出奥维奇金的问题。他已被叫到中央委员会。这场苏联情况下的丑闻的下文实堪注目。在举行了行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之后，将能知道更多的情况，因为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处置渔业部长伊什科夫，而更关心的是如何对待作家奥维奇金。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莫斯科。

从我们在这里迟收到的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以格罗·埃诺为首的匈牙利代表团已在南斯拉夫呆了几天了。匈牙利新领导急于尽早去南斯拉夫，宣布同我国的关系正常化。他们以为，通过南斯拉夫他们将在本国争取到较好的政治地位。俄国人也这么认为，这也正是在他们的导演下演出的。匈牙利人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或许会在国内加强格罗的地位，但是这肯定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声望。我不知道，我国公众是如何看待匈牙利人的这次访问的；我更不知道，匈牙利本国公众是如何看待这次访问的，在布达佩斯采取了为拉伊克和其他无辜被害的匈牙利人平反的行动后，匈牙利公众大为觉醒。

这里的外交团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是一些对苏联政府不利的说法。人们把为拉伊克平反与苏联的平反工作进行了对比。差别很大。布达佩斯重新安葬了无辜被害的拉伊克，发表了讲话，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有大批群众参加。在俄国，平反几乎是秘密，根本不让人民参加，人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或许发给无辜被害者的家庭某种平反证件，党或政府的某种书面决定。我也不知道。这也是秘密。或许这种决定不是给每个人逐个地作出的，而是按阶级、按年限作出的，就象象征召新兵入伍时那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莫斯科。

就我国军事代表团来访，今天我应邀出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午宴。一切正常进行。索科洛夫斯基和亚克希奇将军讲了话。哪一方也都没有讲过头的话。在我看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讲话是可以接受的，是克制的。

在我们为我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出席的有苏军的以下几位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巴格拉米扬、莫斯卡连科、罗特米斯特罗夫、苏杰茨，还有大批苏联将军。莫斯卡连科代表朱可夫元帅表示歉意，他有公务缠身来不了。除他以外，科涅夫元帅也没有出席我们的招待会。招待会上的气氛很克制。这可能是由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不大爱讲话，看来他对南斯拉夫也不是特别有好感。扎多夫大将问我们的潘特利奇上校，南斯拉夫有没有美国军事教官。从这个问题可以设想，彼此并不特别信任。

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匈牙利事件

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怒不可遏。匈牙利爆发起义。格罗下台和赫格居斯政府辞职。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一次军事干涉。纳吉·伊姆雷领导匈牙利新政府。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匿名前往南斯拉夫。布里俄尼秘密会谈。《真理报》称匈牙利事件为反革命。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二次军事干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波兰发生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党，也就是说国家的最高一级发生了变动。掌舵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迄今为止的领导人统治下服了五年苦役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三天前，十月十九日在华沙举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因此变动是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

波兰中央全会和哥穆尔卡的当选在莫斯科引起了一片张皇失措。变动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但是变动不符合苏联领导人的心意。然而，波兰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尽管苏联方面扬言要反对这种变化。在发生现在的变化之前，在半年多之前，俄国人曾指责波兰人，首先是反斯大林派，“想到西方去”，“想让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在半年以前，我也不怎么相信苏联的这些指责。俄国人一九四八年时也曾用关于反苏主义的口号指责我们，俄国人

认为，这一口号跟四十年前一样具有神奇的力量。不接受苏联的霸权，就立即被宣布为“反苏分子”。由此得出，凡是接受苏联的霸权的，就自然成为“亲苏派”。俄国人简直辨别不了，社会主义世界里有人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以这样的身分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必是“亲”苏的，或“反”苏的。

从西方人士处我们早在两、三天前就获悉，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立即从这里飞往华沙，但是这一次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同。赫鲁晓夫不再象仅仅一个月前去南斯拉夫那样只身前往了。当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共同前往波兰，苏联最高层显然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们从几个方面听说，俄国人是作为不速之客前往波兰的，他们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感到不安。有消息说，那里的苏军已处于戒备状态，而波兰人在华沙的工厂里分发武器，建立工人营、民兵或诸如此类的队伍，准备抵抗俄国人，如果俄国人试图使用武力的话。一旦同苏军发生冲突，波兰军队将站在波兰新领导一边。

看来现在又是赫鲁晓夫采取了最激烈的反波的态度。正如他在五月一日祝酒辞里所表白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也即苏联在这一阵营中的霸权，对于他来说，跟对于苏联最高层任何出名的斯大林分子一样亲近。赫鲁晓夫很可能以为，他这样讲话会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斯大林分子就不可能指责他，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在他领导下开始瓦解了。如果事态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连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也可能被归之为赫鲁晓夫的罪过。

至于俄国人指责说，现在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在波兰掌权了，这一点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对于波兰人来说，奉行类似的方针，就会等于是民族自杀。无论如何，局势是严重的，但是俄国人可能使局势变得更为严重。西方的侵略集团如果试图干与波兰和阵营的内政的话，可能使实际危险更趋严重。

波兰的国防部长是苏联元帅和波兰裔苏联公民罗科索夫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俄国最出名的统帅之一。他已经当了大约七年时间的波兰国防部长，现在成问题了。我认为，罗科索夫斯基是独一无二的，他既是一个欧洲国家的国防部长，同时又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和元帅。在斯大林生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下，这是可能办到的。

如果考虑到通过莫洛托夫代表俄国人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条约，斯大林和希特勒在商定的基础上使波兰蒙受最近一次瓜分和亡国，在目前情况下莫洛托夫到华沙，只能是对波兰人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为了使波兰从希特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俄国牺牲了三十万官兵，那么看来每一个俄国人都无权同波兰人讨论这些问题。

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是得出结论，觉得我应当去贝尔格莱德一趟，听听我们的领导的意见。我们关心的中心，不再象二十天前在克里米亚我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苏联对我们的政策。现在另一些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知道，在评价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和人物上，我们同俄国人分歧。我们对六月二十八日的波兹南事件的评价也是不同的。我不怀疑，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也会是不同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我们得到了几天前的南斯拉夫报纸。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政府极其重视本月十五日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的以格罗为首的匈牙利党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几次会议，在匈牙利大使馆和我们方面都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除格罗·埃诺外，匈牙利代表团里还有匈牙利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两党和两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几天会谈。看来，在经过这

么些年的冲突之后，彼此是有话要说的。为了使格罗此行取得尽可能大的成功，我们最核心的领导都参与了。在最高一级举行了好几次会议；铁托和格罗在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盛大招待会上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讲话。我们的《战斗报》十月十八日发表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讲话，讲话谈到三天有益的会谈，谈到匈牙利人来得正是时候，会谈将加强我们党和匈牙利党之间的全面合作。

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以十分积极的调子叙述了访问的经过。我们还发表了格罗的一次十分乐观的谈话，他或许是在南斯拉夫人的影响下，现在谈到民主制，谈到要使匈牙利的全体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

匈牙利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在前天结束的，格罗率代表团回布达佩斯，于十月二十三日抵达布达佩斯。二十三日以后，我们没有从贝尔格莱德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收到我们的报纸。关于匈牙利的局势，莫斯科流传各式各样的谣言。据说，匈牙利的局势比几天前波兰的局势糟得多。看来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俄国人七月份做出的挑选拉科西的第一副手格罗来领导匈牙利的决定，加深了，而不是缓和了匈牙利的内部危机。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俄国人本来准备保留拉科西，通过他在匈牙利实行“非斯大林化”！最后，俄国人也看清楚了，要在匈牙利做这样的手脚也办不到了，但是却挑选了拉科西的最亲近的共事者，而不是挑选名声不那么臭的某个人。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代表传出了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最令人惊恐的消息。据这些消息说，那里的人民大批走上街头，举行了激烈反对匈牙利政府的示威游行。事件很快就获得了反对当局的性

质。据说，示威的参加者推倒了布达佩斯的斯大林大铜像。要求追究杀害拉伊克及其同志们的人的责任，要求以命抵命。还攻击匈牙利现领导，据认为，就主要人物而言，现领导跟旧领导一模一样。另外，据说匈牙利党开始瓦解，人民拿起武器占领了若干地方和仓库，俄国军队为了在布达佩斯“确立秩序”而调动，刚访问了南斯拉夫回去的格罗和赫格居斯的威信丧失殆尽。

关于这些情况，苏联外交部什么都不宣布，态度十分审慎。在同俄国人的谈话中，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西方通过匈牙利发起了一场反对阵营和苏联的名副其实的战争。苏联报纸也是这样来说明事态的，苏联报纸谈到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匈牙利的仆从挑起骚乱，据说这些人人数甚少。格罗这个拉科西的新当选的继承人，立即叫来俄国军队，进行干涉和“确立秩序”。这只是促使人民起义和造反。新总理赫格居斯辞职了，由纳吉·伊姆雷来领导政府，他前不久被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而现在又被吸收入党。

西方代表是在莫斯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谁都不能指望苏联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少数代理人的阴谋”的简短的公报。俄国人自己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真理报》上写的东西。

示威游行一开始时还有可能加以因势利导。甚至没有尝试这么做。格罗往火上加油，大谈其“乌合之众”，从而使大部分人民起来反对他。很难说，这一切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看上去，似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四分五裂，在最薄弱的地方，在匈牙利，阵营中断了。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亲苏”的，直到昨天还在同俄国人打仗，反俄的情绪在这里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还往往可以听到，一百多年前，沙皇俄国的军队镇压了匈牙利人在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领导下的解放斗争。当时俄国的、沙皇的军队赶来救援奥匈帝国，扑灭了匈牙利人的解放斗争。

昨晚我在克里姆林宫遇到赫鲁晓夫，应他的要求我同他谈了

话。谈话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题目是匈牙利。赫鲁晓夫看上去至少是十分不安。他说，匈牙利发生了流血事件，他指责西方，说反苏分子拿起武器反对阵营和苏联。西方要求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从匈牙利开刀，随后逐一窒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西方打错了算盘。他要我向铁托转达一个口信，谈谈苏联对业已形成的局势的观点以及苏联准备以武力回答武力。赫鲁晓夫要我相信，苏联领导人是完全一致的。俄国人将支持在匈牙利实行政治解决，如果这样的解决现在有可能实行的话。赫鲁晓夫给人的印象是，他不相信这样的解决。他说，我们南斯拉夫人现在在匈牙利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许多工作。

我得到贝尔格莱德的同意，后天动身回国。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赫鲁晓夫，我觉得他支持我回贝尔格莱德这个想法，因为他问我，我将于什么时候抵达那里，路上我要花多少时间，他关心的是我尽快抵达贝尔格莱德，把他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意见转告铁托。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基辅。

我于十月二十六日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启程。我们正常地飞到基辅，接着就遇到困难了。机场当局叫我们走下飞机，不允许我们继续前往利沃夫，再到布达佩斯，这显然是由于匈牙利的局势。苏联当局一口拒绝，就是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上路。

我找了基辅机场指挥部，没有结果，我要求让我跟莫斯科通话。我是作为旅客要求的，他们象对待其他任何旅客一样，拒绝了我。我看这样可能拖到明天，我就对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昨晚在尼·谢·赫鲁晓夫那里，我同他进行了特别重要的谈话，我为此而飞往贝尔格莱德，他们在这里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使我不能把赫鲁晓夫的口信转告铁托。这番话帮了忙。他们立即把我带到联络

中心。我立即同莫斯科的空军元帅日加列夫通了话，我告诉他，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我建议他下令苏联飞机经过罗马尼亚飞往贝尔格莱德，如果不能经过布达佩斯的话。我向日加列夫元帅也谈到我给铁托带有口信。经过十来分钟，我们接到通知，莫斯科决定我们经过布加勒斯特飞行，我们于深夜抵达那里。我们明白了，布达佩斯的局势恶化了，甚至连空运也不能正常进行。这种状况很可能是在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里恶化的，因为要是莫斯科估计到这种状况，就不会卖给我们飞机票了。谁也没有提到匈牙利，但是对于我们绕开布达佩斯，飞那么远的理由，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贝尔格莱德。

昨天和今天上午，我和我们领导人进行了初步接触。波兰的局势以及违背俄国人的心意哥穆尔卡成了党的领导，尤其是匈牙

^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夜间，布达佩斯出现了大规模示威和武装冲突。骚乱很快就扩大到全国。在群众的压力下，格罗·埃诺就被撤换，担任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的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被拉科西关押的卡达尔·亚诺什，担任政府总理的是大学教授、科学院士、从一九一八年一起就是匈牙利共产党员的纳吉·伊姆雷。对于人民的行动，俄国军队立即作出了反应，包围了布达佩斯所有关键性的地点，这就是俄国军队所谓的“第一次干涉”。这使冲突更加尖锐化。南斯拉夫领导关切地注视着匈牙利的事态并谴责俄国军队干与匈牙利内政。铁托同志十月二十九日发出了南共联盟中央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的信，对匈牙利的事态发展表示不安，同时对要求匈牙利国内生活民主化的愿望表示支持。信中说：

“……南斯拉夫公众一致欢迎国家和政治新领导的建立以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本月二十九日的声明。匈牙利政治和国家新领导政治纲领的根本内容，诸如使公众生活民主化，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自治，在平等和尊重主权基础上调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倡议就苏军撤离举行谈判等等，以及上述声明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所作的现实的估计，都证明，国家和政治现领导的政策和匈牙利劳动人民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愿望结合为一体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一步的事态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利事件已把俄国人和我们之间不到一个月前在克里米亚的那幅田园诗般景象抛之脑后。我们的领导人自己也完全扑在匈牙利局势上，夜以继日地竭力想了解有关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的局势的比较确切的消息；而局势没法估计，也预料不了进一步的发展。

匈牙利的局势在继续恶化。出于必要，而不是按照自由选举，组成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新政治局，昨天还被开除出党的纳吉·伊姆雷成了新的政府总理。卡达尔作为斯大林，也即拉科西的恐怖统治的受害者曾蹲了几年牢，应当由他替代业已从舞台上消失的格罗来抚慰起来造反的人民。格罗很可能躲到苏军那里去了，或者“撤退”到苏联去了。要是俄国人三个月前，且不说三年前，搞掉拉科西，不是让他的副手格罗，而是让这个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某个受害者来占据他的位置，或许现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现在谈这种事有什么用呢？！

我在贝尔格莱德获悉，纳吉·伊姆雷要求苏军立即离开匈牙利领土；事实上看来这只涉及大布达佩斯地区。我还听说，纳吉向苏联大使馆提出尖锐的抗议，抗议苏联源源不断派新部队到匈牙利来。俄国人一声不吭，对于纳吉·伊姆雷的抗议什么都不说，而看来却把越来越多的军队派到匈牙利来，并包围布达佩斯。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贝尔格莱德。

俄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的主要支柱是军事力量。莫斯科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声明。声明短得异常，我国外交部告诉我，只“等于”《真理报》的一栏篇幅。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原则的声明的文字是好的，似乎是我们南斯拉夫人写的。在声明中，苏联方面强调这样一些因素：平等、完整、主权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人们唯一担心的是这项声明发表得太晚了。最重

要的事实是，苏联的实践同这一声明完全背道而驰。波兰和匈牙利不出事的话，也不会发表这项声明。使我不解的是，当俄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从四面八方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匈牙利有谁能去分析莫斯科《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呢？

匈牙利方面几乎严密地关闭了同我们接壤的边界，但是匈牙利公民还是大规模地逃到我国。据说，逃过来几千人。很难理解匈牙利政府的态度：向着南斯拉夫的边界现在仍然关闭，而向着奥地利，也即向着西方的边界却开放着，尽管健全的理智说应该是相反，因为我们被要求帮助匈牙利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直接的危险，推翻匈牙利这个制度的人员和武器来自西方，来自奥地利，而不是来自南斯拉夫。

还盛传纳吉·伊姆雷要求退出华沙条约，他的这个要求以及他直接地或间接地向西方提出的其他要求，只是使匈牙利残存的进步力量更加混乱，看来在匈牙利很少有谁想维护现有的制度。斯大林通过拉科西强加于匈牙利人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信誉扫地。格罗和赫格居斯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也无济于事。不是我们加强他们，反倒是他们削弱了我们。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贝尔格莱德。

西方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宣传运动，来赞助“匈牙利起义”。看来参加闹事的人五花八门，各色人等都有，从极左翼到极右翼，或者用我们这里的俗话来说：弄不清楚谁喝酒，谁付钱。随着匈牙利爆发了武装冲突，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局势也突然恶化了。英国和法国似乎认为，俄国人现在忙于处理匈牙利的紧急事态，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保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现在顾不上就苏伊士运河问题援助纳赛尔。

* * *

我的空闲时间比我设想的要多，使我能够翻阅一下从莫斯科带回的材料，我本来打算根据这些材料提出报告。有许多材料现在显然是提不上日程的。在我从莫斯科带回的材料中，有一份关于英国工党领导人科尼·齐利亚库斯在莫斯科大使馆拜会我的记录。在此之前十来天，齐利亚库斯曾去赫鲁晓夫那里，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将使齐利亚库斯有更多的机会在南斯拉夫受到欢迎。旧有的友谊把我们同他联结在一起，而对于我们来说，他对于苏联和苏联现领导人的看法是令人感兴趣的。^①

齐利亚库斯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远远高于对苏联现在所有领导人的评价。他告诉我，赫鲁晓夫竭力要证明，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或许象赫鲁晓夫有时说的那样，“必须”同其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起呆在大家庭里（呆在阵营里）。赫鲁晓夫还对他说，南斯拉夫在两个集团之间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这是不彻底的，这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齐利亚库斯还告诉我，他对赫鲁晓夫的这一论点提出了意见。他对赫鲁晓夫说，苏联承认亚非新兴国家可以奉行独立的政策，而与此相反，却责难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奉行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赫鲁晓夫回答说，这是对的，但是同样对的是，南斯拉夫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这些国家刚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南斯拉夫则是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有悠久的传统，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在掌权。

齐利亚库斯还告诉我，赫鲁晓夫对他说，俄国人对我们是耐心

^① 科尼·齐利亚库斯，英国工党政治家，主张和平和国际合作。作为一个富有独立精神的人，同自己的党发生冲突，特别是由于他批判工党领导人并对大西洋公约采取不调和的态度。（美国）国务院不给他签证，不让他进入美国，而斯大林分子又称他为英美代理人。他是南斯拉夫的友人，在世界上为宣传我国的真相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共产党情报局运动期间。

的(！),寄希望于我们之间的分歧会减少,因为我们南斯拉夫理应“改正”。鉴于我也已经向齐利亚库斯谈了我们南斯拉夫对俄国人的耐心,于是齐利亚库斯就说,耐心,或者缺乏耐心,是相互的,因为“在谁应当改正和改正什么问题这个上,你们的看法完全相反”。

齐利亚库斯告诉我,今年春天苏联人访问英国时,他在伦敦同布尔加宁谈过话,布尔加宁几乎赞扬齐利亚库斯在我们同斯大林发生冲突期间在政治上支持南斯拉夫!这是令人不大能相信的:苏联政府总理赞扬英国工党领导人,因为他在南斯拉夫和俄国人发生冲突时支持了南斯拉夫人,而没有支持俄国人!

齐利亚库斯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这几
次谈话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布里俄尼。

铁托办公室昨天通知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将于午间抵达布里俄尼,同我们进行最紧急的磋商。他们乘一架双引擎伊尔-14型小飞机前来。是他们要求前来,并强调事情十分紧迫。他们还指出此行的秘密性。铁托预料他们将在下午四、五点时或傍晚时抵达。就保守秘密而言,如果他们在夜幕的保护下抵达普拉,抵达布里俄尼,则更好。

要我在下午四点左右到铁托同志处。兰科维奇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已在那里。我们外交部没有人在那里。我们一致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人除了为了匈牙利问题而外,不会为别的事而来。那里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在纳吉·伊姆雷政府的纲领问题上,混乱比几天前还要严重,而布达佩斯处于等候一旁的俄国军队的火力圈中。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晚上六点后乘飞机抵达普拉,接着乘船

驶抵布里俄尼铁托的别墅下面的码头。外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风浪呼啸着，布里俄尼四周这片浅滩的大海在晃动，象是大洋似的。我们，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走下山，来到小小的码头上，来迎接不平常的客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看上去筋疲力尽，尤其是马林科夫，勉强站住脚。俄国人吻了我们两边面颊。在小小的荒凉的码头上，这个场面是很不平常的。俄国人头几句话就抱怨天气太坏，他们出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天气，由于刮着强劲的风，飞机几乎飞不动。赫鲁晓夫说，比战时还糟糕。马林科夫连坐都坐不住，在飞机上大半路程是躺着。看来，在海上的这段短暂的航行，对俄国人也不轻松。我们的保安机关和铁托卫队中的军官“为了保密”，沿着波涛汹涌的海路，顶着大风，在漆黑的夜晚，把他们从普拉送到布里俄尼，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使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觉得腻烦透了。

我们的客人关心的是我们尽早坐下来会谈。歇了半小时，喘了口气之后，就在铁托别墅的底层开始会谈。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就只有他们自己，他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不在，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我们方面出席的有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没有记录，没有翻译，也没有“技术设备”。实际上，唯有这样的会谈才应当拍摄下来，而不是官方访问时的会谈，在那种会谈时，我们和俄国人在桌旁坐着二十来个人，人人都记下点什么，尽管往往谁也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来。这次桌子上一干二净，连一张纸都没有。没有人做任何记录，我们中极个别地有人在一张小纸上写上他打算讲的话或者他打算问的问题，讲完话，问完问题就把纸撕碎，扔进烟灰缸。似乎我们大家都希望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这次最高级会晤不留一丝痕迹。而这次会晤的记录本来会比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迄今举行的其他任何一次最高级会晤都更加令人感兴趣。

这一切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的发展象是在战时，而这也确实是一场战争，看上去更象是一场战争，“第一个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反对“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阵营的一员的公民的战争。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

* * *

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会谈从十一月二日晚上七点一直进行到十一月三日凌晨三点。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说，他们前来是为了同我们商讨匈牙利局势问题，把他们打算采取的措施通知我们。他说，昨天，十一月一日，在布列斯特同波兰人谈了。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而波兰方面参加的有：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奥哈布。此后，莫洛托夫回莫斯科了，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就去了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同德治和罗马尼亚人商谈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领导人（诺沃提尼）也去了那里，同他们也商谈了。接着，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去了索非亚，在那里同保加利亚人商谈了。所有这些访问都是秘密的。他们还同中国人进行了磋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中国人跟其他人一样在各方面完全表示同意。波兰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也同意，匈牙利的事态正在变为反革命。波兰人知道，苏联人决定做什么，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希望让我们了解苏联的决定并听取我们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匈牙利的事态正在变为反革命。他开始时有点动感情，没有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他说，在匈牙利，共产党员正遭到杀害、屠戮和绞死。他提到纳吉·伊姆雷对联合国和四大国的呼吁以及退出华沙条约。这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纳吉到底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还是他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老牌代理人，现在还不清楚，主要的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赫

赫鲁晓夫问道，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指的是苏联。如果让步，西方就会说我们愚蠢，或者说我们软弱，而这是一码事。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也好，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也好，都决不能允许这么做。资本家将来到苏联的边界上。赫鲁晓夫说，他们聚集了足够的部队，决定中断匈牙利这样的事态发展。要这么做，他们需要一、两天时间。他说，今天是十一月二日，他们同布尔加宁通了电话，布尔加宁告诉他们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明尼赫·费伦茨和卡达尔·亚诺什已经逃离布达佩斯，现在正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赫鲁晓夫说，这具有巨大的意义。赫鲁晓夫问道，我们是否知道奥普罗·安托尔的情况，说十分重要的是他也能脱身得救。俄国人正在这么做，但是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话题又转到苏军对匈牙利的干涉。他说，从苏联国内的理由出发，他们也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那里可能找到这样来看待整个这件事的人和势力：斯大林治理的时候，人人都听话，没有震荡。现在，他们（在这时赫鲁晓夫用了一个难听的字眼来指苏联新领导人）上台了，就出现了失败，匈牙利就脱离了。而且又恰恰发生在苏联现领导谴责斯大林的时候。赫鲁晓夫说，苏军首先可能这么说，这是要对匈牙利进行干与的理由之一。

赫鲁晓夫说，军事上的准备正顺利进行。他提到朱可夫元帅，提到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领导人将是马利宁大将。他说，罗马尼亚的某些部队也可能参加，但是俄国人认为这没有必要。赫鲁晓夫接着说，两天内一切都会消灭干净，就可以结束匈牙利的任何抵抗。他不说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将很快就开始，我们是他们通知的最后一批人。事实上，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南斯拉夫人的任何同意。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都将在匈牙利进行他们所设想要做的事，尽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正确地理解”他们，是十分重要的。

赫鲁晓夫说，英国和法国对埃及施加侵略性压力对苏军的新干涉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这有助于俄国人。西方和联合国里会吵吵嚷嚷的，但是当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反对埃及的战争的时候，这种吵嚷会少些。赫鲁晓夫说，“他们陷在那里，我们陷在匈牙利”。

马林科夫也表示，苏联一切都准备好了，将立即对纳吉政府进行新的军事干涉。看来俄国人将全面地和十分尖锐地进行干涉，因为他们完全脱离匈牙利人民，实际上是人民反对俄国人。

赫鲁晓夫提到米什科尔茨附近的工人，说匈牙利的矿工仍然是忠诚的，尽管反动派在米什科尔茨掌权。捷克人给了矿工们一点武器，或许借助于这些匈牙利矿工，或者同他们相结合，在那里尝试采取某种反对纳吉的政治行动。他重申，一切都准备好了，将紧急地完成他所说的事，没有别的出路，将最迅速、最坚决地贯彻执行这一决定。顺便他提到，匈牙利两度同西方结盟向俄国开战，赫鲁晓夫强调苏军反对匈牙利的情绪，匈牙利现在又想同西方站在一起，来反对俄国人。

我们方面从一开始就指出，我们极其关注地注视着匈牙利事态的发展。人民的骚乱和闹事是由于对拉科西的政策以及过去的错误和罪行的不满爆发了。要是及时地采取了理应采取的措施，就会避免这样的事态发展和现在出现的情况。鉴于卡达尔撤换了格罗，我们在铁托致匈牙利人的信中，谈了我们对纳吉第一届政府的态度。（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说，他们同意铁托的信的内容，他们提到苏联政府十月三十日的声明，声明是朝着同一方向的，通过这项声明，他们基本上支持纳吉·伊姆雷。）

我们也看到事件在向右转向反革命并感到不安，因为杀害和绞死共产党员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呢（指纳吉·伊姆雷政府）。如果匈牙利出现了反革命，那必须干涉。不应当完全依靠苏军的武

器。将发生流血事件，匈牙利人民将同苏军展开斗争，因为匈牙利共产党由于过去所做的一切而瓦解了，不存在了。在业已造成的局势下，应当作某种政治准备，设想拯救能够拯救的东西，组成或者宣告成立由匈牙利人组成的某种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向人民提出某种纲领。

赫鲁晓夫说，他们有一个建议是由匈牙利驻莫斯科前任大使明尼赫·费伦茨组成匈牙利新政府（闹事前，他被指定为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还提到卡达尔。赫鲁晓夫问，我们有什么想法？铁托询问，谁是明尼赫，兰科维奇提到前不久同明尼赫的会晤。南斯拉夫人说，新的革命政府由卡达尔·亚诺什组成，比由明尼赫组成好，尽管他们对这两个人都不大了解。俄国人显然赞成明尼赫，但是可以说，他们也不反对接受我们的理由。

我们方面指出，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的纲领将是什么样的。从南斯拉夫人提的意见中得出，新政府必须尖锐地和坚决地谴责拉科西和格罗的政策以及导致了这一切的整个过去。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宁愿谈现在的反革命和西方，而不愿谈过去的罪责，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赫鲁晓夫骂拉科西，接着又用最难听的话攻击和痛骂格罗，格罗当时被选为书记，接着就去克里米亚休假，嗣后又来南斯拉夫。拉科西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到佩斯去“帮忙”^①，但是赫鲁晓夫对他说，“可以到下面去，那里的百姓将把他^②吊死”。拉科西要求跟佩斯通电话，但是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马林科夫说，电话员表明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同时又发表评论说，这个白痴连起码的事情都不明白。

① 佩斯为布达佩斯的一部分，系匈政府所在地。——译者

② 原文如此，“他”疑为“你”之误。——译者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问及新政府的声明中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建议是：新政府的纲领应当坚决谴责过去并公开地谈清楚拉科西和格罗的真相。接着是：捍卫社会主义的主要成果。新政府的纲领还应当预告，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民主和平等的关系以及苏军撤离的前景。在国内则诉诸于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工人阶级。赫鲁晓夫同意谴责拉科西和格罗。他还同意苏军将来要撤离，尽管他显然不乐意强调这一点。

上面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十点以后，转到隔壁房间进晚餐。在饭桌旁，赫鲁晓夫又讨论起由谁组织政府来了。看来他不大容易接受卡达尔，后者不是他们挑选的人。他又赞扬明尼赫。他说，现在他才知道，明尼赫一直反对拉科西，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赫鲁晓夫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大约在三十年代，他们作为苏军军官曾在俄罗斯一起参加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演习，他们住在同一个帐篷里。看来俄国人已经组成政府，明尼赫任总理。我说，我认识明尼赫，在莫斯科经常同他在一起，对于他，我只能表示赞扬。但是，要卡达尔还是要明尼赫，在作出这样的评价时，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拉科西时期，明尼赫是驻莫斯科大使，而卡达尔则在布达佩斯服苦役。对于每一个匈牙利人来说，这一点将决定性地有利于卡达尔。赫鲁晓夫让步了，同意了。

南斯拉夫人彼此补充，谈到需要寻找新的干部，强调了这样一种看法：要是革命政府里没有拉科西分子，如果革命政府坚决谴责拉科西和格罗，如果真正从整体上奉行另一种政策，那才可能有所意义。看来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表示容忍，虽说他们来时带来的是不同的人事安排。例如，赫鲁晓夫建议让巴塔·伊斯特万在匈牙利新政府里任国防部长一职，尽管巴塔在拉科西政府里也是国防部长。当南斯拉夫方面说，类似的安排从政治上来说是差劲的。俄国人让步了。

还谈到了匈牙利的一些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一再重申，需要竭尽所能把奥普罗·安托尔救出来。我们提到洛松齐，我们还谈到，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派的、有能力的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表示有保留。从讨论中看出，俄国人知道洛松齐跟我们有联系，认为他是一个面目可疑的纳吉的人。还提到马莱特尔上校，他被指定为同俄国人谈判苏军撤离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南斯拉夫人弄不清谁是马莱特尔，谁都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确凿的情况。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谈这一点，尽管他们是知道马莱特尔其人的。

晚饭后，大约十二点时，重新提出了政治准备的问题。这是马林科夫重新提出的，他谈到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一次谈到并明确了已经提到的原则，对于这些原则，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再一次表示同意，说要采纳这些原则。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匈牙利新政府的声明实际上在莫斯科已经写好，可以在这些会谈和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在谈到对干部拿不准时，我们的同志们得出结论，认为卡达尔·亚诺什应当对匈牙利的干部最了解，应当问问他并听听他的意见。俄国人也采纳了这个意见。

俄国人再次谈到从我们方面设法探究一下处置纳吉的可能性。我们的人除洛松齐外，还提到桑托·佐尔坦，由于有受迫害的危险，他已提出到我们大使馆躲避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样一些人是不会变节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怀有善良意图的正派人。我们商定，我们要看看朝着这一方向我们能做些什么，因为俄国人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几次重申，我们按着上面的意思，对纳吉政府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谈到，不知道能取得什么效果。俄国人对于什么时候动用军队进行干涉只字不谈。我们不能问他们，而他们自己又不想说。因

此不清楚的是时间问题，也即我们对纳吉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以便减少牺牲和不必要的流血。双方商定，我们将设法对纳吉·伊姆雷施加影响。赫鲁晓夫，而特别是马林科夫，十分重视这一点，强调南斯拉夫人朝着这一方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正确和十分重要的。

在谈话中，赫鲁晓夫说同各方，首先是同中国人进行了磋商。他唯一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人。他说，他们请来了中国代表团。他们知道毛泽东不可能来，因此要求别的人来：中共书记刘少奇，或者周恩来（赫鲁晓夫说他是一位“大外交家”）。中国人同意了，确定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六、七个人的代表团。俄国人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离（波兰、匈牙利）事件远一点，没有直接牵连在内，可以比俄国人看得清楚些，俄国人则有一种惰性，过去的习惯。

俄国人建议中国人去波兰一趟，到那里，在现场估量一下局势。中国人经过动摇后接受了。他们等波兰的签证等了几天。他们没有得到签证。毛生气了，通知中国人，即便得到签证也不去了。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是听得出来，俄国人竭力想使中国人站在自己一边。很难弄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波兰人不给签证，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俄国人在某些方面得手了，中国人生波兰人的气。南斯拉夫人听着这番叙述，没有发表评论。

在饭厅里进晚餐时的谈话期间，赫鲁晓夫再次提到罗马尼亚人准备也派部队到匈牙利去。南斯拉夫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让步了。

赫鲁晓夫提到朱可夫元帅，说他管军事方面的问题，他赞扬朱可夫作为一个军人的能力，说在战争时期，朱可夫由于同斯大林争论军事战役计划，斯大林说他要苏联的命运负责，朱可夫报以他朱可夫也要对这一命运负责，为此而失宠。

还提到卡达尔关于匈牙利事态的悲惨发展的讲话。卡达尔担心社会主义和工人政权在匈牙利垮台。赫鲁晓夫说，卡达尔“是好样的”。谈话接着又继续谈到拉科西时期对被捕的卡达尔施加的恐怖行为。在虐待卡达尔方面，特别突出的是法尔卡斯的儿子。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心情抑郁地一再骂：“恶棍！”

我们的人谈到，卡达尔曾是访问南斯拉夫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成员，他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说，格罗谈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大约有九十万党员，而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党完蛋了。

俄国人几次提到米高扬。他今年春天去过匈牙利，接着现在又去了。南斯拉夫人不想谈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可能知道，南斯拉夫对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扮演的角色的评价是否定的。

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问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每个委员对这一切的意见和态度。这个问题使俄国人感到意外。稍稍停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回答说，主席团完全、绝对一致。马林科夫补充说，在事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这样的一致，现在也如此。

赫鲁晓夫温和地谈到波兰，不过，他还是反对波兰人的。他对于哥穆尔卡没有说什么坏话，但是他谈到波兰人的一些不能接受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波兰就八中全会引起的事件而言，远非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根本性的），诸如：波兰人（不知道是哪些人）谈到要把拉沃夫归还波兰。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将提出寇松线问题，东普鲁士是在波兰和苏联之间瓜分的，这些领土也可能成问题（显然只是指波兰的那一半），波兰人在德国找不到任何人会支持他们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为界的西部边界。俄国人已让波兰人了解这一点，哥穆尔卡说，根本没有必要谈这些问题。

赫鲁晓夫还攻击波兰人做买卖的方式：把煤卖给西方，换取现

钱，而用贷款要求俄国人提供小麦。赫鲁晓夫说，这种做法不平等，这是剥削苏联。赫鲁晓夫谈到将向哪些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小麦，提供多少。他们将借给罗马尼亚人，也就是说，罗马尼亚人明年还给他们。赫鲁晓夫关心的是南斯拉夫要进口多少小麦。我们告诉他，我们打算就此同美国政府签订协议。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表示赞成。赫鲁晓夫嘲笑波兰人的看法，波兰人甚至认为苏联欠波兰的债，而苏联给他们很大的援助，给了他们大量资金。

马林科夫在谈话开始时一再从法律和宪法方面证明，纳吉·伊姆雷政府不是合法的，也没有得到宪法机关的正常确认，而它目前的纲领是违反宪法的，似乎这一论据可以方便苏联进行新的军事干涉；似乎这一干涉是合乎宪法的！

赫鲁晓夫在谈话的第二部分，象往常同南斯拉夫人谈话时想让南斯拉夫人心满意足那样，说了斯大林的坏话，似乎这是向他们作出某些让步。这一次他挑选了斯大林对拉科西的态度的趣闻，据说，斯大林不能容纳拉科西，不相信拉科西。拉科西到苏联休假，斯大林也在场。斯大林对这件事起了疑心，说他要教训教训拉科西。第一回，斯大林逼着拉科西一口气喝干了一大杯酒。他们担心拉科西可能死去，把拉科西弄走了，但是拉科西安然无恙。拉科西十足地模仿斯大林，他下令，给他在布达佩斯的办公室安装上铁门，还有某种装甲钢板，免得有人行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最后说，拉科西今天对于应该如何工作，连起码的概念都没有，他同斯大林在匈牙利拆了烂污，现在他们不得不过来收拾。

每当提出纳吉·伊姆雷的问题，赫鲁晓夫往往重申，“匈牙利在杀戮共产党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按照纳吉·伊姆雷政府机关的决定干的。在第一部分谈话中，我们方面一提到纳吉，赫鲁晓夫就报以这样的理由。后来，在谈到纳吉能做些什么，能给整个事情帮什么忙时，赫鲁晓夫发表了另一番讲话，他不再说什么“那里在杀

戮共产党人”，而是接受了对纳吉·伊姆雷的完全不同的评语，同意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帮很大的忙，保全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名声。

* * *

赫鲁晓夫就匈牙利事件和英法两国反对埃及的战争谈到苏军的军事实力。他谈到苏联已经改进了导弹和火箭，现在已经拥有可以射向八千公里以外的目标的火箭。这实际上意味着可以击中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这种武器是无法防御的。赫鲁晓夫关于远程火箭的讲话，与其说是通报火箭武器方面的实际成就，不如说是一个让我们相信苏联军事技术装备的实力的行动。在去了克里米亚之后，十月二十三日，朱可夫元帅对我谈到他们大约还需要一年时间来改进火箭武器，也即制造出远程火箭，而赫鲁晓夫在此后一个星期就说，他们已经制造了这样的火箭（？）。

* * *

谈话在十一月三日清晨五点钟结束。一度曾经谁都不说话。有时候的气氛令人不舒服，由于政治问题已经谈完了，有的人就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进行逢场作戏的谈话。晚饭时没有喝酒，会谈时根本没有送上酒。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态度很软弱、很谦恭，总是倾向于接受南斯拉夫方面向他们说的一切，不论实际上他们是怎么想的。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目的是使会晤在协议的标志下结束，尽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明显的是，我们对匈牙利流血事件的原因的看法是相反的。南斯拉夫方面多次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坚持要坚决谴责拉科西，而这也就意味着谴责苏联，正是他是造成匈牙利目前的灾难的罪魁祸首。在这一基础上，南斯拉夫方面还作了其他的干与，诸如：由谁来组织新政府？制订什么样的纲领？在苏军不可避免地进新干涉面前，如何对纳吉·伊姆雷施加影响？以便拯救还能拯救的一切，以便减少牺牲，防止匈牙利发生新的流血事件。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十一月三日一大早飞离普拉机场。飞行的条件极坏。

我们把客人从铁托的别墅送走后，我留在旅馆的房间里作笔记，记载持续了一整夜的这次不平常的会晤。这不那么容易：我得凭记忆回想这场为时十个小时的谈话。^①

* * *

我们驻莫斯科使馆十分卖力，每天向贝尔格莱德作几次报告。俄国人除了准备用武力镇压匈牙利的闹事外，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向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提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要求，要它们停止对埃及采取一切军事行动，立即撤军。他们还给了艾森豪威尔一封信，把业已采取的步骤通知了他，甚至要求美国参加制止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侵略。美国反对英国、法国、以色列使用武力，现在对俄国人来说，美国的这种态度真是求之不得，尽管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揭露”美国是侵略埃及的主谋。

莫斯科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方外交官中也几乎陷于孤立，他们大多数都谴责进攻埃及。不是因为他们同情埃及和纳赛尔，而是因为这场“愚蠢的战争”使西方不能更好地利用匈牙利事件来反对苏联。俄国人甚至有时间在各个方面的外交行动。在莫斯科接待来访（阿富汗、叙利亚），谈论和平和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为了和平而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的口号。甚至同斯巴克和范阿克

^① 关于十一月二日和三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在布里俄尼举行的会谈的内容以及关于南斯拉夫对当时的匈牙利事件的政策的其他方面，后来国外盛传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的说法对南斯拉夫是怀有恶意的。因此，南斯拉夫政府一九五九年初决定，由联邦执行委员会新闻部发表《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政策和纳吉·伊姆雷事件》（所谓的关于匈牙利的《白皮书》）。书中发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明确确定上述布里俄尼会谈内容的文件（例如第一百号文件《南共联盟中央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致苏共中央的信的摘录》）。本人在本书中直接写下的记录同第一百号文件以及《白皮书》中发表的其他文件所陈述的主要观点完全吻合。

尔谈这一点，他们是在俄国人最不愿同“社会帝国主义者”斯巴克和比利时合作的时候，到莫斯科访问的。但是通过斯巴克，也可以把这用来对西方施加压力，斯巴克在同谢皮洛夫会谈时，为法国和英国的行为辩护，谴责纳赛尔，但是他表示主张刻不容缓地停止战争。而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最近几天来日夜开会。除了朝着各个方向展开政治和外交活动外，俄国人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了军事准备，因为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在一次招待会上，朱可夫元帅提到，科涅夫元帅在波兰。朱可夫对波兰人感到愤愤不平，做着手势，似乎要一举消灭某个人，他说：“我们可以把他们砸烂……！”有一位西方大使问道：“把谁砸烂？您是指波兰共产党人？”对此，朱可夫未予作答。从莫斯科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了以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俄国人担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也可能产生麻烦。看来，在那里俄国人没有理由感到担心。要是阵营里有谁同俄国人站在一起，反对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那首先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我们的同志从莫斯科报告说，印度大使馆告诉他们说，可以指望停止对埃及的战争。艾登在议会里得到很弱的多数。联合国大会多数支持埃及。对于联合国的作用，南斯拉夫作出了特别的贡献。我们的代表，大使约扎·布里列伊博士要求召开大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很好的决议，只要在主要问题上，而这也就是停止武装战斗和进犯者撤军，决议未得到贯彻执行，会议就不断举行。^①

^①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那个夜晚，以色列军队进攻埃及，在接着的七天内占领了西奈半岛。从十月三十一日起，英法空军直接援助以色列部队，而十一月四日至五日，英法伞兵和登陆部队在塞德港附近和更广泛的苏伊士运河地区登陆，遭到埃及的有力抵抗。在联合国大会决议、苏联政府最后通牒式照会和美国政府坚决抗议的压力下，以及在世界公众和本国公众的压力下，进攻者于十一月七日停止了入侵行动。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越来越多的入侵者部队不得不撤离被占领的埃及地区。

暴风雨般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苏联武装力量对匈牙利进行第二次干涉。俄国人称纳吉·伊姆雷为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非斯大林政策暂遭失败。排除对埃及的侵略。同赫鲁晓夫谈话。苏联军队的影响在增长。莫斯科的冷战气氛在加强。到尼·谢·赫鲁晓夫那里做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赴莫斯科途中。

我正在赴莫斯科途中的苏联飞机上。我有的是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来消磨时间。我几乎有一整天时间来继续写这一笔记。我将在这里记载我们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会晤后发生的一切，仅就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能了解的情况而言。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是在十一月三日一大早飞离普拉机场的。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可以猜想，他们这样匆忙，是要尽早下令对匈牙利进行苏联第二次军事干涉，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进行这次干涉。在这一点上，军事秘密的法则起作用了。我吃不准俄国第二次调动部队向布达佩斯进发的号令是在什么时候下达的，但是很可能是在十一月三日就通知了苏联部队。

苏军向布达佩斯实行突击，从种种情况来看，布达佩斯大部分地区在十一月三日至四日的两个夜晚，也即从布里俄尼送走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二十四小时后，仍在起义者手中。还可以从纳吉·伊姆雷同匈牙利一批国家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眷于十一月四日

一大早逃到我们大使馆并要求避难看出。我认为，他们总共大约四十个人。^①此后不久，俄国装甲部队、军车和坦克，就包围了我们大使馆，完全封锁了使馆大楼。对出入我们大使馆的人，他们不加区别一律查验证件。大楼本身的许多窗户被打破，而十一月四日那天很冷。在匈牙利难民中有人生病，病人需要请大夫，而俄国当局除南斯拉夫外交人员外，不允许其他任何人进入使馆大楼。除了其他一切问题外，还出现了那么许多匈牙利难民的吃饭问题。这是我们没有料到而又必须加以解决的新问题，而更不用谈我们大使馆，也即南斯拉夫突然面临的崭新局势了。

仅在三天以前，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作为朋友突然匿名来到布里俄尼。俄国人表现得极其亲切，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是一个事先深思熟虑过的姿态，是要影响我们的会谈和我们对他们的总的态度，因为你对于前不久当作最亲近的朋友接过吻的人，简直不可能采取别的态度。当我写到这里时，我似乎感觉到了马林科夫圆圆胖胖的脸，当我们交换我们本来没有料到的这种人为的接吻时，我的脸的前半部似乎陷进了一只吹得半足的气球。在以前我们会晤时，我们没有同俄国人接过吻，我们几乎有七年时间没有会谈过，而现在他们决定在首先是对他们，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对我们也适用的严重局势下同我们接吻。要是局势反过来，我认为，俄国人甚至会拒绝同我们会谈。

不难猜测，俄国人和新组成的匈牙利政府现在将指责纳吉·伊姆雷要对他们没有过错的事负责。已经对他提出指责，说他出卖了社会主义，说他企图离弃华沙条约，置身于西方卵翼之下。而已经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这样一个纳吉·伊姆雷现在却在南斯

^① 据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确认和发表的材料，要求并得到避难的为四十二人。

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对纳吉·伊姆雷提出这样的指责和把这些指责扩大到保护他的人头上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不大的。

如果设法寻找匈牙利流血事件的原因，看来俄国人将象这些事件发生前那样，走上歪路。他们已经正式把这些事件叫做反革命。以保卫匈牙利的革命为名，他们把苏军开进起来造反的布达佩斯，寻找造反的原因，一直到美国，在他们看来，人人都有罪责，唯有他们是正确的！

情况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我们同俄国人达成的口头协议，他们同我们的拥抱和接吻现在没有多少意义，或者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局势急速地变化了。根据苏联的政治需要，我们现在可能被控，在整个这段时期里，是我们给纳吉下命令，我们是他的保护人，我们是“匈牙利反革命活动”的真正罪人。事实上，主要罪人是俄国人，他们通过苏斯洛夫，接着通过米高扬，苏联通过拉科西和格罗称霸了十来年之后，没有问过任何人，就作出了对匈牙利来说十分片面的决定，最后终于引起了流血事件和起义。

这里值得记载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尤其是最近几天，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有什么作为。它干脆宣布，对于同匈牙利有关的一切事情它都没有受权处理，并且总是叫人去找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而在布达佩斯，苏联大使馆已经“停业”十来天了。我们听说，这个大使馆实际上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实际上由布达佩斯四周的苏军和他们的司令部在那里代表苏联政府。这是蓄意不让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参与一切事务，这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来判断：大使馆里没有一个人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起去布里俄尼。新南斯拉夫存在以来，我还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事：在类似的级别举行某次会晤，最高代表前来访问的那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却不参加，也不知情。

我们已经快到基辅。在布加勒斯特没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因此，我仍然是只身一人在飞机里。在布加勒斯特机场，我们只呆了或许半个小时。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往来，笼罩着一片沉闷的寂静。在整个旅途，俄国乘务人员对我的态度不仅得体，而且是亲切的。经常走进我只身一人坐着的客舱里来，问我是否需要这需要什么，往往给我送上茶，我在这一天内喝的茶比以前许多天里喝的还要多。在布加勒斯特逗留期间，苏联乘务人员避免谈话，我站在飞机的一边，他们站在另一边，我们就这样消磨时间，直到重新起飞。

现在，当苏联在匈牙利利用武力整顿秩序并扬言要在其他阵营国家也这么做时，简直不可能谈论二十大方针和非斯大林化政策。尽管赫鲁晓夫是干涉的主谋，我认为，赫鲁晓夫的威望在下降，而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威望在上升。

飞机上宣布我们飞近莫斯科了，远处可以看到莫斯科的灯光。我开始整理我从贝尔格莱德一直到这里所写的东西。事件就这样积聚起来，我从贝尔格莱德回来时所带回的新的和复杂的问题，比对我十来天前从这里前往贝尔格莱德时带去的问题的回答还要多得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莫斯科。

俄国人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在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保护匈牙利“反革命首领”。显然，问题不仅仅在于他们打算同躲进我们大使馆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一批朋友们算账，而且在于要在这件事情上尽量搞臭南斯拉夫。他们似乎认为，南斯拉夫没有摆脱目前局势的出路。他们决定，如果我们不把纳吉·伊姆雷和别的人交给他们，他们就诬陷南斯拉夫是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如果我们把纳吉等人交出去，那么俄国人又会把我们说成是一个说话不算数，谁都不应指望的国家。

在布里俄尼时，他们比棉花还要软。我们出于善良的愿望，努力帮助他们减轻困难，至少为了俄国人和匈牙利人以及我们大家的利益减少匈牙利的流血事件而建议的一切，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立即加以接受。现在这一切对他们有妨碍了，他们似乎全都否认了。我们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说，苏联外交部官员的举止显得似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根本没有去过布里俄尼，似乎根本不存在本应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件事。

俄国人在准备对匈牙利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同时，在莫斯科接待了东方、西方以及中立世界的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看来，最近谁愿意前来作客，他们都予接待。阿富汗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代表团，关于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的消息，叙利亚代表团，比利时最高级代表的到来，这一切对俄国人来说来得正是时候，使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在自己最高级代表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应当遵循的种种原则。据说，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是遵循这些原则的。因此，俄国人现在十分强调这样一些原则：国家的主权和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尊重，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是这里过去几天宣布和庄严地签了字的，同时他们却在完成用武力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最后准备，而不论那里象西方说的，发生了革命，或者象俄国人说的，发生了反革命。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俄国人努力使西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难于因为苏联对匈牙利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而攻击苏联。然而，不是俄国的外交，而是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侵略，在削弱西方就匈牙利事件一致行动上起了主要作用。英法的这一冒险甚至在这里的西方外交人士中也得不到支持，我常常听到他们大声谴责法国和英国的这一步骤。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

葛罗米柯昨天于凌晨一点把我们的代办博若维奇叫去，进行紧急通报。形势之紧急还可以从外交部象斯大林时期那样彻夜工作这一点上看出来。这样一来，在莫斯科形成了不平常的气氛。葛罗米柯向我们的代表通报如下：

赫鲁晓夫昨天给铁托总统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苏联对中东局势的态度。信中提到苏联政府总理布尔加宁就对埃及的侵略一事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安·艾登和居伊·摩勒以及以色列政府总理本—古里安的一份文件。还告诉他，谢皮洛夫给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一封类似的信。莫斯科电台在我们代办前往外交部时已开始发表这两个文件。

葛罗米柯最后才对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发表意见。说苏联政府在信中呼吁美国政府“共同使用军事力量，采取行动反对侵略者和保卫埃及”！苏联的信说，美国在地中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葛罗米柯在结束这一部分讲话时说，苏联在南方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和其他的力量，通过采取共同的行动，可以制止侵略。

葛罗米柯竭力给人留下尽可能坚定的印象，因为形势是严重的。有好几个外国大使在外交部里“排队等候”在凌晨时分向他们通报这同一内容。大多数外国大使是从梦中被叫醒的，在午夜过后赶到外交部的。这是为了使苏联政府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然，俄国人指望南斯拉夫政府不仅对于苏联在苏伊士问题上的态度，而且对于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吸取教训。在我们之间，在苏伊士问题上没有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相接近的，而在匈牙利问题上则有争论，在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军事干涉，纳吉·伊姆雷、他的残存的政府和其他匈牙利人躲进我们使馆大楼之后，则更其如此了。

* * *

尽管今天是苏联国庆，我要求赫鲁晓夫接见我，虽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在今天要求这样的会晤。赫鲁晓夫在十八点接见了，这可能意味着，他有兴趣尽早见到我。尽管我没有说我要求接见的理由，不难猜测是为了匈牙利，说得比较确切些，是为了试图解决在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得到避难的纳吉·伊姆雷和其他匈牙利人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负有政治性质和道义性质的义务，我们必须说话算数。最后，我们的行动符合我们在布里俄尼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谈话的精神。关于这一点，铁托已经给赫鲁晓夫写了信，在我看来，赫鲁晓夫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事情去。

在克里姆林宫里，在正准备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苏联国庆——十月革命节的格奥尔基大厅附近，赫鲁晓夫身穿黑色服装，佩戴只在隆重场合才佩戴的两枚金星^①，又同马林科夫一起接见了。我们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谈话。在这段时间里，讲话最多的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说得很少。我不得不反击赫鲁晓夫的某些攻击。

赫鲁晓夫开始时谈到埃及和西方强国。他说，索波列夫刚才从纽约报告说，英国和法国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组织和哈马舍尔德，今晚午夜在埃及领土上实行停火。这是苏联前天向西方三个强国采取坚决步骤的直接结果。阿拉伯人看到，谁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护他们。俄国人收到了纳赛尔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令人感动的。纳赛尔说，现在这一代阿拉伯人将告诉后代，苏联如何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护了他们。

赫鲁晓夫说，他们收到了艾登和摩勒的内容相同的答复。艾

^① 按指列宁勋章。——译者

登说，苏联的去文是极其侮辱人的，在别的情况下将退回苏联政府，但是现在处于严重关头，英国人不计较这一点。土耳其人曾下令自己的防空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考虑到苏联的火箭技术装备，这是可笑的。赫鲁晓夫接着说，美国的作用也被揭露了，美国据说是反对侵略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结果发现美国原来是西方侵略计划的合谋者。西方的失败是彻底的。赫鲁晓夫最后说，纳赛尔保留下来了，阿拉伯人的力量在经过法国人和英国人这场白痴式的战争以后将变得更为强大。赫鲁晓夫就上面这个问题讲了十至十五分钟，好象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来拜会似的。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匈牙利。他说，一切进行得比他们原来预料的还要快、还要好。在布达佩斯，除了两、三个据点以外，一天就全部镇压下去了。这里早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从布里俄尼返回莫斯科之前就制订了整个行动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卡达尔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现在将扩大和巩固政府。明尼赫说，这是匈牙利第一届没有犹太人的政府。东德报告说，苏联的计划在那里受到极大的欢迎，一切可能引起不安的情况，都一扫而光。赫鲁晓夫说，他们打电话，通知了尤金，而尤金又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召开了中共政治局会议并邀请尤金，让他向他们全体介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人向俄国人发了贺电。

赫鲁晓夫故意避而不提主要问题：纳吉和其他人的命运。他转而谈到战时的一些趣闻，同时必不可少地谈到斯大林，在我看来，谈话将就此结束。我谈到，我今天在外交部获悉他们对我们就匈牙利问题的来信的答复。我本人的印象是，他们这样的答复不解决围绕纳吉和其他人的避难所产生的问题，使我们大家都难于从匈牙利事件脱身。我简短地重述了铁托、卡达尔和兰科维奇十一月五日致赫鲁晓夫的信的主要内容。

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他到这时为止在谈到苏联在匈牙利和埃

及取得伟大胜利时所用的友好的语调。他重申了他们十一月七日答复中的论点，最后大致谈到以下各点：

——现在一切都成问题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今后是否将友好地得到发展，或者是相反，取决于南斯拉夫对解决纳吉问题的态度。

——对于不交出纳吉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组织者，苏联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只能认为他们以前也都是按照南斯拉夫的指导办的，南斯拉夫要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纳吉和其他人的问题是我们和匈牙利人的问题，但是俄国人也不是不相干，他向我谈到他们俄国人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说这是苏共中央领导的统一的想法，苏共中央领导深入地研究了整个这件事。

——赫鲁晓夫避免谈到最近的布里俄尼会谈，只是说，我们在那里象共产党人那样就所有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在拯救反革命首领的问题上又怎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援引了铁托同志所说的有关纳吉的坏话。他提到兰科维奇所说的有关洛松齐的好话，然而，洛松齐却表明是主要匪徒之一。他说，他们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揭露拉科西的建议，称他为“匪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断然重申，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成问题了，因为苏联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为拯救反革命首领而作的努力。纳吉·伊姆雷没有发表过正面的讲话，直到最后一分钟还通过电台号召同俄国人作斗争，随后就躲进了我们的大使馆。赫鲁晓夫最后说，这是为了什么？或许是想组成一个对抗卡达尔政府的新政府，是这么回事吧？

我在回答中列举如下事实：

让纳吉和其他人在我们大使馆避难是我们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就减少纳吉政府的反抗是可取的这一点所达成的共同意见合乎逻辑的继续。纳吉没有发表辞职声明，这是他的事，但是纳吉政

府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之时起实际上就消失了，这是有益的，是有助于卡达尔和俄国人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匈牙利人和南斯拉夫人，以及全世界都可证明，这样一来方便了新政府。

至于说南斯拉夫要对匈牙利事件负责，因为它向纳吉和其他人提供了避难所，因此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想法，我说，我本人不相信苏联公民或者其他什么人会相信南斯拉夫要负某种责任。如果要探究，到底谁要对匈牙利事件负责，南斯拉夫是问心无愧的，我相信，我们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比较确切地来断定谁要对匈牙利事件负责，如果现在希望这么做的话。

赫鲁晓夫打断我的话说，他没有必要害怕我，我也没有必要害怕他，我们应当象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那样，而不应当象民族主义者那样谈话。

我回答说，我们在布里俄尼就对这些人的行动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现在确实在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但是说他们受我们的领导是不对的。我可以理解，形势在迅速变化，星期五，十一月二日至三日夜间看上去还很好，到了现在，星期三，十一月七日，就不那么好了。我也理解，卡达尔的处境是微妙的，但是他们也该理解我们。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对于这个国家的元首，向这些人表示了承诺和提供栖身之所，不让他们进行任何活动，从而帮助新的革命政府，而现在又食言，把这些人交出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赫鲁晓夫重申，他不理解保护反革命阴谋家的共产主义道德。

谈话中，赫鲁晓夫用威胁性的语调谈到，如果他们明天在这里宣布，匈牙利反革命的首领们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找到了栖身之所，那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也可以公布，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没有见不得人的意图。

谈话期间，马林科夫曾外出到前面一个房间，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其他人都在那里。他很少参加谈话。他一再说明，我们在布里埃尼对所有问题都是意见一致的，他温和地支持赫鲁晓夫，补充他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谈到斯大林问题现在在匈牙利也终于解决了，他们已经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如何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苏联人那里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流了血。赫鲁晓夫想表明，我们的关系将受到多大的损害，他提醒我，我们生活在激荡的战争的时期，流了血，等等。

在我们的谈话结束后立即开始举行的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我同主席团委员们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对于为数不多的各国大使很殷勤，西方的所有代表都抵制这次招待会。我接着同布尔加宁谈了话，他问我，同赫鲁晓夫的谈话进行得如何，因为他不了解。我简短地向他谈了谈，而他表示有保留；我的有些论点，他默认了，他一再说明，应该巩固而不是破坏卡达尔政府的威信。

我认为，应当同卡达尔联系上并提出上述这个问题。我的印象是，俄国人会十分强硬，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现在不可能脱身了。我们要么把所有难民都交出去，从而在世界上大丢脸，在匈牙利事件上扮演肮脏的角色，要么冒同苏联和其他国家发生新冲突的风险，而且是作为纳吉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人——俄国人就想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莫斯科。

或许是为了让我知道，我们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特殊关系，尽管到三天以前还存在这样的关系，现在一切都经由正常的外交渠道交涉，谢皮洛夫部长的一位助理帕托利切夫约见我。帕托利切夫在十一月七日国庆节这一天约见我，这是很不寻常的，只有在局势反

常时才这么做。这次会见的直接目的很可能在于在我下午去见赫鲁晓夫之前正式通知我，他们对于铁托十一月五日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写的信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我们的信，除铁托外，还有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两位同志签名，是给赫鲁晓夫本人的。很可能他们认为这样更好一些，有助于解决纳吉事件。看来，南斯拉夫三名最负责的人签署我们的信也没有多大助益，因为是帕托利切夫在外交部向我宣读苏联的答复的！

帕托利切夫向我宣读了这一“新闻”以后就说，谢皮洛夫约见我。很清楚，苏方这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帕托利切夫对我说，谢皮洛夫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从桌旁站起来，向我伸出手，这样就使我没法说什么，他的借口是苏联外长紧急约见我。这样的谈话技巧真不坏！我到莫斯科后，在苏联外交部第一次遇到这种手法。

我曾要求见谢皮洛夫部长，以就苏军武装进攻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和大使馆人员向苏联政府提出尖锐抗议。一辆苏联坦克在我们大使馆大楼前的广场上占据了相应的位置，随后完全无端地和突然地用机枪向我们大使馆底层的窗户扫射，底层当时有好几个人。我们大使馆的秘书米洛万诺夫在自己的工作桌旁当场被打死。俄国人用这种办法对我们和对匈牙利难民施加粗暴的压力。此外，俄国人的目的在于把大使馆大楼搞得无法生活。

谢皮洛夫不接受我们的抗议，尽管事情是一清二楚的：俄国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挑衅，用机枪开了火，打死了在大使馆大楼里的我们的外交官。谢皮洛夫甚至没有向我表示一下遗憾。他对事件提出了苏联的一套完全是假的说法，说什么在封锁我们大使馆的苏联坦克附近爆炸了一枚炸弹，俄国坦克在发生了这一爆炸之后才“朝着使之受到威胁的方向”，也即朝着南斯拉夫大使馆大楼开了火。

谢皮洛夫的态度十分傲慢，显得他对有关这件事的谈话十分

讨厌，从一开始起他就认为这一谈话是多余的。显然，他已奉命不接受我的抗议，苏方已经编造了谎言，说什么在苏联坦克附近爆炸了炸弹，致使苏联坦克处于“不得不防御”的处境，尽管根本没有发生过爆炸。谢皮洛夫当了大约半年时间的苏联外长，以前从来没有在苏联外交界任过职，现在要他这样粗暴地行事，似乎这是他的专长似的。

* * *

最后让我还记下这么一点：赫鲁晓夫在称纳吉为“反革命首领”的同一次讲话中，要求我们把他交给俄国人，他在向我谈到纳吉十一月三日致乔治乌—德治的信时，对同一个人作了完全不同的鉴定。赫鲁晓夫说，纳吉的信的内容是“令人震惊的”，这证明了事件把他推到表面又超越了他的一个人的孤立和绝望，他不知道怎么办，因此向德治求援，几乎是求救，赫鲁晓夫说。

在这次谈话中，赫鲁晓夫有两、三次迫使我退让，尽管我当时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赫鲁晓夫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怒气冲冲地向我提出问题：您果真这样认为？我重复了自己的回答，使用新的论点，用比较平静的方式来表达。此后，情况有所缓和，接着赫鲁晓夫又施加压力。或许他想先把我本人吓倒，然后我由于被吓倒了，从莫斯科发回令人胆颤心惊的消息，以此来吓唬贝尔格莱德其他所有人。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莫斯科。

俄国人在准备对匈牙利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时候，发表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宣言。宣言同迄今为止的类似文件相比，尤其是同莫斯科的实际作为相比，前进了一步。宣言既不是作为苏联二十大以后的政策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前发表的，而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不久，

在匈牙利事件的压力下发表的。这样一个宣言实际上起了为苏军在匈牙利进行干涉作政治准备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使莫斯科市民极为不安，虽说这里的报纸对匈牙利事件的规模的报道连接近客观都谈不上。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从上至下地向党团组织对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任何解释。就目前而论，在苏联报纸上只能找到几条短消息，谈到“反革命分子”试图制造混乱，谈到他们遭到失败。鉴于苏联宣传工具不报道其他任何消息，许多人就收听外国电台，包括收听“美国之音”。苏联报纸对匈牙利事件越是沉默，人们收听得就越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

每当东西方关系尖锐化，苏联和阵营就照例进一步加强内部纪律，在各个生活领域内加强“磐石般的团结”。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丝毫动摇可言的，通过讲话和报纸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外国公开地了解了这一点。《真理报》最近的一个行动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苏联的政治观点眼下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该报停止了较长时间以后，又宣传起恩维尔·霍查这样的阵营国家里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代表人物来了。这也是一个迹象，表明主席团现在采取反对非斯大林化政策的态度，因此俄国人眼下需要这样的作者和他的文章。

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方面，这里的西方人士散布捉摸不定的情绪。对于匈牙利和埃及所发生的事件最感失望的个别人谈到应当卷铺盖从这里回家，说在莫斯科已经没有事情可做了！我的印象是，西方现在对于反对埃及的不成功的战争，对于西方所显露出来的四分五裂，正在彼此埋怨。在西方三大强国中，两个参与了反对埃及的战争，关于西方的团结，根本谈不上。在匈牙利和埃及这两件事情上，这种情况对于俄国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莫斯科《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从昨天起开始登载在匈牙利被吊死、被杀害的人的照片，说明说，他们是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照片底下没有受害者的名字。是些什么人？在这一点上不是很令人信服，很清楚的，而展示的场面却是很难看的，象战时我们那里的宣传画面（《黑山的地狱——共产主义》）。不能得出结论，谁杀害了谁，谁吊死了谁。我觉得，要是俄国人停止这么做，那会是一件好事。我不能向他们提任何建议，因为在这里所形成的心理状态下，这会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护匈牙利的反革命”。

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米洛万诺夫被杀害的消息，给驻这里的外交团留下了沉重的印象。许多外国代表通过书面或口头向我们表示悼念，问及米洛万诺夫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害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中间，没有人向我们表示悼念。埃及人向他表示担心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这会削弱阿拉伯人的事业，而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不能排除俄国人向他谈了对于同我们的关系的看法。如果谈了，埃及人当然是支持和赞同俄国人的。

东方人越来越远离我们。中国人比其他人好一点，尽管他们现在正处于显示俄中兄弟情谊的高潮之中。《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纸转载它所能找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莫斯科和北京是团结的，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特别是俄国人和匈牙利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应当看来是不重要的，因为同中国人的兄弟情谊补偿了这一损失。在前晚中国剧团演出时，出席观看的，除其他人之外，还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对中国演员表示欢迎的仪式变成了显示苏中友谊的不合宜的和不自然的群众大会，仪式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莫斯科。

应我的要求，赫鲁晓夫昨天，十一月十一日，星期日，接见了
我。我表示歉意，因为是休息日，星期日，之后赫鲁晓夫说，他是应
我的要求来会晤的，他本来要早一些约见我，当他获悉我要求接见
时，他不在市内。看来，赫鲁晓夫指望我带来铁托同志的新的答复，
但是我带来的却是铁托同志前一封信，十一月九日的信的原件，苏
共中央主席团对这封信已经向贝尔格莱德作了答复并建议为纳
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安排新的解决。

赫鲁晓夫向我全文宣读了他们的答复。我谈到，我认为，他们
的答复是建设性的，这件事应当通过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
中央委员会大楼谈话以后，赫鲁晓夫邀请我和我的夫人米什卡在
自己一家人范围内进午餐。我同赫鲁晓夫度过了好几个小时，谈到
许多问题。

虽然我们就匈牙利问题交谈了长时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说出
什么重要的新东西，而是重复了我们十一月七日的谈话中已经陈
述过的论点。赫鲁晓夫昨天以不同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同我
的谈话的方式对待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那次谈话是尖刻的，赫
鲁晓夫方面提出了许多公开的威胁。在谈话中，我几乎没有一点
能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他把拉科西和格罗称做“匪帮”并称卡达
尔·亚诺什为匈牙利政府首脑这一点除外。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意
见只是加强了其他问题上的总的不一致。

赫鲁晓夫指望，我们对他们的最新建议（把纳吉·伊姆雷送往
罗马尼亚）的答复能是肯定的，他认为，建议采取的折衷办法是唯
一可行的办法，认为这既使我们和他们满意，也使匈牙利人（卡达
尔）满意，而罗马尼亚人同意参加帮忙。除纳吉不能留在匈牙利外，
名单上还有洛松齐。很可能是因为俄国人认为，洛松齐同我们有
关系，他们急于把他搞臭，在卡达尔政府十一月六日的公告中谴责

他。他们提纳吉—洛松齐集团。

在谈到同西方的关系时，赫鲁晓夫说，现在冷战将恢复，但是这对苏联不是一件坏事。他们向西方表明，他们是强大而坚定的。西方是软弱和四分五裂的。俄国人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实担心苏军在欧洲可能采取比较重大的措施。只有东德的苏军部队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眼下在欧洲的力量强大。赫鲁晓夫说，这是北约的专家们说的。

赫鲁晓夫断言，在苏联最近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期间，美国人禁止北约驻欧洲的部队调动，以免刺激俄国人。苏联在阿拉伯人中间的威望，在亚洲的威望，大大增长了。英国和法国的软弱无力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伊士运河已经堵塞，西方被剥夺了石油的正常供应，这从军事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世界贸易将受到很大损失，这要归咎于英法的侵略。赫鲁晓夫说，昨天关于派遣志愿军的声明，终于吓住了西方，但是他不认为会派遣志愿军。他的结论是：苏联不想打仗，但是苏联最近对西方的军事要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赫鲁晓夫说，他们在考虑采取新的裁军行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支持这一措施以及旨在缓和现在的严重气氛的其他措施。裁军问题十分复杂，但是我设想苏联舆论是会欢迎减少以武力相威胁的任何行动的，因为眼下的局势十分严重。赫鲁晓夫说，对于这个问题，他还要考虑考虑。

纳赛尔在三国进攻以后，曾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赫鲁晓夫说，给他派了顾问。不知道有多少人，纳赛尔使用得如何。英国人特别努力于缴获埃及军队使用的未损坏的苏联军事装备，尤其是 T-54 坦克。赫鲁晓夫说，他们或许缴获到了，但是这没有多大重要意义，因为这些东西今天很快就过时。

赫鲁晓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起劲地要我相信，中苏在目前危机的所有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的和相同的。他们同中国

人进行了讨论，并就所有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从匈牙利事件起，一直到向埃及派遣志愿军的想法为止。赫鲁晓夫告诉我，他们同十月底秘密前来这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最近的一个代表团还谈到南斯拉夫，他告诉我，中国人同意俄国人的意见。我明白赫鲁晓夫的意思是说，还向中国人谈了苏联对于南斯拉夫在东欧事件中所奉行的政策和所起的作用的保留态度。赫鲁晓夫谈到中国人不同于我们，也不同于他们俄国人；中国人审慎而贤明，自搞一套，但是现在的危机使俄国人相信，中国人在所有问题上同苏联站在一起。

关于南苏关系，赫鲁晓夫开始时说，他在从布里俄尼回国途中，在飞机上曾同马林科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两人都对在布里俄尼的会谈感到满意。但是在我们之间还有十分明显的分歧和不信任。

赫鲁晓夫接着评述起我们的领导人来了。

赫鲁晓夫和这里的其他人始终认为评述我们的领导人是他们的权利并津津乐道于此。当牵涉到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对其他国家和其他党的人作出评定这种做法是一个特殊问题。赫鲁晓夫在提到我们外交部的某些领导人时，挥了挥手，说他们完全是“亲西方的”，不值得一说。在他看来，我们的外交干部多数是“亲西方的”和“反苏的”，他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涉及身居最敏感的岗位的大批人。我向他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次了，但是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了让我相信，他向我念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扎鲁宾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我们的大使马特斯抵制苏联十一月七日的招待会。赫鲁晓夫认为我们的报纸不好，特别是对苏联的态度不好，还认为我们的报纸没有朝好的方向改变，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了。

对于这一点，我向赫鲁晓夫谈到，人民民主国家和某些共产党

就匈牙利事件反对南斯拉夫到底干了些什么。我提到《真理报》十一月八日发表的恩维尔·霍查的文章，并引述了其中最恶劣的一些段落。我提到在法共的卵翼下在巴黎组织的反南报告会。赫鲁晓夫丝毫不感到意外，看来，这一切他都知道，也就是说，未经他们同意，这一切也不会发生。他说，他们这里，在党内也有人认为，二十大要对这样的事态发展负责。混乱到了什么地步：赫鲁晓夫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却同意同一些人士对我们提出的类似的指责！赫鲁晓夫说，这样的现象首先存在于苏军中。他在二十大上批判地，也即只从反面谈到斯大林。中央委员会六月三十日的决议作了补充，谈到了肯定的方面，而现在，十二月全会将更加明确和“比较客观地”论述整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可以预期会变得更糟）。

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他们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除西方外，唯有我们使用这样的提法：斯大林主义和非斯大林化。我们还在冲突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的一套措词，而现在还在用这样的措词，这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必然会产生不好的后果。最后，连我们南斯拉夫也没有象我们自吹自擂的那样，有那么多民主和权力下放。我们说在南斯拉夫新闻是自由的，而每当我们需要时，我们很容易让报纸写政府想写的东西。思想自由也是这么回事。赫鲁晓夫说，“你们很好地解决了吉拉斯事件，我们只能向你们表示祝贺。”

他长时间谈到中国人，他说，中国人的做法同俄国人不同，但是也不同于我们。中国人不自吹自擂，也不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别人，而我们南斯拉夫人却这么做，中国人还不谴责俄国人这么做，而我们却老是这么谴责。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亲西方的。战前，南斯拉夫就以属于西方而自为荣，战后，由于我们之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事件，一九四八年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了。

我第一次从赫鲁晓夫那里听到这样的意见和评价。我的印象是，他深信自己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真诚地提出他真实的想法。他带点苦恼地几次谈到我们的两个提法：“非斯大林化”和“斯大林主义”；说我们想用我们南斯拉夫的标准来衡量东方的一切。我说，我们不向任何人强加任何东西。有人援引我们的话，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他们如何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的事，但是我认为，尽管出了匈牙利事件和其他事件，最成功的政策还是他们在二十大上通过他的两个报告作为新政策宣告的那种政策。

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听着我说。对于匈牙利，他默认了，没有提到反革命，也没有提到帝国主义者。当我提到二十大和他的报告，赫鲁晓夫勉为其难地说，他们那里“有人认为，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怪新决议”。他还说，他们在苏联“有八百万共产党员，只是要是全都是共产党员就好了”。

谈话中一度提到保加利亚，赫鲁晓夫说，格奥尔基·赞科夫在这里。他要求援助，因为保加利亚大约有十万人失业。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俄国人义务援助，但是如何援助？——赫鲁晓夫问道。他们可以向保加利亚人提出，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或者长期定居，去兴建工厂或者开垦“处女地”。他说，“别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把莫斯科或者基辅给他们，因为在那里我们自己也有许多问题”（指有许多贫穷的人）。

一度，赫鲁晓夫给人留下了他是一个有许多事要操心，面临巨大困难的人这样一种印象。

铁托十一月十一日在 普拉发表演说

苏联发表裁军宣言。对铁托的普拉演说的反应。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谈话。在我们大使馆大楼前，午夜过后，在汽车里同赫鲁晓夫继续谈话。苏联领导回答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政府就使处于避难中的纳吉·伊姆雷获得自由一事达成协议。苏军抢走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并把他们带走，去向不明。南斯拉夫同苏联的新的公开冲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莫斯科。

在十一月十一日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曾向我谈到，苏联政府在考虑在裁军方面采取某种新的主动行动。今天，这次谈话过了四天，部长助理瓦·佐林约我去外交部，他把给我国政府的一份苏联政府关于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宣言交给了我。宣言跟苏联所有类似文件一样，写得很长。我认为，在世界上，这一宣言将被认为是苏联方面的宣传。即便如此，我认为，宣言还是会引起某种注意，尤其是因为俄国人通过这一宣言预告了不同于他们近来实际上所奉行的那种政策的另一种政策。

* * *

从我同赫鲁晓夫谈及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的命运以来，快过去十天时间了。谈话后，赫鲁晓夫改变了态度。不再在纳吉

问题上进一步发生冲突，而于十一月十一日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在几个小时内，对我和我的夫人很殷勤。对于纳吉·伊姆雷，连提也没有提到。

根据这里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能够判明的——我们得出结论，现领导在国内将进一步加强党的路线并进一步使同国外的关系冷淡下来。可以预料，二十大的路线将蒙受新的损害和损失，因为现在又加上了匈牙利这个新包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莫斯科。

这里的一些外交代表，大部分是西方的，但是也有某些东方的，向我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的权威的文本。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文本，不论是用我们的文字刊印的，还是用外文刊印的。我早在十一月十一日，在我去赫鲁晓夫家吃晚饭那一天，就听说铁托发表了演说。俄国人本来就多疑，不相信别人，现在会指责我搞两面派，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不仅知道铁托要讲些什么和在什么时候讲，而且我还从这里设法对普拉演说的内容施加影响。而我们大使馆却直到今天，十一月十七日，还没有拿到演说！我听说，演说谈到南斯拉夫对最迫切的一些问题的态度，详细地谈到匈牙利事件，批判地谈到苏联的政策。关于所有这些事情，最近几天我曾跟赫鲁晓夫多次谈到。此公会认为，这是我们对近来向我所谈的一切的答复。或许他会指责我，说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因为演说对苏联显然是完全不利的。要是演说是另一种调子，西方人就不会竭力想得到了。

大使馆的同志们中间，有人给贝尔格莱德打了电话，他被告知，南斯拉夫报纸昨天刊登了铁托的演说。演说是一周以前发表的，报纸昨天才刊登，这也有某种原因。如果俄国人 not 扣压我们的报纸，后天我们将得到演说。我们将向各国大使散发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文的演说，跟往常一样，贝尔格莱德不会给我们寄来法文本和英文本，而这里的外交团里，谁都不讲我们的语言。

到现在为止，俄国人没有吭声。报纸甚至没有报道铁托在普拉发表了演说。今天我将去克里姆林宫，出席俄国人为哥穆尔卡和其他波兰人举办的招待会，将会看到在演说问题上会同俄国人发生什么情况。

* * *

在克里姆林宫为波兰人举办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时攻击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对埃及的强盗般的袭击，讲了这番话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大使们示威性地“列队”离开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持续的两个小时期间，在俄国人中间，不仅主席团中，而且还有其他人，没有一个人想同我和我的夫人握手或者打招呼。招待会结束时，在格奥尔基大厅的出口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遇见了我。赫鲁晓夫没有打招呼就说，他们想同我谈一谈。我们一起回到了空荡荡的大厅里。我们在那里在墙边站着，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的夫人一个人坐着，在大厅里等着。随后赫鲁晓夫建议我们走到隔壁房里去坐下谈，避开望着我们的那些人的目光，他们感到奇怪，我们怎么进行那么长时间的激烈的谈话。在隔壁的房间里，我们又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谈话由赫鲁晓夫主讲，布尔加宁常常很尖锐地插话。莫洛托夫插话少，而且平心静气，他的讲话在这次不平常的谈话中是最温和的。

赫鲁晓夫开始时说，铁托同志对苏联的攻击使他们感到十分意外。“公开把我们叫做斯大林分子，说苏联的问题不是‘个人迷信’，而是苏联的制度就是这样的，是斯大林主义的。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毫无变化，整个苏联受到攻击。除了我们的敌人外，谁需要这种说法呢？”赫鲁晓夫接着说，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尤其是

发生在铁托同志十一月九日关于纳吉·伊姆雷问题的信之后，这封信是同志式的和友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子，全都改变了，铁托公开地在全世界面前攻击和谴责我们。赫鲁晓夫用十分郑重其事的语调说，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是他们触发冲突的，而是我们。赫鲁晓夫给人的印象是，发生了某种很坏和出乎意料的事。^①

① 《战斗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用两版版面刊登了铁托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军队之家发表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关于匈牙利事件，谈到：

“我们看到，对于其他国家，这件事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苏联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抱有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对于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的关系有过某种错误的和有缺点的看法。不过，我们对于这一点并不看得很悲观，因为我们看到，这不是整个苏联领导的态度，而只是一部分人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强使另一部分人接受这种态度。我们看到，这种态度是那些过去一般来说是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而且现在仍旧站在这种立场上的人们所强加于人的。……”

“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起义，在这场起义中，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自己事与愿违地同各种反动分子站在一起了。反动分子混在这场起义中，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有人问，苏联的干涉是否有必要？第一次干涉是不必要的。应格罗的请求而进行的第一次干涉是绝对错误的。……”

“我必须说，匈牙利境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那里显然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在这种屠杀和内战中，社会主义可能被彻底埋葬，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因而爆发。……”

“……我们始终要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军事力量。可是现在在哪一种的坏处比较少一些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在那里的苏军的干涉？前者是一次大灾难，后者是一个错误。当然，假如那样能拯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么，同志们，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军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假如他们该做的事早一点做了，那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军事干涉。发生这一错误是由于他们令人遗憾地总是认为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军事力量并不解决一切问题。看吧，赤手空拳的人民抱定争取解放和独立的宗旨的时候，会怎样作出猛烈的反抗。他们已经不再在乎这将是怎样的独立，也不在乎资产阶级和反动制度是否会在国内复辟，他们所在乎的只是保持民族独立。在人民中间占优势的就是这种想法。当然，我现在只能这样说，第一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中最糟糕不过的情况了，而第二种情况——苏军的干涉——也同样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它能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保全，也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保障世界和平，那么有朝一日这将成为一件好事情，但是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静下来以后，苏军务必撤出去。”

布尔加宁咄咄逼人，还污辱人。他立即转到我们过去发生争吵和关系不好时期的众所周知的措词和“论点”上。他说：现在你们可以指望美国人的贷款了，他们对于你们所做的一切，会表示欢迎的。“铁托同志在讲话中两次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没有用‘同志’这个词。这是公开的凌辱，苏联任何人都不会有别的看法，只会把这看成是公开的侮辱。”他说，铁托称他们为斯大林分子，这就是说，我们想把他们今天所反对的过去的一切坏事全推到他们身上。布尔加宁不能自制，他说，我们这么做是指责他们要对逮捕和枪杀负责，而我们在南斯拉夫就逮捕了数以万计的赞成情报局的共产党人。布尔加宁对我说，“你们还枪杀共产党人”，他由于对我们极其恼怒，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所说的话。

莫洛托夫保持沉默，只是不时地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所说的话表示支持。他们开始计算，我们之间重建友好关系以来，过去了多少个月，这种关系现在结束了。他们说，他们必须对铁托公开的攻击作答。他们不打算在国家方面改变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但是在党的方面，他们说，是我们改变了关系。

赫鲁晓夫说，本来可以采取其他任何形式，写信或者类似的方式，而不是发表正在全世界传播的公开演说。赫鲁晓夫说，登有铁托演说的南斯拉夫报纸明天将在这里，在莫斯科出售。我们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是同我们共同的党的宣言背道而驰的。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将感到满意，鉴于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陷入了严重的局面，那就更其如此了。他们提到了我们最近用外汇向美国买到的一百万吨小麦。

赫鲁晓夫说，他们决不会同意我们对斯大林的意见，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扔进了垃圾桶。苏联今天的实力的基础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奠定的，他们对自己的这一段历史感到自豪。斯大林所做的坏事，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今天受到这

样的攻击时，会保持沉默。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说。赫鲁晓夫说，整篇演说他还没有看。布尔加宁说，他看了。在谈话的前半部分，他最激烈。

我说，我没有演说稿，但是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了。我的印象是，铁托同志的演说是建设性的，并不意味着要中断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演说公开地谈到匈牙利的灾难的原因，我认为，如果我们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为未来吸取教训的话，这只会是有益的。

至于美国的小麦，确实我们根据美国和我们的法律将得到一定数量的美国小麦，但是，我们吃的是我们南斯拉夫的面包。我们在这个场合，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是可悲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以前在布里俄尼，后来六月份又在这里，在莫斯科，同他们谈过。当时我们一致同意，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而现在我却听说，他们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问，铁托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奉什么为指南的。我说，我身在这里，在莫斯科，演说我还没有得到（布尔加宁插话说，“明天你会从《战斗报》上得到的”），但是我认为，在他看来是有当真的理由的。首先是匈牙利。铁托有责任把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告诉我国人民，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这场灾难都是一次失败。对于这一点，他们中谁也没有说什么。此外，在东欧各国党里以及在其他党里，一直盛传我们南斯拉夫人要对匈牙利的悲剧负责。我们又见到了恩维尔·霍查的反南文章，这一回的责任要由苏共中央来负，因为他的文章发表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法共和其他党，跟过去一样，又重新发表反对我们的类似言论。

这三个人，相互补充，互相插话。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回答攻击你们的恩维尔·霍查、法国人和其他人，而是铁托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是斯大林主义制度。布尔加宁说，如果我们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那么，铁托为什么又干涉他们的内政，把他们叫做

斯大林分子，把苏联的制度称做官僚制度等。布尔加宁接着以嘲笑的口吻谈到铁托演说中的一些用词：恩维尔·霍查分子、拉科西分子、斯大林分子。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谴责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布尔加宁问我，我是否知道什么是大国沙文主义，并说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就采取这样的立场。赫鲁晓夫谈到我们反对各国共产党中的垄断主义，而自己却谋求垄断地位，因为我们公开谴责不符合我们南斯拉夫人心意的一切人。赫鲁晓夫叙述说，泰波曾如何嘲笑地谈到阿尔巴尼亚党，这使俄国人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看法。

我对布尔加宁说，我对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概念。我提醒他，我们南斯拉夫在战争和我们革命时期以及战后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我们有自己的直接的经验，我们懂得什么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霸权主义民族，我们很容易识别这样的现象。要是我们是另一副样子，南斯拉夫就不可能经受住最近十五年来所经受的种种考验。我转向赫鲁晓夫说，如果说泰波在某个具体场合嘲笑了恩维尔·霍查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什么灾难。泰波也做过完全相反的姿态，去年他在这里，在莫斯科曾同恩维尔·霍查亲吻，我认为，没有必要根据这些姿态得出深远的政治结论。

布尔加宁一定要我回答他，既然我们反对干涉，那么铁托同志为什么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对谁有用。我对他说，铁托没有干涉他们的内政，而是谈到同南斯拉夫有极大关系的严重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后果。

赫鲁晓夫说——我闹不清，这是第几次了——他们将回击这一攻击，随后我们又将回击他们，其他的因素也会牵涉进来，谁知道结局会是怎么样的。他们没有料到铁托同志会发表这个演说。他们知道，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举行的会议是专门召开的，这就是

说，我们决心这样行动。布尔加宁说，后果将很糟，但是责任不在于他们，是我们违反了莫斯科宣言。我指出，宣言通过后，他们就违反了宣言。他们诧异地问道，他们如何违反了宣言？在什么时候违反了宣言？我提醒他们注意他们主席团今年夏天的秘密信。出现了一阵不愉快的沉默。赫鲁晓夫问道，我们是否拿到了这封信。我回答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寄给我们，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拿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莫斯科。（续前）

我跟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告辞，赫鲁晓夫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提出要用自己的车把我的夫人和我送回我们使馆。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夫人只身一人坐在离相当远的一张桌子旁。她跟我说，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问这一切会如何收场。

我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我没有提到我的司机还在克里姆林宫里等着我）。从克里姆林宫到我们使馆，汽车在僻静的莫斯科街道上行驶，在汽车里的第一部分的谈话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内容。在我们后面跟着一辆或者两辆国家保安机关的汽车，我们在南斯拉夫使馆所在的面包巷二十一号门前停了下来。米什卡向赫鲁晓夫告辞，邀请他进屋喝杯茶，外面很冷，气温是零下十度。赫鲁晓夫表示感谢，把我留在汽车里，又重新开始谈话，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发现，伴送我们的不止一辆国家保安机关的汽车，这些汽车停靠在我们的前后，使面包巷里的交通全部为之中断。

午夜早已过了，我们仍然继续在汽车里进行这番不同寻常的谈话。赫鲁晓夫继续谈下去。坐在把我们同司机隔开的玻璃栅后面，这使司机什么都听不见，赫鲁晓夫多次问道——他大声地说，若有所思——铁托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赫鲁晓夫再次谈到，他本人如何致力于重建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追述了一九五四年起直到现在的有关这方面的重大事件。接

着他谈到，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不得不在主席团里投票赞成公开回答我们，从而又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揭开一场新的冲突。赫鲁晓夫心情激动，相当苦恼地对我说：“要是你们知道，我在南斯拉夫和克里米亚的会谈之后提出了怎样一份书面报告，我指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积极发展，那就好了。”

我问他们打算如何回答，对此，赫鲁晓夫说，他们还要商量，是由中央委员会来回答，还是由《真理报》编辑部来回答，或者采用别的方式。赫鲁晓夫说，争吵一旦开始，是很难加以限制和使它停下来的，他重申：由此将带来巨大损害，西方人已经兴高采烈。我说，他们感到高兴不是由于铁托发表了这样一篇演说，而是由于他们指望我们之间发生新的冲突。因此十分重要，他们将作什么样的回答，西方是否有理由感到高兴取决于他们的回答的性质。我说，如果讨论保留在共产党人之间提出原则性看法，甚至提出分歧的范围内，西方就不会有多少理由感到高兴。我们之间过去的冲突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赫鲁晓夫很现实，他重申，争吵和争论一旦开始，那是很难控制和限制的。

我相信，他们会公布，纳吉·伊姆雷在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他们问我，关于这件事，我们方面是否有什么回答。我说，我没有收到，我认为，最好是纳吉和其他人能够自由地回自己的家，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同意。

特别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铁托同志把他们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要是南斯拉夫任何别的人这么做，那还好说得更多。赫鲁晓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例如莫沙·皮雅杰和科查·波波维奇依然用老的眼光看待苏联。赫鲁晓夫说，费林格^①

^① 兹德尼克·费林格，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外交界任职，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在复兴的捷克斯洛伐克任政府总理。自一九五三年起任议会主席。

亲口对他说，莫沙·皮雅杰曾建议费林格在关于南斯拉夫的讲话中不要强调苏联在最近的这次大战中在欧洲起了解放者的作用。我说，莫沙·皮雅杰对苏联的友情不同于费林格，比费林格更深厚。我发表了一番议论，说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最好的方针是说南斯拉夫的坏话，向俄国人告发南斯拉夫人，从而赢得苏联的信任。他们在这里提出的反对我们的证据，被认为是证明他们忠于苏联的明证。这种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和具有破坏性的。赫鲁晓夫表示不同意。

赫鲁晓夫谈到，我们和他们对人的看法不同。因此，契尔文科夫留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中，他们是感到满意的，而我们不满意。他还以同样的方式提到乌布利希。我发表议论说，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位领导人在人民中间享有的威望。我认为，要对这十年来所干下的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负责的人，是难于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的。任何新政策不可能经由他们来贯彻执行。

鉴于在主要话题上谁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赫鲁晓夫问我对他们的裁军宣言有什么看法，十一月十一日我到 he 家里作客时，他曾跟我谈起过这份宣言，这样一来，在汽车里进行的这番谈话又继续下去。我说，从一开始起，我就认为裁军宣言是件好事，虽然我认为，现在不必指望会取得某种实际的结果。我表示反对恢复冷战。赫鲁晓夫这时表示同意，尽管他十一月十一日对我说，冷战将恢复，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坏事。

我把我同法国大使德让的谈话告诉了他。法国人对我说，苏联在妨碍法国体面地摆脱埃及之战，问题在于要寻找纳赛尔和其他人都能接受的出路。赫鲁晓夫仔细地听着。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波兰人举行招待会，赫鲁晓夫发表了讲话，据普遍认为，这篇讲话比他昨天在克里姆林宫的讲话要温和得多。赫鲁晓夫当然为

苏联的政策辩护,但是他又说,纳赛尔是民族英雄,但他在埃及逮捕共产党人,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对埃及的态度是客观的,不论有多大的差别。他还谈到应当找到摆脱严重局势的共同的、正当的出路。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在汽车里的谈话也是起了作用的。

有的时候,气氛是很不友好的。不幸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只有在争吵的时候,才能同俄国人真心实意地谈话。昨晚双方就是这样。我认为,我的某些理由还是起了作用。俄国人的处境确实不妙,同南斯拉夫发生新的冲突,现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使得总的局势更趋复杂,尤其是在阵营各国里。我认为他们对铁托普拉演说最初的回答会是温和的,尽管他们受到很大的冲击。

耐人寻味的是,赫鲁晓夫认为,他们现在,在他们预料会发生新的冲突的前夕,在政治上要比一九四八年时强大。我得到的印象是,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张立即回答我们,而且尖锐地回答。但是被采纳的意见却认为,应当比较心平气和地,在作了扎实的准备之后,再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这番话结束了我迄今同赫鲁晓夫进行的或许是最不平常的这次谈话。比谈话本身的内容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进行这次谈话的那种戏剧性的环境:在街上,在我们使馆大楼前面,在汽车里,在零下十度左右的气温下,在午夜过后。这种不平常的环境也表明,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在这里是多么难于接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

在今天的《真理报》上,俄国人回答了铁托同志在普拉的演说。他们未加渲染,仅限于在报纸的第二版上发表一篇大约两百行字的文章。他们把文章处理得象是塔斯社记者发自贝尔格莱德的一

篇报道，因此《真理报》的文章没有署名。文章援引了《战斗报》十一月十六日刊登的铁托的演说。尽管他们竭力使这看上去象是一篇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似乎《真理报》的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事实上，俄国人的回答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草拟的，这是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会见时告诉我的。由《真理报》，也即由匿名的塔斯社记者作答，就官方级别而论，这是这里所能设想的最温和的办法了。俄国人很可能会解释说，他们使用这样的调子，是为了在目前不使事情更趋紧张。然而，可以预料，俄国方面还会作出回答，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会讨论这个问题，这取决于今后十至十五天的事态的发展。《真理报》今天的回答足于使人看清楚，苏共领导将朝着什么方向为自己辩护，也即朝着什么方向对南斯拉夫提出指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昨天七点半时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向他宣读了我们领导的电报，作为对铁托同志普拉演说的某种说明，我给他留下了俄文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抄本。

在宣读的时候，赫鲁晓夫三次打断我，虽说电报很短。看来，他想吵架。当我宣读到我们中央指责苏联领导人把我们分做“亲苏派”和“反苏派”时，赫鲁晓夫说，只有他本人这么做，别人都不这么做，他现在仍然这样看，将来也这样看。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他们这里也好，我们那里也好，都是如此。他强调，只有他真诚地谈出了这一看法，而现在我们用来当作反对苏联领导的论据。

赫鲁晓夫还谈到苏共中央关于铁托访问的秘密信，我在最近一次谈话时曾提到过这封信。他说，他们做得对，因为他们对我们有保留，而现在铁托的言论最有力地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的秘密信本来是可以给我们的，主席团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决定不给。信里实质上没有什么六月份就党的宣言在莫斯科谈

判期间没有对我说过的东西。秘密信里唯一的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是对布尔加宁的批评（说铁托是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同意这一批评，是他提出这一批评的。赫鲁晓夫说，要是他不提出，别的什么人就会提出。

鉴于在铁托的演说中，俄国人觉得最刺耳的是指责他们奉行斯大林主义，因此我们又谈到这一点。赫鲁晓夫重复了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他列举说：工业化、土地集体化、反法西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要是事关这一点，那他们全都是斯大林分子，并以此感到自豪。斯大林有铁腕，敌人害怕这一点。现在这些敌人以为，他们苏联人由于攻击了斯大林而在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上变得软弱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地位，一切都将过去，包括我们攻击他们是斯大林分子。

我说，我不相信铁腕政策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好处，我指的是战后时期。我认为，冷战和孤立使我们大家都受到损害，资本主义从这样的政策得到好处，资本主义强行组织几乎把苏联所有邻国都包括进去的军事条约。

当我们谈到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时，赫鲁晓夫说，他们知道，我们会获悉这封信的。今天很难进行秘密通报，因此他们也知道我们认为是秘密的一些信件。十一月十七日谈话时，赫鲁晓夫还影射了他们所获悉的我们的某次秘密通报，而现在据说他们很重视这次通报。

赫鲁晓夫说，他们的主席团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但是主席团里没有我们所分的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也不会分裂。在对我们的态度上，全都是完全地和坚定地一致的。在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上，也是一致的。的确，有些人打算象一九四八年那样回答南斯拉夫。另一些人认为，我们应当回到一九五四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之前时的状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这里的中立人士和西方人士对我说，他们“听说”苏联最高级将发生变化。据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将失去自己的职务。据这些猜测，赫鲁晓夫将被任命为苏联农业部长，布尔加宁的新的安排尚不清楚。作为接替他们的人，提到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而据某些猜测，还提到米高扬。对于马林科夫，据说，他将再次担任政府总理。莫洛托夫则领导党务。

他们征询我的看法。我回答说，类似的情况我一点也没有听说，我本人不相信这样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我作任何别的回答都会是错误的，即便我得到了与他们相似的情报。赫鲁晓夫前天对我说，他将在十二月全会上作报告。最近十来天，赫鲁晓夫已经两三次向我提到这次全会，提到他是主要报告人，或许最近这一次向我谈到是为了间接地驳斥关于他将被撤换的谣传。这些谣传无疑他也听到了，因为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从苏联公民那里也可以听到。这对于目前正在这里形成的危机和不稳定的气氛来说，这是富有特征的。

我认为，这些谣言是西方代表或者赫鲁晓夫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对者制造的，而这样的人，在苏联为数不少。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这批人的数目甚至还在增加。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层有反对者。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尤其是同我国的关系尖锐化之后。二十大以来发生了不少事，最糟糕的都算在他头上。赫鲁晓夫现在仍然说，他对于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并不后悔，但是他现在谈斯大林的功劳比谈斯大林的罪行多。提到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作为党和政府的新领袖一事，使得关于撤换赫鲁晓夫的这些谣言变得更可信了。毫无疑问，传播这些谣言的许多人是希望发生这样的变动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自从社会主义阵营欧洲部分出现危机之后，俄国人就一直要我们相信，中国人完全赞成苏联的言行。赫鲁晓夫强调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同中国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要是俄国人说，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或者东德人“支持我们”，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在俄国人听来，也会是一种嘲笑。但是援引中国的支持，这就有另一种“理论和实际的”意义了。在最近几次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我觉得俄国人在美化和夸大这一支持。

今天的《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发自巴黎的关于法共中央全会的报道。文章用一半篇幅完全公开地，不象中国人用影射的办法，提到南斯拉夫和铁托，文章多次直接提到铁托。法共中央书记雷蒙·居约充当了我们的批评者，他明确地支持俄国人同我们发生冲突。过去，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时，也大量利用法国共产党人。他们现在故伎重施是不足为怪的。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党的类似的表态，而《真理报》“仅仅转载”这些声明。同时俄国人将对我们说，他们并没有扩大冲突，只是人们自由地表达意见罢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就停止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在我们驻布达佩斯使馆的避难一事，达成了书面协议。匈牙利政府先是作了口头保证，随后作了书面保证，躲进我们大使馆的全体避难者都可以自由地返回自己家里。当向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宣读了南匈两国协议后，他们自己自由地认为，继续避难的必要性已经不再存在。匈牙利政府曾用书面作出保证，不会对十一月四日

以前的事追究他们的责任。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间离开我们驻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在就纳吉·伊姆雷问题同卡达尔政府达成协议后，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因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而造成的负担就减轻些了。

* * *

我们为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的问题的顺利解决，为这些人回到自己家里而感到高兴是高兴得过早了。苏军在他们离开我们大使馆的那天晚上就把他们掳走了。看来，谁也没有为这件事问过卡达尔政府，或者是俄国人同他们是合谋的。这样，匈牙利政府同南斯拉夫签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就成了一纸空文。苏军把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带往方向不明的地方去了，带往匈牙利内地某处，或者可能带往罗马尼亚，俄国人早些时候曾让罗马尼亚参与解决“纳吉问题”。

现在就此事发表了官方公报，我们就卡达尔政府食言和粗暴地践踏协定而提出了抗议照会。这样一来，俄国人和我们之间以及我们和匈牙利人之间的事情，就朝着新的、更糟糕的方向演变了。即便没有这件事，俄国人本来也走在恶化同南斯拉夫关系的道路上。现在，关系的恶化无论如何会加速。我们和卡达尔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将恶化，在此以前，卡达尔政府一直寻求并利用南斯拉夫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我们则竭尽所能援助匈牙利的“工农”新政府。这是不会使莫斯科感到遗憾的，因为卡达尔政府继续软弱无能，只依赖俄国人，同相邻的南斯拉夫发生冲突，违犯它所签署的第一个国际协定^①，这一切似乎是更符合莫斯科的心

^① 匈牙利政府通过同南斯拉夫政府交换信件，几次对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的安全提供保证：

“……为了了结这件事，匈牙利政府同意南斯拉夫政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给我的信的第三页第八段提出的建议，现谨通过这一途径书面重申口头多次所作的声明：它不想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对他们实行惩处。我们谨表示

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最近两天这里举行了同捷克人，随后是同法国人表示团结一致的活动，接着谈论同保加利亚人的兄弟情谊，并继续夸大中共给他们的支持。对正在访问莫斯科的北京市代表团，给予了特殊的接待并作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

围绕埃及的运动在继续进行，尽管规模缩小了。重心慢慢移到帝国主义的普遍危险上，尽管不那么常常提到美国。向埃及派遣志愿军的问题不再列在首位。主张在志愿军问题上采取行动的人是苏军里的人，或者是接近苏军或者共青团的人。以《真理报》为首的党报系统地发表发自匈牙利的消息，想通过这些消息来搞臭工人委员会。不仅搞臭匈牙利所组成的，随后被强行解散的工人委员会，而且搞臭一般意义上的工人委员会。报纸发表了材料说，匈牙利工人委员会里有重刑事犯、流放犯和恶棍。据说，工人委员会里有霍尔蒂的军官和宪兵。据说，这样的工人委员会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匈牙利工人阶级，试图组织总罢工和散布对苏联的仇恨。

昨天，在这里的报亭前，苏联公民排成长队等着买我们的少量报纸。在《真理报》对铁托普拉演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作答之间，俄国人拿出了数量有限的我们的报纸供出售。我们的报纸马上被一抢而空。由于我们的报纸少，苏联公民就买波兰报纸，希望能在波

获悉，向这批人提供的避难以这一方式即告停止，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根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授权

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布达佩斯。

兰报纸上找到什么。

收听贝尔格莱德电台和其他外国电台的人很多。在目前的危机中，看来苏联公民大量寻找外国的消息来源，因为想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有些人早在波兰事件时就表示不满。随后，他们又发牢骚说，不让他们知道匈牙利发生的真实情况。现在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这种情况又在继续。

* * *

在《真理报》对铁托普拉演说第二次作答之后，我没有同苏联领导人见过面。我相信，在阿尔巴尼亚人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招待会上我将遇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明天将见到来参加我们的招待会的那些人。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庆节在同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近年来，我们交替提前一天举行招待会。使我们共同感到不幸的是，旧有的冲突现在又将恢复。阿尔巴尼亚人将继续吵架，而其他，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想使南阿这场争吵永远吵下去。

* * *

美国大使波伦对我说，俄国对我们的回答从形式上看是很温和的，不想直接破坏国家关系，用词对于这里的习惯来说是相宜的，称铁托为“同志”。他说，他们美国人想同俄国人建立起明智的关系，但却一无成就，尽管战时还是盟国。

某些西方代表把我们作为“敌人的敌人”加以支持。阿拉伯人赞成普拉的演说，但是置身一旁，不希望由于同我们过份友好而搞坏同俄国人的关系。西德大使很满意，说从现在起，我在这儿的处境比他还要困难，因为到现在为止，他的处境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糟糕。中立国代表，象同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奥地利大使比朔夫，赞同铁托的演说，但是匈牙利的灾难使他感到十分苦恼，他认为演说使得紧张局势和普遍的困难进一步加剧，而且很难找到出路。英

国大使海德找了个机会表示心满意足，他给了我一封信，感谢我给他寄去了铁托的演说。

我的印象是，草拟《真理报》上第二次回答的人直接从赫鲁晓夫那里接受指示。从十一月六日至十九日，我同他进行了多次谈话，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后来《真理报》所发表的几乎全部论点和许多提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今天，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奥尔维德约见我，建议我就我们的国庆节在莫斯科电视台和电台上发表讲话！俄国人总算找到了某些行动来使我们感到意外，尽管我们认为，我们一切都预见到了。鉴于我们和苏联之间所形成的局面，我们决没有料到他们会要求我在苏联电视台上讲话。在我看来，俄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这里通常在十至十五天前向各国大使们提出类似的邀请，以使大使有时间同本国政府商量，从而增加整个这件事的意义，讲话的目的也在于这里。他们在最后关头才打定了主意。情况是十分混乱和矛盾的。正如我们的一个民间故事里所说的那样，你接受吧，你会后悔的；你拒绝吧，你也会后悔的。

我认为，完全无视最近发生的一些公开和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及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法来谈论南苏关系的，尽管我不会明确地去谈论这些事件和分歧。另一方面，很难提出我们的态度，表明我们在最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政策，而会使俄国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多少表示接受。

我本人不怀疑，俄国人主动要我在几千万苏联公民面前谈我们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前景，这是在主席团里决定的，十分可能还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在他们中间，他是最善于奉行这种时冷时热的政策的。今天，他要求我象朋友似的在莫斯科电视台上发表

讲话，而仅在几天以前，他们掳走了纳吉·伊姆雷，而现在又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似乎这同南斯拉夫根本无关。

我无法拒绝这项建议，我更不能不经过贝尔格莱德就接受这项建议。即令关系比较正常，这两者都是我身为大使作不了主的，且不说在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遭到公开破坏的时候。

我询问贝尔格莱德的意见，尽管我担心我从贝尔格莱德得不到任何意见，因为时间太短了。最方便的是拒绝俄国人的这一倡议，但是拒绝也是一种政策。同时，那样的话，我就会成为拒绝苏联政府类似建议的各国大使中的第一人。到那时，俄国人就会有理由断言，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我们拒绝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贝尔格莱德没有作出任何回答。我同使馆里的同志们商定，我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讲话。

我一本正经地伤了一番脑筋，用俄文起草了为这个复杂的场合用的为时十来分钟的讲话。本来应当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说点好话，但是关系近来公开地恶化了。没有必要就最近的事件直率地批评俄国人，而同时却有必要表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接着还有必要提到我们共同地隆重地签署的那些主要文件，就当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地仍然有效，尽管它们已被打入冷宫。还应当哪怕是在最不足道的程度上表示确信我们所面临的前景，尽管相互间的不信任在增强，冲突看来要加剧。还有其他一系列不可能完全忽视的矛盾。现在我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不可能为这个隆重的场合起草一份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都能接受的最通常的政治性稿子。

我在起草这份应景的讲话稿时，考虑到了所有这些，这个讲话稿必须是尽量不带色彩的，以便能够讲成，它很可能既不为俄国

人，也不为南斯拉夫人所喜欢，诚如它也是我所不喜欢的一样。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设法就我们的国庆利用一切条件至少同俄国人保持国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设法用我的话来说，按照新的方式同他们争吵，而不象斯大林时期那样。

* * *

今天我去出席阿尔巴尼亚人的招待会。我没有到主宾席上去，我等着招待会结束，不发生什么违背我的意愿把我牵连进去的某种引人注目的场面。赫鲁晓夫一见到我，就离开主宾席，显示出某种特殊的热乎劲，走过来同我打招呼，这在在场的人所瞩目。赫鲁晓夫笑着说：“我们吵架了，但是不会打仗”。布尔加宁不大愿意谈话，莫洛托夫提议为友谊干杯。

招待会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走过来，我们就我们之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交谈。我问他对于我们在这场公开论战中在《战斗报》上作的回答有什么意见。他说，他已从塔斯社得到了我们的回答，从招待会回去后他就看。他向我列举他白天干了些什么，似乎要让我相信他确实没有时间来谈我们的回答。他说，他明天将前来参加我们的招待会，将告诉我，他对《战斗报》的回答有什么想法。赫鲁晓夫说，他们也不希望关系紧张，如果文章的调子象我所说的那样温和，那是件好事。

我们谈到纳吉·伊姆雷。赫鲁晓夫对纳吉的态度又变坏了，象十一月七日谈话时那样谴责他。他说，他们决不能继续让纳吉把匈牙利的水搅浑，纳吉不再在我们大使馆这就好得多。我提出的看法是，他们选择了最糟糕的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削弱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也削弱匈牙利的卡达尔政府的地位。我说，我们有义务发表照会和发表被匈牙利人践踏的同卡达尔达成的协议，我们并不需要纳吉，尽管在铁托演说的前后我们有义务保护他，因为我们许下过诺言。

我向赫鲁晓夫提到阿尔巴尼亚最近的枪决，并把这一行动斥为既有害于阿尔巴尼亚人本身，又有害于其他所有人。^①我说：当我们开始同你们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尔巴尼亚人却开始在国内枪杀人。赫鲁晓夫同意，这是错误的，他说：他们不是保持警惕，而是枪杀人。他重申，必须不使我们之间的争执激化。现在他说，六月份关于我们两党关系的宣言是好的。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现在不是赞扬这个宣言的时候，但是他这么做很可能是由于他准备指责我们违反了宣言。当我们今年夏天公开赞扬这一宣言的时候，赫鲁晓夫对宣言保持沉默。

我向他抱怨，苏联文化部最近邀请我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我已决定接受邀请，尽管我的时间很少，我不可能同贝尔格莱德作任何商量。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他们要求我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告诉我，苏联报纸将就我们的国庆节发表文章。我之所以说了关于我的讲话的这番话，是为了事实上表明我国政府与此无关，因为贝尔格莱德对于我的电报根本没有作答。如果产生某种后果的话，这样做更好些，因为这样一来，这只跟我本人有关，而不涉及我国政府，因为我国政府可以说，对于我的讲话它并不知情，也未予批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苏联所有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都发表了文章，庆祝我们的十一

^① 根据《战斗报》转载的地拉那电台的消息，利丽·盖加、恩德雷乌·达利和彼得·布拉蒂（即布拉托维奇）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地拉那受审判并被立即处决。被告“作为一个外国的间谍，犯下了严重罪行”。据认为，这个外国是南斯拉夫。被处决的这三个人都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在不同时期同恩维尔·霍查发生过冲突，终于失宠。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彼得·布拉托维奇无法返回南斯拉夫，并把阿尔巴尼亚国籍强加于他。

月二十九日国庆。全都提到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在战时建立的人民权力机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建设国家方面的成就等等。还提到工人委员会的某些积极的成就，但是也提到了消极面，特别是农业的困难的状况，在农业方面，社会主义关系取得胜利还是遥远的事。除《消息报》外，没有一家报纸提到铁托的名字。着重点放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努力下”以及“苏联人民希望友好”上，这是说得相当含糊的，因为没有提到领导这些自觉地致力于友好的“劳动人民”的我们和他们的领导力量。

总的来说，苏联报纸的报道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些。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冲突显然已不能同斯大林时代的冲突相比。现在我们公开地批评俄国人并指责他们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事件负责，他们还是没有大大加剧冲突。虽然可以说，他们的政策基本上同过去一样，我认为不应当看不到他们这种做法中的新情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莫斯科。

大约有三百名来宾出席我们就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招待会。我们大使馆的地方太小，不相称，接纳不了许多人。苏联领导人前来的阵容很强大。外交团也全体出席。我认为，我们是在礼仪方面唯一的一个不搞冷战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人都接受我们的邀请：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中立国家的代表也好。俄国人和西方人之间没有进行谈话，更多的象是“休战”，因为正处在“第三者”的地盘上，因此既不想吵架，又不想和好。

我们还邀请以基伏·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出席招待会，斯托伊卡在阿尔巴尼亚人的招待会上见到我们时态度十分友好。苏联领导人没有象通常那样集体前来，而是分成三批前来。最先到的是朱可夫元帅，接着是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为首的一大批人，最后是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主席团委员们

的态度是克制的，赫鲁晓夫竭力想比其他人热情些。我问赫鲁晓夫对《战斗报》的文章有何想法，我们昨天曾谈到过这篇文章。他说，有许多东西他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战斗报》的答复不是为了使讨论变得更激烈，因此他们决定不再通过报纸作答。他们不想加剧冲突，他们相信我们也不希望这样。

赫鲁晓夫接着说，他特别不能同意我们对于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团结一致问题的态度，也不同意我们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立场。现在明确了，我们是站在某种中间的立场上，他将在他们的全会上谈这个问题。他还将谈他们的制度同“个人迷信”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对此提出的批判。我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和某种实践，自从马克思提出以来，一百年来一直是现实的。我们坚决赞成无产阶级团结，只是要就这到底是指什么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大家说同样的话，但是想法却不同。在这一点上以及在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时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上，我们应当弄得一清二楚。我提醒赫鲁晓夫，斯大林正是借助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来为自己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辩护的。

在基伏·斯托伊卡在场的情况下，我同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就我们的分歧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罗马尼亚大使达列亚把所有的谈话都翻译给斯托伊卡听。布尔加宁还谈到，他有一个大家庭，这是整整一个“积极分子小组”，说他们全都对铁托的演说感到奇怪。在这个家庭的范围内，他们都批评他，批评布尔加宁，批评他本人为了同南斯拉夫友好而做的一切。我告诉布尔加宁，公正的做法是把铁托之所以这样地发表演说的原因告诉他的“积极分子小组”和其他人。他们知道这些原因，某些主要原因在我交给赫鲁晓夫的铁托的信中也援引了。

最后，我结束谈话说，我们之间现在的这场分歧，不论是多么尖锐，还是证明，我们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之间现在进行这样一些公开的、相互尖锐的批评和讨论，这在不久前的过去是不可能的，马上就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布尔加宁坚决支持这一看法，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求为友谊干一杯。在场的罗马尼亚政府总理基伏·斯托伊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表现十分友好，没有参与谈话，没有站在任何一方。

《真理报》和《消息报》十一月三十日十分详细地发表了我前一天在我们国庆节时在苏联电视台上所发表的讲话。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问我是否看了苏联晨报，他们对我说，《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了我的讲话的详细摘要，并说他们同意我的讲话。我的印象是他们事实上并不特别满意。很可能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同志也不会满意。我认为，现在不可能使“双方满意地”发表谈话。

南苏关系恶化

苏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全会推迟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举行。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议会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对卡德尔的讲话感到愤愤不平。关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苏联领导对卡德尔的回答。我同赫鲁晓夫的会晤的得与失。反对进一步“以毒攻毒”地写文章。南斯拉夫政府要求购买苏联飞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莫斯科。

十一月底，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监察部长，这在苏联首都，尤其是在驻莫斯科的外交团中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苏联报纸就莫洛托夫在苏联政府中的新职位宣称，从列宁和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建立时起，国家监察问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既然莫洛托夫去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不是加强布尔加宁政府，而首先可能意味着削弱布尔加宁政府。听说莫洛托夫的新职务在调整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上享有一定的权限，这在苏联是一个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也包含重要的经济意义。二十大以后有被排挤感的苏联国家机器现在又处于重要地位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莫斯科。

昨天，在俄国人在克里姆林宫为罗马尼亚代表团举行的招待

会上，应赫鲁晓夫的提议我同他谈了话。我只记载这次谈话中的两、三件事，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新闻。

我问什么时候召开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回答说，全会已推迟到一月下半月举行。十二月也将举行中央全会，但是不是象以前设想的那样谈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赫鲁晓夫告诉我这一情况时，情绪不是特别好。他没有告诉我，他将是十二月全会上的报告人，而以前常常强调这一点。我的印象是这一变化是不符合赫鲁晓夫心意的，但是或许我的印象是不确切的。

我们用了较多的时间再次谈到纳吉·伊姆雷。赫鲁晓夫有点苦恼地提到科查·波波维奇在纽约的讲话：他想把纳吉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赫鲁晓夫说，纳吉在罗马尼亚，说纳吉在一次谈话中曾援引铁托对他的看法。赫鲁晓夫接着还告诉我，到了布加勒斯特机场以后，纳吉环顾左右，说这是基辅。赫鲁晓夫从中得出结论：纳吉害怕到俄国来。在我看来，赫鲁晓夫越来越认识到在纳吉问题上他们的处境不妙。在我看来，纳吉在审讯中没有象俄国人希望的那样回答他们的问题。完全作为我个人的意见，我指出，最好是让纳吉留在匈牙利他自己家里。赫鲁晓夫不接受这一意见。俄国人显然认为，纳吉呆在匈牙利对于俄国人所设想的平息局势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和危险。

赫鲁晓夫抱怨我们的报纸，提到《政治报》刊登了“令人厌恶的漫画”，这种漫画会使苏联的每个人产生最坏的印象。他说，我们那里的一九四八年冲突时期的“老机器”又开始运转了。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想解释漫画事件，似乎是认为用漫画来对待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人就是很侮辱人的，不论内容如何。赫鲁晓夫列举了我们的负责人士在世界各地和贝尔格莱德的反苏言论，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指出，汇集这样的报告弊多于利。过去已经多次表明，这往往是一些臆想的事情。赫鲁晓夫说，

他们也考虑到这种情况，不象过去那样干，常常认为报告是不真实的，而退回给自己的情报机构，他们自己能够分辨给他们塞来的东西，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赫鲁晓夫说，他们的机构没有送来反对我的这样的报告，这里的西方人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向他们谎报些什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莫斯科。

从前天见面时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苏联领导竭力想模糊我们之间的争执的实质，而公众闹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从一系列谈话看来，现在正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我们的反应最激烈。

中央主席团现在对于策略问题远比在斯大林时期重视。从对待我们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策略和政策的这种交织在一起，彼此交叉的情况。在同我会见的时候，态度特别尖锐并带有胁迫的性质，随后又表示和解和显得很客气，几乎是友好的，接着第二天又故态复萌。

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九月份时在贝尔格莱德觉得气氛不好，曾打算提前回国，但是后来一切都改观了。他再次强调他在南斯拉夫和克里米亚的会晤后向主席团提出了很好的报告，而我们现在却干出了这样的事。看来，这些对我们有利的报告现在对他不大有利。我们注意到，国家机关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对我们态度冷淡。我们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了主席团关于南斯拉夫的新指示。我们掌握未经核实的消息说，举行了专门的党的会议，会上修正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南斯拉夫已不再属于友好国家。

新的情况是，主席团委员们让赫鲁晓夫一个人跟我在一起，而他们都离开了招待会。以前他们不这样做。要么是他们中有人参

加谈话，从而等他，以便一起离开招待会，要么是问他是否马上就走，或者以别的方式等他。而前天晚上，没有采取这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莫斯科。

迄今为止，我曾两次同赫鲁晓夫谈到贝尔格莱德答应要向他提供的关于我们的制度和未来发展方针的材料。赫鲁晓夫九月份在南斯拉夫时曾要过这份材料。后来，这件事搁起来了。我们之间的冲突爆发后，赫鲁晓夫向我索取曾答应给他的材料。我要求贝尔格莱德经由我把答应给他的材料送给他，而不管我们的关系现在是不好的。

昨天我们收到了我们出版局寄来的有关南斯拉夫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九十份材料以及他们关于这件事的一封信。材料的文字未经加工，没有装订成册，印得很差，是胶印的。显然，搞得如此粗糙的材料给其他人也是不合适的，更不用说给赫鲁晓夫了，而我要把这份材料送给的正是他。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给我们送来了九十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材料，在这里我们无法分送给人。我不能把这样一份材料送给赫鲁晓夫，而且这份材料还是匿名的。我们要求我们的外交部提供这份材料，而它看来把事情推给了企业，而企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既然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已经搞坏了，我认为，我们方面就更需要更加审慎地为赫鲁晓夫草拟这个文件。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莫斯科。

昨天我要求赫鲁晓夫在本周内任何时候接见我。我打算把我们尽可能加以改进的关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材料交给他。

赫鲁晓夫今天在中央委员会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

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尽管我本来打算进行一次短得多的会晤。赫鲁晓夫延长了谈话。我没有能猜到，赫鲁晓夫会对我们如此恼怒，因为我不知道在南斯拉夫在南苏关系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卡德尔在我们的议会里发表了讲话，使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致使我所见到的赫鲁晓夫是我迄今所未曾见过的，甚至在铁托同志普拉演说之后他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似乎是正等着要见我，以便发泄他的怒气。他说，这是对整个苏联，对领导和对制度进行不友好的攻击。所涉及的不是匈牙利，而是苏联。赫鲁晓夫知道，当卡德尔“嘲笑玉米和土豆政策”时，指的是他。卡德尔谴责苏联所创造的一切：工业化、技术进步、为此而承受的牺牲。赫鲁晓夫说，他们曾忍饥挨饿，受尽苦难，孤立无援，全世界都反对他们。现在卡德尔似乎是在某个荒岛上，提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联除了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存在。苏联如果是按这种理论来建立的话，那就不会有苏联。赫鲁晓夫说，苏联要是今天遵循这种理论的话，就会垮台。

大家都知道，卡德尔不是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的，是我们的政治局同意这么做的。我们想吵架，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需要吵架。在党的方面将发生决裂和斗争。赫鲁晓夫说，卡德尔的讲话同铁托普拉演说不一样，卡德尔走得更远，使关系恶化了。

他们在准备回答铁托同志最近的一封信。有许多事情他们是不同意的，但是他们认为这封信总的意思和目的不是要吵架，不是要使关系紧张化，而是相反。卡德尔的讲话在这一点上也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这将反映在他们不久将寄给我们的回答上。

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前天，帕托利切夫把苏共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南斯拉夫的秘密信交给了我。赫鲁晓夫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认为这封信不怎么样。根据信里所描述的我们同西方的关

系，似乎苏联在拯救南斯拉夫。赫鲁晓夫问，把信给了我们是否是一件好事。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回答，我觉得现在这已没有多少特殊意义，这封信已经起了自己的作用。最好是他们没有起草这封信。

关于匈牙利，赫鲁晓夫说，那里现在的情况是好坏参半。必须最终地清算反革命。必须要么消灭地区工人委员会，要么政权向它们投降并取消政府。连南斯拉夫都不存在地区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将只留在企业里。

他们没有让哈马舍尔德去匈牙利，因为那样就会发生新的示威、混乱，或许还会发生流血事件，哈马舍尔德正是为此而想去那里，或者是要求他去的那些人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在匈牙利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西方的宣传，也不是联合国。赫鲁晓夫坚持苏联必须在那里进行军事干涉。

赫鲁晓夫几次问我：有没有什么可能，使我们求得共同的立场来解决匈牙利的危机。他说：请告知铁托同志并问问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说，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建议，他是在谈话过程中提出来的，因为他看到，匈牙利是我们之间的主要争端；要是这能够得到解决，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赫鲁晓夫还提到卡德尔在挪威作的报告，他试图贬低卡德尔的观点的价值。他指出卡德尔在讲话的一个部分中教训人们只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在另一部分中又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表明南斯拉夫没有达到这点或那点、生活水平低下、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困难等等。

我认为，这种无视和贬低的态度将反映在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对卡德尔的答复上。中央委员会或者政府不会作答，而是由苏联的经济学家或者宣传家来作答。他们不会发表卡德尔的讲话。在谈到卡德尔的讲话时，赫鲁晓夫比迄今同我的任何一次会晤都

更激动，表示更大的反感。一度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盛怒之下极其苦恼的人。

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们的中央全会十二月十七日开始举行（他们没有推迟全会，但是改变了议程）。列在议程上的是苏联的经济。将改变政府计划机关的职权，在计划工作方面将授予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以及他们的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将“解除”苏联政府一系列职权。全会的主要议题将是修改第四个五年计划。暂时将减少对重工业的货币投资，把资金投入住房建筑、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饮食上。至少现在报上将这样报道。

赫鲁晓夫请求我关于这一点暂时不要说，因为是机密的情况。他们得修改计划，相信这样更好些，不会象斯大林那样办，斯大林禁止对计划作任何修改，即便人人都知道干得不对头。

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已推迟到一月下半月举行。赫鲁晓夫再次说，他将在这次全会上作报告。我谈到这里的外国人不断问我关于（苏）领导的变动，并就此散布形形色色的猜测，对此，赫鲁晓夫说，他全都知悉，有关于莫洛托夫的谣言，谈到他赫鲁晓夫要下台等等，但是这一切毫无根据，不会有任何变动。

赫鲁晓夫提到许多奇怪的事情，其中还提到一些事，我可能因此而中断会晤而离去。例如，他说，格罗正当匈牙利准备闹事的时候曾率代表团去我们那里。他问，这是偶然的吗？（以格罗为首的匈牙利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事实上是俄国人在克里米亚强加于人的。）接着他又问，我们几乎没有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却有好几个现代化机场，为什么要建这样的机场？我问他，他是否也这样看待？赫鲁晓夫表示自己同这两件事无关。对于前者，他说：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对于后者，他说，他们的军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只是告诉我，在他们这里，人们是如何作出反应的。

同上面这种情况相反，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一再说，我们的党是

强大的，是经过困难的考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直的和有能力的，说苏联的党也是这样。我们顽强地维护我们的观点，俄国人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替代合作的是开始了斗争。他重申，他们希望在国家方面继续合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莫斯科。

前天^①，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赫鲁晓夫对于我给他的关于我们国内体制的材料表示感谢，我说（我虚构说）这是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奇—泰波同志送给他的（因为贝尔格莱德不幸的是甚至没有告诉是谁送来这批材料的）。赫鲁晓夫看了看内容，看了一下提要，问如何阅读好，他说，他无论如何要通读一遍。

——对于卡德尔的讲话，赫鲁晓夫还说，这篇讲话实际上支持现在在匈牙利号召举行总罢工，反对卡达尔政府，反对正常化的那些人，而俄国人称这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卡德尔的理论同任何社会主义实践，也同南斯拉夫的实践，毫无关系。这种理论的目的只在于攻击苏联的制度，把苏联的制度说成是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某种畸形儿。赫鲁晓夫起劲地为苏联的制度，为苏联工人阶级四十年来作出的牺牲和努力辩护（好象我们对此提出异议似的）。

——你们的南斯拉夫的民主制也差不多。你们老是夸耀这种制度，而一九四八年以后你们却逮捕了数以万计的不同意你们的主张的共产党人。你们还枪杀共产党人。赫鲁晓夫说，一九五六年，他们在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以后返回南斯拉夫后，你们还把他們逮起来，判处服苦役。而当我们苏联或者现在匈牙利逮捕我们的敌人

^① 从上下文看，似应为“昨天”。——译者

的时候，你们就把这叫做恐怖、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你们说，你们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免受我们的敌人之害。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卡德尔这样的朋友之害吧，而我们自己会懂得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之害的。赫鲁晓夫最后激动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试图就卡德尔的主张是什么这一点展开正常的讨论。我说，他提到的许多事情同卡德尔的讲话没有关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之间没有争论。讲话对匈牙利社会主义陷于灾难的因果进行了分析。应当考虑到卡德尔讲话之前以及讲话之后在那里显现的事实，并认清讲话同这些事实背道而驰呢还是这些事实证实了讲话。这些事实证实了讲话。这是实际情况。

指导卡德尔的完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和匈牙利局势正常化的利益。那里现在设立了严格的军事法庭，工人委员会被宣布为新的反革命，试问哪里还有革命和社会主义可言？

这一切都是在宣布“反革命已被粉碎，武器已交出”（卡达尔语）之后一个月发生的，而现在一切又重头开始。只凭赤裸裸的武力，在匈牙利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就是卡德尔的论点。在匈牙利是政治危机，应当采取政治办法，军队在那里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卡德尔现在，就象铁托在普拉一样提醒人们注意，要能为苏联的军事干涉辩白，匈牙利应当继以什么样的事态发展。

至于苏联在战前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出的牺牲，这些牺牲是光荣的，受到全世界的公认。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苏联武装力量上个月在匈牙利作出的牺牲就不能这样说了。我们确实逮捕了情报局分子。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外国代理人。我不知道他们被判处枪决，但是有被打死的，象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将军，他曾想越过国界逃往罗马尼亚。他在死去之前从苏联回来，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赫鲁晓夫沉着脸听着。他显然不同意我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续前)

当赫鲁晓夫谈到我们的言论(指卡德尔)帮反动派和美国人的忙时，我指出这个论点不好。美国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并将存在下去，我不知道还将存在多久，一百年，或许更长些时间，或许短一些。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也存在着。这就是说：我们和其他人应当沉默，在我们之间不应当就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任何讨论，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似乎共产党人之间只有在资本主义和反动派垮台之后才能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赫鲁晓夫告诉我，苏联某个大使馆里的一位负责官员(不是大使)同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不是大使)谈过话。美国人说，他们完全理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美国处于类似情况下也会这么做。匈牙利属于划分东西方之间的“危险区”的那根“红线”的一边。要是双方都越过这条“红线”，就会爆发世界大战。在匈牙利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赫鲁晓夫说，这样的讲话肯定不是未经美国政府同意的。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讲话是足够坦率和明确的，但是美国同时从匈牙利事件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赫鲁晓夫说，他们要是有机会的话，也不会允许对美国做同样的事。他们在匈牙利的作为的根据是自己的政策，那番讲话是令人感兴趣的，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现实主义观点。

赫鲁晓夫对我说，在最近的事件过程中，匈牙利还提到邻国中的“匈牙利”领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使用匈牙利旧国徽(赫鲁晓夫说：科苏特国徽)问题时，有人注意到，在这一国徽上，有大片别国的领土，特别是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划进了匈牙利。赫鲁晓夫说，其中的苏联领土最少。赫鲁晓夫强调，使用这样的国徽是办不到的。更动边界是世界问题，国家

之间的边界从来还没有不经战争就加以改变的。

我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我们有四十多万匈牙利人。赫鲁晓夫说，有一百万，他笑着插话说，你们掩盖起来，缩小人数。赫鲁晓夫故意不明确讲，他不肯说，是谁和在什么时候同匈牙利进行了这场讨论。如果这些问题曾以任何形式作为当代匈牙利的问题加以讨论过，则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还令人感兴趣的是，赫鲁晓夫是在谈到苏联机构在东欧犯了侮辱东欧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只给俄国人造成损害的错误的时候，开始谈到这一点的。赫鲁晓夫说，例如，崔可夫元帅让东德人穿上苏联的军装。在波兰和匈牙利也有类似的现象。匈牙利出现了有关那个国徽的讨论，赫鲁晓夫希望我了解这一点。

或许不光是圣斯特凡王冠的拥护者在琢磨建立一个匈牙利的问题。在那里现在的一片混乱中，很难限制那里能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赫鲁晓夫很可能想提醒我注意一旦匈牙利不在阵营内对南斯拉夫的危险性，也即让我注意在匈牙利人和我们之间还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不重视世界上就波兰，也即就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掀起的反苏运动。我提到西方存在进步力量，还有亚洲的印度和其他国家，还有非洲国家，他们可能由于在匈牙利犯的错误而使这些力量和国家转而反对他们自己。赫鲁晓夫说，在这一点上我是幼稚的。他就我这一番话提到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前不久在联合国建议就匈牙利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苏联方面有人认为应当弃权。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且不说印度，即便是上帝本人提议通过决议，也让他去见鬼去吧！苏联只能投票反对决议，不能由于自己弃权而让匈牙利人自己去反对。

赫鲁晓夫问匈牙利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卡达尔通过哪一些人来组织新的党、军队和警察。如果还是拉科西的人，那就不会成功，工人和人民反对。要是卡达尔同拉科西时代相反，发布一项宣言书或类似的文件，宣布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将获得相应的地位，将成为工人管理生产的机构，那么他或许会稍稍缓和一下局势。这是赫鲁晓夫同意我的意见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一件。我还谈到卡德尔同志的报告中的一些想法，谈到有人幻想可以恢复旧型的党和老的管理方式，哪怕是不再犯原先的错误。赫鲁晓夫似乎没有想起这是卡德尔讲话中的内容，未加驳斥，只是听着，一声不吭。

最后，他向我叙述，他和马林科夫十一月二日和三日同我们进行了秘密会谈后从布里俄尼回来时差一点完蛋。在普拉，他们的机组人员在机场上告诉他们，从莫斯科接到命令不得起飞，莫斯科和基辅都不让飞机降落。然而，在亚得里亚海岸上空马上就有可能失事。飞机在韦莱比特上空（很可能是塞尼上空）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旋涡气流中。暴风雨似乎要把跌落下来的这架苏联小飞机打得粉碎似的。风把他们吹得一忽儿左，一忽儿右，他们勉强才脱身。赫鲁晓夫说，在战时他也没有经历过这样恶劣的飞行。

这一番话最后结束了我就卡德尔在我们国民议会里的讲话同赫鲁晓夫进行的谈话。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最近几天，我完全局限于记载我同赫鲁晓夫的长时间谈话。我认为，这里我应当记一下我同赫鲁晓夫的这些经常会晤的性质。莫斯科只要举行赫鲁晓夫参加的招待会，他就同我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这几乎已成了惯例。有时候，派遣自己的某个随行人员找到我，转告说，如果我仍留在招待会上，他就想跟我谈话。这样一来，我

就有义务等他。外国代表已经习惯于离开我们，让我们呆在一边。

到目前为止，我在这里记下了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所谈到的所有重大事情。这从一次又一次的会晤中可以看到，直到最近这一次会晤。最初，我们彼此很不了解，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迫使我作出让步，谈话不是每一次都以对我有利的方式结束的。赫鲁晓夫通常通过提出下面这样的威胁性问题来求得在谈话中占上风：我所说的是否就是我真真正想的或者要我重复一遍，谈谈这件或那件事情。这往往是在谈话具有我们之间发生争吵和冲突的性质的时候，而开始是在七月份，谈到南斯拉夫报纸对他的讲话“实行新闻检查”的时候。我当时吃不准促使赫鲁晓夫提出这些威胁性问题的究竟是什么。我当时考虑到，他可能把我的个别讲话说成是对苏联政府或对他本人的侮辱。那样的话，一切就很糟了。在贝尔格莱德面前和在莫斯科面前，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只有我要负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迫使我让步，虽说不是改变立场，但是无论如何迫使我更加审慎地挑选用词和论据。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赫鲁晓夫不再能按老样子利用这一长处了。对于他的威胁性问题，我不再有必要作表面的让步，因为我照例把最站得住脚的理由留到我们谈话的末尾来讲，这样的理由通常对于继续进行下去的谈话是起作用的。

这一切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在我看来，这样的关系只有同赫鲁晓夫才能建立，同苏联领导中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建立。这样的谈话方式看来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我常常向他谈一些对苏联的政策并非特别有利的事情。

我猜想，他没有很多机会听取对于苏联，也即他自己的政策的批评性评价。或许因为这一点，赫鲁晓夫才对这种会晤感兴趣。他要是没有兴趣，我想建立这样的关系就会是徒然的。要是我试图强加于人，那就越不会成功。

我觉得,在各方面赫鲁晓夫总是想影响我国的政策,试图使我们的政策朝着在他看来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赫鲁晓夫相信我会确切地把他的话转告贝尔格莱德的。坦白地说,赫鲁晓夫谈了很多在贝尔格莱德的我们的同志们决不会喜欢的事情。或许总的来说他并没有象我觉得的那样考虑那么多,或许赫鲁晓夫只是说一而说而已。只有一点是确凿的:从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会晤起,赫鲁晓夫对同南斯拉夫大使进行这样的谈话是有兴趣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莫斯科。

我很快就看到,我同赫鲁晓夫的经常会晤也有其令人难堪的,我要说是危险的方面。首先,赫鲁晓夫往往是无法预料的。你吃不准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会对我的一些讲话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其次;赫鲁晓夫开始在人们面前,在莫斯科的各种招待会上当着苏联和外国客人的面在讲话时越来越经常地公开提到我,而我对于他从我们的谈话中挑选什么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公开加以引用这一点又无法施加影响。他这么做必定是出于好意,但是考虑到我在莫斯科的官方职务,这种做法本身对我来说往往是令人难堪的。第三,不难看到,苏联外交部官员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官员,对于赫鲁晓夫和我之间的这种越来越经常的会晤和会谈日益感到不满。

我从一开始起就注意到后一点,我对于苏联外交部的人竭力尽可能客气和合作,免得他们说滥用赫鲁晓夫对我的态度。因此我努力把属于外交部或苏联其他某个国家或党的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与这些机关里的人交涉。我同这些机关打交道,或者经常接受它们的邀请,从来不提赫鲁晓夫的名字,也不援引我同他的谈话。但是,他们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例如有一次葛罗米柯交给我

苏联政府一份通告性和宣传性照会，让我转交南斯拉夫政府时，情绪不振地说：您已经就此事同赫鲁晓夫同志商谈停当了。

在我对赫鲁晓夫进行第一次礼节性拜会的时候，赫鲁晓夫提出了好几个重大问题，并问及我对于他的谈话的看法。我坚信，我不能照下面这样的方式回答他：我将报告我国政府，我将告知您答复。虽然有些大使是这么做的。我向赫鲁晓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同时有一点保留，就是我是以自己的名义向他谈的，我拿不准，贝尔格莱德的同志们是否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莫斯科。

昨天的《真理报》在一篇占据整张报纸四分之一版面的文章中，回答了卡德尔同志的讲话。文章的标题是《这对谁有利？》署名是伊·帕夫洛夫，《真理报》的一名编辑。南通社记者丘利奇昨天花了一整天时间把它发回贝尔格莱德。我的初步印象是：

《真理报》今天的回答尽管从政治上和方法论上而言，同它就铁托普拉演说发表的文章相类似，在歪曲讲话的实质和欺骗苏联公众方面却是走得更远。借助于这样的方法，先是不确切地叙述卡德尔的观点，然后加以谴责。现在这种做法已达到了全面攻击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程度。

在众所周知的罪名中，《真理报》加在卡德尔头上的有：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过渡时期国家理论上的反列宁主义，而在现行实际政治方面则说我们帮助匈牙利反动派，破坏社会主义团结。《真理报》还援引了冯·勃伦塔诺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应当援助铁托主义的话，这可以表明《真理报》走得有多远。

最后，《真理报》说，苏联真诚地祝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而不论南斯拉夫同志为这一建设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接着还有几句话，这几句话发挥的意思是说，我们把

我们的发展同其他各国对立起来，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等等。

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提出最严重的指责和评判之后，又这样地对“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使人想起情报局一九四八年第一个决议的结尾。那里在结尾处也向南斯拉夫的“健康力量”致意，也是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名义向这些力量发出号召，要他们推翻自己的合法政府和国家的领导。

《真理报》前不久对铁托同志的回答最后强调，苏共准备今后也奉行我们两党合作的政策，以利于各兄弟国家人民，因此应当在平和友好的气氛中讨论现有的争议等等，与此不同的是，《真理报》昨天的回答充满了有意歪曲南斯拉夫的一切这样一种敌对精神。他们甚至不惜粗暴地对卡德尔同志进行人身侮辱。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得到卡德尔同志讲话的外文版。此间外交团的兴趣极大。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在对这样的事情兴趣最大的时候却总是迟到。我们没有及时得到讲话的翻译稿，而是给我们寄来了一百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战斗报》（1）。

如果不是由帕夫洛夫签署《真理报》的文章，而是由苏共中央或者某一位主席团委员签署这篇文章，如果必须由个人来签署的话，那就更糟了。这样总算还没有越过一切界限，尽管党的关系将受损害。这还不是在各条战线上发生冲突，我们和苏联之间的国家关系，如果说不会取得进展的话，还能保持住。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种事情又开始重演了，尽管这场冲突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莫斯科。

最近我收到科查·波波维奇同志谈我们同苏联关系的一封信。我在考虑我们方面能采取什么措施，使这种关系不致于进一

步恶化。

从十一月^①七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在五、六天内，我同赫鲁晓夫会晤了八次。有四次是我根据贝尔格莱德的命令要求举行的，而其他几次都是赫鲁晓夫主动要求举行的。赫鲁晓夫说了许多坏话，把谈话变成争吵，这种争吵暴露了俄国人对我们玩弄的策略手法，尽管如此，我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希望冲突不致加剧，不致变成南斯拉夫—苏联的一场新冲突。

在谈到不加剧的时候，他们首先指的是使事情暂时平息下来，我们不攻击他们，以便争取到时间，只在同时对付尽可能少的反对者。

这里还不是现实地看待我们关系发展的前景，过去的坏经验仍然有效。如果说，一九五五年我们使国家关系正常化了，一九五六年建立了党的合作，现在我们又两者都没有了，还不清楚这一切会导致什么情况。

我十二月三日开诚布公地对赫鲁晓夫说，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最好是把南斯拉夫拉进阵营，这仍然是他们的战略目标。他们对于同实际存在的南斯拉夫发展关系的问题采取错误的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此。

对此，赫鲁晓夫未加否认。我们之间现在的危机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俄国人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当然，要是俄国人在六月份或稍后一些时间内，在我们之间还笼罩着和平和友谊的时候（在南斯拉夫同赫鲁晓夫的会晤，接着是在克里米亚会晤）就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不是在现在，象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同我谈话时形容我们目前的关系的那样，我们彼此已经“剑出鞘”，才由我们告诉他们这一点，那就会好得多。赫鲁晓夫觉得百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十二月”之误。——译者

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之间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此间许多善良的人们也有这种想法。这里的领导人说，使他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铁托发表演说和卡德尔发表讲话所选择的时机：结果似乎是我们挑选了这样的时机。

赫鲁晓夫对我说，在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之前两、三天，他们收到了铁托的一封关于纳吉的克制的信，随后突然来了这么一篇演说和对他们的攻击。一个月以后又重演了这种情况。在卡德尔讲话之前两、三天，这里也收到了铁托同志的一封详细而克制的信，谈我们的关系和有必要消除许多障碍，随后就来了个卡德尔的讲话，更加激烈地攻击他们。这一切都使俄国人感到困惑，增加了他们的不信任和对南斯拉夫感到恼怒。但是，他们或者我们感到恼怒，这是次要的事，问题在于：在取决于我们的时候，今后怎么办？

他们关于不使关系恶化的想法，且不说他们指的是今后，本身就包含着客观的可能性，可以设法找到对我们和对他们都有利的某些解决办法。从这个角度可以提出我们的权威代表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我在考虑让科查·波波维奇到这里来，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从作为访问的结果可予发表的东西来看，我担心对南斯拉夫外长访问莫斯科一事提不出十分具体和能为人接受的建议。在目前的形势下，这样一来或许会削弱我们在俄国人和阵营国家心目中的地位；这会显得是我们在为自己辩白和我们在后退。又会在西方使人迷惑不解。不清楚的是，在公开场合，科查的访问又以什么来收场。在这里，谢尔洛夫不是他的会谈对手（虽说从表面上来说是对手）；对手是赫鲁晓夫和主席团里的其他人，不清楚他们如何看待这种安排。赫鲁晓夫在十二月十二日的谈话中十分断然地说，现在不考虑他们中有谁去南斯拉夫。

我们和他们的党中央正在通信。尽管对于这样复杂，同时又变化很大的局势来说，通信不是很有效的，应当重新估量一下，我

们是否继续停留在这种可能性上，认为目前就够了。苏共中央的回答最近将送达贝尔格莱德。在对苏联这项官方文件作出评价后，贝尔格莱德应当作出决定什么是今后行动的最有利的方式。

俄国人已经发表了自己对卡德尔的进攻性的，就方法而论是不光明正大的回答，这就更减少了求得某种解决的可能性。我们打算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开拓道路，我们热衷于这一点，六月份和以后也同他们会谈过这一点，但是看来在这上面我们不会取得多少成就。他们同样不现实地打算把我们拉进阵营，这仍然是他们的战略目标，在同我们的关系上在这方面他们也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三天以前，美国大使波伦在我这里吃晚饭。我们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在谈到埃及的时候，波伦一再证明，美国从一开始起就试图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苏伊士危机，接着又坚决要求停止战争和三国立即撤军。这给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英法两国为另一方的关系造成了巨大困难。应当致力于迅速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最紧迫的问题是清理运河。撤军最近几天就将完成。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纳赛尔。如果纳赛尔继续象一位固执而短见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行事，如果他以为他的主要任务是煽起阿拉伯沙文主义并扮演胜利者的角色，那么他既没有理解联合国决议，对目前局势中的其他情况也一无了解。如果在英法两国的参与下，纳赛尔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来破坏清理运河，那么联合国的行动可能信誉扫地。

我指出，清理苏伊士运河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便是唯一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费的问题。我指出，埃及受到了两大强国和以色列的进攻。最好是不是由进攻了埃及的国家首先表示

要清理苏伊士运河。

波伦想了解，我们是否预料俄国人会发起一场反对我们的全面运动。我表示怀疑，也表示捉摸不透。俄国人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在匈牙利局势最近恶化之后，在俄国人回答了卡德尔之后，对这一点，我再也吃不准了。波伦说，俄国人如果对我们全面搞紧张将使欧洲的危险局势更趋恶化。他没有料到会对卡德尔作出这样尖锐的回答。同《真理报》第一次回答相比较，他认为，现在的局势恶化了。

波伦说，他预料艾森豪威尔与尼赫鲁的会谈将顺利结束。对于匈牙利，他不怎么强调，似乎匈牙利已最终地交给俄国人了。西方除了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加以利用外，我认为，别的情况什么都不会发生，不管俄国人在那里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波兰人就军队问题同俄国人达成的协议，对波兰人是有利的，对东欧其他国家堪为先例。

波伦说，他对俄国人有所了解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卡德尔攻击他们奉行“玉米和土豆的政策”时，他可以设想他们是多么恼火，因为在苏联一提到玉米，人人就想到赫鲁晓夫。我对他说，不幸的是俄国人什么都不发表，只是歪曲南斯拉夫人所说的一切，然后加以攻击。俄国的这种讨论方式使人们进一步迷失方向，什么都澄清不了。波伦说，美国多年来一直处于这样的地位，苏联领导有计划地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美国的政策。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本月二十日，星期四，我要求拜会米高扬，他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接见了。

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向苏联购买米格—19飞机的许可证以及购买已经生产的若干架这种飞机的问题。我请求苏联政府原则上

考虑一下这两个问题。

米高扬说，关于这件事铁托有一次对赫鲁晓夫谈过，除了赫鲁晓夫那次谈话时说过的话之外，他现在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米高扬将把我们的要求报告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他们有了答复，将通知我们。随后我们谈到南苏关系，当然也谈到铁托的演说和卡德尔的讲话。双方都没有谈到什么新意见。

* * *

我同我们使馆几位参赞和武官曾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和他最亲密的同僚的座上宾。中国大使刘晓是中共中央委员。除我们南斯拉夫人以外，没有别的客人出席这次晚宴。

中国人在晚宴上为我们国家和党的友好合作祝酒。我本着同样的精神作答。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并谈到有必要进行讨论，作为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反映各种观点的正确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的内部生活中，首先是在文化、科学和艺术领域内提倡这一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

我提出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目前的冲突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则问题。我的态度是，最好我不向他谈这场冲突之前发生的一切，最好他也听听另一方面的看法。我对他说，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同苏联或者其他某个党公开发生分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削弱同这个国家和党的国家的或党的关系。我没有批评苏联的观点。我认为，俄国人还不习惯于在尊重所提出的事实的条件下进行这样一类的公开讨论。我指出，可资证明这样一点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没有发表铁托的演说和卡德尔的讲话，却公开地对他们两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我提出的论点是，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讨论的自由迟早要占上风，这只会加强社会主义。说

这么做是为帝国主义效劳这样的口号事实上意味着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禁止自由地交换意见，而帝国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帝国主义利用的是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不是讨论的自由和我们之间某些观点上的差异。

刘晓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总是此后又说一些——考虑到他这样的态度——使人意想不到的话：帝国主义现在在发动攻势，苏联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今后的命运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似乎俄国人在窃听他讲话，或许窃听过他讲话，就象窃听我们讲话窃听了十来年一样。至于我们的冲突，这位中国人谈到南苏两国可派代表会晤。中国大使要求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们是如何发表了俄国人所写的骂我们的一切的，而他们又如何一点都不发表我们所说的一切。最后，他还告诉我，周恩来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将来这里，将在苏联呆几天。

中国人很清楚，现在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人进行这样亲切的会晤不是时候，俄国人监视着一切，而他却偏偏在现在邀我去作客。

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新年

赫鲁晓夫的新年讲话。新的提法：斯大林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苏联经济的管理上加强中央集权制。苏联增加对阵营国家所承担的经济义务。苏联减少对南斯拉夫承担的经济义务。由于去年丰收，苏联有十多万人获奖。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进一步加强苏联国家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莫斯科。

《真理报》十二月三十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的一项声明。尽管中国人在自己的长篇声明中运用不同于俄国人的方式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甚至以自己的方式批评了苏联，这里制造的气氛似乎中苏完全是一致的。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现在也主张承认中国人是苏联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平等伙伴，虽说这一时是对苏联有损害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支持苏联目前的政策，至于威望，以后再说。

俄国人这样的做法也反映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新年这件事上。在布尔加宁作为政府总理为苏联上层人物和外交团正式举行的晚宴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赫鲁晓夫的讲话。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最重要的是，他谴责“有人把苏联领导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从而想在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制造分裂”。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接着强调，他们“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彻底性而言，是斯

大林分子”，他们“是斯大林分子，因为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同斯大林一样地不调和，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对斯大林的这番颂扬中，主要的一点是赫鲁晓夫当着大约一千名经过挑选的客人的面，宣称他“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并以此感到自豪”。

由于发表了这样的讲话，赫鲁晓夫受到了苏联在场的上层人物的两、三次热烈掌声。我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这样的讲话使大多数在场的人感到意外，并且自发地鼓掌。虽说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提到了英国和法国以及它们对埃及的进攻，关于这一点他谈得很短并且是平心静气的，似乎是谈一件过去的事。赫鲁晓夫的主要攻击不是针对其他什么人，而是针对“把共产党人分成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的那些人，也就是针对南斯拉夫。

我认为，对斯大林的这种重新加以赞扬是赫鲁晓夫的一时的策略。鉴于苏共中央行将就意识形态问题举行全会，对俄国人来说，中国目前的态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全会应当在本月举行。

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莫斯科。

关于克里姆林宫的迎新晚宴，我再记下若干情况。布尔加宁提前一天邀请外国代表出席晚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国家的大使们抵制了这次晚宴。只有希腊大使来了，希腊现在在这里有一个贸易代表团，希望同俄国人签订一项好的贸易协定。

布尔加宁作为东道主几次发表讲话并请其他人讲话，主席团里讲话的还有：赫鲁晓夫两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各一次。伏罗希洛夫午夜通过电台讲了话，向同胞们祝贺新的一九五七年。最明智的是莫洛托夫的祝酒，他谈到各国人民的合作和友谊。马林科夫就最近一次全会关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强住房建设的决议向工会致意。卡冈诺维奇大叫大嚷地对共青团说了一

番不合场合的讲话，说共青团正同其他所有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违反了苏联官方的理论，因为从官方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

在谈到斯大林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这个姿态应当有其象征性意义。他从桌子旁站起来，环视整个格奥尔基大厅，走向中国大使，只向他祝贺新年并把他引到主席团桌子旁。赫鲁晓夫用这样一种方式显示了“苏中团结”。

给我指定的位置是根据苏联礼宾司按照在莫斯科递交国书的日子确定的名单。当大使们前去向主席团委员们致意时，我也去了。我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握了手。俄国人严格按照官方规定办事，好象“嘴里含着水”似的。没有人说什么，只有伏罗希洛夫老人带着诧异的神情问我：“您现在怎么样？”我回答说很好，他带着怀疑的神情重复了我的答话。当布尔加宁宣布晚宴的官方部分结束，邀请客人们玩乐一番时，米什卡和我就离开了招待会。

人总是希望新的一年比旧的一年好，因此总是兴致勃勃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年。很少有人对旧的一年感到惋惜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九五六年的结局如此糟糕的时候。

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莫斯科。

《政治报》驻这里的记者达沃尔·丘利奇根据编辑部的指示，就该报举办的“艺术和文化把世界联合在一起”这一新年征询意见活动请苏联几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发表最简短的讲话。我们本以为这一部分苏联知识界会多少自由一点，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会允许这些到过南斯拉夫，或者为我国公众所熟悉和尊敬的人满足《政治报》的友好邀请。

我们的预料落空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拒绝了我们的记者的请求，提出了一个嘲弄性的理由，说他不是“主持婚礼的将军”，也即他不是事先被指定发表逢场作戏式讲话的人物。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前不久到过南斯拉夫，带着良好的印象回国。列昂诺夫通过苏联作家协会告知，他很忙，甚至没有时间接见我们的记者。我们还找了康斯坦丁·费定，他连前两人所做的都没做。苏联作家协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后，立即告诉我们“找不到”费定，“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的记者最后找了奥维奇金，本书开头时曾提到他是非斯大林化新政策的坚定的拥护者，他带着最美好的印象从南斯拉夫回来。奥维奇金发表了表示否定的谈话，无法采用。芭蕾舞女演员加琳娜·乌兰诺娃讲了几句无法采用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和《共产党人》反对我们的指示性文章发表之后，苏联方面对我们的态度的气氛的恶化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证明我们国内的制度是不正确的，据苏联作宣传报告的人说，我们国内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物。权力下放、多民族、自由市场、经济上发达程度不一和竞争等因素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了。其结果是经济困难，这被说成是表明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正确的最好证明。在公开的报告会上，又在说共产党情报局第一个决议是正确的，第二个不正确。以党的名义正式作报告的人的回答表明，把南斯拉夫和它的领导搞臭的路线正越来越占上风。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莫斯科。

外交部副部长帕托利切夫一月四日十一点把阵营国家全体大使都叫到外交部去。会上向他们宣读了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帕托利切夫谈的纯粹是苏联的内政和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于计划工作领域特别重要，涉及新成立的经济

委员会的职权等等。帕托利切夫告知在场的阵营国家大使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叫南斯拉夫大使到会。他说，态度同苏联政府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国家的代表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 * *

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用于研究经济问题。从种种情况来判断，住房建设在苏联政府的经济计划中占据绝对的优先地位。据说，在莫斯科通常是：一家一个窗，一家一间房！在再次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标志下，对计划工作体制实行改变，似乎迄今的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还不够似的。我的印象是，十二月全会在人民中间没有产生本来指望产生的那种效果。全会足足开了五天，研究了意义极其重大的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我觉得人民期待的是别的东西。即便在经济领域内，全会也没有提出有关许多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政府没有公开承担义务，没有发表表明将从谁那里获取什么，将给谁什么这样的数字，没有说将给基本建设投资多少，也看得出来答应要给住房建设投放的巨额新资金从何而来。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莫斯科。

周恩来访问苏联一事，在他到达莫斯科之前就已成了一起政治事件。各界都在谈论这件事。他将于一月十三日结束对苏联的访问，然后去波兰，嗣后再回莫斯科。这象是在俄国和波兰之间进行调停。我不知道周是否去匈牙利。如果去那里的话，那就可以有根据地猜测中国在起调解人的作用，甚至准备起苏联和其他阵营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国家之间的某种仲裁人的作用。关于周去波兰的消息证实我们最初的印象：这次访问不是由于中国和波兰的双边关系，而是首先由于苏联和波兰的关系。

在机场上迎接周的时候，俄国人摆出了尽可能强大的阵容。布尔加宁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来欢迎贵宾，对于前来这里的大多数外

国客人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布尔加宁的讲话比较温和，照章办事式的。周恩来的答词长一倍，他的答词十分尖锐，对于隆重迎接的场合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依次攻击了英国、法国、以色列，接着是总共才发表了一天时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在招待中国客人的盛大午宴上，布尔加宁讲了话，似乎他是党的领导人，而不是苏联政府总理。他讲话的重点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上，放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以及苏中之间的永恒团结上。布尔加宁还赞扬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俄国人正在仔细地研究中国的经验。

在同外交团的代表见面时，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代表格外客气。尽管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周恩来象老熟人和老朋友那样同他们打招呼，而同我们其他人打招呼则是公事公办式的。在苏联为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又遇见了他。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莫斯科。

这里得到的印象是，苏联领导打算把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转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去。苏联政府准备取消，或者说任意延期我们之间最大的一项经济协定——关于所谓的铝贷款协定。

根据同东德代表团以及其他一些阵营国家代表团最近达成的一些协议来看，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在国内和在阵营内承担新的补充的经济义务，只是对南斯拉夫，苏联政府不准备履行自己的经济义务。显然，这完全出于政治上的理由，是由于我们在匈牙利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由于这里对我说的“缺乏资金”。

发人兴味的是苏联政府对待出售粮食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我看来，俄国人宁愿给你黄金，提供任何外汇的信贷，更不用说各种商品了，而不愿意卖粮食给你。很可能在这上面有某种传统的东西，担心收成没有把握。当某种东西成了一国人民的传统时，那是

不容易放弃的。因此，每当阵营中有谁要求他们提供一点粮食，即便是在对俄国人条件十分有利的时候，他们总是十分强硬。出于同样的原因，俄国人无论如何决不肯发表美国迄今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几千万吨小麦，而且往往是无偿地提供一事。俄国人怎么也向本国公众解释不清楚这件事，因此把它当作国家高度机密掩盖起来。赫鲁晓夫也显示了俄国人对粮食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对我说，他们向波兰人提供了粮食，而且是根据短期贷款提供的，把这件事说成是苏联方面的名副其实的功劳。在米高扬身上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向我谈到他们向东德人提供了粮食，似乎这比其他一切要重要得多。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莫斯科。

一九五五年五月，当我们同赫鲁晓夫代表团谈判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俄国人第一次向南斯拉夫表示将提供两亿美元的贷款，供在黑山建立新的炼铝工业。当他们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感到不满意时——铁托一九五六年六月访问苏联后我们也没有改变这种观点——答应要给的数字减少了一半。接着又减少了已经减半的这一数字，从原定的两亿美元中，他们给了东德人五千万美元，让他们把这笔钱借给我们，只是为了使他们作为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的一方出现，尽管我们同东德还没有外交关系，我们还没有承认它是一个独立国家。最后，现在俄国人向我们表明，他们将推迟几年履行对我们承担的信贷义务，而这一切，至少是现在，一无结果。据说，他们没有资金。正如我已经说过，真正的原因在于南斯拉夫人又同俄国人公开地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据我们了解，俄国人今年并不削减对亚非国家所承担的信贷义务。相反，象阿富汗和伊朗这样一些国家表示不可能利用俄国

人向他们提供的相当一部分贷款。不应当忘记，赫鲁晓夫率领的第一个代表团一九五五年五月抵达贝尔格莱德时俄国人就答应向我们提供的贷款，在我们之间经常起着政治作用。这是对苏联有利的，使苏联便于解决同我们的某些争端。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莫斯科。

东德中国的公报强调社会主义阵营无条件地有必要“在苏联领导下”保持团结。这是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经过较长时间以后又使用起这样一个提法：“苏联领导下的阵营”。俄国人甚至在二十大之前，更不用说二十大之后了，都不敢使用斯大林时期曾是法律的这一提法。现在又重新使用这一提法，并且散布消息说，据说，这是中国人要求的。《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和其他报纸，从一月十日起又重新宣传起这一提法来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莫斯科。

三天前，在克里姆林宫为东德人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我曾见到米高扬。他对我说，我们怎么还没有同东德建立外交关系，而据说铁托曾告诉俄国人，我们将在年底前建立这一关系，而这一期限已经过去了。我对他说，就我所知，从来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将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建立这一关系，而今天我们还有比同东德建立外交关系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的问题。从米高扬的这个问题中，以及从乌布利希前不久向我提出的类似问题中，可以看出在东德人和俄国人的谈判中，我们肯定是被列在日程上的，对于南斯拉夫问题，俄国人替德国人拟订了专门的方案，很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俄国人分别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等制订了专门的反南说法，作这样的推测是正常的。

或许我们驻地拉那公使馆一等秘书被驱逐一事同这种种方案

不无联系。在以前发生冲突的时候，在需要向南斯拉夫挑衅的时候，俄国人也总是利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充当俄国人手上的玩偶，用于证明我们南斯拉夫对这个巴尔干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小国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唯有这个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显然，俄国人还始终在内部把我国看成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某种附属国，再次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这里在某些场合又热衷于遵循斯大林时期的公式，如果没有彻底遵循这些公式，就认为还没有能够“象应该的那样”搞坏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俄国人认为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坏得还不到家，如果没有从哪个阵营国家里把我们的哪位外交官作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的话。理由总是从事间谍活动和搞颠覆。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莫斯科。

我认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哪一个国家也不象苏联现在这样，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如此大规模地颁发奖章和勋章。苏联中央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报纸一月十三日的大部分版面用来刊登哈萨克、乌兹别克、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沿海地区以及苏联其他地区由于去年丰收而获奖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名单。处于人们注意中心的是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共和国的“生荒地”，也即赫鲁晓夫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应当最终地解决苏联的粮食问题。《消息报》用百分之七十五的版面来刊登部分得奖者的名单！有十万零九千六百四十七名男女获奖，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共和国的政府和党的一百五十八名领导人。

很可能在大量颁发成功褒奖的战时，苏联报纸也不是这副样子。在受奖者名单的前面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以及赫鲁晓夫去乌兹别克和伏罗希洛夫去哈萨克的消息。赫鲁晓夫很可

能想把这件事变成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我听说，他要求制造出几吨勋章和奖章并予分发，这在苏联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通过对西伯利亚和中亚、乌克兰和内地其他地方这些凯旋式的访问，赫鲁晓夫将设法改变莫斯科国家和党的机关里的政治状况，因为很难相信，这一切只是为了获奖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才这么做。

这里从政治上已经较长时间在利用去年亚洲地区的丰收。即便在政治上没有必要在国内进行这样的庆祝，苏联领导很可能也会做些类似的事。鉴于阵营中从去年十月中以来发生的一切，对于苏联的制度来说，这样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加不可缺少。

特别是通过这场丰收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苏维埃国家的作用是正确的。苏维埃国家制订了计划、播种、收割，并且如此大规模地嘉奖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前不久在匈牙利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之后，现在正拚命制造一种胜利气氛。这同时也是对国外，特别是对南斯拉夫人的回答，南斯拉夫人曾公开批评苏联国内的制度和“玉米和土豆政策”，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会晤时，再次就此对我提出责难。

还有一点值得记载的是，在向国家提供的粮食最多，因而受到最高嘉奖的两百来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极大多数仍冠以斯大林的名字，而现在是他去世四年之后，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谴责他一年之后。以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名称的比例是一比二，斯大林居多数，而这是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斯大林的名字外——苏联极大多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冠以他的名字——接着是莫洛托夫的名字，其次才有个别的冠以赫鲁晓夫和列宁的名字，马林科夫的名字，只有一、两个冠以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对于衡量苏联领导成员在人民中的地位而言，或者说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地位而言，这样的材料也是重要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莫斯科。

遵照苏共指示作内部报告的报告员奉命不要明确提到南斯拉夫，但是要设法使人人都明白说的是南斯拉夫。因此，对于作为另一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专门谈，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应当专门谈，因为前者早就被揭露，而后者尚未被揭露，因此他们比社会民主党人还危险。

产生了一些不可能符合苏联领导心意的现象。例如，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谈匈牙利问题的党内报告会上，官方的报告员对一位听众提出的意见作出了十分尖锐的反应，这位听众援引某期《真理报》的话，称拉科西和格罗为“匪帮”。报告员说，这不确切，是卡达尔，而不是《真理报》这么称他们。在这次报告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斯大林分子拉科西和格罗是“集团”呢，还是“匪帮”？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在苏联？是谁逮捕了卡达尔？是谁让他蹲了多年监狱？南斯拉夫和波兰为什么没有参加布达佩斯会议？听众要求公布匈牙利大学生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言的全部十点内容。对于大部分这些问题都没有作答。

我们的记者丘利奇和杜热维奇今天告诉我，这里予以全文发表的中国党的声明仍在继续翻印，其规模之大甚至对于二十大的材料来说也是没有先例的。先是《真理报》、《劳动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和《莫斯科真理报》（如上所见，在莫斯科不是只有一种“真理”）以及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十五家主要机关报刊登了中国的声明的全文。接着是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新时代》和《国际生活》刊登了中国的声明。此外，还给中国的声明出版了专门的小册子，发行量数以百万份计。是否还需要别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表明，俄国人现在多么需要中国人给予他们的支持！

最后，还发生了一件别致的趣事：俄国人现在拚命攻击的卡德尔向赫鲁晓夫祝贺了一九五七年新年。赫鲁晓夫迄今没有回答他的祝贺。今天，一月十四日，我们接到了苏联外交部内容如下的一份照会：

“……外交部荣幸地送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名片，并请将此名片送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及其夫人。一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赫鲁晓夫的名片上留有签名。名片上用打字机打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新年的祝贺，致以最美好的新年祝愿。”一月十五日，我把这份不平常的照会，连同不平常的名片，通过信使带往贝尔格莱德。在那里，这一小小的邮件也必定被认为是一起独特的事件。我不知道，苏联政府以前是否向任何一国政府发出过象俄国人现在致我们的照会那样内容类似的照会。苏联政府这个不平常的行动的意思可能是，赫鲁晓夫不想同南斯拉夫，也即同南斯拉夫领导人保持任何关系，极严格的官方关系除外，而且仅仅是在“国家方面”，即令是新年祝贺也罢。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莫斯科。

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正在这里，该代表团前来这里同苏联政府谈判迫切的经济问题。我们的代表团由尼古拉·明切夫率领。俄国人甚至拒绝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为了“在党的方面”更加顺利地攻击我们，俄国人不想报道“在国家方面”正同我国政府进行谈判。就这样，对于公众来说，在莫斯科已经呆了十来天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个代表团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这造成一种不愉快和施加压力的气氛，使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七日，莫斯科。

据我们所能判断的，中国在莫斯科的第一阶段的调解使两大伙伴双方都感到满意。这可能对苏联特别有利，因为俄国人现在不断公开地强调，他们有这样一位强大而英明的朋友站在自己一边。而中国目前的态度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中国报纸发表而由苏联报纸转载的文章中看出。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莫斯科。

跟其他领域内一样，这里在总的被称做意识形态的那个领域内，也忙于“整顿秩序”。哲学方面要求格外提高警惕，以免资产阶级思想渗透进来，人们事先就知道哪些思想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敌对的思想。对于这里的习惯来说，并没有使用过份厉害的字眼，但是人们觉察到领导人现在这次干预是当真的，这是不会出错的。这实际上是对任何问题采取比较自主和别具一格的态度威胁，并使这一方面的全部活动从属于国家当前的政治需要。

由于维护国家和党，而这意味着维护行政对文化、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直接和日常的领导的原则，因此对这一原则提出任何哪怕是最缓和的直接或间接的意见都受到批评。甚至不允许对个别人或者对专业组织的管理机构使用“领导不民主”这样的措词，因为这是“诽谤现有政治制度”，据官方断言，这一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只应该采用这一制度的形式和利用这一制度的可能性。这样的批评，连剧院也不能幸免。有人把未经允许的翻译过来的脚本列入节目而受到谴责，剧院委员会和导演受到威胁，要他们注意自己在干些什么。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中心城市喜欢受批判的戏剧的观众，被宣布为“落后分子”，据发现，这样的观众身上存在“资本主义意识”的残余，对于这一点，剧院、出版社、电影、记者等

等都应加以考虑。在造型艺术方面，热衷于赞扬印象主义是艺术方向的人，都受到批判，苏维埃社会里是不应当存在印象主义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略有微词的人，全都受到攻击，他们被公开地称为世界反动派的奴仆。

甚至精密的科学也不能免于受批判，就事物的本质而言，精密的科学本来是有所不同的。现在，在精密科学方面，开始谈论所谓的党性原则和国家机关的干预在这方面开始妨碍科学的发展的人受到批判。

现在的批判涉及的面很广。二十大以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愿望，要求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生活民主化。现在则在各个领域内都强调必需粉碎这些倾向，口实是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作积极的斗争，似乎所涉及的是微生物和细菌。

同时，“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本身”的人受到谴责。要想使某人无法从事活动的话，就可以宣布他是这样的人。当然，这样一来，还使反对“个人迷信”的任何言行停止下来，官方规定的反对是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就可以看清，苏联的国家和党联系外界的事件，在国内意识形态方面奉行加强控制的方针。就这样，冷战渗透进苏联社会的每个角落。

中国的调解作用

周恩来访问波兰和匈牙利。在克里姆林宫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建议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苏中宣言。我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艰巨的经济谈判。同赫鲁晓夫谈话。苏联卖石油给法国，而拒绝卖石油给南斯拉夫。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莫斯科。

在苏联报纸本周所报道的政治事件中，周恩来在莫斯科的逗留仍然占据首位。双方为他举行了宴会，时而是苏联方面举行，时而是中国方面举行。在这种活动中，彼此似乎都想超过对方。中国人一月十七日举行了一次这样的宴庆活动。这次招待会还由于赫鲁晓夫发表了类似他在克里姆林宫迎新年时的讲话而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讲话开始时，赫鲁晓夫说，他想谈谈苏中友谊，这一友谊十分强有力，他只想谈这一友谊。赫鲁晓夫接着说，他这次不谈帝国主义和别的事情，免得败坏他这种强烈的感情，在他讲到需要强调他是共产党人的地方，布尔加宁打断他的话说，“有人说他是斯大林分子”，说得很响，连站在比较远的地方的我们也都能听到。赫鲁晓夫接过这一或许是事先商量好的插话，话锋就转为赞扬斯大林，象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祝词一样：“他们（毫无疑问是指南斯拉夫人）这样公开地称呼我们（指斯大林分子），想给我们抹黑，然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这只能是他们对我们的赞扬

和称赞。”如果我们全体共产党人在忠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方面,能做到象斯大林那样,那对苏联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更大的期望了。“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榜样,他将作为这样一个榜样永远名垂史册。”

周恩来的华沙和布达佩斯之行是令人感兴趣的。华沙和布达佩斯这两个首都,尤其是后者,对于苏联的政策来说,是格外敏感的地方,中国人的访问触痛了苏联的伤口。可以推测,周恩来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到这两个国家去的,并且是同他的调解者的使命有关的。

在中国的招待会上,我同周恩来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周恩来坚持认为,南斯拉夫应当继续支持纳赛尔和埃及。他再三重申这一点,好象我们正在改变对埃及的政策似的。我被迫最后告诉他,就我所知,铁托是最正式地给予埃及以无保留的支持的第一位社会主义国家元首,从纳赛尔掌政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同埃及发展了友好关系。我期待他谈谈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关系,这种关系过去不好,现在也不是最好,但是周恩来对此只字不提。

出席招待会的有七、八百名客人。评论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讲话,他的讲话常常被掌声打断。这一晚上是在显示苏中团结的气氛中度过的。俄中的谈判尚未结束。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为周恩来举行的招待会是在不同于迄今为这位中国贵宾举行的类似宴会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中国人举行的招待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和周恩来争相表达友好感情,一片掌声和关于苏中团结的口号声。与此不同的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这类表演要少一些。东道主布尔加宁和周恩来各自念了一篇因袭俗例的祝酒辞。赫鲁晓夫没有讲话。人们感觉不到

迄今围绕着周恩来那种气氛。一些西方代表问我，是否知道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招待会开始时，由一批经过挑选的苏联艺术家进行演出。主宾的位置在第一排，在布尔加宁旁边。招待会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就离开了东道主布尔加宁旁边的位置，通过中国大使馆的人员找到我，说他想同我谈话。就这样，我来到了第一排，那里本来没有我的位置。通过说俄语的中国翻译，周恩来谈到以下内容：

关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目前的形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状况，他的意见是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的代表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将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原因和导致它们之间的严重冲突的原因。会议可以在二月底或三月初举行。周恩来请求把这一番意思转告铁托同志，因为他们想知道，铁托同志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有益的，或者是无益的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

如果铁托同志认为这是有益的，如果南斯拉夫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建议，在他目前访问阿富汗和尼泊尔之后——他今晚就离开莫斯科前往这两个国家访问——他将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如果铁托同志认为南斯拉夫不能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周对我国现在这次访问就吹了。周恩来将以后去南斯拉夫，关于这件事两国政府以后再行商定。

周恩来对我说，他提出的建议，现在在南斯拉夫的中国议会代表团团长彭真完全知情，彭真并受权同铁托同志商谈这个建议并使铁托同志了解全部细节。彭真还没有机会会见铁托同志并让他了解这一建议，因此周把这一切通知我。我答应今晚我就打电报，告知铁托同志、我们中央和政府。为了能够更加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的建议，我以个人名义请周恩来作某些澄清，在我看来这种澄清是必不可少的；我问周，他能否告诉我，召开社会主义国

家的党和政府代表的这次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会举行？

周恩来对于我的问题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并作了回答，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明确地作了回答。他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

中国之所以提出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代表会议的建议是由于周恩来访问了阵营的欧洲国家。

会议的每一个参加者想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周恩来明确地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作出强加于任何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恩来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我们不参加证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削弱了。他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们才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

就他访问南斯拉夫一事，我向他说了几句话。我们驻北京大使馆正在办这件事，就我所知，这件事同任何会议无关，就访问的日期而言，我国政府愿意考虑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说，不管他现在提出的建议怎么样，也不管南斯拉夫对于他提出的会议建议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始终会受到人民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友好欢迎。我们希望同中国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全面的合作，不论现在的冲突如何，也不论我们是否参加会议。我局限于只代表我个人讲话并且只是现在从他那里才了解到整个这件事，我表示担心近来的事态发展对于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来说并不是很适宜的。

至于创办各国共产党的一份新的意识形态杂志一事，我对周恩来说，我们完全从私下听说在准备办这么一件事。从官方途径，我们一无所知，因为关于这件事官方没有人对我们谈到，没有，都没

有谈到。周恩来说，他们反对这样的做法，这个问题可以在建议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周恩来谈这个问题以及谈各国共产党之间会商问题的方式，使人感觉到，对苏联迄今的做法有一种明显的批判的调子。

谈话期间，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到苏联。谈话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布尔加宁边上的周的座位一直空着。这一切为在场的俄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为外国记者注意到，有些外国记者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就拟好了报道。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三天前的苏中声明完全是谈世界形势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除最后一段外，没有谈到苏联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但是却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谈的：双方确认它们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有责任维护团结，并且明确地说，这两个国家将继续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全世界的牢固的和平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家关系极其严格地服从于意识形态目标。声明是“国家的”，而不是“党的”，这使得上面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评价阵营中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意识形态依据和标准，系取自《人民日报》最近的几篇文章。

周恩来甚至通过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的花圈缎带上的祝辞，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俄国人和中国人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立场。这场争论暂时的解决也是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有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在献给列宁的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革命导师弗·伊·列宁”。在另一个花圈上则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这样一来，周恩来再次肯定了中国对斯大林的立场，认为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四位经典作家之一。这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没有反对中国这样的观点。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今天我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谈到的话题是发人兴味的。刘晓说，中国留苏学生的费用和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费用太大。他问，我们一九四八年以前这方面是怎么搞的。在我看来，到处都是首先同苏联专家打交道出现困难；以后才产生其他的问题。我告诉中国人，我要回贝尔格莱德，我们同苏联政府的谈判遇到了困难，苏联政府再一次推迟同南斯拉夫就提供信贷达成主要的协议。俄国人的态度看来没有希望变好。看来，俄国人事先就作出了否定的决定，不会进行谈判；问题只是在于苏联要求我们赞同他们的片面的决定。

中国人竭力不讲任何可能意味着他批评苏联的话；同时他又给人以他同意我的意见，理解我们的处境这样一种印象。南斯拉夫的处境比一些国家要糟，例如比印度，或者土耳其，或者伊朗。我有一次想同赫鲁晓夫谈谈这件事，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们公开说，你们跟印度等国一样，那就谁都不会碰你们。问题在于我们也是共产党人，而俄国人不允许有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又不照他们的模式办事，他们对于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一切并不享有意识形态垄断权。

* * *

英国大使海德终于离开了莫斯科。他之所以离开，很可能是由于他对同苏联建立较好的关系的希望破灭了。作为本国的代表和在莫斯科外交团大多数人中间享有威望的一个人，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最近我同北越驻苏大使见了一面。我们就我们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进行了谈判。我不怀疑我们的谈判会顺利地结束，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行的类似谈判已告结束。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贝尔格莱德。

我在这里已经有几天功夫了。我应召回来“汇报”，因为在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消极的东西。

从贝尔格莱德可以看得清楚些，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事情到底复杂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一国政府通过本国大使馆通知对方政府的事宜外，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之间定期还有书信往返，实际上这是一场争论。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除了国家和党的平行渠道之外，彼此还公开指责，不论是通过官方的新闻机关，还是通过个别领导人的讲话。就后果而言，公开所做的事要比信中写的内容更为重要。尽管双方在这些信件中不断强调希望合作，寻求共同的解决（指一方所持的观点），这些信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南斯拉夫方面和苏联方面所采取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步骤目的都在于冲突双方中的每一方尽可能忠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冲突的实质在于我们批评苏联对阵营国家奉行霸权政策。同时，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建立新的、民主和平等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我们具体地批评了苏联过去和现在在阵营内所做的一些事，特别是批评了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

苏联当然不会接受我们的批评，尤其是当这种批评是公开地提出的时候，尽管苏联的领导人甚至也知道我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一个小国谴责一个大国，而这个大国公开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例。我们没有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也没有能够说服我们，彼此的距离反而越来越大。苏联新近决定把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论战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的行动又使上述的趋势加速了。

为了研究同俄国人的关系和争执，我们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几乎已经不可能停止两国领导之间的书信往返，或者说停止论战。在我看来，要是南斯拉夫停止同苏联的这种书信往返，或者说停止一切论战，它势必会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不是别人，恰恰是俄国人明天就会对它说：你们被迫停止论战，因为你们明白自己错了。不过，还是得停止这种党内的书信往返，因为完全清楚的是，以这种方式是什么也不可能达到的。

俄国人对这种书信往返有自己的看法。因此苏联的通信也适应于这种情况。他们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与其说是给我们的，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对于苏联人来说，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政府和公众中间把南斯拉夫领导尽量搞臭，要比停止同南斯拉夫的进一步冲突来得重要。我们听说，俄国人把致我们的全部信件送给阵营各国的领导，而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对南斯拉夫又说这些信是绝密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贝尔格莱德。

正当我们在敲定我们中央委员会致俄国人的又一封信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从莫斯科得到消息说，苏联政府代表在同我国政府代表团进行经济谈判时态度恶劣。我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已经是第二个月了，不时同苏联政府代表团碰碰头。然而，有理由猜测，在同南斯拉夫签订信贷协议的问题上，早在邀请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就此事进行谈判之前，俄国人在最高一级就已作出了否定的决策。

关于两党中央委员会的书信往返，我们方面决定，把我们现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件的复制件以及我们同他们进行的全部通信，送给同我们保持正常联系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援引了俄国人开创的先例。

中国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不会为我们方面所接受。除了其他原因，还因为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遭到苏联方面的压制，我们还遭到中国方面的毫无道理的攻击。其他阵营国家利用了这种情况；它们现在跟不久前一样地继续攻击南斯拉夫。

我们作出决定，让我过一、两天返回莫斯科，要求同赫鲁晓夫谈谈，设法使事态的发展比较有利。南斯拉夫不仅不希望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准备停止这场冲突，尽管南斯拉夫仍然坚持它以前提出的基本观点。

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来南斯拉夫共青团的档案的消息，在贝尔格莱德受到欢迎。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莫斯科。

我昨天要求赫鲁晓夫接见。他今天午后接见了。谈话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因为赫鲁晓夫不断延长讨论。尽管谈了那么长时间，没有谈出多少新东西。这里我记下谈话的某些部分。

我向赫鲁晓夫转告了铁托同志对于克服我们之间的困难以及使我们的国家关系继续积极地发展的必要性的看法，我最近同铁托同志谈过话。我详细地指出扩大国家关系方面的冲突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从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以及从他们对于推迟，实际上是拒绝就铝和苏联其他投资信贷达成协议一事所持的态度可以看出，事情正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我还指出，在就今年的易货进行谈判时，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向我们提供他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大量提供的某些产品。

我谈到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南斯拉夫根本不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因为这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如南斯拉夫在阵营之外是一定的环境的产物一样。我们十分坦率地谈到苏联试图把我们拉进阵营以及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从这样的

政策中吸取教训，在现有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关系。我还谈到，在我看来，这里正越来越奉行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就是通过我们之间有争论的一些问题来看待我们的关系，并且把自己局限于不一致和有争论的问题上。我们曾经一致同意，我们应当不这样做，应当首先在意见一致的地方发展关系，而这样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得到赫鲁晓夫的谅解。他开始从我们对于有争论的问题的态度谈起，从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封信的内容谈起。说这是一个尺度和证据，表明我们之间出现了冲突，而且不象要和解。他说他们将答复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当然是作否定的答复，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信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赫鲁晓夫说，他认为，这样的书信往返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尽管局势这样，他们不得不回答我们。他们不回答的话，就会显得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

至于信贷协议，赫鲁晓夫干脆就说，他们由于缺乏资金连自己的企业也不得不停止兴建，因此他们也推迟兴建我们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我对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两码事。他们随时可以决定推迟兴建自己的企业或者盖别的工厂，这完全是他们内部的事情，谁都无权干涉。他们通过协定对另一个国家承担了义务，象这一回对南斯拉夫承担了义务，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作出单方面的决定，象处理他们的内政那样行事。

赫鲁晓夫说，在苏联，谁都无法理解他们在经济上进一步为南斯拉夫作出任何牺牲。我们攻击了他们，我们谴责苏联的制度，我们甚至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说，可能出现影响经济协定执行的非常情况，而这样的非常情况就是波兰、匈牙利、

东德和其他国家的需要。赫鲁晓夫说，俄国人必须向它们，而不是向我们提供资金。

我问他，关于这件事，苏联政府是否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在这里已经坐了第二个月的冷板凳，徒劳地等待会谈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明切夫是否可以回国，赫鲁晓夫说，他可以回贝尔格莱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变化。我指出，我国代表团在这里事实上并没有象他们的信通知的那样，进行谈判。他们叫我们的代表团到这里来，只是要求代表团在苏联事先准备好的方案上签字。我们不能这样进行谈判，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别的情况下。

这一场讨论是完全不符合赫鲁晓夫的心意的。我只是提出经济上的论点，对我们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只字不提，我提到有关苏联代表团的做法的某些事实，提到这种做法给南斯拉夫经济造成的损失。赫鲁晓夫则相反，不断地提出政治上的论点，而不谈信贷协议的具体的财务问题。最后，赫鲁晓夫说，我对于苏联政府这样的决定给南斯拉夫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说明或许是确凿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对于行将出现的后果，苏联不负责任。是南斯拉夫公开攻击了苏联，而不是苏联公开攻击了南斯拉夫。

我还提到我们现在正在莫斯科进行的有关今年易货的另一个商业谈判。他们甚至拒绝向我们出售他们大量地出售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成员国的商品。例如，他们卖给法国大约两百万吨石油，而南斯拉夫，连四十万吨都不卖。我们的人民不可能理解这种做法。他们卖石油给法国，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相反，我认为，人们只会欢迎苏联政府的这项决定，但是使我不理解的是他们同时又拒绝卖给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对于这个事实未加否认。他说，他们必须向阵营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向它们购买苏联并不需要的商品，这不是平等基础上的贸易，不是按照互利原则符合双方利益的，而是往往有损

于苏联。我们坚持对苏贸易的互利原则。赫鲁晓夫接着说，现在事情就这么办着。我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有同南斯拉夫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贸易的，在同我们谈判时他们就更不应该如此刁难。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还提到了许多问题。赫鲁晓夫长时间谈到铁托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本指望他在普拉的讲话会产生另一番效果，因此他把他们苏联领导分成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想找到可以用来使我们之间的争吵加剧，也即使苏联的地位得到改善的一切情况，他说，铁托公开侮辱他，不称他为我们那里和他们这里习以为常的“同志”。他说，他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讲话。赫鲁晓夫再一次攻击卡德尔，因为卡德尔嘲笑了俄国人所奉行的“玉米和土豆的政策”。他强调这是对他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因为众所周知他管农业。赫鲁晓夫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怒不可遏，给人的印象是，他本人确实受到伤害。

我说，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封信交来前后，我都同铁托同志谈过话，我向他介绍了铁托的这样一个看法：不使冲突尖锐化，不使冲突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继续进行友好的合作，是于我们双方都有益的。我提醒他，我们最近的一封信只是回答了他们一月十日的信，今后大概也会是这样：一封信引起另一封信，这么下去，看不到会有一个终极。

俄国人把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当作最近关系紧张的口实，尽管他们早在得到我们的信之前就使关系紧张了。赫鲁晓夫对我说，卡达尔告诉他，而保加利亚人来这里时也同样告诉他，他们从我们那里得到了我们和苏联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通信。我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作了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俄

国人从一开始起就通知了各国共产党领导，而我们只是现在才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迟，因为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这种书信往返只是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事。赫鲁晓夫很不高兴地说，对于这种做法，他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在谈话中，每当我谈到，我们的制度让我们来安排，他们的制度听凭他们去处置，由各国自己去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制度，而在我们现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上，实践和时间以及相互间的良好愿望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赫鲁晓夫多次热烈地表示赞同。然而，每当我接着说，这么做的条件是我们不要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譬如不要象他们现在这样拒绝签订信贷协议，赫鲁晓夫就改变观点，重提一切有争议的事情。

赫鲁晓夫援引一个美国记者的报道说卡德尔前不久不在贝尔格莱德，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卡德尔大概到一个僻静之处起草了我党中央委员会致他们的最近的一封信。他接着说，在他们党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最近的答复，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赞同苏联领导对南斯拉夫迄今所采取的态度。

赫鲁晓夫生波兰人的气。他说，哥穆尔卡给了他们一封信，尽管十一月份同苏联签订了协定，这封信拒绝提供十一月份接受的那么多的波兰煤。赫鲁晓夫嚷嚷起来：“我们要停止向他们提供小麦，今天有谁象我们给波兰人那样，用贷款提供面包！”赫鲁晓夫气呼呼地说，波兰人把煤卖给西方，换美元，又用我们俄国的粮食来喂猪，把猪卖给英国人，好象这一切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似的。而我们却没有停止向他们提供粮食。难道这是平等的贸易吗？不是，这是我们在承受牺牲。赫鲁晓夫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在为小国作出牺牲，“而你们和别的一些人还说我们是杀人凶手”。同其他阵营国家的经济关系也是相类似的，是不平等的，是有损于苏联的。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很需要保加利亚的辣椒，我们不能没

有辣椒，不过保加利亚人也没有别的东西卖给我们”。

在谈到改组对工业的管理的新体制时，赫鲁晓夫兴奋地谈到这一体制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说，他的报告被一致通过了。个别部长有点牢骚，但是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他只用了十四天时间准备这个报告。正在起草新组织的方案，据料，到一九五七年六、七月间，一切都将完成。他本人继续掌管与此有关的一切重要措施，从一开始起就是由他负责的。

当我深夜回到大使馆，谢皮洛夫的副手帕托利切夫打电话给我，问我如果他们在报上发表，说我去见了赫鲁晓夫，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第二天，所有中央报纸都报道说，赫鲁晓夫应我的要求接见了，进行了谈话，除了这条消息外，还报道说，中国大使也去他那里了，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们对有关拜会的两条消息所作的这一区分，是为了他们的公众不致偶或，哪怕是一时，产生误会，以为我的拜会改变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迄今的政策方针。

关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同十二月全会相反的决议。“集体领导”中的力量对比是否在改变？中央的两项不同的“决议”。谢皮洛夫被撤换。南斯拉夫同欧洲的阵营国家发生冲突，而同亚洲的阵营国家加强联系。南斯拉夫和苏联签署新的贸易协定。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九日，莫斯科。

又一次可以看出，俄国人和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的。我已说过，俄国人把这看成是我们彼此接近以及以后我们加入阵营的一个预备阶段。我们对同一件事情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从我们方面尽可能成功地行事，以便苏联尽量多地、尽量快地离开自己旧的、斯大林主义的路线。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就是最有力地帮助俄国人在苏联和阵营内贯彻二十大的决议和非斯大林化政策。

阵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表明，这两种相反的预料一个也没有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国和小国的关系表明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国和小国的关系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以为一个社会主义小国，具体地说是南斯拉夫，可以对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超级强国，具体地说是苏联，施加比较重大的影响，如果这不符合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基本利益的话，看来这是一种幻想。

要是苏联领导越是背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是他们从苏

联最高领导开始越是同秘密报告所谴责的那种政策的代表人物妥协，那么就更难能谈什么南斯拉夫和苏联基本利益相吻合了。每当苏联领导认为，它被迫暂时放弃秘密报告所提出的政策而实行它以前加以谴责的政策，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就会发生公开的冲突。

且不说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分歧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很大的，尽管关于这一点谈得不多。在官方的公报中，我们同他们一起得出了一个提法，就是双方对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是“接近的或者是相同的”。我认为，这一提法远非是正确的。存在不少重大国际问题，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立场是不同的和相反的，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接近的或者是相同的”。

我们迄今同苏联的关系的经验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不谈在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而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了，公开讨论的就只是这些分歧了，似乎我们之间除了分歧外，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似乎不存在哪一个领域我们可以正常地和乎等地合作。例如，现在我们关系的前景看上去远非是有利的。对于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不同道路的一致看法，在这里要比二十大时我们南斯拉夫人以为的那样更难行得通。在大会召开以后的这一年时间中，我认为，苏联新领导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远离大会的精神。去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宣言》接受了上述观点，这一事实眼下对苏联没有任何影响。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莫斯科。

我从贝尔格莱德回来的那一天，莫斯科这里发表了苏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全会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管理的决议。当你哪怕是极其肤浅地对比一下这次二月全会的决议和两个月前就同一个问题举行的苏共中央上一次全会十二月全会的决议，你必

然会产生一些问题。

十二月全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是进一步加强国家从一个中心领导经济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建立了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关，诸如“国家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以前只有苏联政府本身才拥有的十分大的权限。这一决议是符合旧的刻板公式和关于苏维埃国家在领导国民经济方面起着无所不能的作用这种斯大林主义观点的精神的。这项决议还标志着在组织和领导经济的行政方法方面中央集权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十二月全会的决议比较短，这是不平常的，因为这里照例就各种各样问题通过十分冗长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讲话，一点也没有发表，考虑到他的党的领袖的职务，考虑到他本人很关心这些问题，这一情况也是惹人注目的。

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的决议好象废除了前一次全会的决议，并且以苏联的方式宣告了国民经济领域内的一项新政策，同党的同一个最高机构十二月时所确认的政策背道而驰的一项新政策。同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关相反的是，二月全会的出发点是，苏联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分散在苏联辽阔的国土上，从一个中心来领导是不可能想象的。全会谈到要使苏联经济“区域化”，不仅扩大共和国和州的，而且扩大地方机关领导企业和工地的权限，仅仅计算比较大的企业和工地，苏联今天就有三十多万个企业和工地。

如果二月全会的某些基本主张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只会使莫斯科的中心削弱。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本身就牵涉到苏联最高层提出如此不同的决议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关系。

可能与这种情况有某种关系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任命莫洛托夫为国家监察部长的决议，还有两次全会就经济作出的相对立的决定，文艺领域内的紧张气氛等等。赫鲁晓夫在十二月全会上不象

在最近这次全会上那样活跃，在最近这次全会上他掌握着主动权。因此，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老是强调二月全会，而对十二月全会，则不谈。十二月全会决议的倡议看来不是赫鲁晓夫，不是党提出的，支持这些决议的似乎是苏联政府及其机构。我所谈到的所有那些决议，据说都是一致通过的。这里历来是这么做的。现在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了，苏联领导也是一致的。谈不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或者马林科夫的观点有什么不同，至少就他们的公开活动而言是这样。在同我谈话时，他们是一致的，这样的谈话次数很多，尤其是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

苏共中央一、两次全会的不同的决议很难能加强不同集团间的团结，据悉，苏联政治最高层是存在这样的集团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最近，德·特·谢皮洛夫被撤去苏联外长的职务。他重新担任以前担任过的同一职务，在再次被任命为党中央的书记之一。对于外交部领导人的这一变动，赫鲁晓夫十分不能令人信服地谈到了某些原因。他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中央书记的地位比外长的地位高，新任部长将执行前任部长一周以前所作的决定，苏联的对外政策不取决于外长个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由党和苏联政府规定的。当我提到谢皮洛夫被撤换时，赫鲁晓夫以嘲弄的口吻说，他们之所以撤换他，是因为他在最高苏维埃对南斯拉夫说了一番坏话。随后他说，谢皮洛夫在中央委员会比在外交界更有用。

接替谢皮洛夫的位置的是第一副部长之一的安·安·葛罗米柯。一些西方人倾向于认为，选择葛罗米柯这个莫洛托夫以前的宠儿和“不先生”^①意味着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强硬路线得到了加

^① “NIJTMEN”，指葛罗米柯在外交谈判中态度强硬，总是说“不行”——“NIJET”。——译者

强，而同谢皮洛夫不同。谢皮洛夫是在放松政策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一政策失败了，因此谢皮洛夫也随同这一政策垮台了。

外交团里别的“苏联通”则断言，苏联外交部领导易人没有什么意义，不必指望苏联对外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两派都提到谢皮洛夫当外长的不寻常的历史，指出他是在去年六月铁托抵达此间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前一天，几乎是戏剧性地被任命接替莫洛托夫的位置的。苏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全会解除了谢皮洛夫中央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他一九五六年六月担任外交部的职务。现在，在这次全会开过一个月之后，谢皮洛夫被解除了在外交部的职务，重新到中央委员会任职！

即便在别的哪个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这里肯定有文章，更不用说发生在苏联了。在苏联，一当部长就是几十年，有的几乎是终身部长。赫鲁晓夫对我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我认为，应当把这一变动看成是谢皮洛夫个人的失败。在莫斯科这里也好，在他代表苏联出席的国际会议上也好，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外交活动。看来，谢皮洛夫哪一国外文都不懂，不熟悉基本外交手腕，这在苏联条件下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是一种手艺。很可能这些事情妨碍了谢皮洛夫在国际上起比较活跃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他的被撤换也起了作用。

不必对这一变动赋予特别的政治意义就可以预料，葛罗米柯将跟谢皮洛夫一样仅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独立执行人，主席团，或者说身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控制，只会得到加强。

我还记得谢皮洛夫举止中的一个场面。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进行自己的那次出名的第一次访问时，他把谢皮洛夫也带去了。有一次在铁托那里吃午饭，我们总共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谢皮洛夫。赫鲁晓夫往往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趣闻和窘境，他问及谢皮洛夫他说的情况是否对。谢皮洛夫取下跟我们大家一样夹

在衣服上的餐巾，从椅子上站起来，象军人向上级作报告似的回答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是这样！”，嗣后又坐下。谢皮洛夫这样做，赫鲁晓夫居然接受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异乎寻常的。

赫鲁晓夫和谢皮洛夫之间的关系就象是一位将领和一个士兵之间的关系，这还是不久前的事，不到一年时间的事。谢皮洛夫那时飞黄腾达，出人意料地当上了苏联外长。在我看来，谢皮洛夫忘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是这样！”正是这种驯从的姿态帮了他的忙，使他爬上了最高的位置。除了他能力差之外，看来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从这一职位上被撤了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在克里姆林宫为保加利亚代表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俄国人派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最强大的阵容参加。俄国人以这一方式来显示保加利亚人同他们是“平等的”。我没有料到他们在苏保友好大会上对我们进行攻击以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为保加利亚人举办的招待会演出节目期间竟然邀我坐在一起。

我们就座以后，我是坐在赫鲁晓夫边上，他问我是否看到了贝格莱德《政治报》上的反苏漫画。赫鲁晓夫接着说，报纸就对纳赛尔的态度把他和布尔加宁丑化了一番，画得很丑，赫鲁晓夫甚至用了“卑鄙的”这个词。他说，这使他们受到极大的侮辱，因为在苏联是无法设想有人用漫画来丑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我告诉赫鲁晓夫，我没有见到这幅漫画。我搞不清楚，在克里姆林宫，在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代表团”举行音乐会期间，赫鲁晓夫的手上怎么会一下子出现了一份《政治报》。他把报纸递给我，象是出示某种“罪证”似的，并等着我向他解释他提出了异议的这幅漫画的意思。在场的别尔乌辛，也是主席团委员，冲着我来了一

句：“难道这也是友好行动？”

我看了一眼这幅漫画，我说，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不会喜欢这幅漫画，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讽刺的是赫鲁晓夫。讽刺的不是他，而是艾森豪威尔（两人都是秃头，画得不好就可能彼此相象）。这使赫鲁晓夫感到意外，他得悉讽刺的不是他，而是艾森豪威尔和布尔加宁就松了口气。接着赫鲁晓夫就向布尔加宁解释，他们弄错了。布尔加宁显得受了侮辱：把他跟艾森豪威尔一起画在漫画里，这意味着在对埃及的政策这件事上把他们是等量齐观的。赫鲁晓夫平静下来，他琢磨起来，把布尔加宁画得象不象，并且发表意见说，报纸发表编辑部想发表的东西，而编辑部又发表上级要求他们发表的东西。

我试图加以解释，把某个南斯拉夫记者写的东西，或者我们的某个漫画家画的东西都说成是南斯拉夫政府要直接负责的事，是没有意义的。报上发表的文章和漫画，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我们的领导人往往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和漫画，但是往往就发表了。

赫鲁晓夫发现布尔加宁心情不佳，他就又争论起来，或许是为了显示他同布尔加宁是团结的。他说，我们把苏联和美国对埃及的态度看成是一样的，这促使我们把苏联和美国画在一起。我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肯定没有画这幅漫画，而且与此无关。别尔乌辛听说漫画上画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艾森豪威尔，就再也没有作声。

这里说的是《政治报》一月十七日登的朱姆胡尔的一幅漫画。俄国人，而且是党的领袖和苏联政府总理出面干预，尽管这种干预是不适当的，几乎是可笑的，我认为，至少现在应当对我们的漫画家，对大报的编辑部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再采取类似的行动，不要画苏联领导人的漫画。

我告诉赫鲁晓夫，在这里就有争议的经济问题(贷款)一无成效地进行谈判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已回到了贝尔格莱德，而我们的贸易代表团还在莫斯科。我们的人已经等了第十天了，在等苏联对口方面请他们去继续谈判，我们代表团团长同样等了这么久，在等苏联部长卡巴诺夫接见他。

赫鲁晓夫装作感到奇怪，向我表示这不是苏联领导的态度，他把米高扬叫来，问他“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米高扬从赫鲁晓夫的语调和脸部表情立即领会到，应当承认我说的是真情，他说，他第一回听说有这样的事，他们方面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和别尔乌辛也重复了这番话。赫鲁晓夫说，他们想同我们做生意，他们希望同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又说对我们“不会再作任何的让步”。我说，我们不同意谁向谁作了让步这种说法，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说过，我们以后很可能还要谈。

赫鲁晓夫夸奖了同保加利亚人的谈判。他说，“话只讲了一半”就把一切问题谈妥了，说他们之间存在充分的信任。我说，要是他们同保加利亚人的会谈没有共同地、公开地攻击南斯拉夫，那就更好了。我向他引了苏联报纸发表的于哥夫在布尔加宁举办的官方午餐上的讲话。讲话里谈到，南斯拉夫感到遗憾的是保加利亚没有爆发武装冲突。我问赫鲁晓夫，这样的无稽之谈意味着什么。

考虑到于哥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在几次招待会上进行了攻击，我没有走过去同保加利亚人打招呼，尽管我本人是认得于哥夫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几天以前，美国大使波伦要求同我谈话。他说，他要回华盛顿述职，在走之前他想“核实一下”自己的看法，要求晤面。

可以设想，美国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会

晤，是不大符合苏联政府的心意的。我们并不指责俄国人使他们自己同美国人的关系搞得比我们还紧密，并且想更多地发展这种关系。俄国人想使我们同美国代表的联系完全中断，如果这种联系是不受莫斯科控制的话。

波伦对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苏联国内局势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趋势作了正面的评价。他认为，不可能回复到斯大林主义，虽说俄国人在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加强控制。他认为，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中的最薄弱的环节。至于两、三个月前人们议论到的人事变动，波伦认为，不会有任何变动。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地位在一月之后，特别是在二月中央全会以后更为巩固了。他不认为撤换谢皮洛夫有什么重大意义，波伦说着流利的俄语，称谢皮洛夫为“进步的德米特里”。

最后，波伦说，他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些什么，他跟杜勒斯相处得本来就不太好。他不知道俄国人真想同美国逐步改善关系，还是不想。我根据同赫鲁晓夫的谈话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俄国人真想改善关系。我对美国就铁托总统计划中的美国之行掀起的反南宣传运动，向波伦提了意见。波伦的解释是，美国的情况特殊，政府并不支持这种做法，似乎其他任何国家的情况都不特殊，唯有美国的情况特殊。可以说，波伦重视俄国人决定拖延、拒绝同我们签订贷款协定一事甚于关切我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吵。

* * *

在同美国大使会见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刘晓大使拜会了我。我告诉他，我们已经把我们迄今的论战——同俄国人的书信往返告知中国党的领导了。看来，这个中国人没有把这一点看成是一个新闻，他已经知道了。

这位中国人说，周恩来在离开了国内将近两个月之后已经回

到北京,并且又在准备出国,而且又是来欧洲,来访问他以前未能访问的人民民主国家。显然,中国大使把这件事告诉我,是希望我提出中国人访问南斯拉夫的问题,在中国总理此行中,南斯拉夫起着特殊的作用。我认为,我不对中国人告诉我的事发表意见为妙,因此我没有再询问周恩来行将进行的访问的细节。谈话到此也就结束。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在我同赫鲁晓夫谈过话两天之后,苏联贸易部长卡巴诺夫终于接见了我国贸易代表团团长。两国代表团一无成效地谈判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一些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立即得到了解决。双方商定,要签订一项新的贸易协定。

向赫鲁晓夫交涉这一回是成功了,这是在目前情况下所能指望达到的最大成果了。

卡巴诺夫部长为我国贸易代表团举行了午宴。我出席了这次午宴,并且除了卡巴诺夫和我国代表团团长外,我还讲了话。我在讲话中,对于两国代表团工作的成功、新协定的签订和我们之间进一步合作的发展表示祝贺。尽管新贸易协定是很一般的,我还是只强调了它的好的方面。关于与签订这一协定的同时发生的我们关系中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我的祝酒辞中也好,在我国代表团团长巴皮奇的讲话中也好,都未加涉及,就好象没有这样一些事情。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为我们的贸易谈判有成效地结束作了努力,他同时又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赞成苏联单方面推迟签订贷款协定。这表明,后者是二月中央全会决定的,而前者不是。赫鲁晓夫即令想改变这一决定,他也无法改变。赫鲁晓夫越是坚决地贯彻执行

关于贷款协定的消极决定，他就越是主张同我们签订一九五七年的贸易协定。

在最近一次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南方和高加索，“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钓钓鱼”，这个时候的赫鲁晓夫在我看来，跟十一月、十二月我们多次见面时相比大为不同，要心平气和一些，自信心更强一些。赫鲁晓夫决定离开莫斯科，到内地度过十五天时间，这说明，他觉得自己在苏联最高层地位越来越牢靠。不然的话，我不相信赫鲁晓夫会这样心安理得地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去发表政治演说。

可以说，赫鲁晓夫不象他的前任，也不象现在跟他分掌权力的大多数人那样，靠坐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跟苏联其他领导人比，更多的是以苏联的方式，通过面向人民，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的。如果不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谴责，拟议中的对经济的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就会是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共产党以来在国内政策方面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了。考虑到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实行着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考虑到苏联幅员广大，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事业。要是苏联经济权力下放的政策跟非斯大林化政策一样，走的是一条前进一后退的路线，出现形形色色的动摇的话，那就不好了。

对南斯拉夫提出新的指责

关于苏联地方苏维埃选举。苏联画家代表大会。苏联领导对莫沙·皮雅杰去世所持的态度。布尔加宁和卡达尔发表讲话，攻击南斯拉夫。什么叫“人民民主”？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是如何编写现代史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莫斯科。

我邀请苏联副外长之一瓦·佐林共进晚餐。他对南斯拉夫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我认为，了解他的南斯拉夫人对他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照“实际对等原则”行事的。

我问佐林，对于我国外长科查·波波维奇的报告有什么看法。佐林说，他对于这个报告的评价不佳。波波维奇讲话的方式，谈论苏联的方式不是友好的。他认为，我们方面在使关系紧张化，并且不是在某个次要的渠道这么做，而是通过南斯拉夫外长在国民议会作官方报告这么做。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几乎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除佐林外，出席晚宴的还有荷兰、伊朗、波兰、冰岛、加拿大和缅甸的大使。就这样的会晤而言，这里还在进行冷战。西方人难得同东方人会晤，因此我们举行的晚宴是他们还能碰头，同时又有苏联外交部代表参加的难得的机会。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莫斯科。

最近几周来，苏联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事件中有一件事是布尔加宁同阿登纳的通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欧国家中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苏联的利益要求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可能深地纳入欧洲的力量格局，除此以外，俄国人还计算着，大选前的困难会迫使阿登纳在同东方改善关系方面向前迈出一步，而苏联方面不必作出任何让步。

大大增加苏联同西德的贸易，也可用作苏联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这样一种事态发展会加强苏联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地位。在西德外长冯·布伦塔诺访问美国的时候，这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波恩政府，特别是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这是俄国人最害怕的。不过，我还是不相信，这会对布尔加宁和阿登纳在通信中业已同意采取的措施（扩大贸易、科技合作）的贯彻执行有什么重大影响。

俄国对西欧的政策越来越显示出细微的差别，并且不顾前不久还导致战争威胁的种种矛盾而在发展。如果俄国在欧洲的政策存在某种不变因素的话，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这意味着保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俄国对各个西欧国家采取的不同步骤也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一日，莫斯科。

根据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改组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决议，这里有许多委员会在草拟符合新决议的措施。据设想，新体制要在两、三个月内制订出来，嗣后这一切要在七月初变成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

新体制的基础是，根据工业项目位于何处，而不是根据它们属

于哪个部门和莫斯科的哪个部来建立经济区。在这样的单位中，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中领导。在具有“全联盟意义”的部门，诸如原子能、军备、国防、研究、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等等，则仍保留莫斯科对经济的直接领导。据料，将取消苏联政府的一大批经济部，现在这样的部有将近五十个。

这样一来，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多少世纪^①以来建立起来的绝对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斯大林只是加强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现在想使对工业的领导靠近各个共和国和“在现场”的人，这种做法应当使苏联的领导和人民之间的至少某些隔阂得以消除。

赫鲁晓夫首先通过自己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接着又通过现在的经济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所开创的这一进程，将持续很久。现在就可以看到，正如非斯大林化政策迄今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切不会沿着笔直的、始终上升的路线发展。

我们听说，在已经知道自己所管的部要取消的部长中间，已经出现了不满的现象。听说，苏联最高级的官员在抵制，他们多少年来一直身居高位，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得以这样一种方式放弃自己的职位。在这些人中间正在谈论，在“哈齐亚英”（“主人”的意思，指斯大林）领导下毕竟比在现在这批人领导下要好一些。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莫斯科。

这里的党报和其他报纸在谈到权力下放的新措施时，不放过机会“触动一下”南斯拉夫。似乎他们担心有人说，他们开始象我们，因为我们南斯拉夫人早就在经济和国家机关中贯彻执行权力下放的措施。为了免得跟南斯拉夫相象，党中央的机关报已经抛出了一个关于“南斯拉夫式权力下放”的口号并且加以阐述，说这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种“权力下放”由于存在着混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由于有竞争、自由市场、集团所有制和分散而是资本主义的。俄国人要叫人相信，他们的权力下放不同于南斯拉夫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三月初，苏联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唯有格鲁吉亚尚未进行。据公布，选举中有一百五十八名（1）地方苏维埃代表候选人落选。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是民主的。即便是谈实验室的某一次化学分析，而不是谈政治，这个数字也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仅仅在俄罗斯就选出了八十四万四千三百三十七名代表，他们是由党的各级委员会提名的。任何大批量物质生产出现百分比微不足道的废品，是正常的事。而这里涉及的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提名并且当选的候选人，因此那落选的一百五十八人只是证明了苏联的选举机器是出不出什么差错的。选举没有表明任何新东西，选举的办法和政策跟过去雷同。斯大林关于“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联名选举”这一久经考验的模式，再一次胜利了。

在二月全会上，是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改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报告，尽管由政府中的某个人来作更为自然一些。这一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影响在增长。赫鲁晓夫的名字同“开垦荒地”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在苏联被看成是一场极大的胜利，他的名字现在又同预告要进行的工业改组联系在一起。要是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成了报告人，那么应当替苏联政府的威信担心，而不是替赫鲁晓夫的威信担心，他的威信显然又在提高之中。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莫斯科。

一周以前，苏联画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闭幕。到会的有五百七十九名代表和来自阵营国家的来宾。成立了美术家协会，这个协

会有五千多名会员。俄国对于某些学衔总是设有候补人，甚至在叫人难于设想的称谓方面也是如此。于是就存在“候补美术家”！新协会就有一千八百名这样的候补美术家。选举了由九十九人组成的新理事会。旧的理事会中没有一个人当选，而当局多年来一直是通过这个理事会来管理这一领域内的事务的。

代表大会上的一件大事是谢皮洛夫的讲话。党的领导说为这次代表大会郑重其事地作了准备。看来，主席团下决心清除声名扫地的旧集团的活动，而为了保持“平衡”，同时也清除新的“极端派”，自由派，官方指责他们“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于迄今为止的美术遗产和美术创作，现在又重新强调无条件地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阵营国家代表，波兰人除外，在大会开始时致了祝词，充满了对苏联艺术的赞扬，在这方面，中国人走得最远。

谢皮洛夫在艺术家代表大会上的权威性讲话证明，新领导，也即党，在这条战线上将保持严格的垄断和控制。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莫斯科。

我们的出版者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将近二十天时间。我们的这个代表团同其他许多代表团不同的是，来到莫斯科，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并且知道想干什么。我想，这是南苏两国出版者第一次郑重的接触。

我们翻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规模之大给苏联的出版者留下深刻印象。南斯拉夫人到目前为止翻译了三千五百部苏联的书，而俄国人只翻译了大约七十部南斯拉夫的书！特别使俄国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翻译俄罗斯和苏联书籍的这种做法是持续不断的，在旧南斯拉夫和同斯大林发生冲突时期我们翻译，今天我们也翻译，而不管我们之间的公开冲突仍在继续。

在我举行的招待会上，出席的一位苏联官员对我说，我们的代表团在莫斯科给人留下的印象比阵营国家类似的代表团留下的印象要好。这番话他是悄声面对我说的，因为公开地说类似的话在这里是危险的。

我曾出席文化部副部长就我国出版者代表团成功的访问举行的晚宴。在开始的时候，俄国人在祝酒时只限于“出版活动”，我们把它扩大到其他领域，俄国人也同意了。代表团团长伊凡·布拉特科和其他团员在苏联访问期间，做了他们在现有条件下能做的一切。特别有意义的是，这是一个在谈判时势必要用一系列资料加以说明的问题：要列举出数字、名字、年代、已出版的书籍的发行量、苏联作家的书按人口计算的数量，翻译的苏联作品同翻译的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的作品比例。在这里谈论我们的“修正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有的材料都有利于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远远走在苏联的前面，这一点是俄国人自己不得不指出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领导在我国国民议会主席、南斯拉夫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莫沙·皮雅杰同志突然去世时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最坏的印象。他是从英国回国途中在巴黎去世的，他率领我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到英国访问英国议会。莫沙是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阿莱什·贝勃勒博士在场的情况下去世的，贝勃勒跟法国大夫们一起做了一切来帮助他，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帮不了忙，过了十来分钟莫沙就去世了。这一悲惨的事件使得南斯拉夫全国深感哀痛，而苏联对这件事的态度却是极不得体的。

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三月十六日只用了一句话来报道这一消息。《共青团真理报》也转载了这一句话。这三家报纸全在

最后一版，次要栏内刊登这一句话，而且是登在“报屁股”上。

这三家苏联报纸还用五行字刊登了贝尔格莱德的葬礼的消息以及最高苏维埃的最低不过的官方唁电，这封唁电已低于任何礼节性最低要求（而在贝尔格莱德电台的广播中，关于这封唁电的消息却照常放在第一条位置广播，排在国外所有唁电之前！）。苏联其他报纸却只字全无。

我要求我们大使馆翻阅一下苏联的报纸，以便比较一下俄国人近来对于类似的事情是怎么报道的。我们发现，《真理报》和《消息报》三月十日以同样的方式报道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和流亡分子霍尔蒂海军上将去世的消息，今年三月三日还报道了日本前外交大臣重光葵去世的消息。

今年二月十四日，意大利教授马尔克齐去世时，《真理报》强调指出马尔克齐是意共中央委员，叙述了他的生平、党龄、职务等等。

《真理报》在刊登莫沙去世消息的同一天，刊登了菲律宾总统去世的消息（苏联同菲律宾没有外交关系），登这条消息的版面要大两、三倍。

在奥地利人克尔纳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去世时，苏联派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去参加葬礼，发表了谈话，苏联报纸在整整五天内一直在报道此事。在芬兰总统巴锡基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去世时，也是这么报道的。苏联报纸刊登了故人的遗像，不仅发表了苏联人士的讲话，还发表了外国人士的谈话。

到今天为止，我们大使馆没有收到苏联任何官方机构以及苏联公民的任何吊唁，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下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私人的吊唁信，因为邮局是加以监督的，这样的东西是没收的。

三月十六日，一个星期六，发生了苏联公民私人就莫沙之死向南斯拉夫大使馆表示唯一的一次吊唁。令人遗憾的是，这是匿名

的, 是因为通过电话表示的, 是从公共电话室里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只是说, 他代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就伟大的革命家、社会主义战士和官僚主义的敌人莫沙·皮雅杰之死向我们表示吊唁。当我们的官员想继续谈下去时, 电话就中断了。

我认为, 就许多方面而言, 莫沙·皮雅杰是欧洲和世界工人运动, 而不只是南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杰出人士之一。在旧南斯拉夫, 他在军事法西斯独裁当局的监狱里服了十四年苦役。战时以及战前, 他是铁托同志在我们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最亲近的合作者之一。战后, 他是我们这个新国家最杰出的建设者之一, 并在这一创造性工作中突然去世。

我们在大使馆里举行了追悼会, 我在会上讲了话。我追述了对这位伟人的回忆, 我谈到战前地下活动时期与已故莫沙同我们这些贝尔格莱德大学生——我当时也在其中——一起工作有关的一些事。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匈牙利的一个最高级代表团正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在匈牙利人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好几位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问我, 我们对他在二月中全会上关于改组苏联工业管理的报告有什么样的印象。我说, 他的报告我不知道, 因为这里没有发表他的报告, 对此赫鲁晓夫说, 他们已把报告送给我们, 因此他认为我是知道的。赫鲁晓夫以为我们党中央分发了他的报告, 因此我也得到了报告。我们的人显然不这样想, 因此也没有把报告寄给我, 看来, 他们认为这是党的机密通信。我根据从以前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了解的情况, 根据这里已经发表的情况, 对二月全会的决议作了积极的评价。当我告诉赫鲁晓夫, 我没有收到他的报告时, 他显得不高兴。

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一批主席团委员走向我们。这是莫沙·皮雅杰几天前去世以来，我第一次同他们见面。他们中间谁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昨晚我同卡达尔·亚诺什谈了话。他提出了苏联的论点，说我们的关系的改善现在只取决于南斯拉夫。我对他说，关系始终取决于有关的各方。对此，卡达尔重申现在一切都只取决于南斯拉夫，说过去的情况不同，一九四八年他们攻击我们，而现在南斯拉夫攻击他们。没有意思再继续讨论下去。我说，他提出的问题十分复杂，招待会上熙熙攘攘是没法讨论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我们和其他有关方面都将作出努力来克服困难，在我们之间发展良好的关系和合作。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在列宁格勒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卡达尔两次攻击南斯拉夫。除了不确切地叙述南斯拉夫对匈牙利事件和其他问题的观点外，卡达尔还提出了新的口号来反对南斯拉夫，表明他想在苏联公众面前尽可能地把我们搞臭。卡达尔公开地把“卡德尔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同自由欧洲电台、欧洲之声电台的立场作比较，据他说，这两家电台也把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月的匈牙利事件称作革命。

有鉴于此，我不打算接受苏方邀请出席“匈苏友好大会”。我认为不去比示威性地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为好。我将出席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宴会。如果再出现对南斯拉夫的类似诽谤，我不打算去送行，如果贝尔格莱德没有别的指示的话。

在于哥夫和保加利亚人的代表团之后，俄国人现在叫卡达尔和匈牙利人出来攻击南斯拉夫。今天的《真理报》还急于让阿尔巴尼亚也尽早参与这场运动。这三个国家都是南斯拉夫的近邻。

我认为，对于建立在使南斯拉夫孤立于邻国的基础上的苏联目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来说，尽可能地搞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目前的冲突是在匈牙利问题上爆发的。通过卡达尔这样一些讲话，俄国人是想表明，匈牙利也谴责南斯拉夫的政策。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今天，帕托利切夫奉苏共中央之命，把赫鲁晓夫一月二十七日就改变工业管理体制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以及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上的报告交给了我。他是奉赫鲁晓夫明确的命令这么做的。

一方面，在国家关系方面，甚至通过来这里访问的阵营国家代表团扩大对我们的攻击，同时，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记下赫鲁晓夫这个政治上相反的姿态是很有意思的。

苏联所有的报纸今天全文发表了布尔加宁和卡达尔在苏匈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两人都攻击了南斯拉夫。到目前为止的反南运动这里主要是在报刊上进行的，往往由编辑部里的人署名，与此不同的是，昨天整个事情提高到两国政府总理的水平。这是在苏匈两国党和政府最负责任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苏联迄今为止的反南活动就成了苏联政府的官方政策，匈牙利也参与其中。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美国人肖尔几天前从华沙回来。他从华沙带回了耸人听闻的消息，说苏军对匈牙利的第二次武装干涉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就这件事达成协议之后进行的。他还说，一位波兰人在华沙告诉他，赫鲁晓夫为了同铁托商谈而曾秘密前

往南斯拉夫。

这位美国记者在莫斯科外国记者圈中向自己的熟人讲了这件事。他也向法新社驻这里的记者舍雷谈了，后者又告诉了我们。这位法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是想核实这一消息，而仅仅是向我们通风报信，让我们知道这里在谈论些什么。他认为消息是确凿的。我在这里已经详细地说过，俄国人事事实上是自己作出了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需得到南斯拉夫人的首肯。事情更多的在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不要因为他们的军事干涉而在我们之间爆发公开的冲突。

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

我相信除了俄国人之外谁都不知道对纳吉·伊姆雷的调查取得了什么结果。苏联和阵营国家以前受审判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调查中和在法庭上发表了苏联侦查人员要求他们发表的供词。就这样，捏造了最离奇的指控。根据这样一些“无法推翻的证据”，在我们早些时候同苏联的冲突期间，不仅出现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运动，而且苏联和阵营国家废除了这些国家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协定。我不相信现在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尽管现在在援引被捕的纳吉为例，正如以前援引被捕的拉伊克·拉斯洛为例一样。

俄国人已经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拉进了反南运动，他们或许要设法把罗马尼亚人也拉进来，尽管这一点他们比较难于得手。在罗马尼亚，人们广泛得多地确信，他们越是攻击南斯拉夫的独立，罗马尼亚人自身对俄国人的独立就越少。此外，南斯拉夫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一贯是良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外政策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我们对外政策的失败之一——尽管不只是南斯拉夫应对这种失败负责——就是我们几乎同所有的邻国，不仅

仅是同阵营中的邻国的关系不好。毋庸置疑，俄国人将竭力在我们的国家边界上使这样一种状态保持下去。

布尔加宁最近在匈苏友好大会上的反南讲话是引人注目的。不能说这是即席讲话；布尔加宁所说的一切苏联报纸第二天就发表了。或许布尔加宁想以这一方式来弥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去年七月对他的秘密的书面批评？或许他违背自己的心愿领受了这一任务，恰恰是因为他去年公开地夸奖了我们，对我们表示了赞赏？不管怎么样，布尔加宁这一番话使他在南斯拉夫人眼里还残存的一点声望丧失殆尽。现在再也不会会有机会进行去年十月在克里米亚进行的那种谈话了。即便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样的机会，我也难于“安慰”布尔加宁，因为他关于南斯拉夫的那些“坏话”，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新讲出来的，也即即使在苏联也不会有人强迫别人象斯大林时代那样发表这样的讲话。或许苏联政府总理自己愿意别人把这样的事强加于他，现在才有可能把那些“坏话”强加于他？

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

贝尔格莱德就波兰主要报纸《人民论坛报》以前的编辑部被撤换，以及就波兰新领导越来越同波兰的反动分子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妥协问我们，我们在莫斯科怎么看。我们无法检验我们的观察和评价，苏联报纸决不能成为提供这一方面情况的消息来源。

我们有保留地报告贝尔格莱德，我们从这里看来，哥穆尔卡同俄国人越来越达成谅解。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他有可靠的情报说苏联的局势越来越困难，因此他不希望他们波兰人使这种局势变得更困难。似乎波兰这个因素在苏联国内政策中十分重要，苏联的国内政策几乎是取决于它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和过分的解释。用对外政策的必要性来解释在国内不得人心的内政行动，对于哥穆尔卡来说这是个好主意。

哥穆尔卡同波兰的教条主义分子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妥协的政策是符合苏联领导的心意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哥穆尔卡对于这件事比这里最初以为的要懂得多。我不相信这会明显地促使苏联领导改变自己对波兰的总政策。这里几个月前所做的，主要是满足波兰人对苏联在提供经济援助方面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哥穆尔卡还不那么起劲地同国内的教条主义分子搞妥协。苏联领导这样的态度有可能促使哥穆尔卡现在奉行这样的方针，而不是哥穆尔卡去促使俄国人改变态度。

波兰人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苏联现领导和赫鲁晓夫夫人继续掌权，从他们的解释中也使人感觉到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有某种批评，南斯拉夫的态度不象波兰人的态度那样，不是服膺于“更高的利益”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莫斯科。

在克里姆林宫为匈牙利人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同赫鲁晓夫谈了话。我请他给我说明，为什么这里要把阵营国家的国家代表团的到来变成反南活动。似乎这些国家同苏联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最高官方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或者是同他们一起，公开地攻击南斯拉夫。我们绝对不反对苏联同这些国家友好，但是俄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似乎这种友好关系是建立在这些国家对南斯拉夫不友好的基础上的，这些国家不声明反对我们的话，就不能同俄国人交朋友。赫鲁晓夫再一次断言，说我们掀起反对他们和阵营的运动，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的危害超过了帝国主义者的宣传，说他们是在自卫；他举例子说，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前不久在埃及人面前攻击他们，而埃及人立即前来把这一切告诉了俄国人。

当我提到布尔加宁的讲话时，赫鲁晓夫觉得不痛快，这是不准

发党的。现在我使用赫鲁晓夫十一月、十二月间用来反对我们的那些提法：这种做法对谁有利？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需要这么做？为什么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等等。

他们现在把南斯拉夫同纳吉·伊姆雷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在不知道设在何处的监狱里对纳吉和其他被捕的匈牙利人的侦讯有了结果。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布尔加宁的话，他谈到有“无法推翻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纳吉早就“在为别国服务”了。布尔加宁所使用的语言同苏联三十年代著名的残忍的审判案中的起诉书和阵营中后来所使用的语言是相雷同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的处境是极其艰难的。看来俄国人是想从纳吉和其他人那里套取口供，尽可能地说明俄国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是有道理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莫斯科。

驻莫斯科的所有西方记者都当作当天的重要新闻转发了布尔加宁的反对南斯拉夫的讲话。他们发表评论说，这是苏联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最尖锐的攻击。我们觉察到，俄国人中有些人不太欢迎布尔加宁的讲话。仍同我们交往的一些俄国人说，我们之间的这一切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的。听起来，这象是他们并不直接接受这一讲话。

我认为，布尔加宁的讲话将使苏联人民中间本来就有的混乱变得更加严重，不仅是在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上，而且部分地也是在苏联总的政策方面。人们将越来越担心，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会全面紧张起来。尽管布尔加宁的攻击本应作为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集体领导”是团结的，我认为，这个讲话只会扩大苏联最高层内部的困难。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在光天化日之下已表明比原来

以为的要坏，从此以后同我们的关系会进一步紧张化。

苏共中央的官方文件和公开文件常常列举今天在有世界上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排在首位，其他国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对于这两大强国来说，字母的次序不适用。在这份社会主义国家名单中，南斯拉夫被略去了。眼下南斯拉夫和苏联对某些政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就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世界。此间在斯大林死后显然仍就认为，谁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谁又不是，是取决于他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客观性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里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莫斯科。

几周前，（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做《什么是“人民民主”？》，而这家出版社是苏联最官方的出版机构。发行量：二十万册。作者：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索鲍列夫。

头几章的标题是：《中欧和东南欧劳动群众为建立“人民民主”而进行的英雄斗争》，接着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整顿》，或者第三章：《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在谈到“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反对希特勒的“英雄斗争”时，列举了各国的材料，南斯拉夫除外。例如，作为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解放斗争的“证据”援引了捷共中央战时的传单和宣言，接着详细地描写了利迪察村的被毁，接着是某个中央委员的被捕，随后又列举了被拘留的捷克人的数目。南斯拉夫死去的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对于这一点却只字不提！

对于保加利亚，书中说，保加利亚游击队仅在一九四三年就同法西斯军队进行了一千六百次战斗（！）。据说，一九四三年冬天和春天，保加利亚游击队击退了二十个师的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据说一万八千名保加利亚游击队同这二十个师进行了较量，而直接

帮助游击队的有二十万保加利亚人。一切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一切都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关于所有这一切，世人现在第一次从苏联这本书中才了解到。谈不上有什么材料，这完全是臆造，是最粗暴地捏造历史。

在好几处还谈到匈牙利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雄斗争！居然对匈牙利人还能说出类似的话来！他们一直站在希特勒一边打仗，直到俄国人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布达佩斯。红军为了解放匈牙利，仅仅战死的就有十多万官兵。匈牙利人就是这样“英雄战斗的”，但是是反对俄国人和他们的武装力量。

这本书里还谈到罗马尼亚的英雄斗争，但是罗马尼亚人也曾是希特勒的盟友，罗马尼亚军队曾同希特勒军队一起一直打到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那时他们才开始被苏联武装力量消灭。苏联还不敢捏造东德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雄斗争”。

对于战时也好，对于战后时期也好，哪里都没有提到南斯拉夫，似乎南斯拉夫不存在似的，尽管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中欧和东南欧”是唯一的两个国家，作为俄国的盟国同法西斯征服者作过战。就伪造历史，特别是战时的历史的幼稚做法而言，以及就搞宣传，哪怕是苏联的宣传的一般水平而言这本书也属于斯大林在世时出版的那种最糟的共产党情报局书籍。我相信，在苏联也好，在阵营国家里也好，在正常人中间它是不会取得多大成功的。读者的平均水平还是超过了作者和同意出版这本书的人的无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莫斯科。

这里对于同南斯拉夫多少有点关系的一切痛恨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苏联报纸对待现在正在这里的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的态度这件事情上看起来。我们的运动员比苏联代表队显然要强得多，比赛中我们的运动员打赢了。苏联报纸连这一点都不愿得体地

加以报道，而是使用了反叙法来提供在循环赛中获胜的我们的运动员哈兰戈兹的“消息”。他们说，我们这位运动员一场都没有输，但是他们不愿说他胜了，因为怎么能说南斯拉夫人打败了俄国人呢！

* * *

在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内，我们几位公民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那里的国家雇用的向导一定要给俄国和外国的参观者作介绍。他们干脆把这家博物馆里的南斯拉夫室上了锁，不让人参观，好象不存在这个室似的，也就是说，好象南斯拉夫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我们不相信，因此我叫我们的几个工作人员去参观这家博物馆，向导让他们看了南斯拉夫室边上的几间房间，至于南斯拉夫室连打都没有打开，他说，这就是他们所能看的一切。显然，这是苏联最高当局下的命令。南斯拉夫室里除了别的東西外，还展出了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的像。俄国人不希望在目前让参观博物馆的公众看到这些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还由于照片上写着“南共联盟著名活动家”字样，因为俄国人现在正同我们的“著名活动家”和我们的南共联盟发生冲突。

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

同朱可夫元帅谈话。苏中“磐石般团结”出现裂缝。苏联的内债。苏联派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问题。中国留苏学生停止学习的前夕。伏罗希洛夫访问北京。同恩维尔·霍查谈话。阿尔巴尼亚象过去那样攻击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为什么不接受非斯大林化政策？苏联在多数巴尔干国家的势力加强。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莫斯科。

前不久，我同布尔加宁谈到阿尔巴尼亚，目的在于对俄国人施加影响，让他们尽量少利用阿尔巴尼亚人来反对我们，布尔加宁注意地听着，阿尔巴尼亚人这样的做法如何会给俄国人自己造成严重的后果。我指出，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情况不是最妙，阿尔巴尼亚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还算牢靠，唯一的原因是南斯拉夫保证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它的领土完整。对于南斯拉夫这样的政策，阿尔巴尼亚多年来一直报之以敌对的态度。

同一天晚上，朱可夫元帅显得他很愿同我谈谈南阿关系。当布尔加宁攻击泰波，说他在中东发表反苏讲话的时候，朱可夫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并说他也可以在印度和缅甸攻击南斯拉夫，但是他不愿在那里发表一个字的反对我们的话。朱可夫说：“我为什么要发表那样的讲话，难道这会有助于增进了解和一致吗？”朱可夫接着谈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攻击了科查·波波维奇在我国国民

议会的报告，因为据朱可夫说，波波维奇对美国和对苏联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也就是说对两个军事集团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当我单独同朱可夫元帅呆在一起的时候，他改变了谈话的方式。他对我说，他想真诚地和开诚布公地同我谈话，向我谈一谈他对于我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前不久把自己的看法向赫鲁晓夫谈了，“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说到这里，朱可夫元帅指了指离我们不远的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等人。朱可夫说，他不赞成南苏之间的关系象现在这样发展。一方公开攻击另一方，另一方又反击攻击他们的那一方，后者再予回击，并更加严重地攻击另一方，这样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糟。每一方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威望问题，而不是相反，设法找到防止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某种解决办法。朱可夫说，“再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彼此兵戎相见，我们干吗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对谁有益呢？”

我没有打断朱可夫，只是向他表示我同意他的意见。他接下去说：政治家的任务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意思的，应当认真采取措施使我们最负责任的人聚首一堂，或者找到别的某种方式来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状态。

我没有攻击苏联方面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化，因为我这样做只会迫使朱可夫维护自己一方并且攻击我们。这样的谈话，我在这里已经够多了，这样的谈话是没有多少益处的。因此我同意朱可夫的意见，我说，我们也希望找到他所谈的出路。当布尔加宁向我们走来时，我们中断了谈话，从谈话中看出，似乎朱可夫在同我们的关系上不同意布尔加宁的做法，也不赞同他最近对南斯拉夫的攻击。

* * *

前天晚上我同中国大使刘晓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我觉得，中国大使不喜欢布尔加宁最近的一次讲话和他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这样的讲话使得中国人设想举行的会议的愿望变得渺茫了，一月份时，周恩来向我谈起过召开会议的事。布尔加宁的粗暴攻击结果反倒成了迄今为止我们的公开冲突中苏联最差的一着了。我们关于不使冲突尖锐化和国家间保持正常合作的论点变得很有力。这样也使我比较容易向这位中国人谈南苏关系的现状。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莫斯科。

美国大使波伦前来向我辞行。他说，他本来还想在这里再呆一年，但是那时卢·汤普森就不可能来接他的班。在西方人面前，波伦不掩饰他对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决定由他担任驻菲律宾大使感到愤愤不平，因为这几乎等于流放。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波伦接受了这一任命。俄国人出于两个原因而感到满意：第一，他们讨厌波伦，因为他对俄国人的了解太多了；第二，他们感到满意的是，美国人也有类似于流放的决定。法国人、瑞典人、加拿大人和其他人都说，波伦很了解苏联领导的政策，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起了好的影响。他们都谴责把他从苏联事务上调离的做法。这里盛传波伦想到南斯拉夫去当大使。自从获悉他去菲律宾后，西方人都说，去南斯拉夫本来是一个好的安排。

至于苏联的局势，波伦认为，在俄国人在匈牙利失败以后，局势还不稳定。他认为，根据苏联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事态总的进程并没有使俄国人感到有多大的不安。至于他研究了二十多年的苏联，他说，苏联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政治治理方式是陈旧的和直接违反国家的需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波伦认为，俄国人很落后。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莫斯科。

二十年前，苏联政府通过一项决定，每年发行国内公债。这项决定今天仍然有效。公民认购公债的期限是十个月。国家归还公债的期限是二十年。

每个职工必须认购公债。以这样一种方式从人民身上搜括的最低限度是一个月的工资。每一个认购这样的公债的人在一年内的十个月内分期支付一定的数额，而每期为工人或职员的工资的百分之十。这样一来，通过国家的决定，而不是靠认购人的自愿，这些公债就变成了对全体职工的一种经常性的和高额税款了。集体农庄庄员也不能幸免。

斯大林死后，在马林科夫当政府总理的时候，仍然每年发行公债，但是数额比到当时为止的数额减少了一半。曾有一项指令，规定认购额总共不超过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四十，苏联公民把这看成是马林科夫政府时期生活水平的一次改善。但是一九五六年又回复到了斯大林时期的旧做法。

今年，一九五七年，计划也要发行国内公债，只不过数额比前几年少一点——二百六十六亿卢布。去年要人民必须认购的公债是三百四十亿卢布。

鉴于规定公债的归还期为二十年，而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发行了大批公债，因此每年提取归还的数量越来越多，国家必须归还公民的数目不断增加。要是当年认购公债的人在此期间去世了，由他们的继承人提取。苏维埃国家就这样进入了公债的死胡同。今年的公债回笼的货币必须用来归还旧债。这是简单的算术：苏维埃国家已处于从发行公债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样的境地。政府以这一方式不再能对苏联的商品总额和货币基金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而这本来是发行公债的主要目的。

这样的公债在人民中间早就不得人心了。从各方面都可以听到，人们对于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向人民抽税的做法是有意见的。

赫鲁晓夫在前不久在高尔基城举行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建议供讨论：今年仍发行公债，但是数额要比原先规定的少；不是二百六十亿，而是一百二十亿。国家用这笔公债来归还已经该归还的一部分公债，虽然赫鲁晓夫没有说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归还。这看来象是某种减轻负担的措施，但是赫鲁晓夫同时又建议在二十年内停止偿还以前的公债。这样做，实际上是国家从人民那里得到一笔为数几千亿卢布的长期纯贷款。

苏联现在围绕这项建议掀起了整整一场宣传运动。这项建议当然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是很难加以核实的，因为整个盘算是一清二楚的。鉴于这项建议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人们的不满都冲着他，并把这种情绪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十来天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令，修改了关于把职工从城市的住房中强行迁走的一项法律。现在重新规定当局有权“采取行政手段”把不论是出于自愿，不论是由于违反纪律，或者由于犯有规定要进行刑事追究的罪行而中断劳动关系的职工“迁走”。

我认为，恢复从城市强行迁走这一措施——苏联以前也这样做过——是同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改组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各项决议有关联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反对国家机关所作的从莫斯科和其他中心迁往苏联内地的人采取镇压措施的制度就合法化了。把人从中心城市迁往内地，也即从办公室派往工厂的做法，可能具有大规模的性质。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莫斯科。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最近的谈话中首次向我们谈及他们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方面的某些困难。他们谈的是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领域内的问题。

中国人告诉我们，中国为留苏学生的学习承担了对他们来说很高的费用。在以前见面时，他们也曾向我们暗示过这一点。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这里上学比在中国上学使他们多花二十五至三十倍的费用。开支有那么大的差别，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他们不想再派人到苏联来学习了，只派个别人来进修，而且只进修指定的项目和进修有限的时间。这将使在苏联学习的中国人大大减少，但是中国已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尽管这将使两国间的文化合作和科学合作锐减。

中国人最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对在南斯拉夫工作的各个领域的苏联专家给予什么样的待遇，以及“我们^①同他们打交道有什么经验”。我们对他们说，就目前而论，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因为我们没有苏联专家。他们说，他们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太高，同自己的人的待遇相比，高得无可比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待遇，要比在苏联工作的同一类专家的待遇还要高。他们还向我们抱怨，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些过份的要求，这给他们制造了额外的困难。

这里的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说，同俄国人签订的在中国兴建五十五个新工业企业的协定尚未着手执行，而关于这件事的协定还是一九五五年签订的。俄国人削减了在阵营各国兴建新企业的计划，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这一削减也涉及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愉快。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你们”。——译者

前天晚上，伏罗希洛夫动身前往北京。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中连一名主席团委员都没有，也没有第一流的政界人物。根据所发表的代表团的组成，这次访问不会进行认真的政治会谈。陪同伏罗希洛夫的高等教育部长叶留金、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拉希多夫和十来名外交部副部长中间的一位费留宾，在我看来，不象是能够在北京进行认真的政治会谈的人物。

要是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出某些意义深远的结论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同苏联的冲突首先是从在其他国家为苏联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开始的。在南斯拉夫是这样。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会导致某种类似的情况。即便没有苏联专家问题，这两个大国也会在什么问题上发生冲突。就象我们的遭遇一样，在这里，这也可能成为一个借口，来掩盖发生冲突的更为重大的原因。

现在还在谈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磐石般团结。叫人不清楚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能同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小国相处，又怎么能同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平等合作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莫斯科。

昨天我出席了一次招待会，这是阿尔巴尼亚人就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为苏联东道主举行的。我离开坐着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主宾席远远的站着。出席招待会的大约有一千名来宾，我消失于挤满苏维埃饭店的最大的一个大厅的人群中。在招待会上恩维尔·霍查和赫鲁晓夫讲了话。霍查没有直接提到我们，他的讲话相对来说是温和的。赫鲁晓夫在讲话讲到一半时提到了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的讲话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都是十分温和并且是和解性的。赫鲁晓夫给人很好的印象，某些西方国家大使赞扬了他，欢迎他的这番讲话（例如法国大使）。

赫鲁晓夫在谈到南斯拉夫，谈到苏联希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谈到希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时，直呼我的名字，当着大约一千人的面说，我离他们很远，他们希望“米丘诺维奇同志离我们近一点”。赫鲁晓夫在讲话结束时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坐到主宾席旁，这番话受到在场的大多数人的热烈鼓掌。我接受了，我不得不穿过来宾的行列走到主宾席旁。

恩维尔·霍查当着赫鲁晓夫和好几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在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面，表示他们愿意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这是符合普遍的利益的，等等。俄国人补充了他的讲话，并表示支持。我同意霍查的讲话，我说，南斯拉夫政府以前和现在都持这样的看法。霍查在谈到他们愿意同我们改善关系时，几乎每一句话的结尾总是说：“请转告铁托同志”。赫鲁晓夫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应当建立党和国家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逐步去做，说俄国人真诚地希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赫鲁晓夫跟我开玩笑，说我站在大门附近，很可能是因为料想会攻击南斯拉夫，所以呆在那里，离开招待会时近一些，而他们却希望同我们友好。

米高扬和马林科夫也相继插话，谈到我们之间有必要保持友好关系。这时布尔加宁也插进来说，这是俄国人的真诚愿望。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讨论过我四月四日向布尔加宁谈到他同卡达尔一起的讲话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政策，赫鲁晓夫今晚和解性的谈话是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谈南斯拉夫的那部分讲话是他讲话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关于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只讲了几句话，阿尔巴尼亚人有双重的理由感到不满。

在赫鲁晓夫讲话之前，其他主席团委员对我也是引人注目地显示殷勤。赫鲁晓夫要求同我谈话，并且离开了阿尔巴尼亚人。谢皮洛夫穿过成群的来宾，同我打招呼，“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了”。主席团跟往常一样，集体地离开招待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返回大厅同我告辞。在不太久以前，俄国人中谁都不愿同我的夫人和我打招呼，而且是在他们邀请我们参加的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而今晚却是如此周到！在这次阿尔巴尼亚招待会上的主要政治事件就是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对南斯拉夫的这一出人意料的友好态度。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莫斯科。

三天前，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应我的邀请，出席了午宴并告辞。他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当大使。谁都没有料到美国最孚众望的一位外交官会遭到这样的贬黜。波伦说，苏联现领导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他们不可能摆脱斯大林的影响。波伦说，尽管斯大林时期不可能重演，苏联人还是认为以别的方式无法管理这个国家，基本上只能以斯大林的方式，当然是在没有“个人迷信”的情况下。

波伦举谢皮洛夫前不久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音乐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例来说明现在在这里占上风的状况。他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苏联现领导即便在音乐领域内，除了照斯大林时期的做法行事外，无法有别的作为。谢皮洛夫的讲话是否“温和”不是重要的，主要的一点是，又是由党的代表来给苏联音乐家们规定如何来谱写乐曲！

波伦向我再一次谈到马林科夫同主席团里的其他人不同，当同他以不同于苏联的方式谈话时，马林科夫至少能够理解，如果说他并不想同意的话。我们谈到中苏分歧的现象。波伦说，中国人以不同于俄国人的方式行事，他们同俄国人讨论这一点。中国这样的做法为莫斯科所默认，因为无法加以改变。波伦对被调到菲律宾一事作了一番自嘲。看得出来，这件事使他感到痛苦。他说，他

不打算在马尼拉久呆。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①，莫斯科。

四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里为阿尔巴尼亚人举办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走到我身边，邀请我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恩维尔·霍查谈话。我接受了赫鲁晓夫这一居间活动。结果是霍查和我处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之间，他们两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没有插话。同霍查的谈话进行了二十来分钟，后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别洛夫和朱可夫元帅以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都走过来了。同阿尔巴尼亚人和俄国人的谈话就在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这一切都是在外交团和外国记者面前进行的。我无法避开这个场面。大概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俄国人在认为可能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在公开场合制造这样的场面，这种场面变得越来越令人不愉快。

在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能够听到的两个人单独的谈话中，霍查“象对同志和共产党人那样”向我谈到以下看法：

阿尔巴尼亚人希望同南斯拉夫保持良好的关系，将致力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我们的关系。霍查一开始这样讲话，我就觉得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恩维尔·霍查接下去说，我们驻地拉那的公使阿尔索·米拉托维奇在阿南两国关系上起着十分不良的作用。米拉托维奇两个月以前拍摄了地拉那军用机场的照片，这一点他们通过本人认识我们公使的阿尔巴尼亚监督机构人员确证无疑。米拉托维奇未经阿尔巴尼亚当局同意就前往培拉特，那是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区。霍查说，在这两起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十九日”之误。——译者

事件中，阿尔巴尼亚当局对于违反阿尔巴尼亚法律都没有作出反应。我们驻地拉那公使馆的人员在各种招待会上公开地辱骂他和谢胡、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党，还本着这一精神在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公民家里召开会议。霍查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们的现任公使阿尔索·米拉托维奇。霍查说，比起我们前任公使普雷德拉格·阿伊蒂奇来，米拉托维奇更是阿尔巴尼亚的敌人，尽管阿伊蒂奇在地拉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更糟。

可以看出，霍查开始这样讲话，这次谈话就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而对于有些事我又不能默认。在我们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上，不会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我对于向米拉托维奇提出的指责表示怀疑，驳斥了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敌人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我早就对他很了解。至于拍摄军事设施的照片和到禁区去旅行一事，我不相信我们驻地拉那的任何人员会做这种事，更不用说公使了。我确实可靠地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几年前明确禁止在阵营国家里，因此也禁止在阿尔巴尼亚从事任何类似的活动。

至于他们报纸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恩维尔·霍查说，这只是他们对我们的攻击的反击。他还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在梅托希亚和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报纸和科索沃梅托希亚的少数民族报纸多年来掀起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运动，以各种方式侮辱他个人。马其顿的报纸也是这样。通过我们的边界用各种手段反对阿尔巴尼亚：散发反阿尔巴尼亚的传单，散布谣言说阿尔巴尼亚有人死于饥荒，说他们的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将被推翻等等。霍查在接下去的讲话中对南斯拉夫提出了新的指责。

赫鲁晓夫为了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提到在铁托同志最近访问希腊国王时，在场的希腊人中有人“开玩笑”地谈到由南斯拉夫和希腊瓜分阿尔巴尼亚。我说，铁托也好，南斯拉夫人中的别的什么

人也好，无法施加影响，让希腊国王或者他的随从人员中的某个人挑选什么话来开玩笑，不论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我驳斥了在这方面对南斯拉夫的任何怀疑。我提到希腊人在巴黎和会上曾经通过自己的代表卡尔达里斯正式地，而决不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向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就瓜分阿尔巴尼亚一事进行谈判。我们的代表，已故的莫沙·皮雅杰在和会上公开揭露了希腊的这一计划和希腊代表卡尔达里斯。在斯大林时期以及后来，不论南阿两国的关系多么糟糕，我们始终维护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我们今天仍然这么做。

赫鲁晓夫尖锐地谴责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说他在中东国家和希腊攻击苏联。赫鲁晓夫说，泰波对苏联的攻击使得阿拉伯人，甚至希腊人象他们后来所说的那样，不得不起来维护苏联，驳斥南斯拉夫副总理。我对赫鲁晓夫说，他了解泰波，我相信他会同意，说泰波有“反苏情绪”是没有根据的。谁都没有明确地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持相反的观点。整个这次谈话没有多大意思。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莫斯科。

昨天，赫鲁晓夫通知我，苏联政府作出决定，推迟签订为在南斯拉夫兴建一座氮肥厂而提供贷款的协定。我表示感到意外，我们最近刚给一大批他们的专家发了签证，他们已去贝尔格莱德，以便同我们的专家一起完成设计。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们已经召回自己的氮肥厂专家，他们正在返回苏联途中。

我问他这么做的理由。赫鲁晓夫说，理由是经济方面的。我指出这一行动会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关系带来损害。我担心，在南斯拉夫也好，在苏联和世界上也好，人们不会有别的想法，只会把这看成是苏联政府的一项政治决定。我提到他们几天前还说他们希

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提到在向别的一些国家提供成百万、成十亿卢布的新贷款，而对南斯拉夫却是推迟，实际上是拒绝就兴建一座中型的工厂签订协定，而且是在执行协定的过程中这么干。

除了炼铝厂之外，又推迟建氮肥厂，这是进一步加强对我们奉行消极的路线。南斯拉夫同美国政府就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所达成的协议也促使俄国人作出这一消极的决定。这里认为，我们当着苏联公众的面同美国达成协议一事，足于成为推迟提供氮肥厂贷款的协定的理由。

赫鲁晓夫通知我，苏联政府将就这个问题给我一份照会。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本人并不赞成这一决定，但是在苏联最高层存在一致反对南斯拉夫的多数，在这样一些事情上赫鲁晓夫不打算反对这个多数。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在波兰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提到我。他说，我曾责怪他，说俄国人不象从其他阵营国家那样从南斯拉夫购买农产品，说我谈到，肯定的是“对于俄国人来说，保加利亚的辣椒比南斯拉夫的可口，南斯拉夫的辣椒辣”。赫鲁晓夫接下去说：“是的，对我们来说，保加利亚的可口……”，等等。在五、六百名苏联来宾、外交团、记者和其他的人中间，出现了哄堂大笑和说话的嘈杂声。

赫鲁晓夫基本上忠实地援引了我的话，但是并不完全。我对他说过，我知道，对于俄国人来说，我们南斯拉夫的辣椒是辣的，保加利亚的是符合他们的口味的，所以他们向保加利亚人买。这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石油问题上刁难我们，他们还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大量出售石油。然而，这一点赫鲁晓夫就没有提到了。

当我们开始交谈时，跟我们一起的还有波兰政府总理西伦凯维支，但是很快他就离开我们走了。主席团其他委员也都没有走过来。谈话过程中，保加利亚大使馆参赞祖尔洛夫走近我们，请求赫鲁晓夫为赫鲁晓夫关于保加利亚的讲话同他干一杯。赫鲁晓夫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同这个保加利亚人碰了一下杯，但是不想喝。保加利亚人一走开，赫鲁晓夫就问我，此人是谁。我告诉他，此人是保加利亚人，想感谢他讲到了保加利亚的农产品比南斯拉夫的好，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对这位保加利亚人的行动发表了不那么好的意见。

赫鲁晓夫提到他们正同阿尔巴尼亚人进行顺利的会谈，这时我对他说，四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宫当他把我叫去同恩维尔·霍查谈话时，我本来指望同阿尔巴尼亚人的谈话将会是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谈话中我只听到了对南斯拉夫的指责：我们想把阿尔巴尼亚作为第七个共和国纳入南斯拉夫，想同希腊瓜分阿尔巴尼亚，说我们屠杀阿尔巴尼亚族这个少数民族等等。赫鲁晓夫没有接下去谈。

在叙利亚人的招待会上，我同朱可夫元帅谈了话。他告诉我，他要去俄罗斯南部，随后朱可夫说：你是否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改善。他指的是赫鲁晓夫四月十五日讲话。朱可夫告诉我，他四月四日同我谈过话之后曾同赫鲁晓夫谈过，并且还要谈。已经有结果；他相信今后还会产生结果的。

我就苏斯洛夫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表示遗憾。我试图说明事情这样是很难办的：在公开讲话中毫无根据地指责南斯拉夫，指责完了又表示愿意合作。朱可夫元帅回答说，他们并不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等等，而只觉得个别人是修正主义分子。谈话到此就中断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在莫斯科，从乘飞机付汽油费这样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也会制造一些政治事件，而且是高级人士这么干。这有下面这件事为证：一位俄国上校，很可能是为了尽可能扩散这一有损我们的消息，在捷克人的晚宴上说，南斯拉夫当局要俄国人支付应我们邀请访问南斯拉夫的苏联高级官员用掉的汽油费。这里说的是米高扬的访问和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访问。这位苏联上校本来可以不把第三者牵连进这件事，只同我们办完该办的一切，但是他显然想把事情搞得为人人所知晓：南斯拉夫当局，而且是军事当局，要求米高扬支付他最近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所用掉的汽油费！

我们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当局确实犯了这一错误，已经让他们纠正错误，并且是通过俄国驻贝尔格莱德武官纠正这一错误。当我们的人认为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时，俄国人却通过国防部再一次正式问在这里的我们，该向南斯拉夫付哪些汽油费，哪些不该付。据说，俄国人这一点不清楚，因为除了我们邀请的米高扬和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帐单外，他们还收到了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帐单！这里也是有关汽油的。这样一来，苏方把事情进一步扩大了。俄国人在无情地利用南斯拉夫某个会计的这一错误。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显然是在俄国人的压力下，我们同卡达尔新政府的关系，在卡达尔前来莫斯科之前仍不好。在卡达尔在莫斯科的正式会晤中以及在苏联政府总理陪同下在苏联各地的群众大会上对南斯拉夫提出指责之后，关系走上了完全不利的方向。

在匈牙利人来这里之前，保加利亚政府曾派来以总理安东·于哥夫为首的代表团。保加利亚人也在俄国人在场的情况下，在

同俄国人正式会晤时发表反对我国的讲话。或许不需要做多少工作，于哥夫和保加利亚人就会显示出这一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不仅是因为保加利亚人早在共产党情报局和斯大林时期以及以后就已习惯于通过诽谤南斯拉夫来证明自己对于苏联的忠诚，而且还因为南斯拉夫同大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冲突具有久远得多的历史。大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是大多数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从保加利亚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意识形态”遗产，一个光荣的例外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他持同样观点的一批人。保加利亚领导人充满了幻想，以为凭借自己新的强有力的保护人，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反对南斯拉夫，就有可能实现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所未能实现的事情。苏联目前的对外政策从官方来说是反对改变欧洲现状的，但是索非亚想到今天还没有打消上个世纪的建立一个保加利亚的迷梦。看来，只要莫斯科认为有必要，这一幻想是很容易实现的，索非亚指望的也就是这一点。

在匈牙利人之后，轮着前来这里的是南斯拉夫第三个近邻——阿尔巴尼亚。应当使南斯拉夫同这个邻国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因为说实在的，俄国人在同美国较量或者在同其他大的强国较量时，阿尔巴尼亚政治上的援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苏联来说，阿尔巴尼亚之所以有意义，首先是它的战略的和军事的地位。通过阿尔巴尼亚，俄国人就前出到地中海北岸，此外，还从南方包围南斯拉夫。

诚然，要保持南阿之间不好的关系无需俄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采取主动行动。令人遗憾的是，两国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很坏，很难设想在和平时期还能怎么更坏。苏共二十大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有点困惑不解，甚至有点担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担心非斯大林化政策扩展到阿尔巴尼亚。为此，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去年上半年对苏联积极的变化感到担心之后，实际上满意地欢迎匈

牙利事件，欢迎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新的公开冲突和非斯大林化政策在整个战线上停滞不前。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立即开始于它的边界，开始于它同邻国的关系。被怀着敌对情绪的邻国包围，因而被迫“越过海洋”寻找自己的朋友的国家的处境是不妙的，因为这样的国家在自己的边界上有敌手。

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处境不是最妙。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或许光说这一点就足够了，眼前立即就会出现一幅这个地区沉重的历史遗产的景象。巴尔干的历史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充满着西方和东方的大国和强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它们把巴尔干各国人民当作“找钱的零头”。

有些巴尔干国家是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些巴尔干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南斯拉夫的近邻中立的奥地利既不属于西方军事集团，也不属于东方军事集团。不属于军事集团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就处于这些不同的、对抗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之中。斯大林一九四八年以及以后对南斯拉夫奉行的侵略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事态发展大为恶化。南斯拉夫大多数近邻都参与了反对我国的这一政策的执行。这使得巴尔干各个小国之间过去的为数众多的矛盾再度显现，除南斯拉夫是例外，这些国家再一次表明，它们继续在充当列强手中的玩偶。斯大林奉行的对南斯拉夫施加侵略性压力的政策，多年来使得巴尔干变成了欧洲最不安全的地区。现在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苏联对巴尔干的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随同斯大林一起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在奉行。

尼·谢·赫鲁晓夫的地位加强

莫斯科举行五一节庆祝游行后同赫鲁晓夫谈话。拜会朱可夫元帅。苏共中央主席团对赫鲁晓夫的计划不表兴趣。苏联继续对西方发动外交宣传攻势。前往蒙古。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莫斯科。

莫斯科举行五一节庆祝游行后，苏共中央跟去年一样，举行了盛大的午宴。除以主席团为首的中央委员以外，阵营国家的全体大使都出席了。我也被邀请出席午宴。这次午宴不象往常那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而是在离莫斯科大约三十公里的中央委员会别墅的花园里举行。这使得气氛不那么正式，具有更多的节日喜庆性质。赫鲁晓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一的东道主，除了他，别的人也发表了祝酒讲话。大约有十来个人讲话，大多是讲的苏联国内政策。赫鲁晓夫讲话中的某些部分是饶有风趣的，是同气氛很合拍的。他谈得最多的是经济问题，谈到旧体制过时了，谈到新的经济体制会带来什么样的种种积极的东西。

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中国，也没有列举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名称，因为那样做的话，他们就必须专门谈谈我们，而这不是攻击我们的场合，因为已经邀我出席午宴，至于赞扬我们，这是不予考虑的。午宴后，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向我走来。客人们开始离去，波兰大使塔德乌什·盖德走到我们这里来。赫鲁晓夫留下了波兰人，

邀请我们到就在附近的他的别墅里去。在赫鲁晓夫家里，这位波兰人和我呆了大约四个小时。大约午夜的时候，我们在赫鲁晓夫陪同下乘他的汽车返回莫斯科。

在波兰人走到我们这里来之前，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有一段时间福尔采娃也在场）曾提出如下问题：

我问赫鲁晓夫，他是否有机会看了铁托同志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联盟在布里俄尼举行的会议上的最近一次讲话。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很克制的。他说，他不同意铁托讲话中的某些观点，但是他认为讲话是好的，因为铁托申明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而这是主要的。兰科维奇的报告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提醒赫鲁晓夫，我们正致力于让我们的国防国务部长来访问朱可夫元帅，早在四月二十四日我就要求朱可夫元帅接见。赫鲁晓夫说，他知道我曾要求朱可夫接见，并说朱可夫会接见我的。他没有问，我从贝尔格莱德给朱可夫元帅带去什么消息，而是立即转而谈只剩下我们单独两人时他要对我说的话。

在节日气氛允许的范围内，赫鲁晓夫相当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的领导人完全错误地看待苏联和他本人的一些行动并且得出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结论。他说，据他们获悉，铁托同志在同某些西方国家大使的谈话中，对赫鲁晓夫（以及主席团里的其他人）在莫斯科的外交招待会上经常同我谈话一事发表了评论。据说，铁托同志向西方国家代表解释说，苏联领导人，首先是和最多的是赫鲁晓夫本人之所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同我谈话，是为了破坏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对南苏关系的现状在公众中造成一种歪曲的印象。据说苏联领导人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向西方人表明，我们之间正在进行某种机密的交易，两国的公开冲突是商定好了的。赫鲁晓夫说，他之所以跟我谈话，是因为他以这一种方式和别的方式努力来

改善我们的关系。

他对于现在正在这里访问的我们的记者代表团表示有兴趣。他对我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准备跟他们谈谈。在向苏联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记者会有可能同赫鲁晓夫谈话。现在事情变得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好。我曾问过，苏联方面对他们的接待如何。他们对我说，对于到目前为止的接待没有什么意见。我告诉我们的记者，一定要表示希望拜会赫鲁晓夫或者苏联其他某一位最高领导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接见他们的话。

对于苏联国内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持乐观态度。他再一次向我谈到二月全会。他说，二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在这一点要比刚开始想到改组经济管理体制时要看得清楚。赫鲁晓夫说，他们正在考虑苏联上层的人事变动，这不仅涉及要取消的各个全联盟部，而且还涉及别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推行新体制。多少年来习惯于旧体制的人是无法推行新体制的。要取消的各部的大多数部长将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的各个小组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说，在经济战线上业已取得的成绩以及推行管理经济的新体制后将要取得的成绩会表明，南斯拉夫对苏联的制度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你们应当明白，苏联要是照南斯拉夫的办法做的话，苏联就会垮台。”他接着发表意见说，我们之间的新的公开冲突对苏联有利，加强了阵营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攻击也促使苏联国内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把他们分成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的时候，我们指望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现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同了，它们可以自由地表态，批评南斯拉夫和反驳我们。而在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发表共同宣言之后，它们是不可能做这一切的。赫鲁晓夫说，“我们

曾经不得不经常干预这些国家，让它们不要反对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看上去对于事态这样的发展确实是感到满意的。

我表示，我们对于经济管理体制中新采取的权力下放的措施和变化感到高兴。我们向我们的公众作了报道。我接着谈到我们的经济在顺利地发展，他们前不久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的经济终于完蛋了。我提到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下一步的某些计划。

关于他们从贝尔格莱德获得的与我们在莫斯科的谈话有关的消息，我作了不好的评价，我把这叫做“最高级”的阴谋。

赫鲁晓夫接着再一次谈到在铁托发表普拉讲话之后，我们本来指望出现别的结果，最后是一无所获。在苏联也好，在阵营国家里也好，恰恰发生了相反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苏联现在不象斯大林当年那样干，而是根据你们的态度来奉行政策。我们之间目前的冲突对我们有利，而不是对你们有利。”赫鲁晓夫表示不同意切普拉科夫在苏联官方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已告垮台这样一个结论。（以前，正是主席团里的那些人下令这个切普拉科夫写这样的文章，现在又开始批评他。）

谈话具有相当友好的调子，哪一方都不想破坏这种调子，尽管谈话的内容本身并非总是很令人愉快的。我本着这一精神在最后指出，今天的谈话证实，我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已经表明，对于苏联也好，对于南斯拉夫也好，而我听说，也对于阵营国家，都是很有益的。因此不应当停止冲突，而我们始终是这么做的！赫鲁晓夫对我这番话表示欢迎，双方都发出了笑声。结论是，我们可以做到既公开地冲突又友好地交谈。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莫斯科。

我继续记载五一节午宴和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俟波兰大使

走近我们，赫鲁晓夫就显得有保留得多，波兰大使对于我乘他的车出席午宴感到高兴。赫鲁晓夫不再提出新的政治问题。他一次也没有批评波兰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公事公办和疏远的味道。我们讨论开了各种各样彼此间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互联系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国内制度，关于党和国家的作用，什么是我们经常讲的自由报刊，是否存在这样的报刊等等。赫鲁晓夫多次强调，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人，不管有多大的分歧，并祝我们三个党进行合作。

赫鲁晓夫为“铁托同志和哥穆尔卡同志”干杯，这是在同我们发生新的冲突后，赫鲁晓夫第一次为铁托干杯。赫鲁晓夫在问及铁托现在的关节炎是否好了时，态度也是与此相类似的。他说，他相信，如果到苏联的哪个疗养地来治疗的话，肯定会对铁托有助益。他列举了苏联的几个疗养地，让我把这件事告诉铁托，让他自己作决定。铁托同志一旦前来的话，他们将十分乐意地在苏联做好一切该做的事。在接下去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又回到了铁托同志前来苏联的问题，并在结束关于这件事的谈话时明确地说，要是铁托和哥穆尔卡私下前来苏联休假的话，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看来，赫鲁晓夫找到了治疗这个方式，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会使铁托前来苏联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提到哥穆尔卡的前来。很可能他忖量这会促使铁托前来，铁托或许会接受同哥穆尔卡作伴。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确有把握，哥穆尔卡在讨论同我们的争论时会支持苏联方面（波兰大使五月一日在同赫鲁晓夫和我谈话时就是这种态度）。

我们谈到已故的莫沙·皮雅杰。我认为，俄国人，首先是赫鲁晓夫本人已经看到，对死去的莫沙进行报复是不体面的。这里知道我们大使馆举行了追悼会，知道我就已故的莫沙发表了讲话，知道我们对俄国人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现在他们好象是想在某种程

度上来纠正这种做法。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们不能原谅莫沙同志在我们的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反苏”态度。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法在赫鲁晓夫的家里使这场讨论趋于尖锐，我只好谈莫沙的功绩，谈他的去世不仅使南斯拉夫的革命运动所蒙受的损失。

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莫斯科。

前天，我拜会了朱可夫元帅。我通知他，我们的国防国务部长戈什尼亚克将军将前来访问。朱可夫元帅同意象我们建议的那样在六月上半月前来访问。朱可夫指出，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只由一位将军、一位上校和一位低级军官组成不是最好，因为代表团至少应当对苏联武装力量有所了解。他提出，要是例如来三位将军、三位上校和各军种再来一些军官，那会好一些。朱可夫记了下来，算了一下，总共是九个人；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多来一些也行。谈话充满了双方的良好愿望，谈话的方式要比我们在外交部遇到的为好。

朱可夫元帅对我说，他们不能让我们的人看原子军事部门。这一部门是特殊管理的，即便对于没有必要了解的苏联高级军方人士和其他人士也不开放。我理解朱可夫作这番解释是他本人努力要使我相信，这么做不是对南斯拉夫人采取某种特别的态度，而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即便我们的关系比现在要好，朱可夫元帅很可能也会对这次访问发生兴趣。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恰好在军事领域内最密切。我们两国的军队是我们的共同斗争的主要承担者，是过去，特别是最近一次大战期间建立的战友关系和紧密联系的象征。这样的联系是不会轻易地被忘却的，是会写进人民的历史并留在历史上的，也是不可能从当代人的记忆中，从今后的几代人的意识中抹掉的。

俄国人在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方面是很强的，正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有利地使我们处于依附地位，如果考虑到我们对军备的需要和苏联的可能性的话。戈什尼亚克在担负国家的重要职务的同时，还是我们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就使得这次访问不仅在俄国人眼里，而且也在别人眼里变得更为重要。这是半年前我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以来，我们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前来莫斯科。或许这里首先把他当成我们党的领导人看待，其次才把他当成政府的一位部长看待。在我们之间关系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在其他任何领域内我们都不可能对莫斯科作如此高级的访问。不是别人，正是朱可夫元帅这位在苏联和南斯拉夫都享有极大威望的人物来充当我们的国防部长的东道主，这一点使得这次访问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我已建议贝尔格莱德，在我们代表团的组成方面接受朱可夫元帅的意见，因为这样一个姿态无疑会受到苏方的欢迎，而对我们来说，也是正常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莫斯科。

关于改组苏联经济的管理的报告，是由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作的。苏联一直在强调，他们现在对经济体制实行权力下放是不同于我们在南斯拉夫的做法的，他们是“照列宁的原则”办事，而我们不遵照这些原则。不过，事实毕竟是这是苏联的生活出现变化的开始，斯大林时期的状况站不住脚了，即便权力下放不是“照南斯拉夫方式”进行的。如果不改变经济中的关系，在苏联也不可能设想生产力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俄国人仍然鼓吹国家起无所不能的作用，不过已经不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方式鼓吹了。

应当记载的是，赫鲁晓夫是所有这些变化的倡导者，他一再坚持这一点，免得有人会以为改组计划的提出者是国家计委、苏联政

府或者某个第三者。早在三个月之前，赫鲁晓夫就开始改变某些重要的国家机关，撤销一些机关，把一些不大为人知晓的新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这样就取消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实际权力，而这个委员会去年年底才成立。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国家监督委员会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尽管人们本来以为这将成为苏联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部。

苏联政府的组成在去年年底，匈牙利事件之后特别加强了。大多数主席团委员都参加了苏联政府。赫鲁晓夫仍跟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一起，并在那里草拟权力下放的计划，以前这属于苏联政府总理的权限，而不属于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权限。去年十一月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情况也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一个人不能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而是在马林科夫或莫洛托夫的陪伴下才能代表，而现在他代表党和政府说话，并且自己一个人提出采取最重大的措施的建议。其他主席团委员，甚至连布尔加宁也都不特别支持他，更不用说在公开讨论经济新体制的所有场合一声不吭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

我认为，我们的报纸或者杂志现在就开始批判地分析赫鲁晓夫的报告，试图从中找出弱点来，那是毫无益处的。我认为，相反，如果我们的报界继续对这些变化发表予以肯定的评论，那只有好处。我将告诉赫鲁晓夫，他们没有确切地反映南斯拉夫对所有这些重要事件的积极态度，这是于我们大家都有害的。

几周来，尽管我同主席团委员们有过多次会晤和谈话，除了跟赫鲁晓夫以外，我还没有机会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较长时间地谈谈改组他们的经济一事。其他的主席团委员对于这样的谈话显得不那么特别有兴趣。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莫斯科。

波兰大使馆参赞巴尼克在同我们的人谈话时，主张铁托同志和哥穆尔卡对苏联进行一次私人访问。显然波兰大使同自己的同事们“加工”了赫鲁晓夫的主意，现在波兰大使馆参赞就来说服我们，这件事“对于所有三国都有莫大的意义”。或许波兰人从俄国人那里领受了任务，朝着这一方向对我们做工作。巴尼克还谈到，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和完全非正式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来探讨现有的问题和分歧，因为可以坦率地和十分诚恳地进行会谈。对于这样一次“三方”会晤，波兰人肯定已得到哥穆尔卡的首肯，因此现在对我们下功夫，以便实现赫鲁晓夫的计划。

我们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是反对进行秘密会晤和反对达成秘密协议。同俄国人也好，同其他所有人也好，一概都如此。不论可能达成什么样的种种协议，不论会在什么问题上一致意见，访问和协议不予发表这一事实本身就只会对我们有害并限制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自由。因此，我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我们是不予考虑的。我们没有必要保什么密，即便我们接受的话，这种秘密也保不住。只要人们获悉进行了秘密访问，从左边和右边就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优越性恰恰就在于它的公开性。因此它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哪怕是在一九四八年那样的艰难的形势下。

《消息报》打破了最近几周来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中保持的暂时的平静。五月十六日的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军用物资》。今天所有的中央报纸和军报都刊登了内容相同的文章。

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报纸只发表美国对向南斯拉夫提供新的军用物资的协议的解释，目的在于在苏联公众中间造成尽可能

坏的印象。有些说法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他们援引美国人的话说，艾森豪威尔关于向南斯拉夫提供武器的决定“应当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一番话对俄国人来说来得正好，他们可以继续把南斯拉夫搞臭。根据这里多年来使公众考虑各个对外政策事件时所习惯的公式，俄国人现在借助于援引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证明”，美国向南斯拉夫出售武器一事始终是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执的背景，这一点现在“被揭露”了。

苏联公众相信艾森豪威尔的话甚于同南斯拉夫人发生争论的苏联的某个人士讲的话。至于我们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言论，俄国人干脆不予理会，并且竭力不让苏联有人发表我们的言论。俄国人这样玩弄计谋的结果是，由美国政府，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阐述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现在涉及的已经不再是在“现代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美国进一步向南斯拉夫提供武器，而苏联公众对这个问题要敏感得多。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莫斯科。

长期推迟的苏联作家协会全体会于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举行。苏共中央书记谢皮洛夫和波斯别洛夫轮换出席了全体会议。谢皮洛夫发表了长篇书面讲话，讲话没有发表。他是“负责”文化的，粗略地说，他负责的是应当如何写书、唱歌、写故事和小说，谱写什么样的音乐；这就是他的“工作部门”。

我听说，谢皮洛夫在自己最近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口号：百花齐放。他说这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中国还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和对立的阶级，存在着好几个政党。然而，这样的口号不能运用于苏联，苏联没有不同的社会阶级，也不存在不同的政党。很可能不会发表谢皮洛夫的讲话，因为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苏联的文学作出评价，也即党要求苏联作家不要去寻找文学的新道路，而是

严格遵循早就确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讲话还向苏联作家们提出，不要试图把中国的提法运用到苏联的国土上来。中国关于自由发展的必要性——“百花齐放”和关于工作自由——“百家争鸣”的理论，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受到某些发言者的攻击。有人针对中国的理论强调“一根毒草就可能搞坏一束最美的鲜花”。尽管就目前而论，仅仅涉及“鲜花”，这对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来说，毕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莫斯科。

在苏联的对内政策中，让我记下这么一点：莫斯科，很可能苏联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继续在对改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贯彻执行这一改组的速度提出意见。我们听说有人要求推迟召开定五月七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因为筹备这次会议的时间太短。然而，最高苏维埃会议不仅举行了，而且甚至还缩短了，而所有建议采取的措施都本着赫鲁晓夫报告的精神合法化了。

在中央国家机关，这里包括正在改组的某些部的工作人员中间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这不是由于对苏联的经济进行这样的改组所致，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把谁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针对我的问题对我说，要予撤销的各部的个别人将转到外交部来工作，以便加强苏联的外交机关。苏联政府的两名成员由于早就考虑到他们所负责的部将予撤销，就被任命为苏联驻土耳其和日本的大使。看来，这两个人是不那么关心苏联经济这样的改革是否好。

反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和他的改组苏联经济的计划的人正在散布一则笑话，说这是“特里什卡的长袍”。从前有一个人叫特里什卡，他有一件很好的长袍，他为了使长袍变得更好看，就着手改做。就这样，特里什卡老是在修修改改自己的那件长袍，直到把长袍完

全改坏了。赫鲁晓夫现在对苏联经济也在这么办。反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人，现在用赫鲁晓夫本人所使用的方式，通过笑话和民间谚语来反对他。还听到有这样的意见：赫鲁晓夫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因为计划的目的是不是从物质上刺激直接生产者 and 他们的企业，唯一的目的是改变莫斯科和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其他政权机关的权限。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对于苏联政府对西方的多方面的对外政策活动和其他活动来说，富有特征的是，俄国人的出发点是消除中东战争和他们对匈牙利的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后果，回复到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国际关系中占上风的那种气氛。据说这种气氛之所以有利首先是由于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现在俄国人向每一个西方国家提出进行接触和谈判，以便改善双边关系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世界问题。他们期待这场运动会取得某些结果，随后就转入第二阶段，同时坚持同一个基本目标——维护和平以及保持现状，首先是在欧洲。这一保持现状的政策不适用于亚洲，更不适用于非洲。那里的政治地图在不断变化：在当年的殖民地的土地上正在建立新兴的独立国家，同时西方殖民强国的领地在缩小。因此俄国人主张在欧洲保持现状，同时主张在亚洲和非洲消灭殖民主义。

俄国人现在对于西方在某些地区的利益的态度要灵活得多。他们不要求撤销美国在别国建立的全部军事基地。看来他们准备承认英国在近东和中东的利益以及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比以前温和。至于在下面这个主要问题上，则寸步不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结果，也即阵营的问题。这仍然是同西方强国达成任何协议的一个真正的条件。

某些西方代表谈到，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苏联政府改变策略，

而不是苏联奉行新政策。策略不可能改变某个国家例如苏联所奉行的政策，苏联大量地发出信函和大量地发表宣言声明，提出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政策也不能脱离策略。策略往往是政策的一部分。苏联最近提出的一些倡议，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能成功，尽管基本上被人们称之为策略，还是使得参与这一书信往返的全体参加者能够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活动。有人把这叫做策略或者政策，这是次要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今晚我将同米什卡一起前往蒙古，我是派驻那里的南斯拉夫第一任大使，而常驻地设在莫斯科。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大使馆的秘书拉伊夫·迪兹达雷维奇同志。我们尽我们的可能从几本俄文书和手册上了解这个遥远而不平常的国家。我们还是无法摆脱我们是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随身还带了一些为蒙古最高领导人准备的礼品。在这件事上是有点不平常的味道：我去蒙古是为了递交国书，但却象古时那样，带着送给蒙古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和外长等等的“礼品”。为了使得这件事尽可能地显得平常些，我要求礼物具有尽可能多的象征性质，更多的是要体现我们的国家，而不要象过去送给帝王的礼物那样具有商业价值。这一习惯在当代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大批新兴国家中。

我们随身带了我们贝尔格莱德军事地图研究所出版的几本地图集，由有关我们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人民解放斗争和革命的发展情况的地图组成，作为赠送给遥远的蒙古的新朋友的礼物。我认为，这本地图集具有极大的情报性和文献性价值。文字说明很少，全都在地图上表达：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事态的发展。同时，这本地图集记载着有关我们的这场战争和革命的全部重大的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是任何人的宣传所动摇不了的。

中国和蒙古之行

访问北京。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国大规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浪潮。访问蒙古。会见国家元首桑布和政府总理泽登巴尔。某些旅行观感。返回莫斯科。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乌兰巴托。

我在路上已经有十来天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字未记。现在我在蒙古首都，事实上是在蒙古政府供我们使用的离城五、六公里的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我现在有比较多的时间。

我们是通过北京到达蒙古的。当然，我们未必要绕道中国走，因为从伊尔库茨克有俄国人开办的班机。我们驻中国的大使弗拉多·波波维奇同志邀请我们在去乌兰巴托时去做客。要是没有这趟去蒙古的公差，我怀疑我们会有机会接受这一友好的邀请。

现在我设法记一下我们在北京的短暂逗留。我马上要说的是，我的印象和随行的其他人——米什卡和迪兹达雷维奇的印象，跟我们原来料想的不同，更不平常。现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到外国去，我们迄今为止在不同国家的旅行似乎都不是去“真正的外国”。

尽管我要说，我们都准备接受最不平常的印象，这是一个人对这样的事情所能做的准备，国家也好，人也好，我们四周的大多数事情也好，都使我们感到意外。我认为，这不能用我们南斯拉夫的

尺度，也不能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之间的差别是综合性的和巨大的，几乎象是这是其他某个星球和这样一个星球上的居民。

我们在北京的逗留完全是非官方的。没有任何有安排的日程，也没有旁的义务，一个例外是周恩来的外交部欧洲事务助理姬鹏飞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晚宴。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我还见到了周恩来，他的态度亲切友好。

在中国目前政治局势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在各级进行的，从农村和工厂开始，一直到大学以及国家和党的机关。在我们驻北京的大使馆里，大家都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制订了完整的工作计划，以便能够注视正在中国展开的这一场看上去是民主的运动的发展情况。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都不存在这样的事；在中国，谁都逃不掉受批评。与这一现象的同时，受批评的人还进行自我批评，这一切都是公开地，在有最广泛的群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据说这是掌权的人和百姓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系，至于发表意见，为每一个人保证了绝对的自由，最突出的事件则详细地在报上发表。

鉴于我们大使馆里没有一个人懂中文，他们无法根据中国报纸来注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我们大使馆里的同志们整天忙于翻译这里用英文发表的报纸和其他各种材料。所有这一切我们大使馆都加以整理和评述并且发回南斯拉夫。对于整个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中国人是完全有利的。中国的做法日复一日地不断证实这一点，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危险：有什么人可能批驳我们大使馆的同志们得出的结论或者对之提出异议，尤其是丝毫不怀疑这些结论可能遭到中国人自己的驳斥。我在我们驻北京大使馆里花了好几个小时谈论这一点。同志们有成

堆的文献性材料，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报纸，可以来证实他们的意见。

我们的同志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过多次谈话，中国领导人向他们证实，报纸忠实地反映了党和政府目前的方针，这是中共政策中的一个总的和持久的方针。我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遇到周恩来，他对我说，这是要改变“工作作风”，纠正以前所犯的错误，现在努力要做到“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对于批评中国的党和国家来说，不可能有比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客观和更深刻的了。因此现在正在研究迄今为止的全部经验，人们在他们所属的单位的会议上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他们预料，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将是十分重大的，如果对迄今为止的工作作风的批评更加展开的话，结果将更大。

周恩来还向我谈到，目前的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改善党群关系”。现在党应当多听取广大人民群众说些什么，更紧密地联系群众。中国不久前才打完仗，搞完革命，那时它是倾听群众的呼声的，因此它才能胜利。但是就象在战时一样，特别是在战后，在建立了新国家之后，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这样的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我对周恩来说，我不了解他们的国家的情况，我只是因私事来这里逗留几天，但是正在发生的一切给我们大使馆的同志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于中国党和政府这样的活动，我们的同志们只有赞扬的话。我们的同志们还让贝尔格莱德关心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南斯拉夫报纸从正面对此作了报道。我的印象是，周恩来对我这番话的反应不坏。

周恩来提到我们半年前在莫斯科的谈话。他没有直接问我南斯拉夫在参加他一月份建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方面所作出的决定。事情本身就很明白，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否定

的。

周恩来只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他问及我们现在跟苏联的关系怎么样。我告诉他，关系已大为改善，我们的国防部长，他同时也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政治局委员，过十来天将去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周恩来对此作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并不特别感到兴奋。

关于晚宴上同中国外长助理姬鹏飞的谈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好记载的。弗拉多·波波维奇同志曾同他就中国国内问题进行过长时间谈话，关于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已作了一些记载。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乌兰巴托。

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馆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他们受到中国方面的良好接待。我们的大使馆设在属于蒋介石的一幢房子里，这一事实就说明，中国人也希望给南斯拉夫代表安排得尽量好一点。于双方都有害的是错过了许多年时间，在我们之间不仅没有做任何有益的事，而且有几年时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好。中国一直支持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奉行侵略政策。情况表明，中国是不考虑为了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国家而同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搞坏自己的关系的。今天，中国再一次奉行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那些原则。

我在同周恩来谈话时，不论是以前在莫斯科，还是现在在北京，我都没有提出北京—莫斯科—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题目。我认为，最好是避而不谈可能显得象是我们在苏联和中国之间耍弄阴谋的一切。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同大使馆的同志们就苏中关系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我谈到，在身在莫斯科的我们来看，这些关系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阵营欧洲部分的政治危机去年变得更深刻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作用变得重要了。在苏联对匈牙利进行

军事干涉之后，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但是现在对于莫斯科来说，中国政治上的支持似乎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不太需要了。俄国人不同意中国现在这场运动，也不同意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看来现在倒可以谈论苏中分歧，而不光是谈论苏中磐石般的团结。周恩来向我谈过的共产党会议，本来设想是要作为谈论那些事件的一次会议召开的，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些事件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现实意义，因为赫鲁晓夫同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意见越来越投合，在这件事上，对他来说，中国的支持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至于调解那就更谈不上了。

我们离开北京时，充满了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过份短暂的接触所得到的各种各样印象，五月三十一日我们乘飞机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乌兰巴托。

蒙古对我们的接待非常好，把我们看成蒙古政府的正式客人。通过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我们预订了乌兰巴托旅馆的房间，了解了价钱，电汇了必要的钱。然而，我们抵达乌兰巴托之后，他们把我们安顿在市郊政府总理的别墅里（总共只有两个这样的别墅），给我们以质量最高的招待，给我们以特殊的伙食。对于蒙古来说，这是他们所能向外宾提供的最上等的接待了。

亚洲国家的大使以及阵营国家的大使在抵达蒙古时没有享受到类似的待遇。蒙古政府对我们的这样的态度使得阵营国家的某些代表心里很不以为然。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对我说，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蒙古政府“许可”在这座别墅里住了两个星期。

我们抵达乌兰巴托以后，立即同外交部礼宾司谈了支付我们在乌兰巴托逗留的费用问题。费用是相当多的：我们所住的别墅、伙食、蒙古人员的服务以及我们一周时间内所乘坐的汽车。然而，

蒙古人坚持说我们是他们政府的客人，根本谈不上支付什么费用。只有我为蒙古高级领导人举行的正式晚宴是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理应算作我们的开支。

在递交国书和履行其他官方义务方面，蒙古政府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外交部长在我们抵达之后几个小时就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我就递交了国书。同一天，政府总理就接见了我们，接着是党的书记。大人民呼拉尔——相当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桑布在递交国书时的讲话中特别赞扬了铁托同志，这番话蒙古报纸后来发表了。政府总理泽登巴尔和党的书记达姆巴也都向铁托同志问候。出席我们的晚宴的有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和蒙古其他最有声望的人士。

从所有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蒙古领导人在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的道路上对于同我国建立关系一事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努力给予南斯拉夫第一任代表以尽可能周到的接待。一切该发表的东西，蒙古报纸在我们在乌兰巴托的一周访问期间全都在头版发表。

（在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我们看到，叫人遗憾的是，〈战斗报〉只发表了递交国书的新闻，而〈政治报〉甚至连这件事也没有报道。我们的报纸也没有报道我们的日程中我们有义务发表的项目，如果我们想同一个刚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保持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向蒙古民族英雄、蒙古国奠基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元帅的纪念碑敬献花圈，我拜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泽登巴尔，我为蒙古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等举行的晚宴。由于蒙古人的照顾和关心，我们的电报只用了几个小时就从遥远的蒙古打到贝尔格莱德，我们的报纸想报道的话是能够正常地发表的。无论如何蒙古人是会注意到这一切的，在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他们就很可能把这看成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蒙古领导人正因为还没有打入世界，对于这样的

做法要比某个大强国的政府敏感得多，后者几乎不会去注意这种事情，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后者也不需要去注意这种事情。）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

现代的工人阶级和蒙古的知识分子战后才开始形成。革命之前没有蒙古人当大夫、工程师和兽医。考虑到蒙古极其落后，过的是游牧生活，气候寒冷，我认为任何建树即便拿绝对数字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值得最高的赞扬。文盲已经扫除。他们告诉我们，八岁到四十岁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九都已识字。现在已有八千名大学生。他们大约有四百座低一级的各种专业的学校。非牧业人口在不断增长。蒙古首都都有电影院、剧院和民族歌剧院。由于内部的变化以及苏联的援助，特别是卫生方面的援助，人口不再下降，每年的增长将近百分之一一点八，或者每年大约一万三千人。

国家的主要财富是畜牧业：大约九十万人口，就有二千六百万头牲口，这使蒙古在世界上占据首位。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牧民联合成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农场，这一数字在增长。在俄国人的影响下，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间曾尝试实行牧民集体化。虽说宣布这是自愿的，其实是强制性的。在居民进行了激烈的抵制和闹事之后，放弃了集体化。现在逐步地以和平的途径使仍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联合起来。牲畜的死亡率很高。例如今年由于严冬和饥饿就死掉了六十多万头，同以前年月死掉一、两百万头相比，这已被认为有了进步。

很难设想比较快地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加速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国民收入。理由是多方面的：人口少，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方式，普遍的落后，国家缺少资金和其他资料等等。因此每一项比较大的经济工程完全依赖外国的援助，实际上是依赖俄国人。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蒙古人的民族感在发展。在确实代表着科学和历史财富的国家中央博物馆(是按照苏联的方案布置的),我们看到有专门的陈列室,里面有关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的展品。我们向陪同我们的蒙古人询问了那个时期的他们的历史,得到的回答是,例如,那时的蒙古首都曾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一个城市,令人遗憾的是已经全毁了,蒙古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人把拿破仑时代的一切都保存着,而蒙古过去的文物都毁了。

蒙古领导人以最殷勤不过的方式接待了我们。南斯拉夫和铁托同志的声望是高的。蒙古方面在所有的谈话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在战时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以后更加提高了这一声望。

蒙古所有领导人对于我们现在同苏联的冲突真正表示不安,对我谈到有希望改善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表示感到宽慰。他们还就苏联的批判,问及在我们那里党和国家的作用。他们还谈到苏联对蒙古的援助,至于中国,他们基本上只字不提。他们全都一再感谢南斯拉夫支持接纳蒙古进入联合国,请我转达对铁托同志的问候。

蒙古人向我们表示,他们希望我们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今年夏天,在七月十一日蒙古国庆节过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阿尔巴尼亚进行回访性国事访问。他们还非正式地问及铁托去中国访问时是否能到蒙古来,好象访问中国一事已经谈妥了似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①,莫斯科。

我已经记载过,蒙古人大多数从事畜牧业。今天这一大多数仍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七日”。——译者

然过着游牧生活，跟随自己的牛羊马群到处为生，这些牲口始终还是大多数蒙古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扫除了文盲，确实是令人惊奇的。我问过政府总理泽登巴尔，关于蒙古没有文盲的消息是否确凿，他对我说是确凿的。

蒙古人对自己的首都乌兰巴托感到自豪。该市相当一部分是由蒙古包组成的，但是正在兴建越来越多的新房子和街道。乌兰巴托集中了国家的领导、全部最重要的党政机关、大学、中央人种博物馆、主要的工业以及国内唯一的一座民族歌剧院。这里还有几个外国大使馆的房子。就目前而论，最大的房子是苏联大使馆，但是房子陈旧，我不相信俄国人会在那里久居。苏联大使皮萨列夫对我说，中国正在为大使馆兴建一幢新房子，很大的一幢房子。此外中国人还预定要盖一座有将近一千个座位的电影场和一座大约有一百个床位的医院（！），而且这一切都同大使馆的房子在一个场院内。至于就大使馆的房子而言，中国大使馆将是最大的，在这一点上俄国人将落后于中国人，中国人在莫斯科也不会有这样的房子。

在乌兰巴托附近，我们参观了一座古老的蒙古庙宇，那里还有一些喇嘛。米什卡要求作这次参观，尽管陪同我们的蒙古人不怎么愿意让我们参观。以前的蒙古在宗教方面的偏见多得叫人难于想象，多少世纪以来，政权掌握在喇嘛手里，就我所知，他们的宗教喇嘛教——佛教的一种西藏变种，很可能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教派。这十来个喇嘛所反映的蒙古的过去要比阅读任何书籍都要来得透彻得多。当米什卡、迪兹达雷维奇和我到达那里时，他们正在进行某种仪式。仪式和喇嘛本身的相貌看了叫人害怕。我们估计，喇嘛的平均年龄可能在七十岁左右。大多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颅变了形，有的带有伤痕，有的胖得不自然，另一些又特别瘦，抹着什么油，裹着红黄色的袈裟，看上去一点都不吸引人。这座庙充满

了过去的精神，在里面很难呆上十来分钟。

我忽然想到蒙古人的沉重的遗产，他们一直到一九二一年革命，仍然处在这样的僧侣的统治下。我觉得，我现在耳朵里还在回响着这些老人念经时的铙钹声以及金属的擦响声。这些僧侣的信条之一是，禁止“触犯”大地，也即在大地上什么都不得做，既不能挖土也不能耕地，因为这样会使大地受伤。因此蒙古不存在农业、采矿业等等。当年连死者都不下葬，以免“触犯”大地，而是把死者听凭“卫生检查员”——食尸体的白兀鹫去处理，这些白兀鹫直到今天仍常在蒙古的居民点上空盘旋。

斯大林早在一九四二年就下了一道命令，在蒙古把基里尔字母当做官方文字！古老的蒙古民族文字干脆就被禁止。他们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命令的抵制，基里尔字母五年以后才实行。我在递交国书时发表了一番讲话，作为惯例，蒙古名义国家元首，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作了答辞。鉴于他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在他念自己的答辞时，我看见答辞不是用官方的基里尔字母写的，而是用蒙古传统的文字写的，蒙古传统的文字不是由左到右横写的，而是从上到下竖写的。我本以为，某些上了年纪的人，包括他在内，还保留蒙古旧文字。我错了。我同桑布谈话时在场的记者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在笔记本上也是按照旧蒙古的方式从上到下写字的。

有一天我们到乌兰巴托近郊郊游，我们在一座村庄附近呆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了典型的蒙古风光：有许多牛羊，特别是马和毛几乎触地的牦牛。在那里，我看到四、五岁的孩子就骑在蒙古小马的光背上，没有鞍子，也没有马笼头，这对于他们来说，就好象我们欧洲的儿童骑木马似的。据说蒙古人是“在马鞍上出生的”，这番话是确切的。

在第一个官方晚宴上，蒙古人让我们喝马奶，我们喝了，尽管

有点勉强。他们露出兴奋的神情对我们说，他们真诚地感到遗憾，我们不是在蒙古过年——过马奶节时来到他们那里。我想，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是件好事，就这一点马奶就够我们受的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莫斯科。

在结束关于蒙古的这番记载时，我认为，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我们的蒙古之行是符合俄国人的心意的，俄国人希望南斯拉夫通过莫斯科同蒙古建立关系和保持联系。

尽管俄国人在十月革命以后事实上建立了今天的蒙古，把它当作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某种填充国，我认为还是越来越感觉到蒙古的独立，特别是在斯大林死后和尼·谢·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之后。很可能蒙古人不可能以别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不管怎么样，事实是今天的蒙古在几十年内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进步，比以前几百年还要大，尽管这是在苏联的支配下取得的。对于我们南斯拉夫人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享有的这样的独立没有多大意义。当斯大林试图把类似的“独立”强加于我国时，我们就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尽管就南斯拉夫而言，我们对斯大林的抵制，也即我们同苏联的冲突，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对于蒙古来说，由于环境所迫，则适用其他的规则。

南苏关系改善

我国军事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设晚宴招待朱可夫元帅。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朱可夫元帅出席我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美国继续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军事方面”建立联系的政治意义。赫鲁晓夫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莫斯科。

应朱可夫元帅的邀请，由国防国务部长、南斯拉夫政府成员戈什尼亚克将军率领的我国军事代表团昨天抵达，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引人注目的是，俄国人利用朱可夫元帅，也即利用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把苏联和我国的外交部置于一边。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来说，朱可夫元帅是苏联方面最合适的人选。南斯拉夫夫人毫不犹豫地就响应了苏联提出的重建一九四八年时中断了的两国武装力量代表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就其政治意义而言超越了两国国防部建立墨守成规的接触。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莫斯科。

我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十分殷勤的接待。朱可夫元帅领着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苏联元帅和将领到伏努科沃机场迎接。安排了苏军仪仗队，奏了国歌。朱可夫在同我谈话时向我表示，他们

给了戈什尼亚克最高的荣誉，比惯例为高（部长们是不予检阅仪仗队和奏国歌的，这些礼仪是用于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

昨晚朱可夫元帅在国防部举行盛大晚宴招待南斯拉夫客人。出席的有在莫斯科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杰出领导人，他们有二十多人，以七、八名元帅和大将为首。朱可夫的欢迎辞充满了对我国军队和人民的赞扬，从政治上来说是温和的和令人接受得了的。根据苏联国防部补充通知，我们比原定时间提前十来分钟出席晚宴。为此，今天苏联所有中央报纸发表了专门的公报。这被称作“朱可夫元帅同戈什尼亚克会谈”。公报说我也参加了会谈。事实上除了打招呼和照相外没有进行任何会谈，而照相在希望创造比较好的气氛时是很常见的事。这反映了俄国人方面政治上过于着急了。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耐心，等不及让访问照安排得很好的日程进行，到时候再进行会谈。

原定今天同朱可夫元帅进行谈话。俄国人回避了，干脆把谈话一项从日程上取消了，而对我们的人说，日程上的这项那项“改变了”。晚宴后进行了谈话，这实际上是彼此首次相识，俄国人立即建议用他们的图-104型喷气机把我国代表团送回贝尔格莱德。戈什尼亚克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接受。我们代表团是乘坐一架达科他型小而慢的双引擎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飞抵莫斯科的。同俄国人不仅在我们面前而且在西方面前引以为自豪的现代化的图-104型喷气机相比，我们的飞机象是玩具。他们想让这架飞机早出现在南斯拉夫。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没有耐心，他们一开始就向戈什尼亚克提出，把他送回贝尔格莱德。送我国代表团前来的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有人守卫，在那里将停留两个多星期，始终有人守卫。我们不能夸耀，说我们的国防国务部长是乘坐有名气的飞机前来莫斯科的，它就象在展览会上似的停在伏努科沃机场上。

朱可夫元帅对待戈什尼亚克和其他所有南斯拉夫人十分得体

和友好。由于他的举止和谈话是直率和朴实的，同他的每一次会晤都给我们的人留下愉快的印象。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们以前还在为我国这个代表团抵达作准备面对面谈话时，朱可夫元帅的一些讲话。我认为，这些话现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现实意义，但是出自朱可夫元帅这样一位人物之口，肯定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这些话表明了他的思考方式。

朱可夫元帅简短地回顾了我们一九四八年的冲突。他说，这种事不应再重演。朱可夫说，即便是当时也不是一国人民同另一国人民发生冲突，或者一国政府同另一国政府发生冲突，而是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专横跋扈的产物，而我们对他也报以同样的态度。朱可夫元帅说，双方都有个人野心，而两国人民并没有吵架。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最好是避开这一点，不去争论一九四八年谁攻击了谁，为什么攻击。他接着说，他们是一个大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一九四八年时他们能够用三天时间就让我们屈服！这番话是叫人“咽不下去的”。我对他说，我们之间的冲突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我无须列举这些原因，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至于说苏联能“在三天内征服”我们，我不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经验表明，连当年处于军事实力顶峰的德国人也没有能征服我们，不只是用三天时间，而是用了四年也未能征服。我对朱可夫元帅说，“您最清楚，一九四一年时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仅成功地顶住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我们同苏联和其他盟国一起胜利了。”

这番讨论并不是能取得美满结果的一个谈话题目。既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由我开的头，我竭力尽早结束这番讨论。朱可夫说，我们的抵抗运动之所以有可能顺利进行是多亏了苏军的战斗。我没有表示反对，我说这是对的，我又说，可惜的是这一条没有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适用，譬如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

利人等等，他们没有利用苏军的战斗这样一个因素。要是他们进行了斗争，就会减轻俄国人的作战负担，减少苏军为解放他们这些国家所作出的牺牲，而且或许还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缩短。朱可夫元帅说，战争仍会拖那么长，这些国家的任何抵抗运动都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这番谈话是前不久朱可夫元帅进行回访时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莫斯科。

瓦·瓦·库兹涅佐夫向我通报，十来天前，美国政府在伦敦交给苏联政府（由史塔生交给佐林）一份裁军问题备忘录。这是有关美国政府独家采取的最新态度的备忘录，并不包括其他西方大国，据说，其他西方大国甚至还不了解美国的新立场。苏联政府也回了一个机密备忘录，是由佐林于六月六日在伦敦交给史塔生的。库兹涅佐夫说，俄国人尽可能接受美国的建议，但是同时又指出美国人所提出的许多条件。库兹涅佐夫说，美国政府这么做事实上不可能从僵局迈步并且使得任何协议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的政治目的和估计。

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最有意思的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作为两个超级强国开始交换秘密备忘录，尽管这些文件眼下没有希望成功。关于苏美两国今天就裁军问题，明天就别的什么问题重新进行直接接触一事，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正逐步地摆脱由于匈牙利事件而陷入的危机和孤立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应当考虑到。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莫斯科。

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麦德维杰夫到我们大使馆来拜会我。这是一位重要的“机关权势分子”，苏共中央同我们党的全部交道

都是通过他进行的。以前他负责联系我们的赞成情报局决议的侨民，大概现在仍负责联系。他给我带来友好的信件和好消息这一点证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正在改善。当然，麦德维杰夫是奉最高当局之命来向我们宣布比较有利的消息的。我们应当把这看成是一个迹象，表明苏联最高级采取了改善我们的关系的方针。这一回的事情同党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有关，这在政治上应当具有特殊的份量。

麦德维杰夫交给我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信是寄给我党中央的。信的内容是友好的，而希腊共产党中央是受苏联的影响的。尽管我什么都没有问他，麦德维杰夫提出了我党的档案问题，他要我相信，他们在做这件工作(事实上，最近八个月来已经停止了)，说这件工作需要许多时间。麦德维杰夫谈到改善我们两党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到苏共中央的一项决定，这一决定已经通过苏联大使在贝尔格莱德通知我方：邀请我们党和国家的二十至二十五名领导干部到苏联休假。麦德维杰夫说，“卡德尔同志表示愿意来，兰科维奇同志也表示了。铁托同志说，明年他无论如何要来”。

这样一来，苏联方面就做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决定停止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以一种必然会被各方面注意到的方式这么做的。我认为，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正是南斯拉夫派自己的领导人到苏联来“休假”，而不是相反。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个决定在对待我们最近的冲突方面政治上有一种“反作用力”，尤其是因为涉及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等同志。这里对这一切是十分满意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莫斯科。

苏联和西德达成协议，决定进行谈判，目的在于从苏联遣返余

下的德国人，接着是签订领事条约，或许还要签署新的贸易协定。阿登纳尽管反共，但是却想在同俄国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方面有所作为。他不能闭耳不听西德许多家庭和舆论提出的遣返还在苏联的战俘的要求。他也不能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西德有关经济人士同俄国人发展贸易的要求。就这样，布尔加宁致阿登纳的信有了一定的结果，且不去管它彼此间个人的情绪如何。

阿登纳接受谈判，对俄国人来说，完全是件好事。这样一来，苏联在同西德的关系上，实际上是在同两个德国的关系上取得了进一步的优点，因为同西德打的交道越多，在使东德政府得到承认的道路上迈出的步子就越远。这样一来，由于西德政府本身的缘故，我们离开德国统一就越来越远。这个政府的反共和不承认东德的意义就越来越小。时间显然不利于阿登纳迄今的政策和他的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的土地上，两个德意志国家越来越独立。就目前而论，莫斯科是世界上坐着两个德国大使的唯一的首都，但是肯定会有一些首都仿效莫斯科的榜样。

值得记载的是，我们在苏联外交部还听到这样一些意见，说阿登纳在西德掌权对于俄国人来说要比他们迄今所了解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掌权好。同阿登纳打交道是在明处，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从他那里可以预望得到什么。同社会民主党人打交道，就不是这样了。此外，西德这样的反共政府是符合俄国人的心意的。因为这使其他人看到存在的危险。这样就使俄国人大为方便，使他们在东德可以以迄今为止的方式行事，而在涉及德国问题的大多数问题上持“强硬”态度。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莫斯科。

两天以前，我就戈什尼亚克将军和我国军事代表团正式访苏举行了一次晚宴，招待朱可夫元帅和他的同僚。在晚宴上，除了朱

可夫元帅外，还有一大批苏联元帅到场：罗科索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巴格拉米扬、莫斯卡连科、苏杰茨、罗斯特米斯特罗夫、比留佐夫以及安东诺夫将军、索科洛夫将军和苏联武装力量其他一些杰出领导人。俄国人呆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晚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有的时候的谈话对一方或另一方来说不是愉快的。晚宴保持了一种官方的调子。

我发表了讲话，对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客人表示欢迎，尽管我们大使馆在类似的场合的习惯是不发表讲话，这一点俄国人是知道的。我的讲话事先写下来了，这就带有更多的官方性质。苏联方面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朱可夫元帅也报之以书面的讲话，这在俄国人来说也不是习惯，除非是想使整个事情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既然如此强调官方的性质，这就会影响亲切感，好象这两者是走不到一起的。

我认为，我的相当克制的祝酒辞没有使朱可夫元帅和大多数出席宴会的苏联元帅和将领特别感到兴奋。朱可夫着重强调我们战时的盟国关系以及我们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保持友好”的必要性。在具体的一些问题中，朱可夫元帅在谈话过程中提到了南斯拉夫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他还问我们：你们干吗要美国的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南斯拉夫都是有害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接受这种援助，因为没有来自东方的危险在威胁我们，俄国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会成为敌人。美国在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对我们真正的利益是有害的，侵犯我们的主权，因为这个使团保留着视察我们军队的权利（现在俄国人为我们的主权操起心来了！）。说美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使团从一开始起，就是对苏联和阵营以及对南斯拉夫搞情报活动的中心。既然美国人在南斯拉夫什么都可以达到，俄国人又怎么能向我们提供军事装备（朱可夫特别提到米格-17）呢？

朱可夫元帅接着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就其最终结果而言，美国的军事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南斯拉夫，而不是加强南斯拉夫。例如，美国人给了我们 F-86 喷气机，但是这些飞机从美国的装备中早就淘汰了。这在现在是教学飞机，可以送到废铁堆里去了。其他的武器也是这样，嗣后还会提出备件的问题和我们完全依附于美国的问题。

与此同时，朱可夫还提到我们“不太久之前签订”的巴尔干联盟以及它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我们的立场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实质上不是反对集团的，南斯拉夫是同西方集团联系在一起。朱可夫元帅说，他们并不主张我们加入东方集团，而是问题在于共产党人的团结一致。事情很清楚，朱可夫主张我们放弃美国的军事援助，同时我们还应放弃巴尔干联盟。南斯拉夫这样做的话，就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就会夹在两个集团之间，同两者的关系都不好。

朱可夫元帅也好，在场的苏联其他元帅和将领也好，根本不提我们一九四八年的冲突，南斯拉夫正是由于这场冲突才被迫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加入巴尔干联盟的。

主要是由戈什尼亚克来回答朱可夫元帅。我很少插嘴，我已经有过足够的机会同朱可夫谈同一些问题。戈什尼亚克是被迫提到一九四八年的，尽管我们事先商量过，我们方面不提一九四八年。我们现在不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跟铁托去年六月对赫鲁晓夫说的差不多），问题只在于我们同美国政府商谈结束这一援助。南斯拉夫必须保障自己可以向其他国家购买它所需要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但是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障。

俄国人提出了以前只在我们之间吵架时才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似乎使他们感到松了一口气。现在没有发生任何争吵，而是相当正常地进行交谈。双方强调，在哪些地方意见一致，在哪些地

方意见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各方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是在友好和共同希望建立较好的关系的标志下分手的。我认为，这次晚宴和晚宴期间进行的谈话的主要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朱可夫元帅几次提到赫鲁晓夫跟我谈话时提出的同样一些论点，甚至语言几乎都是同样的。显然，对于朱可夫元帅今晚如何讲话，他们是商量过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莫斯科。

北越大使六月十七日通知我，他的国家的政府已作出决定，在贝尔格莱德开设大使馆一级的外交代表机构。他们打算今年秋天就开设大使馆。除大使外，他们估计，在贝尔格莱德还要派驻七、八名外交官。

越南人还告诉我，今年七月他们的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对东欧国家进行正式访问的途中将路过这里。他没有列举访问将包括哪些国家。我向他谈到铁托同志行将访问亚洲。我们将注意胡志明此行，因为现在可能是访问南斯拉夫的最好的机会。越南人向我强调，他们对于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将访问北越感到高兴。这将是这样一位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莫斯科。

我国国防国务部长对苏联的访问继续顺利进行。同我国军事代表团见面的俄国最高级军事领导人的面越来越广。这几天戈什尼亚克将军跟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一起，因为他负责我们代表团所关心的一些事务。朱可夫元帅早在三天前就曾建议戈什尼亚克将军延长对苏联的访问两天时间，从原先商定的到六月二十四日延长到六月二十六日。这么做的理由是，从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

四日，列宁格勒将庆祝建城二百五十周年。我听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都将去那里。为此日程发生了一些变化，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只有在列宁格勒的庆祝活动结束后才能接见我国军事代表团。我建议贝尔格莱德，无论如何要接受朱可夫元帅的这项建议。诚然，没有这件事，访问本来已经延长了，但是苏联方面出现了必须予以考虑的情况。

我国政府起草了一项同裁军，特别是同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有关的建议。苏联政府，特别是苏联军界对于我们宣布的某些要求将持否定的态度。我特别指的是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单方面承担义务，在一段时间内放弃进行核试验，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存在任何国际协议。苏联把这一点同进行这样的试验的所有国家达成协议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我们的建议没有希望成功。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前不久毫无波折地、毫不动摇地拒绝了日本的类似倡议。

俄国人在采取宣传性行动，鼓吹全面、紧急和无条件禁止核试验的同时，断然拒绝要苏联单方面放弃，哪怕是暂时放弃自己的试验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这样的倡议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旨在削弱苏联和使苏联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在我看来，要是我们向俄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他们对南斯拉夫是会格外生气的。我们要是证明，我们的目的不是使苏联落后于西方，而是相反，我们希望为进一步巩固和平作出贡献等等，那么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又会展开一场新的论战。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六月十九日，就我国军事代表团来访我举行招待会，招待苏联最高代表，招待朱可夫元帅和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驻莫斯科的外交团。我邀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而他们将根据苏联礼

宾部门的建议确定主席团中谁将出席。我邀请外交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管没有严格的规定，国防部长来访时要邀请外国大使。我觉得最好是邀请自己的同行以及全体武官，以便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看到，我们方面同俄国人没有什么秘密。我知道，俄国人对于我邀请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大使和武官是不会特别感到高兴的。他们甚至表示了，他们指望这次晚宴只有苏南两方的人参加。我不能接受俄国人的意见，因为这样一来，我只会助长他们对这次访问的片面的解释。

苏共中央主席团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接着是朱可夫元帅和葛罗米柯。大部分受邀的苏联元帅都来了：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巴格拉米扬、莫斯卡连科、叶廖缅科、马利诺夫斯基、苏杰茨、罗斯特米斯特罗夫、布琼尼以及苏军的许多将领。外交团应邀出席的情况出乎一切意料。西方的所有大使都出席了，阵营国家的大使也是如此。富有特色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所有大使都出席了。出席的还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接着是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我们的印象是招待会出乎意料地成功。我们以前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无论如何应当邀请所有的大使和所有的武官，因为这里对我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的兴趣是很大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大使馆的房子对于举行这样的宴会来说是太小了，太不舒服了。我们总共只有一间中等大小的客厅和两间房间，所有的客人都得安顿在那里。因此，每当举行招待会时，如果邀请的客人超过两百人，我们那里总是挤得不可开交。这一回邀请了三百多人，尽管招待会是很成功的，很可能大多数客人是会由于挤得不可开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印象而记住这次招待会。布尔加宁在招待会上显得气呼呼的，颇为烦躁，一句话都没有讲，走进我请他去的那个房间，随后就跟俄国人在一起，一直跟他们在

一起，一点不想同戈什尼亚克或者同我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交谈，甚至不想同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交谈。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解释这一情况。从我到莫斯科以后，我还没有见到布尔加宁心情如此不佳，或者说如此烦躁，准备吵架。

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另一副样子，几乎是亲切的。他感谢铁托同志向他赠送的礼物（一管猎枪）。先是米高扬，接着是赫鲁晓夫告诉我，最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曾到铁托同志那里做客，受到十分好的接待，这里对于他们的大使在布里俄尼受到的接待以及同铁托同志的谈话表示满意。

俄国人利用这次招待会在美国军事使团继续留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向我们施加压力，美国使团是为了执行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而来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我国军事代表团团员韦利科·科瓦切维奇将军说，只要美国军事使团留在南斯拉夫，俄国人就既不会向我们提供，也不会向我们出售军事装备。马利诺夫斯基是在谈论到苏联 T - 54 型坦克时说这番话的，我们的人曾对这种坦克的一些部件表示有兴趣。俄国人一再断然重复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是知道美国军事使团不久将离开南斯拉夫，军事援助将告停止的，他们这么说是觉得很痛快的。

俄国人现在想加速美国人离开，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在他们的压力下美国人才离开的。俄国人这样的态度只是给我们制造困难，妨碍我们同美国政府达成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协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单方面的决定来拒绝美国的军事援助。俄国人正是在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是无论如何应当避免的。如果我们本着俄国人要求的这种做法的精神去做，这就意味着拒绝美国的军事援助，而转而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这是不予考虑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最近我同葛罗米柯就匈牙利最近宣布死刑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就此事掀起反对匈牙利和苏联的运动一事谈了话。我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同苏联外长谈这件事，而从种种迹象来判断，葛罗米柯的理解刚相反，似乎没有得到所代表的政府的指示，是不能谈任何问题的，尤其是所涉及的是大使和外长的话。

我说我并不很清楚全部必要的事实，在作了这一保留之后，我对葛罗米柯说，匈牙利刚刚开始巩固政局就又开始宣判死刑，在我看来，这从政治上来说是错误的和无人道的。国外反对匈牙利的运动已经开始减弱。现在却又有两名匈牙利作家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我是最近从巴黎《世界报》上读到的。西方舆论又激动起来。在我看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士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反动的冷战分子。事情不只是在于反对匈牙利的运动又以这一方式恢复了，而是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把人判处死刑，以及这样的判决是否有助于整顿匈牙利的局势，还是恰好相反。我认为，答案是清楚的！

葛罗米柯显得好象他是在议会或者某个类似的场合对问题作官方的答复似的，他说：这是匈牙利人自己的事，他不想干涉他们的内政。

我没有料到如此正式的和“正确的”回答。我对他说，无论如何这件事首先使匈牙利感兴趣，但也使我和匈牙利的其他朋友感兴趣，尽管我既不想干涉匈牙利的，也不想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认为，对于匈牙利的朋友来说，匈牙利的具有对外政策后果的某个问题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还是以那种方式解决，并不是无所谓的，无论如何，匈牙利人最清楚，他们应该怎么办。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戈什尼亚克邀请朱可夫访问南斯拉夫。看来，朱可夫元帅早

就料到会有这一邀请，他立即满意地接受了邀请，并说他可以在我们那里大约呆八天时间。他提到九月份是合适的时间。朱可夫元帅后来还提出，我们最好同时邀请赫鲁晓夫去。鉴于他有准备地接受了邀请并谈到自己对南斯拉夫的访问的细节，特别是他提议我们也邀请赫鲁晓夫，我认为，可以确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关于这一切，朱可夫元帅事先同赫鲁晓夫商量过。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昨天午后三点接见了戈什尼亚克和我。在动身去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那里之前，苏联方面通知我们，说将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这一点我们以前是没有料到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个大厅“完全按照规定”准备好了供两国代表团谈判用。临时又把我国军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叫来。除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外，那里还有朱可夫、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三位元帅、安东诺夫将军以及费留宾大使。事实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布尔加宁一句话都没有说。大概是他自己发觉他这样的举止有点不平常，布尔加宁就对我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解开了上衣，给我看，他浑身是汗。布尔加宁的举措同他六月十九日出席我们招待会时完全不一样。在那里时，他显然情绪不佳，但是准备同我们发生冲突。昨晚，他同样情绪不佳，但是他的缄默并不表明他准备吵架；他引人注目地寡言少语。

在进行了总共一刻钟左右的“谈判”之后，就入座进午餐。进午餐时的气氛很好。赫鲁晓夫对这一气氛作了最大的贡献，他情绪很高，也促使我们大多数人情绪高涨。赫鲁晓夫象以前关系好时那样祝了两、三次酒。午餐后，费留宾单独对我说，据他说，他“根据机密情报”认为，我国政府要求购买军事用品的话，他们将予顺利解决，我们不应当拖延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要求。显然苏联最高级已经商量好把这番意思告诉我。看得出来，俄国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元帅对这次会晤是满意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我国军事代表团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南斯拉夫。我们也好，苏联方面也好，都认为这次访问是十分成功的。可以说，朱可夫元帅这一回起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作用，而且这一角色扮演得很好。俄国人在礼宾规格方面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似乎这是一次政府总理的访问。他们这么做，在制造友好气氛方面达到了最大的效果，而又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上周给了我们一份照会，建议根据文化合作条约在莫斯科举行南苏两国代表会议，最后来确定苏联和南斯拉夫今年的文化交流计划。俄国人急于使我们这一领域内的关系也正常化。这样一来，我们两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就没有一个重要领域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这么说的前提是，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在这里的会谈将会是成功的，这是可以设想的，因为不然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决定现在前来莫斯科。

俄国人急于通过其他的倡议和活动来表明我们的关系的正常化。因此，他们根据以前同我们商定的安排，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以科夫帕克将军和科尔涅耶夫将军^①为首的退伍军人和苏联前游击队员代表团。科尔涅耶夫把现在这次南斯拉夫之行看作同我们战时的领导人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也算履行了他的誓言。他激动地回顾了同铁托同志以及我们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度过的时刻。

^① 科尔涅耶夫将军，一九四四年时为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莫斯科。

我们从苏联报纸上看到，赫鲁晓夫也好，布尔加宁也好，苏共中央任何主席团委员也好，都没有去列宁格勒参加庆祝活动，而朱可夫元帅却曾为此而明确地要求我国军事代表团回国推迟两天。赫鲁晓夫六月二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同布尔加宁一起设晚宴招待我们。赫鲁晓夫情绪很好，而布尔加宁坐立不安，诉说他有病。在谈话过程中我向赫鲁晓夫问及列宁格勒的庆祝活动，赫鲁晓夫回答我说，他们最初是考虑去那里的，但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委派党的一位老中央委员安·安·安德烈耶夫代表他们。我没有再同赫鲁晓夫谈这件事，尽管他的答复不是那么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主席团委员们通常还去参加比列宁格勒这次庆祝活动次要得多的一些活动。显然主席团委员们由于有某件重要的事而不能参加这次庆祝活动，而我们却没有必要地让我国军事代表团延长了访问。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前不久在谈到促进苏联的农业时，曾提出了一个口号，要“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农业是苏联经济的最大致命弱点之一，尽管这个领域赫鲁晓夫管得最多，并且往往公开谈到。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农业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潜力，他这么说很可能是对的。不过，要使这些有利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除了自然因素外，人的因素，在苏联是国家的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手头没有苏联官方关于肉类、牛奶等的产量的统计。因此，很可能我不可能完全确切。我认为，俄国人现在生产六、七百万吨肉，而美国人大约生产一千九百万吨或者两千万吨。这一差距要象赫鲁晓夫提出的那样，在三、四年内弥合是办不到的。我已经不

仅从外国人，而且也从一些俄国人那里听到对这一番话的不少批评。

至于牛奶的产量，赫鲁晓夫就更缺乏耐心了，或者说更不现实了，他规定明年苏联就应当“赶上和超过美国”。这意味着苏联要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增产牛奶大约二千万吨——苏联现在落后于美国的就那么多，这在我看来是办不到的。在向国家计委里的人提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不愿发表意见，但是看上去他们显而易见是不高兴的。

我认为，整个事情不只是在于在一种或另一种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尽管产量在这里也是放在首位的。同时还应当全盘地来解决一切同正常地供应公民有关的次要的事情，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来解决，而不只是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中心。例如，在莫斯科我们遇到一些大学生和他们的教授在这里购买糖，并且在沿伏尔加河一直到阿斯特拉罕的整个旅行期间一直随身带着，因为他们吃不准沿途是否有糖，而他们却要经过苏联好几个大城市！在供应上，莫斯科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它好象是苏联某种长期的对外展览橱窗。即便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其他地方，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更多的象是负责分配一般是为数不多的某些商品的国家中心，而在这些商店——分配中心里，商品基本上是一个式样的。谈不上正常地供应不同花样不同质量的商品。通常向顾客提供的是一种商品，因此“要就要，不要拉倒”。要谈到“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话，应当把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考虑在内。

由于这件事赫鲁晓夫不只是说说而已，问题就更严重了。这被当作国家和党的任务提了出来。我不知道，这一切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种种后果，但是这是实现不了的，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清楚的。例如，俄国人在钢产量方面接近美国人。或许把钢或者类似的产品，而不是把美国远远走在苏联前面的肉类和牛奶

作为同美国竞赛的项目，事情会好一些。按人口计算的收入（且不管这一收入是如何分配的），美国人在世界上除了几个国家外是最高的，而苏联则刚刚进入具有中上国民收入的一批国家的行列，肯定将很长时间呆在这一行列中。

我还认为，确定精确的日期，什么时候苏联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时候将开始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建设将进行多久，什么时候——哪一年——可以指望完成共产主义建设，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危险的。比起俄国人在短期内应当在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来说，更堪置疑和更不现实。美国在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远远走在俄国前面，这丝毫不足为奇。在这方面，美国还走在其他许多国家前面，而在某些产品方面，美国一国的产量等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这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这种解释未必有损于苏联，如果考虑到各国过去所处的历史条件的话。苏联肯定有超过美国的别的长处。这就是分配领域、工业产量增长率、居民的社会福利和保健、国家的自然财富等等。

在我看来，“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场比赛是不会成功的。我想同赫鲁晓夫谈谈这件事，尽管这是很难谈的，因为会发生不必要的争论，而我们南斯拉夫人同俄国人的争论本来就够多的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联 最高层的一场较量

在外交部的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集体领导”的结束。政变是否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权？关于苏联的政变。朱可夫元帅和苏军在六月事件中的作用。美国人七月四日的招待会。同米高扬谈话。拜会赫鲁晓夫。致函铁托谈同赫鲁晓夫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莫斯科。

今天，七月三日，葛罗米柯的助手之一帕托利切夫叫我去。我到外交部时，发现阵营国家的代表都来了，他们占据的座位好象要举行一次较长时间的会议似的。帕托利切夫在半小时的讲话中向我们通报了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体会议的決定。大多数大使不断地匆忙地做笔记，在我看来，他们象是速记员。帕托利切夫告诉我们，前天，七月二日^①已经把将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通知了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他得到的任务是也在这里通知我们，以便在莫斯科从官方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帕托利切夫念了一些材料，然后讲了话，讲的时间比较长，是不受拘束地讲的。他向我们谈到以下情况：

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不是正常地由党的有关机关召开的，而是根据足够多的中央委员的书面要求召开的。这种做法党的章程也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昨天，七月二日”或“前天，七月一日”。——译者

是有规定的。在出现非常情况时才采用这种做法，而由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反党活动，情况是非正常的，他们还把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争取过去了，而在开始时，还把老伏罗希洛夫也拉过去了，因此他们在主席团里占了多数。

帕托利切夫没有告诉我们，在开始时，当这个反党集团占据令人信服的多数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没有说这一情况持续了多久，而是立即就转而谈这次中央全会，说在全会上有二百一十六人报名发言，大约有六十人发了言。由于时间不够，其他的人未能发言，而是交了自己的发言稿。全会一致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策划了”反对党和国家的总路线的“阴谋”。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在全会上三次发言，还不算他们的短时间讲话。在这方面，他们享有绝对的自由。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除了被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外，还将被剥夺政府副总理的职务。迄今为止的全体主席团候补委员都晋升为委员，谢皮洛夫除外，他参与了反党集团，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高尔基城、斯大林格勒和白俄罗斯的党的书记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别利亚耶夫、波斯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也都被提升了。

政府总理、迄今为止的主席团委员尼·亚·布尔加宁受到最后警告的处分，但仍为主席团委员。帕托利切夫说这番话时使人理解到促使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布尔加宁是苏联政府总理，不然的话，他也会被开除出主席团。我明白了，布尔加宁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什么时候丧失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级的职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马克西姆·萨布罗夫被开除出主席团，但是仍然是中央委员。别尔乌辛受到降职处分，从主席团委员的地位降为候补委员。鉴于布尔加宁担任苏联政府总理的职

务，党对他的处分将不予发表。帕托利切夫请我们把这一点视为机密。我认为没有什么机密可言，因为对十来个国家的十五个人宣布这一消息，它的机密性就只能是在报上发表这一消息而已。

我觉得，帕托利切夫的通报对于大多数在场的人来说，是极其出乎意料的。会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十五个人完全保持沉默是令人难堪的，甚至可能显得对帕托利切夫向我们通报的内容持保留态度。鉴于他仍在等待，我就请允许讲几句话。我祝苏联党和政府在今后的政治工作中取得最大的成绩。我总共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在我之后，波兰大使盖德讲了话，他几乎逐字重复了同样的话。帕托利切夫还向我们谈到党员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欢迎，苏联全国都在举行会议，贯彻和解释中央这次非常全会的决议。

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莫斯科。

莫斯科的外国人纷纷要求同我们接触，猜想我们对事情的了解比事实上要多些，因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朱可夫、苏联的元帅和将领们、葛罗米柯以及其他人都出席了六月十九日的招待会，呆了将近两个小时，而我们在没有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同他们谈了话。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谈到了中央全会，谈到了苏联最高层发生的事情。

我们后来于六月二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受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接见，我们在那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而恰好是在我们的招待会和苏联的招待会之间的期间内举行了这一次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共中央全会。这就更使外国人以为我们是了解这些事件的，因为苏联报纸引人注目地报道了我们同赫鲁晓夫和其他人的会晤。许多国家的大使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所知道的不比报上报道的多多少。他们一再提到赫鲁晓夫六月十九日到我们这里来和

我们去克里姆林宫。我一再说明，这是为我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对这两次宴会我的同行们现在已经不大感兴趣了。

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角度，我们大使馆现在重新回顾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六月十九日到我们这里来时以及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再次会见他们时的举止的每一个细节。现在我们对于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的布尔加宁的态度比较容易解释了，第一次时他怒气冲冲，对我国军事代表团漠不关心，第二次显得淡漠无情和抑郁不欢，以致象有病的样子。

赫鲁晓夫六月十九日竭力做得象往常一样，尽管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某种不同。例如，我们现在才明白，赫鲁晓夫那一天为什么根本不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样同外国大使谈话。大使们呆在一间客厅里，赫鲁晓夫和苏联贵宾呆在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另一间客厅里。赫鲁晓夫一反常态，喜欢同其他客人隔离。至于就情绪而论，他努力显得兴致勃勃，尽管他并不是始终都做到了。现在我们明白了，赫鲁晓夫那一天在主席团会议上居于少数地位，他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使我们一无所知。自从我到莫斯科以来，他第一次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没有同布尔加宁交换过一句话。

如果现在已经有有可能作出某些结论的话，那么只能根据帕托利切夫昨天在外交部向我们提出的通报以及根据苏联报纸最近这两天的报道来作。无论如何，富有特色的一点是，帕托利切夫当着十五位阵营国家和南斯拉夫的代表通报了对布尔加宁的处分。我听说在党的会议上也宣布了这件事，而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席这样的会议。不难设想，苏联政府现任总理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了。

替换布尔加宁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在撤换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之后，再撤换他，对于苏联和赫鲁晓夫本人来说，是过份了。那样就会更难于渡过目前的危机。我认为，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留下，这只是一个暂

时的解决办法。布尔加宁不可能长期呆在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上。

布尔加宁参加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一事，使得赫鲁晓夫极其不高兴，十分伤心，因为在马林科夫被撤职后，正是赫鲁晓夫提名布尔加宁担任这一职务的。布尔加宁已表明，他在政治上完全不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在公德方面，他也没有显得好一些；他欺骗了当了他几十年政治朋友的赫鲁晓夫。要是马林科夫政变成功，因为事实上确有其事，我认为布尔加宁不可能还呆在台上，在最短的时间内他就会丢掉自己的职位。

至于要替换布尔加宁，如果不考虑赫鲁晓夫，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尽管新主席团增加到了十五名委员，现在看得出来，斯大林消灭苏联的干部，不让新人达到苏联的最高层达到了什么程度。除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元帅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米高扬，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正常地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朱可夫元帅是一位军人，他从来没有搞过行政和经济，此外，考虑到国外，让朱可夫元帅担任苏联政府总理的职务也是不合适的。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已经排除在斯大林之后又由某个非俄罗斯人来领导苏联。赫鲁晓夫是党的第一书记，现在或许还不会把国内这两个最高职位再一次集于一身。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撤换米高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最困难的是莫洛托夫问题。因此他们把他放在第三位，而在我看来，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是莫洛托夫，而不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一九五五年被撤销政府总理职务之后，已经一半被除掉了。不过马林科夫在农民和一部分城市居民中间还有一定的威信。人民回想起“在马林科夫领导下松了一口气”，在斯大林去世后，在其他任何人领导下他们也会松了一口气的。

卡冈诺维奇是不足为道的，尽管他们按字母次序把他排在第二位，排在莫洛托夫之前。他的名字对于苏联最落后的那部分居民或许有点意义，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的庇荫下

在苏联最高层呆了三十年。人们往往讲一些笑话，谈到每当现在需要发表政治性应景讲话，或者每当同他谈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卡冈诺维奇是如何“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我并不是说他已经昏聩老朽了，尤其是从体力上说，他还没有衰老，看上去身体很好，我听说他还常常到莫斯科近郊滑雪。现在提到有一份几百名铁路员工的名单，卡冈诺维奇曾断然要求斯大林把他们干掉。卡冈诺维奇的要求不仅被满足了，而且还由于这件事和类似的一些行动，他被奉为“布尔什维克”的榜样。

无论如何，我认为，由于反党集团里有卡冈诺维奇，揭露这个集团就比较容易。

至于莫洛托夫，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对于党，对于苏联公众来说，他的名字几乎就是神话。除了伏罗希洛夫之外，他是有文件可资证明，早在列宁时期就曾在列宁领导下工作过的苏联少数活着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一直在苏联的最高层，三十年来一直是斯大林的左右手。二十大以后的事态的发展似乎证明了莫洛托夫是正确的，他的某些悲观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去年，阵营里的对外政策危机和苏联的失败，特别是波兰的变动，尤其是匈牙利事件，还有苏联同南斯拉夫的新冲突，都加强了莫洛托夫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赫鲁晓夫是被迫向莫洛托夫作出让步的。

在我看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最后是莫洛托夫这样的排列是赫鲁晓夫的一个策略，以便把马林科夫说成是这个集团的头子，同时也有理由来反对莫洛托夫，指控他听凭自己由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牵着走。对于苏联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来说，莫洛托夫不仅是最难对付的，而且他也是所有人中间最顽强的一个。最后，据中央委员会的公报说，唯有莫洛托夫在表决全会决议时弃权，其他所有人都“批判”了自己，这种做法在这里已成惯例。

过去并没有听说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是朋友或者亲密的同

僚，看来可能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件事是，他们不能忍受赫鲁晓夫当党的领袖以及事实上的苏维埃国家元首。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作为个人同他也是格格不入的。这一切的根源还在过去，而在斯大林死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撤销了马林科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接着又在一九五五年撤了他政府总理的职务。我认为，正是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当苏联的领袖，而不只是主张上的分歧使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在推翻赫鲁晓夫这一共同的目标上联合在一起。

我到莫斯科以后，据我对他们的观察以及我同他们的谈话，马林科夫把自己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情绪掩饰得比莫洛托夫好。现在，去年五月一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午宴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赫鲁晓夫作为东道主祝了十来次酒，而莫洛托夫基本上一声不吭地在桌子边坐了几个小时，好象他是被迫忍受这一切似的。

在我看来，使苏联公众感到意外的与其说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布尔加宁的态度。赫鲁晓夫同前三人过去都有过冲突，而在这一次以前，同布尔加宁从来没有过冲突。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莫斯科。

我们大使馆继续研究苏共中央最近一次非常全会的结果。全会使得苏联政界上层的一批人剥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并代之以自己的人的尝试未能得逞。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试图按照其他国家搞政变的做法——只不过这种做法已适应于苏联的情况——在苏联办到这一点。这里不用真实的称呼——试图搞政变——来称呼这种做法，而是称为“反党集团”的活动，似乎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出现政变的。

在我看来，仅在斯大林死后的三、四年中，苏联就已经发生了

两次政变，而这一次第三次的影响最为深远。我认为，前两次政变的组织者是赫鲁晓夫。第一次政变是在一九五三年，当时通过在苏联上层最核心的圈子里施展阴谋，干掉了贝利亚和他最亲密的同事。第二次未经流血的政变也是赫鲁晓夫策划的，他撤掉了马林科夫所担任的苏联政府总理的职务。那是在一九五五年。这两次政变的特点是，都是在苏联上层最核心的圈子里，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策划的，他这样干就使苏联共产党和全国面临既成事实。

现在，别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他们又策划了一次更大的政变，这一回是反对合法选举产生的党的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甚至不是主席团全体委员都知情，因为这是一个集团反对另一集团。政变分子打算只把通过政变作出的决定告知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至于俄国老百姓，他们就不想把这件事专门告知了，就象在头两次政变时所干的那样。苏军和朱可夫元帅忠于赫鲁晓夫所代表的政策在使政变分子遭到失败这一点上起了重大作用。在这场冲突中，突出地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富有活力、勇敢和具有政治才干的个性，近几个月来，他在老百姓中间的威信在提高。

回过头来再看看关于这些事件的官方公报，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央委员会这次非常全会的公报一开头就谴责“个人迷信”，这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理解为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同这一迷信联系在一起。这只能意味着，在二十大上没有把同“迷信”有关的事全说了，很可能是出于当时要在内部保持安定这一考虑。公报还谴责国际和国内的修正主义。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属于策略范围，免得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支持者指责中央委员会“向修正主义分子投降”，指责中央委员会改变党的立场，因为没有提到修正主义分子，而在苏共内一贯是这么提

的。

眼下，在个别地方还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为“同志”，尽管比较少。比较多的是称他们为宗派反党集团。随着时间的消逝，我认为，最后一种称呼将越来越占上风。苏联社会以及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

在莫斯科看不出来采取了非常的安全措施。街上的人比往常略为少一些。读报栏前聚集的人少了一点，有的话也是各人看各人的，都不说话。商店前排队的人群无所不谈，就是不谈最重要的消息。我们进行了某种“民意测验”。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说：“俄国完蛋了，上面在争权夺利”。“莫洛托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一位老年妇女愤愤不平地说：“跟别的地方一个样！”一位市民说：“老百姓喜欢马林科夫。”另一位市民说：“谁知道谁对谁错？俄国老百姓永远闹不清楚。”可以感觉到人们对官方的解释是不相信的。我认为这是多年来的做法的结果，在“清洗”时期一再向人民反复地讲述干掉领导人士的虚假的理由。因此，这里早就不信任“从上往下”灌输的官方公报了。

西方代表的举止显得他们似乎在公布之前一无所知。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我们一样并不知情。东方代表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不是同斯大林分子较量的结束，而是开始。这也将席卷他们这些国家，在那里，许多斯大林分子始终还占据着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阵营的某些记者在敢于讲话的场合说：现在应当记起铁托同志在普拉的讲话了。我们从某些俄国人那里听到：现在该看清楚了，我们这里，在领导人中，是否象铁托所说的那样有斯大林分子，还是象我们的人说的那样没有斯大林分子。

* * *

美国人七月四日就美国国庆举行的招待会，是发生了暴风雨

般的事件，干掉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莫斯科报纸总是这样来称呼谢皮洛夫，好象这成了谢皮洛夫现在的新姓似的——之后，莫斯科的政界头面人物第一次有机会聚首一堂。至于谢皮洛夫，俄国人严格地这么做，报上报道他的名字时总是少不了那个“参加他们一伙的……”。俄国人自己现在称谢皮洛夫为“俄国姓名最长的人”。

驻莫斯科的外交团全都来到美国人那里。苏联来宾则是经过仔细挑选的，确定了谁该来，谁不该来。

在最高级领导人中出席招待会的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和葛罗米柯；赫鲁晓夫没有来。苏联著名军事领导人中，除了负责同外国军事使团联系的部门的人员外，没有任何人出席。米高扬不仅是原来的主席团中“幸存下来”（迄今为止，他始终如此）的少数委员之一，而且是新的主席团委员中第一个出现在美国人的招待会上。挑选什维尔尼克出席这一场合是合适的，因为他是刻板的，外国人试图吸引他进行某种政治性谈话，总是徒劳。

我同有兴趣进行谈话的米高扬交谈了较长时间。他说，反党集团成员们自己选择了挑起危机和转入进攻的时机，很可能他们认为他们不能长时间等待了，因为他们认为时间对他们不利。他们以攻击赫鲁晓夫的形式来攻击党的总路线，这时另一部分主席团委员主张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作为唯一有权限解决争执的办法。米高扬说，布尔加宁使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动摇了。布尔加宁没有被马林科夫争取过去的话，这两个人是会站在党一边的。

我问米高扬，是什么原因促使谢皮洛夫加入这个集团。米高扬说，这不是谢皮洛夫同党第一次有分歧，有旧的分歧，也有新的分歧。早在一九五五年，他们从南斯拉夫回来之后，谢皮洛夫就说过，南斯拉夫的观点是纯粹的孟什维主义。后来，他又不赞成现在的改组经济的计划。他把国家的职务看成是某种财产，他把外交

照会和讲话当作自己的“著作”，用国家的开支作为自己写的小册子来出版这些照会和讲话。我指出，在我们看来，谢皮洛夫飞黄腾达得太快了；从一名报纸编辑一夜之间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又成了苏联外长。米高扬说，这也是他垮台的原因之一。

由于还没有收到贝尔格莱德的指示，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谈到，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把这件事当作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正常地、如实地告知苏联和世界公众，这是很好的。我认为，这样做最有说服力，最好。

外国人看到我同米高扬单独谈了较长时间，没有走到我们两人这边来。后来他们就追问我，但是我叫他们去问还在招待会上的米高扬。我特别对苏联公报的对外政策部分发表了予以肯定的意见，其他一切都是苏联的内政。大多数西方代表注意到，现在“集体领导”完结了，因为主席团里再也保持不了平衡了，而是一个方针、一个人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西方人装做似乎他们对于布尔加宁的事一无所知，这当然不必相信。

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莫斯科。

今晚深夜我给铁托同志写了一封信，谈我同赫鲁晓夫就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莫斯科发生的暴风雨般的事件进行的谈话：

铁托同志，

寄上关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同尼·谢·赫鲁晓夫谈话的信。

我于七月四日晚上要求接见，赫鲁晓夫于七月五日午间在中央委员会大厦接见我。

鉴于赫鲁晓夫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事件而特别忙，我准备会晤只进行五到十分钟。然而，赫鲁晓夫却同我谈了一个半小时。赫鲁晓夫很坦率，态度是友好的和亲切的，在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他

向我介绍了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事态的发展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和后来在中央全会上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集团的彻底失败和被清除而告终的。

在这封信里，我将尽可能确切地向您报告我同尼·谢·赫鲁晓夫的谈话经过，目的在于使您了解赫鲁晓夫向我谈到的事实，也即了解在这次谈话过程中提到的全部情况。

我在打招呼时就祝贺赫鲁晓夫，祝他们的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祝愿苏联和赫鲁晓夫本人取得最大的成就。我感谢他接见我，随后就向他宣读了您的来信。赫鲁晓夫认真地听着，对您正确地理解他们并对全会的决定采取这样的态度表示感谢和满意，他说，他们今后也将为建设共产主义竭尽所能，他请我向你转达他的亲切的问候。

接着赫鲁晓夫说，他不知道费留宾是如何向您通报这次全会的，尽管费留宾奉命向您介绍情况。嗣后，赫鲁晓夫就事件发生的经过向我谈到以下细节：

赫鲁晓夫说，他还在芬兰访问期间就感觉到布尔加宁有点不对头。布尔加宁对他的态度与往常不同，使人感觉到布尔加宁显得不耐烦，这在人与人之间是可能觉察到的。赫鲁晓夫对此未予特别重视。赫鲁晓夫以为，这是由于他经常批评布尔加宁的缘故。他们从芬兰回到莫斯科后，这个结开始慢慢解开了。有一天中午过后，布尔加宁打电话给他，说应当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当时在家里，而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里，那里有一个供中央委员进餐的餐厅，便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在有事情时在工作时间“中断”后在十三点至十四点之间可以在那里立即进餐。赫鲁晓夫回答布尔加宁说，他已经象往常一样预定了主席团会议的时间，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六月十八日召开。布尔加宁回答说，“我们要求

召开”等等。赫鲁晓夫问他，“他们”^①是哪些人。布尔加宁回答说：“在这里吃午饭的一批人”。赫鲁晓夫回答说，按照党章和主席团的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会进午餐集团”，会议应当象原定那样举行。布尔加宁更加坚决地要求开会，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他将 从家里去克里姆林宫，去餐厅，他去那里进午餐，到时候再商量。

在那里，赫鲁晓夫遇到：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也即整个主席团。苏斯洛夫没有在莫斯科，他在度一年一度的休假；萨布罗夫在华沙参加经互会会议，基里钦科在乌克兰。赫鲁晓夫继续进行布尔加宁在电话里开始的讨论，事情立即就尖锐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要求召开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试图解释，那天不能开会，因为主席团已经决定由赫鲁晓夫接见匈牙利记者代表团，随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向他发表谈话，这一切都已说好了，是否请他们等到第二天再开。他们拒绝了，除米高扬外，全都开始攻击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我们大家都去。赫鲁晓夫说，可以大家都去，如果主席团决定这么做的话，他认为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这番话讲了没有用，他们做出决定，果然全都去了，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

在进行这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气氛就极度紧张。这实际上是经过长期酝酿的一次爆发，一次袭击。除米高扬外（我的印象是，在当时，米高扬是消极的和持中立态度的），赫鲁晓夫是单枪匹马。就在当时，六月十八日，斯大林分子提出了第一个要求：他们要求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不由赫鲁晓夫主持。赫鲁晓夫试图反驳，援引了他以前的建议：他以前曾建议由全体委员轮流主持，而他们当时没有采纳，决定由他赫鲁晓夫来主持。现在他们又要撤换他。为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我们”。——译者

什么要破坏决议？赫鲁晓夫的抵制没有成功。马林科夫(?)或者是莫洛托夫向布尔加宁建议，由他主持这次会议，据他们设想，这次会议得使斯大林分子取得胜利。赫鲁晓夫被迫服从，会议由布尔加宁主持。赫鲁晓夫只做到使得大家同意把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叫来。赫鲁晓夫寄希望于这三个人改变主席团里的力量对比。面对大多数人的激烈攻击，他想争取时间，而他们设想一切都在主席团里进行并有一个结局，在主席团里做出决议，把这一切强加于党和国家。

多数人同意把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叫来。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表示坚定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令人遗憾的是，萨布罗夫表明，他在去华沙之前就已被争取过去了，他加强了主席团里的多数。

斯大林分子的要求是要干掉赫鲁晓夫。事实上，这是接管党内和国家的权力的一个手段。他们开始时没有提出什么纲领，而是通过一些策略上的手法，想尽早在一些细小问题上同赫鲁晓夫较量，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他们硬是让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这已是一件大事。

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指责大致如下：

在赫鲁晓夫领导下，主席团不团结，党内也不团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为什么赫鲁晓夫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苏联全国各地走动，干预一切，插手对外政策？第二天本应集体去参加列宁格勒的庆祝活动，本来决定由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这也要改变，改由别人讲话。他们提出了限制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的招待会上讲话的自由的问题，说赫鲁晓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对这种做法应当加以谴责，在主席团里做出决议。

事情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尖锐。斯大林分子提出了内务部的问题，撤换谢罗夫的问题，他们指责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委员搞窃听。他们还攻击赫鲁晓夫发起的在牛奶、肉类和黄油的生产方面

“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他们攻击赫鲁晓夫在外国代表团面前出风头等等。

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顽强地为自己辩护。赫鲁晓夫尽管处于少数地位，事实上是他在进行进攻，从一开始起他就说了，他们是些什么人，该到哪里去。赫鲁晓夫对我说，当马林科夫提出去列宁格勒的问题时，他对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或许不想到那里去。他有理由害怕去列宁格勒，因为他沾满了他所杀害的列宁格勒共产党员的无辜的鲜血。他——马林科夫是枪杀库兹涅佐夫^①的直接罪魁祸首，是马林科夫陷害了沃兹涅先斯基^②。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说：“你是有理由害怕去那里的，彼得堡的工人可能会问问你的”。而马林科夫对于这番话则报以：这可耻，同志们，你们听见了没有，等等。对于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也说了类似的话。

赫鲁晓夫的基本策略思想是：“主席团不能对任何问题作出任何决议。我们到全会上见”，到那里去解决一切。赫鲁晓夫进行抵制，施展策略，以便争取时间和动员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成功的策略的一个例子是：从根本上说，他反对由主席团作出决议的任何主张，因为这就会是失败，然而，为了争取时间，他同意确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全会的决议。围绕这个决议起草委员会，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和斗争。斯大林分子提名莫洛托夫，作为他们这个集团

① 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一九〇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库为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为联共(布)党中央书记，一九四九年因“列宁格勒事件”被捕并被处死。——译者

② 指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一九〇三——一九五〇)。沃为一九一九年老党员、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院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任苏国家计委主席，一九三九年起为苏部长会议副主席；一九三九年三月起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一九四一年二月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四七年起为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九年初因“列宁格勒事件”被捕，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被处死。沃著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济》和未完成稿《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译者

的领袖，“另一派中间可以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表示反对，他说：“要是我和莫洛托夫在一个委员会里，你们知道，那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决议草案”。他们表示同意，于是就围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展开了较量。赫鲁晓夫参加了这一较量，尽管正如他自己向我作的解释那样，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可能产生任何决议，赫鲁晓夫只是在拖延，以便争取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天时间，使中央委员会有所准备。

说明赫鲁晓夫的策略的第二个例子是：在主席团里遭到失败以后的第二天，以科涅夫元帅以及我认为是高尔基州委书记伊格纳托夫为首的二十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前来要求出席主席团会议。这批人在大门前等着，而主席团里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则攻击赫鲁晓夫，说这是施加压力，这是分裂党等等。同斯大林分子站在一起的老伏罗希洛夫激动地说：“你们还可以把坦克调来”。朱可夫元帅（他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出席了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的会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回答他说，这没有任何联系，坦克听他朱可夫的命令调动，而在大门外的是中央委员，不是坦克！

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和其他人说：“请看这就是你们自己要召开的全会，而你们却害怕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提到开始大规模枪杀之前，甚至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一种老的做法，那就是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允许。赫鲁晓夫说，当他在莫斯科当地方委员会书记时，他就经常这么做，而斯大林分子现在却反对让要求进来的二十名中央委员进来。不过，多数派还是没有让步。斯大林分子不让这二十个人进来，他们不难猜出这些人全是反对他们的，而是决定从主席团里确定一个人出去向他们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多数派选择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不同意，他要求并办到了，让他也出去。据赫鲁晓夫对我说，布尔

加宁喃喃地说了几句，这没有使在场的中央委员满意，接着赫鲁晓夫讲了话。整个事情变得对赫鲁晓夫很有利，因为他的论点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唯一有资格的机构，等等。

事情就拖延下来了。又来了三十名中央委员，提出了同第一批中央委员相同的要求。此后，已经开了四天会议的主席团收到了八十三名中央委员提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到他们那里去，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去，到那里去报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全会是唯一有权解决问题的机构。在这上面已经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将取胜。斯大林分子的士气还很高。事情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他们就开始准备为在全会上争取到多数而斗争。

在那里，斯大林分子遇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已经不是他们继续指责赫鲁晓夫，而是全会在对他们提出指控的标志下，要求斯大林分子出来说清楚，他们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到底想干什么。出来发言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等待着他们的是全会怒不可遏，他们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派的地位，事情完全翻转过来了。有六十多人发言，还有一百五十人报名，要求把所有（斯大林分子）开除出党，予以审判，等等。

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对全会的领导。从他对我讲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我认为是杰出的政治和策略才能。赫鲁晓夫在为如何拯救老伏罗希洛夫而操心。全会已经要求伏罗希洛夫表态，表态后就会把他归于斯大林分子一类，因为伏罗希洛夫在主席团里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对伏罗希洛夫施加了影响，对全会做了工作，伏罗希洛夫就脱身了，做了一个尚能令人满意的发言（在他在全会发言之前，赫鲁晓夫说，这是一只老狼，别人把它推进泥淖里，它感觉到了，清醒过来了，跳出来了）。关于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向我讲了同样的意思，据我看，他说得还是客

观的和真诚的：“老家伙”什么也不干，什么也干不了，可还以为自己是共青团员；他自己都不知道别人要把他领到什么地方去。赫鲁晓夫说，“重要的是伏罗希洛夫的名字，这是有份量的，应当把他拉出来”。

接着谈话转到布尔加宁问题。赫鲁晓夫怨恨布尔加宁，抱着厌恶的情绪谈到他。赫鲁晓夫说，这是一个傻瓜，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赫鲁晓夫接着说，还在主席团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处于少数，布尔加宁在主持会议时，他就把这一切当着布尔加宁的面说了，骂了他，并对他说，他可以把这也拿到全会上去，作为反对他——赫鲁晓夫的一个论点。在全会上，鉴于事情翻转过来了，布尔加宁来找赫鲁晓夫帮忙。赫鲁晓夫告诉他，让他首先自己帮自己的忙，在这之后，他赫鲁晓夫才能帮忙。布尔加宁答应这么做。

然而，布尔加宁的头两次发言不令人满意。接着萨布罗夫要求发言，他把一切都讲了。之后，布尔加宁再一次发了言，证实了萨布罗夫讲的话。萨布罗夫把全部真实想法都讲了。问题在于要改变党的，接着是政府的领导（赫鲁晓夫对我说：“布尔加宁这个笨蛋不明白，他们要是得手了的话，一天之内就会把他干掉”）。（反党集团）甚至明确地考虑了，一开始作为过渡，让赫鲁晓夫担任农业部长。作为收买和诱饵，让布尔加宁保留政府总理的职务，在最终解决之前，（反党集团）要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萨布罗夫说的，赫鲁晓夫对我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是布尔加宁说服了他。在萨布罗夫之后，别尔乌辛作了类似萨布罗夫的发言，别尔乌辛也是布尔加宁争取过去的。

这就快结束了。拯救伏罗希洛夫进行得很顺利，全会对此的反应良好，人们对“老家伙”作了现实的评价，倾向于宽恕他。至于对布尔加宁，就比较困难了，全会要求撤换他，对他讲了一些十分

尖锐的话。现在，在共产党员会议上，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又在这么做。在莫斯科的一次有三千五百人出席的会议上，布尔加宁也讲了话，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象一个白痴，赫鲁晓夫说，人们正常地得出结论，“苏联政府总理的位置不是为白痴准备的”。赫鲁晓夫说，在全会上也好，在工人的群众大会上也好，他不得不说服人们理解，让布尔加宁继续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就目前而言是有利于苏联的稳定的，至于布尔加宁该下台，这一点是人人都清楚的。

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全会上，米高扬讲了将近三个小时。讲话的第一部分有点学究气，“有教训人的味道”。全会不喜欢这一部分讲话，有人开始插话。接着，正常的是会议结束了，第二天再开。赫鲁晓夫提醒米高扬注意，从他讲话的第一部分起，气氛就不同了，提醒他注意插话，至于他如何讲话和讲些什么，没有对他提出要求。米高扬表示同意，第二天讲了一个半小时，全会对他的反应很好，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讲话是好的。

赫鲁晓夫还向我谈到斯大林分子在全会上，当人们开始向他们谈出真相时士气低落和一副懦弱相的某些细节。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显得最懦弱，装出一副可怜相。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比较硬，他是实际首领。莫洛托夫德高望重，这对马林科夫是很有利的。马林科夫在第一阶段的主席团里的斗争中是最积极的。当时的情况是，莫斯科的一些中央委员去找赫鲁晓夫，对他说：“不要屈服，我们支持你，不要屈服。”

关于全会的力量，赫鲁晓夫向我讲了下面这样一句话：“从列宁时期以来，党内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既没有过这样的斗争，也没有过所有的人在一个集团面前团结一致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说，在他从事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过程中不记得有过类似的情况。他对于全国对全会决议的反应十分满意。赫鲁晓夫说，这个集团没有参与党和国家的实际生活，从这一方面来说，没有损失

(赫鲁晓夫说到这里，举卡冈诺维奇为例)。他对于谢皮洛夫的评价很坏。赫鲁晓夫在全会上承认，他提拔谢皮洛夫是他的罪责和错误，他过去以为谢皮洛夫是一名正直而有能力的共产党员，而谢皮洛夫却表明是不称职的。谢皮洛夫在全会上发表了一个卑劣的讲话。全会对此感到特别愤慨(很可能正是由于谢皮洛夫在一年内爬上了苏联最高层，而现在显出了本相)。

赫鲁晓夫说，六月二十九日把这些事件向各国共产党作了通报。从四面八方得到的都是最积极的反应。赫鲁晓夫向我列举了法国人和阵营的某些欧洲党。他没有提到中国人。关于这一点，我也没有问他。

在赫鲁晓夫谈话过程中，我只提出某些很短的问题，以便尽可能具体而明确(并且不打断他讲话)。最后展开了短时间的讨论。我对赫鲁晓夫说的话同我昨天在美国人那里对米高扬说的话差不多是同样的。我向他谈到全会的对外政策决定所引起的积极的反响，这应当提高苏联的威望，减少西方反动派的敌对活动。这还将对国内外全体公众起到安慰和建设性的作用，便于清除掉教条主义分子。

我还对赫鲁晓夫说，按我个人的意见，全会把这一事件作为纯粹的政治性事件告诉苏联公众和全世界，而不影射某个斯大林分子为外国效劳，这是很对的。我对他说，这对于苏联来说是不同于斯大林的新做法，对于说服人们以及对于苏联的威信来说，这具有巨大的意义。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我声明，我只代表我自己讲话，贝尔格莱德获悉我的讲话的话，或许会谴责我。我对赫鲁晓夫说，在我看来，最好是让公众尽早获悉关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等人个人命运的官方消息。我对他说，关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人的个人命运，我从这里的外国人以及从苏联老百姓那里听到了形形

色色的猜测。我认为，官方尽早讲话，例如，宣布他们中有的人退休了，或者担任别的职位，这只会对苏联有利。我向赫鲁晓夫表示歉意，我干涉了这件事，但我不是作为南斯拉夫的大使，而是作为共产党员和苏联的朋友这么做的，是希望中央全会的决议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

我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看法，赫鲁晓夫表示欢迎，他说，他同意，说他们已经在考虑这件事。我顺便还谈到，让萨布罗夫在什么地方露一下面，让他参加就全会举行的某次积极分子会议，或许是件好事。许多人问我，萨布罗夫怎么样，因为据我所见，苏联报纸除了对他以外，对每个人都作了报道，敌人可能利用这一点。我认为，最好是报纸在报道萨布罗夫露面时，除了他的名字外，还列举出“苏共中央委员”，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趋于正常。赫鲁晓夫说，将让萨布罗夫担任苏联与阵营国家经济关系领导人的职务。

赫鲁晓夫今天对我说，他将同一大批主席团委员去列宁格勒。现在他才去做本来于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就该市庆祝二百五十周年应做的事，苏联最高层发生的事件使他们没有办成这些事。七月八日，星期一，他将同布尔加宁一起率领党政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他不再愿意跟布尔加宁一起去，但是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之后，将顺路去东德。在我看来，他将在那里发表讲话，或者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对东德表示支持，以削弱阿登纳在大选中的机会。

赫鲁晓夫向我通报了他们对于我们提出的在多瑙河上举行党的会晤的建议的态度。他说，他们同意，条件是罗马尼亚人要同意，因为牵涉到他们的领土。或许我弄错了，但是我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宁愿在别的某个地方，也即比较简便地举行会晤，不必牵涉到第三国。

在讲话过程中，赫鲁晓夫多次向我谈到朱可夫反对马林科夫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这个派别和主席团多数派的这次或那次发言。马林科夫早在在主席团策划阴谋之前，他就同朱可夫谈过话，说“我们应当研究有些什么作为”，因为事情这样下去不行，说是他把朱可夫当作朋友和同志才说这番话的，等等。卡冈诺维奇的别墅紧挨着朱可夫的别墅。卡冈诺维奇对朱可夫说，他只是主席团候补委员是不正确的，他是一个政界人物，而不只是军人，他是光荣的统帅等等。朱可夫当场十分明确地拒绝了两人的倡议。这后来成了反对派系分子的过硬的论据。

对于事件的最终结局，赫鲁晓夫表示乐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以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方式一直试图一切背着中央委员会，关起门来解决，赫鲁晓夫同他们相反，对中央委员会，从而也对党和人民显示了巨大的信任。赫鲁晓夫在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作斗争过程中曾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同百姓没有联系，中央委员会至少可以选出不比他们现在这个主席团糟糕的三个主席团。

当斯大林分子谈到他们被窃听，想以此来使赫鲁晓夫信誉扫地和撤换谢罗夫时，赫鲁晓夫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加以核查：如果这种说法是确切的话，谁下令窃听，就要谁的脑袋。要是这种说法不确切，那么进行诋毁的人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赫鲁晓夫建议组成一个以站在斯大林分子一边的别尔乌辛为首的委员会。

派系分子害怕了，他们这个论点失效了。赫鲁晓夫对我说，他们想撤换谢罗夫，夺走这个位置，首先是为了销毁那里的于他们不利的档案。当我谈到，最好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个人命运尽早告知公众时，赫鲁晓夫向我叙述说，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卡冈诺维奇从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打电话给他。卡冈诺维奇哭泣着对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赫鲁晓夫大力谴责的过去的事（他

指的是镇压、蹲监狱、枪毙)不致于重演。赫鲁晓夫说,他回答卡冈诺维奇说,之所以要把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人赶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免得这样的过去重演。

这些就是赫鲁晓夫今天向我叙述的同昨天公布的苏共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暴风雨般的事件有关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一报告是由只反映了已开始得到积极解决的这场大危机的外部表现,而没有反映其全貌的一些互不衔接的细节组成的,不过,我认为,这作为关于所有事件的一个补充报告,还是会对您有用处的。

请原谅我,这封信写得潦草,我是匆忙写就的,因为过几个小时我要从莫斯科乘飞机前往黑海,迎接马尔科、贝夫茨^①和其他同志。这封信我不寄给国内其他任何人了,您最清楚,是否应当让别人了解。主要的内容我将告知贝夫茨和马尔科。

顺致同志般的问候,祝您健康。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于莫斯科

我派信使带走给铁托同志的这封信,信写得太长,我又未能缩短,因为信的内容使我无法下决心留下什么,从信中删去什么。

① 马尔科即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贝夫茨即爱德华·卡德尔。——译者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以后

到索契迎接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前，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在改善的道路上。米高扬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态度。致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的信。赫鲁晓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正常化。莫斯科郊外的晚宴。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索契。

我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城等待卡德尔、兰科维奇等同志的到来，他们应苏联领导的邀请，将以度年假的名义在苏联度过大约十五天。我们的同志在返回南斯拉夫之后，在这次“休假”之后一定还得休息。在苏联逗留的日程范围内，他们还将在莫斯科停留两三天，在那里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

还在六月十七日，在主席团中发生戏剧性事件以前，我们几乎已经使南苏关系正常化了。苏共中央邀请我们党的二十至二十五位领导人“来苏联度假”。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志就是应苏联的这项邀请而来苏联的。

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访问苏联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这个斯大林主义集团的失败发生在同一时候，对于那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可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南斯拉夫最杰出的领导人可以说是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垮台后的第二天来到苏联的。南苏的友谊是在苏联政界最高层强大的斯

大林分子集团失败的同时，重新建立的。赫鲁晓夫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后不久接见了，我，以便我向他转达铁托同志的问候，赫鲁晓夫很可能是将我作为莫斯科的第一位外国代表，向我详细地叙述了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尽管上面的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候，在公众中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但事实仍然是，南苏关系以前就已正常化，并且不取决于后来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

我认为，谈不上“南斯拉夫因素”对这里的事态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者我们对于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件早有什么预料。去年也发生了类似目前的巧合，当时铁托前来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使我们极感意外的是，在铁托抵达莫斯科二十四小时之前，莫洛托夫突然被撤销了苏联外交部长的职务。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南斯拉夫却被认为是一个活跃的因素。

我在索契等候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志时记下了这些事情，他们应该在这里开始自己在苏联的“休假”。他们今天，在这里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来到苏联，无论如何比他们一个月以前决定此行时所想象的要满意得多。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索契。

卡德尔、兰科维奇、维塞林诺夫同志已抵达。我向他们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件。我随身带了我给铁托写信时所依据的一份笔记，这使我们这次谈话总算有一个头绪。在我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集团在莫斯科发动的旨在推翻赫鲁晓夫的袭击的可能的借口进行了讨论。有多种推测，但我们一致认为，斯大林给自己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继承人留下的深刻危机还没有克服，虽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的失败已经使它受到了有力的冲击。显然，再也不能象斯大林时代那样来治理苏联了。不大清楚的是，理应逐渐取代我们

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新体制，将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赫鲁晓夫在半年多以前，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地位最为虚弱。当时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显得他是一个比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还要坚定的斯大林分子，根据这一点可以设想，他当时觉得他可能失去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地位。

在谈话中，我提请注意这样一些事实：赫鲁晓夫是如何从防御转入进攻，如何在十二月中央会议上保持沉默，然后如何召开了二月全会，他在会上谈了自己对苏联经济的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从而事实上取消了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决定。这在苏联最高层的官僚中为赫鲁晓夫树立了新的反对者，赫鲁晓夫的对经济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我倾向于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之间多年的友谊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这使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得以使布尔加宁转过来反对赫鲁晓夫，而他后来又把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争取了过去。除了赫鲁晓夫外，他们都支持十二月全会的决议，反对赫鲁晓夫对国民经济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教条主义势力确有把握地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赫鲁晓夫则越来越多地依靠各共和国内的党的领导，以及莫斯科以外的党政机关。

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还有朱可夫元帅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这已表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此外，在赫鲁晓夫一边的还有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深信，甚至不会发生力量大小的较量，他们在主席团中确保的牢固的多数，对于实现他们的全部计划来说，已绰绰有余。看来他们对于自己的政变计划的成功是确有把握的，以至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或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建立自己的据点，更不用说在所谓“社会基础”，即苏联人民中建立这样的据点了。实际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直到最后一刻，关心的

是如何使他们的政变计划尽可能保持高度的机密。在搞政变的时候，以及在苏联搞政变的时候，人民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他们往往面临的是既成事实。

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是，南斯拉夫人在新形势下重新作为朋友来到苏联。随着赫鲁晓夫的胜利，南斯拉夫的方针也胜利了，这一点特别表现为，苏联官方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称为斯大林分子，而南斯拉夫人正是由于他们公开断言苏联最高层存在着不能摆脱斯大林主义观点和方法的人们而与苏联发生了冲突。

赫鲁晓夫、兰科维奇和其他人于七月七日在索契逗留之后，启程前往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他们将在那里停留几天，然后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天之后，再去列宁格勒。由于这是私下访问，在索契对他们的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有：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姆日阿瓦纳泽，州委书记、（苏共）中央委员波利扬斯基，外交部部务会议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扎姆切夫斯基，他是同我一起从莫斯科专程到这里来的。欢迎时以及谈话时的气氛良好，没有谈到我们的冲突，也没有谈到斯大林主义集团在莫斯科的失败。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七月五日对于苏联最高层所发生的暴风雨般的事件作了长达将近两小时的谈话，我相信他是十分坦率的，并且有时是真诚的，因此他还向我谈了他对米高扬的态度评价。他向我谈到米高扬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如果事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不能排除米高扬故意留到中央全会第二天举行的下一次会议才发言的讲话的第二部分，会同那样的事态发展相适应。

我不知道米高扬在斯大林死后所发生的危机中，更不用说在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多次危机中，都是怎样随机应变的。这里我指的是一九五三年逮捕和干掉贝利亚、一九五五年撤换马林科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和他对斯大林进行谴责这几件事。据我所知，在斯大林时期，米高扬跟其他从历次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人一样，都在竞相讨得这个大独裁者的尽可能多的欢心。

去年，我从一个匿名的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前几年的一份《真理报》的头两版，上面登有米高扬在斯大林诞辰时的讲话。讲话全部用红铅笔划了杠，这是对斯大林奉承、赞美、颂扬的一个范例。根据这一点，这篇讲话就可以作为对“个人迷信”歌功颂德的最突出的事例送进博物馆。

这位匿名的俄国人还给我大致写了下面这样一番话：米高扬正如他昨天赞美斯大林的讲话一样，准备明天再发表赞美别人的讲话，米高扬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封匿名信保存下来。

从米高扬在目前这次危机中的现实表现来看，我不相信他会同在过去的危机中的表现有多大区别，很可能他也是在等待着看那一边将占上风。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刚毅的性格和信仰的力量对于这样行事的人来讲是不特别需要的，这只会妨碍。这样行事的人更需要的是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才干。毫无疑问，米高扬四十年来这两条都具备，在苏联最高层，而且是在斯大林手下整整干了三十年，今天，他站在胜利了的赫鲁晓夫一边。米高扬的这种才干，很可能在苏联还会有所表现。

米高扬现在在莫斯科各处主持党的会议，并且成功地揭露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使苏联共产党员确信党的路线和他

本人是正确的！

这几天，我们同许多地区的苏联公民进行了接触，如：塔什干、维切布斯克、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伯利亚、拉斯基里亚、萨拉托夫和其他地方。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当中多数人更多地倾向于原谅和同情过去的领袖，而不是归罪于他们。只有几次，我们遇到了拥护全会决议的人。大多数人保留地接受决议，有的人害怕苏联国内的这场较量会被国外的敌人利用。

在苏联，许多年来不但把那些不同意官方政策的人，而且还把那些被怀疑可能成为官方政策的潜在反对者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在斯大林死后，还从肉体上消灭了贝利亚。现在却与莫洛托夫等人进行了整整十二天的辩论，并且“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甚至还被留在党内！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采取了在政治家当中进行政治清算的办法，尽管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几十年来犯下了种种罪行。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莫斯科。

多数西方代表把莫斯科作出的决议看成是围绕权力发生的冲突。人们最初不大重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所作的阐述。现在多数西方代表重新强调马林科夫的功劳，谈论着他在斯大林死后的短时间内任苏联政府总理时，他的政策的两个基本的和积极的特点：认为核战争是一场普遍的灾难，因此这也是荒谬绝伦的事；以及他主张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主张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苏联经济的方针。

除马林科夫外，这些西方代表还为莫洛托夫感到“惋惜”，他们公认，莫洛托夫在为实现苏联外交目的的斗争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某些人谈到莫洛托夫同希特勒会谈时的表现，作为他的顽强性和坚定性的例证。当时莫洛托夫甚至在口头上也一丝一毫都

不背离斯大林所规定的苏联的要求。据说，希特勒在一九四〇年同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谈之后，终于作出了进攻苏联的决定。

我认为，苏联党和政府目前的纲领是这里许多年以来最好的纲领。因此这些西方代表一般都回避谈论六月全会的决议，他们更喜欢谈论个人，谈论被清除的主席团委员们的功劳，并把他们同赫鲁晓夫相比较。

如果在西方，在苏联的反对者中，一旦理解到苏联以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为一方，同以赫鲁晓夫为另一方之间发生了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将在俄国自上而下地继续下去，从而使苏联削弱，这将会是令人担忧的。如果现在围绕德国问题发生新的对抗，那就特别危险。在莫斯科这里，在同老百姓的谈话中，我们就遇到担心这一点的俄国人。因此最近几天，我在同西方国家大使们的谈话中，无保留地支持了苏共六月全会的对外政策部分的决议，而这样的谈话最近几天很多。我这么做是符合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因此就对外政策而言，支持苏共中央目前的决议比较容易些。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莫斯科。

几天以前，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领苏联国家代表团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访问。这里的捷克大使馆完全了解布尔加宁在六月事件中的恶劣表现，他们说，布尔加宁现在去做他们的客人，使他们不大高兴。因此，某些捷克外交官在这里表明，他们甚至敢于批评布尔加宁。

赫鲁晓夫前几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个企业，发表了清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后在一个阵营国中的第一次政治性讲话。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是讲得不好的一次。因此苏联报纸也只发表了讲话摘要，而且在这个讲话摘要中还有很多只能是对南斯拉夫的影射和攻击。赫鲁晓夫的讲话大部分是

同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看来，又开始了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报告之后的情况。这里似乎对自己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决议有所顾忌。赫鲁晓夫似乎需要证明他不是修正主义者，于是他象被清除的“反党集团”成员那样讲话。因此现在赫鲁晓夫证明，他的坚定性不比他昨天谴责的那些人差，于是他重新谈到今天修正主义者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尽管斯大林分子昨天在主席团里还占了多数，使他勉强地从他们手里保住了地位，或许还有脑袋。不能脱离开苏联所实行的制度来看赫鲁晓夫的这种表演。赫鲁晓夫这么干，有意无意地是企图充当这个制度的最优秀的代表。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莫斯科。

前天我给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寄了一封信，他们还在格鲁吉亚，四、五天以后他们要到这里来。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

我给你们寄去我们最近一周的报纸和南通社电讯，我不想用这几公斤的材料来破坏你们的休假，但是我相信你们在来莫斯科前夕，对这批材料，首先是南通社的电讯是感兴趣的。此外，我派去信使还出于下列原因：

1. 韦利科·泽科维奇同志从贝尔格莱德给卡德尔同志拍来电报，内容是：

“一些共和国建议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于十月份举行，我们同意并建议各共和国都这么办，是否同意，请速回电。泽科维奇。”

2. 驻这里的芬兰大使通知我，芬兰政府希望您在芬兰逗留时，将作为芬兰政府的客人进行访问。我表示感谢并将有关您的活动的一些初步安排交给了他，并向他暗示您的时间有限。他还

将再来找我，就此事进行商谈。

3. 赫鲁晓夫于七月十一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格勒”企业发表了非常坏的讲话，请看七月十二日《真理报》的摘要。

赫鲁晓夫的不彻底性、混乱和糊涂，有些象二十大以后的情况，他似乎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通过攻击南斯拉夫来争取苏联和阵营内的莫洛托夫的支持者，从而避免党内和国内出现政治斗争，并且“维护团结”。

赫鲁晓夫赞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赞扬他们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国际主义精神。他有三、四次号召与会者把巩固阵营作为基本任务，等等。关于教条主义和清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原因，他只字未谈。苏联报纸所发表的讲话摘要，一处也没有提到南斯拉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赫鲁晓夫七月十一日讲话的主要内容。

对南斯拉夫有多处影射。第一，谈到了修正主义者并赞扬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他们的斗争。第二，谈到了匈牙利事件，说这一事件表明了谁是国际主义者，谁不是。第三，谈到一些“聪明人”他们批评社会主义建设和寻找差错，而不愿意看到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因而难免犯错误。第四，赫鲁晓夫攻击了曾对捷克人讲不要过多地强调是苏联解放了他们的那些人。（这只能是指南斯拉夫，我曾两次同赫鲁晓夫谈到这个话题，赫鲁晓夫这里指的是已故的莫沙·皮雅杰，去年费林格曾向俄国人提供了攻击他的假报告。）

根据苏联报纸的报道，赫鲁晓夫的报告仅此而已，但是，他的讲话比这还要坏。贝尔格莱德电台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五的节目中报道说，赫鲁晓夫攻击了南斯拉夫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然后攻击我们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最后批评了工人委员会。据贝尔格莱德电台说，赫鲁晓夫论证说，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制度不是工人参加管理的唯一形式。贝尔格莱德电台七月十二日首先援引了

赫鲁晓夫讲话中关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的某些积极的部分，然后逐条列举了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批评，谈到南斯拉夫的地方，见我上面所述。贝尔格莱德电台自己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西方通讯社认为，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南斯拉夫问题，一致强调，赫鲁晓夫的讲话是未加准备的。

赫鲁晓夫在七月十一日发表了这次很坏的讲话之后，于七月十二日发表了第二次讲话。据苏联报纸报道，在第二次讲话中也提到了南斯拉夫，但是这次却是从正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断然声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任何地方也不能回避这一点”（原文直译）。

我认为，这一切首先是对赫鲁晓夫本人，对苏联是消极的、缺乏政治意义的和有害的。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里对中央委员会宣告的事情连一个星期也贯彻不了。这样，实际上他们是在削弱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企业的讲话，不仅在南斯拉夫、波兰和世界其他地方，而且在苏联引起了失望的情绪。两三天之后，他将在东德发表的讲话是值得担心的，它可能进一步破坏这里发生了变化以后所造成的积极的印象。

4. 苏联政府于七月十日答复了我们七月九日有关炼铝厂和氮肥厂的照会，他们同意我方的新建议；他们建议新的谈判于七月十五日前后在莫斯科举行，我们已同意。明后天哈桑·布尔斯基将率领四、五人的代表团抵达这里。这是在赫鲁晓夫“斯大林格勒”企业的讲话之前在贝尔格莱德商定的。

5. 苏联外交部七月十日通知我们说，他们的原子能专家问，兰科维奇同志这次在苏联逗留期间，是否能参观苏联的几个原子能机构，这同在贝尔格莱德转达的邀请有关。已告诉他们，我们将向兰科维奇同志转达，但是由于时间短促，我们对此表示了怀疑。

6. 今天贝尔格莱德通知我说，铁托同志的意见是，对赫鲁晓

夫七月十一日的讲话，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不采取任何步骤，对整个事件也不予重视。今天晚上铁托同志给你们信即可送达，希望能赶上给你们送信的信使。铁托同志的意思是，请你们在莫斯科时，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指出赫鲁晓夫的讲话对于无保留地支持苏共中央最近的决议的南斯拉夫是不得体的，整个事件对于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危害比对我们更大。

如有需要我向贝尔格莱德汇报的事情，特别有关第三点，还有对泽科维奇的答复，请回复。昨天贝尔格莱德没有举行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为了避免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我们的评论）。

向大家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韦·米丘诺维奇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于莫斯科。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莫斯科。

我就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即将去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一事拜会了他。伏罗希洛夫说，他希望象我们建议的那样于九月份去，越是靠近九月一日越好。我把我所知道的已商定的一些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几次访问告诉了他，以免在他访问我国的同时有其他外宾。对此，伏罗希洛夫提出了八月二十五日，如果对我们合适的话。显然，他急于尽快去南斯拉夫访问。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伏罗希洛夫说，他希望在南斯拉夫看到工厂和工人，还有“农庄”，最后还有我们的剧院。对政治会谈，则一次也没有提到，似乎这是别人的事，而他在这方面则无所求。

我认为，在伏罗希洛夫六月份在苏联政界最高层发生危机时，作了一番恶劣的表现之后，贝尔格莱德不必急于安排他的访问。在这里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他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不会再有助于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政治目的了。或许伏罗希洛夫急于尽快去南

斯拉夫，是为了通过这次访问来加强自己在苏联的地位？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莫斯科。

今天，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我陪同他们去了。事先我们已商定，我们不提不久前的争论问题。如果赫鲁晓夫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尽量不把事情搞僵。我们还估计到，注意的中心将是莫斯科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并且，赫鲁晓夫的谈话很可能会比我们大家加在一起谈的话还要长。

谈话持续了大约两个半小时，除其他问题外，赫鲁晓夫还提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赫鲁晓夫已听说了我们的意见。他说，他以为讲话不会发表，他曾说过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参加，但是一些西方记者钻进来了，他们把事情宣扬到了全世界。赫鲁晓夫的解释，听起来与其说是坚持讲话的内容本身，不如说是试图辩白，至于讲话的内容，他既没有提到也没有企图维护。卡德尔和兰科维奇没有对此发表意见。

关于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我们的同志援引了铁托以前同赫鲁晓夫进行的谈话。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新的重要情况，因此我们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们希望他们苏联的观点也没有改变。赫鲁晓夫肯定了这一点，但是他谈到我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说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方面已经建立了联系，但是，只要美国军事使团还在贝尔格莱德，就难于进行合作。他本人认为，这不是什么特殊的障碍，但是他们的某些军事领导人是这样看的，这将给我们造成困难。

至于六月全会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只停留在一般的说法上，并谈到他们现在是如何团结、强大，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赫鲁晓夫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会证实南斯拉夫关于苏联领导中存在斯大林分子和教条主义者

的论点，而赫鲁晓夫去年全年，直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都是坚决驳斥这个论点的。

我们估计，今晚在赫鲁晓夫邀请我们参加的晚宴上，将在较多的苏联领导人的范围内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确信这次晚宴将只是南苏之间的活动，它将使我们的同志们在苏联的访问友好地结束。

晚宴订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央委员会别墅举行。我们估计将在那里遇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至今没有机会见到的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南苏的这次第一次会晤，在我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特别是在清除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之后，将会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我们希望这将在我们两国的公众中，以及在国外的一部分公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当我们沿着穿过庭院的狭窄小道去出席晚宴时，我走在人群的后面，卡德尔走在最前面。由于不知道要同谁打招呼，他走进前厅时遇到了恩维尔·霍查，他站在门口附近，并同卡德尔打招呼，这使我感到意外。显然，卡德尔以为是在同某个俄国人打招呼。我没能挤到前面去告诉他这是恩维尔·霍查，并且我还看见了托多尔·日夫科夫在这里，他跟迎接我们的俄国人站在一起。赫鲁晓夫没有通知我们，就把日夫科夫和霍查带到晚宴上来了。苏方的这个突然袭击虽然使人感到不愉快，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显得似乎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似乎在赫鲁晓夫邀请我们参加的晚宴上，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相遇，在我们看来是正常的。席间的气氛既不可能是自发的，也不可能是愉快的。这种气氛逐渐影响到全体出席者。

赫鲁晓夫、日夫科夫和霍查致了祝酒词。从种种情况来判断，他们并不让我们这样感到意外，他们事先已商谈好了一切。关于同南斯拉夫的友谊，他们谈得不多，谈得较多的是赞美苏联，而日

日夫科夫和霍查则象不久前赞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那样，特别赞扬了赫鲁晓夫本人。在我们看来，他们和俄国人是想让我们在我国的祝酒词中去谈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然后由他们来评定我们说得“正确”还是“不正确”。在我们方面，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对于俄国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所期望谈到的内容，连提也没提到。卡德尔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讲得很短。兰科维奇的讲话长得多，是符合南斯拉夫立场的精神的。如果在场的只有俄国人，他们两个人肯定都不会这样讲的。只有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的祝酒词没有得到掌声。调子是俄国人定的，日夫科夫和霍查跟随他们。

晚宴接近尾声时，在一个俄国人手里有一份关于这次晚宴的官方公报稿，列举了晚宴全体参加者的姓名和职务，接着强调说，晚宴期间四方进行了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等等。卡德尔由于这一切而感到不高兴，他根本不想对公报的文稿做什么修改，而明天苏联所有报纸都要在头版刊登这则公报，似乎这是一件重要事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多年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晤。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干预。俄国人则把这简单地解释为我们对他们的文稿没有意见，我们同意发表他们所建议的文稿。

散席后，我们对俄国人，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议论。虽然我们对他的事先难以预料的行为是有所准备的，但是诸如此类的事却没有考虑到。俄国人的这番作为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旧观点，继续把我们和其他阵营国家当做苏联政策的对象。

我们料到，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感到意外，我们不但不得不向外国人，而且还不得不向我们的人说明所有这一切的来龙去脉，说明把这看成是对任何人都具有特殊意义的某起政

治事件是错误的。我们的一些人指责我们接受了联合公报，说我们不应该接受，说现在第一次发生把会晤、晚宴和事先既未通知我们，我们也不同意的公报强加于我们，应该向俄国人公开讲明，使他们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我们商定，不采取任何特别的措施，因为很快就会清楚，整个事情的安排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赫鲁晓夫去年十月在克里米亚也干过类似的事，当时他出乎我们的意料，把格罗和匈牙利人带来参加午餐，随后又硬要格罗和匈牙利代表团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中旬正式访问南斯拉夫。赫鲁晓夫曾以为，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最大限度地稳定匈牙利的局势，然而一切却是以这个国家的灾难和俄国军队的武装干涉而告终。现在赫鲁晓夫又这样干，再次对我们搞突然袭击，把其他国家的代表带到社交活动中来，并发表把这一活动变成政治事件的公报。俄国人这样做，是想通过这种途径能使南斯拉夫同阵营国家和苏联的关系的性质发生有利于苏联和这些国家的变化。我们知道赫鲁晓夫跟其他人一样，也可能犯政治性错误。然而，我们曾认为他不可能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而这一回，他恰恰是这么干了。显然，清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后，他过分急于要在苏联和阵营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取得某种对外政策的成就。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莫斯科。

七月十九日，苏联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四国代表友好会晤”的官方公报。苏联关于莫斯科郊外的晚宴的官方公报的反响相当大，特别是外国报纸，当然还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团。当了解到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后，除了这样的手法势必引起的事后的失望情绪外，整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还破坏了上午同赫鲁晓夫谈话的印象，并且使我们曾予肯定的某些因素变得逊色了。

铁托和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 八月一日和二日的会晤

关于南苏关系的变化。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布加勒斯特会晤。斯纳戈夫会晤“备忘录的草签”。“南斯拉夫因素”在苏联政策中的作用的变化。伏罗希洛夫推迟访问南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新任驻蒙古大使。苏联五年计划的变化。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贝尔格莱德。

我在贝尔格莱德已经一个来星期了。我们在为铁托和赫鲁晓夫，也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会晤作准备。围绕这次会晤的组织工作存在一些问题。赫鲁晓夫曾多次对我说过，这次他们将不来南斯拉夫，现在该轮到我们去苏联了。我们曾经研究过铁托和赫鲁晓夫在多瑙河上，在我们的或苏联的船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赫鲁晓夫对这个方案表示不太感兴趣。在他看来，从礼仪的角度，这个方案太复杂了，礼仪成了主要问题，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他建议不在船上会晤，而在边境地区，或者最好是在一个既同南斯拉夫又同苏联交界的阵营国家会晤。我们同意在罗马尼亚会晤，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罗马尼亚领导愿意欣然充当东道主。我猜想，俄国人对不在南斯拉夫会晤，而在一个阵营成员国会晤，是感到满意的，他们在那里可以比在南斯拉夫更感到是“在家里”。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贝尔格莱德。

从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传来了好消息。苏联政府接受了我们就围绕贷款协定强加于我们的单方面决定重新进行谈判的建议。他们同意改善执行这些条约的条件。他们明确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由最高当局这样决定的，并说，苏联代表团团长尼基廷已就这些问题见过赫鲁晓夫。

从莫斯科向我们报告说，那里每天都在同接踵访问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举行会晤。这些党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同苏联领导团结一致。看来，还举行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的秘密会议，因为它们领袖都在莫斯科。这在国内政治方面将对俄国人有助益。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也将用来达到这个目的。

经济互助委员会提议研究在多瑙河建设水电站的可能性。多瑙河流经的所有阵营国家都缺乏电力和作为能源的水力。至于眼下的动力情况，南斯拉夫的处境也很糟，但是要谈到能源，它的处境要好得多，因为它是欧洲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谈判代表接受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关于讨论在多瑙河建设一座水电站的倡议。这件事很可能进行得很缓慢，很艰难，因为多瑙河并不流经苏联，而俄国人却想在这里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贝尔格莱德。

我们不久就要去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会晤，我们将乘船前往，这更象是沿多瑙河旅行和愉快地游览，而不象去进行重要的政治会谈。

我认为，应该说，南斯拉夫人这一回从礼仪上讲不仅走了“一半的路程”去迎合俄国人，而且走得比这还要远些。我这里指的是我们最近去苏联的众多的代表团，特别是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苏

联的“休假”。所有这一切都会使赫鲁晓夫更坚持他去年秋天所说的“这次他们^①将不去南斯拉夫”的话。要谈到促使尽快在布加勒斯特会晤的一般条件，苏联下面这样一些经验并非最不重要：每当我们的关系好时，他们在我国的影响总是在扩大，同样，每当这种关系最坏时，这一影响就降到了最低限度。在清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以后，有了改善苏南两国关系的条件，这样一来，莫斯科提高自己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威信的希望增大了。

我认为，在这次会晤前夕，我们的立场在政治上比不久前突然表现得更加坚定了。如果有谁在半年前由于南斯拉夫同苏联的新冲突而谴责我们的领导，因为当时我们公开断言，“苏联领导中有斯大林分子”，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南斯拉夫人有远见，正确地预料到莫斯科后来的事变。我们以最近两年同俄国人会晤时相同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会晤，两年来事态的发展加强了南斯拉夫的立场，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估计，我们同俄国人的新的和解，不会符合我们国外的一些伙伴的心意，它将使东西方的冷战支持者感到满意。在东方，南斯拉夫同苏联的新的友好关系，将会使所有利用南苏冲突——无论是以前一九四八年的那一次，还是后来一九五六年的这一次冲突——并作为南斯拉夫的反对者，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对苏联的友谊的那些人感到恐惧。

在西方，首先反对南苏新的接近的将是欧美最反动的集团。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财政经济利益是很大的。冷战仍然支配着国际关系，因此，如果你在一方有所得，在另一方就会有所失。不可能同东方和西方，首先是东西方阵营的领袖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观点，仍然被当作一个准则而企图强加于人。同其中一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我们”。——译者注

方的良好关系的条件，仍然是同另一方关系的恶化。我们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会晤，在这方面会不会带来什么新的结果，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布加勒斯特。

今天结束了在布加勒斯特近郊斯纳戈夫举行的苏南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晤。苏联方面出席会晤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库西宁，然后是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费留宾。南斯拉夫方面除铁托同志外，出席的还有爱·卡德尔，亚·兰科维奇，维·弗拉霍维奇和我。俄国人越是强调会谈是“党”的性质的，而不是“国家”的性质的，就一些问题进行会谈也就越没有必要。在俄国人昨天交给我们的联合公报苏方草案中，对会晤的全体参加者，只提到他们的党内职务，似乎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似乎这两者可以截然分开。

俄国人认为，党的协议更牢靠些，对我们也更有约束力，因为“国家”之间的协定，也可以和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签订，赫鲁晓夫去年有一次就是这样说的。

俄国人也是根据他们赋予这次会谈的性质组成代表团的。代表团里有米高扬，根据需要，他既可充当苏联党的代表，也可充当国家的代表。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使苏联代表团具有党的性质。代表团里还有老库西宁，他在大部分会谈中都保持沉默。他的参加，是为了强调这不是国家性质的，而是党的性质的会谈。波诺马廖夫参加代表团，是为了保证“正统性”，也就是保证所通过的决定的“正确性”。

会谈本身从来也没有那样轻松和友好。实际上更可以说，这次会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标志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关系有了新的改善，事实上关系确实有了改善，而不是为了到布加勒斯特会

晤中来寻求这种改善。因此联合公报轻而易举地签定了，而且很简短，总共不过十来句话。

公报是俄国人起草的，从语调和用词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的某些观点，南斯拉夫人是不会那样表达的，然而苏联的提法还是被接受了。俄国人可能会说，南斯拉夫人最终还是接受了苏联关于必须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观点，而我们最近的冲突，在苏联有可能被说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发生的，而现在，我们已经“改正”了。在专门的问题中，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同意援助和支持卡达尔·亚诺什政府，如果考虑到去年我们同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一点就尤其重要了。

在俄国人看来，他们使南斯拉夫重新接近了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南斯拉夫人看来，在苏联内部政治斗争问题上，例如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政治斗争，南斯拉夫的影响再一次得到确认，现在赫鲁晓夫将比较坚定地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

布加勒斯特会晤的特殊意义在于，铁托和赫鲁晓夫之间重新建立起个人的友好关系。在布加勒斯特，我们重申了“莫斯科声明”和“贝尔格莱德宣言”，一致赞同在平等、互助、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南苏关系在经历了去年年底的逆境之后，又重新走上了上升的道路。我们之间关系的最近这次正常化，以及这以前的冲突，很可能都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曾在这里召开过情报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决定，会议通过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决议。这项决议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兄弟党大家庭”。随之而来的是苏联、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奉行施加侵略性压力的政策。从情报局这次会议，到今天在布加勒斯特近郊的会晤，已经过去了九年时间。这段时间既短暂又漫长。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说，这一时

期是十分短暂的。另一方面，考虑到在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以及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在作为世界进程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这九年却跨过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们的会晤的全体参加者也都有我的这些联想。大家对于这次斯纳戈夫会晤看来都感到非常满意。看来赫鲁晓夫心满意足，因为他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当上了苏联唯一的和无人提出异议的领袖。南斯拉夫人看来对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满意，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这样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贝尔格莱德在同莫斯科的争论中是正确的。以格·乔治乌—德治为首的，参加了我们的午宴和晚宴的罗马尼亚领导人，也对铁托和赫鲁晓夫是在罗马尼亚会晤而感到满意，罗马尼亚确实有兴趣使这次会晤以尽可能多的共同的成就而结束。

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贝尔格莱德。

铁托和赫鲁晓夫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同事在布加勒斯特的会晤，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阵营国家对这件事的报道是十分注意分寸的。尽管从斯纳戈夫发表的官方公报没有谈到俄国人和我们之间达成了具体的协议，但是他们可能设想我们也就具体的事务进行了会谈，并且就这些事务达成了协议。事实也正是如此。俄国人建议就南苏为期两天的会晤谈及的重大问题搞一个简短的记录，并由双方代表团团长签署。为了使我们易于接受俄国人提出的，而我们最初并未表现出热情的这种新的形式，赫鲁晓夫说，不必正式签字，“只在这个记录上草签”，似乎这两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似的。还谈到，之所以搞这个记录，并不是为了我们彼此之间需要通过这一途径来承担执行的义务，这是肯定无需讨论的，然而这是有关我们在会晤中取得了一致意见的一些事情的一种备忘录。诸如此类的意见也促使我们就这个问题达成

了协议，就这样搞成并草签了这个备忘录。

虽然这个记录形式上并不具有两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的正式特点，而只赋予它以“备忘录”的形式，它仍然是南苏两国政府就其中所记录的问题达成的协议。我国政府同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采取这样的形式，并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我相信这一次本来我们也是不会接受的，并不是由于那里所记录的一些内容不符合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得以接受是由于在莫斯科发生了六月份的暴风雨般的事件之后，在政治上清除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集团之后，我们有理由支持赫鲁晓夫。我们方面曾经商量过，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我们不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就让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对我们也不特别有利。因此，我们才同意草签斯纳戈夫会晤的这类文件。

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贝尔格莱德。

从在国内的多次谈话中，我获得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相当多的人喜欢夸大南斯拉夫对苏联制定政策的作用。我认为，尽管莫斯科对于同我们的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南斯拉夫在苏联的政策中，并不起我们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种作用。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南斯拉夫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只可能具有次要的意义。据我对这些事件的了解，谁也没有提到南斯拉夫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发生冲突的某种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今天在阵营国家中，在政治上不起重大的作用。这些国家自然不会不希望获得比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能获得的还要多的自由、独立和平等。南斯拉夫对这些国家的状况的影响，是南斯拉夫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迄今为止所获得的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南斯拉夫政府干涉这些国家内部事务的结果。这种以不断为实践所证明的自己的榜样为基础的

影响，是当局的决定所不能阻止的，犹如单凭个人的愿望是不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一样。只要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南斯拉夫的这种影响只会削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来支配。俄国人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并如此顽固地企图使南斯拉夫脱离它的自主的立场，使南斯拉夫的独立性尽量接近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立场。在国内发展方面限制南斯拉夫的自主性，在对外政策方面限制南斯拉夫的独立性，是苏联和我国至今所进行的一切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很可能今后仍然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两国之间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总是处于尖锐的冲突状态。

我在谈到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底抵达贝尔格莱德时，曾经记过：俄国人尽管掌握种种物质的和军事的力量，当时他们需要“南斯拉夫通行证”，以便借助于这张“通行证”比较顺利地走上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八月一日同赫鲁晓夫会晤以后，我的印象是，今天他们不太需要这张“南斯拉夫通行证”了，不象两年前那样了，当时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来谈判南苏关系正常化。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莫斯科。

几天前，我和米什卡带着孩子在南斯拉夫度过一年一度的休假之后，回到了莫斯科。这本日记也和我一起休息了，在停写了几个星期之后，现在我继续写下去。

在我们大使馆里，我得知，苏联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以后的第二天对我们的态度就变好了。下面这个例子也表明了这一点：八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布加勒斯特会晤的联合公报发表的第二天，苏联共青团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伊来到我国青年中间，详细地友好地询问了我们的印象，表示他们将为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竭尽全力。莫斯科电台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有所改善。现在广播南斯拉夫游击队歌曲，而

不是我国的民间乐曲和民歌，甚至还播送了我们歌颂铁托同志的游击队歌曲！直到不久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歌曲“优先于”类似的南斯拉夫节目，而现在，捷克人在这类节目中却降到了第二位！

外交团对布加勒斯特会晤的态度是不同的。西方各大强国的代表很少掩饰他们对会晤的不满。法国大使德让和往常一样，他显示的保留要少得多，似乎他根本不感到意外。中国大使刘晓有保留，虽然本来可以指望他会是首批欢迎南苏关系改善的人之一。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对我们说，他们对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好感到不安。

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中，阿拉伯代表最为满意。他们说，我们同苏联合作的加强，就是加强他们；因此他们对促进南苏关系的一切措施，事先就表示欢迎。

相反，尽管这次会晤，特别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当前的新闻”，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同我们的接触中，却连提也不提。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对南苏关系的改善表示满意。保加利亚人对他们同俄国人的关系，以及俄国人对我们的关系的改善是不满意的。苏联国内事态的发展也使他们不高兴。可能他们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保加利亚的经济困难，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期望比较大，而赫鲁晓夫却向他们提供了西伯利亚，供保加利亚失业者就业用。保加利亚国内所发生的变化同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莫斯科从领导人中清除了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保加利亚却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了进步分子：赞科夫、特尔彼谢夫和扬科·帕诺夫。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人居然能够这么干，并且得到俄国人的同意，就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在这里取得了胜利一样。特尔彼谢夫和帕诺夫都是南斯拉夫的朋友。或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应予从严处置的情节”，或许正是根据这一点保加利亚人才取得了俄国人的同意？

赞科夫、特尔彼谢夫和帕诺夫曾主张同南斯拉夫友好合作，他们对我们同苏联的新冲突感到痛心。他们还主张同希腊合作，为此赞科夫不久前同希腊政府开始了谈判。索非亚的某些人是清楚的，只有通过同其他巴尔干国家友好合作，才能实现保加利亚的独立。现在这三个人在政治上已被清除。希腊驻这里的大使帕帕斯担心，保加利亚现在对希腊的政策会恶化。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也不能想象保加利亚人会实行某种为莫斯科所不信任、没有事先同意的政策。

阿尔巴尼亚大使并不掩饰自己对南苏关系发生的变化不满。阿尔巴尼亚领导对六月全会的决议也是不满意的。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们还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一政策同阿尔巴尼亚对邻国的仇视和不友好的一贯作法是不相吻合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我们所知，俄国人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来对地拉那一贯奉行的和保加利亚人不时奉行的同莫斯科不同的方针政策施加影响。使莫斯科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坚决拥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莫斯科感兴趣的时候谴责南斯拉夫。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莫斯科。

外贸部、对外文委、苏联青年组织以及苏联其他机构，对我们代表的态度比过去一年里要好得多了。他们采取主动，重新在我们之间展开接触和交往，使我们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尽快“趋于正常”，并同布加勒斯特会晤的原则声明相一致。苏联共青团组织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头，他们对我国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好几个青年组织非常友好。当我们的青年代表韦伊札吉奇在同苏联共青团领导举行告别性会晤时，对谢列平谈到我国青年对评判委员会奖给我们合唱团铜质奖章一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时，竟发生

了这样的事情：谢列平当场打电话给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要求把铜质奖章换成金质奖章！这位部长立即同意，于是我们的合唱团就获得了金质奖章！谢列平不仅把铜质奖章换成了金质奖章，撤销了以前作出并已公布的苏联评判委员会的决定，而且还向我们的代表表示歉意，并对他们大加赞扬！

我们遇到了耐人寻味的问题，问题是苏联方面在青年联欢节开始时，在牵涉到南斯拉夫青年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中有：为什么你们接受美国飞机；为什么你们允许美国电影在南斯拉夫泛滥；为什么南斯拉夫没有集体农庄；你们学校里学不学俄语；为什么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委员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南斯拉夫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南斯拉夫不同阿尔巴尼亚改善关系；为什么南斯拉夫允许对铁托的个人迷信？这些问题是在去年我们之间发生冲突时提出来的，并在苏联广泛传播。现在官方已经不提这些问题了，但是仍然在一些地方提了出来。

尽管进行了布加勒斯特会晤，俄国人对正面报道南斯拉夫仍然是有分寸的。现在作客观的报道是没有危险的，更不用说赞扬我们了。我们因公务而到过的大多数苏联机关，对我们都是友好的，都比以前要好。现在，当我们会晤时，不再有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将我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的“秘书”在场了。使我们感到没有任何好转的唯一方面，就是遣返我国的公民，共产党情报局时期以前的政治侨民的问题。这些事务由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主管，不仅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他们无效的，就连去年我们同苏联政府签订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政府协定，对他们也是无效的。

我再记下这样一件事——八月底，以政府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我陪同代表团在我国度过了四天时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我们的蒙古客人对于他们所受到的殷勤接待和他们在我国所见到的

许多事情确实是满意的。这是蒙古人第一次出访欧洲阵营以外的国家，他们自然关心自己在国际上得到确认。我国政府和铁托同志对他们给予了十分周到的接待，似乎这是同我国关系很发展的一个国家的代表团的访问。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莫斯科。

还在上个月，俄国人就开始同我们和我们的一些代表团商谈有关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准备工作了。主席团已就庆祝活动的基本轮廓作出了决定。这里准备接待以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为首的所有阵营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准备接待阵营以外的最高级的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已同意出席莫斯科的庆祝活动，并将于十一月初抵达这里。中国人这样早就透露了这件事，是为了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让它们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这证实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期间，将举行周恩来早在今年一月对我们所说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

除苏联共产党外，苏联工会也在为庆祝十月革命作准备。它将邀请十五至二十五人的代表团，视国家的大小，也即视这里对某个国家重视的程度而定。他们打算让这些代表团于十一月七日作为自己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列队通过红场。

南斯拉夫受到高度重视——我们也进入了应邀派遣二十五人的工会代表团的国家之列。俄国人认为，要我们工会派出这样多的代表是有意义的。久罗·萨拉伊同志前不久在莫斯科时，他们曾向他在这方面进行过试探。萨拉伊表示不大愿意派这么多人来，这使他们感到不高兴。

俄国东正教会也将对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作出特殊的贡献！它也将在党和国家庆祝十月革命的同时，“独立地”庆祝自己

的四十周年，并向国外的东正教会发出邀请，要求派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他们的庆祝活动将在党的庆祝活动以后十五天开始，为期两周。为此，全俄大总主教阿列克谢已经向塞尔维亚大总主教普罗达诺夫发出了邀请。同时还向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埃塞俄比亚、耶路撒冷、希腊的大总主教和塞浦路斯的主教发出了邀请。

这样，由苏联政府及其主管俄国宗教事务的机关在莫斯科组织的这次东正教神甫的集会，将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庆祝活动和在此期间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会议增添光彩！你可能会想到，当教会的某个庆祝活动在莫斯科同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果真要在同时举行时，为了不至于破坏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俄国人本应将教会的庆祝活动延期。但是，俄国人却硬是让这两个活动同时进行！在苏联看来，教会的庆祝活动不仅不妨碍共产党的庆祝活动，似乎在莫斯科同时举行这两个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莫斯科。

据从蒙古回国的大使馆秘书迪兹达雷维奇报告说，以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为首的我国代表团对蒙古的访问非常成功。蒙古人在乌兰巴托最大的一家工业企业组织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在会上泰波还讲了话。蒙古人准备同我们进行各种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不应妨碍我们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蒙古人在讲话和祝酒词中，谈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时，在用词上是慷慨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知道我们不那么喜欢这种提法。关于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他们比欧洲阵营国家代表谈得更广泛。

我国代表团访问蒙古，是在莫斯科发生六月事件以后，南斯拉夫夫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蒙大使，他严格履行一切礼仪规定，作为苏联大使，他对泰波同志

和南斯拉夫代表团非常客气。

任命莫洛托夫为驻蒙大使证实了这样的消息：主席团中占上风的想法是，现在不应让反党集团成员退休，而是要求他们仍然从事“自己的本行”。于是他们决定让莫洛托夫搞外交，马林科夫任哈萨克北部的乌斯特—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发电厂厂长。对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也做了同样的安排。主席团这样的决定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这迫使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服从纪律，表示顺从，打破他们这个集团，并让他们远离莫斯科数千公里，有如现代条件下的流放。

蒙古人为泰波的代表团举行的所有礼节性会晤，邀请了在乌兰巴托的人数不多的外交团，莫洛托夫都出席了。在一次招待会上，在同泰波的交谈中，莫洛托夫提议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干杯，并提到同阵营各国的合作，泰波说他不喜欢这个词。后来，莫洛托夫建议，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干杯。他还在乌兰巴托飞机场迎送了访华路过的以彼得·斯坦鲍利奇为首的我国另一个议会代表团。他的态度是得体的。

迪兹达雷维奇对我说，一般来讲，蒙古人对莫洛托夫是特别周到的，他仍然是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由在乌兰巴托任职最长的四、五个大使组成的外交团中，相互转述着莫洛托夫所讲的一切。虽然按照递交国书的日期，他是“最年青”的大使，但是外交团通常总是把他放在首位，似乎莫洛托夫是外交团的团长一样。当莫洛托夫在蒙古人为我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退席时，大家都报以掌声。九月十七日晚，在剧院举行的越南歌舞团的音乐会上，当他进入外交官包厢时，又出现了掌声。莫洛托夫本人巧妙地使人们对自己保持这样的情绪，在招待会上，他总要走遍每张桌子向所有的人致意。

当然，蒙古人没有表示不赞成六月全会决议，他们和其他阵营

国家一样，支持了这些决议，并公开谴责了反党集团。尽管如此，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莫洛托夫，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在乌兰巴托外交部，他们对迪兹达雷维奇说，人们不能一下子就克服昨天的、曾是一个伟人的莫洛托夫同今天的莫洛托夫之间的鸿沟。蒙古人还可以找到的借口是：我们尊重苏联的大使！更困难的是，要向俄国人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使蒙古人处于这种地位：他们首先是把莫洛托夫派到蒙古人那里当大使，随后又指望蒙古人会本着莫斯科六月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待他。

苏联迄今为止的驻蒙大使皮萨列夫——他在那里是外交使团团长——现在被无辜地贬职为莫洛托夫大使的公使衔参赞！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异常现象。

我认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对苏联领导来说都要比莫洛托夫好办，他们将消失于苏联辽阔的国土上，不会象莫洛托夫那样同外国人经常接触。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赫鲁晓夫还得对付莫洛托夫，看来，莫洛托夫的表现表明，他还在抵制六月全会的决议。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以韦利亚·斯托伊尼奇为首的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参加者联合会代表团正在这里访问，访问的进展良好。在机场上，斯托伊尼奇等人受到苏联“退伍军人”协会的十来名代表的迎接。巩多洛夫将军和斯托伊尼奇发表了讲话。昨晚俄国人在苏军之家中央大厅举行了集会和音乐会。

我和斯托伊尼奇商定，我们的代表团不去莫斯科的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俄国人已就此事问过他们。我建议，当代表团去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时，可向两个城市的保卫者献花圈。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献给陵墓的花圈题词，最终不能不制造政治问

题。如果我们明确强调花圈是献给列宁的，只会激怒俄国人，整个事情就会产生同我们的愿望完全相反的效果。

我们的每一个代表团不能都模仿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国家代表团，去年，当他们献花圈时，饰带上写的是献给列宁。

苏联同大多数国家不同，在莫斯科没有全国性的或国家的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碑之类），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以及阵营以外的所有国家在正式的场合对苏联正常地履行自己的礼仪。这既有损于苏联，也有损于有关国家。或许在适当的场合同赫鲁晓夫谈谈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件坏事。这将便于我们和其他人正常地开展活动，特别便于俄国人自身使陵墓起到另外的某种作用，不致于给外国代表团造成困难，使它们左右为难。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莫斯科。

苏联目前的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进行了两次认真的修改，第一次是在去年的中央十二月全会上，然后是在两个月以后的中央二月全会上。现在，总共才过了九个月的时间，又在对现在的计划进行第三次修改；虽然官方文件没有说，实际上第六个五年计划已经停止执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新的远景计划正在制订。规定国家机关必须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提出新计划草案，很可能将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开始执行新计划。

在莫斯科的西方大使中，已经在议论“第六个五年计划已告破产”和二十大纲领中关于苏联国内发展的部分是无法实现和不现实的。在我们看来，西方的这种解释不完全正确，虽然苏共二十大所通过的计划，确实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中没有完成（煤、钢、水泥等，这我过去就听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讲过）。

我们觉得，苏联的官方文件没有说明过至今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的全部主要原因。很可能根据赫鲁晓夫的纲领所进行的经

济管理体系的改组，暴露了在旧的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系基础上制订的现在的计划有许多弱点。一系列部门的亏损和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昂贵，技术上广泛地落后于西方等等苏联经济的许多固有的弱点，年复一年地从一个计划转入另一个计划。因此，仅仅建立新经济区，仍然不能使新的改组顺利地实行。

几十年来，俄国的重工业，或者“第一部类”，一直受到重视，而轻工业—第二部类则一直不受重视，不应当只把各种各样的加工工业，而同时还应当把农业、畜牧业以及一切属于人民生活水平的部门算作第二部类。据我认为，赫鲁晓夫所建议的改组的最积极的一面，就在于它规定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这同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死后立即提出的政策是一样的。我认为，马林科夫下台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而不是由于他忽视“第一部类”，重视“第二部类”，虽然这一点也被当成了撤换他的原因之一。

六月以后，苏联还通过了另外一些经济性的决定，苏联最高层肯定认为，这些决定受到人民的欢迎是有把握的。在这些措施中，有苏联政府关于在苏联取消宅旁园地税的决定，然后这里又公布了苏联政府打算在十到十二年内解决住房问题。虽然这一点一开始是受欢迎的，但是随后就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俄国人不仅用十来年时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今后几十年内也解决不了。可以设想，这样轻率地规定期限，源出于赫鲁晓夫本人。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苏联认为，他们现在比一年前，比制定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的那个计划时，对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更好的了解。我认为，这种断言是可信的。在制订新计划时，从这些因素出发，而不是从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原订计划出发，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的方针是好的。

此外，生产关系问题仍将不予触动。直接生产者在新的体系中，仍然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成果。国家机关仍然是全部生产资

料的一种集体的雇主和占有者，而直接生产者则处于特殊的雇佣关系之中。

当谈到修改苏联经济计划时，不能忽视苏联巨额军备开支给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施加的长期压力。虽然这一开支的总额，任何场合也没有全部发表过，但是有根据推测，开支是很大的，而且有增无减。这项开支同美国以及同在这方面与苏联不相上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的负担要更重些。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朱可夫元帅被撤换

莫斯科对哥穆尔卡访问南斯拉夫有保留。人造卫星和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俄国人。南斯拉夫在“法律上”也承认了东德政府。朱可夫元帅启程访问南斯拉夫。西德同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朱可夫元帅被撤换。苏联的制度和一部分人的权力还是一个人的权力。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莫斯科。

从迄今为止同俄国人的接触来看，这里对哥穆尔卡访问南斯拉夫有保留，并且感到不安。俄国人同我们，同在莫斯科的波兰人，基本上避免谈论这个问题。（对一个波兰人就访问提出的一个问题，波斯别洛夫曾冷冰冰地回答说：“是的，我听说了。你们那里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实际上，俄国人对这次访问最关心不过了。

这里仅供一定数目的领导干部阅读的塔斯社参考消息上，全文发表了南斯拉夫和波兰在访问前后所报道的一切。与此同时，这里对哥穆尔卡访问（直到发表声明之前）所作的为数甚少的非政治性报道，也反映了苏联领导对访问结果的不安心情。

这里的报纸发表了南波声明，但是至今未发表任何正式的评论。听这里的波兰人说，俄国人对声明表示满意，当发表铁托—哥穆尔卡声明时，他们从正面的意义上感到出乎意料。这本身也

证实了他们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几天以前，米高扬对我说，波兰外交部长腊帕茨基向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介绍访问情况时说，“我们所取得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苏联报纸对铁托同志在哥穆尔卡访问期间的多次政治演说和讲话，却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俄国人不喜欢不受苏联的保护而显示波南友谊的任何活动，而现在这里却在谈论波兰人“在南斯拉夫所取得的结果出乎意料”。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莫斯科。

苏共中央委员安德罗波夫邀请我去拜会他。他把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部分档案交给了我。我们签署了一个简要的纪录，其中谈到他交给我什么，然后列举了我所接受的南共青团的档案和关于我国赴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档案材料。没有说明为什么整整一年没有交给我们一份文件，虽然所有这些材料很可能在十年前就准备转交了。

在通知我有关行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说，正在研究是否可能在十一月八日举行一次莫斯科市民的盛大集会，会上将由未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话；十一月九日开始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会议。会议目前还不知道可能开多少天，会后，将根据他们的愿望，组织代表团去苏联各地。

铁托同志因病不能率领我们的代表团，也来不了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对此只字未提。我的印象是，俄国人认为，这是外交病，认为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决定铁托这次不来莫斯科。

我们的代表团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但是是否参加会议还不清楚。安德罗波夫没有向我问及此事。结果是我们只谈到有关庆祝活动和会议的技术问题，而关于我们是否参加会议这个

根本问题却没有提到。安德罗波夫显然是领受了这样的指示的。

有必要对十一月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尽量充分的准备。在我们中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看法，认为南斯拉夫人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比别人更了解俄国人。从下面这一点也可以判断，这种想法是多么过分：到这里来的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以为，他们都懂俄语！因此，我们所有的代表团到苏联来办事，都不带翻译。他们中间最固执的一些人甚至敢于“用俄语”讲话，而他们平生从未学过俄语，从未讲过俄语，当然也不懂俄语。俄国人听不懂我们这样一些讲话者，有时还闹出笑话来。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莫斯科。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因此错过了参加苏联为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行的庆祝活动。全世界不断地报道和议论这件事已经好几天了。俄国人于十月四日以强大的火箭运载装置发射了这颗人造卫星，由于地心吸力的缘故，它围绕地球运转，并有规律地发出无线电信号。这已不再是苏联的宣传，对苏联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来说，这是个不愉快的事实。

看来，俄国人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确实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从这里可以判断，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人类曾预料，他们要先于苏联完成这样一项历史性的功绩。苏联的威望在世界各地都在急剧提高，无论是在非常了解这一成就的意义的发达地区，还是在不太了解这一意义的落后地区。

现在，我认为，应该相信苏联报纸上所登载的国外反应。俄国人早就习惯于当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时，只从国外报纸上选择那些肯定他们的反应。这种做法照例造成一种气氛，似乎全世界都热烈赞同苏联的一切措施。现在，《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纸，大大扩

大了〈国外反应〉栏。援引了所有国家的报道，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个政治集团。我认为，确实应该相信，全世界都对俄国人在这一领域超过了美国人这一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很少有人以为会发生这种事情。

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由于开创了探索宇宙的新纪元，而具有科学上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俄国人实际上证明，他们拥有强大的火箭，可以在明天用来向地球上任何地方发射原子弹。这无疑将会影响到苏联和美国这两个东西方主要强国之间军事和其他方面的眼下的力量对比。

我认为，不应怀疑西方，首先是美国人，迟早也会成功地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问题是苏联能保持多长时间的垄断权。在这段时间里，其他发达国家也将加入进来。历史上一切划时代的发明都是这样，但是迄今为止，西方总是走在东方前面。这一次则是美国人必须来追赶俄国人了。

毋庸置疑，苏联为这一成就所选择的时间，是俄国人所求之不得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之前一个月。由于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俄国人在庆祝今年地球物理年时，现在在报纸上纷纷发表文章说，还在很久以前，他们在制造火箭方面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并提到了俄国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称他为苏联火箭之父。我应该承认，以前我从未听说过齐奥尔科夫斯基，他很早就死了。不了解火箭发动装置的发展和俄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的知识的人，很可能不只我一个。从现在起，完全可以肯定，我们这些门外汉也将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门学科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莫斯科。

住院妨碍了我参加对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

事。这就是朱可夫元帅启程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鉴于我无法去为朱可夫元帅送行，我就此事从医院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朱可夫同志：

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您启程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的前夕，我因突然生病而不能当面向您致意。由于我不能采取其他方式——我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请允许我祝您此行一路顺风，并祝您在我国逗留期间十分愉快。我国正怀着对苏联和您本人真诚的友谊和深切的敬意之情等候着您。

我相信，您对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将对两国人民旨在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全面和牢固的友谊和合作所做的共同努力，作出新的巨大的贡献。

致以真诚的敬意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我可以记下的是，我这么做，不仅仅是履行我对苏联政府所负有的礼节上的义务，还因为我对朱可夫元帅怀有最真诚的敬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就钦佩苏联卫国战争，或笼统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位最杰出的统帅之一的功绩。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莫斯科。

我得到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小册子，是在这里出版的，是苏联为即将举行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而有计划地进行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伟大十月革命对阿尔巴尼亚的影响》，是由俄国这类著作的最主要的出

版社，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的，出版说明提到，恩维尔·霍查是应苏联出版社之约而写了这本小册子的。印刷册数为十万册，最后发排日期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我们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将近整整一个月之后。

小册子是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所惯用的众所周知的语言写成的。例如，恩维尔·霍查是这样叙述一九一五年塞尔维亚军队路经阿尔巴尼亚的撤退的：

“一九一五年六月，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政府利用实现自己占领企图的有利时机，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了自己的军队，他们占领了我国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到处进行残酷的屠杀和抢劫。一九一六年以后，奥匈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代替了塞尔维亚军队的占领。”

列宁曾把恩维尔·霍查在这里所讲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评价为民族解放斗争和正义斗争。塞尔维亚军队在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进攻下，曾经英勇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在十分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得不撤退。为了避免被歼灭，为了继续战斗，唯一可能撤退的方向就是阿尔巴尼亚和地中海。而恩维尔·霍查却把这称之为对塞尔维亚“有利的时机”，把塞尔维亚残存的军队路经阿尔巴尼亚的撤退称之为对阿尔巴尼亚“实现占领的企图”！

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武装斗争中，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影响，至少是合作——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对阿尔巴尼亚解放斗争的一贯支援是众所周知的——却只字未提。而霍查却强调说，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在大战结束时，在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在南斯拉夫继续进行了反对希特勒分子的斗争，从而履行了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恩维尔·霍查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献出这样的“礼物”是不足为怪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在庆祝十月革命和第一

次各国共产党会议前夕，竟然出版了十万册这样的小册子，甚至还强调说，这本小册子是恩维尔·霍查应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之约，为苏联读者写的！

还应记下的是，俄国人丝毫也不会怀疑，这本充满对南斯拉夫人民仇恨和诽谤的小册子，会在我们当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应予考虑的话，那就是苏联的立场，而不是霍查的小册子。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莫斯科。

南斯拉夫已决定承认东德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在莫斯科的西方代表中间，南斯拉夫承认东德一事几乎引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骚动。这几天，我同法国、瑞典、希腊、波兰、瑞士、东德的大使，以及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交谈。西方代表在同我们接触时突然变得拘谨了，而俄国人同南斯拉夫承认东德以前相比，也没有变得坦率些。根据目前东西方代表的反应来判断，使人觉得，南斯拉夫在一方所失掉的东西，比在另一方所得到的东西要多。

西方人士反对我国关于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决定，责难说，南斯拉夫自己的这项决定单方面地为苏联效了劳。南斯拉夫这样做，不仅对西方，而且对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利益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害。西方代表认为，我们这么做，等于自己破坏了使我们得以同双方建立积极关系的搞平衡的政策。

西方人士认为，在莫斯科有两个德国大使馆的现象，不能成为我们或其他国家的任何先例，因为苏联对德国处于特殊的地位。根据现有的国际协定，苏联是控制着德国的一部分的一个国家，而南斯拉夫则不是这样。显然，西方代表这里采用的是各大强国享有特殊权利的旧规矩，作为小国的南斯拉夫则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大使馆既没有反驳，更没有申辩。我们不同意我们的谈话对手的观点，不同意只根据莫斯科或华盛顿的想法来评价南斯拉夫的政治行动。我们也不认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奉行“打击”西德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政策。相反，这只会有利于国际合作。两个德国的存在，责任不在南斯拉夫或它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各大强国迄今为止对德国政策的结果。

我会见了赫鲁晓夫，并向他提及西方对我国承认东德所掀起的叫嚣。赫鲁晓夫说，他估计西德不会同我们断绝外交关系，目前的戏剧性局面将会过去。值得记下的是，赫鲁晓夫不那么重视南斯拉夫的这项决定。他没有特别谈到这项决定，似乎事情本身就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应当承认东德，而且不是现在，而是早就应该承认了。

看来，俄国人和东德人现在显得他们方面不是从南斯拉夫获得了什么让步，而是获得了某种“自己的权利”，因此现在他们感兴趣的是新的让步，或是继续实现“自己的权利”。俄国人将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丝毫没有改变这个方针，坦率地说，这种压力不但没有希望减弱，反而更加强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莫斯科。

西德政府由于我国承认东德而决定同南斯拉夫断绝关系。俄国人显得似乎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并谴责西德政府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对这个决定不但不感到十分遗憾，而且，我敢说，波恩同贝尔格莱德断交使他们感到出乎意料，但却是令人高兴的。

驻这里的西德新闻社的记者尼尔逊对我们的记者米利切维奇说——显然是根据他们上司的指示精神说的——虽然西德政府不得不断交，但是西德政府并不打算搞坏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冯·

勃伦塔诺部长曾列举二十二个国家可能效仿南斯拉夫的榜样并注视着波恩会如何反应。现在这些国家不会再做贝尔格莱德做的事情了。这个德国人重申，西德政府希望，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贸易、我们的索赔、以及旅游等方面，跟迄今为止一样，保持不变。

苏联也发表了评论，其中除谴责西德人之外，还就这一决定谴责了美国人。对苏联报纸来讲，似乎这是攻击西德和美国的好机会，南斯拉夫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是不大在乎的。我们获得相反的情报，美国人曾劝说波恩不要同我们断交，而不象俄国人说的怂恿了他们。

外交团里传布着消息说，驻贝尔格莱德的一系列国家的大使馆估计，贝尔格莱德没有料到断交，南斯拉夫为此感到出乎意料。于是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失算了。此间，在对我们并非没有好感的西方人士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评论，说这是长期以来南斯拉夫外交政策中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俄国人，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对阿登纳政府的决定感到满意，这样的印象是无法消除的。仿佛他们在说：你们南斯拉夫人一旦在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了多年以来不愿采取的“正确立场”，你们就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今天晚上，在伊朗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今天从下午三点半到晚上将近八点，一直在解决朱可夫元帅在六月全会以后的态度问题。赫鲁晓夫列举了朱可夫元帅反党态度的如下事例：

在六月份发生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有关的事件期间，朱可夫元帅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他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算账。赫鲁晓夫

说，这也就是说，朱可夫是在以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人来说不能容忍的方式讲话。因为，如果朱可夫对自己和使用军队是这样考虑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和党还有什么用。

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于今年八月上半月访问东德一事，这里后来决定布尔加宁不去。据说，朱可夫却玩弄阴谋，私下对布尔加宁说，他应该去等等。朱可夫还对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军司令格列奇科元帅说，他不必去迎接赫鲁晓夫和代表团，让德国人去迎接。格列奇科没有接受，并把此事报告了赫鲁晓夫。

朱可夫元帅作为国防部长，是秘密的国防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也即赫鲁晓夫的副职，作为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这个委员会中居于领导地位。朱可夫未召集委员会开会，却建议这样地来组织这个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人，包括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内，在委员会中完全受到排挤，而军界人士则颇受重用。

赫鲁晓夫说，西方就朱可夫元帅在六月事件中的作用，有意地进行大肆宣传，朱可夫却受到西方这种宣传的影响，他忘记了党和人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鉴于这一切，赫鲁晓夫继续说，今天，主席团在身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出席的情况下，决定撤销朱可夫元帅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新任国防部长。这将于今晚由电台发表，明天见报。本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将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朱可夫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我说，全会很可能要把他开除出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所说的话，不能排除还会通过某项更严厉的决定。

赫鲁晓夫要我相信，整个这件事同朱可夫元帅访问南斯拉夫毫无关系，今天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记录中指出，朱可夫的南斯拉夫之行是成功的，是有利于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的。

朱可夫元帅今天下午两点左右回到了莫斯科，根据赫鲁晓夫谈的情况来看，朱可夫是从机场径直去参加已经在举行的、并正在等待着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

我就这一对我来讲完全出乎意料的新闻，同赫鲁晓夫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我预先申明，我的意见可能是不恰当的。我谈到这件事对即将举行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这将给世界上认为苏联领导内部不团结的舆论再次找到借口。我大声问道，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前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是最适合的时候？

赫鲁晓夫回答我说，他们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但是没有别的选择。星期一将在全会上批准这一决定，然后向全党传达，随后还要向广大公众宣布。我又重新回到朱可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赫鲁晓夫要我相信，在那里一切都好，他们没有任何意见。谈话快结束时，米高扬和布尔加宁走了过来。赫鲁晓夫转向他们，并告诉他们已告诉了我，他们两个又一个接一个地反复强调，这件事同朱可夫访问南斯拉夫没有关系。

赫鲁晓夫要求铁托和其他同志正确地理解他们党要求如此解决朱可夫元帅问题的最健康的动机。赫鲁晓夫再次谈到，当朱可夫或其他任何人同党背道而驰时，中央委员会和党是磐石般团结的。

至于国外，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国外会发表五花八门的评论，但是基本上会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会使他们不再担心军人们、元帅们夺取苏维埃政权，从而增加爆发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国外会看到苏联党是强大的，它象事实上的强者那样作出决定。随后赫鲁晓夫说，他从来没有同意过斯大林对待朱可夫的态度。朱可夫在六月全会上表现很好这一点丝毫不改变现在对他采取这样的立场的必要性。赫鲁晓夫要求我把他告诉我的一些事情

看成是机密，他只把这些事告诉了我们。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在昨天的谈话中，我向赫鲁晓夫谈到，我对朱可夫元帅在阿尔巴尼亚停留的时间如此之长，几乎比在南斯拉夫的时间还要长，感到奇怪。言外之意是清楚的：他们让朱可夫在阿尔巴尼亚逗留十天，又在南斯拉夫逗留这么多天，直到这里在这段时间内为在政治上清除他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为止。这时赫鲁晓夫说，这是错误的，在阿尔巴尼亚进行这样的访问，一般只需两三天时间，而不是十天！

朱可夫在阿尔巴尼亚逗留的最后几天，苏联报纸突然停止了报道，理由是没有可报道的。耐人寻味的是，朱可夫元帅竟然同意了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日程。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朱可夫元帅做梦也没想到，莫斯科在为他准备什么。

我曾问赫鲁晓夫，朱可夫元帅对发生的这一切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说，朱可夫说，既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他的行为作出这样的评价，主席团决定撤销他苏联政府国防部长的职务，是可以理解的。赫鲁晓夫说，党任何时候也不容许象朱可夫元帅那样估价自己的人来担任苏联政府的国防部长职务，而他认为，什么时候动用军队干预国内问题这件事只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在六月份曾威胁说，他要动用军队来“建立秩序”，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用这支军队来反对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明天就可以用来反对其他人。那么，把决定一切的中央委员会放在哪里呢？把党和人民放在哪里呢？赫鲁晓夫重复了这番话。

赫鲁晓夫对我说，“军人”对朱可夫元帅的行为特别感到恼火。他以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患哮喘病的海军上将为例说，这个海军上将声称，现在他可以“轻松地喘气了”。赫鲁晓夫以十分赞赏的

口吻谈到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关于撤换朱可夫元帅的消息，在这里成了耸人听闻的事件。星期六深夜，一些外国记者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记者，一个法国人甚至说，铁托元帅可能知道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的原因。在莫斯科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特殊的安全措施。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公民对撤换朱可夫元帅感到十分意外，这从下面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这看成是准备任命朱可夫为苏联政府总理，以替换在六月份信誉扫地的布尔加宁。人们在谈论朱可夫的声望，正常地期待朱可夫得到晋升，而没有想到朱可夫已在政治上被清除了。甚至东欧的和其他共产党的某些记者也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请求贝尔格莱德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告知外交部领导以及我们的国防国务部，因为我们的许多人已经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今天我们的总参谋部二部居然通过俄国人、匈牙利人等控制的公开电话，责怪我们的武官，为什么一点消息都不告诉他们，而他却不能告诉他们任何新的东西，因为只有我向贝尔格莱德报告，而那里的同志又告知了应该告知的人。我通过电报要求戈什尼亚克将军迅速告知我们，如何处理他的写有“致苏联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元帅”的加封信件。我们的武官萨沃·波波维奇上校为了转交这封信，早在前天就通过国防部联络司要求在国防部受到接见。今天，俄国人接见了，在我的建议下，他想出了一些过去未解决的问题，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我曾设法了解一下赫鲁晓夫打算如何公开地处理朱可夫事件。由于不能直接提出问题，我就谈到朱可夫元帅战时的功绩，这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所有东西方人士都很了解的，因此应该现

实地对待，尽管朱可夫现在的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立即表示同意，他说，他们注意到朱可夫元帅战时的功绩，谁也没有打算对这些功绩提出异议。接着，赫鲁晓夫赞扬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是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看来，马利诺夫斯基做朱可夫元帅的继承人，是赫鲁晓夫选定的。据赫鲁晓夫说，马利诺夫斯基在战前差一点被斯大林当做外国间谍枪毙掉。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苏联许多高级官员出席了土耳其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使所有出席招待会的人，特别是土耳其大使感到极大的意外，因为在整个十月份里，苏联因叙利亚问题，对土耳其采取的态度几乎是威胁性的。土耳其大使无法设想俄国人会以这样的阵容应邀出席招待会。如果不发生朱可夫元帅事件，很可能俄国人根本不会接受邀请。现在，赫鲁晓夫想尽力平息因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每当苏联最高层发生危机时，赫鲁晓夫不但不回避，反而在这种时候出现在外交招待会上和大庭广众之中，左右攀谈，努力给人留下泰然自若的印象。这说明，他是一位老练的政治策略家，是善于在政治困境中搏斗而不退缩的人。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莫斯科。

帕托利切夫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向他们通报朱可夫事件。他说，中央全会于十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举行了两天会议。苏斯洛夫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改进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报告。朱可夫在执行党在军队中的路线上所犯的错误早已为人所共知。主席团十月十九日在一些军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的错误的面很广，程度十分严重，因此决定召开全会。

说在这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才决定召开全会，这显然不对。所有这一切在很早以前就决定了。我认为，实际上，在仅仅几天时

间内,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在苏联进行任何调查,不管是象他所说的那种秘密调查,还是公开调查。

帕托利切夫说,朱可夫元帅在卫国战争中有很大功劳,这在全会上也得到了肯定,但是,苏联其他元帅也都同样有这样的功劳,而最大的功劳是属于进行斗争的党和人民的。在功劳不小于朱可夫的元帅当中,帕托利切夫例举了马利诺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

在关于制造朱可夫个人迷信的一系列证据中,帕托利切夫提到有一部影片,把朱可夫描写为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期间的常胜将军。影片末尾是朱可夫的一个特写镜头,他骑着一匹大白马,背景是被炸毁的柏林国会大厦。在另一部同类的影片中,朱可夫的形象是以柏林被破坏了的勃兰登堡门为背景的。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上映了这些影片。迄今为止,我还闻所未闻,有任何地方以在中央全会上放映几部影片,作为反对全会应当对之作出政治决定的某个人的证明材料。

帕托利切夫特别强调,这件事完全是他们党的内部问题,因此不可能同朱可夫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有任何关系。与会的大使们向帕托利切夫提出了许多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有中国大使和我没有提问。在我和帕托利切夫打招呼时,他对我说,鉴于我同赫鲁晓夫谈过话,所有这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

会晤后,在返回我们大使馆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帕托利切夫对我们的谈话。我认为,帕托利切夫在谈到影片描绘朱可夫是一个常胜将军,骑在一匹大白马上,这段话讲得最成功。我还想起了另一部关于朱可夫的影片,是莫斯科电视台拍摄的,内容是关于这位元帅七月份在列宁格勒的逗留。我想那是在六月全会和清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之后,赫鲁晓夫访问捷

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电影中的朱可夫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大街上，不是骑着一匹大白马，而是在敞篷的“吉斯”牌汽车上，汽车徐徐前进，象是在检阅部队，沿街有上百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热烈欢迎挂满勋章和奖章的光荣的苏联元帅。

那时，朱可夫是苏联唯一的“全权”发言人（而不是米高扬或主席团的其他某个成员），他就反党集团发表了尖锐的讲话，这个集团正是由于朱可夫元帅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才被击败的。莫斯科电视台转播了列宁格勒对朱可夫元帅的盛大欢迎，而苏联中央各报都转载了朱可夫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尖锐的讲话。不知道是否在十月二十八日的全会会议上放映了在列宁格勒拍摄的影片。

我估计，当时赫鲁晓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后，无论如何是不会喜欢在列宁格勒拍的这些影片的。我还认为，他也不会喜欢朱可夫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尖锐的讲话，以及朱可夫在赫鲁晓夫不在时，成了苏联唯一公开提出这些问题的发言人。这个国家的制度，没有一个作为党和国家化身的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在世时是这样。他死了以后，就不知道最后由谁来充当这个无可争辩的领袖角色了，因为觊觎这一领袖角色的人有好几个。一九五七年六月份，觊觎这一领袖角色的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失败了，虽说他们还曾设法暂时分担这一角色，只要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得这一角色就行。朱可夫元帅在他们的失败中显得特别突出，我认为，即使在六月以前的苏联，他的威望也比苏联其他任何人都高。看来，这种情况反倒对朱可夫元帅不利。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

根据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断定，清除莫洛托

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对苏联的震动，比苏联报纸或苏联领导人公开的或秘密的讲话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实际上，苏联领导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内的形势是严重的。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正在加紧制定一系列国内经济措施，以便促进国内的稳定，提高六月以后替代“集体领导”的新主席团的威信。除了我在这些记录中提到过的措施（取消宅旁园地税、着手解决居住问题、经济的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等）以外，当前，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期间，还将颁布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实行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关于缩短某些部门的职工退休必须达到的工龄的法律、关于取消未婚者和无子女夫妇的税收的法律，可能还有其他类似的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法律。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而且符合六月全会的积极宣言的精神。至于党中央和政府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的政策和外交政策，就不能这么说了。

所有上述这些措施还只处于初步阶段，有些连这一点也还谈不上。同时，苏联领导除了依靠政权和共产党的机关外，还首先依靠工会。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情况相当不妙，工会组织至今不但表现得无能，甚至反而使关于经济实行权力下放的决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很可能还会给苏联领导增添麻烦，苏联领导在今年八月庆祝工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就曾对工会的工作表示不满。

苏联通过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制造洲际弹道火箭而取得的划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对苏联社会发生了十分强有力的影响。这个问题占据苏联报纸的头几版已经快一个月了。并且，就此拍摄了电影，全国都在普遍举行科学普及集会。这一切都变成了对苏联的国家和社会的颂扬。同时，过分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似乎人造卫星本身就足以掩盖苏联的一切弱点，似乎它可以作为对苏

联的任何领域提出任何批评的人的回答。

重新出现了以前时期的民族主义口号：不仅谈到科学技术发明方面的苏联的，而且还谈到俄罗斯民族的天才。于是，苏联的中央各报发表了一些社论，谈俄国人在当代发明了一些什么：

——切雷帕诺夫兄弟发明了蒸汽机；

——莫扎伊斯基发明了飞机；

——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

——雅布洛奇科夫发明了电灯。

这首先是由《文化报》发表的，后来，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维扬诺夫于十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集会上又重复了同样的内容！

在发射了人造卫星之后，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说轰炸机可以当废铁了（见赫鲁晓夫十月八日在东德人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就这一成就的科学技术方面置之一旁，而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成就的军事方面。把人造卫星当成一个证据，来证明苏联在武器方面对西方的优势。这种做法很可能由于国际形势紧张而突出了。但是这也给苏联国内由于人造卫星而出现的兴高采烈的情绪泼了冷水，因为战争恐惧情绪在增长。苏联报纸在报道人造卫星的同时，在整个十月份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庆祝十月革命和莫斯科 各国党的会议

俄国人对铁托没有前来表示不满。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施加压力。在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的会议。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关于赫鲁晓夫的态度。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是一个倒退。我们接受了《和平宣言》。关于毛泽东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莫斯科。

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宣传提纲中，包含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所取得的成就的正式评价，以及苏联对当前一些迫切的重大问题的观点。提纲中的许多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似乎苏联的作者在不力求使所有的外国的党都能从中找到符合他们心意的论点，而其他问题则可以不予理会，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同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了。例如，在提纲中可以找到对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承认，但是同时，提纲又把社会主义说成似乎就等于阵营国家，而在阵营之外则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提纲对世界事态的发展有一些新的提法，但是同时又有不少斯大林时代所遵循的陈旧论点和原则。

我认为，对于这个文件，以及对于在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产生的其他文件，都应从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来加以探讨，这就

是：是否回答当前世界革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我只记下已经产生了好几年的两三个问题：

——各国共产党是否将根据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处境，自由地来决定自己的政策，还是象这里仍然坚持的那样，它们在政治上要接受一个中心的指导和领导？

——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是否基本上就等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界，还是这种力量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不论这些国家的国界如何？

——是否应当承认各国根据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而存在着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理论——这也是世界现在存在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继续坚持所有的国家一律要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当只存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今天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小自阿尔巴尼亚，大至中国，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以各国独立平等的原则为出发点建立起新型的国际关系，从而对国际关系起积极的影响，还是在社会主义世界象资本主义世界一样继续保持强国对弱国、大国对小国、富国对贫国的统治？

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有人企图把独立的南斯拉夫纳入这一阵营——本身就是这个提纲的政治用意所在。早就可以预言，莫斯科会议不负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回答的任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莫斯科。

在苏联边境对我国代表团的欢迎一切正常。乌克兰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为欢迎我国代表团在基辅举行的晚宴也是这样。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卡德尔非常友好地谈到了苏联和乌克兰。给我的印象是，他的讲话受到了欢迎。根据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在莫斯科

也会一切顺利。然而，在基辅的应景的讲话是一回事，而在莫斯科等待我们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我设法向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在战争年代对莫斯科很熟悉的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同志介绍了一下莫斯科不会对我们特别有利的气氛。但是这对这几位同志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他们通过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讨论，已经对俄国人的态度得出了一定的结论。这两位代表最近曾去贝尔格莱德，目的是就主席团想要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同南斯拉夫人协调立场。我们表示不同意，并且通知了俄国人。他们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带着有关南斯拉夫的立场的坏消息返回了莫斯科。苏方对我们的不满在增强。因此，边境上的热情欢迎和基辅的晚宴并没有忠实地反映俄国人的真实情绪。

在莫斯科迎接代表团时，俄国人没有掩饰他们的不满。迎接代表团的是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一些比较低级的政府官员。由米高扬和苏斯洛夫陪同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乘车到他们的宾馆。在总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谈政治问题。一到宾馆，我们的同志就提出要求拜会赫鲁晓夫。直到晚上他们才得到答复说，赫鲁晓夫很忙，明天，十一月六日才能会见他们，而且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休息时会见。关于拜会伏罗希洛夫的事，明天再商定。

庆祝活动的日程和已经知道的情况一样。卡德尔将作为第一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个发言者，于明天下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致词。各国党的会议将召开多长时间，将如何召开，还不清楚。除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致词外，还定于十一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群众大会，其余国家的代表将在会上讲话。最高苏维埃将通过两项宣言，一项是致苏联人民的，另一项是致世界人民的。会议是否具有预先所料想的那种性质，目前还不

清楚。我不相信莫斯科能召开这样的群众大会，由于莫斯科城市之大，群众大会在参加的人数上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苏联的制度同举行这种群众大会的做法是不相容的。

俄国人确信，铁托的病是“政治性的”。当我方提及这个问题时，俄国人总是避而不谈，从而显示出自己的不满。

正式的活动日程，包括最后一项——古比雪夫的一座巨型的新水电站开闸典礼在内，在十一月十二或十三日以前是结束不了的。除了胡志明以外，还没有任何客人来看我们。

十一日晚，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因雾很大，参加庆祝活动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降落时坠毁。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蒂亚萨和罗马尼亚飞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牺牲。其他人全部得救，但是都受伤不轻。罗马尼亚大使馆告诉我们，基伏·斯托伊卡同志受了轻伤，他们说，罗马尼亚代表团的两、三名成员很快即可出院。飞机已烧毁。

这一事件使这里十分扫兴。虽然出事时外交团都在机场等候代表团，并且听到了飞机的爆炸声，但是仍然对这件事保密。已通知外交团说，由于气候恶劣，飞机已返回基辅。

今天，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志打算去医院看望基伏·斯托伊卡等人，但是对他们说，“他在发高烧，不能会客”。代表团原应由乔治乌—德治率领，但是三天前作了变动。据我们从罗马尼亚大使馆听说，德治病了，因此不能来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

苏联的广大地区这几天一直有浓雾，因此外国代表团的抵达也发生了混乱。蒙古人等飞往莫斯科的飞机等了三天，在罗马尼亚人出事之后，所有的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东德人）都不乘飞机改乘火车了。某些人要在明天，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会开幕之前才能到达。这给组织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

我认为，卡德尔在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的致词是最适合于这种场合的。只有卡德尔和哥穆尔卡用的是俄语，其他阵营国家的代表都用的是本国语言。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不懂俄语，而不是由于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如此珍重。苏联公众只能通过翻译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他们的致词往往达不到什么较为强烈的效果，尽管有些阵营国家党的领袖就象在某种竞选集会上那样大叫大嚷。托多尔·日夫科夫嚷得最凶，用我们的话说，他是“扯着嗓子”喊的。

大约一万名与会的俄国人直接听取了卡德尔和哥穆尔卡的致词，对他们的欢迎显然要比对其他阵营国家的领袖更为热烈。结果是，苏联公众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波兰代表的致词，比其他阵营国家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致词更乐于听取、更加欢迎。

我想，俄国人没有料到卡德尔的致词对苏联如此友好，如此贯穿了十月革命的思想和对列宁以及对开创了这一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的俄国人民的赞扬。在卡德尔致词以后会场休息时，有一群俄国人向我走来，致词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们为“卡德尔讲得那么好”而向我祝贺。这些人看来确实感到出乎意料，也十分激动。我对他们的祝贺表示感谢，同他们五、六个人握了手。我说，致词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过去卡德尔也是这样谈十月革命的，南斯拉夫对十月革命总是这样谈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莫斯科。

俄国人还对我国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以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不满。这也影响了其他一些不愿受俄国人指责的代表团，它们

回避我们，使我们的处境更为尴尬。只有波兰人正常地同我们交谈，虽然他们对于同我们在一起呆多久也是有所考虑的。我们告诉哥穆尔卡，我们将不在任何共同文件，例如责成所有的党采取一致行动的宣言上签字，因为我们原则上是反对通过这样的文件的。哥穆尔卡告诉我们说，俄国人千方百计想要通过一项共同文件。

我们代表团在赫鲁晓夫那里同俄国人共进晚餐以后，一切比最初时变得更加紧张了。苏联方面出席的还有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南斯拉夫方面，代表团没有全体出席，出席晚宴的同志有卡德尔、兰科维奇、科利舍夫斯基和弗拉霍维奇。为了免得把时间浪费在讲一些应景的话上，赫鲁晓夫立即开腔，他通知我们，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说，他对这样的事态表示遗憾，但是事情掌握在我们手里，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将再次遭到破坏，但是这丝毫不取决于他们，因为是我们现在做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他们。

我们方面由卡德尔和兰科维奇讲了话。他们陈述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对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谈过的相同的观点。双方的讨论越来越尖锐。这也是赫鲁晓夫的态度促成的，他破坏了晚宴的气氛。赫鲁晓夫的某些话，简直就是侮辱性的，他甚至没有打算回避讲这样的话。

我们代表团的印象是，由于最近几个月这里发生的事件，使俄国人变得如此强硬，并对我们施加了如此强大的压力。晚宴上曾经提到最近的布加勒斯特会晤，俄国人现在却根据他们的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似乎是我们没有履行自己在那里许下的诺言。这说明，凡是不予发表的，最好什么也不要同俄国人一起签字。赫鲁晓夫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强硬，在我们看来，在苏联领导中还坐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朱可夫元帅的时候，我们同他要比较

容易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九日，莫斯科。

在第一次晚宴上，赫鲁晓夫曾企图采取一种冲锋式的态度来消除我们对签署共同宣言的反抗。当这一“袭击”战术“失败”以后，俄国人变得平静一点了，他们又通过赫鲁晓夫来说。他说，铁托在美国杂志《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非常好，在经历了种种情况之后，他们现在更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拒绝在宣言上签字。所有的党都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赫鲁晓夫说，许多党在他们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以前，还拍来了电报表示接受。现在他们正在同中国人一起修改草案；他们希望能提出一个共同的草案来。我们听说，中国人在某些问题上把苏联原来的草案搞得更加糟糕。例如，中国人现在坚持把“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写进宣言草案。波兰人也将签字。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什么各国共产党会议。代替会议和讨论的将是各自发表相互雷同而又多少是郑重其事的言论，宣布赞成共同宣言。

赫鲁晓夫建议我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这样做，会在各方面造成混乱。到那时，无论是在阵营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会知道我们持什么样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会在南斯拉夫国内造成混乱。结果会是，我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接受俄国人和阵营的立场，但是又不完全接受他们的立场，好象还想为其他人，为西方集团保留一点地盘似的，而俄国人本来就在谴责我们这样做。派代表参加莫斯科举行的最高苏维埃庆祝会的各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思想的赞同，以及由此而对苏联表示的支持是非常强有力的。我们大家作为朋友，通过前来参加活动对苏联表示了支持，而俄国人硬要通过他们自己起草的、我们所不同意的共同宣

言，恰恰是削弱了这一支持。

我们也不能按照贝尔格莱德的某些意见办：提出我们自己的宣言草案。这等于我们同苏联和其他阵营国家分裂的公开挑衅。唯一可行的是，我们签署波兰人所提出的“和平宣言”，条件是及时地向我们提供草案和如果我们同意该草案的话。除了需要通过“和平宣言”的会议以外，各国党的会议，在通过共同宣言时，我们就根本不参加。

我们的代表团呆在列宁山上的别墅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或其他的义务。我们等着俄国人送来宣言草案，而我们会再一次说明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俄国人没有送来宣言草案，我们也没有要。或许新的更糟糕的“经过补充修改的”草案不送给我们，那就最好了，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又一次不愉快的争论和冲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莫斯科。

我们的代表团在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要求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接见，但是直到昨天才受到接见。我们的代表团还受到布尔加宁的接见。原来设想这几次拜会是礼节性的，但是如果俄国人重新提及有争论的问题，我们就准备再次告诉他们我们的观点不变。

虽然我们的同志已经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赫鲁晓夫的晚宴上，同赫鲁晓夫等人见过面，并同苏联代表团会谈过，昨天他们装做象是我们第一次会见似的。我们的同志转达了铁托同志对苏联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最高苏维埃的庆祝会开得非常成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来，最高苏维埃或许没有在克里姆林宫以外召开过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体育中心卢日尼基召开的，在可容纳上万人的大厅里召开的，大厅里座无虚席。在这样的场合离开克里姆林宫，对俄国人来讲，

是件新鲜事，这对于庆祝十月革命更加合适，而且给外国代表团和苏联公众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赫鲁晓夫谈到搞掉朱可夫元帅的问题，虽然我们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连暗示一下都没有。赫鲁晓夫对我们代表团所谈的，基本上同他十五天以前和我谈的话一样。至于朱可夫在南斯拉夫的会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都说，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由于我们拒绝签署宣言，我们同苏联当局在其他级别上没有任何接触，我们四周是一片不愉快的气氛。我们的同志在列宁山上的大楼里感到无聊，时间过得很慢，在这漫长的十一月的夜晚，我们的同志大都呆在家里打纸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爱打“逮黑猫”，而是为了不讲话，因为他们知道，俄国人在窃听。因此，我们代表团的住地是安静的。今天早上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病了，他着了凉，嗓子哑了，只能低声说话。这几天，乌格列沙在打“逮黑猫”时老是输，弗拉霍维奇就说他嗓子哑了是因为得了“猫咳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莫斯科。

今天我们的代表又去赫鲁晓夫那里。卡德尔说，我们不能在宣言上签字，理由是赫鲁晓夫所熟知的。宣言的文字不符合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达成的协议，甚至距离很大。我们认为，对于我们同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最好是我们不参加会议。我们不准备在有保留的情况下签署宣言，因为那会增加混乱，而在签字之后，我们和他们又都必须进行公开的解释，这一切都是不可取的。卡德尔说，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支持宣言中我们所同意的观点。

赫鲁晓夫既没有象上次会晤时那样表示惊讶，也没有提高嗓门，但是实质上他还是以同样的方式谈了同样的论点。他企图对上面所提到的所有事件，甚至对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也作出他

自己的解释。他威胁说，现在在我们之间会发生分裂，这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前途。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的敌人会感到满意，因为情况表明我们之间不团结。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可能会对我们这样的态度表示祝贺。我们的同志对赫鲁晓夫这番话，没有以牙还牙。我们的同志努力同他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阐明我们为什么原则上反对恢复这样的宣言所主张的成立各国共产党新的国际组织的理由。

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为了不使会谈趋于紧张而克制着自己。他们解释说，我们拒绝在宣言上签字，不应影响我们两国国家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会晤在相当过得去的气氛中结束。虽然我们的同志讲清楚了，这是我们最后的话，因此没有必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赫鲁晓夫却说，事情还要再斟酌，这就告诉我们，他们还要第三次对我们施加压力。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莫斯科。

由于需要最后决定是否继续坚持我们从一开始就持有的观点——不签署宣言，也不参加会议，代表团决定在我国大使馆再开一次会，我觉得在大使馆里谈话可以自由些。虽然我们已经及时清除了苏联的窃听系统，共找出了十九个用电缆连接着的、装在各房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内的窃听器，我们还是没用使馆的任何办公室开会。我觉得代表团的会议在一个小穿厅里举行更好些，这个地方平时不用，也没有电线。我觉得，为防止俄国人窃听，那里可能更安全些。

参加这个会的同志有，卡德尔、兰科维奇、韦利科·弗拉霍维奇、拉扎尔·科利舍夫斯基、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和我，都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的。我们还请了当时路过莫斯科的久罗·萨拉伊同志参加会议。我们在这个圆形的小房间里，非常艰难地挤在

一张小桌周围。由于屋里没有电灯，我们在中间点了一支大蜡烛。我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样一次在半暗不明的房间里围着一张小圆桌，中间点着蜡烛的会议。我们尽量压低嗓门讲话，而且还伴随着隔壁房间里传来的音乐声。

谈话持续了将近一小时。虽然我是代表团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我好象充当东道主那样，首先非常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尽管赫鲁晓夫期待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观点最后通知他，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新的情况，使我们有必要改变我们的领导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这一立场我们代表团已多次通知了俄国人。

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发了言，其中几个人发言很短，实际上只是重复了来莫斯科之前所表明态度。卡德尔和萨拉伊同志的发言较长。卡德尔谈到，我们不签署宣言可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这被认为是必然的。我们希望，我们在其他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我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致词——这一致词发表了，能为苏联及其他公众所知晓——我们出席会议闭幕式，这些都会起到“缓冲作用”，而影响不亚于这一切的是苏联有兴趣于使他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致尖锐到极点。

我们收到了“和平宣言”草案的最后文本，尽管比(各国党的)宣言要好些，并且作为政治文件具有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不太好。无论是苏联的文本，还是这份草案，都离不开苏联的框框：谴责西方和美国奉行冷战政策等等，而对阵营的描述则与此截然相反，全是积极的。草案的调子和措词都是局限于阵营内所用的，是本着这里所发表的其他宣传文件的精神起草的。除我们之外的十二国党的会议将于明天开始举行。我们将参加第二个会议，即所有的党都参加，而不光是阵营国家的这些党参加的那个会议。我们将为签署“和平宣言”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以阐述我们对一些基

本问题的立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莫斯科。

我们代表团同国内的同志就我们在这里所持的态度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铁托和国内其他同志完全支持我们的态度。我们代表团因而受到很大鼓舞。在代表团内，即使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观点也都是真正一致的。我相信，代表团这种一致，也影响到国内同志。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健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个人必然会觉得很愉快。

俄国人采取僵硬的、基本上是霸道主义的旧有的态度，也促成了这种情况。如果他们不提出这种划一的要求，如果他们灵活一些，如果他们不搞这个《十二国党宣言》，不把它当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们还企图把南斯拉夫也拉进这个阵营——所有共产党的某个意识形态的纲领，我们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拒绝参加。第二个，扩大的会议（因此不如第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来得重要，虽然在我们看来应该刚好相反）于昨天开始举行，有六十四个国家参加。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格奥尔基大厅里举行的，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两边，苏联和中国代表团面对面地坐在正中间。苏联代表团及时分发了苏斯洛夫要作的报告。这是整整一本书，长达七十页。对于这样的集会来说，这份报告的水平很低。苏斯洛夫的讲话很短，讲话的目的只在于强调分发给我们的报告的官方性质，并提醒我们注意报告里所写的东西是不供发表的。

会议今天继续进行。在今天的会上，法国共产党代表雅克·杜克洛发言将近一小时。他的讲话是老一套的宣传，我想很少给谁留下好印象。继他之后发言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他也讲了差不多一小时。随后相继发言的有波兰、英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产党的代表，都是十到二十分钟。

正如我们所料，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陶里亚蒂的发言。他同所有持旧观点的人，特别是同法国人展开了间接的论战。对于他来讲，这比起触动俄国人或阵营内的其他人，最无痛苦和轻松得多。陶里亚蒂坚决反对成立类似过去的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各国共产党新的国际组织，同时他强烈主张发展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他越是主张进行这样的合作，就越坚决地批判成立任何新的国际组织。他支持《十二国党宣言》，因为他不这样做，他的这些积极的意见就连谈都不可能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

让我记下有关毛泽东前天发言的若干细节。所有的代表团对他的发言都抱有很大的兴趣。所有的人都是到讲台上发言的，只有毛是会上唯一没有上讲台的人，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讲话。他一开始发言就说他不到讲台上讲话，因为他有病，翻译翻的是“头痛”。我感到，这番话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意外。毛通过翻译讲了几乎一个小时。我觉得，讲话是公式化的、带有宣传色彩的，讲了许多中国的谚语和格言，却没有描绘出当今的世界，无论是社会主义世界，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或是两者之间的世界的真实面貌。

当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通过站在身后的俄语翻译讲话时，苏联代表团中发生了一阵轻微的骚乱，随后米高扬对毛泽东的发言作出了引人注目的示威性动作。毛一度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翻译就是这样翻他的话的。毛的确切提法到底是什么，大厅里除了中国人外谁也不知道。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同被他称为另一集团的苏联共产党等同起来，而且他是在世界

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这番话的，这使得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一度，米高扬背转向发言者，我想，他是在看用金字刻在格奥尔基大厅墙上的上千个俄国最高战斗勋章——圣格奥尔基勋章的获得者，沙皇团队的名称和俄国军官的名字。今天举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克里姆林宫里的这座古老而华丽的大厅，从沙俄时代起就因此而获得了这个称呼。

米高扬当着俄国人的面进行这样的示威，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米高扬才继续站着听毛泽东讲话，米高扬时而转过身望着他，似乎是在听他讲话，随后又朝窗外看去，把背转向发言者。在毛泽东讲了这样一番话，米高扬作出示威性的反应，而苏联代表团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之后，我们在这里处处都听到的苏联和中国“磐石般的团结”这句话听起来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却表现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

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代表团的名义作了简短的发言。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讲话的毛泽东不同，韦利科虽然只有一条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就成了重残废，但是仍然走上格奥尔基大厅尽头的讲台去讲话。弗拉霍维奇的发言受到了多数代表团的欢迎。俄国人没有掩盖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没有鼓掌。作了这个发言之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就终于完成了使命。经过在莫斯科的长时间逗留和对俄国人向我们所施加的压力的抵制以后，代表团可以返回南斯拉夫了。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事，它与会议没有关系，但是可以说明在

我们当中是什么样的气氛。同志们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为了帮助他们消磨时间，有一天我和我们代表团约好到使馆来进午餐。我们约好午餐只有一道菜：士兵吃的菜豆“外加”一点达尔马提亚熏肉。我知道南通社驻莫斯科记者达沃尔·楚利奇经过几番周折，从达尔马提亚搞到了熏肉。他同意作出牺牲，提供熏肉来做这顿午餐。米什卡不难充当女主人的角色。这一天却成了少有的一天，我们的代表团和使馆人员感到象在家里一样，而我们驻莫斯科记者还向各自的编辑部发了消息说，南斯拉夫大使设午宴招待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的报纸第二天就在第一版当日重要新闻中刊登了这个消息，列举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参加午宴的其他人的名字！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莫斯科。

我们代表团已于今天十一点钟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回贝尔格莱德。返回日期一再推迟，有整整十来天时间一直定不下来。我想，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在莫斯科已经尽了我们所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得不坏，尽管不是很容易。我们对于是否在《十二国党宣言》上签字的问题，一刻也没有丝毫的动摇。还在国内时已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只是贯彻执行这个决定，同时尽我们所能不使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极度紧张化，不致使南斯拉夫孤立于其他代表团。

虽然苏联的压力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对一切压力所给予的成功的抵制并不特别困难。我们感到，以铁托为首的我党领导，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欧洲和世界的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不论事情在莫斯科会如何发展。同时我们还感到，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受到南斯拉夫上百万党员和非党员的积极支持的，我们绝大多数公民坚决相信我

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不会做出不同于它已经做过的事情来。

* * *

我忘了在这里记下几句话，谈一谈毛泽东接见我们代表团的情况。当会议临近结束时，当《十二国党宣言》已经在南斯拉夫不参加的情况下签字以后，根据卡德尔同志的建议，我们代表团提出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我们最后决定拒绝签署宣言以后，毛泽东完全可能拒绝接见我们，如果拒绝，那就只能听由他们决定了，不过那时中国人自己就要考虑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很好。

中国大使刘晓对我的要求迅速作了答复，并且是肯定的答复。他对我说，毛将很高兴于当天就接见我们代表团。似乎显得中国人只是在等我们去提出拜会的要求。毛亲切地同每个南斯拉夫夫人打招呼，作为东道主，他非常客气地同我们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谈话提到了有关南斯拉夫的许多问题。我们的同志尽可能准确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我们没有签署《十二国党宣言》竟一点都没有表示不满。当我们的同志简短地向毛说明我们没有签署这个文件的理由时，毛只说，这不是什么问题，说我们现在没有签署这个宣言，经过十五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在别的宣言上签字。这样的回答使我们的同志感到意外。当我们的同志向他说明，为什么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还很落后时，毛作了类似的反应。我们谈到，由于我们目前把主要投资放在工业和城市，因此农业落后了，但是我们将在两三年内改变这种状况。毛回答说：为什么经过两三年，或许要二、三十年，或更多些时间？

最后，他亲切地送别了我们代表团。毛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讲了几句经过斟酌的话，他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在中国人和我们之间除了其他的

差别外，我们对于国内国外政策中的时间因素也有着明显的完全不同的看法。

会议是以共进午餐而结束的，还是在举行会议的格奥尔基大厅里举行。午宴期间，毛泽东手中举着一杯葡萄酒，环顾了所有的客人，围着长方形的大桌子，向一批批的客人祝酒，并在他们身边稍微站一站。他走过整个格奥尔基大厅，共停了五、六次。当他来到我坐着的桌子旁边时，他停了下来，中国大使馆的陪同人员把我介绍给他。毛说愿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干杯，还说了几句寒暄的话。然后毛继续走向其他客人，很少在谁那里再停留过，只是左右频频点头，向与会者致意。与我同桌的一个人问我是否到过北京，在这以前是否认识毛泽东。要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没有向他谈到过我，很可能同毛泽东不会有这番会见，我从在这里开始任职起，就同刘晓建立了良好关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当我在基辅火车站送别我们代表团时，我们的同志都祝我“一切顺利”，不过他们不大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预料到同俄国人的关系会重新恶化，将继续沿着曲线发展，时高时低。只是不知道现在会有多大程度的低落。看来，只要俄国人企图限制我们的独立，把我们拉进社会主义阵营，而我们又抵制这种做法，关系就不可能稳定。因此我们两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我们所预料的困难也是无法回避的。看来，一个社会主义的小国同另一个身为大的强国并且以这样的身分行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除了经由象俄国人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的道路外，是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我们大使馆里，大家都为我们党的代表团离开这里而感到非常空虚，他们在这里和我们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多天。我们对代

代表团已经完全习惯了，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机构的力量增加了好几倍；现在我们又显得力量单薄了。如果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能经受住这次新的、但是很可能不是最后的冲突，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南斯拉夫以这样的方式，尽管是经过冲突，却对自己在新的，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在作这些努力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孤立的。只有南斯拉夫拒绝签署确认旧的不平等关系的《十二国共产党宣言》。我不知道我们能对其他国家有多大影响，我们也在为他们的平等而努力。但是我敢断言，南斯拉夫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力量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将始终不渝地继续我们迄今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不会缩小我们的政治影响，只会以这样的方式使之继续扩大。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拒绝签署《十二国党宣言》的结果。

又一个岁暮时节

庆祝我们的国庆。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赫鲁晓夫的轶事趣闻。不稳定仍然是苏南关系的主要特点。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晚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这里的气氛比往常对我们更冷淡了。这从俄国人以及多数阵营国家代表的态度上可以感觉到。南斯拉夫没有签署《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对于他们当中最保守的那些人来说，似乎是正中下怀，现在阵营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在国内或在俄国人面前证明，他们没有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没有对我国采取别的新政策，是做对了，现在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昨天美国大使汤普森拜会了我。当然，他认为我们不签署宣言是正确的，他问我对撤换朱可夫元帅的原因有什么想法。我说这是苏联的内部事务，我认为这在外交政策方面不会有什么影响。

汤普森说，他们本来指望赫鲁晓夫真正关心有一个和平的时期，尽管苏联的某些作法是与此相违背的。汤普森还提到《十二国党宣言》，他认为这一步骤不会加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事业。后来还谈到苏中两国的关系，通过现在这次会议，可以对此作出评价。我说，《十二国党宣言》是苏中的共同建议，这番话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谈到苏联同中国在各方面的差别，援引了有关

中国现在还在进行的反右运动的一些材料。

我们谈到里德伯格大使返回贝尔格莱德的问题，而这正是汤普森前来拜会的原因之一。我说，里德伯格大使返回贝尔格莱德，这很好，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这已是里德伯格大使第三次正当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之间发生麻烦的时候返回贝尔格莱德了。如果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不取决于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如何，那就好了。如果同一方改善关系要以搞坏同另一方的关系为条件，那么这种政策要取得什么结果是不能想象的。

汤普森大使要求拜会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让俄国人注意到并记下，美国大使是在南斯拉夫拒绝签署的《十二国党宣言》发表的那一天拜会南斯拉夫大使的。这一点对于我，或许还对于汤普森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会给俄国人留下印象，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对我们说过，我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过，我们还是不打算根据莫斯科高兴或不高兴，来安排我们同美国或其他国家大使的会晤。

对于我们没有签署《十二国党宣言》，汤普森并没有给人留下他由于幸灾乐祸而感到特别满意这样一种印象。关于这一点，他更多的是谈到，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对于我们的政策来说，这个文件是不能接受的。在谈话中，我提出了南苏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俄国人；我们对同苏联和阵营国家的关系尽可能好地得到发展是关心的。我对汤普森也是这样讲的，当然，他对这一点是赞同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大多数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特别是西方国家大使，一弄清楚南斯拉夫没有签署《十二国党宣言》，就立即要求同我会见。很可

能他们得到了自己政府的指示，要他们密切注意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而他们认为，到我们大使馆至少可以了解到和听到一些并非纯粹是宣传的情况。同时这也可能是一种用以达到一定效果的“外交手腕”，因为外国大使知道，这样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俄国人对我们的怀疑。

意大利大使马里奥·德·斯特凡诺企图缩小我们不签署共同文件的意义。他捏造说，存在一个“第三个秘密的最重要的文件”，并在记者和外国代表中散布这个神话，以便不加区别地扩大对所有共产党人，也包括对南斯拉夫人的不信任感。考虑到他一九四二年时当过墨索里尼驻黑山的“民政专员”这样的法西斯生涯，这就不奇怪了。这几天，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没有要求同我们会晤。我想，他们暗暗地是赞同我们的独立立场的，但是他们害怕我们同俄国人的新冲突会削弱阵营和我们同阿拉伯人的支持和援助。当然，苏联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其他援助比南斯拉夫的要来得多。为了免得俄国人有意，他们没有要求同我们会晤。

除了俄国人还在继续说，对我们拒绝参加会议和拒绝接受宣言感到意外之外，现在我还发现另一方的代表出自相反立场，也对我们的立场感到意外。西方的几位代表公开地对我说，他们以为在我们承认东德之后，南斯拉夫的态度会有改变。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这几天，西方驻莫斯科的一些代表重新对撤换朱可夫元帅一事发生了兴趣。他们之所以现在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或许是想缩小《十二国党宣言》、《和平宣言》以及俄国人最近所采取的其他一切措施的意义。无论如何，西方代表想使朱可夫元帅的问题继续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并把它同苏联其他对内对外政策问题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许多事情就变得容许加以争论了。例如:苏联怀疑朱可夫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朋友”,对西方怀有见不得人的意图,以及苏联的整个对内政策等,因为俄国人撤换了在清除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并怀疑赫鲁晓夫企图实行个人统治。他们还使人们对赫鲁晓夫的道德品质产生怀疑,因为他清除了六月全会上,在清算“反党集团”时充当他的支柱的一个人。顺便还使苏联的制度信誉扫地,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是以这种方式清算最杰出的人物的,从而使人们怀疑苏联国内局势的稳定,使人们对不符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领导心愿的那些人们的命运普遍产生疑虑。

在这些谈话中,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说这是苏联的内部问题,至于对内对外政策,我不相信在朱可夫元帅和赫鲁晓夫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我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仍然同撤换朱可夫元帅以前一样,俄国人仍关心和平,关心同美国和西方达成谅解。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方面建议我在我国国庆时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讲话,我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这样一种讲话,应为尽可能多地向苏联公众介绍南斯拉夫的真相作出一定的努力,但是也要表示我们希望同苏联保持正常的关系。由于环境的缘故,这个讲话成了一种枯燥而刻板的讲话,这是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能够发表的讲话。

我不相信俄国人会满意我的讲话。他们很可能没有估计到我会谈南斯拉夫,谈我们的关系唯一可以依据的原则,而更多的是指望我赞扬苏联所做的一切。

南斯拉夫居然可以拒绝《十二国共产党宣言》,而他们的大使在此后一个星期却在苏联的电视台发表讲话,苏联相当多的官方

人士对于这件事是不会很满意的。不过我相信，苏联政府不可能对我在讲话中所谈的任何内容正式提出意见。鉴于他们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前才通知我的，因此我可以说，苏联最初的决定很可能是消极的，而到最后的时刻才改变了决定。我认为，俄国人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缩小我们拒绝签署《十二国党宣言》的意义，也是为了表明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是完全成功的。如果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使同我们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尖锐化，他们自己就证明了我们拒绝签署宣言是莫斯科会议的主要事件，结果就会是，会议实际上遭到了失败，因为事实表明不存在“磐石般的团结”。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得出结论，俄国人眼下对我们的殷勤态度，是同发表《十二国党宣言》之后的目前时刻相关联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莫斯科。

在庆祝我国国庆期间，苏联政府造成的印象是：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在继续正常地发展。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出席了我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米高扬以《战斗报》为例，提出了我国报纸对《十二国党宣言》报道不充分的问题。他说，这是我们的官方机关报，至于其他报纸他连提都懒得提，因为其他报纸比《战斗报》更差劲，《战斗报》对宣言作了删节，只摘登了宣言原文中不重要的部分。

赫鲁晓夫说，他已获悉科查·波波维奇最近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里德伯格的谈话内容。如同他对其他某个人所做的一切作出评判一样，尤其是如果涉及南斯拉夫的话，赫鲁晓夫这次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波波维奇的讲话是好的。这是赫鲁晓夫少有的一次居然对科查·波波维奇的行动作了总的有利的评价。

俄国人提到，西方代表对撤换朱可夫元帅重新感到了兴趣。俄国人说，西方大使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苏联抱有善意，他们也不

想弄清楚什么问题。他们只是想引起有损于苏联的混乱。我当着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的面，对赫鲁晓夫说，我听到了对赫鲁晓夫向一个美国记者发表的谈话的好的评论，赫鲁晓夫说，尽管朱可夫元帅出了事，他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我认为这番话在西方的反应很好。赫鲁晓夫满意地听取了我这番话，而米高扬发表意见说，这样的谈话和论点“使敌人解除武装”。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莫斯科。

我们发现苏联各地的苏联军人，就莫斯科十一月事件采取了对南斯拉夫一点也不友好的态度。铁托同志受到公开的攻击，南斯拉夫的政策被说成是“不是始终不渝的和虚伪的”。苏联一位高级军界领导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铁托脚踩两只船？他到底是支持莫斯科还是支持美国？为什么他犹豫不决？然后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除了苏联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外，不可能有别的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大多数共产党员来说，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某些成员开始，问题似乎是南斯拉夫应当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出抉择。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结论：谁不是在各方面都同苏联在一起，他就自动地是反对苏联的，他就是赞成美国的政策。苏联共产党员的这种冷战的观点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人首先拥护南斯拉夫。

赫尔松的苏军一支大部队的一位领导人，于十一月七日命令一个苏联公民不要再戴我们的战斗勋章，说难道你没看见铁托已拒绝来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南斯拉夫的政策是不真诚的，甚至可能是敌视苏联的？我们还了解到，苏联各地有五、六个高级军官也有类似的反应。

* * *

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党课上，一个听课的人问道，反党集团成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现在怎么样了？报告人列维茨基上校回答说，“他们都在自己新的工作岗位上”，并说出了他们现在都在哪里。他显然是满意地说，这四个人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他们当中有人还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出席了最高苏维埃的庆祝大会。这是真的，在十一月七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庆祝大会上，我看到了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我还同卡冈诺维奇打了招呼。至于他们在最高苏维埃的地位，报告人说，将不会有任何变动。他说，四个人的“态度都很好”。他说，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收回了自己在六月全会上的立场，当时他在表决时弃权，并表示同意党中央对他的态度，他准备在自己的外交专业范围内，到党派他去的任何地方去工作。

据我所知，这是六月全会以后，第一次在党课上正面谈到莫洛托夫等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的医院里已经住了十来天了。这个记载的最后几页是我在医院里记的，后来就没有再写。今天我再继续写下去，因为我感觉好了一些。

苏联政府宣布，如果拥有核武器的美国 and 英国也准备发表关于停止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声明，苏联就准备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庄严宣布停止继续试验核武器，同时在此期间就停止核试验进行国际谈判和商谈达成国际协定。俄国人还对这次暂时停止试验规定了期限，即提出在两三年内结束谈判。俄国人还在原则上接受了“有效的国际监督”。我认为，西方肯定不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因此他们可以更不受拘束地提出自己的和平倡议。

俄国人还建议西方解散军事集团，建议东西方国家之间就和

平解决一切争端达成协议，以及就停止进行煽动战争的宣传达成协议。我认为，至少这后一点用不着等待同西方国家达成任何协议，俄国人自己就可以平心静气地停止进行。

他们还建议就德国问题和近东问题达成专门的协议，以及就东西方之间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扩大贸易、科学、文化、体育等联系达成协议，接着的是这里经常定期反复提出的关于裁军的一般建议。

我们大使馆的同志和研究过苏联信件的其他同志们说，苏联政府给艾森豪威尔的这封信是最温和不过的，信中强调得最多的是两个最强的国家之间有必要达成谅解，并再次提到“日内瓦精神”，这甚至在苏联的宣传中也早已不提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莫斯科。

我们大使馆的同志从苏联人士那里得到消息，根据这些消息这里开始得出结论：苏联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所做的宣传过了头。现在苏联关于它在这方面，首先在军备方面的实力和技术优势的过头的宣传，开始得到同这里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突然提出了在这方面西方落后于东方，也就是美国落后于苏联的问题。通过大量增加财政投资很快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以便尽快赶上苏联，并剥夺他们暂时享有的垄断权。苏联的宣传虽然希望加强和平，但是在对战争和苏联的军事优势的恐惧不断增长的世界里，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现在艾森豪威尔将毫不困难地从美国国会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必要金额，以消除苏联同美国之间已经出现的差距。

我们听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决定。通过党的机关已下达指示，今后不再发表有关苏联在火箭方面的优势的任何材料，宣传机器要重新回到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的

和平共处问题上来，把它作为主要问题。因此选择了目前的时机向尼赫鲁、艾森豪威尔等人发出了和平信件。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莫斯科。

我们最近重新考虑的一个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是，南斯拉夫周围所有的邻国都同我们的关系不好。由于我们拒绝签署《十二国党宣言》，某些邻国的大使馆反对南斯拉夫的议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不仅在欧洲，在世界上很可能也没有什么地方象我们巴尔干那样，在那么小的地区，利益如此错综复杂，相邻国家的方针如此截然相反。异国的占领和各大强国统治巴尔干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段漫长的时期已成为历史。还没有过时的是各大强国对巴尔干小国的支配。今天各大强国对这个地区的支配是通过现代的形式，通过在一个巴尔干国家集团里“建设社会主义”，或者通过在另一个巴尔干国家集团里“维护自由世界”而进行的。今天，这两个国家集团从属于截然相反的、看来是不可调和的几个大强国的军事集团。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巴尔干国家，则不从属于这些军事集团，采取独立的立场。勿庸谈论的是，所有巴尔干人民的美好未来，毫无区别地在于从各大强国的控制下获得解放，所有国家都置身于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合作和友谊之中，这是过去和现在全体巴尔干人民的最优秀的代表一向追求的。

我不想再继续记下去了，因为不然又变成了关于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史的“家庭作业”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几天之内我就要出院了。由于我还躺在病床上，不能注视和记录现实问题，我想在这里记一些同赫鲁晓夫会见时的谈话，这种

谈话很多。无论是在恶劣的形势下谈的，还是在别的较为顺利的形势下谈的，我们之间的情绪随着不同场合而变化，并由于赫鲁晓夫的态度在我们之间形成了完全非官方的气氛。他善于用一种他所特有的生动的方式来讲话，使他变得饶有风趣，机智灵敏。但是我想在这里选记一些他的讲话，这些讲话不仅象故事那样有趣，而且还能帮助了解他的复杂多变的个性。

七月五日他对我谈到苏联最高层发生严重政治危机时主席团中一些人的表现时，他一度谈到伏罗希洛夫的表现，于是他叙述了“老头子”的如下一些事：

伏罗希洛夫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负责接受外国新任驻苏大使的国书。因此在大约两年前，他接受了伊朗大使安萨里博士的国书，后者是由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派驻苏联的大使。安萨里博士的俄语讲得很流利，在举行这个仪式时，在他和伏罗希洛夫之间不需要翻译。

按照礼仪的规定，由新任大使首先讲话。伊朗大使也这样做了，他开始转达伊朗国王本人对伏罗希洛夫的口信和问候。这期间，伊朗大使几次使用了陛下这个词，意思是指自己的君主，以他的名义在讲话。我不知道是在第几次讲到“陛下”的时候，伏罗希洛夫象从梦中突然清醒了一样向大使问道：“什么，什么，你是否提到了皇帝陛下？”吃惊的伊朗大使肯定了这一点，并说明“陛下”是指的谁，伏罗希洛夫这时接着说：“在我们俄国也有过沙皇‘陛下’，那是个狗屎堆，下流坯，因此我们把他的脑袋砍了，你没看见在此之后创造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

伊朗大使惊愕万分，在场的俄国外交人员力图补救伏罗希洛夫所造成的这种局面，但已无法补救。赫鲁晓夫对我说，最后商定，这件事绝对不向任何人讲。俄国人理由不讲，因为这可以免得败坏自己，也就是败坏自己国家元首的声誉；伊朗大使也有理由

不对任何人讲，以便不让国王知道，以免国王把他从莫斯科的职位上召回，并导致两个邻国之间关系出现难以预料的复杂情况。

伏罗希洛夫和伊朗大使之间的这场对话，关于“王中之王”的代表向苏联国家元首递交国书之后的隆重时刻出现的这一场面和谈话，即便不是由象赫鲁晓夫这样机智的人讲述，其本身也是令人难以忘却的。我没有把这件事报告贝尔格莱德，因为我敢肯定，事情在那里肯定会广为传播，而苏联的机关又会把这向莫斯科报告，那只会给在莫斯科的我们带来麻烦。

* * *

这里我想记下赫鲁晓夫的一次讲话，它生动地涉及德国的划分，也即涉及“证明”不存在任何“德国问题”。同时这表明赫鲁晓夫在开玩笑中是不大加以选择的。

春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们曾就有关德国的某些现实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赫鲁晓夫问我是否听到了对阿登纳和德国问题的最新议论。我回答说没有听到，于是赫鲁晓夫向我叙述了最近在莫斯科盛传的下面这个笑话：阿登纳喜欢代表两个德国讲话，并向欧洲提出德国问题，似乎我们不接受阿登纳的主张我们就活不下去。然而阿登纳却没有把事态真正反映清楚，他本人就证明他所说的是不对的。赫鲁晓夫说，如果你把阿登纳剥光了，那么你从后面看他，就会清楚地发现德国分成两部分。赫鲁晓夫说，如果你要从前面看阿登纳，那也同样清楚，“德国问题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

* * *

去年六月铁托访苏前夕，赫鲁晓夫向我解释斯大林时期在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上，他们那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当时对我国所写的、所说的全是最坏的。尽管对南斯拉夫的指责是捏造的，由于一天天地重复，人民就开始相信了。赫鲁晓夫说，情况就象那

些阿訇一样，他们相信了他们自己所捏造的谎言。随后赫鲁晓夫说，一九五五年，他在南斯拉夫时同样向铁托说过这番话，并问我当时是否在场。我的答复是否定的，对此他似乎感到满意，因为这将使他有朝一日重新叙述显然他十分欣赏的有关“劝谕”的笑话。赫鲁晓夫向我述说了以下的故事：

在俄国的中亚地区，有一次一个阿訇从城里经过，他想要欺骗路上遇到的人们。他开始对他们说，在城市的另一边在向人民无偿地分发抓饭（穆斯林所喜爱的食物）。阿訇一路上遇到人，就这样重复说，消息很快从城市的一头传到了另一头。突然之间人们都向阿訇跑来，并且边跑边告诉他，在城市的另一头在无偿地分发抓饭。由于一再有人这么说，阿訇转过身来，撩起长袍使它不致妨碍他，并自言自语地说：可能真的在分发抓饭！于是和大家一起向“分发抓饭的地方”跑去。赫鲁晓夫结束了这个故事。他说，在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时期，在我们苏联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最严重的指责是斯大林想出来的，随后这些谎言在全国广泛传播，并且不间断地反复了多年，结果那些捏造了对南斯拉夫的虚假指责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些谎言了。

如果能用这样的和类似的故事和笑话来说明一九四八年以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我想很少有谁能象赫鲁晓夫这样成功。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表现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的故事，无疑比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要亲近得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次同赫鲁晓夫进行的对我不利的谈话。在我看来，这件事对于赫鲁晓夫是很典型的、很成功的，虽然事情对我不利的，但我还是不能不多次向同志们讲述。

很早以前，《真理报》发表过一篇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特别

长的文章。那些天苏共中央正在开会，因此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实际上具有官方的性质，并象是一份宣言或者党的决议。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点名，不需要是任何意识形态问题或苏联外交政策的专家，立即就可以看出这是对南斯拉夫的严重攻击。文章还谴责“民族共产主义”，谴责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和“得到帝国主义贷款”的人，等等。这样，就连那些最不敏感的读者也不难看出这是指谁。

那天晚上，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遇见了赫鲁晓夫。在交谈中我对他说，这篇不署名的、因此更具有官方性质的、企图损害南斯拉夫名誉的文章使我感到惊讶，这只能有损于双方，使我们的关系趋于紧张，谁需要这样的文章，现在南斯拉夫人将对这种攻击做出回答，等等。赫鲁晓夫胸有成竹地问道：你说的是哪篇文章？我回答他说，是指《真理报》的长篇文章。赫鲁晓夫继续说：谁也没有在那里提到南斯拉夫，我们写的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而你们却说是攻击南斯拉夫。我继续说，无论俄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知道这是指南斯拉夫，以便说明苏联的这一明显的策略。为了加强自己的论据，赫鲁晓夫笑着向我讲述了以下故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群俄国大学生在所乘的火车上谈论政治问题。这批大学生是反对当局的，他们大声地用最坏的字眼来称呼尼古拉二世，例如：杀人犯、吸血鬼、笨蛋，等等。这些都被暗探局的特务听到了。他们抓住了这样议论沙皇的一位大学生，并且逮捕了他。当他们把这位大学生带到审讯官面前时，他竭力为自己辩护说，他使用这些字眼时，并不是指沙皇尼古拉，而是指威廉二世皇帝。对此，审讯官回答他说：只要你们说皇帝是白痴、杀人犯、混蛋等等，这只能是沙皇尼古拉，不会是别人。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你们也是这样。《真理报》攻击民族共产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而你们说：我们为什么攻击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大声笑了起

来，我不但没有能继续指责《真理报》的文章，反而同赫鲁晓夫一起笑了起来，让他的故事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我向他承认笑话的水平很高，但是如果《真理报》没有发表这样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宣言，那就更好了。

* * *

有一次，虽然我没有问赫鲁晓夫，他却向我提起了三十年代初他们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遇到了重大的困难。工厂和矿山发生了罢工，由于农村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赫鲁晓夫叙述说，在许多大工厂举行罢工的严重形势下，最杰出的中央委员们来到工人中间，企图扭转当时的局面。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工人最喜爱的布尔什维克之一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也从莫斯科带着这样的使命到一个大工厂里去了。气氛十分紧张，困难很大，工人的不满情绪和匮乏状况十分严重，莫斯科很担心加里宁如何对付工人。当时召开了罢工工人大会，工厂最大的厂房里挤满了人。首先由支持罢工的人发言。其中一个人公开攻击加里宁说，他在吃了一顿美餐以后来给他们讲故事，而他们工人们连面包都没的吃。这个工人发表了一长篇讲话，使气氛更加恶化了。

加里宁要求讲话。首先他说，在他前面发言的人猜对了，他加里宁今天吃了一顿少见的美餐，并且还有头等的葡萄酒，这是不能抱怨的。由于那个工人在讲话中提到他有七个孩子，加里宁问他这些孩子是否都是他的。这就已经改变了工人中的紧张气氛。那位罢工工人回答加里宁说，当然所有的孩子都是他的，怎么有人居然敢怀疑这一点。接着，加里宁当着几千人的面对这个工人说：你既然生了这么多孩子，那么你就必须养活他们，可是你的举动好象你有义务继续生孩子，却要国家来替你养活他们，而你却在这里闹罢工。赫鲁晓夫说，加里宁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最

后，他受到了那些在几小时前怀有敌意地迎接他的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的印象是，赫鲁晓夫之所以回忆起几十年前的这件事，首先在于加里宁所运用的“论据”以及他对罢工工人谈话的方式，因为我认为，这种方式同赫鲁晓夫自己的作为非常相近。

* * *

赫鲁晓夫曾多次表示过，俄罗斯有关哥萨克的那部分历史强烈地吸引了他，他很了解他们的历史。他往往愿意讲一个年代久远的有趣的故事，如果能为这个故事在当前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就更其如此了。去年铁托正式访问苏联期间，曾到俄罗斯南方的顿河和库班地区去，同赫鲁晓夫以及我们其他人一起在那里的一个哥萨克农村停留过。赫鲁晓夫感到这个环境再好不过了，并告诉我们昔日的哥萨克的后代还保留了哪些特点。当时赫鲁晓夫表示他还会唱很多哥萨克歌曲。当我们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的这些地区时，赫鲁晓夫唱了几支古老的歌曲，唱得很好。不论我们在参观工厂还是参观农村也即集体农庄时，每当赫鲁晓夫和“人民”在一起时，就表现出这样的情绪，而每当该他同我们正式会谈时，这种情绪一般就消失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我出院了，苏联的医生们尽量给我以帮助，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大使馆的同志们：公使衔参赞兹冯科·彼里希奇、参赞博若维奇、秘书迪兹达雷维奇、博日奇和彼利仓、武官萨沃·波波维奇、我的秘书博若·弗兰克等人到家里来看我，和他们到医院里看望我时一样，我们谈了一些工作，因为在“年底以前”我还不能上班，而这总共还有四天时间。

苏联方面对待我国继续玩弄这里所奉行的两面手法：苏联官

方机构对待自己的多数南斯拉夫伙伴的态度是正常的，公事公办的，并同他们办理着日常事务。在某些方面我们和苏联的代表还在制订未来的计划，而不提十一月会议和《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以后加深的意识形态和党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各种途径，继续举办内部宣传活动、内部通报等，从各方面败坏南斯拉夫的声誉。他们象最近我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时那样谈论南斯拉夫，把我们的党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甚至在一定的场合还说成是反苏的。

苏联政府不能够向自己的公众客观地反映南斯拉夫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时。《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把不久前在南斯拉夫的倡议下同美国政府达成的关于停止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援助的协定，向苏联读者报道成似乎是由美国倡议的，似乎是美国作出决定停止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而不是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协议停止这项援助的。根据苏联报纸所编辑和发表的消息，使人得到的印象是，南斯拉夫希望今后仍能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政府停止了这项援助！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当最后记录今年南苏关系的状况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夸耀说取得了某种特别有利的结果。看来，不用说过去十年，就在过去这两年中，在我们之间也是冲突多于友谊和合作。我们曾经希望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达成正常化协议以后，南苏关于会按照另一种方式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俄国人把南苏关系不好的责任归咎于我们，而我们则归咎于俄国人，因为我们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看来不幸的是，苏联的政策也没有任何变化，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正是由于我们和他们的政策都没有

任何变化，因此就发生了冲突。

最近两年苏南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尽管在实行政策的方法和手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苏联对于南斯拉夫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这是我们在过去所熟知的。

我曾对赫鲁晓夫说过，在我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期，我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的主要错误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我们本来的面貌承认我们，而是总想把南斯拉夫搞成适合他们口味的另一个样子的国家，把我们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当我们拒绝签署《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以后，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同苏联冲突的基本原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情况很可能还是这样。只要苏联继续保持自己的阵营政策，只要南斯拉夫继续象迄今所做的那样反对这个政策，我们两国之间就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

这不仅涉及独立的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方针，同样也涉及对内政策，涉及不依苏联和阵营的社会主义模式为转移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差别，在对内政策方面可能比在对外政策方面还要大。在我看来，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方面自行其事并不那么妨碍俄国人，虽然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而他们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南斯拉夫独立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常常是同苏联的经验不同的。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方面，即各国和平共处的方针方面，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在我看来，苏联的提法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俄国人在谈这个问题时，总是严格注意强调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就意味着，这个政策对于社会制度相同的或相似的国家，例如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不适用的。在同赫鲁晓夫的几次交谈中，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没有权利”实行这个政策，因为那里是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适用

的是另外的原则，不同于例如印度、伊朗和土耳其！只要俄国人还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放弃他们的阵营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和平共处原则对这些国家是不适用的。

由于存在使苏南发生磨擦的这样那样一些差别，现在对南苏关系的发展是难以作出预料的。目前国际关系比较顺利地发展和逐渐摆脱十来年在这种关系中占上风的冷战状态的现象，如果得到加强和发展，那么就越会造成不适合于苏联奉行把南斯拉夫纳入阵营的政策的气候。反之，如果越是陷入冷战关系，苏联这种阵营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影响就会越大。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即斯大林时期，苏联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最坚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莫斯科。

《真理报》在一周前就为斯大林诞辰提供了相当大的版面，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在约·维·斯大林的故乡》的文章。文章是由《真理报》记者署名的，发自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哥里城。据塔斯社报道，《共青团真理报》也发表了文章，题为《在约·维·斯大林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由此而使人得出结论，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明确作了规定，由谁为斯大林诞辰写文章和如何写、写多少。这两篇关于斯大林诞辰的文章，在这几天苏联报纸发表的文章中不是最长的，但是无论如何是最引人注目的。

现在关于斯大林的文章仍然承认他的功绩，对他本人也仍然是尊敬的。《真理报》又称斯大林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杰出战士，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报道接着说，在斯大林故乡哥里城，陈列有数百件关于“约·维·斯大林为共产主义而生活和战斗”的展品的博物馆隆重开幕。

我们和其他人，都对《真理报》和其他各报去年当莫洛托夫、马

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处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对斯大林诞辰的报道做了比较。当时没有关于斯大林的这类文章。鉴于今年同去年的政治时机不同，就出现了看起来十分荒诞的现象：当苏联最高层中存在斯大林分子时，没有歌颂斯大林，但是，当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清除了苏联领导中的反党的保守的斯大林主义集团而成为苏联无可争辩的领袖时，却写文章歌颂他。

这几天，我收到苏联政府的邀请，请我和米什卡一起去参加明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晚会。我相信赫鲁晓夫不会象一年前那样发表那样的新年祝词了，当时他说，“对于自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而感到自豪”，当时他以这样一番话来向我们祝贺新年。我希望今年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国家的大使们不会象去年那样抵制苏联政府的新年招待会，在那之后，冷战扩大到了礼宾方面，对东西方关系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有理由指望，苏联政府所安排的这一晚会，至少在我们送旧迎新的时刻，这一次是会在比去年为好的气氛中度过的。

苏联继续展开“和平攻势”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八年新年晚会。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是和解性的。特地为艾森豪威尔祝酒。赫鲁晓夫在明斯克讲话。苏联的洲际火箭、人造卫星和苏联的“和平攻势”。美国发射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同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莫斯科。

象去年一样，苏联政府今年也在克里姆林宫组织了新年晚会。不过，与去年不同，那时晚会是为进一步加剧冷战服务的，今年气氛变好了，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是节日般的，友好的。赫鲁晓夫四次祝酒：为外交代表祝酒，特别着重提出为代表过去反希特勒同盟国家的大使祝酒；接着为苏联军队祝酒；然后专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祝酒；最后为苏联共产党，为苏联工人阶级，人民知识分子，集体农庄庄员和青年祝酒。

赫鲁晓夫的全部祝酒词对西方代表都是颇为和解性的，特别是谈到反希特勒同盟的那部分更是如此。赫鲁晓夫说，“遗憾的是，在我们共同打败希特勒之后的第二天这个同盟便散伙了”。这里有好长时间没有提反希特勒同盟了。赫鲁晓夫开了先例，可是他马上便单独排出美国来谈，他讲话的绝大部分谈的是美国，讲话表明苏联关心的是同美国人“两家”一起来解决世界的基本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认为：苏美只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才会于大家有利，而不

会损害第三国。赫鲁晓夫讲话结束时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致意。为此，美国大使汤普森穿过大厅，走到主席台桌边向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致意。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唯一被特别提到的一人，苏联方面还为他祝了酒，从而着重说明这里对苏美取得谅解的兴趣。对于这样的方针，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大国、强国，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国家都是侧目相视的。

正如赫鲁晓夫没有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他甚至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在反西方的意义上特别赞扬亚非的中立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团团团长、瑞典大使苏利曼对赫鲁晓夫致了答词。他讲话的调门同赫鲁晓夫的一样。很可能两人的讲话是事先商量好的。在莫斯科任职时间较长的某些西方国家的大使对我说：这是从他们来这里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最成功的一次招待会。

根据赫鲁晓夫的态度，可以说，苏联领导侧重于努力以某种方式摆脱冷战，而不是在冷战中取胜。只有象约·福·杜勒斯、阿登纳这样的冷战政策最狂热的支持者，以及苏联方面的冷战拥护者才会有要在冷战中“取胜”的野心。赫鲁晓夫前天晚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里相信，不可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因此他在几次讲话中都谈到苏联领导所设想的摆脱冷战的途径。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莫斯科。

应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的要求，我拜会了他。他交给了我一份《苏联政府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此建议将提交给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政府以及瑞士政府。他还交给了我一份苏联政府致艾森豪威尔的又一封信。这封信象某种“附件”，目的在于解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的苏联建议。这两个外交文件都很长，各有十五页，过一两天将在莫斯科发表。

苏联上述函件是苏联政府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十二月巴黎会议的答复，同时还建议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和华沙条约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建议两个军事集团所有成员国的会议将于两、三个月内在日内瓦召开。苏联也不反对这些国家中的少数国家的代表举行小范围的最高级会议。苏联政府在现阶段认为，由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军事集团的国家，如印度、阿富汗、埃及、南斯拉夫、瑞典和奥地利参加这样一次会议是有益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莫斯科。

意大利“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在这里访问，代表团同葛罗米柯就意大利感兴趣的各种迫切问题进行了会谈。该委员会成员中也有左翼政党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们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有一个印象：当葛罗米柯同意大利人谈及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问题时，当他把阿尔巴尼亚——华沙条约成员国中离意大利最近的成员国和某种领土抗衡力——同意大利对立时，葛罗米柯似乎并不是特别成功的。葛罗米柯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好象南斯拉夫不在这个地区似的，好象讨论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建立和平区它不是某种因素似的。在他看来，这只与“大西洋集团”方面的意大利，“阵营”方面的阿尔巴尼亚才有关。

他们还谈了苏联同梵蒂冈的关系。这次苏联方面没有象斯大林在战争时期那样，当有人向他谈到梵蒂冈在世界的影响时，他提出“梵蒂冈有多少个师”的问题。葛罗米柯谈到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制订苏联和梵蒂冈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政治纲领，例如防止核武器和维护和平。

实际上向意大利人提出了意大利的中立问题，作为“补偿”，提出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也处于类似的位置。苏联方面企图这样策划：似乎是要在苏联西部边界周围——从埃

及到最北边建立某个中立地带。引人注目的是，苏联政府避免同我们会谈怎样才能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建立“和平区”，虽然南斯拉夫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国家，地中海沿岸国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给了苏联最近的东西方谈判计划以官方的和公开的支持。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莫斯科已收到艾森豪威尔对布尔加宁一月九日信件的答复。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是否定的。俄国人在报纸上只公布了美国复信中的几句话。俄国人对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以及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态度，大概他们的答复差不多。苏联方面加紧搞这么多的外交往来信件，致使这里可以象连载小说一样在报纸上发表。苏联只发表艾森豪威尔复信中个别几句话使这里的美国大使不快，因为这样来向苏联公众介绍美国的答复是不确切的。汤普森大使指责俄国人只字不发表美国复信中断然声明美国决不当侵略者，也不帮助自己的任何盟国进行侵略的话。乍一看，苏联方面应当成为似乎它是双倍地“证明”了拥护东西方谈判的伙伴：这里公布了苏联的建议举行这样的谈判信函，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和西方其他人却不接受苏联的建议。简单的算计是要向读者作这样的报道的。苏联报纸的读者表明，事实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证实”，苏联是主张和平的，而对方则不愿奉行这样的政策。

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报纸，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苏联报纸发表了艾森豪威尔对布尔加宁第二封信的复信，我们的报纸刊登这条不确切的新闻很不好，我们的报纸编辑部没有就此事询问过自己驻莫斯科的记者。

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大使在向布尔加宁递交了上述文件原

件的第二天就把本国政府首脑的复信副本送给了我。迄今为止这里的西方代表从未采取过类似的行动。这样做很可能是由于苏联报纸采取了上述做法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苏联报纸很少报道苏加诺正式访问南斯拉夫的消息，虽然南斯拉夫是除苏联外，苏加诺迄今访问过的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此行是在印度尼西亚困难的日子进行的。这里仍在起作用的老规矩是：有关南斯拉夫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威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新闻，一概不予发表。苏联报纸不攻击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主要是不予理睬，不管事情是否同南斯拉夫有关，不管是南斯拉夫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 * *

经过多年以后我总算有机会向我们驻地拉那公使馆推荐一位阿尔巴尼亚高级官员，建议设法同他建立尽量得体的联系，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位官员便是阿尔巴尼亚迄今为止驻苏大使普里夫蒂，他将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南阿关系也将由他管。普里夫蒂在我驻莫斯科期间对我们的态度是得体的。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向贝尔格莱德报告：我们开始碰到待南斯拉夫不坏的阿尔巴尼亚官方代表。象在莫斯科我们同苏联存在的这种关系会不会也在阿尔巴尼亚继续呢，我没有把握，不过，我想值得试试。

* * *

蒙古大使巴特交给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南共联盟派代表团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代表大会订三月十七日开幕，历时一周左右。他们规定，南共联盟代表团由两名成员组成，估计我们会出席。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中某个国家第一次邀请南共联盟派代表出席它的党代表大会，而

且这件事发生在南斯拉夫拒绝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之后不过12个月。我将此事报告了贝尔格莱德，报告了弗拉霍维奇同志。我事先肯定，国内的同志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邀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发表讲话之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苏联农业的决议。农业始终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日程上。目前这个决议提出了种种要求，要苏联的农村生产搞得更多、快、好、省，而且说，在苏联农业目前的组织形式下这一切是应当、必须和可能实现的。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讲话中却相反，他预告，要撤销迄今为止的那种形式的机器拖拉机站。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发表还不到一周时间，我认为，它已开始失去意义了，因为赫鲁晓夫在自己的讲话中走得比那里所写的要远得多。将试行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国营农场迄今为止的对生产作计划的方式，将对工资核算制度实行新办法，预料对不完成计划将采取经济措施，将扩大集体农庄庄员大会的权利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方面，“一长制”的原则以及国家的无所不能的作用依然有效。

赫鲁晓夫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的讲话答复了西方对布尔加宁的信件最近的一封复函。他猛烈攻击美国和西德，把美国和西德同其他西方国家分开。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讲话拒绝了美国的某些谈判条件，而提出了过去的许多消极问题，这样一来，使他的讲话带有强烈的论战语调。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这样做，好象是苏联方面要在此时迫使西方在俄国建议的基础上谈判；俄国人生西方的气是因为西方未能这么办。好象只有一方迫使另一方谈判，才能保障世界和平似的。

在印度大使的招待会上，我同赫鲁晓夫谈了话。我在回答他

的问题时对他讲，我可以断定，他的讲话已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论，很可能西方反对谈判的集团将利用他在明斯克的讲话来进一步破坏气氛。赫鲁晓夫说，应当公开讲清楚今天在国际关系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双方使用的尖刻用词很快就会缓和下来，被置之一旁，而事态将表明，各方的立场如何，东西方之间今天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米高扬参加了这次谈话，他也一再说赫鲁晓夫的做法正确。关于宗教的那番话也是应当向美国人和其他人讲明的，因为他们象许多年以前一样，今天仍在这些问题上诽谤苏联。

米高扬特别批评了美国的立场，说美国幻想可以改变已在东欧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且这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不光是同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有关。赫鲁晓夫说，承认欧洲的现状是举行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这一点西方人一定要弄清楚。我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整个这一时期这一现状一直存在，并且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今天才能举行任何谈判，不过，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要求西方正式承认现状，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推迟谈判。但是，如果谈判成功，那只会意味着西方更加肯定现状，虽然谁都不这么提。赫鲁晓夫很支持我的这些看法。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弗尔科·契尔文科夫突然从保加利亚来到这里。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在莫斯科阵营有什么活动，而看来是困难迫使保加利亚人向“老大哥”来要求提供经济援助。据现在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的情况，俄国人过去给了他们援助。不久前，阵营里通过了相互贸易新章程。新章程的出发点是：在贸易中采用世界价格。这使保加利亚很吃亏，因为它再也不能根据有利条件在

这里，也不能在阵营的其他地方购买工业品了。而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很不稳定，这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利的经济条件。

保加利亚人甚至让这里同意接受他们额外数量的冬季新鲜蔬菜，因为俄国的新鲜蔬菜从来都不够。看来将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让保加利亚向俄国人输出自己的园艺工人，以便在园艺方面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因为在这方面保加利亚人是呱呱叫的。

话又说回来，保加利亚自认为是比阵营其它国家还要忠实于俄国的盟国。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援引事实说，迄今俄国人是如何把他们两次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首先是从土耳其，后来又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了他们。这里的保加利亚大使每当想强调指出他们同俄国人的关系是如何不可分割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确有把握，俄国人还会第三次把他们从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保加利亚不会再成为任何人的奴隶，或者保加利亚将同俄国其他盟国一起为保卫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他们只字不提，因为，好象这么一提，就会缩小苏联解放者的作用似的。俄国人方面则把保加利亚当成苏联最忠实可靠的盟国，而对于保加利亚的经济困难，例如这一次的困难，解决起来就好象是解决苏联国内问题似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助理帕托利切夫昨晚在我这儿吃晚饭。我问他，他们同西方和其它国家关于东西方谈判的信件往来的情况，他回答说，现在不会举行任何会议和谈判，因为美国不准备谈。他说，美国在火箭武器方面的劣势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苏联。美国人现在不想在地位较弱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在苏联军队用洲际火箭装备起来之后，在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之后，达成任何协议都是对美国有损的。美国人现在将首先采取可能采取

的一切措施，重新建立已经被打乱的同苏联的力量对比，而不是现在达成协议。这是一位苏联代表就这些问题同我进行的一次少有的坦率交谈。

接着，帕托利切夫谈到西欧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一些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谈到国际局势的时候，这是苏联爱谈的一个题目。显然，莫斯科把许多赌注都押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其次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最后是所有这些西欧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矛盾这张牌上。时至今日这里还念念不忘这一旧有的刻板公式，尽管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西欧国家之间矛盾的性质和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与对待艾森豪威尔的答复不同，帕托利切夫称赞了尼赫鲁的答复。俄国人特别欣赏的是尼赫鲁复信中提出的只由美苏两家，而不是由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的所有成员国举行会谈的主张。这次谈话证实：苏联领导首先期望的是同美国直接会谈和达成协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莫斯科。

当南斯拉夫领导人或其他外国政治家不同意俄国人的看法时，苏联报刊就从他们的讲话中摘登只言片语，报道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少有哪国的报纸象苏联报纸这么干的。因此不能到苏联外交部去抗议报纸歪曲我们领导人的讲话的意思，因为外交部会回答说，苏联报纸只不过是发表摘自南斯拉夫报纸上的材料，所以我们应当生自己报纸的气，《真理报》和《消息报》便是这样对待铁托最近一次讲话的。俄国人在这里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翻译不确切，挑选符合他们口味的模棱两可的词句在内。例如，铁托说，南斯拉夫正在发奋努力尽早“自力更生”，而俄国人则把这句话翻译成好象铁托说南斯拉夫应当尽早“独立自主”。而在上下文中，还报道关于美国停止武器方面的军援的话，这样一来，事情就得到了

完全假的意思了，似乎南斯拉夫直到现在都不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别人，正是铁托本人在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大会上承认这一点的！

* * *

克里姆林宫一月二十九日设宴招待人数不多的埃及经济代表团（团长是埃及工业部长西德基）。我见到了马·萨布罗夫。萨布罗夫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一起在去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从政治上被打倒了。萨布罗夫目前在党内不担任任何职务，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作。一个曾经属于苏联最高领导、尔后在政治上被打倒并被称之为“反党的”人竟然出现在苏联领导为招待外宾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新闻。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人连命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参加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了。萨布罗夫站在一旁，站在离苏联领导人、自己过去的同事稍远的地方。在整个晚宴进行过程中，外国人当中只有挪威大使、奥地利大使和我走到他身边。我们谈了苏联和埃及的经济关系，我没有提任何别的问题。萨布罗夫竭力作出一切如常的样子，好象不久前的过去他并没有遭遇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按照苏联礼宾司的要求，外交团“列队”欢迎埃及农业^①部长，这样的欢迎仪式在这里是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在招待会上的态度表明苏联对埃及，即对近东和阿拉伯国家有莫大的兴趣。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今天比一年或两年前大得无可比拟，且不说同更早的年代相比了。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莫斯科。

俄国人最近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项文化科学合作协定。《消息

^① 原文如此，此处疑为“工业”之误。——译者

报》发表了协定全文。艾森豪威尔和布尔加宁的谈话强调了协定的重要政治意义。

除了驱使俄国人同美国人进行接触和达成谅解的一般政治动机以外，俄国人通过签订这项协定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美国的兴趣更多地在于设法创造某些可能条件使苏联公众能够经常了解美国的成就。美国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苏联的以下领域：电台、电影、电视以及在苏联出售俄文版《美国》杂志。俄国人一方面竭力想达成协定，同时又尽量妥善地防范美国的这种兴趣。例如，美国人在协定签订后便立即向俄国人提出，卖给他们大约三十部美国影片。《美国》杂志的销售问题尚未解决，因为美国人不满意迄今的办法：杂志到不了老百姓的手里。

鉴于协定是在赫鲁晓夫明斯克讲话（讲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的是实力）之后发表的，苏联人士中更加相信，实力不是达成这样的协议的障碍，而是相反。这里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对协定满意的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不满意的是美国的某些盟国。俄国的盟国感到高兴或者感到不高兴，没有人去注意，也不为人所考虑。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莫斯科。

在罗马尼亚大使馆昨天的招待会上，我同赫鲁晓夫谈起了美国首次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这件事。美国这颗人造卫星使俄国人感到意外和沮丧。我刚来到招待会上，刚在存衣室放下大衣，便碰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格奥尔加泽，他问我是否听到了“令人不愉快的消息”，美国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尽管俄国人估计到他们不可能成为长期享有这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唯一国家，但是他们却未料到美国人会这么快就赶上他们。

我发现赫鲁晓夫情绪不佳。可以看出，他也感到意外和恼怒。俄国人的沮丧是自作自受。他们把自己吹得太过份了，说他们在

火箭技术方面是世界第一，他们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遥遥领先。鉴于探索宇宙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可以说，俄国人把东西方关系（苏联给西方国家的信函）过多地置于这一基础了。我认为，可以有根据地说，俄国人现在成了自己四个月前宣传的受害者，他们那样做的结果只不过加强了美国上述成就在苏联公众和苏联领导中引起的政治和心理效果。

为了宽慰赫鲁晓夫，我说，人们本来可能以为美国会更早一些发射人造卫星，美国发射晚了已经使它在世界上的朋友感到意外，感到不高兴，再说别的发达国家也很可能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与出席招待会的俄国人和赫鲁晓夫不同，我的态度就好像对美国的成就无动于衷似的。赫鲁晓夫还是情绪不佳，脸色阴沉，他对我说，美国人的人造卫星用的不是俄国拥有的那种弹道火箭发射的，而用的是某种别的、差劲的火箭发射的。接着赫鲁晓夫向我解释差距何在，而这种差距是有利于苏联的。

至于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赫鲁晓夫是以贬低的口吻谈的。赫鲁晓夫说，几乎只等于苏联卫星的重量的三十分之一，只有柠檬那么大。赫鲁晓夫紧握拳头接着说，“我们明天要给他们看看，我们要发射重一千公斤的人造卫星。”

我说，苏联可以发射这么重的新的人造卫星无疑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不过，在我看来，最好是现在让美国这个“柠檬”也围绕地球转，好让我们看看它转得怎么样，而我倒是要向艾森豪威尔、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工人发了贺电，祝贺美国发射人造卫星。

我提醒赫鲁晓夫注意对这一事件的最初的一些评论，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评论，评论认为在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之后，它可以同苏联谈判了，因为它不再感到处于劣势了。

我认为，我说的这些话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某种印象；特别是当我向他建议从这里向艾森豪威尔发一份贺电时，他显得活跃

起来。

这里现在没有为同西方谈判继续作准备，而提上日程的是国内的事，选举最高苏维埃和选举苏联新政府。这两件事并非象过去一样只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因为我们已获悉，最高苏维埃的组成将有重大变动，将年轻化。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莫斯科。

到二月八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被提名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如下：提名赫鲁晓夫的有一百一十个选区，提名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的分别有四十个选区，基里钦科——二十七选区，苏斯洛夫——二十一个选区，什维尔尼克——十七个选区，福尔采娃——十五个选区，阿里斯托夫、伊格纳托夫和勃列日涅夫——各有十三个选区，库西宁——十一个选区，穆希金诺夫——十个选区。最后，各有两三个选区提名波斯别洛夫、柯西金和别利亚耶夫为候选人。提名布尔加宁为候选人的总共有八个选区。提名仍在继续。最后，将由中央委员会委员决定接受哪里的提名，余下的候选名额分配给上述人的替补者，这些人也是要保证选上的。这里就是这样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苏联公民的选举权的，他们在好些个选区提名领导人为候选人，以此表明各个领导人的地位。这一切都是事先计算好的，精心确定的。苏联领导成员不仅无须竞选，而且由他选择向谁表示垂青，并接受委托书。

一些苏联官员对我说，最高苏维埃目前的组成将发生变化，将主要由领导党和国家的基层工作的人组成，而他们大多是新人，他们除了现在的职位外，还将在最高苏维埃占有席位。就未来的最高苏维埃的组成而言，赫鲁晓夫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苏联新政府或者说它的总理的选举，因为布尔加宁的地位不仅很弱，而且是维持不了的，在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

维奇反党集团之后的整个这一段时间里，俄国全国都在等待撤换他。

* * *

驻这里的大多数西方和东方的代表都反对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苏联官员奉命不对此事表态，从而表示持保留态度。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现在可以更进一步，不要非效法俄国人不可，而且他们同俄国人已商量好，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态提出批评。他们说在同埃及联合的招牌下，叙利亚会失去独立，提醒人们注意反动的、不平等的联合宪法，谴责取缔政党的做法。他们说，从现在起纳赛尔不仅要提名以他为首的联合政府，而且还要组织议会。这里还举出别的类似的理由来反对这次合并，认为这样做丝毫不能证实这是加强阿拉伯的团结。他们预料，现在埃及同叙利亚之间的矛盾将加剧，在两国关系中将出现迄今没有过的新困难。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莫斯科。

贝尔格莱德通知我：将邀请苏联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俄国人发出邀请。这一切到底会怎么样，尚不清楚，因为，别的不说，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通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新纲领，而这一纲领已遭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谴责。

二月十五日星期六，我要求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二月十七日星期日在中委大楼接见了我们。

我把我们中央关于我们不同意，即不出席为出版各国共产党理论机关刊物而订于三月七日至八日在布拉格举行会议的信交给了他。我向他宣读了我们中央复信的俄译本。这一切总共只有几分钟时间。赫鲁晓夫说，他已经知道我们的答复，因为卡德尔已在最近设晚宴招待扎姆切夫斯基时把这些事通知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

大使(赫鲁晓夫顺便说他不清楚为什么要设这次晚宴;说或许是为了解释,为了缓和我们与苏共中央在理论机关刊物问题上的否定答复)。赫鲁晓夫告诉我,卡德尔就我们党代表大会向他们的大使讲了一些什么情况。我说,我们期待着苏共代表团的光临,赫鲁晓夫指出,尚未向他们发出邀请。我说,最近准备发出邀请,据我所知,尚未向任何一个党发出邀请,鉴于还有两个多月才举行代表大会,因此,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出。赫鲁晓夫没有说将如何对待我们的邀请。

在后来的交谈中提出了如下问题:

我问赫鲁晓夫是否可望东西方举行谈判?成功的希望如何?赫鲁晓夫说,今年大概将举行谈判。如果期望双方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不太大。西方不想达成这样的协议。苏联希望进行谈判,希望就各种问题达成协议,并认为这是今后进行协商的出发点。

我提到昨天看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简报上的一条消息,说美国准备在太平洋进行一系列新的核武器试验。美国人已宣布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为禁区。据说试验要从四月进行到八月。我发表了个人的看法:美国的这一决定将在全世界不受欢迎,而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会因进行这一系列试验而大大加强,正如美国要是不试验的话,它的军事实力也不会削弱一样。我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在目前形势下,正当人们期待东西方进行谈判,并把停止原子爆炸的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假若苏联声明在举行东西方会议之前自己方面不进行试验性的爆炸,那会大得人心。我问赫鲁晓夫的意见如何。

赫鲁晓夫说,他们准备放弃试验,条件是,别的国家也得这么做,苏联单方面放弃试验会使美国人占优势。赫鲁晓夫说,试验的目的主要是降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本,因为正在做到制造两三颗,

乃至更多的原子弹和氢弹，花费都一样。苏联从军事方面对新试验并不那么感兴趣，因为已断定十颗原子弹就足以摧毁英国了，何必搞四十颗呢？赫鲁晓夫一再说，试验原子弹意味着节约数十亿卢布，此外，如果苏联单方面放弃试验，那么，世人就会把这说成是软弱的表示，这样，苏联政府就会受到舆论的压力。

指望俄国人会接受停止核试验的建议，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以看出，除了原子试验爆炸的真正价值外，赫鲁晓夫对强弱的看法有一种很强烈的变态心理。

我们还提到了最高苏维埃选举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改组。赫鲁晓夫略加思索或者说迟疑片刻之后对我说，选举以后布尔加宁将被免去政府总理的职务。赫鲁晓夫说，主要原因是他去年六月的态度，此外，布尔加宁也不能胜任这一职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容让他，没有理由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赫鲁晓夫说，例如，目前同西方的信件来往，是由布尔加宁签署苏联的建议，这一切苏联和全世界都加以公布，人们在谈论什么“布尔加宁建议”，“布尔加宁政策”。这引起了苏联人的不快，人们说长道短，因为，布尔加宁担任苏联总理的职务干得怎么样，大家是清楚的。赫鲁晓夫说，最近这封（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三封信）署上布尔加宁名字的信，布尔加宁连看都没有看，因为他病了，疲劳了，没有上班。最高苏维埃将于四月初开会。赫鲁晓夫说，他认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将赞成撤换布尔加宁，中央委员会在最高苏维埃四月初开会前夕将对此作出决定，而在此以前，一切保持不变。

赫鲁晓夫提起伏罗希洛夫访问南斯拉夫的事。他说，是我们重新提起这件事的。他们现在同意。去年在布加勒斯特他们不同意伏罗希洛夫在六月全会之后不久就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去我们那里，在那次全会上伏罗希洛夫的表现不好。

我作为自己所关心的事顺便问起伏罗希洛夫进行访问身体吃

得消吗,在这种情况下日程总是排得很紧,很累人的。赫鲁晓夫理解了的意思,他说,伏罗希洛夫会吃得消的,还说“伏罗希洛夫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时起直到现在主要就搞些访问。”赫鲁晓夫说,伏罗希洛夫今后仍将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赫鲁晓夫说,“干吗我们要把他换掉?”“老家伙”本来就不干什么事;在目前,对于苏联来说,他保留原职比下台好。在领导中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可能扮演别的某种角色,他们曾经怂恿伏罗希洛夫,并把他争取过去了。赫鲁晓夫说,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相信,伏罗希洛夫在南斯拉夫将受到极其殷勤的接待,南斯拉夫将给伏罗希洛夫留下美好的印象。赫鲁晓夫开玩笑说,“伏罗希洛夫回来时就成了你们的代理人了”。

我未能直接问赫鲁晓夫谁将任政府新总理,因为要是我这样问的话,那就太过份了。即便这样,我在他们的选举和内部人事变动问题上已纠缠太多了。

赫鲁晓夫提到埃及和叙利亚合并问题,我们和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赫鲁晓夫满意地表示,他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态度完全一样,他是根据卡德尔前几天已把南斯拉夫的观点通知苏联大使作出上述判断的。赫鲁晓夫举出了合并的消极方面:纳赛尔不讲意识形态,没有经验,迄今全靠民族主义口号,而这是不够的,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进步的。第二,在政治方面埃及比叙利亚落后,反动,而叙利亚却屈从于埃及。假若纳赛尔使两国国内政治状况仍保持合并前的状况,那将是聪明的一着。

纳赛尔准备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说,纳赛尔建议四月或五月成行,届时赫鲁晓夫将同他进行坦率的会谈。赫鲁晓夫还谈到合并的某些积极方面,观点同我们的看法类似。他提到,“铁托向纳赛尔发贺电稍为急了点”,说他们中央委员会想保持沉默,待到二月二十一日叙利亚和埃及举行全民投票再说,不过最近他们发表

了持肯定态度的评论,准备在全民投票后发表自己的肯定态度(贺电)。(铁托同志的贺电对这里施加了压力,看来叙利亚和埃及也在这里进行了干预。赫鲁晓夫提到尼赫鲁的电报,不过,尼赫鲁的电报比起南斯拉夫方面的贺电来,他感到要容易接受些。)赫鲁晓夫最后说,他感到高兴的是,情况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并未协商,而且卡德尔举出的论点同他们在主席团会议上引用的论点是相同的。

在我们谈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有点担心,生怕代表大会可能出现消极的后果会对我们的关系,同时与此(意识形态问题)有关又对阵营中的普遍关系产生影响。虽然这里官方对我们的态度是符合赫鲁晓夫在十二月最高苏维埃的讲话的精神的。(我们没有在《十二国党宣言》上签字是件消极的事,但是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以前小了,希望这些分歧今后会完全消失)。人们感到,俄国人对于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带来什么这个问题上深有保留。这里采取观望的态度。

我请贝尔格莱德答复:是否大体同意我就苏联方面暂时停止核试验向赫鲁晓夫阐述的观点。要是认为我这样做走得太远了,我想,如果让俄国人了解到我是在特定情况下确实是代表我个人讲的,那么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同赫鲁晓夫谈话时的气氛是好的,跟往常一样。

第二次去蒙古

庆祝苏军建立四十周年。赫鲁晓夫重新穿上军装。
苏联恢复核试验。谈谈对苏友好协会。前往蒙古。
同莫洛托夫谈话。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昨晚举行了庆祝红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俄国人使这个日子过多地服从于当前的政治需要。由于俄国人在叙述过去事件时过多地掺进了符合他们现在需要的东西，历史就遭了难，被篡改了。昨晚他们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就是这么干的。俄国人没有必要贬低西方盟国对战胜法西斯的贡献，也没有必要夸大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苏联对打败法西斯的贡献最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无可争辩的。尽管如此，格列奇科元帅在《消息报》发表的文章中在谈到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反希特勒大同盟时却讲了下面一段话：

“对打败人类死敌——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在战争最后阶段作出贡献的有反希特勒同盟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

当这里说，例如，英国只是“在战争最后阶段”才对战胜法西斯作出了贡献，那么这只会引起英国和别的国家的愤慨，因为，人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当苏联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持中立态度，履行条约规定的对希特勒德国的义务时，英国在法国沦

陷后对希特勒德国单独作战了一年多时间。这里对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目前在各种国际问题上的态度感到不满，因此篡改了现代史。

这一切都与赫鲁晓夫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晚会上的讲话背道而驰，赫鲁晓夫的那次讲话是在一个半月之前，布尔加宁致西方各强国的第一和第二封信之间讲的。在这短短的期间，整个形式已向哪个方向“演变”，可以据此作出最好的评价。

在卢日尼基公园的体育馆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还爆出了一件人们未曾料到的新闻：赫鲁晓夫身着中将盛装来参加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中将军衔是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军队里获得的。我们在观礼台的座位相当远，无法看清赫鲁晓夫究竟是什么军衔。有人带了望远镜，当看到赫鲁晓夫并不象到会者开初传说的那样穿的是苏联元帅制服，大家松了一口气。大会结束时在签署了《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下跳起了“友谊”舞。没有南斯拉夫的国旗。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最近苏联又进行了一次好几百万当量的核爆炸。这次核爆炸是在苏联全国为庆祝红军建军四十周年而进行的盛大庆祝会那天进行的。俄国人没有宣布这次核爆炸，而核爆炸却是在苏联为准备同西方会谈，为保障和平而展开外交活动的时候进行的！在这次核爆炸之前，在布尔加宁致西方国家的两封信之间，苏联也进行了威力很大的核爆炸，而那两封信却建议：如何来改善国际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

跟美国人一样，俄国人把爆炸原子弹看得比他们互换爱好和平的信件要重得多。现在许多国家的公众都可以看到，只要东西方在互换信件的同时还进行新的核爆炸，并把这作为主要论据，这

些信件就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苏联政府就是这样来答复不光是美国——美国跟俄国人一样，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会谈——而且还有象日本国会议员那样的“开明派”，他们呼吁苏联暂时停止核试验。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莫斯科。

苏联领导作出决定：出席我们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们确定波斯别洛夫为代表苏联共产党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根据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地位来看，该代表团是中级的。波斯别洛夫属于这样一部分苏联领导人，他们在研究所里消磨日子，跟书本打交道，判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在斯大林时代，波斯别洛夫在政治上的地位比现在要高得多。我想起波斯别洛夫什么时候讲过，或者写过哪怕一句有利于南苏合作的话，即便是在讲南苏合作比今天更加吃得开的时候也罢。

* * *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问我：我是否得悉科涅夫元帅在苏军建军四十周年时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不愉快的事”。我说，我知道这篇文章，我提到，对这种“不愉快的事”南斯拉夫报纸三、四天前已发表过评论。这位捷克人说（竟眼不眨，脸不红），把南斯拉夫从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打败法西斯作出贡献的国家的名单上漏掉了，是他们报纸的“印刷错误”，他批评《红色权利报》编辑部，然后说，出现这样的“印刷错误”很令人不愉快，因此他才提到科涅夫元帅，因为给他造成了“不愉快”，但是他却不提南斯拉夫，实际上捷克人正是由于南斯拉夫才犯了这样的“印刷错误”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莫斯科。

去年年底莫斯科开始建立各国对苏“友好协会”^①。今年这项工作加快进行。一、二月份已建立了苏联对芬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以及匈牙利友好协会，并成立了建立苏印友好协会发起委员会。鉴于这是苏联政府的重大政治行动，这里于二月十七、十八两日召开了迄今为止已建立的所有“苏联之友”协会的会议。

我听说苏联在准备建议也对南斯拉夫建立这样的协会。在我看来，整个活动从政治上来看是很可疑的。

苏联报纸强调，党的工作者尼娜·波波娃是“建立同苏联友好的协会”这一行动的发起人。强调这一点很可能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整个这件事与苏联国家机构无关，尽管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我们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发展尽量友好的关系，因为只有享有平等和独立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朋友，地位不平等的人是决然成不了朋友的。那时就成为主从关系，而不是朋友关系。整个这一主张，我们不喜欢，也不符合我们的胃口。既然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其他阵营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这些国家存在的所有团体一律都得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而法律又规定取缔一切对苏联不友好的团体，在这些国家建立这样一些协会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到底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对苏友好协会”？

至于南斯拉夫，这个问题特别敏感。首先我们反对使对苏联的友谊发展成南斯拉夫“负责同俄国人友好”的某个专门组织。相反，我们所有的人，从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政府起，都要发展这种友谊。第二，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这个协会的话，就好比把我们的公民分成两部分人：一些人是苏联的好朋友，另一些人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苏联对各国‘友好协会’”。——译者

却不是。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开始把这个协会看成是某个亲苏组织，这样的组织就会逐渐越来越享有某种自立的地位，它就会开始搞自己的“对苏友好”政策。

依我之见，俄国人倒是应该在有各种反苏组织在活动的国家，诸如美国、西德、英国以及类似的国家里建立这样的协会。让这些国家的这种“友好协会”去为苏联争得人心，为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同俄国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奋斗。

除了上面已讲过的种种情况外，南斯拉夫在这方面对苏联的态度不能有别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允许俄国人做类似的事情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就应当允许建立同美国、英国、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友好的这样的协会。我希望，在涉及南斯拉夫的这件事情上俄国人不会操之过急，因为我们在这里已使他们灰心失望，虽然这也许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莫斯科。

不好的是，俄国人在谈论巴尔干的文章中无视南斯拉夫，在这样的文章中本该提到我们，至少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南斯拉夫是位于巴尔干中部的，最大的国家，这个事实既不以我们，也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二月二十七日的《消息报》发表的一篇长文就是这么干的，文章谈到罗马尼亚建议巴尔干国家合作，然后谈到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为把“巴尔干变成和平与安全地区”而作的类似努力，至于南斯拉夫，则只字不提。

铁托同苏兹贝格的谈话，三月八日的《消息报》只报道了一句话，而且是以这里的报纸惯常刊登似是而非的消息这样一种方式报道的，结果，对报道的东西既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又可以作那样的解释，又不是直接捏造，使你无法向苏联官方机构提出抗议，这里只要发表铁托同苏兹贝格（他是美国最有影响的一家报纸的主

编和老板之一)谈南美关系、巴尔干条约以及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而且还使这件事带有强烈的反苏性质,这就足够了。这里就是这么干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莫斯科。

苏联同西方之间关系不好以及苏联共产党人同西欧社会党人的关系,也都对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最近南斯拉夫同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变坏了,同西德的关系甚至中断了。美国停止了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这一因素不再影响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再会产生消极影响。由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南斯拉夫同法国发生了公开冲突。南斯拉夫同西欧社会党人的关系眼下也不象过去那么好。在我看来,这一切都缩小了我们的关系的基础,实际上是缩小了我们反抗苏联的基础,苏联从这样的事态发展中将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同苏联以及同东方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们同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而得到改善。的确,我们同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发生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在同样程度上来改善我们同东方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可是俄国人却因此而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很可能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关系受到的损害越大,它的国际地位就越弱。尽管有人可能认为,如果南斯拉夫削弱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合作,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就会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莫斯科。

根据南共联盟领导的决定,我过两天将去蒙古,出席蒙古党代表大会。南斯拉夫拒绝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之后加强同蒙古的党的关系,这具有政治意义。由于这是在许多方面意见有

分歧的两个共产党之间合作的一个例子，蒙古—南斯拉夫的这一举动堪为其他大得多的党的表率，这些党未必相互取得完全一致才能进行友好合作。

蒙古可以说是完全受苏联的影响，虽然如此，它还是邀请南共联盟派代表团出席蒙古党代表大会。我不相信，如果苏联不知道，或者不经苏联的同意，蒙古会这么做。这是否意味着俄国人将逐渐接受我们的独立地位，不会象迄今那样竭力把南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呢？考虑到苏联在其他方面的作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也许这里还在希望能够对我们施加影响，因此现在对我们“眼开眼闭”，不阻碍蒙古邀请我们出席他们的党代表大会。当我准备去蒙古远行时，这样的和类似的假设便涌入我的脑际。我几乎有一年时间没有去蒙古了，尽管我是想去的。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同维·米·莫洛托夫重逢，他现在是苏联驻蒙古的大使。尽管关于如何对待莫洛托夫我没有从贝尔格莱德得到任何指示，我相信我们的会面将是有意思的；我相信我们在乌兰巴托交谈的时间会比我们在这里在另一种环境下晤谈的时间要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我在蒙古呆了十天之后，已于三月二十五日返回。由克尔斯特·茨尔文科夫斯基和我组成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受到了蒙古政府以及蒙古党代表大会的很友好的接待。其他外国代表团一般都是由兼任驻莫斯科和乌兰巴托的大使任团长。我认为，从我们方面来说，做得比较好，因为代表团团长是直接南斯拉夫来的，而不是象所有阵营国家所做的那样，来自莫斯科。

蒙古劳动党^①代表大会本身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

^① 原文如此，应为“蒙古人民革命党”。——译者

大会差不多：冗长的报告、有组织的讨论、没有活跃的气氛或者没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不展开任何斗争，也没有自由地交换意见。无论是报告还是讨论都是“正确的”，“按章办事的”。

关于蒙古本身发生的变化材料，使外国代表团发生了兴趣。这些变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典型的：有百分之多少的蒙古居民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同意在一个地方定居，有多少蒙古人同意放弃传统的蒙古包，搬进房子，卫生事业的情况如何，当局如何使这个游牧国家从八岁到四十岁的每个居民识字，等等。其他的材料谈到工业、交通、电气化、住房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跟我们欧洲人开代表大会时的材料差不多。

蒙古领导人通知我：他们将派党的代表团出席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还要由现在将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但是，泽登巴尔总理对我说，这里肯定将派代表团去。倘若派代表团去的话，那么，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将同南共联盟逐渐发展党的合作，尽管我们拒绝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

我向蒙古人转交了我国政府欢迎他们派大学生去南斯拉夫学习的邀请，开始时为数很少。蒙古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们对我说，现在他们在苏联学习的的大学生约有一千名，在其他阵营国家还有大约一百名。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要弥补迄今的合作中的空白；在可能进行合作的各个领域进行合作，而文化合作在这方面名列前茅。即便是现在，蒙古人还在不停地感谢去年夏天由泽登巴尔总理率领的国家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时所受到的十分热烈的欢迎。泽登巴尔总理向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伏克曼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等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另一位书记告诉我，实际上，当时泽登巴尔病了，他在苏联治病，尚未康复。

我拜会了驻乌兰巴托各外交使团的团长，我并没有感到特别

困难，因为常驻蒙古首都的大使一共只有四位：中国大使、北朝鲜大使、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以及苏联大使莫洛托夫。对于同莫洛托夫的谈话，我专门写了一篇详细的记录。苏联代表团对待莫洛托夫的态度很坏，不理睬他，不同他往来，甚至不让他出席苏联代表团对蒙古高级领导人必要的礼节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大使必定是要在场的。即便在代表大会上，同经常跟蒙古领导人或本国代表团在一起的其他外交官相比，莫洛托夫也是受歧视的。既不准莫洛托夫同蒙古领导人接近，也不许他跟本国代表团在一起，除了在给他规定的代表大会开会时坐的那张椅子上外，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他。

很可能有人会就我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玩弄阴谋，待传到莫斯科时，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老实说，即便我没有拜会莫洛托夫，而拜会了驻乌兰巴托的其他所有大使，俄国人也可能搞阴谋。他们可能说我侮辱了苏联，因为我唯独没有对苏联大使进行礼节性拜会。不过，比较现实的倒是，这里对我在乌兰巴托的长谈，而且是“单独”同莫洛托夫的长谈肯定是不赞赏的。因此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向赫鲁晓夫谈这次拜会。我要把我在现场看到的有关莫洛托夫的一切尽可能地告诉他。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我同葛罗米柯商谈了伏罗希洛夫访问南斯拉夫的事。关于这次访问，俄国人和我们都一致认为将是“很有益的”，（强调得越多，人们越认为事情恰好相反），可是我们尚未商定。现在再次商办这件事，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目前不存在任何政治障碍，应当在五月份实现这一久远的计划了。

葛罗米柯提到我从蒙古回来，我向他谈了几句，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开得成功，我还会见了常驻蒙古的一些国家的大使、

莫洛托夫和其他人。葛罗米柯避而不谈这个题目，接着说据他获悉，蒙古党代表大会开得成功。此时此刻，他对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的情况并不感兴趣，生怕我讲出点什么有关莫洛托夫的事。最后，葛罗米柯邀请我出席今天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会上将选出苏联新政府。

* * *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了苏联新政府的组成。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从去年六月份起就开始的危机总算解决了。现在赫鲁晓夫正式独揽党政大权。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苏联领导人在政府里建立自己的阵地，好同在党内建立自己的阵地的对手竞争，反之亦然。斯大林死后的几年内，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马林科夫，后来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布尔加宁等人企图加强自己在国家机构中的阵地，而赫鲁晓夫则在党的机构中这么做。去年六月在苏联政界最高层，大概就是从党和政府的这些阵地出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或许在苏联的制度中，这两个最高职务必须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人们只能把斯大林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制度看成是一个人握有无限的权力，除此之外，是不可设想的。除了在社会主义法制和个人迷信问题上作了一些纠正之外，现在的苏联制度不过是斯大林的遗产而已。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当选毕竟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因为赫鲁晓夫今天是苏联领导人当中就其多方面的特点而言远远超过主席团其他所有成员的唯一领导人。

我听说，赫鲁晓夫将以苏联政府新总理的身份率领苏联国家代表团很快就要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赫鲁晓夫先于其他所有国家，优先考虑匈牙利。他这样做大概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月的事件以及当时苏联军队武装干涉所起的作用吧。赫鲁晓夫以苏联政府总理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身份采取特殊的步

骤，是为了尽快使人忘却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我在乌兰巴托逗留期间碰到的问题是，我如何同莫洛托夫商定会晤，因为我们大使馆没有一个年轻职员跟我一起去，那样我便可以派他去苏联大使馆，并通过他向莫洛托夫建议会晤。我也无法请求蒙古政府的什么人帮我约定这次会晤，因为这件事太微妙了：由蒙古政府来安排莫洛托夫和南斯拉夫大使会晤！如果把一件简单的事纳入这一轨道，那马上就变复杂了。

我看我得自己安排，于是我便在蒙古党代表大会上这么做了。会议休息时，我在走廊里等莫洛托夫，这条走廊是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经常把莫洛托夫伴送到一个专门的房间去的必经之路，休息时莫洛托夫得呆在这个房间里，不得同在休息厅里闲谈或者在这座大楼周围散步、休息的外国人和蒙古人混在一起。在我们所有的人走出会议大厅之后，这个蒙古人就伴送莫洛托夫到那个房间去，他在此期间把莫洛托夫留下，使后者无法同我们当中的什么人会面。我留在走廊里，期望莫洛托夫和伴送他的人遇到我，因为除了这条狭窄的走廊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向莫洛托夫打招呼，会见是亲切的。我觉得，当莫洛托夫看见我在走廊里等他，并表示希望暂时摆脱派给他的“以示关照”的守护人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同他一起走到聚集着代表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休息厅里，便留在那里攀谈起来。在数百名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来。在我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相距几米的圈子，莫洛托夫和我就在这片“包围”中愉快地交谈了十五分钟。

阵营国家代表团仿效苏联代表团，在我同莫洛托夫会面之前也一直不同他往来。当我和莫洛托夫分手后，首先开始向我走来的便是阵营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他们问及我同莫洛托夫的会见。

我对他们说，我来蒙古照例要拜会我所有的同事，当然也要拜会苏联大使和其他人。在此以后，波兰大使毅然走到莫洛托夫身边，同他打招呼，虽然在此之前波兰大使一直回避这么做。来自莫斯科的其他阵营国家大使，尤其是苏联代表团成员，在这之后没有去找莫洛托夫。这是三月十七日的事，我同莫洛托夫约定第二天在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碰头。

鉴于我在蒙古递交国书比莫洛托夫要早，所以此公按照在乌兰巴托也仍遵循的外交惯例，一定要他先对我进行礼节性拜会。我告诉他，我没有地方接待他，我同所有外国代表团一起住在一座大楼里，我在这所公寓里只有一间卧室，莫洛托夫听我这样讲了以后，方才作罢。莫洛托夫在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里十分殷勤地接待了我。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边谈边喝茶，还喝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因为是莫洛托夫提议喝的。会晤时间拖长了，虽然我两三次站起来想走，可是他坚持不让走，我就留下来继续谈。

苏联代表团团长尼·伊格纳托夫(他也在大使馆里)从头至尾窃听了我们的谈话。即便如此，记下我们谈话的内容以及莫洛托夫的举止，或许仍然是发人兴味的。开始时，我谈起他的健康。莫洛托夫说，他感觉良好，我说我在这里感觉不好，我提到蒙古气候干燥的一些特点。莫洛托夫说，他的身体很不错，也许是他经得住现在生活在其中的干燥气候。他说，他的妻子有病，几天前她在这里动了手术，肚子开了刀，此外还有心脏病。我问，手术是蒙古医生、还是苏联医生做的，莫洛托夫回答说，在乌兰巴托有两个苏联医生，所以手术是他们做的。莫洛托夫然后谈到这里的俄国医生和蒙古医生相互嫉妒的情况。莫洛托夫说，他担心妻子的健康，她身体以前就不好：“她到蒙古来，得了心脏病，回莫斯科，又犯病了，现在又动了手术，不过，也许她经得住。”

“莫斯科怎么样？”这是莫洛托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向他谈到美国新任大使汤普森，这时他显出感兴趣的样子，而且稍稍活跃起来。他说，他在维也纳时就认识汤普森了。然后他问及东西方会谈的实际前景如何，会有什么结果？我大概地谈了谈，未作肯定的回答。莫洛托夫说，可能谈得成，美国和西方人很想改善自己的形象，说现在正围绕应当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开会这个问题展开斗争。莫洛托夫接着说，例如，关于禁止原子试验的建议是好建议：“既然一方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另一方就很难反掉它，因为这件事对大家都有好处”。莫洛托夫对苏联政府的某些建议也讲了类似的话。

我提到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苏共中央已确定派波斯别洛夫率领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莫洛托夫问及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似乎略知此事。我提到代表大会要通过的南共联盟新纲领。我向他叙述了纲领草案的某些内容。莫洛托夫对草案之详尽感到惊讶。他一度问到：“我怎么才能得到你们的纲领草案？”我回答他：草案已印好，将译成俄文，很可能莫斯科已有了。我无法回答他说我给他寄一本来，虽说在别的情况下这么做是正常的。接着他又问：“纲领是否也能为别的党所接受？若是那样，就好了。”我只局限于我们党，说我们认为纲领草案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目前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莫洛托夫再一次说，在他看来，事情很有意义，并且开玩笑地说：“你们南斯拉夫人是不会不搞点特色出来的。”我向他谈到二月二十八日已公布的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信。莫洛托夫一无所知，他详细询问了信的内容。或许这促使他谈到苏联共产党（在苏联革命后第一阶段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列举了当时的几个例子）。

我问莫洛托夫蒙古的情况；问他在被任命为大使后是一直呆在乌兰巴托呢，还是到蒙古各地走走。莫洛托夫说，他曾四面八方

各地都去。他向我讲述了旅途印象。他谈了以下情况：在草原上他走到一群牧民身边，问他们生活过得怎样。牧民回答他说：我们同牲口一起生活，牲口过得怎样，我们就过得怎样。莫洛托夫说，这些人实际上对待生活不可能有别的态度，很难确定谁管谁，是他们管牲口，还是牲口管他们。例如，当北方来的暴风雪袭来，牲口便拼命向南逃跑，跑数百公里之远。有时候连牲口连人跑到中国去了，待牲口停歇下来，人也才歇宿下来，等等。

莫洛托夫说，在旅途中他走进一顶蒙古包，问两位男主人希望将来做什么。一个说，他希望当喇嘛，另一个犹豫不决：要么当喇嘛，要么参加畜牧合作社。莫洛托夫说：“您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抉择。莫洛托夫说，蒙古领导人对牧民这样回答他的问题感到气恼。

莫洛托夫转而谈到蒙古的经济情况，他说，全国连一家面粉厂都没有，当他肯定情况确实如此时，他感到惊愕不已，他们俄国人要对此负责。“蒙古人种粮食，从苏联进口面粉，而全国竟连一家面粉厂都没有。”现在俄国人在给蒙古人建四座现代化的面粉厂。莫洛托夫说，他就这个问题给莫斯科写了报告。接着他谈到让蒙古人熟悉任何一种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这种秉性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给他们许多小汽车，可是他们基本上对待小汽车就象对待马或者骆驼一样。他们抓住方向盘，就猛开，所以事故多，损坏的也不少。总的来说，他们对技术大致如此，蒙古人把机器搞坏一点或者出了故障，便马上要新机器，而不是修好旧的，但是新机器很快就遭到同样的命运。

谈话过程中，莫洛托夫也许感到，他讲消极面讲得太多了，于是便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作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成绩，可是接着他又讲到消极面：干部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本问题，他们有足够的医生、教师和兽医（莫洛托夫讽刺说，“在他们这里连外交部长也是兽医”），可是却没有技术干部，也没有足够明确地朝这方面

去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三月十八日同维·米·莫洛托夫的谈话续志：

莫洛托夫说，苏联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会对美国人和西方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他们采取现实的态度。他们本来可能低估了“对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水平。美国现在同过去相比，将比较冷静地看待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莫洛托夫对我说，美国今天（三月十七日）又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可是很小，说这个消息是有人在乌兰巴托机场告诉他的，当时他在机场等候由莫斯科来的女儿，后者是因母亲生病而来的。

当我们谈到我们的新纲领时，莫洛托夫问：“谁参加了起草委员会？”我回答说，参加起草的约有一百人。莫洛托夫又问：“谁是委员会的头？”我说，是铁托同志，还有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大约二十位同志。我的感觉是，莫洛托夫期望我告诉他，是卡德尔在搞纲领，所以他才问。莫洛托夫还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在现在通过新纲领？我告诉他，基本原因是，以前的纲领已过时了，我提到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南共以前几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不同。

谈话期间，莫洛托夫有一次提到伏罗希洛夫。这是在谈到蒙古的气候和去年伏罗希洛夫访问蒙古时提到的。他没有提到苏联其他领导人。即便他在谈到苏联关于东西方举行会谈的建议，或者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时，甚至也没有提到苏联政府。莫洛托夫总是找到别的什么词来表达，而不说“我们的建议”，或者“苏联政府的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莫洛托夫的心理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把自己同本国政府连在一起（即便他赞同这一政策也罢）。

至于说蒙古的生活，莫洛托夫仿佛忘了他开始对我说的感觉良好的话。他谈到气候令人难受，指给我看他的办公室里放着盛有水的器皿，好使空气湿润，他说在蒙古的一些地区由于太阳整天不断地照射而产生的辐射使得气候更加恶劣，这种辐射尤其对妇女有致命性的影响，可是蒙古和乌兰巴托对于非蒙古人的特殊生活条件(疾病、对水和空气的反应等等)方面根本就没有研究过，狼和野兽都跑到乌兰巴托的近郊来了，等等。从莫洛托夫提到的这些情况中，实际上可以看到，他在蒙古的生活有多困难。

如上所说，莫洛托夫非常客气，我想走，他两三次把我留下。谈话过程中，他首先提议“为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干杯”。然后我们为健康干杯，我希望他重病在身的夫人恢复健康。接着莫洛托夫为“我们的友谊”干杯。最后的一杯隔了较长的时间，看得出来，他是让我来祝。我提议，我们“为苏联的繁荣，为苏联最近关于同西方达成协议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成功，为世界和平”干杯，对此莫洛托夫是欣然赞同的，他又加了一句，“为南斯拉夫”干杯。

莫洛托夫说，中国人给蒙古“越来越多的援助”，问我看没看过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新大楼。我回答说没有看过，莫洛托夫说，新大楼很大，建得相当好，我应当去看看。同中国大使馆相比，苏联大使馆就显得小了，此外，苏联大使馆也够旧的了。(后来我到中国人那里去了。我觉得，莫洛托夫讲起中国新大使馆并非偶然。这座大使馆的确很大，别的不说，有一个有八百个座位的电影厅，可以邀请多达两千人出席招待会。从砖开始，全部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运来的。我相信，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现在是中国任何一个驻外代表机构所拥有的最有代表性的，最大的建筑物。现在他们在建一座约有一百个床位的医院，供使馆人员用。这一切都能说明中国在蒙古的设施计划多么庞大。)

我们交谈过程中曾提到波兰。莫洛托夫说，“波兰情况很严

重”。我的印象是，莫洛托夫认为，波兰的困难是由于哥穆尔卡上台产生的，也即更为严重了，在一九五六年前，旧政权时期，波兰的情况好些，困难少些。

莫洛托夫送走我时，说了几次：“有空请再过来吧！”我答应了，但是，我没法去，因为我要去的话，就超越了使我借以对他进行这次绝无仅有的访问的官方最低限度规定。莫洛托夫想回拜我。我对他表示感谢，我解释说，这次我无法接待回访。我对他说，今年七月我还要来乌兰巴托（我向希望拜会我的其他国家大使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将有机会见面。

在乌兰巴托的各种文娱演出会上，我还碰见过莫洛托夫两三次，最后一次见面是三月二十四日，在剧院的走廊里。这一次莫洛托夫靠墙站着，好让外国代表团和蒙古领导人先走出剧院。我向他问好，并告诉他，我明天走，我问他，“何时回莫斯科？”莫洛托夫说，“可能今年夏天。”不过，我七月份去乌兰巴托时，我们还会见面。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

我想就我们在乌兰巴托的逗留记下，那里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不光给我们代表团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人们感觉到，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代表大会是令人难堪的。代表大会的第二天，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格纳托夫向大会致祝词时猛烈攻击了莫洛托夫，这以后令人难堪之感就尤为明显。伊格纳托夫使用了苏共中央全会开会时苏联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决议中众所周知的提法，两次提到莫洛托夫，说他是派别分子，反党分子，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已被苏共粉碎，对此“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完全同意的”，等等。当伊格纳托夫第一次提到派别分子莫洛托夫时，会议厅里的许多代表

以及外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到那时为止莫洛托夫一直坐着的位置（代表大会开会时莫洛托夫是在应作致意表示时首先站起来的人其中的一个，而且每次总是鼓掌到底）。莫洛托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伊格纳托夫的致词给整个代表大会造成很坏的印象。

伊格纳托夫讲完话后，大会休息。苏联代表团第一次独自孤单地呆在会议厅里，没有人走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三个人也互相不说话。第一次笼罩着某种沉闷的气氛。波兰大使走到我面前，说他对伊格纳托夫作这样的致词感到惊讶，这样讲话是对代表大会，对蒙古的侮辱，而不是对莫洛托夫的侮辱。可以感觉到，蒙古人的情绪也不佳。这一切是有害于苏联（首先是在蒙古人当中）的威望的。苏联利用一个国家及其政府、党和代表大会等等来进行苏联领导的内部争吵。

我认为，任命莫洛托夫为驻蒙古大使从一开始起就是一项糟糕的决定。如果他们想把莫洛托夫当作派别分子反下去的话。这一次一切都搞到了荒谬的地步。俄国人原来估计，蒙古（党）代表大会，而且莫洛托夫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是再次向他发泄的极好机会。苏联代表团在这么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到蒙古人这个有关的因素，也不考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外国代表团。

仅举几例说明：与所有驻乌兰巴托的大使不同，不允许莫洛托夫迎接本国党代表团，也不让他出席他的代表团对蒙古政府应进行的礼节性活动，他们叫莫洛托夫出席第一天代表大会，然后第二天伊格纳托夫谴责他时，把他弄走，第四天又把他带来参加代表大会。接着蒙古报纸刊登伊格纳托夫攻击莫洛托夫的讲话，最后，莫洛托夫“作为大使”被叫去出席盛大招待会，可是他不能坐着，尽管外国代表团和蒙古领导人全都坐着，而是自始至终离开我们一段距离站着。天天几乎都有类似的场面。有一系列方式可供采用，在我看来，无论采用其中的哪一种方式，对于苏联（赫鲁晓夫）来

说，都比他们所采用的要好。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后第四天举行的招待会上，莫洛托夫怯生生地走向代表团的第二位成员希季科夫（远东滨海地区书记）和最后一位成员维诺格拉多夫（苏共中央副部长），向他们问好，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的面前。

伊格纳托夫和代表团于三月二十四日清晨离开乌兰巴托返回莫斯科。他在三月二十三日晚上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同与会者握手，却在走过莫洛托夫身边时不向他伸出手去。

我去莫洛托夫那里交谈的那天，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格纳托夫和我同时迟到，都未准时参加蒙古代表大会的下午会议。我们两人同时乘车到达召开代表大会的那座大楼前，于是我们也一起向开会的大厅走去。一路上，以及在进大楼的入口处，除了伊格纳托夫和我急急忙忙赶去参加会议外，到处空无一人。我说我到莫洛托夫那里去了，伊格纳托夫回答我说，谈话“有点紧张”，不象我同尼·谢·赫鲁晓夫交谈那么自然，随便，从而证实苏共代表团团长伊格纳托夫在我在苏联大使馆同莫洛托夫谈话期间，就在苏联大使馆内，他就呆在隔壁房间，听我们谈话，直到谈话结束。谈话一结束，伊格纳托夫就象我一样，赶紧上车，这样我们便同时抵达，参加代表大会会议了。

伊格纳托夫这时向我提到莫洛托夫过去对南斯拉夫态度不好。我说，我知道这一情况。我无法同伊格纳托夫讨论他对莫洛托夫讲的那番话，因为我有一个印象，伊格纳托夫除了认为我本人是“支持莫洛托夫”，“反对苏共中央”外，他不可能有别的理解，而且他将这样向莫斯科报告。

在我回到莫斯科后，许多外国人，还有一些俄国人问我：我是否会见了莫洛托夫。他们的兴趣之大，远远超过了我曾经向他们讲的情况，因为我在回答问题时极为克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由于伊格纳托夫作了这样一番讲话，大多数人指责赫鲁晓夫。我了

解有些外国人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是持友好态度的，不能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让人在蒙古的党代表大会上如此攻击莫洛托夫，就象六月全会昨天才开一样，赫鲁晓夫这样做是自己夸大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影响，从而使人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怀疑，表明已在党内和国内建立起的团结情况不妙。至于莫洛托夫本人，此公再也不考虑帮助或者反对赫鲁晓夫或者在苏联掌权的其他任何人的政策。或许这只是根据一时的状况获得的印象。

莫洛托夫去年同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一起采取行动，非法改变苏联共产党领导。我想，凡是了解过去和现在苏联在进行政治清算时对人的处理的人，都会说，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人们对苏联的做法进行种种责难，但是赫鲁晓夫对待反对派领袖实际上表现了苏联自列宁时代以来所未见过的人道精神。

围绕南共联盟新纲领 同苏联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保留苏联政府的原班人马，只是没有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以政府总理身份首次出国，访问匈牙利。南苏关系面临新危机。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在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攻击南斯拉夫。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同米·安·苏斯洛夫交谈。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新总理赫鲁晓夫基本上保留了迄今为止的布尔加宁政府的所有部长。虽有极小变动，但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例外的是，任命科兹洛夫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是想强调，这个“集体”，除布尔加宁外，全体过去都是按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因此无须撤换任何人。任命弗罗尔·科兹洛夫为政府第一副总理表明他是提升了，这个情况，这里也估计到了。米高扬象迄今一贯的那样，仍旧原位不动，虽然有迹象表明，象报纸公布的那样，科兹洛夫排在他的前面不单单是由于按字母顺序。

布尔加宁保留了政府成员的头衔，按顺序排列是第四十四位，政府成员一共是四十五人。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银行行长。布尔加宁是从银行业发迹的，现在分配给他的这个职务是他二十年前担任过的。当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宣读苏联新政府部长名单，宣布苏联国家银行新行长布尔加宁的名字时，会场上可以听到窃

窃私议声。布尔加宁的新职，意味着他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在形式上并根据级别，保留布尔加宁政府成员的头衔只不过意味着他服从新的决定。任命在政治上被打倒的人重操旧业，现在成了赫鲁晓夫的做法，而这里的外交团对此的初步评论也是肯定的。

赫鲁晓夫政府第一个有较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便是苏联方面暂时停止核试验。最高苏维埃兴奋地采纳了葛罗米柯就此提出的建议，表决变成了表示赞同的热烈场面。这里的外国人对苏联政府这一决定的反应也是积极的，不可能是别的。俄国人希望从自己单独停止核试验这一决定中捞到某些政治上的好处，而不管西方人是否效法他们。要是西方人不效法，（西方很可能这么干）那么这里就作出同现在的这个决定相反的决定，重新继续核爆炸，同时指责西方不效法他们。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莫斯科。

今天四月二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从这里启程，前往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的阵容是极其强大的，其中有政府第一副总理科兹洛夫，然后是葛罗米柯，还有其他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国家的大使没有接受邀请去伏努科沃机场为赫鲁晓夫代表团送行。这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在礼宾方面进行冷战的这种做法已停止了。在一九五七年，西方国家的大使曾接受类似的邀请，而且当时，例如在匈牙利代表团和其他阵营国家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一月庆祝活动时，他们不一定象现在这样非到场不可。

西方人今天的姿态是一个迹象，表明总的气氛已恶化，这不仅仅是对赫鲁晓夫个人的不礼貌问题，这是赫鲁晓夫首次以苏联政府总理的身份正式出国访问。也许西方人这样做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在这种气氛中，比较容易使苏联禁止核爆炸的决议得不到支持。

赫鲁晓夫的一个随行人员对我说，他们将在匈牙利逗留大约八天，访问象匈牙利这样一个小国，花这么多的时间，这是异乎寻常的。据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引人注目地竭力对匈牙利表示特别关照和友好，从而尽量减少一九五六年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西方人则希望给莫斯科制造困难，不使它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去伏努科沃机场，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是去了，就会使俄国人更容易很顺利地实现他们对匈牙利的意图。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莫斯科。

耐人寻味的是，葛罗米柯不久前在最高苏维埃就西德联邦议会决定用核武器武装西德新军队一事发表的讲话。葛罗米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攻击之猛烈，以及大部分讲话谈及这一问题，给这里的外交团的大多数人留下了印象。原来可望签订苏联西德贸易协定和领事协定，而现在却成了问题。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俄国人现在不签订这些协定，尽管截至昨天为止还准备签订。假若俄国人现在签订，阿登纳就可以因此不仅向西德，而且在欧洲和全世界面前夸耀说，只是在他作出用原子武器武装德国军队的决定后才使俄国人同意签订协定。

* * *

北朝鲜大使今天把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①金日成给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交给了我。信中对我们邀请他们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北朝鲜人将派出由政治局委员^②李孝淳和检查委员会委员长李熙俊组成的两人代表团。可以预料，他们的代表团在南斯拉夫逗留时将提出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① 原文如此，当时金日成为朝党中央总书记。——译者

② 原文如此，当时李孝淳为朝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译者

问题。我向贝尔格莱德建议，我们同北朝鲜建交，如果他们对是否提出这一问题犹豫不决的话，我们要鼓励他们。

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莫斯科。

今天我拜会了伏罗希洛夫，几天前他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我把我们为他访南重新作的详细日程交给他了。我再次邀请他夫人访南。我还通知他，也邀请他儿子和媳妇前往。夫人是否成行，伏罗希洛夫没有说定，因为她健康不佳，而对我们邀请他儿子，伏罗希洛夫表示满意，还评论了一番：要是他儿子“陪老头子去南斯拉夫一趟”，那倒不错。

* * *

在匈牙利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帕托利切夫，接着同米高扬交谈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草案应在本月底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正如我们在这里根据在各级同俄国人交谈所记录的迄今全部答话表明的那样，库兹涅佐夫和帕托利切夫持保留态度，他们辩解说，文件内容很丰富，是整整的一本书，还没有看完，等等。库兹涅佐夫针对我们纲领草案内容繁多引用了一句俄国谚语：“宁可短些，但要好些”。这两个人持极为保留的态度，就此地情况而言，一般就意味着持否定态度，至于何时将这种否定态度公诸于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米高扬说，他们这里希望我们的纲领不要象草案的那个样子，说同去年我们在罗马尼亚会晤时达成协议并签了字的文件相比，我们后退了。米高扬说得这么肯定，使人不可能怀疑他讲的是苏联领导的意见。

四天前我们的秘书迪兹达雷维奇“为苏共中央代表团前往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会晤苏共中央南斯拉夫科科长麦德维杰夫。麦德维杰夫没有答复迪兹达雷维奇何时去会谈，直到

今天也没有答复，尽管四天已过去了。以前进行类似的会谈，通常在几小时之内就接待了我们。我打算为苏联代表团赴南约请代表团团长波斯别洛夫吃晚饭。苏共中央继续保持沉默。在我同米高扬谈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之前，我曾对帕托利切夫说，我们期待苏共中央代表团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帕托利切夫未置可否。

看来，最近他们重新研究了我们的代表大会的事，结论是否定的。莫非他们改变了先前关于派苏联党代表团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决定？

* * *

波兰大使盖德对我说，他拿到了我们党的新纲领草案。我问，他的印象如何，自然，他的回答跟俄国人的一样，说由于纲领草案内容浩繁，他无法了解，因为“这是整整一本书”。他说，他翻了翻草案个别章节的标题和内容。他说，根据这些标题和内容来看，俄国人对南斯拉夫纲领无论如何不会满意，因为他们不习惯，也不能同意别的什么人提出自己对国际关系和社会主义普遍问题的观点，而我们在纲领草案中已写上的看法是不符合苏联的观点的。这个波兰人说，可能要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根据波兰大使所说的来看，苏联政府已把社会主义阵营所有欧洲成员国大使召到外交部，把苏联对南斯拉夫纲领的观点通知了他们。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莫斯科。

俄国人估计，他们作为东西方会谈的倡导者，已经巩固了自己的一些初步的成就，因为他们有保留地采纳了西方关于在“最高级”会议举行前召开外长会议的某些建议。苏联采取灵活态度的新因素是：苏联声明，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甚至准备去美国会谈。说明苏联发动这场和平攻势的还有某些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策略因素。于是俄国人把同意先举行外长会议的决定通知了处境困难、

地位孤立的法国，这样俄国人便向巴黎表明：它愿意以同西方其他各大强国不同的方式同法国会谈。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抛出苏美秘密信件往来的消息。最后，为了使第三方也积极起来，苏联政府正式邀请英国国防大臣访问苏联。这样，西方三国各自都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一点东西，而这是不会增强他们之间的团结的，苏联政府则表现出它对同西方各大强国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关系都特别关心。

西方国家的一位大使对我说，西方国家代表不仅在这里没有为东西方会谈作任何准备工作，而且他们根据本国政府指示，正在离开莫斯科，免得在这一点上有所作为。东西方会谈这个主意本身被俄国人利用了，因为，现在各国人民的情绪多多少少是主张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是主张使争端通过协商取得解决的。俄国人早在采取现在的“和平攻势”之前就已估计到了这种情况。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莫斯科。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迹象，可以得出结论，俄国人已把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否定态度转达给阵营其他党的领导人，而对我们仍旧什么也不说。在四月的头几天，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运动开始加强了。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苏联已准备公开攻击我们的纲领草案。阵营国家的某些大使已开始攻击纲领。他们肯定是奉各自中央的指示才这么干的。

这里把我们以书的形式发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把纲领草案译成外文，视为南斯拉夫方面的挑战，视为我们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采取的进攻性步骤，在去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唯一的样板强加于人。现在我们的纲领草案起的是另外一种，与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签署的那个宣言背道而驰的行动纲领的作用，而且作为印成各种外文的书大量发行，

书名是《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不管怎么说，这好象是同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唱对台戏，不仅表现在时间等方面的巧合上，而且表现在我们的纲领对当代大部分基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十二国共产党宣言》提供的解决办法。

上星期同米高扬的简短交谈已完全清楚，莫斯科把事情看成似乎是，这不仅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问题，而且这里硬说我们的纲领野心勃勃。这里认定，南斯拉夫人企图通过自己的纲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南斯拉夫同这种社会主义唱对台戏已有整整十年了。从去年十一月到最近南苏关系较为平静，现在这种状况恐怕又要变成公开的冲突了。这场冲突决不会仅限于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会对南苏关系产生广泛的影响。

现在俄国人将指责我们背离“普遍接受的原则”，从而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引起分裂。我们将指责俄国人不允许发展不受莫斯科控制的任何革命运动。看来，似乎这里没有特别汲取我们十年来为争取在相互关系中享有独立和平等地位而斗争的教训。早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就同俄国人发生冲突的那些问题又提上日程了。

* * *

今天米高扬邀我去，原因是我们在匈牙利人的招待会上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的那次谈话。苏联外交部通知我，同米高扬一起会见我的还有已确定为出席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波斯别洛夫。

我在苏共中央大楼拜会了米高扬和波斯别洛夫。米高扬向我宣读了苏共中央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该信认为我们的纲领草案（他们已把草案看成是正式纲领）是不能接受的，理由如下：（1）纲领同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的思想背道而驰；（2）纲领表明我们背离了我们在罗马尼亚会谈时采取的立场；（3）纲领表明我们背离

了我们在莫斯科签了字的《和平宣言》的思想。

为此，他们取消派遣苏共中央曾确定出席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俄国人没有明确说他们的大使是否作为观察员出席代表大会。我们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但是没有结果。米高扬引用了列宁的某些书——他从中读了个别的提法——来攻击我们的纲领草案。看来，我们之间再次爆发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莫斯科。

去年我被选入南共联盟《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起草委员会。鉴于我一直呆在莫斯科，所以不能参加贝尔格莱德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此，我寄去了书面意见。由于离代表大会开会只剩下很少时间了，我极其简单明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划出了我认为应当删去的纲领的某些部分，与此同时，我提出了应当取代上述文字的措词。我还尽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

我的信和意见是寄给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同志的。当然，纲领草案在代表大会上也可以修改。我不知道这些意见的命运如何，因为剩下的时间太短了，况且意见相当多。

俄国人既不等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也不等我们把南共联盟新纲领确定下来，就事先决定，对我们进行公开攻击。大概下星期苏联报纸接着就要进行“全面”攻击了。俄国人又自认为要对发生的一切负责。由他们来确定某个党将把什么样的纲领定为本国的政治纲领，还自认为有权确定在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大会上，或者别的某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定是否“正确”。时至今日，这种“正确性”仍然取决于某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是加强还是削弱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垄断地位。

鉴于俄国人现在急于要宣布再次对南斯拉夫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可以猜想，《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已使得莫斯科颇为不安。可

以料到，我们之间的这场冲突要比去年十一月我们拒绝签署《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开始摆脱的那场冲突来得尖锐，来得深刻。南斯拉夫同苏联之间所有主要矛盾现在都集中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上。看来，这场冲突不可避免，虽说南斯拉夫不希望发生。实际上，前天米高扬和波斯别洛夫同我的谈话就预示了新冲突的来临。

我们设法向俄国人解释我们的纲领不是为他们，或者为别人，而是为我们写的，这样做将是徒劳的。这里把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看成是国际范围（不仅是本国的，南斯拉夫的）某种危险，所以这里决心要阻止这一“危险”。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莫斯科。

我通过苏联外交部长助理帕托利切夫转交了铁托同志给尼·谢·赫鲁晓夫的信。这是铁托对赫鲁晓夫几天前的一封信的复信，是有关苏联政府的决定，即最高苏维埃关于苏联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决议的。南斯拉夫坚决支持并欢迎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

铁托的信只字未谈《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即将开幕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或许希望，这封信从自己方面将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不致对我们的纲领草案采取敌对的态度。看来，希望很渺茫。俄国人甚至不在报纸上发表他们收到铁托的信的消息，尽管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真理报》上发表国外来的类似信件。一旦他们不发表铁托的信，那就意味着，苏联领导对我们采取全面否定态度。

赫鲁晓夫昨天在访问匈牙利归来后发表了讲话。群众大会是在卢日尼基公园的体育馆举行的，出席大会的约有一万名经过挑选的莫斯科市民和外交团。赫鲁晓夫还谈到南斯拉夫，讲得很坏，没有点我们的名。他讲话很随便，没有讲稿，而苏联报纸对讲话作

了“修饰”，把某些部分删去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成员国正如在赫鲁晓夫代表团赴匈时抵制送行一样，代表团归来时也不去迎接。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①，莫斯科。

今天赫鲁晓夫接见了。我把铁托同志有关我们代表大会的信交给了他，然后我们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赫鲁晓夫说：我们的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坚持导致我们两国之间目前这种状况的立场，信中的某些提法还可能是侮辱人的。

赫鲁晓夫又提出他们信中的某些论据，接着重复了米高扬和波斯别洛夫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论据。赫鲁晓夫引用了铁托同志一九五五年讲的话：我们应当摒弃我们之间一切旧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背离了这一原则。俄国人将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和我们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赫鲁晓夫说，他们本来想就在日报上发表文章，由于贝尔格莱德电台向俄国听众转播了我们的纲领草案，所以俄国人既然不同意这个纲领草案，就要利用相应的工具公开报道。将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将由几个苏联作者署名。这样一种形式比不署名的文章要温和些。

赫鲁晓夫通知说，中国人给我们发去了一封“更尖锐的”信，他们这里已印出我们的纲领草案，发给了所有苏共中央委员，各共和国、州以及边疆区的书记，让他们了解纲领草案，以便他们的文章在这里发表时，他们可以较好地理解批评的精神。这样，党的负责人可以比较好地主持党员会议。赫鲁晓夫在讲完了这一番话之后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十四日”。——译者

最后说，因此他们既不派代表团，而且也不向我们的代表大会祝贺。

我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没有料到他们方面有这么大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的纲领草案在对待苏联方面，实际上是一九四八年以后整个来看南斯拉夫发表的类似文件当中最积极的文件。我问，为什么他们现在就采取上述各种措施，准备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就攻击我们，而南共联盟的新纲领究竟怎么样，要由代表大会来确定。我说，不管他们的信（将阐明其否定态度）如何，我们已经料到，我们那里将对纲领草案提出许多意见，而且已经提了。我告诉他，兰科维奇同志写信给我说，第七次代表大会很可能不会把我们的新纲领定下来，而是大概在代表大会之后由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进行个把月的工作。我问赫鲁晓夫，在取消已确定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团这种气氛中，难道他们以为南斯拉夫会接受苏联批评纲领草案的某些提法吗？难道能够指望我们现在会当着世界公众的面根据他们的公开要求修饰《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吗？

我还对他说，所有社会民主党都拒绝以任何形式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而现在他们也竟然采取类似措施。西方对我们的纲领的看法，自然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正如西方所说，我们“接近苏联”，而苏联却打算也这样来攻击我们的纲领和代表大会！我告诉他，我对他讲这些是要说明目前这种状况的特点，而不是以此作为批评苏联的论据。

在经过长时间交谈，并重复基本上是我上面已谈过的同一些论据之后，赫鲁晓夫以提问的形式发表他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代表苏联领导：我们是否会发表声明，宣布由于对纲领草案提了大量意见，我们无法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做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推迟这件事呢？要是我们发表这样的声明，那么，他们就把公开批判压下。赫鲁晓夫还提到推迟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我发表个人看法说，在我看来，这种抉择并非正常。我们的党纲起草委员会目前不可能发表任何声明，也不可能规定代表大会干得了什么，干不了什么。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推迟代表大会，此外，其他共产党也将开始效法苏联，采取否定态度，那时，世界上只会公开地议论这一切，从而只会给南斯拉夫带来新的损害。我多次提到，霸权主义、势力范围、两个集团，这些都是他们赖以批判的基础，虽然有些提法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们必须让我们正常工作，现在就撤销自己持否定态度的决定，停止对我们事先攻击。赫鲁晓夫不同意我这样的结论，他一再说我们既已出版并散发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我们就是采取了行动，而却要求他们不要表态。赫鲁晓夫说，要是他们准备作出什么让步的话，那就是，他们打算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发表批判文章，但是条件是，我们得发表那个，令人生疑的声明。

虽说我多次反复讲到纲领的一些提法将作修改，讲到从这一意义上我们那里已接受了大家提出的一些意见，可是，这都没有给赫鲁晓夫留下什么印象，也没有觉察到他们会放弃预定要采取的措施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谈到我们之间的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超出任何人的希望。我有一个印象，似乎俄国人并不指望修改这个或那个提法，因为他们已使我们之间的状况变得不正常。他们动员了其他所有共产党来批判我们的纲领草案，而根本不想等待我们作出回答。我觉得，我们现在发表声明，说我们准备修改某些提法，也不会改变苏联目前的态度：取消代表团和打算发表文章。何况，赫鲁晓夫说，由于他们现在在政治上承担了义务，所以不能改变态度。

问题是，不管我们的纲领如何，俄国人是否一开始就打算派代表团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我在琢磨，现在我们方面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例如把关于纲领一些提法的新文本交给俄国人。要是

我们这样做没有希望改变苏联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会使我们的地位恶化。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莫斯科。

昨晚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我又同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和基里钦科谈了话。双方都没有谈到任何新的重要情况。赫鲁晓夫比较明确地表示了推迟代表大会的主张。我拒绝了这一主张，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做法。

赫鲁晓夫还提到以下问题：说我们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即便是在谈南斯拉夫的事，同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也必定包含企图把我们的国内制度强加于他国的野心，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我们现在还通过电台用俄语广播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野心，那么，通过电台用各种外语广播《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目的何在呢？

我提醒说，他们甚至连铁托给赫鲁晓夫的关于暂时停止原子试验的复信也没有发表，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的复信则都予发表了。赫鲁晓夫生气了，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真理报》，斥责他们，然后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不是他的错误。我说，我不是建议他们发表这条或那条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只不过向他举出事实。《真理报》和《消息报》今天刊登了铁托同志给赫鲁晓夫的信。

即便这次赫鲁晓夫也未能，或者说不想忍住不对卡德尔说几句坏话，他说，这样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是卡德尔的作品，铁托自己没有充分地研究整个这件事情。赫鲁晓夫还重述了连队和士兵的故事，说我们的行为好比那个步调不一的士兵。赫鲁晓夫接着说，有一次科查·波波维奇对他说，不知道谁是连队，谁是士兵。这就是说，南斯拉夫把自己同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立起来。赫鲁

晓夫说，现在就会知道而且看清楚谁是连队，谁是士兵了。

当我们谈到摆脱目前局面的出路时，可以看出，俄国人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决定，明确宣布我们公开放弃自己的纲领草案。他们推迟代表大会的主张也是奉行的同一方针。我认为，两者的目的都只能在于要在南斯拉夫引起危机，而不是要修改我们纲领草案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提法。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莫斯科。

我奉贝尔格莱德的指示要求拜会赫鲁晓夫，或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某位成员，向他介绍南斯拉夫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已作的修改和补充。为此，贝尔格莱德特地派来信使乘飞机飞抵这里，带来了修改过的文本。修改和补充的办法是：把印有新修改和补充的文字的单页纸插入纲领草案中要修改的那部分。

莫斯科根本就不考虑我们的纲领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改一事，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什么工作。莫斯科反对我们整个纲领。在我看来，我们同俄国人就此进行的谈话会削弱我们的整个立场，俄国人可能还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准备在个别提法上讨价还价。

赫鲁晓夫对我要求拜会立即答复说，他很忙，不能接见我。这是我来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第一次答复说他不能接见我。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件事不会有好结果，俄国人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他们谈，所以赫鲁晓夫才回避会晤。莫斯科对我们纲领草案的修改已持否定态度，其实，改动得确实不多。

苏共中央通知我赫鲁晓夫不能接见我，所以他们向我提出由米·安·苏斯洛夫接见我。这是又一个迹象表明，从我们的谈话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既然是同苏斯洛夫谈话，那就排除了南斯拉夫人同俄国人之间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即便是涉及比围绕南共联盟纲领争端更轻的争执，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我带着一叠文件去谈话。我是在办公室里见到苏斯洛夫的。他的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他坐在后面，几乎看不见他。一俟我们相互问候之后，他便提高嗓门，激烈地批判我们的纲领。开初我无法讲话。苏斯洛夫气急败坏，无法克制自己。他甚至不懂得表示一下让我坐下，他站在桌子后面，我就站在他的对面，听着他猛烈地谴责我们的纲领草案。他怒气冲冲，这实际上不是谈话；我听着他一条接一条地攻击南斯拉夫，而他讲话的态度好象是我，或者某个南斯拉夫人，侮辱了苏斯洛夫本人或者他的家庭，现在要报复。我一直站着，手里拿着那叠文件，等到我讲话时，我对苏斯洛夫说，这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纲领，不是苏联共产党人的纲领。我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想走了。这时苏斯洛夫方才让我坐下，并表示愿意听听我的意见。

在这样一场令人不快的开场白之后，我把我们的《意见》，还有铁托同志的信的原件交给了苏斯洛夫。昨天我给赫鲁晓夫的是铁托信的抄件。我向苏斯洛夫解释说，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和建议，纲领起草委员会将向代表大会建议对第一、第二、第三章作出修改和补充，委员会还要对初稿进一步加工，因为我们已收到好几百条意见了。

我还给了苏斯洛夫一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草案文本，里边注明了建议要修改的全部地方，这样使苏联翻译的工作方便了。

苏斯洛夫对纲领攻击之猛烈超过迄今这里任何人对纲领的攻击。他认为纲领草案是要把南斯拉夫同苏联以及其他所有共产党对立起来。不仅仅是头三章（草案的意识形态，对外政策部分）有问题，而且整个纲领都有问题，任何修改和补充都不可能改变纲领的实质，即纲领妄想使南共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所有的党都众口一词，步调一致，而我们南斯拉夫人却背道而驰，而且还要求别的党仿效我们。

苏斯洛夫说，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谈到，我们收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指责纲领对斯大林的态度信件。苏斯洛夫说，显然，这样的信是应当写的，而且确实也写了，因为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总的来说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引起了共产主义者的反苏情绪。

苏斯洛夫提出：为什么整个纲领草案一次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美利坚合众国，而在六十四党的《和平宣言》中是有的，这个宣言，我们也是签了字的。

苏斯洛夫说，纲领草案有关南斯拉夫国内问题部分，“我们没有予以注意，但是，即使这部分也总是贯穿了攻击苏联和兄弟党的方针”。苏斯洛夫说，凡是谈国家主义和国家作用的地方，都是针对苏联的。

这场谈话，双方都很烦躁，无论是苏斯洛夫也好，还是我也好，随时都会拒绝继续谈下去而使谈话中断，而且我们分手时的气氛会比见面时还要糟，于是我对苏斯洛夫说了下面这番话：

正如我已对他说过的，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纲领，而不是苏联共产党或者其他某个共产党的纲领。因此，不应把现在所建议的和以后还会有的修改和补充，理解为他所说的对我们的纲领草案作实质性的修改，我们也不准备制订另一个相反的什么纲领来代替现在的纲领。他认为我们的纲领有使南斯拉夫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称霸的野心这一看法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同我们纲领草案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不管草案是否修改。至于说什么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步调一致，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只能证明我们的政策多么错误这样的口号，我对苏斯洛夫说，我的看法是，最好我们不要玩弄这样的口号，而是具体地谈谈（苏斯洛夫插话说：“你们会得到具体的”）。我继续说，从前，一九四八年所有共产党都是这样步调“一致”，其中也有苏联共产党，而我们的步调却不“一致”，

不过，要不是他首先挑起这个问题，我今天本来是不会谈的（苏斯洛夫插话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苏斯洛夫提到的《和平宣言》不仅仅是苏共的文件，南共联盟也在上面签了字，因此，他断言我们害怕美国，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整个纲领草案都讲要反对帝国主义。

苏斯洛夫今天，象赫鲁晓夫昨天一样，指责我，说我们对《十二国共产党宣言》未作任何报道，我们的《战斗报》扣压不发。我对他说，我们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共产主义者》上全文发表了《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他们竟然不知道，我感到很奇怪。

谈话结束了。苏斯洛夫最后说，我转交给他的材料，他将呈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我竭力不把事情做绝，因为苏斯洛夫偏要这么做，甚至不回避侮辱人（“你们了解美国人”。）他看了看我交给他的某些修改条文，对其内容采取轻蔑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莫斯科。

同苏斯洛夫的谈话不仅没有使情况变好，反倒变糟了。我想，苏联方面一定对苏斯洛夫向我讲的那些话感到满意，我们的“修改”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使俄国人坚定了立场。我们方面可以问心无愧了，因为，我同苏斯洛夫的谈话表明贝尔格莱德方面是有善意的，而且我们准备同俄国人就任何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取得一致。

这里我谈谈铁托同志就苏联对我们纲领草案以反对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的态度给赫鲁晓夫的信。在铁托同志写这封信时，俄国人已宣布取消派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铁托同志试图向苏联领导施加影响，希望他们对南斯拉夫的纲领和代表大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铁托在给赫鲁晓夫的信里说，要是我们不完全一致，那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由于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就

公开冲突，相互攻击，而不去平心静气地讨论和探讨这些分歧。铁托同志在这封信的末尾说，如果苏联的报纸或杂志发表批判我们纲领草案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可怕的事。然而，如果全面攻击南斯拉夫，那就不好了，这表明，又在掀起一场攻击我国的普遍运动。

我们的纲领草案多处对斯大林在苏联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长期推行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公开批评。俄国人对此受不了。别的不说，这将表明，斯大林的遗产在苏联现领导政策中还在起多么大的作用，表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多么强烈。实际上这将表明，我们的纲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多么正确。南斯拉夫仍有政治力量来抵制莫斯科的这种政策，尽管我们与此同时设法同苏联保持尽量好的关系，不过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的国家来保持这种关系。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莫斯科。

今天俄国人就我们的新纲领发表文章，攻击南共联盟。阵营国家的一些党，诸如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东德人等肯定还要使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某些批判更加激化。苏联的文章为一场运动提出了最初的论点，迄今总是这样，这场运动总要比俄国人开始攻击时走得远得多。莫斯科特别害怕南斯拉夫在各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中的影响，所以俄国人认为用这种办法将最有效地缩小南斯拉夫的影响。现在基本上涉及的仍旧是我们一九四八年同斯大林发生冲突的那些问题。

苏联外交部今天两三次表示关心我何时动身回贝尔格莱德，说第一副外长瓦·瓦·库兹涅佐夫无论如何想见我。库兹涅佐夫在电话里同我谈话时非常客气，请我晚上随便什么时候一定去他那里一趟。会晤时库兹涅佐夫通知我：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就西德联邦议会关于用原子武器武装西德军队的立场采取的行动给

予肯定评价。联邦议会采取这一立场大约有个把月了。此后俄国人曾同西德政府签订了领事以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协定，而现在却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反对西德政府政策的行动表示欢迎！我们就东西方关系以及波恩政府的行动交谈了几句。俄国人在我动身回贝尔格莱德前要求举行这次会晤，是为了好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攻击《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文章的同时表示一点善意。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 的关系激化

苏联在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攻击南共联盟纲领。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倒退一步。社会民主党人也抵制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电贺五一节。五月九日同阿·伊·米高扬谈话。赫鲁晓夫是否受到压力？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莫斯科。

我将带着不好的消息回贝尔格莱德。可以预料，苏联从党的角度采取的否定态度将在我们可以希望党的关系会改善之前就扩大到南苏关系的其他方面。

俄国人没有破坏继续合作的全部桥梁。他们确定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以观察员身分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暂时还谈不上完全断绝党的关系，而恰恰最初莫斯科是以此对我进行威胁的。然而，现在苏联大使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至少应当使苏联的态度有所缓和。大概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也会仿效苏联，确定它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代表大会。观察员可以对代表大会持保留态度或持否定态度，这要视将出现的情况而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席代表大会本身不管怎么说是有积极

意义的。假若俄国人和阵营决定连他们的人也不派，那就更差劲了。归根结蒂，苏联和将派观察员的其他国家将通过观察员以相应的形式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

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俄国人已劝阻大多数共产党不要参加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大会。不过，虽然如此，现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显然不象十年前那样坚定。归根结蒂，无论是苏联，还是阵营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都不象一九四八年那样僵硬。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卢布尔雅那。

就在我们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两天，即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莫斯科便发表文章，公开攻击我们的纲领。这篇篇幅很长的官方文章是由费多谢耶夫、波缅洛夫和切尔帕科夫署名的。文章援引南共联盟纲领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按照苏联的解释）不一致的许多提法。这特别涉及对当代国际形势发展的评价，对存在两个世界体系的看法，各国，首先是苏联的已总结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文章接着攻击我们关于国家作用的理论，以及我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态度。文章还攻击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建立平等和独立的关系的观点。文章最后说，对我们纲领草案进行这样的批判不应妨碍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的结尾是积极的，尽管在此结尾之前所谈到的一切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当中许多人也没有作这样的期望。

问题就在于：如果发生公开论战，俄国人能否仍然保持这样的态度？现在《共产党人》的文章就坚持苏联在理论方面实行垄断的原则，也就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享有霸权地位的原则。就南苏近几年签署的共同文件而言，事情是倒退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作特别的努力，在我们的许多地方

制造一种对苏联不利的气氛。因此，在苏联最近对南共联盟纲领和南斯拉夫攻击之后，我们的国家和党的领导必须作相当大的努力，保持合作的气氛，而不要堵塞进一步发展我们关系的前景。在俄国人每年都重新对南斯拉夫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情况下，南斯拉夫政府要在人民当中致力于加强对苏联的信任，这也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苏联自一九四八年之后从根本上失去了南斯拉夫的任何信任，苏联现在这么做，这种信任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卢布尔雅那。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铁托同志主持下，正好在十点钟开幕，他受到与会者和来宾暴风雨般的热烈欢迎，与会者和来宾齐集一堂，卢布尔雅那的最大一个大厅座无虚席。后来，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因此，我无意在这里记载大会进行的情况。一切都将予发表，首先在我们的报纸上，然后出专门的书。我只记出席代表大会的外国来宾的情况，苏联和其他共产党以及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代表大会的抵制。

铁托同志在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以后，有机会向来自各洲的一小批各种左派党表示欢迎，这些左派党既没有接受苏联的，也没有接受社会民主党发出的号召：抵制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样的党中有丹麦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在欧洲共产党中很可能这两个党作为本国的政治因素影响是最小的了。接着亚洲社会党联合会和日本社会党出席代表大会受到欢迎。大会向正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表示暴风雨般的热烈欢迎。代表各自的党出席代表大会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党、瑞士劳动党、智利社会党、喀麦隆人民联盟、摩洛哥独立党、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代表。以代表身分出席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就这么多。

然后是作为观察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的代表，这些人数目略为多些。他们中间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突尼斯共产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民族联盟等的代表。第三批代表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大使，他们也是以观察员的身分与会的。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连观察员也没有派。

原来希望意大利共产党人——他们在本国起很重要的政治作用——派党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人即便现在，在我们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十年之后也没有胆量，敢于采取与斯大林现在的继承人的做法不同的做法。西方第二个最大的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也没有这么做，连观察员也没有派。法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表现俨如他们是“比教皇还笃信上帝的天主教徒”，真没料到。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卢布尔雅那。

阵营国家选派大使作为观察员与会，在我们一部分代表中引起抵制，因为这是党的会议，而不是国家的会议。因此大多数代表自然而然地把更大注意力放在智利社会党代表、喀麦隆民族解放运动代表身上，而不是阵营国家的观察员身上。莫斯科很可能把这说成是代表大会笼罩着“反苏气氛”，虽说并无此情。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会记得：早在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他们就极其正式地攻击我们的代表大会，谴责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表现出反南态度。

凡是致力于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赞成实行各国共产党平等和自主的主张，凡是要求承认根据各国特点，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这一事实，凡是致力于本国独立和主权并为反对各大强国对他国实行霸权而斗争的人，不可能是反苏分子。南共联盟新纲领草案恰恰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因

此，苏联指责我们的纲领草案是“反苏的”，是失策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卢布尔雅那。

事实是，在南共联盟纲领和苏联共产党维护的一系列观点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虽然在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南共联盟纲领和《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对当代世界的状况和发展，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和这一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的两种不同观点。

苏联谴责我们纲领时强调：南斯拉夫人现在发表这样的纲领是为了用这个纲领同去年十一月签署的《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唱对台戏。在我们看来，这个宣言要当作指导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行动纲领，当作争取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斗争的指南，早就过时了。因此我们连字也未签。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月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会谈时把这番意思都对俄国人讲了。

可是，我们的党纲草案并不是为了要变成一个与《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不同的、对立的文件才制订的。南斯拉夫没有也决不想在确定南共联盟新纲领时同苏联和阵营发生冲突。早在十年前，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迫使南斯拉夫人抵制斯大林的理论 and 实践。可以说，目前的情况有点类似。

在南斯拉夫，人们原以为，通过南共联盟新纲领和确定在自治的基础上在南斯拉夫建设国内制度的方针，将向进一步发展南斯拉夫革命迈出一大步，而不会导致苏联对我国的再次攻击。正如我在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谈话时所说的，我们是为我们，为南斯拉夫人，而不是为俄国人或者某个第三者制订南共联盟新纲领的。因此，无须苏联党或者别的任何党同意我们的提法，这些提法是根据我们南斯拉夫的经验，而不是某个外国的经验得出

来的。

我们深信：这个草案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加强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贡献。同样，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只会丰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决不会由于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力量进行新的活动形式而削弱这个体系。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草案没有支持苏联当时的或者现在的做法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苏联的做法在当代情况下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必须采取的办法。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卢布尔雅那。

当初看来似乎是不利的政治环境——代表大会在明显孤立的情况下召开，遭到许多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也有其另一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再次显示出一九四八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战斗力。他们现在就象那时一样，力图自己干自己的事，不允许外国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外国的压力再次变成了一个巩固我们内部团结的因素。

在我看来，苏联的公开攻击只是增强我们纲领的国际意义。苏联的基本论点是：我们的纲领草案同《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公开地唱对台戏，这样讲更引起了国际上对南共联盟纲领的兴趣。

苏联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代表大会说成是对阵营和国际革命运动的严重威胁，因此国际上的这种兴趣就更加强烈了。假如明天其他共产党也开始效法南斯拉夫，提出最符合本国情况而不管莫斯科作何想法的纲领，这种前景肯定已使苏联领导感到严重不安。因此，俄国人才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贝尔格莱德。

还有一个同我们代表大会有关的情况不合苏联的心意。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贝尔格莱德对一批前切特尼克卖国贼因从事叛国

活动而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其中有两三个前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这些人一度属于加入第二国际的那一派（虽然他们在战争期间是站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卖国贼一边的），所以西欧社会民主党，或者说第二国际抵制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十天前我在莫斯科曾同赫鲁晓夫谈到西欧所有社会民主党都决定抵制我们的代表大会，而俄国人现在却效法他们，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这番话使赫鲁晓夫感到不愉快。也许这促使俄国人决定还是至少派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代表大会。

抵制我们代表大会的不仅有属于工人运动左翼的人，而且还有组成这个运动右翼的人，这样，我们的代表大会便保持了更大的平衡。在对待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件事情上，俄国人结果处于同社会民主党人同样的立场上，这毕竟是少有的。只要指出这一事实，就削弱了苏联在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地位。社会民主党人抵制我们的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苏联原来的估计。

苏联原来估计，南斯拉夫人肯定会让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因为南斯拉夫人已遭到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抵制，而这只会使我们对社会民主党人与会更感兴趣。我们对遭到两者抵制并非无动于衷，我们又孤独无援了，虽然这种孤独感不同于过去，一九四八年七月南共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

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昨天闭幕，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要是可以谈论代表大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的话，那么居于首位的便是通过南共联盟新纲领。代表大会责成纲领起草委员会完成校订和文字方面的工作，以便在五月份就照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文本发表纲领。草案已成为南共联盟纲领了。草案未作任何重大修改，更不用说推迟发表了，赫鲁晓夫四月中旬曾谈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向前迈出了一步。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决议是选举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即选举南共联盟党的最核心领导。被一致选进这一机构的同志有：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和伊万·戈什尼亚克。最后，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与会者和来宾出席了在卢布尔雅那为我们所有人举行的联合招待会。我想，有一大批同志通宵都呆在招待会上。我没有发现任何人破坏这个团结一致的招待会的庄严气氛，虽然招待会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莫斯科。

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接着是五一节，我是和同志们一起在贝尔格莱德度过五一节的。这样，我迅速地而且轻而易举地丢掉了长期在莫斯科搞的那一套日常工作，有时觉得好象并没有离开贝尔格莱德似的。我们商谈了伏罗希洛夫访问的事，虽然现在看来进行这次访问的希望不大。这里制订了访问的新日程，新日程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莫斯科客人以前表示的愿望。我随身带着这份日程今天就动身去莫斯科，在莫斯科我们应当赶紧采取我们方面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以确保伏罗希洛夫进行这次访问。虽然希望渺茫，还是存在某些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防止南苏关系变坏。

就在我从贝尔格莱德动身前，收到了莫洛托夫从蒙古乌兰巴托发来的五一节贺电，发的是我在莫斯科的地址。电文如下：

“值此五一节之际，我们大使馆全体人员和我个人向您，并通过您向贵馆全体同事祝贺全世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节日。我祝愿您以及贵馆全体同事身体健康，并祝您在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维·米·莫洛托夫”

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上述种种情况之后，我根本没有指望苏联方面有谁会发来贺电，更不用说莫洛托夫的贺电了。令人怀疑的是，莫洛托夫“不了解行情”，莫斯科也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利的转折向他通报。电报是通过正常邮政往来发来的，是邮递员把电报送到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躲过了苏联当局。在贝尔格莱德时，我没有机会同人商量如何答复莫洛托夫，也没有特别的需要同任何人商量，因为这件事要求我对于莫洛托夫向我表示的关切和良好祝愿也以类似的方式作答。

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结论：很难相信莫洛托夫完全不知情，因为蒙古人曾指派了代表团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接着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取消了，蒙古人肯定把这个情况告知了莫洛托夫，要是苏联政府什么情况也不告诉他的话。

我没有再提出各种假设，而是也通过邮政给莫洛托夫发去了复电，这次邮局已表明是互致五一节良好祝愿的可靠渠道。电文如下：

“乌兰巴托，苏联大使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非常感谢对五一节，劳动者国际团结的节日的祝贺。我谨代表我们大使馆同事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以及向苏联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致以五一节的诚挚祝贺，祝愿您的工作在各方面取得成就。

弗·米丘诺维奇”

我不清楚，莫洛托夫是否收到这封电报，除非我再去蒙古，否

则我不可能核实这一点。不过，看来希望不大。在我们的同志中对我同莫洛托夫的这种“通信往来”开玩笑地发表了一些评论，特别是由于我同赫鲁晓夫的良好关系已经告吹了。不管怎么说，莫洛托夫不仅是在一九五八年五一节向我致以友好问候的苏联的唯一大使，而且是处于某种政治地位的苏联的唯一公民。其他所有苏联官员表明：他们考虑的是南斯拉夫同苏联正在发生的新冲突。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莫斯科。

假如苏联方面有起码的善意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铁托同志的闭幕词表明我们希望事情不要恶化。但是俄国人连这点起码的善意也没有。苏联公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在他们看来，是南斯拉夫把事情搞糟的。在俄国人看来，和解是软弱的表示，而他们的报纸发表的文章的尖刻以及举止的傲慢才是有力量的表示。因此在我们作出表示和解的姿态之后，俄国人不但不接受，反而进一步对我们施加压力。

* * *

我们又为伏罗希洛夫访问的事同苏联外交部交涉。我们仍然得不到回音，而且这件事是同苏联政府已确定好的。苏联的态度是挑衅性的。似乎他们很希望我们取消这次访问，从而苏联政府从中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南斯拉夫不仅破坏了党的关系，而且还破坏了国家间的关系，甚至还侮辱苏联。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莫斯科。

今天的《真理报》刊登了苏共中央五月六日和七日全会关于发展苏联化学工业的决定的公报。公报登在头版，除标题外，简短的消息一共只有两三句话。此外，在第三版和第四版发表了一篇未

署名的文章，实际上是苏共中央的反南声明。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牢固团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进一步胜利的保证》。这篇声明性文章分为六部分。尽管没有明说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声明，显然每个读者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全会的主要决议，而不是属于政府机构正常工作的关于发展化学工业的例行决议。《真理报》的反南声明没有署名，应当把这个声明看成是党的指示，不过苏联党中央委员会毕竟不会因为这个声明而遭到正式指责，中央委员会没有署名！

苏联对南斯拉夫和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对我国政策和意识形态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不仅如此，声明在多处强调我们采取的是美帝国主义者对待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强调我们的表现不是批评他们的政策，而是对他们的政策进行捏造和诽谤！

同这里的(苏共)中央近来发表的有关南斯拉夫的公开文件不同，同苏联宣传毕竟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审慎态度相反，现在他们把铁托同志及其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置于对南斯拉夫的谴责的中心。这对于南苏关系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俄国人这次跟过去不一样，没有把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分成“亲苏的”和“反苏的”，而是“赤膊上阵”了。过去，在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内政进行这一类干涉的时候，铁托往往没有被列为“反苏的”领导人，而现在这也发生了变化。

苏联反对南斯拉夫的声明是以挑衅性的，侮辱性的口吻写的。在这方面它象斯大林时代的文件。苏联政府很可能有意尽量搞坏南斯拉夫同苏联和阵营国家，以及其他共产党的关系，从而惹得我们作出尽量尖锐的公开反应。因此，《真理报》明确写上南斯拉夫最近两年向美国人出卖自己的意识形态，换得了多少美元。

于是《真理报》宣布：南斯拉夫由于铁托同志在普拉的演

说——这里称那次演说是反苏的——而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不多不少正好九千八百三十万美元。据说我们同年十二月底又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六百万美元的支票，这笔钱是美国政府在南斯拉夫所掌握的。还有，《真理报》在这篇声明性文章中举例说，南斯拉夫由于拒绝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而从美国得到了六千零五十万美元。《真理报》还写道，由于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还要从美国政府得到相应的美元赏金。请看，莫斯科的《真理报》在攻击南斯拉夫的政策时竟然堕落到如此低下的水平。

这里对苏联攻击南斯拉夫的粗暴和侮辱性的程度感到十分意外，这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某些好意的，不了解情况的俄国人在议论，说似乎我们正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是他们对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这种做法的解释！他们说，否则许多事情不会这样讲，不会这样公布。我不知道，苏联的黑色宣传之所以提出这种说法，是否为了使苏联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如此严厉的攻击比较容易为人接受。

最后，我还要记一点，根据我们两国政府多次磋商正式商定的伏罗希洛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还有二十四个多小时就该进行了。南斯拉夫政府尚不知，也无法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伏罗希洛夫是否率领苏联国家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到目前为止，我已去过外交部六次了，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起先为的是商定访问日程，最近则希望他们哪怕是对我们说一句话：伏罗希洛夫究竟是去，还是不去贝尔格莱德。

我从来这里的旅客听说，贝尔格莱德已开始在伏罗希洛夫要经过的地方搭凯旋门，街上装饰着花和旗帜。在业已形成的这样一种气氛中，进行这次或者任何这类的访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和俄国人都清楚这一点，可是苏联政府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

宣布自己的态度的。他们希望贝尔格莱德作好一切准备，而他们在最后时刻单方面取消访问。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莫斯科。

昨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举行盛大招待会。有一千五百名来宾，外交团，自然还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出席。

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去不去。不去的理由有好几条。这里的苏联报纸发表了捷克对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攻击。他们捏造南斯拉夫的观点，然后按照苏联的公式加以谴责。此外，《真理报》发表了那篇大肆攻击南斯拉夫整个政策的文章，据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出卖自己的政策，来换取美元，这也是我不去参加招待会的原因。

不过，我还是去了。我完全呆在一边，离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坐的主宾席远远的。我不想同他们见面，也不想同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见面，因为由于《真理报》那篇文章，很容易会作出令人不愉快的解释。

米高扬离开主宾席，穿过相当拥挤的人群，向我走来，他来之前先同赫鲁晓夫交谈过。米高扬代表赫鲁晓夫邀请我去主宾席就座，苏联领导人和捷克东道主都坐在那里。我想，赫鲁晓夫的打算，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引人注目的场面。尽管《真理报》发表最恶毒的文章攻击南斯拉夫，而同一天却有南斯拉夫大使坐在赫鲁晓夫身边，这样赫鲁晓夫在他打算马上发表的讲话中就可以设法利用这一点，而且谁知道如何利用。我谢绝了米高扬，拒绝去主宾席。

光是邀请和拒绝邀请，事情还没完。接着我们对《真理报》和苏共中央今天的行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我相信，米高扬来请我，决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番交谈。虽然我们周围的人离我们

有相当距离，也许出席招待会的某些俄国人和懂俄语的外国人对于这次极不愉快的讨论可以听到一些东西。

我问米高扬，怎么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之后写出这样的有关南斯拉夫的文章，为什么他们败坏我们和他们为南苏建立良好关系多年所作的努力？米高扬回答说，是我们挑起这场冲突的，他们《真理报》的答复是有分寸的和审慎的。这是俄国人在我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惯用的说法。这次我没有“放过”米高扬。我问他：他说什么有分寸和审慎，是不是开玩笑？他回答说，他是当真这么认为，我便接着问他，既然他们今天在《真理报》上向全世界宣布每当我们同苏联发生分歧时，南斯拉夫就向美国人出卖自己的荣誉和意识形态，来换取多少多少美元，他能对我说这能是郑重地讲话吗？他们还写道，南斯拉夫由于召开了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通过了新纲领，将得到美元奖赏。难道这就是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这就是为我们之间建立新的更好的关系而作的努力的结果？

米高扬一时无言以对，因为招待员到我们这儿来了，给我们送来了葡萄酒。沉默了几分钟后，米高扬继续谈，说我们指望美国援助，我们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政策。我提醒他，只要我们的关系搞坏了，我们就总是听到苏联的这种非难。我向他举出一九五六年六月克里姆林宫会谈，我还列数了参加那次会谈的大多数人，他也在场，当时赫鲁晓夫声明，他们不仅丝毫不反对南斯拉夫接受美国贷款和美国援助，而且苏联也准备在同样的条件下接受美国贷款。赫鲁晓夫一年前在我们两国代表团贝尔格莱德会谈中也声明了这一点，当时米高扬也在场。现在，他们以苏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宣布，南斯拉夫的政策不是独立的，为这样的政策出卖自己，而且是为了取得美元出卖自己。米高扬无言以答。我们各自手里拿了一杯葡萄酒，谁也不想喝。谈话稍为停顿了一下，米高扬试图祝酒，他按

照惯常的方式说：“祝您健康”，我不怎么客气地回答他说：“也祝您健康”，但是我不愿喝。我们又一次相互祝酒，但是谁也没有喝，我们拿着酒杯，显然谁也无意接受对方的祝酒。

米高扬打破了沉默，他说，去年八月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已达成协议，相互不公开攻击。我回答他说，遗憾的是，同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没有意义，这一点我们迄今的关系已表明了，而他们今天公开地践踏我们已商定的一切。我提醒米高扬，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对苏联是友好的，而他们今天却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美国的仆从。米高扬声称，他没有看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问他，昨天在这里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谴责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而他竟没有看过我们整个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文件，难道可能吗？米高扬马上发现他错了。他试图纠正，声称他看了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文件。我对他说，我感到惊讶，他竟没有看过我们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文件，而与此同时他却能支持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对南斯拉夫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可是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连看也没看过。

此后，米高扬变得明显地焦躁不安。我们又谈到南美两国关系。我援引了《真理报》文章中某些最恶劣和最侮辱性的地方。我照着他们《真理报》上的办法对米高扬说，他们向南斯拉夫提供了二亿多美元的贷款，怎么他们连从南斯拉夫党的纲领中收买一句话也未办到，更谈不上收买南斯拉夫整个政策了，这说明他们是蹩脚的商人。

从我这方面来说，这番话说得太过分了。别的不说，米高扬曾当过苏联的贸易部长，而且这是他干了几十年的主要职业，所以我的这番话也含有对他个人的指责的味道。米高扬说我爱动气，我问他，在他们对南斯拉夫搞了这种种名堂之后他还能指望我说些什么呢。我说，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有人会赞同他们的这种方法，且

不用说他们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了。米高扬说，如果我说他们处于孤立地位，那就错了，孤立的实际上是我们南斯拉夫人，因为所有共产党都站在苏联一边，而南斯拉夫才是孤独的。我对米高扬说，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对这一切已经领教过一次了，何况，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如何收场的。

在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赫鲁晓夫在等米高扬回去，向他报告这次“使命”的结果，以便他发表讲话。米高扬离开了我，把赫鲁晓夫拉到一边，起劲地向他解释什么。我估计，米高扬是向他谈同我的争论，说我们的谈话糟得不能再糟了，我拒绝了赫鲁晓夫要我去主宾席的邀请。然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所有与会者都在等待的祝词。赫鲁晓夫讲得很吃力，虽然他在这样的招待会上发表祝词是异常轻松的。他提到苏共中央全会，接着谈到苏联化学工业发展的前景等等，但是只字未提南斯拉夫。讲话相当混杂，我想，在我同米高扬谈话之前，他的讲话并不是这样构思的。当赫鲁晓夫开始嘲笑那些说苏联剥削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时，米高扬就拿起酒杯，开始大谈其苏捷友好和团结的口号来了，从而结束了赫鲁晓夫的讲话，赫鲁晓夫实际上没有讲完。

我现在想，我同米高扬谈话时采取这样的态度并拒绝赫鲁晓夫请我到他那里去的邀请，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如果采取别的任何态度，都有害于南斯拉夫的威望。我想，我打乱了赫鲁晓夫的计划。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赫鲁晓夫原来打算发表有利于苏共中央有关南斯拉夫决议的讲话，可是，结果他却对南斯拉夫连提都未提。也许我错了，不过，我相信，在米高扬同我谈话之后，他便取消了有关南斯拉夫的讲话，而这样的谈话是一位大使同驻在国的政府副总理很少有一次谈话。

在同米高扬谈话之后，好几个外国人、中立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代表走到我身边来。他们中谁也没有问我我们谈了些什么。我猜

想，他们中有些懂俄语的人听到了米高扬和我谈话的某些内容。其实，他们只要望着我们，就会猜到谈话的内容。在《真理报》如此侮辱南斯拉夫之后，大多数人表示不同意。顺便说一句，波兰大使盖德也走到我身边来了。他开始对我说，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这样来谈斯大林。我打断了波兰人的话，对他说，这种话他该对赫鲁晓夫说，而不该对我说，说到这里，我们便结束了谈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莫斯科。

在我看来，贝尔格莱德对莫斯科形势恶化的初步反应是相当墨守成规的。这种反应包含了许多旧的过时的看法，用这些看法无法解释苏联领导方面，现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人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贝尔格莱德的来函重申了我们一两年前所谓“斯大林分子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某些旧论点，对此我写信作了回答。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论点：认为现在是某个别人，而不是赫鲁晓夫本人在决定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即认为现在赫鲁晓夫也不得不顺应某个别的人，作出让步。

赫鲁晓夫原来设想，可以在五月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那样的攻击南斯拉夫的声明，而在同一天，又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招待会上，让大约一千五百人，外交团、外国和本国的报界看到，他身边坐着南斯拉夫大使，以借此说明，苏联多么希望同南斯拉夫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损于南斯拉夫的消息，就会传遍全世界，而苏联领导的反南行径就又可以继续下去。我至少打乱了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

我知道，我们不能只通过《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来看待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论这篇文章是起劲地反南的。我在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给科查·波波维奇同志的信中，试图阐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观点。在这封私人信中，我还阐述了我为什么再也不怀疑

尼·谢·赫鲁晓夫是苏联政府方面现在采取反南行动的罪魁祸首。

所谓斯大林分子、中国等对赫鲁晓夫的这种政策有某种比较大的影响的结论在今天是毫无根据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据过去——当时苏联领导中力量对比是另一个样子——的惯例和习惯是这样想的。苏联的代理机构也不反驳这样的误解(赫鲁晓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总是想使“敌人”上当,用假情报来蒙骗“敌人”,这是赫鲁晓夫这个善于玩弄策略的老手擅长的手法。

一九五七年六月之后,赫鲁晓夫就对苏联最高层确保其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年来,他对党政机关的人事作了许多变动,最后组成了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他清洗了大大小小的,他认为靠不住的人,却没有清洗可能是斯大林分子的人。

在这么做的时候,非斯大林分子、以及苏联二十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决议也往往遭殃。我确信,搞掉朱可夫元帅完全是赫鲁晓夫出的主意,而不是什么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较量的结果,要说较量,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两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既是斯大林分子,又是非斯大林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如果是指某些集团和个人的话)的影响自一九五七年六月份之后就不再是赫鲁晓夫政策中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因素了。不过,虽然清除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集团,苏联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赫鲁晓夫根据对苏联实际情况的适应以及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念和思想,根据他在苏联握有的不容争辩的权力,来确定苏联的政策。例如,断言在清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之后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就在所谓斯大林分子的影响下,起来反对苏共二十大在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的积极成果,并本着旧

的精神加紧对这一领域的控制。自相矛盾但却是事实的是：斯大林分子被清除后，这一领域的状况更糟了，而且是按照赫鲁晓夫这个非斯大林分子的命令搞的……

我在这封信中提醒说，任何把苏联现领导人严格划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表面的、过时的和不正确的。现在再也不能按照几年前可能作出的那种分类行事了。更不应当把赫鲁晓夫目前反对南斯拉夫的这种政策解释为某人对赫鲁晓夫施加了影响，或者赫鲁晓夫向某些斯大林分子妥协。

在六月全会之前，赫鲁晓夫在对南斯拉夫和波兰施加压力时，经常利用主席团中存在反对派这一点，以斯大林分子相威胁，说要是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做这样，做那样，斯大林分子就会上台。甚至现在还在散播类似的口号，其用意是说应当支持赫鲁晓夫，免得某个更糟糕的人上台。尤其是波兰人随时准备扩散这些口号，于是哥穆尔卡的机会主义显得甚至是进步的。

我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在最近一年中在苏联的真正政治影响削弱了，尽管他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作为绝对的首领执苏联牛耳的：他是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军队统帅以及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

赫鲁晓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变换无常，可以得出结论，他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最高准则是机会主义。因此，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被清除之后的第二天他便是在苏联对内政策中比他们更甚的斯大林分子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他对南斯拉夫、乃至对其他国家无止休地玩弄“时冷时热”的花招上。此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在巧妙地拚命为他个人的绝对权力奋斗，这大大影响了赫鲁晓夫在人民中的威信。在以那样的方式清除朱可夫元帅之后，在人民和军队当中造成了对赫鲁晓夫不利的后果。而

对南斯拉夫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是，赫鲁晓夫的威信会进一步下降。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目前的反南政策的原因不可能在于直到昨天为止我们尚且还不熟悉的某些新情况，诸如斯大林分子的影响突然增大，过去的非斯大林分子转而采取斯大林分子的立场，或者，更加复杂的是，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共谋来反对赫鲁晓夫这个“非”斯大林分子。

南斯拉夫同苏联，同阵营在一系列方面客观上存在着深刻的对抗。从今天到明天，这种情况时隐时现，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关系，而苏联则希望把我们纳入阵营，这种努力和希望往往掩盖了南苏关系的实际内容。南共联盟纲领公开证实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这些矛盾。苏联的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尽管这样来划分已过时了——都确信，如果苏联试图仿效南斯拉夫，那么它就会垮台。赫鲁晓夫曾是第一个持这一信念的人，现在仍然如此。他们还确信，如果波兰和其他国家也效法南斯拉夫，那么阵营也会完蛋。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的原子基地包围圈以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即增加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和阵营所意味的“危险”，而阵营通过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在苏联霸权主义的旧的基本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原则上巩固起来了。

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只有等待赫鲁晓夫什么时候转而向我们进攻。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借口是我们攻击了他们和阵营。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对苏联领导地位的大国和阵营概念，赫鲁晓夫这个工于计谋的人选择的时机，而且还有一个事实：赫鲁晓夫终于把所有共产党都集合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周围。

此外，我不怀疑，最近这次攻击我们的祸首是赫鲁晓夫本人，而且他这么做是出自他的本意，而不是受到某一方面的压力。或

许由于受到苏联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对我们攻击的影响，眼下我过多地只是强调了赫鲁晓夫的某些特点，而对他政策的某些积极方面没有谈及。然而，这不是试图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提供一个完整的概貌，而是对当前南苏关系写的一篇日记，而且是在对南斯拉夫的粗暴攻击的影响下写的。

取消信贷协定

苏联报纸的报道。阵营采取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措施。同弗·科兹洛夫谈话。苏联政府再次单方面取消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信贷协定。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表反南讲话。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给艾森豪威尔的信。贝尔格莱德电台宣布我从莫斯科调回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莫斯科。

这里继续进行反南运动。苏联报纸每天发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攻击我们的纲领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表态性文章。今天《真理报》就根据四天前《新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刊登了东德作这种表态的文章，标题是《同马列主义不相容》，副题是《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五月十四日《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也说明苏联的这场运动之广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学术会议讨论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这篇报道全文如下：“社会科学院讨论同现阶段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的会议今天在苏联科学院开幕。康·瓦·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院士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鲍·尼·波诺马廖夫教授作了同现阶段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基本问题的报告。报告之后，科学家们纷纷发言。会议引起了首都学术界人士的很大注意。出席会议的有一千多人。会议将开两天。”

在领导这次会议的上述两人当中，我对波诺马廖夫比对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要熟悉得多。我早已注意到，波诺马廖夫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两年之后仍在自己办公室的中央挂着斯大林的像。

我不相信，在别的社会和制度中存在着类似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以及苏联社会和阵营中由他们管辖的党和国家官员大军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裁决，就象他们目前反对我们的纲领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样，是最终的，不能撤消的。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纲领不象是批评，而是象不由分说地把异教徒和背叛真理和真正的信仰的人革出教门，这里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在这方面积极参与的是有自己的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的阵营各国和各党，其次是世界上支持苏联立场的大多数共产党。必须承认，南斯拉夫的处境可谓难矣。

虽然苏联政府没有取消同南斯拉夫政府达成的关于在苏联出售我们的一定数量的报纸的协定，但是又是到处都买不到我们的报纸。登有我们答复中国人的文章的那几期报纸在莫斯科根本就看不到。很可能是被没收了。目前国家关系方面暂时相安无事。考虑到这一事实，我认为，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声称他们不会“加剧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是为了欺骗公众。俄国人的做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应当公开答复，不要老等着。我们的任何沉默，都会被这里理解为我们的软弱，而这只会使他们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加无礼的行动。

根据以前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我们的一支海军分舰队到这里进行礼节性访问。显然苏联军官得到指示：待我们的水兵要友好，就象待“对第七次代表大会不负有责任”的人一样。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祝酒词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苏联报纸对我们水兵的

这次访问的报道的用意也是如此。俄国人对由亚历山大·贝利奇和西尼沙·斯坦科维奇率领的我们的大学教授代表团很可能也将采取类似的态度。这个代表团后天抵达莫斯科。每当我们的领导和苏联的领导发生了冲突，俄国人就不惜哄骗我们个别的杰出公民。他们使我们的人处在友好的气氛中，然后设法使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此外，俄国人在南斯拉夫一些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这里是考虑到的，所以他们试图扩大这种差别以利于他们自己。

关于正式确定的，甚至连细节都已谈妥的伏罗希洛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这里人人都知道，是俄国人在最后时刻单方面取消了。外国人问我们时，我们就证实这一情况。我们没有谈苏联政府所采用的侮辱性的方式：他们拒不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作出任何答复。我们是从苏联政府对苏联报纸的通报中得知这一决定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莫斯科。

最近瑞典大使和丹麦大使拜会了我。奥地利、芬兰和瑞士三国的大使也要求拜会我。每当南苏发生冲突，我们的关系中出现危机时，西方方面来同我作这样的晤谈的，打头阵的通常是欧洲中立国家中的某一位人士。

现在他们说，就南斯拉夫政策而言，没有任何变化，是苏联方面改变了态度。他们感兴趣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对我说，最近这里传说苏联方面向南斯拉夫提出了某种最后通牒。据说，因此我们才不答复《真理报》五月九日的攻击。也许西方人抛出这个消息是要挑起我们尽早答复，也许甚至是俄国人抛出来的，因为，最后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最后通牒似乎是活该，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好答复他们的。《战斗报》作出回答将消除这种奇谈怪论。

这里的外国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再也不能谈什么斯大林分子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他们说，整个事情出自赫鲁晓夫之手，因为南斯拉夫人通过批评苏联，利用赫鲁晓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月十四日，我同印度大使梅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位印度人表示完全理解南斯拉夫的政策。梅农大使已有近两个月没有在职了，他病了，将只在莫斯科呆四天。他对我说，他要拜会赫鲁晓夫，谈谈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作这一改变的原因。

这里在纳赛尔访苏期间举行的友好群众大会上，纳赛尔在讲话中明确声明：“苏联和南斯拉夫是在埃及遭受侵略期间在安理会援助埃及的唯一两个国家”。在纳赛尔讲话之前，赫鲁晓夫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谈到同一个问题时只强调苏联的援助。当翻译把纳赛尔讲的有关南斯拉夫的话翻译给出席大会的人听时，在举行大会的最高苏维埃大厅里寂静无声。接着近两千名与会者悄悄议论起来了。虽然这只不过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目前情况下，纳赛尔的这番话却是对我们有利的。甚至可以说，纳赛尔把苏联和南斯拉夫援助埃及的政策相提并论，是出乎俄国人的意料的。

阵营国家的代表根本不再同我交谈政策问题。阵营里的亚洲人现在比欧洲人要好，而在亚洲国家的代表当中蒙古大使巴特的态度最为得当。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不同，波兰大使塔德乌什·盖德仍同我保持以前的关系。这位波兰人把五月十五日《人民论坛报》谈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章带给了我，很可能他想接着同我谈谈。虽然波兰这篇文章的措词和语气不同于苏联报纸进行的反南宣传运动，但是这篇文章毕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多处跟俄国人一样批评我们，不错，措词较为客气，没有侮辱性的字眼。

* * *

在莫斯科可以听到消息说，布尔加宁实际上已被从党的领导

中排除。我认为，目前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因为早在去年六月他就丧失了任主席团的任何作用。西方一位代表告诉我，朱可夫元帅在莫斯科郊区的住宅和别墅已封闭了。据说朱可夫已不再在苏军中服役，退休了。我认为，幸好赫鲁晓夫在处理朱可夫元帅这件事情上没有象对待莫洛托夫那样，任命莫洛托夫为苏联驻蒙大使，等于是把他流放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这里接连召开阵营国家的各种会议，着重是谈经济问题。俄国人的方针是，企图通过在所有阵营国家之间实行更广泛的和更细致的分工来实现程度尽量高的经济一体化。这将加强相互的依赖，最终实现阵营更大程度的团结。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的阵营“磐石般的团结”，要比至今通过时而对阵营的这些成员，时而对那些成员施加政治和党的压力以及采取“意识形态的”措施实现的团结，有更加牢靠的保证。

我还要记一点，莫斯科当局没收了五月十七日的《战斗报》，那一天的《战斗报》上刊登了对莫斯科五月九日《真理报》攻击的答复。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五月二十三日刊登了东正教会要求保卫和平的呼吁书。呼吁书照例是按照起草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的类似文件的方式写成的。呼吁书首先指出，在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大总主教区恢复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东正教教会是团结一致的，它们对保障和平深为关切。然后呼吁书谴责核武器的积聚和试验，最后呼吁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停止试验性爆炸，把原子能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苏联外交部关于此问题的照会就是这样结

尾的，一字不差。《消息报》援引说，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亚历山大港、埃塞俄比亚、俄罗斯、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的大总主教和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以及亚美尼亚的大主教。

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团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了名，因为呼吁书也是他们完全可以接受的。然而，俄国人说，这出乎他们的意料。很可能他们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的，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是苏联政权手中的“传送带”，假如现在南斯拉夫方面，即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方面提出一份呼吁书的话，他们是很难会在上面签名的。鉴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在呼吁书上签了名，苏联政治检查员就只好对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采取歧视态度，把他的名字从签名者的名单上删去。如果俄罗斯东正教会自己能自由地决定这件事的话，我相信，它的态度会不同于苏联领导的态度，会比他们好。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塔斯社五月二十二日《参考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谈谈美国给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全文如下：“（塔斯社纽约电）《纽约邮报》记者艾伦自华盛顿报道：铁托现正设法从美国得到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艾伦断言，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正作‘审慎准备’，试探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便着手正式谈判。艾伦写道，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有种种迹象表明，将同意继续援助南斯拉夫。艾伦断言，南斯拉夫将得到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用来在美国和西欧购买重型机器和其他工业设备，还得到允许购买‘有限数量’的美国武器，特别是购买美国人已供给南斯拉夫的军事设备的备件。”

《纽约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极其可能是俄国人自己写的，然后他们又从那里将此文“客观地”转登在塔斯社《参考新闻》上。在

这个艾伦的文章中有莫斯科用来证明他们在五月九日的《真理报》上对南斯拉夫进行公开攻击所需的一切材料。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俄国人自己写有关南斯拉夫的文章，专门在西方报刊上发表，然后在塔斯社《参考新闻》上转登，这样便按照他们自己有关南斯拉夫的公开言论的精神向自己的干部“通报”。

我相信，不少苏共中央委员对塔斯社《参考新闻》上刊登的苏联“黑色宣传”的这种消息都是信以为真的。十五天前《真理报》转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估计，援引了数字，说明南斯拉夫最近两年间为了奉行自己的独立的，或者按这里的说法，“反苏的”政策，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多少美元。现在则是“铁托向美国人要求得到的”已得到证实的确切的美元数目。这就是说：《真理报》五月九日那篇声明性反南文章所援引的事例是确切的，苏共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证明便是塔斯社《参考新闻》上刊登的《纽约邮报》的那篇文章。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莫斯科。

这里继续“奉行”针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但是正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我们发生冲突时赫鲁晓夫对我说的那样，他们的做法同斯大林不同。例如，今天的《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致铁托同志的生日贺电。即便五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也不是只登给铁托的贺电，而是同一天还刊登了新华社关于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几项决议，此次会议是于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举行的。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即反对南斯拉夫的如此大量的文章，从来不提我们纲领中的基本事实之一：我们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地位和权利平等的原则基础上。我可以说，这是南共联盟纲领中最使苏联恼火的一点。俄

国人并不特别关心：南斯拉夫对马克思或者列宁有关某个问题的看法是否作出了错误的解释，使俄国人感到恼怒的是，南斯拉夫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批评在这些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苏联霸权，以及我们要求消除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本障碍之一——过去的这种余毒。因此，苏联报纸今天列数修正主义者、一些社会民主党以及个人近半个世纪来犯下的弥天大罪。从而企图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而不是向本国公众和世界公众至少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现代社会发展今天提上日程的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今天，在阿富汗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政府第一副总理科兹洛夫走到我身边，交谈了我们关系的现状。他谈到苏联政府如何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说从赫鲁晓夫给铁托的生日贺电以及从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组织午宴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也出席了那次午宴。我回答科兹洛夫说，葛罗米柯今天交给我的一份照会表明，苏联政府的政策不同于贺电和宴会上的祝酒词。根据这个照会，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苏联政府同南斯拉夫缔结的并且已推迟过一次的所有贷款协定。我对科兹洛夫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这两件事是同时做的，他们发表贺电和祝酒词，表示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可是马上又交给我这样的照会。我问科兹洛夫：据他们设想采取这种方式如何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科兹洛夫于是谈到苏联政府提出了发展苏联化学工业的宏大计划。实现这些计划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只好从以前答应给南斯拉夫的贷款中来筹划。我对他说，这是不同的两码事：一个是他们履行早已签订的国际协定的问题，一个是涉及他们的化学工业，这完全是他们的内政，而南斯拉夫同苏联签订的协定同他们国内发

展化学工业或者别的什么工业的计划毫不相干。

当科兹洛夫在我们交谈了这样一番话之后，举杯预祝我工作取得成就时，我也预祝他工作取得成就。我说，我只是不希望他在一件事情上，在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斗争中取得成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昨天发出照会单方面取消，即再推迟五年执行已推迟过一次的苏南关于兴建南斯拉夫炼铝工业、建立一座氮肥厂和其他企业的贷款协定。

葛罗米柯在把照会交给我之前面容严肃地对我说，苏联政府这样做并不是要恶化我们的关系，而是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苏联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别的原因，还考虑到铁托同志的讲话，铁托说过南苏经济关系应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

我对只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过去就有过的意识形态分歧，他们就再次取消履行国家间协定一事表示遗憾。我们的这些分歧在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存在，程度甚至更严重，但是它们并没有单方面取消它们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协定。因此这件事就具有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进行经济制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同另一个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三年前，还在我们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时，我们就同苏联政府就这些问题达成了协议。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有另一种想法，抛弃了早在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已达成的协议。

葛罗米柯好几次回到铁托同志关于发展我们的经济关系要“互利”的讲话，说他们俄国人现在想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建立这样的基础。应当再次听听葛罗米柯的话，说什么苏联政府交给我们的这样的照会并不想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对他说，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了它真正想说的话，他们的照会使人对此丝毫不怀

疑，这时他才不讲话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莫斯科。

昨天在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同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我颇为冷淡地听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指责南斯拉夫，数落我们对目前苏南冲突负有罪责；俄国人不希望恶化已经改善的我们之间的关系；铁托违反了一九五七年布加勒斯特会晤时关于我们之间不公开进行攻击的协议；我们对苏联进行了公开的攻击；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感谢美国的援助，说美国的援助是无私的，而对南苏经济关系则说，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等等。

然后赫鲁晓夫谈到他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去贝尔格莱德，希望同南斯拉夫重建友谊，而我们却多次使我们之间发生公开冲突。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使用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某些观点，虽然他并没有受权这么做，因为我们是绝密地从苏共中央拿到这份报告的，只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在自己的编辑部出版了这份报告，以便给苏联和社会主义带来尽量大的损害，因此我们也走上了给苏联抹黑的道路。接着赫鲁晓夫谈到我们处境孤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团结一致的，唯独南斯拉夫步调不一，说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似乎苏联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只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说，“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呢？”）。

在一些事情上，我回答了赫鲁晓夫。不过这一次大多数问题我没有作答，因为自从我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们不止一次谈过同一一些问题。我没有去进一步解释斯大林和杜勒斯的问题，我问赫鲁晓夫，难道他们非得取消国家间的贷款协定不可。我还对他说，没有苏联这些贷款，南斯拉夫不会垮台，正如假若没有美国的贷

款，南斯拉夫也垮不了台一样，我们感到奇怪的倒是，苏联政府在进行了一个月的意识形态运动来攻击南共联盟之后竟采取主动行动，来恶化我们的国家关系。

赫鲁晓夫表示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经济，而不是政治”。我对他说，这正是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这时赫鲁晓夫情绪变了，强调说，贷款资金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既然铁托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互利”原则基础上的，那么国家间的这些协定就只好这么办。

我认为，谈话是无益的。赫鲁晓夫要求我向贝尔格莱德报告，要改善我们的关系现在取决于南斯拉夫。对此，我说，现在很少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并没有取消履行国家间的协定，而是他们，不过，我将向贝尔格莱德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莫斯科。

到莫斯科来的西方国家经济代表团越来越频繁了。俄国人对他们的接待很好。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谈到苏联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同时他并没有为此而停止指责南斯拉夫同西方合作。我们听说，苏联方面对西方较大国家的经济代表团说，跟象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合作几乎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南斯拉夫是个小国，穷国，西方经济发展的真正前景在于苏联和西方建立和发展合作，存在着进行这种合作的现实前景和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可能性。显然，俄国人对阵营国家用一种标准，对中立国家用另一种标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成员国用第三种标准，俄国人不停地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建议进行最高级谈判。

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莫斯科。

这里刊登了尼赫鲁关于南苏冲突的不偏不倚的讲话，他们把

这说成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意识形态”冲突，尼赫鲁不会对此进行干预。在莫斯科，人们认为，印度的观点现在比最初时同苏联的态度接近些。俄国人没有发表尼赫鲁早先谈到南斯拉夫在同苏联的目前冲突中的立场时对于我们有利的一次讲话。

苏联报纸发表了赫鲁晓夫在索非亚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使人担心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在一个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的近邻发表这样的官方讲话，是想把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尽量动员起来，对南斯拉夫采取敌视态度。赫鲁晓夫这样做，给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正常关系带来了损害。即便赫鲁晓夫不发表这样的讲话，这种关系已不好了。保加利亚领导对于尽量恶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种怂恿，很可能是求之不得。

引人注目的是，苏联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代表，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国家在内，大献殷勤。他们郑重其事地报道克虏伯公司的代表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米高扬在几次会谈中是他们的谈判对手。接着苏联还进行了试探，要西方邀请赫鲁晓夫参观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俄国人对最小的大西洋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进行工作，赫鲁晓夫就贸易问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等等。

俄国人对西方采取和解态度是想要达到几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使他们同我们的冲突不致扩大。苏联政府期望这样做将产生最好的效果：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尽量少过问目前的南苏冲突，把南苏冲突看成是共产党人之间的“内部”争吵。

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莫斯科。

我提请贝尔格莱德注意赫鲁晓夫六月二日给艾森豪威尔关于就发展美苏经济和科技合作举行谈判的信和建议。我认为，我们的报纸应当大量报道苏联主动建议发展苏美经济关系这件事，尤

其是因为赫鲁晓夫提出了美国“按照正常条件”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他还谈到苏联将“分期”偿还这些贷款。根据这封信可以看出：他们设想这些贷款是长期的。其次，在我看来，南斯拉夫报纸应当大量报道赫鲁晓夫信中这样一些段落，那里谈到苏联将给外国企业以特许，那里事先就接受在苏美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初阶段苏联可能出现贸易逆差这种状况，正如赫鲁晓夫现在所设想的那样。

客观地向我们的公众报道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对他们同美国关系的真实态度，这是件好事。这样，我国公众就比较容易把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同苏联发展其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政策区分开来。俄国人对我们进行攻击已有十年时间了，而且今天又在对我们进行攻击，原因是我们得到西方和美国的贷款，而今天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替苏联要的却恰恰是这样的贷款。当南斯拉夫不得不向西方和美国取得这样的贷款，而且是在于我们不利的条件下获得的时候，这里的俄国人几乎把这说成是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俄国人攻击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论据”。而当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时，这却成了和平共处政策和国家间合作的典范。

依我看，赫鲁晓夫的信是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政治宣传姿态。不应当完全排除将产生实际结果，虽然我认为赫鲁晓夫现在并不指望美国会提供贷款。苏美文化关系在逐渐增多，科技和贸易关系也在发展，尽管苏美之间尚无正常贸易往来。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对西方现在奉行的政策通过他最近这一步骤是只会有所得的。其他西方各大强国，即便是西德很可能也不会对赫鲁晓夫的信完全无动于衷。

我认为，这不单单是苏联进行宣传的问题，虽然赫鲁晓夫的信

作为一种宣传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信谈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合作。问题还在于苏联在一系列领域对西方的技术有具体的需要，而且这将在较长时间内对苏联的政策产生影响，使之符合赫鲁晓夫六月二日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的精神。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莫斯科。

还在几天前贝尔格莱德电台就广播了消息，说我已被任命为南共联盟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这个消息宣布后，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的人全都明白，我即将奉调回国，因为我不可能身兼两职，既当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又在我们国内任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委员。正如往往发生的情况那样，外交团总是最先知道哪位大使将调任，这里也开始问我：还要在莫斯科呆多久。

调任的事也好，我应当离开莫斯科的日期也好，贝尔格莱德根本没有通知我。想必快了吧。我估计，如果不调任的话，是不会在报纸上宣布我任新职的。

我在这里的辞行拜会一周以后就该开始了。我想，我将在下月初要求拜会苏联领导人，这样我七月十五左右就可以启程了。如果贝尔格莱德在这方面没有专门的指示，我要求拜会一九五六年初我到莫斯科时曾作过礼节性拜会的那些苏联高级人士。当然，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我现在对赫鲁晓夫作辞行拜会情况会如何，如果这次拜会得以进行的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莫斯科。

根据贝尔格莱德电台六月八日的广播认为，苏共中央关于音乐创作的决议谴责了斯大林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因此现在苏联在音乐创作方面奉行一种新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一个政党的最高机构就苏联今后应当创作什么样的音乐专门作出决定，这件事

本身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个艺术部门在苏联社会的地位了。苏共中央关于音乐的决议实际上在好几处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观点是正确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行政机构对“音乐创作”的控制将加强，在这个问题上还谈到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决议责成党的州委、边疆区委员会和共和国委员会从事这项工作。决议引用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有关“艺术的党性”的言论，比例如下：赫鲁晓夫的话引用了三次，列宁的两次，斯大林的（间接地引用）一次。

虽然苏联的观点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但是他们毕竟希望给人至少造成某种印象；似乎这里也在反对“个人迷信”。因此斯大林受到指责，说他在七年前《真理报》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中，对苏联两三个歌剧批评得过分了。同时又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他是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影响下这么做的，至于这三个人，则明确地说，他们“众所周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对斯大林施加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样一种手法，把贝利亚和其他人牵扯在一起的做法，企图为斯大林辩解，说他在音乐问题上也受他们的影响，这说明苏联最高层的现状不大妙，他们企图用这样一些决议来愚弄苏联公众。

《战斗报》也干出了同贝尔格莱德电台相类似的事情来了，不过是在政治方面。《战斗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赫鲁晓夫六月二日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的报道。在这个版本里既没有谈苏联希望获得美国长期贷款，也没有讲美国资本采用其他形式参与苏联的经济，而这恰恰是赫鲁晓夫信中最重要。我非常清楚塔斯社不发表这一点的原由，可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南斯拉夫报纸也不发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莫斯科。

最近我同美国大使汤普森谈了谈。我想知道汤普森对赫鲁晓夫希望美国向苏联提供优惠长期贷款的主张有何想法。汤普森

说,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信有几个目的:第一,加强苏联对西方关系的地位,把苏联说成是倡议发展贸易的国家。第二,俄国人现在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仅出于政治考虑,而且还由于他们过高估计美国经济困难的影响,于是认为目前向艾森豪威尔发出这样的信的时机特别有利。第三,如果在美国人身上没有产生什么结果,那么俄国人认为这一行动将加强自己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地位,俄国人已向它们提出进行各种大宗交易。这时,汤普森提到西德,西德比所有西欧国家都更能满足苏联引进新技术的需要。

我开玩笑地问汤普森:他能否告诉我,他就赫鲁晓夫的这些建议向华盛顿提出了什么样的忠告。汤普森说,苏联决不可能得到美国国家贷款。至于说美国私人公司,那是另一回事,美国私人公司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赫鲁晓夫信中的这些建议。不管怎么说,美国大使也认为,俄国人的确很需要外国参与苏联的化学工业,最近一次中央会议就化学工业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是他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美国和西方已有的现代化工艺流程。

有些国家的大使对我说,他们已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要他们专门研究一下南苏关系的现状。这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进行分析。他们对我们决定承认东德仍然作出否定的评价。他们说,我们本来期望我们承认东德就会确保我们在莫斯科,在赫鲁晓夫那里发挥更大的影响,可是现在,情况表明我们的期望是没有根据的,南斯拉夫这样做是单方面向苏联和阵营让步。我没有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向某一方面作什么让步。南斯拉夫方面迟早都是会承认东德的,而不管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发展如何。

我还要记一件事:英国国庆时,赫鲁晓夫、米高扬、科兹洛夫、基里钦科、福尔采娃以及其他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去英国大使馆了。这里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苏联方面的一种“亲善”表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莫斯科。

葛罗米柯今天把赫鲁晓夫就举行东西方最高级会议新近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戴高乐的信件交给了我，让我转交给南斯拉夫政府。苏联政府认为迄今在莫斯科同西方各大强国代表举行的会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赫鲁晓夫在信中向西方三大强国政府提出问题：它们对举行最高级会议究竟感不感兴趣。如果俄国人想真正干点事，他们是不会向自己的对手们写这么长的信的，也不会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很可能苏联政府估计它在筹备东西方会议问题上的地位并不怎么坏，而西方强国的不合作态度却十分明显，再发出这样的一封信，会使苏联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纳吉·伊姆雷遭杀害

纳吉·伊姆雷和几位同志遭杀害。外国的反应。六月十九日同赫鲁晓夫谈话。在西方国家驻莫斯科大使馆前“劳动人民举行示威”。苏联政府最终取消同南斯拉夫达成的贷款协定。东西方关系恶化。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决议十周年。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报纸六月十七日发表了纳吉·伊姆雷和几位同志遭杀害的公报。^① 根据南斯拉夫政府同匈牙利政府签署的将不追究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以前所采取的行动的责任的协定，纳吉·伊姆雷等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自愿离开了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苏联军队强行把他们抢走，去向不明。他们同匈牙利人一起就是这样践踏了匈牙利新政府同另一个国家——这次是南斯拉夫就一个问题签署的第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协定。

冰岛驻莫斯科大使今晚举行招待会。纳吉和几个同志遭杀害的消息成了晚宴上的主要话题。人们为之震惊，愤愤不平。大多数外交代表感到纳闷：为什么莫斯科现在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这在世界上造成的影响将对苏联政府及其国际威望

^① 根据匈牙利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发表的官方公报，除了纳吉·伊姆雷外，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毛莱泰尔·帕尔、吉迈什·米克洛什、西拉季·约瑟夫博士。还有五个人被判处五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所有被判刑的人都是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成员。

极为不利。虽然苏联政府试图给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不关他们的事，而是匈牙利的事，但是大多数外国评论员都把纳吉遭杀害归咎于苏联。俄国人最近几年有关阵营国家的独立、主权、不干涉内政的种种言论又一次全给戳穿了。

看来，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甚至斯大林的某些诉讼案，哪怕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也要比现在在纳吉遭杀害的问题上要讲求法制一些。在斯大林时代，甚至老百姓，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也出席旁听某些诉讼案。也有人估计，纳吉早就遭杀害了，或者在侦讯期间就死去了，只不过现在才公布他遭杀害的消息罢了。

对纳吉提出的下列一些指责也牵涉到我们：纳吉呼吁“取消军事集团”，指责纳吉搞“民族共产主义”，西方老早就这样称南斯拉夫的国内制度了。还指责纳吉在匈牙利组织工人委员会。纳吉·伊姆雷被说成是口袋里揣着党证的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是打着社会主义口号来掩盖其背叛行为的人，等等。公报首先给纳吉作的基本政治鉴定是，说他是“修正主义者”，然后才说他被判处死刑。所有这些指责这里已多次公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南斯拉夫提出过。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曾让纳吉和他的同志们避难，两年来一直受到指责，而现在这种情况又重现了。这一切不仅使南斯拉夫同苏联之间的关系恶化，而且也使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恶化。

在谈话中我注意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以后到这里来的大多数外国人不知道卡达尔·亚诺什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曾就纳吉和他的同志们自愿离开我们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一事签署过协定。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昨天对此提出了令人生疑的说法，它未提协定，而是说纳吉如何从南斯拉夫大使馆出走，“因为他得到保证，可以自由行动”。这样说可以解释为，似乎纳吉·伊姆雷等人是受了我们方面的骗，而不是苏联军队践踏了卡达尔政府的第一个国际协

定，把纳吉和那批人抢走了。我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最好是我们重新发表我们政府同卡达尔政府达成的协议，以便使世界公众注意，是匈牙利政府违背了那个协定。

在昨天的招待会上米高扬和苏联其他代表基本上是孤单的。外国人没有象通常那样走到他们身边，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交谈。匈牙利外交官站在一边，以避免大多数外交代表的抵制。由于这次事件，莫斯科的总的政治气氛恶化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莫斯科。

昨天我要求赫鲁晓夫或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某个成员接见我，如果赫鲁晓夫不接见我的话。赫鲁晓夫今天接见了。我把我们中央委员会六月十四日的复信交给了他。赫鲁晓夫注意到，我们的信很长，他把信放在一边，说他稍后将仔细地阅读。可以看出，他并不指望在纳吉遭杀害的消息公布之前写好的我们的信的内容会在某个重大的方面使我们的关系变好。

我们在纳吉遭杀害造成的令人难受的气氛中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铁托给赫鲁晓夫写这封信时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某种类似的情况。如果在此期间他们没有杀害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也许铁托在伊斯特拉的拉宾的演说以及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会是我今天同赫鲁晓夫谈话的主要题目，因为演说和信呼吁双方继续苏南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一来，铁托的演说和中央委员会的信只不过提到了一下，而给赫鲁晓夫的信却看也没看。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说苏联无意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他们曾确定了本应出席我们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此以前，他们还接受了我们请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国家代表团正式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虽然我们拒绝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无论是他们，还是别的党都没有攻击我们。如上所见，他们

把过去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说得符合今天的情况。在进一步的谈话过程中，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益处。

我谈起纳吉遭杀害的事。我对他说，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这样做，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对于苏联和匈牙利来说，任何别的人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不利的了。从政治上来说，纳吉在匈牙利的意义越来越小，他们现在却把他从肉体上消灭了，但是从政治上倒使他复活了。显然，赫鲁晓夫对这个题目感到不愉快。他说，这是匈牙利的事情，不是苏联的事情，说他个人同意匈牙利人采取这样的行动，若是他，也会这么做的。他指责我，说我作为共产党人居然可以指望世界舆论，共产党人对这样的和类似的事情有另外的阶级标准。

赫鲁晓夫换了话题，谈到他们的工业搞得多么好，今年将有一个很好的收成，等等。我说，这使得他们容易改变对同我们签订的贷款协定的消极态度。赫鲁晓夫拒绝了，他进一步发挥铁托关于“互利”的讲话的含义，说他们是顺应我们的态度。赫鲁晓夫说：铁托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苏联通过贷款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只消讲那么一句话，就不会导致这种情况。今后苏联同我们的贸易将在“互利”的原则上进行。

我提到他在索非亚的讲话，以及《真理报》一个半月来日复一日地刊登其他党攻击南斯拉夫的表态文章。我问这种情况是否会停止。赫鲁晓夫说，十分重要的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反对我们，他们将连续刊登这样的文章。我指出，西罗基昨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在提出代表大会的议程之前就先攻击南斯拉夫，很可能基里钦科在布拉格的代表大会上会跟赫鲁晓夫在索非亚一样地攻击南斯拉夫，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和解，而是相反。赫鲁晓夫说，捷克人是自由表明观点的，他对苏共的做法负责，已够他忙的了；说基里钦科不会讲很多，他赫鲁晓夫将于七月

初去东德参加党代表大会，届时他将答复铁托在伊斯特拉的讲话。

同这部分谈话相反，赫鲁晓夫接着说，他知道我们的领导在南斯拉夫人民当中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享有巨大的威望。如果我们以为他们在苏联不享有巨大威望，那就错了；我们说苏联人民不完全同意他们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解释说铁托一九五六年在苏联城市受到如此友好的欢迎是与苏联领导的意愿相违背的，也是不对的。他说，现在这里有人说，他赫鲁晓夫很快而且轻易地相信南斯拉夫人的话是犯了错误，莫洛托夫对此的估计好一些。赫鲁晓夫问我有何想法：我们之间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难道符合他的心意吗？我说，南斯拉夫也有人责备铁托，说他全面支持苏联走得太快了，我们以为已过去的事情现在又重演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说，我们在说他回到斯大林的政策上去了，说我们在叫嚷：请看，赫鲁晓夫在索非亚为情报局的第一个决议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回到斯大林的政策上去了。赫鲁晓夫说，这一切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们南斯拉夫人除了一九四八年前后那个最糟糕的斯大林以外，关于他什么也听不进去，而这并不是全部事实。我们苏联人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比你们要清楚得多，不过，斯大林还有另一面。赫鲁晓夫说，今天我听到世界上有人说我跟斯大林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也是应该的，让西方资本家知道，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斯大林是有错误的，但是，斯大林的另一面，积极的一面，我是怀着最大敬意的。

说到我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他知道我们的领导人过去和现在在人民当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的领导战功彪炳，他现在仍然这么说，永远要这么说。今天，我们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赫鲁晓夫说，所以我们苏联领导人就要

与之进行斗争。赫鲁晓夫接着以提问的形式“秘密地”(信任地)对我说,一位“办事很认真的同志”告诉他,说卡德尔在南斯拉夫是南斯拉夫观点的主要维护者是不确实的,说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原来准备在《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上签字,但是铁托从贝尔格莱德指示他们不签。您知道得最清楚,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说,我感到惊讶,因为向来是铁托讲“半句话”我就全明白他要讲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捣乱,事情往往不是按照铁托和我达成的一致意见那样办。

我说,我可以“信任地”告诉他,他得到的这些情报不确切。我是参加莫斯科十一月庆祝活动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当时兰科维奇、卡德尔和铁托之间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我进行的,我可以告诉他,所有的人自始至终都是绝对一致的。赫鲁晓夫说,“您知道得最清楚,肯定是这样”。(跟我一样,赫鲁晓夫是明白我们“信任地”交换的这些“情报”的用意的。据我看,重要的是,在我们关系目前这场危机中俄国人打破了惯用的老一套手法,孤立卡德尔,吹捧铁托和兰科维奇,而是“有情报”说铁托是“反对在宣言上签字的那个人”。)

象过去通常所做的那样,赫鲁晓夫长时间地谈论我们的野心:我们南斯拉夫人硬要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我们自称唯有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世界;我们总是有理,我们太骄傲;我们一旦说过的话,我们就决不改变,也不纠正。然后他谈到南斯拉夫惊慌失措,逮捕支持情报局的人,有些人跑到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去了。实际上,这清楚地证明南斯拉夫在目前这场危机中的决心,这使赫鲁晓夫感到不愉快。我“安慰”他说,我们那里没有惊慌,我也听说逮捕了一些情报局分子,不过我们对这些人很了解。可能个别心怀鬼胎的人感到惶恐不安,而这也是正常的。

赫鲁晓夫就六月二日致艾森豪威尔的信说,我们很快就开始利用这封信作为论据来攻击他。他问我,我们是否真的以为他期

待美国提供贷款？他并不期待，只是由于政治原因才这么说的，美国不可能提供贷款，这是很清楚的，上帝不会让我们苏联人制订计划时指望美国提供贷款的。如果美国不提供贷款，我们将同英国、西德、法国和日本做生意。赫鲁晓夫说，如果这也不行，那我们可以自己干，我们将把发展化学工业推迟一年，全部情况不过如此。他向我证实：苏联报纸还要继续刊登“批判”南共联盟的文章。苏联政府即将对我们关于贷款的照会作出答复。要他们改变他们已采取的立场是“不可能了”。至于说国家关系，赫鲁晓夫说，将保持“睦邻”关系，即不同于他们同阵营国家，乃至中立国家已有的那种关系。

我们谈到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赫鲁晓夫说，（虽然他没有讲得很明确）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另一副样子，即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他们决不会反对我们接受美国的援助。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清楚：他一会儿说他们不反对我们接受美援，一会儿又重弹其美国为何要援助我们的论调。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现在想“解释”两年前他的想法，当时他说他们同意我们在美援问题上的看法（不过他决没有明确地讲过）很可能不仅仅由于我们，而且还由于波兰人也在按照上面的提法接受援助，而这是苏联感到不愉快的。

赫鲁晓夫说，“他们有情报”说，南斯拉夫逮捕了收听电台转播他在索非亚的讲话的人。我驳斥了这种说法，说这是完全不确切的。其实，我们的报纸报道了他的讲话，而且铁托同志多处提到并援引他在索非亚讲话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还发表了他们攻击我们的其他言论，而他们这里什么也不发表，谁也不知道南斯拉夫的真正观点。（这些情报大概是赫鲁晓夫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得到的。）

他指责我们为什么由于他说情报局第一个决议是正确的就攻

击他回到斯大林的政策上去了。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从未撤销过第一个决议。你们今天是否赞同你们一九五二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时你们不承认苏联在搞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你们坚持你们过去攻击苏联的全部观点，而如果我们说第一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你们就对我们大叫大嚷。我说，假若我们又来讨论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五年我们和他们的观点，那就很不好了，这样做，对苏联是有害的。

（苏联）外交部问我，关于我这次拜会他们如何发消息：鉴于赫鲁晓夫的职务，是把这次拜会看成是党的关系方面的，还是国家关系方面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说，我们什么问题都谈了，他们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我没有什么意见。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赫鲁晓夫这次要比以往我们关系好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态度来得周到客气。今天苏联报纸很显著地报道了我这次拜会，把它作为仅次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头条消息来报道。俄国人感兴趣的是，使同赫鲁晓夫的会晤尽早进行，而且在我提出要求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就接见了。可以看出，俄国人认为，重视这次拜会对他们有好处，除了别的原因且不说之外，还因为我的这次拜会是在公布对纳吉·伊姆雷执行死刑的消息后的第二天进行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昨天出席了正在这里进行正式访问的尼泊尔国王的招待会。外国代表们没有走到他们那里去。西方国家的大使们呆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招待会，象是示威似的。

这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在苏联报纸发表了葛罗米柯就苏联驻哥本哈根大使馆遭到破坏向丹麦政府提出的抗议之后，丹

麦大使馆遭到破坏。丹麦青年和公民这么做是对纳吉遭杀害一事表示抗议。葛罗米柯要求确保苏联大使馆的安全，接着这里在两小时之内苏联的“示威者”便在苏联警察的庇护下捣毁了丹麦大使馆的门窗，干下了葛罗米柯指责丹麦人干的那种事。

这里的报纸报道了“苏联劳动人民的义愤”，而把哥本哈根的示威者称为寻衅者、流氓，攻击他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仆从。依我看，俄国人害怕现在西方各国掀起示威和袭击那里的苏联大使馆的浪潮，企图用这个办法先发制人。他们破坏了这里的丹麦大使馆是要让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明白等待着它们的是什么。

纳吉·伊姆雷遭杀害的消息仍是这里的外交团每次碰面时交谈的主题。人们猜测纷纷，看法不一。要是纳吉不是死于侦讯过程中的严刑拷打，有人认为，是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促使俄国人作出杀害纳吉的决定。要是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好一些，据说，俄国人是不会因为纳吉而冒搞坏同南斯拉夫关系的风险的，纳吉也许还活着。还有人认为，纳吉早就被弄死了，这里之所以现在才公布这个消息，是免得我们公布，因为，据说，我们早就全知道了，所以俄国人生怕我们现在抢先公布。有些人猜测，如果纳吉在侦讯过程中就去世了，那么俄国人宁愿宣布纳吉被判为死刑，已被枪决，而不愿宣布他死在狱中。从而显示其“铁腕”统治，首先是对阵营国家的“铁腕”统治，而纳吉是死在狱中还是被枪决，只有他们心里知道。

印度尼西亚大使对我说，亚洲所有中立国家在听到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信贷协定时都心情沉重。俄国人向印度尼西亚和部分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因此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使他们愈加不安。明天它们可能受到类似的遭遇。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对我说，他打算到赫鲁晓夫那里去，准备把这一想法告诉他。他问我，我有何忠告，如果这样做，赫鲁晓夫会不会勃然大

怒，此公会有何想法？我对他说，在我看来，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最符合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的利益的，而且假若他告诫苏联政府注意这个问题，他作为苏联的朋友给苏联政府帮了大忙。

可以说，又出现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月对匈牙利干涉期间，在俄国人和西方代表之间普遍存在的那种气氛。虽然这对俄国人是有害的，可是他们表现出并不感到特别担心。情况表明，匈牙利坚定地留在阵营里，而当前由于纳吉遭杀害而引起的这种愤怒也会过去，就象一九五六年那次一样，在最近这次会晤时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 * *

苏联报纸六月十九日转载了匈牙利《人民自由报》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文章说，“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伙之所以被判罪，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或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叛乱”，等等。我不清楚，匈牙利人这样写是想表明，他们不是根据思想——尽管这些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来判决的，还是想把南斯拉夫撇在一边，免得彻底搞坏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苏联报纸竭力向公众少提这件事，不想报道纳吉事件，虽然它只用一句话报道了艾森豪威尔谴责对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执行死刑的讲话。按照这里的理解，应当把这看成是证明纳吉该枪毙的一个证据，因为美国总统替他说话。

* * *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他谴责他的前任首先是因为在斯大林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力的几十年间苏联一些无辜的人遭到杀害。在他作了这个报告之后，我认为苏联，以及阵营里，除阿尔巴尼亚外，已没有骇人听闻的政治诉讼了，也没有政界人士被杀害的事情了。无论如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主要功劳之一就是，斯大林的罪恶今后决不会重演，决不会

未经审判或借助审判杀害政界人士，苏联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这个问题在二十大以后这里已经写得够多了。

现在他们杀害了纳吉，给自己的政治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他们再次践踏了二十大许下的希望和诺言。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在宣布纳吉遭杀害之后，俄国人在这里举办了名为《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展览。苏联领导就这个题目搞的名堂可真是五花八门：写文章，出版书籍，在全世界掀起宣传运动，现在又举办这个展览，想通过明显的说教使公众相信，现代修正主义者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或许是为了令人信服，这次展览安排在“卡尔·马克思”图书馆。凡是进去参观的人，都得听苏联党的官员长篇大论地讲一通，他们是搞“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苏联报纸仍然坚持不宣扬纳吉事件的立场。他们每天刊登两三句话，报道匈牙利劳动人民如何欢欣鼓舞地赞成杀害纳吉；同样也刊登一两句话，报道匈牙利流亡分子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起反对杀害纳吉。根据苏联报纸的报道，世界其他所有地区都赞同已采取的行动。实际上俄国人希望在本国公众和其他国家公众的面前开脱所负的直接责任，因为到现在为止，苏联没有对纳吉遭杀害发表过官方的评论。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未能替匈牙利政府洗刷得一干二净。全世界的运动，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运动日益高涨。今天的《真理报》就纳吉遭杀害一事发表了苏联官方第一篇评论。苏联的这篇评论没有提“现代修正主义”，也没有影射南斯拉夫。我不清楚，这是我六月十九日同赫鲁晓夫谈话的结果呢，还是即便我没有同赫鲁晓夫谈话，

苏联评论员也想放过南斯拉夫。这篇评论是回击西方的宣传运动的，并表示苏联声援匈牙利政府，表面上，是匈牙利政府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看来，这里的大多数外国代表本来肯定估计南斯拉夫将是苏联这篇谈处决纳吉的评论的主要目标，而评论根本未提南斯拉夫，使他们感到有点意外。

在莫斯科，有一小批示威者在苏联警察的保护下捣毁了西德大使馆。这是苏联政府对在苏联驻波恩大使馆前的示威的回答。警察护着这帮人，直到他们把使馆的门窗砸坏。这些苏联示威者在西德大使馆的墙上，还写了这样的口号“记住斯大林格勒”，这触及了驻这里的西德代表的痛处。西德大使克罗尔往往强调他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接待，而且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不错，强调他在莫斯科是直接代表阿登纳的，现在人们看见他闷闷不乐地坐在一堆一堆的碎玻璃、砖头以及示威者留下的其他东西旁边。一位西德记者——他对自己的大使没有特别的好感——对我们的记者说，他“看见大使一声不吭地坐着，他的幻想已经破灭。”

苏联当局根本不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在国外，示威者向苏联大使馆示威并没有象在莫斯科那样受到本国警察的保护，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警察总算还是设法保护苏联大使馆的。这里赋予党的某些机构以及政权机构的职责就是：搞针对某某国家的“游行示威”，捣毁大使馆，其规模是事先确切地规定好的。事成之后，“示威者”便安静地散去。这也属于东西方之间新式的冷战较量手段。

苏联官方不断向这里的公众反复解释：西方如何举行类似的示威，这里随时作好准备举行同样的示威，俄国人仍然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西方国家。同时，苏联政府将向西方国家政府提交抗议照会和拒绝西方国家政府发出的类似照会。西方外交代表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赫鲁晓夫在同我谈话时谴责对大使

馆的这种袭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他说,这里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世界各地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迫使他们只好这么办。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挪威大使布罗德兰德在来莫斯科之前曾是挪威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我同他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他对我说,他于六月二十五日对赫鲁晓夫作了辞行拜会。当提到匈牙利问题时,赫鲁晓夫对他说,南斯拉夫通过纳吉·伊姆雷集团干涉了匈牙利的内政。布罗德兰德就此对赫鲁晓夫说,匈牙利卡达尔·亚诺什政府通过一项发表过的书面协定——他本人也看过这一协定——向南斯拉夫政府作过保证和承诺:将不追究纳吉等人过去的活动的责任,而且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回家。达成这一协定之后,纳吉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南斯拉夫政府向他们提供的避难权,走出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打算回家。他们没有到家,而是他们一走上街,苏联武装力量的人员就把他们绑架走,强行带往去向不明的地方。这样,匈牙利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南斯拉夫许下的诺言,而政府都必须履行所作的承诺,哪怕是向凶恶的魔鬼所作的承诺。据这位挪威人的叙述,这部分谈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不愉快,赫鲁晓夫不想继续谈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匈牙利的内政”,苏联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政治诉讼,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 * *

在苏联官方机构保护下,在这里“爆发”的针对美国大使馆的示威,同苏联——西方各个方面的关系中出现的新消极气氛有关。整个事情完全是是有组织的,因此看来几乎滑稽可笑。这里的美国人说,苏联方面事先非正式地通知说,将举行“示威游行”,但是“整个事情将有秩序地进行”,即不会象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所遭遇到的那样,向他们的大使馆扔石头,砸坏门窗。俄国人

对这些国家可不象对美国人那样客气。美国大使馆人员在“示威游行”在大使馆门前进行时呆在阳台上和窗前，有的人用摄影机拍摄了“苏联劳动人民示威游行”的全过程。他们甚至还要求“示威者”摆好姿势，以便照得好一点。有些示威者也这么做了。美国人现在说，他们摄制了有关这些示威游行的“令人有趣的纪录片”。对一些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大使馆采取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其中最倒霉的是西德大使馆——在外交团中引起了种种评论，这些评论对苏联政府及其总理并不特别有利，外交团认为“苏联劳动人民”的这一活动要由苏联总理个人负责。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科。

今天葛罗米柯交给了我一份苏联政府的照会，是对我们六月三日就苏联取消贷款协定提出的照会的答复。我浏览了一下照会，然后作了简单的谈话，这次谈话同前几次同葛罗米柯的谈话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今天的照会同苏联前几次的照会也没有区别。双方都重申自己的理由。葛罗米柯的出发点是：说什么我们拒绝就拟议的问题同苏联政府商谈。实际上，他们是在事前未同我们进行任何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

葛罗米柯说，他们过两三天将发表所有的照会，这就是说，两份苏联照会和一份我们的照会。这是苏联对我们发表它的第一个照会和第二个照会的回答，特别是对我们报纸发表葛罗米柯在交给我第一个照会时对我发表的口头声明的回答。当时他说，苏联政府这样做并非要损害南斯拉夫的经济，而是希望南斯拉夫经济得到良好发展。根据我的报告，我们那里发表了葛罗米柯的这番话，因此，在今天谈话过程中，葛罗米柯在发表看法时非常谨慎，由于我们的报纸发表了苏联照会和我们的谈话，俄国人这个照会的用词比较审慎，具有论战性质，而且考虑到苏联报纸要发表，而不

是要解决两国政府之间的争论。

显然，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政治机构——苏共中央主席团早就作出了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后路可退，俄国人同我们交换外交函件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改善他们在公众中的地位。赫鲁晓夫不希望他对待我们的态度让人看起来跟斯大林对待我们的态度一个样，即只要我们在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上持不同意见，马上就取消最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协定。这一切同我从赫鲁晓夫那里听到的在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态度上所作的辩解很接近：假如你们想要“互利”原则（而不要“苏联的援助”），那你们就实行“互利”吧！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莫斯科。

哥穆尔卡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讲话中公开地批评南斯拉夫。莫斯科的《真理报》在六月三十日转载了他的讲话。对于俄国人来说，哥穆尔卡攻击南斯拉夫的言论比阵营其他任何国家攻击我们的言论都要珍贵。哥穆尔卡作为当时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由于反对情报局而在斯大林时期在波兰的监牢里关了几年，因此他所享有“南斯拉夫的朋友”的声誉可以说要比阵营国家共产党其他任何领袖享有的声誉都要高。就是这样一位哥穆尔卡现在却竭力赋予这场反南运动以某种新的道义——政治性质，并且力图证明这场反南运动搞得对。哥穆尔卡说，与一九四八年不同，现在完全要由南斯拉夫对这场冲突负责，说南斯拉夫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的行动在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说还存在某种希望，希望我们放弃修正主义立场等等，这些说法使得现在阵营的反南运动更加完整了，这肯定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其他某个国家对我国的类似攻击给这场运动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

俄国人现在特别需要他表态支持杀害纳吉，而且需要他发表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讲话。这里给人造成一种看法：凡是表态支持杀害纳吉·伊姆雷的，同时也应该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反之亦然。莫斯科对哥穆尔卡恰恰是这么做的，反应不错。

为了纪念六月二十八日情报局反南决议十周年的日子，我们方面发表了专门文章，追述我们关于反对斯大林及其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政策的决议。看来，苏联方面无意以任何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那天葛罗米柯把苏联第二个照会交给了我，根据这一照会，苏联政府最终取消了给南斯拉夫的贷款协定。我相信，俄国人忘记了这一巧合，把使人回想起从前那次冲突时代的照会交给了我们，要是俄国人记住这个日子的话，他们是不会正好在那天交这个照会的。目前南苏关系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将促使我们方面所抱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一个超级强国对独立的南斯拉夫采取的对外政策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如此迅速地改变，而不管某些已变化的情况，也不变换实现这一政策的方式方法。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莫斯科。

引人注意的是，《真理报》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战争期间的最艰苦的一次战役，一九四三年六月苏捷斯卡战役十五周年时，发表了一篇谈南斯拉夫的文章。苏联这篇文章的论点很可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确定的，其出发点是，首先应把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说成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俄国人民自发的和世世代代的情谊的结果。他们说美国和英国在我们那里援助的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卖国集团，同这两个国家相反，据说，苏联不断积极地援助人民解放斗争，武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实际上，英国是在各大强国我们战时的盟国中第一个派遣军事使团于一九四三年春驻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的。是英国人最先用武

器和装备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他们在埃及的开罗和意大利的巴里建立了提供武器和装备的专门基地，而苏联在差不多一年以后才算给我们派来一个苏联联络官小组，更谈不上给我们装备等方面的援助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责备苏联在战争头几年未能直接援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也不能对现在篡改不久前的历史，使之今天符合莫斯科《真理报》的胃口，默不作声。

一九五八年七月六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由于在纳吉·伊姆雷遭杀害之后处境孤立，竭力使阵营国家的代表团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进行尽可能多的互访。苏联政府还试图赋予这种做法以特殊的政治意义，似乎发生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近来这样的访问比通常情况下明显地增多。围绕诺沃提尼的访问，从他抵达莫斯科时就费尽心机，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办。从国立莫斯科大学直到克里姆林宫，安排了夹道欢迎的人民和民警，长达数公里。通往机场的这条道路上挂满了旗子，交通停止。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出动，欢迎诺沃提尼。诺沃提尼由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陪同检阅仪仗队并同一字排开的外交团见面，他们两人还陪同他乘敞篷车从机场驶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下榻处。苏联政府企图造成有点类似两年前这里对铁托的那种欢迎场面。他们不想使那次欢迎成为一种例外，因为对铁托的盛大欢迎后来曾使苏联领导感到不痛快。

我认为，不应当对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同诺沃提尼在一起时发表的讲话中对我们的态度比较温和抱很大希望，也别指望这会长此下去。令人感兴趣的倒是赫鲁晓夫七月四日在基洛夫工厂的讲话，那次讲话主要是谈苏联的酗酒问题。这次讲话讲得很别致：赫鲁晓夫谈到，为什么在俄国喝酒喝得厉害，为什么在沙皇时代就

是这样，为什么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讲话时，参加群众大会的一个人对他大声嚷道：今天伏特加酒应当卖便宜点。这句插话几乎完全抵销了赫鲁晓夫的讲话的作用，虽然赫鲁晓夫胸有成竹地回答了这句插话。这一切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政代表团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位向着赫鲁晓夫插话，说伏特加酒应当卖便宜点的苏联公民，不管他是喝醉了酒，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使得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禁酒运动信誉扫地，尽管这里想把这个运动搞下去。列宁格勒群众大会上的这句插话已在苏联全国各地普遍传开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莫斯科。

一位消息灵通的中立人士七月初“秘密地”告诉我：苏共中央出现了赫鲁晓夫自发的不满和反感。同我谈话的这个人对我说：一些苏联人士（这就是说不只是一个人）要他相信，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人们的不满是自发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经常使他们感到意外，一会儿作出这个决定，一会儿作出那个决定，变幻无常。赫鲁晓夫涉及对外政策问题过多过勤，几乎天天在公开地谈到对外政策问题，不是在报纸上，在讲话中，就是在外交招待会上这么做，而在莫斯科外交活动又很多。赫鲁晓夫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不是属于“他本行”的事情，都要发表意见；人们跟不上他，即便想跟也跟不上。他们不习惯这种作风，因为几十年来他们习惯的是另一种工作方式。人们没有把握，不知道他们今天执行政策，乃至他们的地位以及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一部分人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决定，另一部分人则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也不能象他们对他的要求那样支持他。

据说，在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可以感觉到这些现象。同我谈话的这个人对我说，向他提供这样一些情报的是苏联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过去就不喜欢赫鲁晓夫，尤其是对他有关文艺状况和党在这一领域的任务作的指示性讲话反应更糟，而赫鲁晓夫这方面的讲话比起他的别的许多讲话来，要糟得多，在讲别的问题时，他也显得象是最高法官。

就我对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地位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我认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打倒朱可夫元帅之后就明显地失去了个人威信。赫鲁晓夫曾经对我讲述过朱可夫的一条罪状，说朱可夫开完主席团会议——会议建议把他开除出主席团——回到家，马上就打电话找赫鲁晓夫。根据赫鲁晓夫本人那次对我讲的，朱可夫元帅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赫鲁晓夫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了解我的，我们是朋友，我简直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举这个例子是要证明他是客观和不偏私的，他说，他回答朱可夫元帅，除了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之外，他决不想同他谈任何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述，这便是他对朱可夫元帅当时真诚地——我相信——寻求友谊的答复。我不知道，“除了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之外”，他们两人是否还作过类似的谈话。

六月全会之后不久，当赫鲁晓夫带着可以想象得到的满意心情对我谈起“反党集团”的彻底失败时，还告诉我，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卡冈诺维奇如何哭泣着给他打电话。赫鲁晓夫对卡冈诺维奇的答复，我已在日记里记过了。赫鲁晓夫对卡冈诺维奇的回答，当时我很欣赏。可是，当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第二次同朱可夫元帅的电话谈话也发表类似的看法时，我的心情就不是这样了。

近东出现危机的苗头

七月十六日同赫鲁晓夫谈话。近东新危机。纳赛尔从南斯拉夫来苏联。伊拉克政变。向法国大使辞行。苏联在东西方关系中采取主动的新尝试。西方强国对赫鲁晓夫的信的反映。苏联报纸的一起反南挑衅行动。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莫斯科。

我把我们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的抄件交给了蒙古大使巴特，我们在信中说明了我们同俄国人争论的实质。贝尔格莱德决定，我们也把这一情况通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因为俄国人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一开始便把他们对这场冲突的说法通报了各国共产党。我还把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同俄国人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记录抄件交给了蒙古大使，我们方面和苏联方面都草签了这份会谈记录。现在俄国人把这个会谈记录搬出来，当作是所谓遭到我们违反的一个文件，我们之间现在这场冲突似乎就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才爆发的。

蒙古大使很友好地接待了我，他很重视这次拜会和我交给他的文件，他说，他将立即把这些文件转送给领导。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亲自参加反南运动，到现在为止，他比参与这一运动

的苏联其他高级人物，比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要突出，更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由于赫鲁晓夫亲自参加了南苏关系正常化的工作，而且做得也比其他人多得多。既然这一正常化没有得出赫鲁晓夫所预期的那种结果，而且，大概他也使苏联方面的其他人相信这一点，而南斯拉夫则继续在执行独立政策，因此，赫鲁晓夫感到有必要先发制人，以免别人攻击他，并且首先采取主动，在目前进行的这场反对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发表尽量尖锐的看法。赫鲁晓夫似乎自认为有责任给整个阵营以及其他共产党的反南运动规定方针和定下调门，很可能他还认为，他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加深刻得多地“揭露”南斯拉夫。赫鲁晓夫过去曾极其严厉地指责过南斯拉夫，乃至公开侮辱，同样他也比在攻击我国时态度比他温和的其他人更早地做到与同一个南斯拉夫“和解”。

根据赫鲁晓夫在柏林的讲话，可以说，他认为凡是把阵营今天的反南运动说成是一九四八年以后斯大林和苏联的反南政策的继续的种种情况，都是对苏联有消极影响的。赫鲁晓夫为了避免这种联系，他修改了他不久前在索非亚的讲话，他当时说什么一九四八年情报局第一个决议是正确的。现在他谴责这个决议中的第八点（苏联呼吁“南共中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南斯拉夫国家的合法领导）。赫鲁晓夫在东柏林扼要地重叙了近十年来我们的关系，并且论证说，他并不是重新奉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的那号人。苏联和阵营其他国家的宣传很可能将把重点放在论证赫鲁晓夫的这个论点上。我还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同赫鲁晓夫的几次谈话中，他就对我说过，他们将如何来对待我们，他们“不会象斯大林过去对待我们那样对待我们^①”，而是他们将“执

^① 原文如此，这里的两处“我们”似应为“你们”。——译者

行”对南斯拉夫的“政策”。

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对苏联对外政策产生的后果，特别是在某些亚非国家，比莫斯科原来估计的要早就感觉到了。现在这里企图把同南斯拉夫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内部事务”，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本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贷款的其他国家不可能遭遇到这种情况（例如苏联方面取消给南斯拉夫的贷款协定）。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的讲话中甚至指责斯大林（和南斯拉夫人）破坏了国家关系，他说，他并不想破坏（尽管他已取消了贷款协定）国家关系，而是想把这种关系置于“互利”的基础上，正是南斯拉夫人要求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的讲话中对南斯拉夫的状况进行估计时也表现出某种不满，南斯拉夫的表现比莫斯科原来预料的要坚强，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中的能量比这里原来想象的要大。赫鲁晓夫在这里还企图改正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在同我们作斗争时的错误使得南斯拉夫人更容易在民族的基础上团结在自己领导的周围。赫鲁晓夫指责我们的领导现在还企图达到类似的目的，而为了不致再度出现这种情况，他给我们的冲突带来了新的情况，例如，他指责南斯拉夫领导向我们的人民隐瞒目前我们这场冲突的原因和性质的真相，他公开赞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在战争中的表现，他不象斯大林那样把我们同曾是希特勒盟友的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以及其他相提并论，斯大林那样作曾使南斯拉夫人受到无法补救的侮辱。

赫鲁晓夫谈到情报局时说，说南共联盟的工作全都错了，这不是事实，最后，他还表示希望今后我们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公开说，苏联不想把我们之

间的冲突闹大，而是南斯拉夫领导希望把冲突闹大。这是同苏联以前的策略背道而驰的，这是要使我们抵制苏联继续施加压力的条件复杂化。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俄国人，也即赫鲁晓夫今天进行的反对我们的运动比起苏联方面前一个时期攻击我们的运动来，手法要高明些。

赫鲁晓夫在讲话的最后作了指示：对于南斯拉夫问题，不应该过得过多，也不要对我们过分重视，可是就连赫鲁晓夫本人竟连二十四小时也没有坚持到，他在七月十二日，苏联代表团回国时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又发表讲话，攻击南斯拉夫。

无论是在东柏林，还是在莫斯科，赫鲁晓夫都是第一次如此公开明确地攻击铁托同志，他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在柏林，赫鲁晓夫指责铁托是“南斯拉夫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报纸登载的卑劣的漫画”——的煽动者和庇护者。

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的事情变得十分严重，也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上看出：赫鲁晓夫甚至对我们当时发表的关于克里米亚的狩猎活动公报也公开地不怀好意地作了一番评论。他说，这是应南斯拉夫的要求进行的，免得惹怒西方，这样便可以掩护我们在克里米亚进行的政治会谈。正如所见，赫鲁晓夫无意这么快同南斯拉夫人“和解”，因为，假若赫鲁晓夫有“和解”的打算的话，他就不会现在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南斯拉夫人。参加莫斯科这一次群众大会的大约有一万名经过挑选的苏联公众。他们欢迎赫鲁晓夫攻击南斯拉夫的每一句话，又是嘲笑，又是鼓掌，在我看来，他们都干得很起劲。

可是，在个人接触中，赫鲁晓夫对我的态度跟关系最好的时候一样。几天前，在克里姆林宫为诺沃提尼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我走到赫鲁晓夫身边向他问候时，他把我

拉到一边，从西服上衣的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卷折好的纸，他说，他想让我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哥萨克致苏丹的信”的全文，根据这封信，画家列宾画了那幅有名的画。关于这封信，赫鲁晓夫过去跟我谈起过。他手里拿着这卷纸，读信中的某些部分，有些话他没有念出声来，而是用手指指给我看，因为这是哥萨克的一些在格奥尔基大厅的招待会上哪怕是悄声念出来也都是危险的用语。这一切，外国记者和别的客人都看到了，但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有些外国记者当天晚上就发表评论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向南斯拉夫大使介绍了将于明天发表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声明的内容。人们纷纷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今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扎鲁宾召见我，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他把苏联政府的一份照会和关于签订《欧洲国家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交给了我。苏联政府的照会共有八页，而条约草案不到五页。照会是对条约草案的注释，照会结尾时“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这一建议采取赞许的态度”。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苏联企图通过这个草案摆脱守势和孤立的地位，重新采取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之后它已失去的政治主动。苏联领导由于丧失了过去曾有过的主动，现在建议召开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他们不难看到，在发表纳吉·伊姆雷等人遭杀害的公报之后，他们为召开东西方最高级会议而作的许多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现在俄国人不仅建议召开东西方代表的会议，而且还建议签订欧洲国家，事先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这个照会和条约草案比苏联今年发表的几个类似文件态度来得灵活。我认为，谁也不指望西欧国家会接受苏联现在的这个建议，苏联政府也不指望会产生什么直接结果。苏联提出的建议也就只能走这么远了。

* * *

我这里补记一下(晚了几天)七月十一日我在蒙古大使的招待会上同米高扬的最近一次会晤和谈话。米高扬不久前才从比利时回来，他在那里参观了布鲁塞尔的世界博览会。他说他参观了南斯拉夫馆，他很喜欢我们的馆，而且对我们的代表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感到高兴。我们简短地谈了我们两国关系不好的现状。我强调指出我们并没有回击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大量攻击，我们不希望冲突激化，我提到铁托同志不久前的一次讲话，据我看，那次讲话是温和的，要使事情平息下来。米高扬说，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在考虑这一点，他们也不想加剧同我们的关系。这是我们进行了在我看来对我们两人都很不痛快的那次谈话——我指的是五月九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谈话——之后，同米高扬进行的第一次不管怎么说可以接受的谈话。

米高扬问我，我是否真的肯定要离开苏联了，他已得到消息了。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我说我已向外交团团长辞行了，还向某些国家大使辞行了，辞行的事进行得相当快，因为现在是“淡季”。米高扬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他说，由于这项调任，“贝尔格莱德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对他们都很熟悉”，我可以比他们刚应该结识的某个新来的人做更多的工作。他称调动我的工作又一次证明我们的“恶意”，因为，假若我们无意加剧南苏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就不会把我从莫斯科调走。米高扬要求我把他们的这个意见报告给贝尔格莱德。我答应了，但是我没有马上报告，而是等着听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赫鲁晓夫的讲话结果是同米高扬的某些说法不一样。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莫斯科。

今天一天之内我两次拜会了赫鲁晓夫，不是为南苏关系的事，

而是为纳赛尔去南斯拉夫，其次是与纳赛尔要求同俄国人——在苏联领土上的任何地方——会谈的建议有关。在我提出请求之后，赫鲁晓夫两次都立即接见了。俄国人知道我为何而去。苏联领导作出了纳赛尔可以接受的肯定决定。在我第一次拜会赫鲁晓夫时他就把苏联的决定通知了我。

赫鲁晓夫谈到伊拉克^①事件时说，他们是从报上和广播里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他赞扬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说可惜在西方几个强国的影响下，在约旦进行了逮捕，因为要是不采取这些预防性措施，约旦也会发生伊拉克那样的政变。西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伊拉克政变成功——以及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执政的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只会使西方在近东和中东的政策更加信誉扫地。赫鲁晓夫说，苏联政府今天将就近东和中东事件发表声明，并宣布苏联方面承认以卡塞姆为首的伊拉克共和国政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要承认伊拉克新政府。

苏联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新政权。为了消除西方的压力，这里已下令调动军队，并在靠近土耳其的高加索地区和面对伊朗的土库曼举行军事演习，前者由格列奇科元帅指挥，后者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他们还商量好，在苏联空军的参加下，由保加利亚军队在土耳其—保加利亚边界附近也举行类似的演习。赫鲁晓夫对我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由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在）和瓦·瓦·库兹涅佐夫（由于葛罗米柯不在）就在隔壁的一间房间里正在为上述军事措施作准备，米高扬和苏斯洛

^①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清晨，巴格达发生了军事暴动，国王费萨尔二世和王室的几名成员被打死，王朝被推翻，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将军为首的共和国宣告成立。黎巴嫩右翼政府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感觉到受到类似的政变的威胁，吁请美、英、法三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第六舰队的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英国的一个伞兵旅从塞浦路斯调往安曼。整个地区形势极其紧张。

夫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赫鲁晓夫一见到我就说，伊朗出了事，美国也在近东采取了措施，可是他们开不了会，因为相当多的领导人休假去了，而且发生的事出乎意料。我对赫鲁晓夫说，据我所知，南斯拉夫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也是从广播里才知道伊拉克政变的，虽然纳赛尔正在访问我国。我向赫鲁晓夫转述了我国政府的第一个声明。赫鲁晓夫发表看法说，我们的立场相同，虽然我们事先并未商量过，他还开玩笑地补充说，“顾不得修正主义了”。然后他谈到准备对巴格达条约成员国采取军事措施，期望我发表看法。我对他说，有些人对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论据的理解肯定比另外一些人要好。我问他：这场冲突有没有可能扩大到危险的程度？他的看法如何？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回答，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估计事态不会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赫鲁晓夫，象米高扬几天前一样，提起我快要离开苏联一事。他说，南斯拉夫这样做是要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尽管这同南斯拉夫发表的声明是背道而驰的，他说，要是不想恶化关系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调换大使；他说，自从我来到莫斯科，他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在所有情况下对我都是给予极大的信任，开诚相见的。赫鲁晓夫还说，我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以及他本人的大门过去对我始终是敞开的，等等。

我说，我们现在的关系不好同把我调回国这两件事之间毫不相干，我们的新大使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关系重归于好。赫鲁晓夫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举例说，在我们就匈牙利事件发生冲突之后，这里曾作出决定，撤回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费留宾，但是他们改变了这一决定，仍让他留在贝尔格莱德，直到我们的关系再次得到改善。人们从南斯拉夫的行动——相反的行动——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打算很快使我们的关系修好。

昨天上午我在赫鲁晓夫那里时，他把我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我开玩笑地这么称呼自己——通知我，八月十五日他要去度年假，届时哥穆尔卡和卡达尔也要去乌克兰，他们将一起打猎，然后三人将去克里米亚。

同一天下午我第二次去拜会，商量纳赛尔在苏联会谈一事时，赫鲁晓夫说，让我转告他对铁托同志的问候，接着开玩笑地说“修正主义者”，要我告诉铁托，在乌克兰的这次狩猎活动将是很有趣的。他说，他很熟悉那里的地形，要是铁托同他们一起去打猎，那将是令人愉快的。我没有回答，而是问他，他们将打什么，于是赫鲁晓夫给我讲起了乌克兰有适合打猎的各种可能条件以及各种各样的地形，还讲他猎获的东西。赫鲁晓夫又谈起，要是铁托来苏联，在那里同哥穆尔卡和卡达尔一起，他们都将成为他的座上客该有多好。赫鲁晓夫情绪很好，他拿出一把斯大林格勒草原上的小麦给我看，他说，我们曾答应把我们种植的从意大利获得的小麦种子的经验和样品送给乌克兰人，他问，这件事办得如何了，这是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说过的。

我们谈到纳赛尔如何从苏联返回埃及，谈话过程中，赫鲁晓夫提醒我，他们供纳赛尔使用的图—104 苏联飞机可能被击落，因为这架飞机象苏联的火箭轰炸机^①。埃及和纳赛尔的敌人可能在地中海水域上空击落这架飞机。赫鲁晓夫说，最好是南斯拉夫马上同希腊政府磋商，允许飞机飞越希腊。大概俄国人还考虑了别的方案，来代替飞越希腊这个方案，因为按照别的方案纳赛尔乘坐的这架飞机又得飞越地中海，而赫鲁晓夫认为，走这条路线有危险。

赫鲁晓夫再次讲，他们建议纳赛尔化名前来莫斯科，为此他们

^① 由于近东事件，最近西方三国几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巡弋，其中包括当时最强大的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

今天已派一架苏联图—104飞机飞往贝尔格莱德了。在莫斯科机场上纳赛尔将在跑道上下飞机，整个地区将封锁起来，不让人看见来者是谁。赫鲁晓夫没有放过机会提到，南斯拉夫也很关心纳赛尔返回埃及的事，说俄国人满足了南斯拉夫政府和纳赛尔的要求。然而，显然，纳赛尔回开罗一事是苏联政府，而不是南斯拉夫政府所操心的事。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莫斯科。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伊凡·谢罗夫将军今天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这里同纳赛尔一起作出决定，不走在南斯拉夫已商定的那条路线回国，纳赛尔对铁托以及其他人士表示感谢。显然，俄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用的是据他们看来比纳赛尔飞越地中海返国更稳妥的办法，飞越地中海返国是在我们那里商定的。由于纳赛尔的家眷留在南斯拉夫，因此原来计划在那里等纳赛尔从苏联返回，然后再一起回开罗，我问谢罗夫，有没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贝尔格莱德，告诉纳赛尔家眷。谢罗夫说，家眷可以乘快艇经由地中海回国，他们也是经由地中海抵达南斯拉夫的，然后他说，纳赛尔家眷的事今天下午还会通知我。

过了一会儿，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找我，通知我，同埃及客人的会谈已结束，一切均“很顺利”，为纳赛尔安全着想，这里已决定不采用“地中海方案”，纳赛尔已乘苏联飞机飞越伊朗和叙利亚，前往开罗了。我提醒库兹涅佐夫，纳赛尔的家属以及埃及的几艘舰只还留在南斯拉夫，应当通知他们是否前往开罗。库兹涅佐夫说，他同意我的意见，他们这里还要就此问题同埃及大使商量，此刻他无法再对我说什么了。很清楚，我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用不着再为此操心了，俄国人已经把这件事纳入苏埃关系的轨道，在南斯拉夫同纳赛尔一起作出的决定不再有现实意

义了。

俄国人如此关心纳赛尔的安全，夸大纳赛尔假如坐飞机飞越地中海就会有所谓的危险，显然他们是在利用这一点把自己标榜为埃及和纳赛尔个人的可靠朋友。

* * *

在莫斯科，人们对今后局势的发展提出了种种假设。按苏共中央的指示写文章的《真理报》对外政策评论员断言，美国入侵黎巴嫩只不过是下一步侵略伊拉克的借口。就是这位俄国人又宣称，他怀疑美国大使汤普森讲的话，汤普森说，美国不会再从黎巴嫩往前走。这位评论员说，美国在伊拉克拥有外国石油租让权的三分之二，而英国只占三分之一。鉴于英国人在科威特和巴林在石油方面还有自己的阵地，所以他们比美国人更易弥补失去伊拉克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外交部人士说，中东局势对和平的危险现在比近几年任何时候都大。俄国人已发表声明：他们将不拒绝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假若伊拉克向他们提出要求的话。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我想，苏联领导肯定会指望战争局限于这一地区。跟以往出现类似的危机时一样，美国已下令它在苏联周围的许多军事基地处于戒备状态。苏联报纸不再对南斯拉夫保持沉默，今天发表消息说，南斯拉夫已承认伊拉克共和国。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莫斯科。

在莫斯科感到总的局势在继续恶化。苏联政治组织，说得确切一点，苏联当局，昨天又让一批工人和青年在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这次示威比较严重。窗上的玻璃砸碎了，“示威者”竟场比赛：看谁把砖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扔到“更高一层”，好砸坏玻璃。为了把气氛搞得尽量严重，苏联当局通过外交部礼宾司通知驻莫斯科

科的外国代表机构：取消准许外国人去苏联南方进行任何旅行，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

* * *

昨天我向法国大使莫·德让辞行。德让对我说，美国政府事先未同法国政府磋商，就把美国军队开入了黎巴嫩。这位法国人估计，美国事先肯定同英国政府磋商过，而且后者表示同意。法国将根据本国利益谨慎行事。法国的利益同西方其他强国的利益不一样。德让认为，美国犯的错误是仍然始终不肯承认苏联在近东和中东的战略和政治利益，而俄国人犯的错误是不承认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切身经济利益。据这位法国人认为，如果相互承认这些利益（他未提阿拉伯人的利益），东西方之间就可以达成协议，并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定的局面。

苏伊士危机导致一九五六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之后，虽然法国人采取了反阿拉伯的立场，但是现在它却持公开的保留态度，甚至不同意英美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真理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法国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他说，法国将不派自己的军事力量参加英美目前在近东的行动。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莫斯科。

贝尔格莱德改变了要我尽快回国的决定，并决定让我留下，继续在莫斯科任职，“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我们的人对俄国人要我现在别断然离开莫斯科的要求表现出善意。他们通知我，要我在这里再留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我的处境颇为不同一般：我已向驻莫斯科的外交团团团长辞行过了，而且也向目前在这里的几乎一半的大使告别过了。对于我何时走的问题，我作了肯定的答复，我提到八月初。若是我同那些我已打过招呼、应邀出席过饯行午餐、晚餐、讲过告别话——通常都是这么做的——的大使又碰面时，一

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我个人的情况也不十分如意。我的家眷已回南斯拉夫，而我也本应很快同他们团聚。突然这一切都改变了。贝尔格莱德要我回南斯拉夫度年假，我没有同意。我希望我继续留在莫斯科的期限不要超过几个月。我认为，现在我更应当留在这里。应当比较清楚地看看：在近东和中东新近出现的，但肯定不是最后的这场危机如何收场。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好几个外国代表问我：我们同苏联的双边关系是否在改善。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近东危机问题上的合作正在顺利发展。人们尤其注意到，纳赛尔是“化名”从南斯拉夫来到苏联的。对这里的外国人有影响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俄国人已不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南斯拉夫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我重新担负起我应当在这里搞的工作，又同我已辞过行的一些国家的大使会面，这引起了各种各样幽默的评论。我觉得，外交团的大多数大使认为我继续留在莫斯科是由于南苏关系将发生变化，如果说还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话。

俄国人劝说纳赛尔让他的家眷，妻子和孩子，以及留在我们那里的正式随行人员离开南斯拉夫到这里来，而这一位居然也同意了。俄国人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并且使纳赛尔接受了他们的保护。纳赛尔的亲密助手阿里·萨布里以及其他人也将南斯拉夫来到这里，虽然，在我看来，除了以此再次表现苏联政府的保护人角色外，没有这种必要。

在波兰人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离开了他跟波兰东道主坐在一起的主宾席，坐到美国大使汤普森的桌边，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跟他们同桌坐着的加拿大大使对我说，赫鲁晓夫自始至终没有提起过一个有关政治方面的话题，但是他所作的这一姿态，却给出席招待会的大约一千名来宾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表明他是希望改变和改善苏联和西方之间总的气氛的。这里有意于使目前的局势戏剧化，而且使之朝各个方向，往往是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仅仅两三天之内就出现这种情况。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前天深夜，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把苏联政府给西方各国的复信抄件交给了我。报纸全都发表了。俄国人为了保持这种异乎寻常的紧急状态，同时为了显示效率高，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作出了答复。苏联政府还搞了些新名堂，来保持紧张状态，使气氛继续紧张。例如，在奥地利大使为拉布总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在草拟”对西方各强国的“答复”，而且说话声音非常大，以致我们离他们比较远也能听见他们说的一些话。因此我们明白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儿，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瓦·瓦·库兹涅佐夫来参加招待会，他夹着一个公文包，就好象是去办公室似的。他同赫鲁晓夫和一批苏联领导人一起走进了隔壁一个房间，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招待会结束。

外国代表、外交官和记者，以及其他客人在招待会上呆了两小时左右，等待赫鲁晓夫，或者别的某个人从他们呆的那个房间里出来，但是白等了。赫鲁晓夫显然故意决定在如此不同一般的情况下，在奥地利大使馆，在为拉布访苏举行的招待会上“工作”，这一切外国人都注意到了。为了制造特殊的气氛，苏联政府需要这样

来显示它的“紧迫感”和“工作的繁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制造了这样的气氛。苏联政府指示外交部的代表就在这个招待会上，叫西方国家的大使在夜里去外交部。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只停歇了几天，苏联报纸又开始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七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就《反杜林论》第一次出版纪念日以五栏地位发表了马卡罗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章完全适应了当前苏联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的需要。文章结尾处攻击南共联盟纲领，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而“现代修正主义充当了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等等。

苏联第二家重要报纸《消息报》七月二十六日以六个半栏的篇幅刊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耶日·普特拉曼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越快——越好》。意思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越快开始攻击各国共产党，或者南斯拉夫越快开始攻击阵营国家，那就越好。文章顺便提到波兰修正主义作为例子，说波兰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和西方的代理人，这居然成为攻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论据。

将近两年前，一九五六年“波兰十月”期间，《真理报》谴责上述文章作者，就是这位普特拉曼特，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他的政治主张，是从《美国之音》那里贩卖来的”。这位普特拉曼特今天把同样的话拿来对我们讲，而苏联报纸竟把他的文章当作马列主义的典范发表！这表明，不仅苏联报纸，而且普特拉曼特本人和波兰现领导都在“进步”。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莫斯科。

《苏联海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成员国(意大利和英国)将参加即将举行的海军演习》。

《苏联海军报》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同斯大林冲突时期苏联报纸发表的那类假消息和挑衅性的材料。我估计，这都是苏联情报机构干的，苏联情报机构首先设法在西德的《午报》上发表这条虚构的消息，然后《苏联海军报》再援引《午报》的消息，好让苏联读者看来整个事情尽量确实可信。苏联方面挑选苏联军事报纸——在涉及一个国家的海军活动时它是“权威性的”报纸——刊登使普通苏联公民意外的消息：南斯拉夫人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成员国一起举行军事演习。这样，苏联公众才会相信。这样做对普通俄国人的影响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谈“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影响要大得多。有趣的是苏联情报机构选择目前这个时机(近东危机以及英美对黎巴嫩和约旦的军事干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这一谣言。这是专门为了使南斯拉夫武装力量在苏联公众的眼里威信扫地，这篇文章就是写给苏联公众看的了。在西德、意大利以及西方的其他地方，公众一下就知道消息是假的，因此也不予理会。这里可就不行了。

虽然莫斯科知道他们发表的是捏造的消息，是对南斯拉夫的诽谤，但是，我们企图让《苏联海军报》，或者苏联其他任何报纸加以更正，即便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莫斯科，以及南斯拉夫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正式提出要求，也全都枉然。早在苏联报纸发表这个捏造的消息之前，苏联政府就已非常清楚，南斯拉夫政府通过我们的通讯社南通社断然驳斥了外国报纸早在七月十七日就刊登过的这条消息。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南斯拉夫政府正式发表的消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联情报机构首先在《午报》上发表的，后来在《苏联海军报》上转登的消息。

我认为，应当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在这里向俄国人提出抗议。应当采取一切措施让苏联公众了解，他们的报纸在散布捏造和诽

谤南斯拉夫的消息，对其他国家的也是这样。不管贝尔格莱德是否同意我们关于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的建议，我说过，要以大使馆的名义给《苏联海军报》写一封信，指出他们的消息不符合实际情况，贝尔格莱德早就对此发表了正式声明，要是他们对实际情况感兴趣的话。

* * *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波利扬斯基说，他获悉，南斯拉夫政府改变了要我离开莫斯科的决定，他对此表示欢迎，他说，是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把我们政府的新决定告诉了他们的，说我将继续留在莫斯科，“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根据波利扬斯基的说法，苏共中央主席团对这一决定感到满意，所以才同我谈这个问题。同波利扬斯基的这次谈话是在《苏联海军报》发表我们的海军同意意大利和英国的军舰在亚得里亚海举行所谓演习的那篇报道之前。假若这里打算继续发表象《苏联海军报》上那样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假消息，那么我认为，讨论我是否继续留在莫斯科的问题，无论是从苏联方面，还是从我们方面来看，都没有必要。

离开苏联前夕

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苏共第二十一
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对基本国际问题的观点“是相近或相同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莫斯科。

我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我回国了。在我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话之后，七月份的延期回国是暂时的，现在我国政府又回到了以前的决定：要我离开莫斯科，在国内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我不久前从国内回来，我回来并不是要继续呆在莫斯科，而是为了继续我的辞行拜会。这里又回到最初的评论：说我终于离开莫斯科，表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莫斯科。

苏联领导宣布了召开苏共第二十一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我的印象是，苏联领导的这一决定不仅使这里的外交团，而且也使一部分苏联公民感到意外。二十一大的唯一议程是讨论《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问题。迄今为止，类似的问题通常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解决，在苏联政府会议上解决，然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为法律加以宣布。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在这样的情况下起贯彻党的决定的“传递”作用。

恐怕现在不仅是确定“控制数字”的问题，而是要让党的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确认赫鲁晓夫迄今的政策，尤其是苏联的经济政策。现在的国民经济远景发展计划和“控制数字”应当不仅以迄今的成就，而且还应当以苏联今后几年进一步发展的前景，给世界和苏联公众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切都应通过对“主观因素”，特别是苏联劳动人民，作特殊的动员来完成。代表大会将号召他们克服目前的困难，办法又是实行“勒紧裤带”的政策，为了更加幸福的未来，再次忘掉困难的今天，将向他们许诺要实现计划，为此提出了“确保美好的明天的控制数字”。又提出今后六年实现“更加幸福的未来”。过去，已经有过几次把事情说成似乎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可谓唾手可及，只要一实现所公布的五年计划，一切就都解决了。

众所周知，苏联欧洲部分曾遭受法西斯德国的极大破坏。由于这种破坏，苏联千百万公民的多年劳动成果毁掉了，因此必须重新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多讲讲这个问题，少谈点一旦完成现在的“控制数字”，苏联人民的幸福就唾手可得，或许会更好一些。这些数字是苏联领导为苏共二十一大准备的。

鉴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及后来在苏联领导内进行的清算，苏共第二十一非常代表大会应当巩固新方针，最终批准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二十大上宣布实行“集体领导”之后发生的一切变化，即使是间接地不提到这些事情也罢。今后几年这个时期已被宣布为“苏联人民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道路上极其重大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阶段。”（《真理报》，九月十日）。这一切都同赫鲁晓夫直接有关。他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发起者，唯一的一项议程的报告人和苏联今后七年国内发展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的主要制订者。

在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之前，二十大选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

员正好一半已从政治上被打倒了。随后又有别的一些著名人士在政治上被打倒。这一切也直接同赫鲁晓夫个人有关。因此，苏共二十一大除了确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控制数字”之外，还应当更加有力地体现出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建立了新的“磐石般的团结”。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莫斯科。

“控制数字”仍然把所谓“第一部类”置于对“第二部类”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说，重工业优先于生产日用消费品的轻工业和农业。这样的关系早在三十多年前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确定了。苏联领导希望在今后几年中“赶上并超过美国”。他们号召增加苏联现在的生产。我认为，在这样的前景下，的确谈不上喘喘气，谈不上比较大幅度地提高生活水平，虽然在作了一切极大的努力之后，生活水平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这种努力是二十一大所要求的，二十一大也是为此而召开的。

尽管人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不会讨论世界总的局势，甚至也不会讨论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但是人们预料大会进行过程中也将考虑这些问题，作这种估计是正常的。可以预期，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作为一个有利于为采纳尽可能雄心勃勃的“控制数字”计划而作出进一步努力的论据，将对二十一大产生影响。这关系到“赶超西方”，而这是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职责。另一方面，二十一大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有利影响，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将讨论苏联今后五、六年的和平建设。如果苏联打算放弃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苏联是赞成实行和平共处的，那么，它现在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计划。

不清楚赫鲁晓夫如何办到缓和由于在领导经济方面实行权力下放而在苏联社会中出现的矛盾。迄今为止，这已导致经济制度中各种因素之间的摩擦，由于取消了莫斯科的万能的某些中央权

力机构以利于国民经济委员会，因此，这个经济制度按照赫鲁晓夫的设想还应加以完善。国民经济委员会削弱了苏联国家和党的中央最高机构的权利，但是同时也使该制度地方化并解体了，因为不可能在行政上把一部分经济权力下放，而同时又加强使党和国家权力集中的总方针。这仍然是最高任务。

赫鲁晓夫是经济权力下放计划的创始人，但是，实际上他本人把几乎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赫鲁晓夫既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政府总理，又是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利于苏联制度的权力下放，而是相反。任何对苏联经济实行比较认真的权力下放的计划都必然同这一事实发生冲突，即便这样的计划是赫鲁晓夫本人提出的也罢。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来克服基于“一长制”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运转的制度的内部矛盾。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莫斯科。

从不久前开始，苏联报纸在攻击南斯拉夫的宣传中使用了新手法。现在这里越来越多地刊登报道南斯拉夫具体事件的“消息”，而不是刊登苏联“博士们”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文章，苏联读者，尤其是广大人民对这些文章肯定没有多大兴趣。《真理报》最近发表的报道萨格勒布博览会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的，文章报道了铁托同志参观博览会时采取的安全措施，说铁托在那里参观时如何不让人民去博览会，然后报道苏联馆的情况以及参观苏联馆的南斯拉夫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的最好的观后感。

这样一些事情比起那些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令人无法理解的、长篇大论的教条主义文章来，给苏联公民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多年来这里时长时短隔一段时间就写一些

这样的文章。现在苏联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各种权力机构：受攻击最多的是警察、海关和国家保安处，其次是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报界等等发表一些不利的评论文章。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总是贯穿一个想法：我们的人民是同南斯拉夫的权力机构对立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已有十来天我没有在日记上记任何东西了。全部时间我都花在对外交团作辞行拜会了：参加通常举行的饯行筵席，席上都得讲一番告别的话。这一切必须参加的活动都大同小异，不胜枚举，可以说，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我来莫斯科时所做过的事又重做了一番。

我不想记这些辞行拜会，这里我想写一次非辞行的拜会的情况。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费留宾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把我召到苏联外交部，把苏联政府关于贷款协定的第三个照会交给了我，苏联政府单方面地取消了我们的贷款协定，或者说确定了履行这些协定的新期限，然后要南斯拉夫政府接受已为我们方面拒绝的期限。现在苏联方面想把这一切说成是另外一个样子：竭力论证苏联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遵守国际惯例的一方，而南斯拉夫政府则是所谓不遵守这一惯例，而且也不肯进行谈判的一方。

苏联方面通过照会最终以损害南斯拉夫的方式解决了整个这件事。我想记下费留宾在把照会交给我之前作的一番开场白，他的这番话是饶有趣味的。

费留宾没有告诉我他为何召我来，而是关心起铁托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的健康来了。然后，他对我讲述他如何从莫斯科多次给铁托同志寄去“西伯利亚酸果”，说这种果子非常难得，有益于健康，他告诉我，这种植物生长在西伯利亚冻土带的雪下面。接着费留宾征求我的意见，现在要不要给铁托同志寄一些“西伯利亚酸

果去”，说趁我还在这里的时候他想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他拿不准，现在贝尔格莱德对此事将作何理解。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即便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只能把这理解为他个人所作的一种友好姿态和关心，就我所知，他同铁托同志的官方和个人关系过去是挺好的。费留宾然后说，他想通过我把“西伯利亚酸果”送给铁托，我答应了。费留宾接着请求我转达他对铁托同志的问候。

在费留宾作了这一番友好的开场白之后，可以预料，苏联政府照会的内容将是另一个样子，费留宾的任务是把照会交给我。遗憾的是，情况刚相反。我们再没有谈“西伯利亚酸果”，而是谈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我并不指望费留宾所说的什么包裹会通过我寄往贝尔格莱德。

* * *

最近在南斯拉夫流传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议论：应当把苏联的资金和黑山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否则黑山炼铝厂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官员把这一种议论从贝尔格莱德传到莫斯科来了，尽管这不仅对苏联方面不利，也对我们方面不利。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莫斯科。

为我离开莫斯科钱行的，除了其他国家外，还有西方国家的大使：美国大使莱韦林·汤普森、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以及英国大使帕特里克·雷利爵士。如果我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南苏关系比现在好的情况下离开莫斯科的，他们也很可能为我钱行。现在这样，他们也许更愿意对南斯拉夫及其在莫斯科的代表表示某种关切。

美国大使汤普森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恶化并未表现出特别高兴。据我看，苏联待汤普森不错，尽管苏美合作规模还始终很不足道。实际上，他在这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不是同上述情况毫不相干的，而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仍然甚为关切的是，同美国建

立合作和达成各种协议的关系，虽然苏联现在大肆攻击美国。我认为，汤普森在这里不仅在正式场合，而且在别的场合都受到良好的接待。对于他可以说，他在这里并没有通过反共来证明他对美国的效忠。

我同中国大使刘晓的告别谈话是最拘泥于形式的了。我们未提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也未提已坏透了的中南关系。我们这次谈话没有任何内容，也同我们以往的会晤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保持“对称”，就象下象棋一样，你走一步，我走一步，一个重复另一个所说的话，都不想法使谈话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几天前我向刘晓作辞行拜会时，他也感到不那么痛快，我同他一直保持着恰如其份的关系。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莫斯科。

为了向赫鲁晓夫辞行，在前往黑海之前，我曾在这范围内反复思考苏联的对外政策，虽然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在我们的谈话中是不会谈到的。可以预料不会谈及这些问题，而是相互声称：双方都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恶化。会再次讨论开哪一方应对目前的不好的状况负责。如果发生争执，不应恶化总的会谈气氛。我们将在他的家里，而不是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会谈，这一点也不应不考虑到。

据我看，这次我们领导方面须带给赫鲁晓夫一个口信，哪怕口信非常短，内容也是事先可以估计到的。我认为，俄国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赫鲁晓夫接见我之前几天他们便通知了我；过去他们没有这么做过。这样，我便有充裕的时间同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同志们联系，得到答复。由于我没有得到外交部的答复，（外交部只讲了一句话，他们“已获悉我将进行这次会谈”），于是今天我向我们的领导发去便函。信中我罗列了很可能要谈到的俄国人

和我们之间的一系列有争执的问题，以及我想向赫鲁晓夫提出的某些问题，从而使我们国内的同志们有可能通知我；在我所开列的问题清单上，我是否提出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莫斯科。

我在确定我将要求作辞行拜会的苏联官员名单时，我犹豫不决：我是否还要拜会我在莫斯科经常碰面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某些成员；其次，我要不要向苏联一些最高军事首长，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苏军元帅辞行。至于说党的领导人，我考虑作辞行拜会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其次是尼·伊格纳托夫、叶·福尔采娃、德·波利扬斯基等人。

我同列·伊·勃列日涅夫见过几次面。铁托同志一九五六年九月访问克里米亚时，赫鲁晓夫邀请了一部分苏联领导人去克里米亚，据种种情况判断，这些人同赫鲁晓夫是很亲近的，而且在苏联共产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新排列的顺序中是赫鲁晓夫所依靠的一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爬上越来越高的地位的苏联领导人当中有勃列日涅夫、基里钦科、福尔采娃以及格列奇科元帅等等。

在上述苏联领导人当中，后来我最常碰面的是勃列日涅夫。我同勃列日涅夫的这些会晤不是因为公务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书记，因此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同他正式会晤。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是对内的，所以他不担任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公务。每当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苏联政府的正式客人时，出席招待会的照例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在同赫鲁晓夫一起出席这些招待会的人当中经常有列·伊·勃列日涅夫，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他常常在场。有时，勃列日涅夫呆在一旁，一直等到我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结

束，因为赫鲁晓夫表示他希望我们面对面地交谈。在这样的谈话结束后，站在一边等着，有时等很长时间的勃列日涅夫通常总是问我，谈得如何，我便回答他，谈得很好，于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交谈就此结束。

在其他非正式场合，我同勃列日涅夫的接触比我同在正式场合碰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接触要随便些。警方说，勃列日涅夫知道我的儿子是在我到莫斯科后不久出生的，通常他见到米什卡和我总是问：“我们的小儿子好吗？”于是，如果在某次招待会上我们看见勃列日涅夫，事先便知道他会同我们这个问题的。最后，勃列日涅夫跟我一样是个烟鬼，他非常喜欢南斯拉夫的香烟，赞不绝口，即便他不称赞我们的社会主义，可却称赞我们的烟的质量好。当我递给勃列日涅夫一支南斯拉夫烟，或者当他比我还快，要我给他一支我们的烟时，我，作为一个抽烟的人总是感到很高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曾事先跟勃列日涅夫讲好，送给他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南斯拉夫香烟。我这个不可救药的烟鬼若是收到类似的礼物，该是多么地高兴，由此可见，大概勃列日涅夫收到这份礼物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尽管有上述种种因素促使我向列·伊·勃列日涅夫作辞行拜会，但是我没有去，虽然我相信，即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好，他还是会乐意接待我的。我也没有要求拜会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和苏联军事首长。我们的合作在“军事方面”尚未开始比较认真地发展，在我们的关系中尚未成为某种比较重大的因素。我们关系的这种状况也影响了我向苏联领导人作广泛的辞行拜会。

我决定照“国家关系这条路线”行事。除了拜会赫鲁晓夫——这次拜会也是极其重要的，还拜会了苏联外交部的官员，最后，在拜会名单上就只剩下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政府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了，我来莫斯科任职时曾拜

会过他们两人。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数十年来担任领导工作的苏联许多著名人士已从公众生活中销声匿迹了。

说到拜会伏罗希洛夫，我想，当我们的报纸和苏联的报纸发表南斯拉夫大使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消息时，会给苏联公众以及我国的公众留下好的印象。毕竟这一印象比我当时在克里姆林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国书时的情景要差一些，那时这位老人说，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好的，往事决不会重演。不错，往事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重演，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要说变好了，还相去甚远，这却是事实。

向尼·谢·赫鲁晓夫辞行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在前往加格拉的途中。

十月七日，将近午夜，我乘坐苏联政府为我提供的专机启程前往黑海。在这架伊尔—14型飞机里，没有座位，而只安放了一张床和几张沙发，这使人想起通常的卧室。当我们准备起飞时，我明白了，我是唯一的旅客。陪同我作此行的保安人员建议我铺好床睡觉，因为，我们得飞五个多小时，才能飞抵黑海边的阿德列尔机场。我第一次处于如此非同一般的境地：要在已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向南飞行的一架飞机上准备睡觉，就象在家一样。

本来我有些想拒绝他的建议。我觉得，在飞机上脱掉鞋，光着脚，穿着睡衣，上床睡觉，有点不寻常。要是飞机出事，那怎么办？我只犹豫了片刻，后来我想，不管我躺在床上，还是坐在椅子上，如果飞机出事，对我反正都一样。

很快我就“躺在”床上，“躺在”飞机上了，飞机的发动机在迷蒙的夜空单调地轰鸣着，催人入睡。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异乎寻常的，首先是我躺在床上这副样子，床边有一个台灯，透过台灯，我翻阅我为明天同赫鲁晓夫的谈话所作的笔记。

终于我在这间飞行卧室里进入梦乡了。我忽然想起，这很可能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这样的飞行旅行。当苏联保安人员叫醒我，准备下飞机时，太阳普照大地，使人感到天气暖和，同我们留在莫斯科的那种严冬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清晨六点过一点，在靠近座落在高加索地区的黑海边

的加格拉市的阿德列尔机场着陆。下飞机后，苏联机上人员又一次象军人那样向我报告，飞机仍留着听我调遣。在机场等候的司机，开车把我送到加格拉。我被安置在座落在该市半山腰的一幢陈设舒适的别墅里，他们建议我在这里休息。一小时后，我接到通知，赫鲁晓夫将于当天上午十点钟在他的避暑官邸接见我，官邸就在我住地附近。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加格拉。

我见到了赫鲁晓夫，他在黑海边一所不大的房子的花园里散步，房子四周是一片松林。赫鲁晓夫一个人在这里。这次会见颇为亲切。赫鲁晓夫问我是否知道我住的那幢别墅原来是谁的。我表示不知道，于是赫鲁晓夫就说，过去是贝利亚的别墅，并且发表议论说，这个“狗东西真会享受”。赫鲁晓夫笑笑，接着说，看，现在南斯拉夫大使住在贝利亚的别墅里了！

我向赫鲁晓夫“辞行”，在他那里呆了几乎一整天。在此期间，我们面对面地进行了三次晤谈，还不包括同赫鲁晓夫一家共进午餐。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午饭前在他别墅的院子里进行的。后来赫鲁晓夫建议，午饭后我们下海游泳。第二次谈话是在午饭后在黑海边的沙滩上，在帐篷下进行的。第三次晤谈又是在房子里，边喝着茶进行的，谈了大约一小时，这时尼娜·彼得罗夫娜^①走到我们这里来了。如果把吃午饭的时间也算在内，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我在赫鲁晓夫那里度过了大约八个小时。十月八日黄昏我坐飞机走了，松林、赫鲁晓夫的官邸以及远处一望无际的大海消失在暮色中。

赫鲁晓夫称赞这一段黑海海岸，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比克里米

① 赫鲁晓夫的妻子。——译注

亚那一段黑海海岸好。他说，在这里黑海最暖和，十月份都还可以游泳，所以他现在在这里休假。据我所知，除了他在雅尔塔的那幢旧别墅外，这是赫鲁晓夫在黑海拥有的第二幢别墅。接着赫鲁晓夫谈起斯大林在这一带的几个别墅。据赫鲁晓夫说，兹弗尔耶现在无人住，无论是他，还是别的任何人都不住那几个别墅。

赫鲁晓夫提到苏联今年的收成，人们指望今年的收成还是会不错的，赫鲁晓夫说，今年收购粮食的数字将会是确切的，决不允许象去年那样，把别的什么农产品(土豆)折算成粮食，来填补收购的粮食的缺额(去年收购的粮食比计划规定的数字少了三十五亿普特)，以便这样来“完成计划”。他说，是他要求今年这么办的，他希望“老老实实地干”，不论是否能完成规定的计划。

话题转到中国今年的收成，据各种消息判断，中国今年的收成将是创纪录的。中国人达到的高产量使全世界感到意外。赫鲁晓夫强调指出，中国人用劳动，用人的因素来弥补资金和农业机械化的不足，他们“象蚂蚁一样”劳动(他用的就是“蚂蚁”这两个字)。

赫鲁晓夫说，他不久前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对他说，他们的粮食将多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对他说，我相信，中国自己能最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会需要苏联专家。赫鲁晓夫对中国有关产量的材料有些怀疑，他提到一些数字，但是，加了一句：“如果这些数字确切的话”。

我们谈到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公社制度以及中国当前的其他一些标新立异的做法。赫鲁晓夫援引历史来说明，为什么俄国人占据了亚洲的北部，而中国人占据了亚洲的南部，在南部容易过活，这两个大国相互依存(“我们相依为命”)。中国人将找到组织他们国内生活的新形式，不应当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至于说人口过剩，赫鲁晓夫说，中国将在国内找到新的资源，来解决它众多的、迅速增长的人口问题。

我们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我说驻莫斯科外交团是对中国情况提出各种猜测和看法的来源。赫鲁晓夫支持这番谈话，同时他还引用了马列主义来回答某些问题。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了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的苏中关系会象迄今为止那样，如果双方都遵循这些原则的话。赫鲁晓夫说，“有人还拿中国来吓唬我”，但是，他靠的是马列主义，根据马列主义，必然得出结论：这两个大国之间不会再生过去那种事情。关于中国问题的谈话进行了近一小时。赫鲁晓夫一次也没有试图改变一直在进行的谈话的这个话题。

* * *

赫鲁晓夫看了看表说，该去游泳了，然后吃午饭，他邀我和他同去。他鼓励我说，我在这里用不着担心莫斯科的气候，也用不着顾忌我来时穿的是冬衣。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我说，莫斯科已冷了，我在那里只再呆几天，走之前，我有许多公事要办，我害怕着凉，现在我无论如何不能病倒。赫鲁晓夫不同意，他开玩笑说：“随您的便，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这又是指南斯拉夫的“独特性”。我看出，我最好是立即接受邀请，不过我始终竭力打退堂鼓；我说，我没有游泳裤。赫鲁晓夫叫我到他的衣柜里去找找。十分钟后，我挑了一件他的游泳裤，虽然这件游泳裤我穿着不合身，但是，在这种场合，却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不久便泡在海里了，对于我这个“莫斯科人”来说，海水在一年的这个季节竟是出乎意外地暖和。赫鲁晓夫还邀请了新西伯利亚城的党的书记跟我们一起去游泳，他是奉赫鲁晓夫之命前来向他汇报西西伯利亚的状况的。赫鲁晓夫说他自己游得不好，大夫要他不要过分累。因此，他泡在海水里时，胸部套了一只软木圈。

我们游离了海岸大约五十米。我离开他一段距离，而离我们

稍远的小船上坐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保安机关的军官，他还看着表，好让我们呆在水里的时间跟大夫给赫鲁晓夫规定的时间一样准确。我没有靠近赫鲁晓夫，为的是他去年在莫斯科当着我的面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十月赫鲁晓夫对我说，一九五六年秋天，他同朱可夫元帅到克里米亚度年假，当时他发现朱可夫元帅游泳时，老是挨他很近。昨天我们离开岸边游泳时，我就想起他讲的这个故事来了，他对我讲他当时产生了疑问，他看着朱可夫元帅，心想：“干吗他挨我这么近？”我慢慢地游，离赫鲁晓夫有十来米远。保持这个距离，我们可以正常地交谈。参加这段谈话的还有来自新西伯利亚城的党的书记，他游时也同赫鲁晓夫保持差不多这么远的距离。

* * *

游完泳，赫鲁晓夫邀请我们吃午饭。出席的人有：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夫的女婿和他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女儿，来自西西伯利亚的党的一位领导人。谈话中，基本上避而不谈政治题目。谈到一九五六年铁托访问苏联以及当时的特别友好的气氛。赫鲁晓夫同年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赫鲁晓夫每当提到铁托，总是说“铁托同志”。我们互致了很简短的祝酒词，赫鲁晓夫为南斯拉夫和铁托同志干杯。午饭时的气氛是友好的，亲切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在赴莫斯科的途中。我继续记向赫鲁晓夫辞行的情况。

午饭后，赫鲁晓夫建议我们到海边沙滩上的帐篷下谈话。当我们在为我们遮阳的帐篷下安顿好时，赫鲁晓夫却一言不发，等我开始讲。我请求他这次允许我看看笔记。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必要这么做，不过，我觉得我需要这么做，因为我一开始便谈起

铁托同志和我们的领导就南苏关系现状带给赫鲁晓夫的口信。

我最后对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好的，而且是最好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改变。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事情不应当继续恶化，而应当努力使我们的关系逐渐修好。尚有许多余地供我们进行合作，我们在各个领域多多少少仍只是处在刚刚开始阶段。我对赫鲁晓夫说，别的不说，我认为，应当不再让我们的关系继续坏下去，这样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尽管我们之间对个别问题的观点有分歧。我试图说明，我们觉得，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基本问题是，首先阵营停止报纸攻击南斯拉夫的运动。

赫鲁晓夫答复如下：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不正确的。南斯拉夫这次攻击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之间的这次冲突负有责任的是南共联盟新纲领。要是我们没有发表我们的纲领，那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终究应当明白这一点。我们对恶化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负有责任，因而也导致了取消贷款协定，他们本想同我们谈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很清楚，他个人在主席团作了多大的努力，坚持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而且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反对提供贷款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反得更起劲，接着是卡冈诺维奇和别尔乌辛。赫鲁晓夫接着说，他在一九五六年我们之间在匈牙利问题上发生冲突后总算保住了这笔贷款。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南共联盟新纲领中又公开地攻击苏联和阵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可能继续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赫鲁晓夫说，要是继续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苏联人民就会真的开始纳闷：苏联领导为什么不得不忍受这一切，还不得不给南斯拉夫钱。

赫鲁晓夫举出我们方面最近采取的一个不好的步骤是铁托讲到南苏经济关系是“互利的”，而说南美经济关系则是“无条件援

助”这样一种说法。赫鲁晓夫说，这样的立场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赫鲁晓夫说，如果苏联向南斯拉夫，或者任何别的国家提供贷款，那些资金是我们从自己的嘴里省出来的。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我们没有必要象西方国家那样输出资本，我们可以把全部资金投入我们这里，而决不向国外输出一个戈比。就我们的需要而言，现在如此，今后将长期如此。不过，我们向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援助。我们这样做，是作出了牺牲的，而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互利”。印度、埃及等国尊重这一点，而不象你们南斯拉夫人那样攻击我们。赫鲁晓夫在我们这次会晤中第一次使用这些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真的对此感到恼怒和激动。最后他说，要是没有南共联盟新纲领，也就不会有我们之间现在这场冲突。

我试图向他解释，他对铁托同志有关我们经济关系实行“互利”原则的话所作的解释不正确。归根结底，苏联从向南斯拉夫提供的贷款中也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得在规定的期限内归还贷款，并且付利息，在这些贷款的基础上，苏联将发展本国的工业，为我们的企业制造设备，苏联的贷款我们非得在苏联花不可。这就是说，他们也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好处，而不是损失。至于说我们的党纲，我引用了我在莫斯科的多次谈话，特别是同米高扬、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的谈话，我说，我们已采纳了我们能够采纳的所有意见。他们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制订不管什么样的纲领，尽管这是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制订的，而不是为苏联共产党人或者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制订的纲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接着我们谈到南斯拉夫当局，苏联当局在各种情况下对对方国家的公民的态度，还保留了许多老一套的陋习。赫鲁晓夫指责说，南斯拉夫当局在许多场合对待苏联公民的态度决非友好。他举了一件事为例，说苏联一位女共青团员曾被捕，这位女青年到南

斯拉夫去探望亲戚，她在我们那里无故被投入狱中关了六十八天。然后他提到我国政府在近东的某些问题上赞同美国政府的意见，我们的报纸的报道基本上跟《纽约时报》的报道一个样，反对苏联政府的立场。最后，赫鲁晓夫列举了阿尔巴尼亚人哈桑·斯帕塔事件，说此人被我们保安机构的人员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打死了。赫鲁晓夫援引了苏联报纸就这三件事所作的报道。

这位苏联“女共青团员”，我本人也认识。苏联警方硬把她弄到我们大使馆来。她企图同我的家庭以及同我挂上钩，她提出，她每天带我们的孩子去散步，教他们学俄语。他们在莫斯科没有得逞，内务部机关便把她派到南斯拉夫去。是她自己寻衅而遭致逮捕的，然后苏联报纸详细地报道了发生的一切情况，把这当作南斯拉夫对苏联公民不友好的一个例子。我把这一切都讲给赫鲁晓夫听了，并对苏联共青团机构采取这样的行动表示遗憾。（赫鲁晓夫的女婿阿·阿朱别伊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主编。）我请赫鲁晓夫详细了解这一切情况，他很容易证实我对他讲的事情的真相。

我向赫鲁晓夫说明了我所知道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斯帕塔在贝尔格莱德近郊死去的事。我说，我对这一不幸事件感到遗憾，尽管这个被打死的人过去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现在是挑拨南阿良好关系的敌人。地拉那政府为他之死确实感到高兴，正是地拉那的政府机构使得这位哈桑·斯帕塔掉了脑袋，而现在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却在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南斯拉夫笼罩着一片恐怖。遗憾的是，阿尔巴尼亚驻莫斯科的大使也举行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谈我国笼罩着恐怖气氛。

最后，我说，《真理报》企图把南斯拉夫对待黎巴嫩和约旦事件的态度——要求英美军队撤出——说成是亲美的，这种做法不妥。苏联外交部一开始就了解南斯拉夫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而且南斯

拉夫的这一态度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欢迎，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
《真理报》现在企图在这一点上也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

赫鲁晓夫甚至没有试图为《真理报》辩解。他说，所有这三件事本身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罪恶的血”日复一日地流进我们的关系中，他对此甚为遗憾，因为他个人为使我们的关系极其圆满地发展作了不断的努力。显然，赫鲁晓夫已不再提对南斯拉夫提出指责的这三件事了，这是苏联的“专门机构”为这次会谈专门为他准备的，可惜，材料不扎实。使赫鲁晓夫最不满的是，我举例说明了《共青团真理报》和苏联国家保安机构进行合作，那位“女共青团员”在南斯拉夫被捕一事揭开了它们的合作之谜。

谈到这些事情使赫鲁晓夫处境不妙。因为基本上是一些具体的事实，他用这些事实来指责南斯拉夫，而这些事实我比他知道得更详细。我对这些事情作的解释，他既不能否认，也无法接受，因此便回到“一般问题”上来了。他感到在这方面处境要好得多：一切更象是进行“原则性的讨论”，在这方面苏联的地位看样子牢固些。赫鲁晓夫把一些事情归咎于南斯拉夫，而对于这些事情，我无法只是说不是那么回事就驳斥得了的。例如，他断言，南斯拉夫反苏，我们用“老眼光”看苏联，我们在苏联看到的只是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等。

赫鲁晓夫指责我们的报纸围绕纪念突破萨洛尼卡战线四十周年以及对纪念活动本身所作的报道，说这一活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赫鲁晓夫说，我们方面把这样的精神贯穿到对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邻国的关系中，不能不对我们同这些国家（指保加利亚）的关系产生坏影响。赫鲁晓夫这样讲，使得我有机会举出有关保加利亚政策的历史事实——早自一八七六——七七年的战争中俄国人把他们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起——这些历史事实任何一方都无须加以评论。我提到了沙俄的一些将军，

他们当时指挥了解放保加利亚的战斗，我提到俄国军队当时所蒙受的牺牲。保加利亚解放后，保加利亚人马上便让德奥王朝当政，而且在欧洲发生的所有危机中，从那时一直到最近这次大战，保加利亚一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最后，在最近这次大战中，保加利亚又成了希特勒的盟国，反对南斯拉夫和俄国。仅仅在当代，三十年来，保加利亚就站在对立的一方打过三次仗，进攻塞尔维亚和黑山，后来是进攻南斯拉夫，在这些战争中，保加利亚始终是日耳曼人的盟国。

我们南斯拉夫既没有公开谈论，也没有公开报道保加利亚人这个希特勒的盟友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在马其顿、塞尔维亚以及南斯拉夫其他地方犯下的大量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同德国占领者犯下的罪行一样残暴，一样血腥。我们今天可以对此保持沉默，只要我们想这么做，可是南斯拉夫人民对这些全都清楚，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把保加利亚说成是过去战争中的朋友和盟国。

至于说纪念突破萨洛尼卡战线以及同保加利亚军队——它当时也是德国在战争中的盟国——打仗的问题，我对赫鲁晓夫说：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举行类似的纪念活动，恐怕这样的纪念活动在南斯拉夫今后还要举行。我提到列宁对巴尔干独立国家，即黑山、塞尔维亚以及希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的解放性质的看法，这三个国家都曾同轴心国及其盟国保加利亚作过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如此。这样的过去，今天是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所不喜欢的。他们已当了政，想忘掉这一切，就好象这些事没有发生过似的，想用忘掉的办法来摆脱这样的过去，可是，这一切是历史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毫无办法。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没有要保加利亚给予战争赔偿，如果我们向今天的保加利亚索取的话，我们是会在任何国际法庭上打赢这场官司的。

赫鲁晓夫没有打断我的话。据我看，关于保加利亚的这些事

实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他没有料到他会听到这一切情况，我相信，不然的话，他是不会提出保加利亚问题的。给赫鲁晓夫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是，我引用了列宁关于巴尔干国家同轴心国以及保加利亚进行的战争的解放性质的论述。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知道列宁的这一立场。这对他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会加以驳斥，唯独驳不倒我引用的列宁的话。

我批评于哥夫、加涅夫等人还在谈论马其顿人民从历史上、民族和文化上是保加利亚人，而马其顿是保加利亚的领土等等言论，对此，赫鲁晓夫表示对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感兴趣，他问：保加利亚有没有马其顿人，有多少。他想结束我们有关保加利亚的谈话，他说，他不知道于哥夫等人说的话，不过，今天来谈改变欧洲国界，那是愚蠢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少都有少数民族，可是，这些问题同向任何国家提出改变国界的领土要求完全是另一码事。赫鲁晓夫说，他向阵营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说过，他将再次向他们讲；与此有关他举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赫鲁晓夫说，他过去还对波兰人谈过这一点。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现在由于少数民族问题而提出改变领土的要求，那么，到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南斯拉夫，都要进行这种改变，整个东欧都有这个问题。不应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说，他一到托多尔·日夫科夫，就将同他谈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谈到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好象一位法官似的。他说，他很难判断谁是谁非；我们这么说，阿尔巴尼亚人那么说。他说，阿尔巴尼亚人在谈到南斯拉夫的态度时向他们证明阿尔巴尼亚人的指责是有根有据的，而且拿出文件来证明。他说，他已很久没有见到恩维尔·霍查了，不过，他要是见到霍查，他会对他讲，因少数民族问题而提出领土问题，是不对的。赫鲁晓夫重申，他本人不了解我们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情况，他指出，

南斯拉夫是个大国，而阿尔巴尼亚属于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列。显然，赫鲁晓夫这么讲是把同阿尔巴尼亚冲突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我们，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大，谁就应当表现出大得多的耐心。

我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期望我对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象对保加利亚问题一样，发表长篇大套的类似讲话。我忍住没有这么做。我说，南斯拉夫不仅尊重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还从自己方面积极捍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受到西方国家威胁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阿尔巴尼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解放自己的国家，同法西斯强国进行过英勇斗争。我还举出战时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一些简要的材料。战后，阿尔巴尼亚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南斯拉夫的预算，尽管南斯拉夫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很贫穷的，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我不想谈一九四八年以后直到今天阿尔巴尼亚领导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我说，我相信阿尔巴尼亚现领导放弃这样的政策的日子终将到来。

当我们谈到匈牙利时，赫鲁晓夫象以前有一次那样，问我南斯拉夫有多少匈牙利人。我说，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可能有四十五万左右，或者稍多一点。赫鲁晓夫笑笑，说我把数字说少了，他说匈牙利同志告诉他，在南斯拉夫大约有一百万匈牙利人。我否定了这一说法，不过，我说数字上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国政府的政策，我国政府的政策在行动上承认各少数民族享有完全的民族平等。我指出，由于执行南斯拉夫各少数民族都无例外地享有民族平等的这种民主政策，因此一九四八年我们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我们同我们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南斯拉夫有很多——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麻烦。我相信，要是南斯拉夫对自己的少数民

族采取消除民族特征和不平等的政策，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获得的印象是，我在有关匈牙利人在南斯拉夫的人数这个问题上没有使赫鲁晓夫信服，他更相信匈牙利的材料，而不相信我们的材料。他没有对我们的民族平等政策发表意见。

当我们讨论报纸问题时，我说苏联报纸和南斯拉夫的报纸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我们对苏联的情况作了广泛的日常的报道，而他们基本上是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才报道南斯拉夫。赫鲁晓夫说，很可能由于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好，个别人只打算写坏的东西，或者就根本不报道我们的事。赫鲁晓夫说，“您以为一切都是赫鲁晓夫下命令这么干的，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许多事情我是事后才听说的”。

我们转换了话题，这时赫鲁晓夫问我，本来应当靠苏联贷款建设的那些企业，我们怎么办。美国人现在是否将向我们提供援助。我说，我不知道，我们无论如何将采取措施，建成潘切沃的氮肥厂和一些比较小的工程；很可能我们为此将从某个国家得到贷款。我认为，我们不会得到贷款来建设黑山的炼铝工业。需要的资金数目很大。看来，谁也不希望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起新的强大的炼铝工业。赫鲁晓夫发表看法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将不建炼铝厂。

他提起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事情上看法都是一致的。他列举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看法一致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断言，我们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他说，南斯拉夫起劲地反对阵营，而警方说同波兰不同，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同波兰意见不一致，可是，在阵营等问题上却不象跟南斯拉夫那样吵架。波兰人对待重大问题采取基本的、阶级的态度，同阵营国家站在一起，而不象我们。赫鲁晓夫说，就说苏联确实犯了我们指责他们所犯的那些错误，可是，这个基本的、阶

级的态度总是否定不了的，而我们南斯拉夫人却加以否定。我试着使我们的讨论转而谈具体的例子，以便弄清楚这种断言。赫鲁晓夫又提到我们的报纸，说我们自吹自擂，经常突出自己，可是别人也是有功劳的。我们没有在每件事上都争论，我只是说，在我们那里，例如，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异议，我们经常维护这一点，而且公开这么讲，而在苏联，即便今天仍然在对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和革命作出不确切的介绍。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赫鲁晓夫说起今天苏联军队的实力来了，他说，苏军的实力比过去强大得无可比拟。赫鲁晓夫说，上个月在克里米亚开了一个会，讨论苏联海军的状况和更新装备的问题。苏联不再建造传统的海军舰只，他们原来设想要建造的，全都放弃了。一切靠火箭来解决。他们用火箭不仅完全控制一些重要目标，例如土耳其的几个海峡，而且还控制着比这远得多的地区。今天俄国人可以严密地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苏联有些“海军军人”还反对为旅游者开放象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基里钦科，还有一些人向他建议发放特别通行证，赫鲁晓夫说，他拒绝了。宁愿不为旅行者开放克里米亚，也别实行特别通行证的办法。赫鲁晓夫说，由于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军事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他们的军事领导人过去是克里米亚的绝对主人。这种情况今天在苏联其他地方还可以遇到。赫鲁晓夫说，假若象克里米亚这样广阔的地区继续不对外开放，那么，旅游业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莫斯科。
向赫鲁晓夫辞行情况续志。

我们在海边的帐篷下谈话，这次谈话除了头半个小时外，没有

多大连贯性，谈话快结束时赫鲁晓夫说，我们之间不信任在加深，这是他最不希望。他举了苏联某位原子专家的例子，此人不久前提醒苏联政府注意一个情况：俄国人同南斯拉夫人一起在贝尔格莱德建立的那个反应堆有不同于美国类似的反应堆的某些更先进的解决方法，苏联方面应当考虑到这一事实，因为这个反应堆现在掌握在南斯拉夫手里。赫鲁晓夫对我说，他斥责了这位苏联专家，对他说，您想些什么？您以为南斯拉夫人马上就会打电话把美国人叫来，告诉他们这个情况。

赫鲁晓夫对我说，他几次要《真理报》也发表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正面东西。他说，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越来越不信任，而且范围越来越广。他在谈这一点时好象是我们要对苏联越来越不信任南斯拉夫负责似的。我就此指出：不仅苏联报纸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而且苏联科学院也参加了“反对修正主义”，即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这使我们的关系又倒退了一步。很明显，报纸发表这样的文章没有任何好处，而科学院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书，这样来搞，那就更糟了。

* * *

赫鲁晓夫指责“南斯拉夫逮捕共产党人”。他说，他听说在我们那里逮捕了根据苏南两国政府协议从苏联遣送回南斯拉夫的前流亡分子。我请求赫鲁晓夫最后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南斯拉夫不逮捕俄国的朋友，而逮捕对南斯拉夫进行敌对活动的人，因此，这些人是赞扬还是诽谤俄国，那是次要的。我说，今后还会这样，别指望会有任何改变。

* * *

赫鲁晓夫还指责我们对斯大林持片面的和完全否定的看法，他说，他们苏联人对斯大林的全部错误要比我们清楚得多，不过，历史将视其功过实事求是地对一切作出评价，因为在斯大林的工

作中也有积极的一面。我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在苏联期间，我没有同任何一位同我交谈过的苏联人谈起过斯大林。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这个问题时对斯大林作了客观的评价。鉴于我们之间的种种情况，铁托对斯大林的评价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赫鲁晓夫说他不知道。

* * *

至于说总的形势，赫鲁晓夫说，他并不认为东西方关系会恶化，更不能说存在爆发比较严重的冲突的危险。他说，资本主义在逐渐削弱。非洲处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不强大，试想，难道纳赛尔、苏加诺，或者伊拉克新政府等能够保持住政权吗。美国就会向那里直接派兵，用武力进行干涉，并强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重新遭受奴役。赫鲁晓夫说，苏联将继续为和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在今后十五——二十年对我们来说尤其需要；十五——二十年之后，谁都发动不起来战争，即便想发动也罢。美国仍然不希望欧洲缓和，因为，如果局势普遍缓和了，就会削弱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体系，就会削弱美国的军事联盟，削弱他们的军事基地，那就会使他们的国内政策遇到困难。

赫鲁晓夫最后说，他们对苏联的对内对外事态发展非常满意。他提到对世界舞台的力量对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某些事件。他说，近几年发生了几起重要事件，这几件事全都对帝国主义，对美国人不利。赫鲁晓夫列数的几件事是：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西方进攻埃及失败、印度尼西亚暴乱的失败、联合国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撤出黎巴嫩和约旦的决议。赫鲁晓夫说，形式上这是外交解决，而实际上就是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从那里强行赶走。然后，他还列举了伊拉克的革命，美国人在远东威信扫地，美国在那里不得不维护蒋介石，并扬言为了中国的几个岛屿还要打仗，虽然很明显，美国

既不会为了台湾，也不会为了中国沿海岛屿而在那里发动战争。

* * *

赫鲁晓夫认为，只有我们两国的代表举行会谈，才有可能改善南苏关系，并且附加一句，这一次不考虑由俄国人去南斯拉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南斯拉夫人应当来莫斯科，要是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好的话。赫鲁晓夫没有明确提举行新的会晤，可是，很清楚，他是有某种类似的考虑的。

谈话中赫鲁晓夫两次自言自语，一边大声地说着话，一边在思索：如何来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大概说了这样一番话：鉴于苏联和阵营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已进行了半年，我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已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有什么手段和办法使我们的关系突然变好，一下子全都改观。同南斯拉夫相邻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我们的这场运动的怂恿下，已开始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虽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魔杖会突然间使这一切变好，但是，对我们之间老是没完没了地争吵这样一种状况以及前景，我认为是不堪设想的。我认为，我们之间必须平息下来，停止反南运动，或者哪怕是变变语调和用词，改变写这种攻击性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时，还应当写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正面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一切必定会在我们之间造成较好的气氛，到那时，才比较容易找到改善我们关系的途径。

赫鲁晓夫已明白，目前我们方面没有主张我们两国代表会晤的任何建议。他重申我们要对目前的状况负责。他再次讲，他个人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和别的任何情况下做点有益的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赫鲁晓夫好象是作某种结论似地说，他们方面不会恶化关系，也不会攻击南斯拉夫，并将在国家关系上继续同我们保持合作。我表示相信，他所说的不恶化两国关系的态度会在贝尔格莱德受到欢迎。可以看出，他对实际上证实各方仍就坚持自

己的观点这样一个结论并不特别满意。也许他本来估计南斯拉夫将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议，为此我才从莫斯科去黑海的。此事毫无结果，可以预料，我们关系不好的状况将继续下去。

尽管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的情绪一直很好。下午大约五点钟光景，我再次感谢赫鲁晓夫的友好接待，并向他表示我要告辞了。赫鲁晓夫没有答应，他又邀我进屋喝茶。在那里我们继续谈，不过，没有什么新的重大的东西。赫鲁晓夫重申现在谈不上采取非常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发表看法说，恰恰应当取消非常的措施，诸如相互冲突以及我们关系中出现的其他一些不好的意外事件。赫鲁晓夫又一次说，责任在我们方面，他提到，今年夏天他要求我继续留在莫斯科，先是他获悉我们方面接受了他的要求，后来又变卦了，把我调回国。赫鲁晓夫问：是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苏联。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强调，这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我将继续在这方面做工作，尽管我不呆在莫斯科。我们喝了茶，赫鲁晓夫让我吃匈牙利苹果，他说，这是卡达尔·亚诺什前几天给他寄来的。他对卡达尔满口称赞。

最后，晚饭前，我感谢赫鲁晓夫这次非常友好的会见，我对占用了他整整一天的时间表示歉意。赫鲁晓夫请我转达他对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三同志的问候。我想就在屋门前向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告辞。赫鲁晓夫不同意。我们走到汽车前，我再一次感谢这次接见，并向尼娜·彼得罗夫娜告别。自从我来到苏联以来我第一次称赫鲁晓夫的名字和父称向他告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再见”。我想，在俄国这样的道别，是出远门时才这么做的。当俄国的哥萨克和军人前往远征时，同他们是这样道别的。在我的汽车还没有拐第一个弯时，我向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挥手告别，以答谢他们送我。

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十月八日我在建造在加格拉山上的贝

利亚过去的别墅过夜。当时已是晚上七点钟光景。在别墅里，我碰见了七、八位苏联政府高级官员，他们是应赫鲁晓夫之召，早在上午就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这里了。他们对我说，他们等赫鲁晓夫接见他们谈话，已等了半天了。其中有些人我早就认识。这些人大多数对我明显地冷淡，这是符合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目前的糟糕的关系这一精神的。

一位我比较熟悉的俄国人、苏共中央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开玩笑地指责我说，我“破坏了他们的工作日”，因为，“由于我”，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我说，他们浪费了时间，是个损失，并表示我对同赫鲁晓夫的谈话感到满意。除他之外，别的苏联官员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表示愿意同我谈话，于是我便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在赫鲁晓夫对我采取友好的、诚挚的态度之后，他们对我采取这种态度就愈加显得不友好，那天我是赫鲁晓夫的客人，这批苏联高级权贵显然对此感到不悦。也许他们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比赫鲁晓夫对我的友好态度更好、更确切地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真正态度。无论如何，他们的态度可以作为对我刚刚才告别的赫鲁晓夫的态度修正和补充。我试图找出这批苏联最高级官员对将要离开他们国家的南斯拉夫大使态度如此冷淡的原因。我同赫鲁晓夫的友好谈话不会由于他的这批主要助手对我采取相反的态度而变得令人尴尬。

苏联报纸在头版报道了我的这一次辞行拜会的消息，但是只字未讲拜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也没有提赫鲁晓夫请我共进午餐。在我之前一两天，中国大使刘晓拜会了赫鲁晓夫，苏联报纸报道说，赫鲁晓夫请他共进午餐，一切都是在“友好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最近美国电影制片人约翰斯顿在同一寓所里拜会了赫鲁晓夫。对于约翰斯顿，也报道说，曾同赫鲁晓夫共进午餐。

在赫鲁晓夫的挽留下，我同他呆了一整天，我应邀同他和他一家人共进午餐，受到了格外亲切和友好的接待。苏联报纸对这一切当然就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在报道我向赫鲁晓夫作辞行拜会的消息中竟然强调我去那里是应我“自己的请求”，似乎应别的什么人的请求，也可能进行这样的拜会似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莫斯科。

我一面为最后离开苏联在作准备，一面象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翻来复去地考虑尼·谢·赫鲁晓夫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尽管俄国人和外国人在这方面作过各种各样的猜测，赫鲁晓夫经过四年之后，还是采取了各种手段摆脱了他的为数不少的对手。

赫鲁晓夫远比他的大多数对手和助手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摒弃那些代表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采取了对苏联国内的发展以及对加强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具有巨大意义的若干主动行动。

赫鲁晓夫的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决定之一便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国际关系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这一新的原则基本上开始得到承认，而这个原则是斯大林所抛弃的。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便开始失去其普遍的、非实行不可的意义，尽管莫斯科即便在今天也没有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赫鲁晓夫明确规定：苏联和阵营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为摆脱冷战和消除核战争危险开辟了前景。赫鲁晓夫开始广泛地在苏联实行尊重社会主义法制的政策。他给许多无辜地被杀害的苏联公民恢复了名誉，把活着的人从集中营里放出来，这些集中营几十年来一直

是“个人迷信”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由于赫鲁晓夫是个好活动的人(他比苏联领导中的任何人都更多地面向苏联公众),一反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那种漠不关心、死气沉沉的局面,苏联在某些方面开始有点动起来了。赫鲁晓夫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中的那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专家和理论家,他们直到今天仍然只知道重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调。赫鲁晓夫公开把苏联这样的理论家称为“学舌鹦鹉”,莫斯科的《真理报》当时还刊登过他的这种说法。

尼·谢·赫鲁晓夫在改变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道路上,最初迈出的一大步是,他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份去贝尔格莱德。当时他同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的国家领导人举行了谈判,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这个宣言意味着南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铁托同志一九五六年六月访问苏联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访问期间,通过同尼·谢·赫鲁晓夫的谈判,发表了《莫斯科声明》,该声明意味着南苏两党关系正常化。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也对非洲和亚洲的新独立国家奉行新的政策。在这方面突出的是,苏联参与埃及(阿斯旺水坝)以及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建设。同斯大林时代的态度不同,当时莫斯科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人如果不是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至少也称他们为民族资产阶级,尼·谢·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对外政策方针,走上同这些民族领袖及其国家合作的新道路。

赫鲁晓夫对俄国的管理不单单是通过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没有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和国家保安机构而把自己同苏联人民隔开。他不是通过可能是特地为他制作的影片来了解苏联的国情,也不回避同人们接触和交谈,一句话,他的举止完全不同于他的前任。

另一方面，从赫鲁晓夫身上可以举出不少的事，使人回想到过去，想到斯大林时代，连赫鲁晓夫也没有摆脱斯大林时代的影响。赫鲁晓夫继续起劲地执行斯大林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在阵营中的霸权的政策。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通过苏联军队干涉匈牙利局势，当时匈牙利使社会主义阵营有解体的危险。当时他还发表了几次公开讲话，颂扬斯大林，称赞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忘记了他自己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却是相反的话，忘记了他自己因此而成为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制订人。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主张杀害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赫鲁晓夫继续维护必须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观点，以及社会主义应当无条件地以“苏联为首”的观点。

苏联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的制度以及赫鲁晓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新措施是行政性的，基本上没有触及苏联制度中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改组”之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直接生产者同苏联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苏联刻板的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很难忍受，实际上是不接受赫鲁晓夫在这个领域推行的新措施。

尽管赫鲁晓夫是南苏关系正常化的倡导者，但是，在实现正常化之后，苏联的政策却在我们之间过去发生冲突的类似基础上，促使我们两国之间出现了新的政治冲突。在新的冲突中，赫鲁晓夫通常比苏联其他领导人更激烈地攻击南斯拉夫，而且从教条主义和保守的立场攻击我们。跟不久前的过去一样，在我们之间的冲突中，苏联方面不大考虑事实和原则，不大考虑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而其任务只是不惜任何代价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这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真理报》，即苏共中央对南斯拉夫的粗暴攻击中尤为突出。

赫鲁晓夫在南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对我们逃往东方的流亡者的态度基本上未改变，他象过去一样，称他们为“共产党人——国

际主义者”。

在上述种种情况中，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极力想方设法“安抚”苏联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势力，对于它们的存在和影响他是给予足够的考虑的。一九五七年六月之后，在苏联领导中再也没有著名的斯大林分子了，赫鲁晓夫仍然是这样做的。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倾向于接受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原则，可是，实际上他未能真正地实行这个原则，也未能在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着手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虽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在有的地方暂时接受了这个原则，例如对待南斯拉夫就是这样，他们也未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一新政策。情况表明，苏联方面把这看成是一个策略步骤。

赫鲁晓夫在国内政策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削弱了国家和党的中央机构的神圣的无所不能的权力的措施以及一些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逐渐动摇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地位。

苏共二十大之后，人们本来期待在苏联社会享有创作自由方面会出现可以容忍这种自由的气氛。然而，根本未出现类似的气氛。党的官方理论和国家的控制重新在这方面不断加强。

虽然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阴影下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又爬上了苏联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但是他仍孜孜不倦地努力使他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状况变好。这个制度是赫鲁晓夫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制度也把赫鲁晓夫造就成一位政治家。谁也脱离不了本性，即便赫鲁晓夫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同一个人身上会碰到新旧两种因素。

南苏关系也是在这样一些矛盾的背景下发展的，两国关系不时陷入危机。据我看，虽然可以说，赫鲁晓夫决不喜欢我们关系出

现这种状况,但是他并不准备,或者说,他不能够按照《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精神,以苏联政府总理的身份,用新的方式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就象《宣言》和《声明》规定的那样,同我们平起平坐地解决争端。赫鲁晓夫没有这样做,而是凭借过去的做法,凭借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在赫鲁晓夫看来,南斯拉夫作为共产党人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应当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用来突出说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出乎意料的态度例子,便是我对赫鲁晓夫的辞行拜会。

* * *

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我向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作了辞行拜会。谈话是公事公办式的,空空洞洞。这两个人都对我同赫鲁晓夫的谈话情况感兴趣。

我在黑海岸边同赫鲁晓夫谈话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便从莫斯科启程回贝尔格莱德。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那天我同米什卡和孩子们一起终于离开了苏联。

(完)

写在“完”之后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贝尔格莱德。

自从我写下这些日记以来已过去将近十五年了。我在“完”之后再补充写几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了。当我记下这件事的时候，我感到我仿佛参加了他在莫斯科的葬礼。

在赫鲁晓夫逝世前一天，我同我的家眷离开了莫斯科，就这样结束了我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在苏联的第二个“任期”。

我同米什卡商量我们向尼娜·彼得罗夫娜发一封电报，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九月十三日，我在贝尔格莱德我的办公室里，拟好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打好字，然后应当象其他任何私人邮件一样，把电报寄给在莫斯科的赫鲁晓夫的家属。在此期间，我在南通社的新闻稿上看到了苏联塔斯社播发的讣告全文，根据讣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就赫鲁晓夫之死只发表了唯一的一句话，在一份简短的讣告里宣布说，“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此外，再没有别的了！

* * *

我要回了我的电文，另写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

尼娜·彼得罗夫娜及尼·谢·赫鲁晓夫家属：

我们同你们一起深切哀悼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深为

悲痛，因为我们在你们国家的多年期间，曾荣幸地享受到这位伟大人物的友谊和殷勤好客的接待。

我们相信，南斯拉夫和全世界的千百万人今天也同你们一起，将怀着尊敬的心情怀念尼·谢·赫鲁晓夫和他的事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各国人民争取美好生活、实现各国之间合作和友好、争取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史上。让这位杰出人物的朋友、钦佩他的人以及他的最亲近的人把这作为对这一最沉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的祝福吧。

请接受我们最深切的吊唁。

布迪斯拉瓦和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于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最大的日报《政治报》编辑部的某位编辑得知我的这份电报，便在九月十四日该报的第一版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消息。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电报是官方性质的？如果《政治报》不认为我们的电报是官方的，我肯定，苏联当局准是这么看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贝尔格莱德。

一九六九年共和国总统铁托同志再次任命我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这次任命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在还有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队的参与下，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之后作出的。这次军事干涉凭借的是所谓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为这一理论辩护的基本理由是，按照苏联和阵营的解释的“社会主义的更高利益”，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说来话就长了。

这次我想对我第二次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期间记下的是同尼·谢·赫鲁晓夫有关的事。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一九六四年十

月十四日尼·谢·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解除了党和国家的所有职务并被赶下了台。我当时作为南斯拉夫驻美大使在华盛顿已有两年时间。那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尼·谢·赫鲁晓夫这样被解除职务和领取养老金后，我还会再次去莫斯科。

我在华盛顿期间，不可能象过去多年那样，直接注视南苏关系的发展，更不用提直接注视尼·谢·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了。尽管如此，从这么远的距离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到，尼·谢·赫鲁晓夫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对外政策方面，近几年来，苏联的对外政策，即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在两个主要方面遭到了两场重大失败——在东方，同中国发生了冲突；在西方，发生了古巴危机。

我并不认为同中国的冲突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这一冲突曾是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新的、令人担心的因素。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恐怕也没有抱多大的幻想：似乎搞掉赫鲁晓夫，他们就会使苏中关系修好，尽管开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搞掉他，两国关系就会变好。

虽然赫鲁晓夫直到他倒台也没有从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危机给他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他在对外政策中的失败对他被撤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国内的原因对尼·谢·赫鲁晓夫的下台起决定性的作用。对外政策的失败只不过促使苏联国内的力量联合起来搞掉赫鲁晓夫。尽管他们把这些失败归咎于赫鲁晓夫，但是，在苏联，人们都很清楚，不单单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要对苏中关系负责，正如不仅仅是他要对美国对苏政策负责一样，即便是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也不可能改变这一政策，正如赫鲁晓夫没能改变一样。认为国内原因是促使他下台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看法也可以从他的继任者仍然执行尼·谢·赫鲁晓夫的

对外政策这一事实得出。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贝尔格莱德。

我第二次在苏联任职，差不多在莫斯科呆了两年时间——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这次我在莫斯科工作的总的条件丝毫不利。

由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又发生了冲突。此外，苏联机构对整个外交团，特别是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些变化。尽管如此，我仍然抱着希望：我将有机会重新见到尼·谢·赫鲁晓夫。我感到非常遗憾，我没有可能拜会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间曾经常殷勤接待我的那个人。

我要是通过苏联官方机构要求作这一拜会的话，我可能只好立即“卷铺盖”回贝尔格莱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连想都不可能想。

正如苏联其他人士一样，尼·谢·赫鲁晓夫的被解职也就同时意味着他被判处永远失宠。用这种方式被解职的苏联领导人自动地被打入某种现代的冷宫，被革出教门。把人排除出社会这种做法又在新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效了，虽然苏联法律根本未作类似的规定。

虽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次关于苏联最高领导改组的决定是通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作出的。在斯大林实行独裁统治的几十年内，曾作出过一些类似的决定，那些被解除领导职务的人既丢掉了职务，也丢掉了脑袋。赫鲁晓夫之所以不是以这种方式被撤换的，最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本人。在赫鲁晓夫领导苏共和苏联国家时，他所作的最大贡献是：使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做法开始成为过去的事。

米什卡和我看到我们同赫鲁晓夫会晤没有希望了，便多次试

图通过赫鲁晓夫在台上时可算是他的朋友的苏联高级官员，转达我们对他及其家属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怀疑，我们这件事也没有办成功。当这些苏联官员和他们的夫人——我们以友谊的名义寄希望他们将这样做——明白了我们的意图时，便躲开我们，回避我们，不同我们接触。不用说，如果我同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会有助于这种关系。遗憾的是，南苏关系以及苏联制度本身都经不起这样一次会晤。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贝尔格莱德。

当我现在记下赫鲁晓夫被解职这件事时，苏联不久前的过去一幕一幕的情景便浮现出来。那时赫鲁晓夫撤换了他的对手和反对者，把他们从他通往苏联政界顶峰的道路上排挤走。赫鲁晓夫并不是首先主张从政治上打倒斯大林时代的那三个苏联著名领导人的发起人。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企图排除赫鲁晓夫，但是，正当他们以为斗争获胜的时候，他们却失败了。

“反党集团”成员从苏联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可是，他们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在搞次要的工作。

我认为，赫鲁晓夫的处境接近于我称之为“打入冷宫和革出教门”的那种地位，而不是“反党集团”成员所处的那种地位，他没有象莫洛托夫那样被派到遥远的蒙古，也没有象马林科夫那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而是留在莫斯科郊区自己的别墅里。我相信，赫鲁晓夫被“强行”软禁在莫斯科要比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有公务在身，日子更难过，尽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远离莫斯科几千公里，他们只有经特许才能去莫斯科。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被判了刑：特殊的终身软禁。由于他生性好动，所以这样一来他被判处了很可能是对他

打击最重的徒刑：他不得不在与世人隔绝的环境中孤独地度过他的晚年，而他到那时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同人们的谈话中度过的。

看来，那些决定支持选举新领袖的大多数人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会再象尼·谢·赫鲁晓夫时期那样，要跟各种各样的倡议，新的做法和主张打交道了，而那些东西又是同业已建立的苏联制度是不相符合的。苏联新领导似乎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使苏联重新朝着经过考验的方向前进，而不采用赫鲁晓夫给他们搞的那套出其不意的新做法。苏联国家和社会有组织的力量：苏联共产党、军队、国家保安机构以及其他政权机构看到，如果让尼·谢·赫鲁晓夫继续担任领导，那就会出现他们不愿遭到的危险。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贝尔格莱德。

就赫鲁晓夫被解职而论，一九五七年十月赫鲁晓夫撤换朱可夫元帅的情况同七年后撤换赫鲁晓夫采用的办法非常相象。这两件事“从技术上”来看几乎完全一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被撤职时看来都正处于权势的顶峰。两人不仅完全没有料到，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央委员会已给他们安排了什么，赫鲁晓夫曾把党和国家的某些最高权力还给了中央委员会。

朱可夫元帅在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后回国，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在这里为他安排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便被径直送去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向他宣布了出乎意料的决定：解除他在苏联的所有党和国家的职务。这次是赫鲁晓夫提出作出解除朱可夫职务的决定的。

七年后，赫鲁晓夫从黑海海边度完年假回到莫斯科，恰好也从莫斯科机场由阿·伊·米高扬——赫鲁晓夫也未料到——把他带去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他甚至不知道召开了这次会议，而他当时是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和苏共的领袖。会上向他宣读了解除

他的所有党和国家职务。如果可以作什么比较的话——虽然只是就事件经过的表面现象而言，采取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苏共中央在撤换赫鲁晓夫时，已经有赫鲁晓夫排除朱可夫元帅这一先例可循。当时看来赫鲁晓夫巩固了他在苏联最高层的地位。后来情况表明，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朱可夫元帅是使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全会上取胜的关键人物之一。朱可夫元帅的功绩在于：他在这些事件中使苏联军队的领导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七年后情况表明，赫鲁晓夫失去了苏联军队的支持，尽管赫鲁晓夫那次仍然能够掌权并不仅仅是依靠苏联武装力量领导的支持。

虽然在赫鲁晓夫时期导致苏联许多最高级领导人被撤换以及赫鲁晓夫本人被撤换的原因有很大不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作起诉报告的都是同一个人：米·安·苏斯洛夫。他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作起诉报告的人，当时从政治上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他也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底苏共中央全会上作起诉报告的人，那次解除了朱可夫元帅的职务。然后，米·安·苏斯洛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做了同样一件事：作起诉报告，这次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贝尔格莱德。

要是说我在莫斯科第二次任职期间苏联新领导对我的态度冷淡，而且严格按礼仪行事，那么，对苏联采取这种态度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是：在我第一次在苏联任职期间尼·谢·赫鲁晓夫多年来对我的态度友好。这一点苏联新领导是很清楚的，在苏联新领导看来，我是——这并没有错——尼·谢·赫鲁晓夫的朋友和钦佩者。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担任南斯拉夫大使时，一些苏联领导人

曾向我表示，他们是了解我的这种情况的。

我之所以写这些细节，是因为他们谈起在那个时候南苏关系的气氛如何如何，虽然撤掉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内政，也不管赫鲁晓夫，或者在他之前被撤职的朱可夫元帅在南斯拉夫是深得人心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贝尔格莱德。

在我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我听说赫鲁晓夫有时可以同住在离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不远的附近村里的农民见见面，赫鲁晓夫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晚年。我听说，有时他同农民一起到附近的河里捕鱼。在莫斯科还听说，赫鲁晓夫经常同农民交谈农业情况，他不谈农业又谈什么呢！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从事他毕生专心致志搞的一项工作。

赫鲁晓夫被撤换以后曾获准在参观一个展览会和在莫斯科投票站——赫鲁晓夫以前也在那里投票——选举苏维埃政权机构时公开露面。这样做恐怕是想表明，说尼·谢·赫鲁晓夫被打入什么冷宫和被革出教门，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他们甚至允许给赫鲁晓夫拍照，拍电视片，说明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行使公民职责，如何在莫斯科投票的情景。

当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在莫斯科投票站出现时，等待他的有一大群人，他从汽车里一出现，人们便自发地向他鼓掌。在投票站，赫鲁晓夫结果身边既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其他任何个人证件。正如他本人所说，他这样来参加选举使选举机构处境尴尬，因为苏联法律规定，选举人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才能证明有资格参加投票。领导这一地区选举的官方机构负责人是一位妇女。她热情地向赫鲁晓夫问候，她说，整个俄国都认识赫鲁晓夫，他们相信他，即便没有身份证也罢。世界广泛地，用文字和图片，报道

了赫鲁晓夫和这位妇女的讲话。

这次“事件”之后，再也不允许赫鲁晓夫露面了，无论是投票，还是干别的什么事。赫鲁晓夫仍然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院墙里，生活在自己家庭的圈子里。只有他不得不临时住进莫斯科医院时，他才离开这幢别墅。

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贝尔格莱德。

最近我收到尼娜·彼得罗夫娜同志和赫鲁晓夫的亲属从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尊敬的韦利科和布迪斯拉瓦·米丘诺维奇同志，

我们极其诚挚地感谢你们就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而对我们表达的热情和友好的感情，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痛苦表示的同情。

你们发来的电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祝你们幸福。

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

及赫鲁晓夫全家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于莫斯科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贝尔格莱德。

最后，在我结束这番记载时，我要提醒一点：问题不在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以后，尼·谢·赫鲁晓夫不再在苏联掌权。尼·谢·赫鲁晓夫领导苏联的时间是很长的，达十年之久。我认为，问题在于：尼·谢·赫鲁晓夫的被撤换再次证实，在“第一个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的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同在台上的个人有关：个人的威信、政治影响、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对某个人过去作用的评价，甚至这个人生活的物质条件。一旦这个人被赶下台，随之而来的是他不再露面，他这个人便销声匿迹，可以说成为一个无个性

的人；甚至默然禁止公开提到以这种方式被逐出社会的这个人的名字。此外，这样的人往往还身受与世隔绝这套做法之苦。

这样的做法年深已久，它是撤掉某人权力的组成部分，虽然国家的法律对此未作任何规定。这一套做法一直伴随着赫鲁晓夫，直至他去世。可以说，在他死后还伴随着他，因为最高当局只准许苏联报纸就尼·谢·赫鲁晓夫之死报道一句话。

按照这种精神，他们从这个世界送走了“领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没有葬在克里姆林宫旁的红场上，那里有列宁墓，在那里苏联新领导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块墓碑，那里安葬着自十月革命至今，苏联功勋卓著的人物的遗体。赫鲁晓夫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家属和一些朋友参加了葬礼。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向 《文学语言》杂志发表的谈话

——《莫斯科的岁月》一书作者回答问题

去年年底萨格勒布大学图书出版社出版了韦利科·米丘诺维奇的《莫斯科的岁月》一书，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南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于1956—1958年期间在苏联所写下的真实的日记。

米丘诺维奇这本书除了是对非斯大林化的最初一些步骤以及在新的、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南苏关系的重要见证外，同时又通过特殊的方式比较深入地和直接地阐明了“情报局”反对南共和我国的那场运动的性质、原因和后果。

这本书对二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叙述，使年轻一代格外感兴趣，为此我们恳请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革命家和社会政治工作者、联邦会议成员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同志向本刊回答与《莫斯科的岁月》一书的写作，首先是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

您的日记里所写到的那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是什么原因今天使您想起了那一段时间？有哪一些回忆促使您着手整理发表那时的笔记？

那些事件深深地刻印在记忆中。南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

国内当真广泛地期待南斯拉夫和苏联在相互关系中求得某种新的和积极的发展。1956年上半年是这样的。在我们就匈牙利问题再次同苏联发生公开冲突期间，事情开始明朗化了，人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看法了。如果说我们方面有过幻想的话，也让位于必然的现实感。

我想，苏联方面也出现了头脑清醒的过程，他们看清楚了，南斯拉夫仍然站在自主和独立的立场上，它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后的事件都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南苏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这在那几年几乎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每当南苏关系出现一段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在不同的领域合作共事，每当我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照例是在我们的独立和平等这个问题上展开较量，尽管这种冲突的缘由总是别的问题。我在莫斯科的第一次任职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种多变的“冷冷热热”的气氛中度过的，关于这一点，《莫斯科的岁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

在整理这个材料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在每一个场合下是否都做得很好？为了避免吵架，在某些情况下是否本来应该向俄国人作些让步？在所涉及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否有可能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对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势力和影响是否作了现实的估计？俄国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不象1956—1958年那样？本来是否有可能发展得更好些？

还出现过这样一个想法：要是公开地，详详细细地去谈论当年属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件“内部”的事，今天是否应该记述这一切，这是否会有给我国或者某个领导人造成损害的危险。我在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今天应当记述那时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参与者，尽管所牵涉到

的是不同国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认为，有必要写他们，有必要写已经作古的其他一些人，有必要尽可能清楚地记述他们所持的立场，只要有可能，仍有必要援引他们用以论述自己的立场的原话，记述他们对于自己和别人的行动寄予什么希望，总而言之，有必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他们是如何“制订”他们所代表的“政策”的。我认为，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记述这些人士，是把神话同现实分开，前者往往被用来掩盖后者的实质。用这样一种方式记述的这些人士，看上去比较正常，比较真实，“从天上又被拉回到地上”。

我认为，我们不再保留老的门面——这种老的门面往往使人们不能够真实地看清楚事情——真实地记述过去的人和重大事件，是无损于任何人的。相反，弄清楚某一方过去的行动的真相，对于正确地评价过去，对于应付新的事件，都只会有所裨益，对年轻一代来说，尤其如此。

编年史作者的任务是忠实地和真实地记述事件和人物，避免对事件和人物制造假相。算旧账是不好的，出于利用前任的错误来对付他们的继任者这样的目的来算旧账，那就更其糟糕。但是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过去时期各国政策的真相，不说别的，仅仅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这种政策，也有必要这么做。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您在自己的书里所谈到的许多事情是历史，是他们不大清楚的历史。在您看来，在我们历史的这一个变化多端的时期，今天的年轻一代首先应当了解什么？

年轻一代对过去的一些事件的了解受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总是无助于使年轻人很好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对他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曾经发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对于《莫斯科的岁月》一书所涉及的某些事件，可以说，情况也是相类似的。

虽说老一代的人很清楚我们历史的那个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年轻一代很可能只是现在才有机会第一次听说那个时期的某些事件。在这方面，我认为这一本和类似的回忆录性质的书填补了一个空缺，使读者暂时回到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需要维护我们的革命，以便它能够在独立、社会主义和自治的南斯拉夫的新条件下继续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我的书所要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就在于此。

或许在我国年轻的一代看来，南斯拉夫今天所处的地位，它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它在国内发展上的自立，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以为这样的状况以前就存在，以前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同时他们还可能认为，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劳永逸地夺得了这些成果并使之受到保障，而在此之后，似乎事情是毫无痛苦地发展的，是自然地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一直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状况。记述个人对过去这一领域内发生的事件的见证，无疑有助于扩大年轻一代的视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便于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前景。

时间把我们同这本书所谈及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事件分开，时间起了自己的作用，促使有些事情越来越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当时展开激烈争论的某些主要问题在我们的伙伴们看来也变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南斯拉夫业已表明，要让它背离自己的独立立场，那是办不到的。每当试图这么做，照例会引起南斯拉夫对这种尝试的抵制，而我们同试图这么做的那些国家的关系就会陷于困难。总而言之，我和我的伙伴已经多次看到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很好地和友好地合作，也即哪些道路是通向破坏这种合作的。我们之间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有助于消除我们例如二十年前在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我在《莫斯科的岁月》一书中谈到了这些困难，当时这样的合作陷于危机。

国外的某些宣传中心试图让您的书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尽管它谈的是历史。对于某些人士所显示的那种耸人听闻的态度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这本书里谈到的一些重要内容的忤度，您是如何解释的？

这本书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西方国家有一大批报刊发表了有关这本书的详细介绍。这些介绍文章是五花八门的。有些写得可以叫人接受，是报道性的，而根据另一些文章则可以判断，在这本书所谈到的问题上，冷战政策的立场还十分顽固。有的地方还可以遇到以往冷战年代的那种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有些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它们是根据“自由的选择”，而不是根据书里所写的东西，对书里的某些部分作了片面和不平衡的介绍，而对书里的另一些部分则避而不提。

有些西方国家的某些报纸首先是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报道这本书的，从书里选择某些段落和掐头去尾的句子，而无视其余部分。这样一来，在许多情况下就忽视了赫鲁晓夫这个人，忽视了他在苏联生活中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尽管这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我想有谁对这本书作出评判，又愿意保持客观的话，那他是不可能无视这个问题的。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可以判断，东方把这件事看成是，似乎这本书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写的。有些人对这件事也是这么对待的，而无视一个起码的事实，那就是这本书当然只牵涉作者本人，是由我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跟国家和党的机关没有任何的关系。出版这本书的企业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事的，严格遵守南斯拉夫处理这类事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现在有效的所有法律规定。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不结盟的南斯拉夫的独立和爱好和平的政策。跟今天一样，在这本书所谈到的过去，南斯拉夫是从独立和不结盟的立场出发对待各种事件的，不结盟当时刚刚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后来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道义政治因素。南斯拉夫政策中的这样的连贯性肯定使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感兴趣。

外国报纸对这本书的一部分书评中不谈南斯拉夫在不结盟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这样的作用，似乎书里根本没提这一点似的。

是什么原因当时促使您写这些笔记？由于什么您在这件事情上顽强地坚持了下去？

促使我二十多年前开始作这些笔记的主要原因是同南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南斯拉夫政府决定派我为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的政治意义相关联的。显然我在莫斯科的新职务比起到当时为止我所担任的工作来说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尽管在解放以后的十来年中，一直到我被任命到莫斯科任职之前，我始终担任高级职务。

当然，我不可能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事态会如何发展，也不知道我在莫斯科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我在莫斯科的逗留期间会发生一些政治上重要的事件。因此，1956年在我还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在我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就开始记这些笔记。一旦开始记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尽管在记笔记过程中也暂时停过，有过危机，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看出这一点。

要是能够谈一谈显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的话，我认为，如果是指整理这一材料，供出版用，那是可以这么说的，而不是指当初的记笔记，我认为，当初记笔记时并没有显示什么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压缩这一材料时，我认为倒是可以这么说。我于1974年7月初突然患了瘫痪症。这场病的一个后果是，我的右手永远地丧失了，右手再也不能写字。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使用左手和打字机——用打字机表明要比学习重新用铅笔写字有效得多——我在压缩这些笔记上所花的时间要比正常条件下多得多。

有的时候，在较长时间处于“休息”状态下时，不论你愿不愿意，几乎是自动地，象是某种条件反射，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些我难于驱散的“不祥的念头”。而最好的办法是工作，是整理这些笔记，我认为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您所谈的显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来的。

据说您的书被苏联官方代表称作为“反苏”的书。

我们南斯拉夫人不写反苏的书。我看不出有谁能够根据某种方式把这本书所记述的事实评价为是“亲”某一方或者“反”某一方的。要是我们打算这么来对待这本书的话，我认为可以把这本书看成是“亲南斯拉夫”的，而未必事先就把亲南斯拉夫的事情看成是反苏。只要莫斯科官方人士不喜欢某些东西，或者想事先就把它搞臭，不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先就贬之为反苏，这当然是苏联的老一套做法。俄国人现在仍然想采用这种老规矩，很可能是寄希望于通过使用这个词说，某种东西是“反苏”的，从而事先就把它搞臭，并确保苏联官方的观点的进步性和正确性。

众所周知，关于某方的反苏主义这个词本身起源于六十年前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在当时以及此后的许多年内，苏联方面的这个政治标签往往具有无所不能的意义。说某人“反苏”这个概念当年具有确切地规定的政治内容，反苏主义是俄国和世界上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形形色色反动和反革命的势力的政治纲领。

在苏联存在的这六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莫斯科现在的做法好象世界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似的，似乎今天只要一使用关于某人有反苏主义这个当年无所不能的词，就无需再去证明某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了。

关于这一点，看来莫斯科老是忘记，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官方政策多年来是极端地反南斯拉夫的，不顾社会主义革命已在南斯拉夫获胜，不顾共产党人在我国掌权。后来，苏联的官方政策成了激烈反华的政策，保持了多年，直到今天。近来，苏联的官方政策自称是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同时莫斯科又多年谈论别人有反苏主义。

在援引同苏联最近几十年的官方政策有关的这些不同事例的时候，有必要提醒一下，在莫斯科时而采取否定一些人，时而否定另一些人的观点的时候，充当它的伙伴的有共产党人掌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共产党。

考虑到这样一种事态发展，考虑到总的局势以及苏联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反对”立场的政策，我相信，莫斯科说某种东西是反苏的，而且只是根据它不符合苏联一时的领导的心愿就这么说，这种口号越来越达不到目的。

您的书里谈到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有时被压下去了，而当这两个国家发生公开的政治冲突的时候，又公开地显露出来。二十年前的您的这番话在多大的程度上仍然是现实的？

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南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苏南关系比起 1956—1958 年间我谈到这一关系时要好些。在独立的、不结盟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作为世界两个超级强国之一、跟西方国家军事集团对立的一个军事集团的盟主

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苏联之间存在分歧和对立,是不足为奇的。要是我们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分歧和矛盾,那就是怪事了。我在书中谈到 1956—1958 年间,这些分歧是如何和在多大的程度上在我们之间反映出来的。令人遗憾的是,书的相当一部分是谈这些分歧的,也即是谈我们彼此间的冲突,谈为时不长并让位于新的冲突的“和解”的。

事实是两国之间曾经存在的某些分歧和矛盾在过去这二十年中得到了消除或者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苏关系发展的经验表明,当我们极其激烈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最大。反之亦然:当我们两国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和互利的合作的时候,分歧就被排挤到次要轨道上。这一点在今天要比过去可能要清楚得多,过去总是合作时期和冲突时期相互交替。

从经验中我们知道,通过冲突,通过使我国变换它的全盘政策所奉行的基本的和独立的方针是不可能来“解决”或者“消除”这些分歧的。这条规律越是得到尊重,南苏关系就越是得到发展。今天变得清楚的是,克服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的最可靠途径是发展全面的合作。要是双方都始终从平等的立场出发对待这一合作,随着时间的消逝,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分歧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将成为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符合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利益的主要内容。

您的书对南苏关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认为,这本书在这方面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取决于就这些国家所写的书的话,世界今天就会是另一副模样。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对苏联的情况说好话或者说坏话,而是记述有关某些人士,有关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的事实,

使今天的南斯拉夫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了解这些事实。

当然，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把象出版一本书这样的事情搞成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这是指，在一个国家里人们只写这个国家的政府所希望的那样的书，那样的话，这个国家的政府要对在这个国家里所写的一切直接负责。如果那样的话，这就意味着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莫斯科的岁月》是南斯拉夫最官方的人士写的和出版的。

让某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写的东西负责，这是一种压力。这实际上不过是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强加于另一个主权国家罢了，如果这个国家不接受想强加于它的做法，就设法追究它的责任。要是同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话，这就意味着承认某人有权干预别人的内政，因为事实上所涉及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当一本书成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争端的时候，是可以对某些人的行动作这样的解释的。

在国际关系中，您二十年前所谈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在大程度上还存在？

在《莫斯科的岁月》中，我曾试图谈一谈我对二十多年前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看法。由于局势所致，发生了好几起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事件，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我不想列举这些事件，因为即便对于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说，这些事件也是很熟悉的，书里不过是记述了比较详细的材料罢了。这些事件中的某些事件即便今天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政治趋势中，首先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政治趋势中起着重大作用。今天，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跟这本书所谈到的1956—1958年时的情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看法都一样。

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参与这些事件的许多人已经

不在人世，书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历史早就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跟过去一样，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相互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问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用行动来承认存在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点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都是过去提出的，南斯拉夫早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今天，有比我们所谈到的过去强大得无可比拟的政治力量主张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当年看上去似乎是难于实现的目标，今天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如果我们只谈它们的话——看成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可以听到有人指责您的书损害某些国家的威望，是这样吗？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我们也好，对其他人也好，基本的问题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得到客观的情报，并对过去的某些行动，对当时存在的状况作出评价。错误不在于现在公开地和真实地来谈论这一过去，错误在于某些有关的国家继续坚持掩盖这一过去，继续坚持生活早就作出了判断的的和错误的观点。有人现在还想把对这种消极的过去保持沉默的做法强加于人，这反映了没有变化的老观点，似乎可以继续把某一方的政策说成是永远正确和始终不渝的，而不论这种政策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怎么样的。

至于说到威望的问题，如果现在谈到有关二十多年前某一方的政策的一些真实和众所周知的事实，某一方今天的威望是不可能受到损害的。反之亦然：某一方如果今天还不表现出准备尊重

有关自己过去的政策的一些事实，想把这种政策说成跟过去的情况不同，那么它的威望真的可能发生问题。对这个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会提高任何人的威望，而只会破坏和缩小这种威望。

您是有涨有落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的见证人。在这方面您如何评价国际工人运动中目前的状况？

非斯大林化过程是由于我们1948年抵制了斯大林的侵略政策而开始的，而在斯大林死后立即扩大了，尽管我们需要等待几乎三年时间，才等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所作的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必要谈谈这条道路上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会把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我只想最简要地提一下这些事件中的某些事件，在我看来，这些事件可以用来尽可能确切地反映被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的这个经常矛盾的过程的发展情况。

在我看来，非斯大林化政策的高潮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政策的低潮是同年，1956年10月至11月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斯大林化政策的高潮和低潮在主要战线上迅速地相互交替。

第二年，1957年，苏联，也即国际工人运动在这些变化方面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同年7月宣布了苏联领导中强大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教条主义集团在政治上被消灭，他们曾经领导被称之为斯大林主义势力的苏联的那股势力。同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各国共产党会议，通过了十二国共产党宣言，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外，在本国掌权的所有共产党都签署了这项宣言。在非斯大林化过程的发展中这项宣言是倒退一步，同年7月苏联发生的事件曾经使这一过程得到新的推动。

后来，这一条道路上的事件是以不同的速度根据各国的特殊

地位发展的,在有些国家里,共产党人掌了权,在有些西方国家里,共产党是一支重要的内部政治力量。我不再进一步列举事件,我认为,如果说我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步地继续在发展,尽管是不平衡的和通过适应各国的不同条件在发展,这么回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里,事情也不可能倒退。

《莫斯科的岁月》的文学特点使人得出结论,您如果没有走上另一条路的话,您的生活的道路很可能会通向文学和写作,您是否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没有机会来选择,也没有条件来选择。

至于您所提的关于我可能从事文学和写作的问题,这是后来才谈得上的。我不相信我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格外的才赋,因为不然的话,我认为,这种才赋会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多年的政治工作中,我就当时十分紧要的一些问题写过许多东西。写这些东西是(革命)运动的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完全是在这一范围内进行的。我不可能知道,如果我不干我干过的行当,我没有干我过去所干的工作,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认为,生活把我领向了另一边,我除了写了《莫斯科的岁月》这本书这一次之后没有从事写作,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多大的损失。要是我不是从事这一问题,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多年从事这一问题,而不仅仅是在这本书所涉及的1956—1958年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从事这一问题,很可能我也不会写这本书,当年也不会记这一日记。

您喜好的文学工作是什么?现在您看什么书?

近来,我自发地比较多地阅读我国和外国政治和历史回忆书籍,而不是阅读其他某些文学著作。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由



2 028 7970 5

于我近年来所处的那种境况，由于多年来个人在这方面的活动，这一类书籍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您的书在公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迄今就这本书所写的文章而言，都是很好的，虽说这些文章只发表在地方性报纸上。根据以下事实也可以猜到，这本书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在为时几个月的很短时间内，这本书几乎一销而光，尽管对于我国来说，这本书的发行量是不小的（一万册），而书价令人遗憾的是又相当高（350第纳尔）（按约合20美元——译者注）。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我们的其他中心，这本书长期被列入畅销书的名单上。

就这本书我收到了我所认识的同志以及我所不认识的同志的一批信。所有这些信都持肯定态度并且是令人鼓舞的，其中有些信对待这本书采取很广泛的分析态度。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受到读者的欢迎。我不知道我们的书评界会有什么反应。这还要拭目以待。

我已经谈到南斯拉夫出版《莫斯科的岁月》一书在国外所引起的反应。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许多国家的主要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从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起——该报详细地报道了《莫斯科的岁月》——直到美国《时代》杂志，该刊也广泛地报道了这本书。

东欧国家和苏联甚至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发表了这本书。

（这一谈话发表在塞尔维亚青年文学杂志《文学语言》

1978年5月10日第100期第3—4页上。）